图 1　　霍去病墓石雕伏虎

图 2　　顺陵瑞兽

图 3　　顺陵走狮

图 4　　桥陵蹲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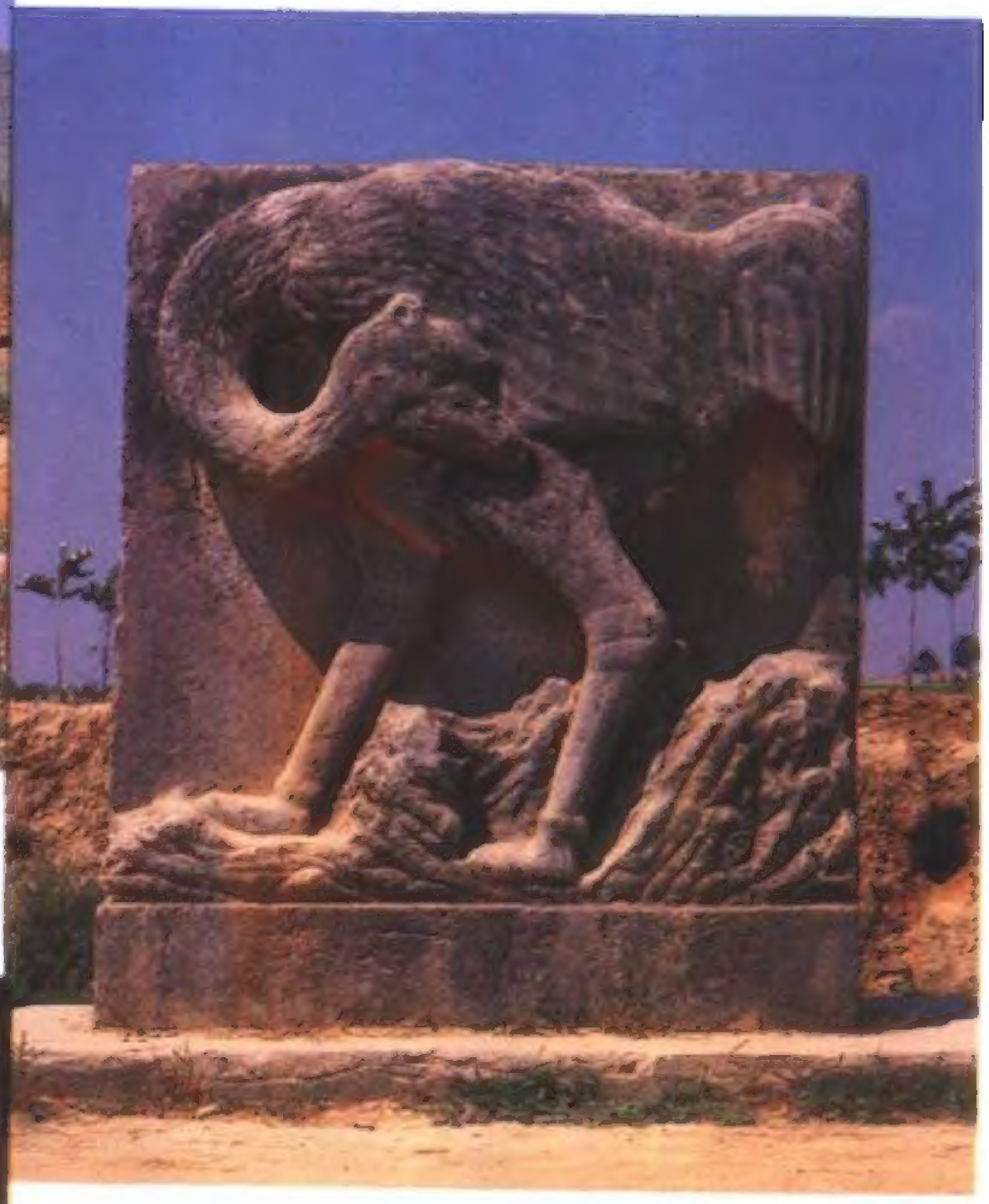


图 5　　桥陵驼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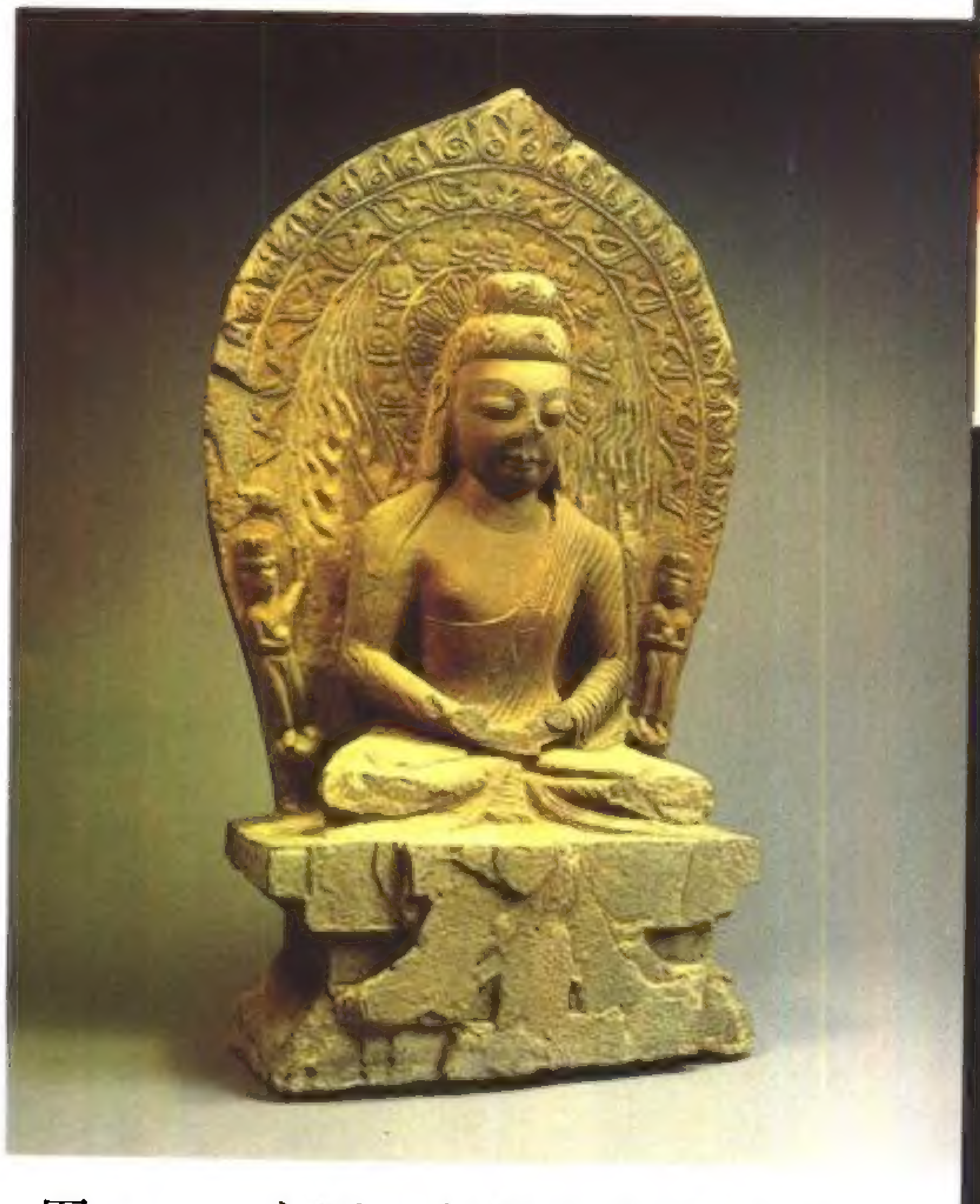


图 6　　永平二年释迦牟尼造像

图 7　　刘宝生造像

图 8　　黄花石观音像

图 9　　隋菩萨头像

图 10　　菩萨残躯

图 11　　白石菩萨头

图 12　菩萨残头

图 13　释迦牟尼佛立像

图 14　西安碑林石刻廊

图 15　乾陵无字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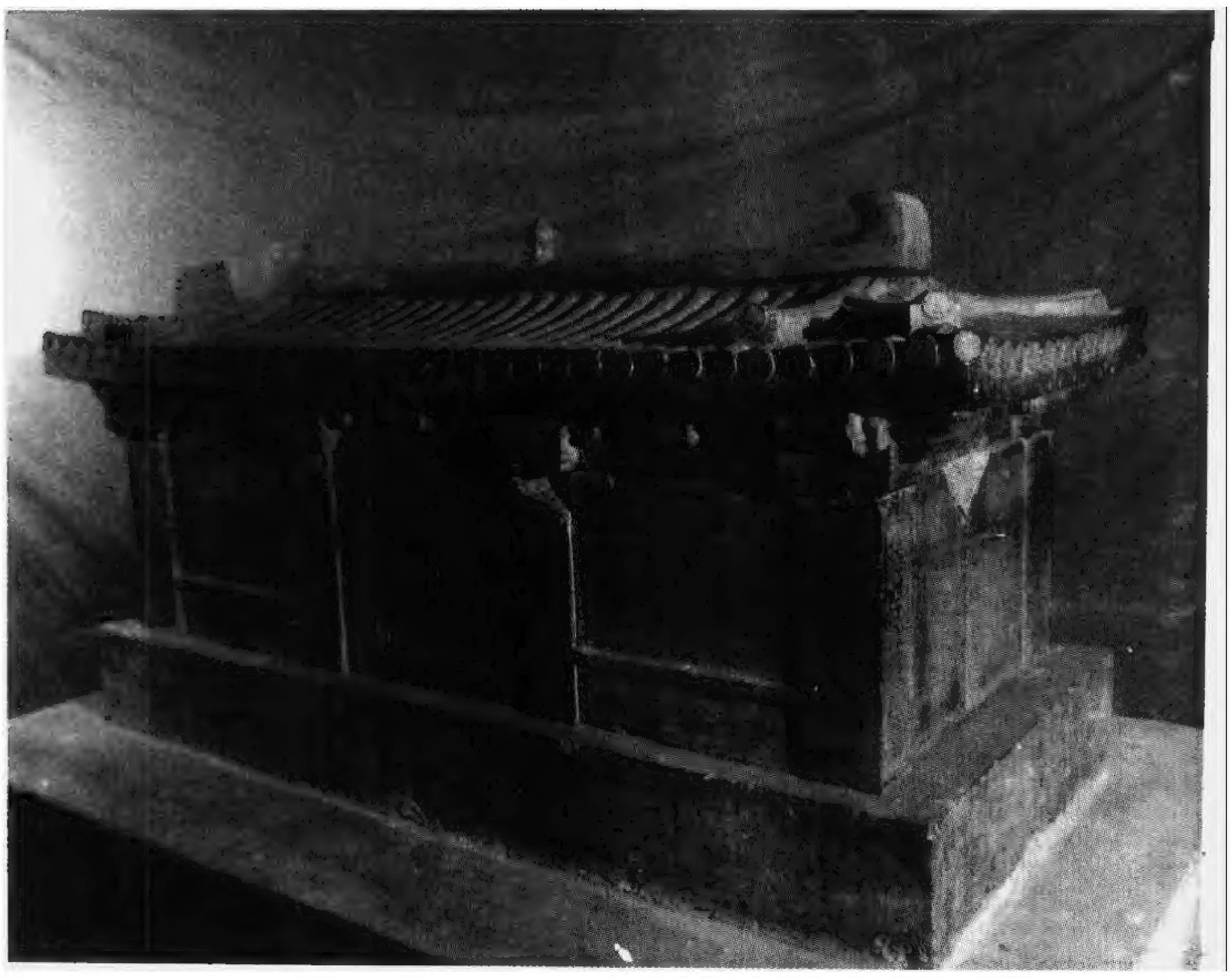


图 16　李静训(小孩)石棺

图 17　李寿墓石椁

图 18　献陵石犀

图 19　石刻密教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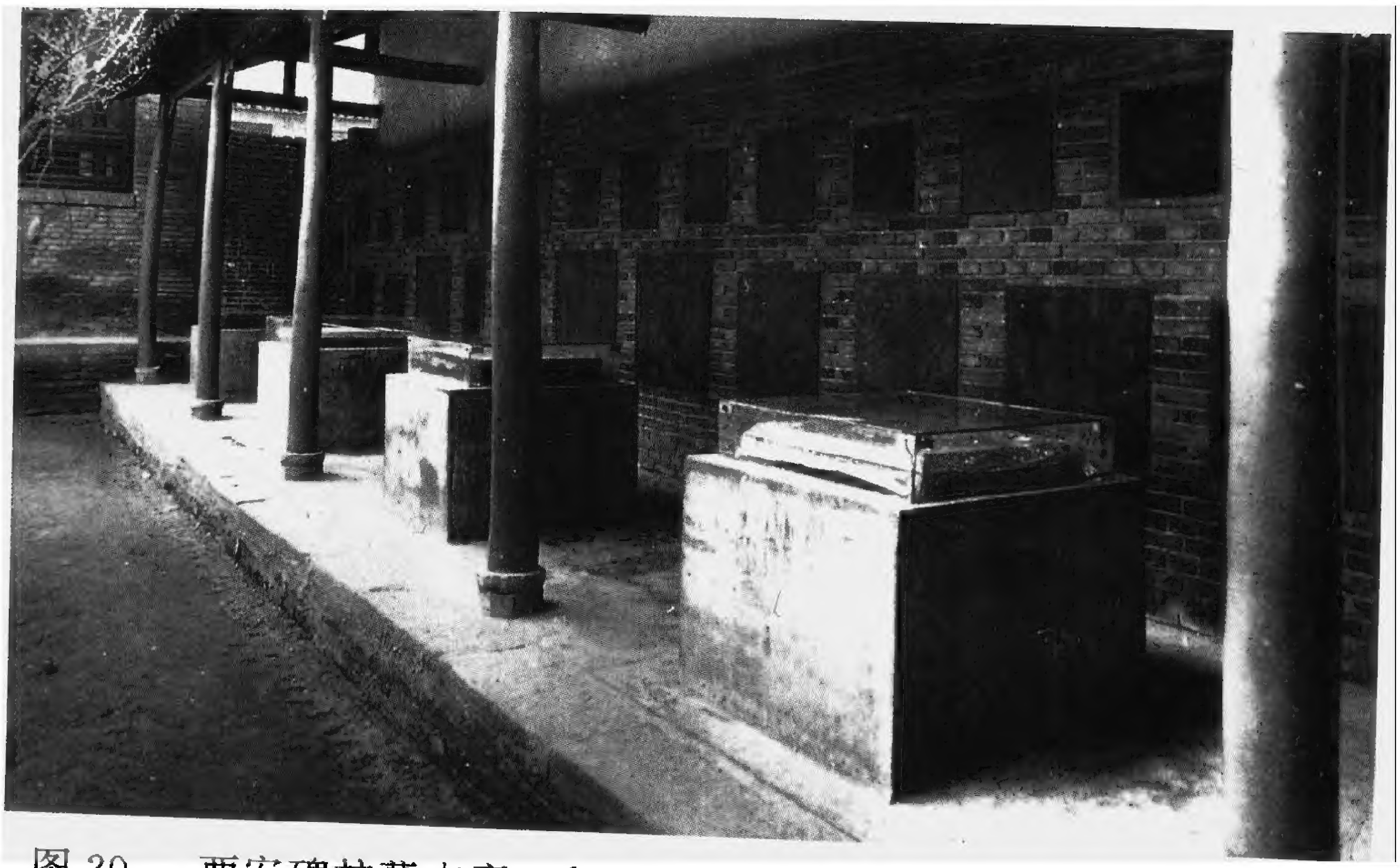


图 20　西安碑林墓志廊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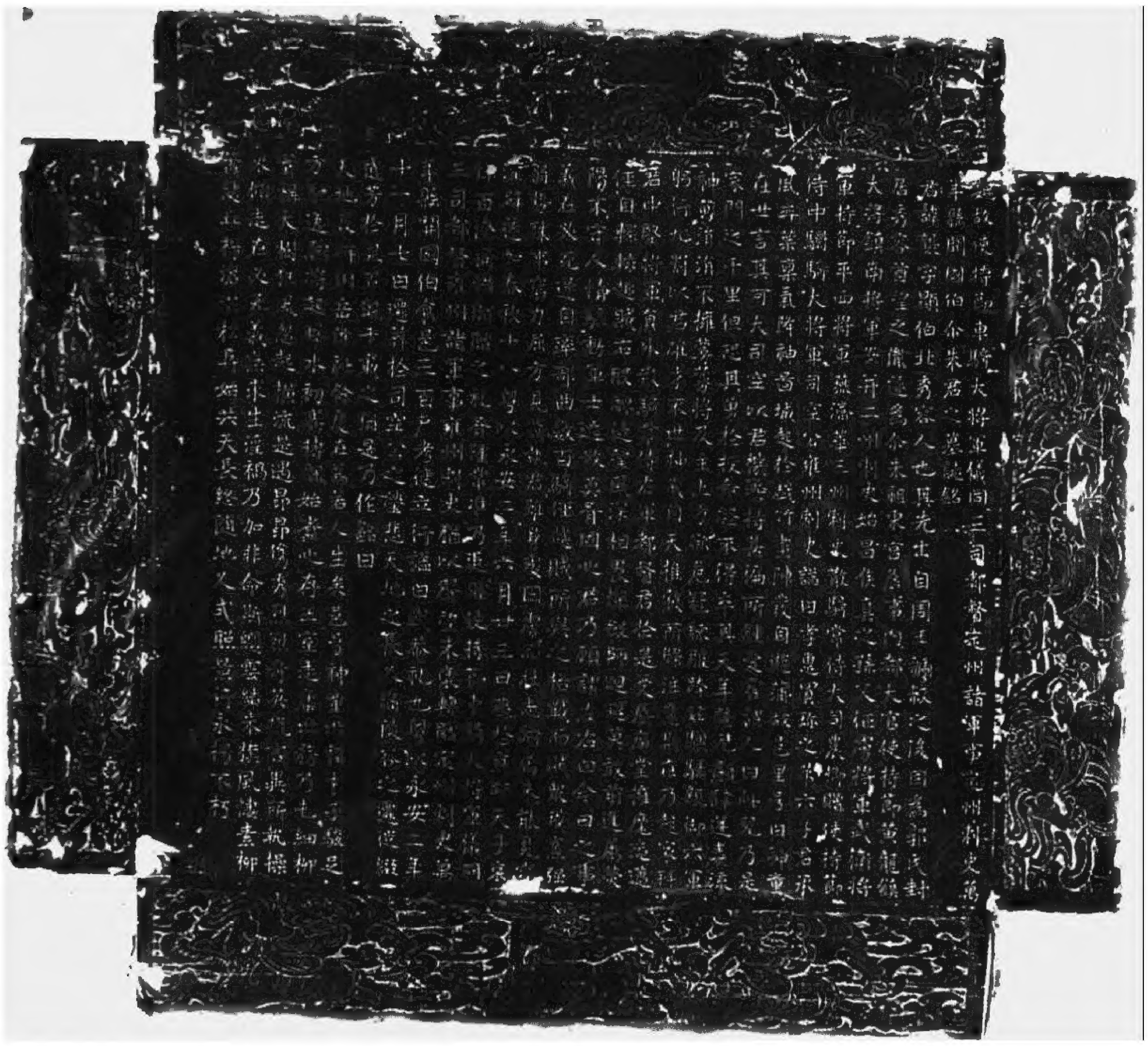


图 21　北魏尔朱袭墓志

图 23　晋司马芳残碑

图 22　正始二年三体石经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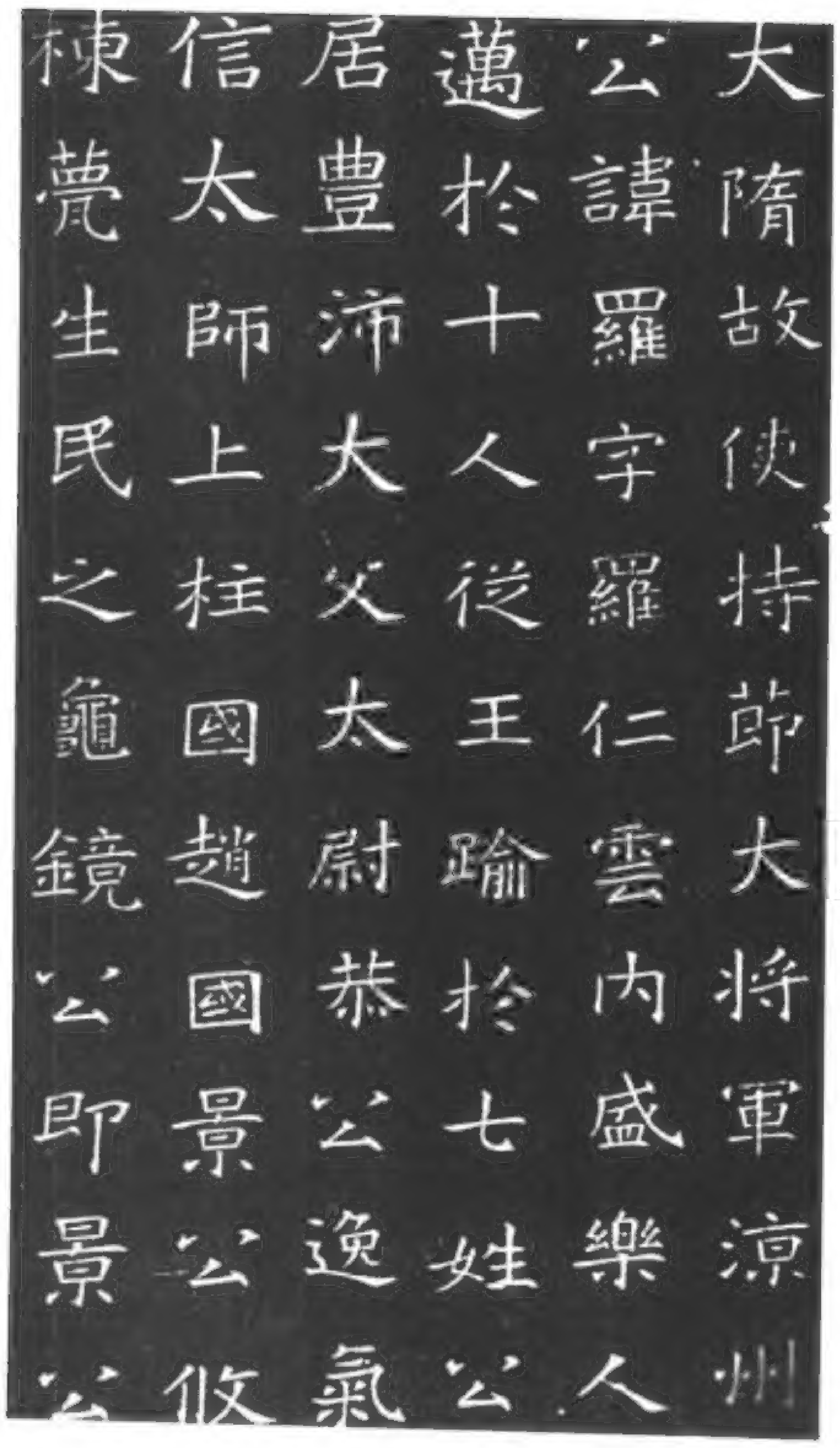


图 25　隋独孤罗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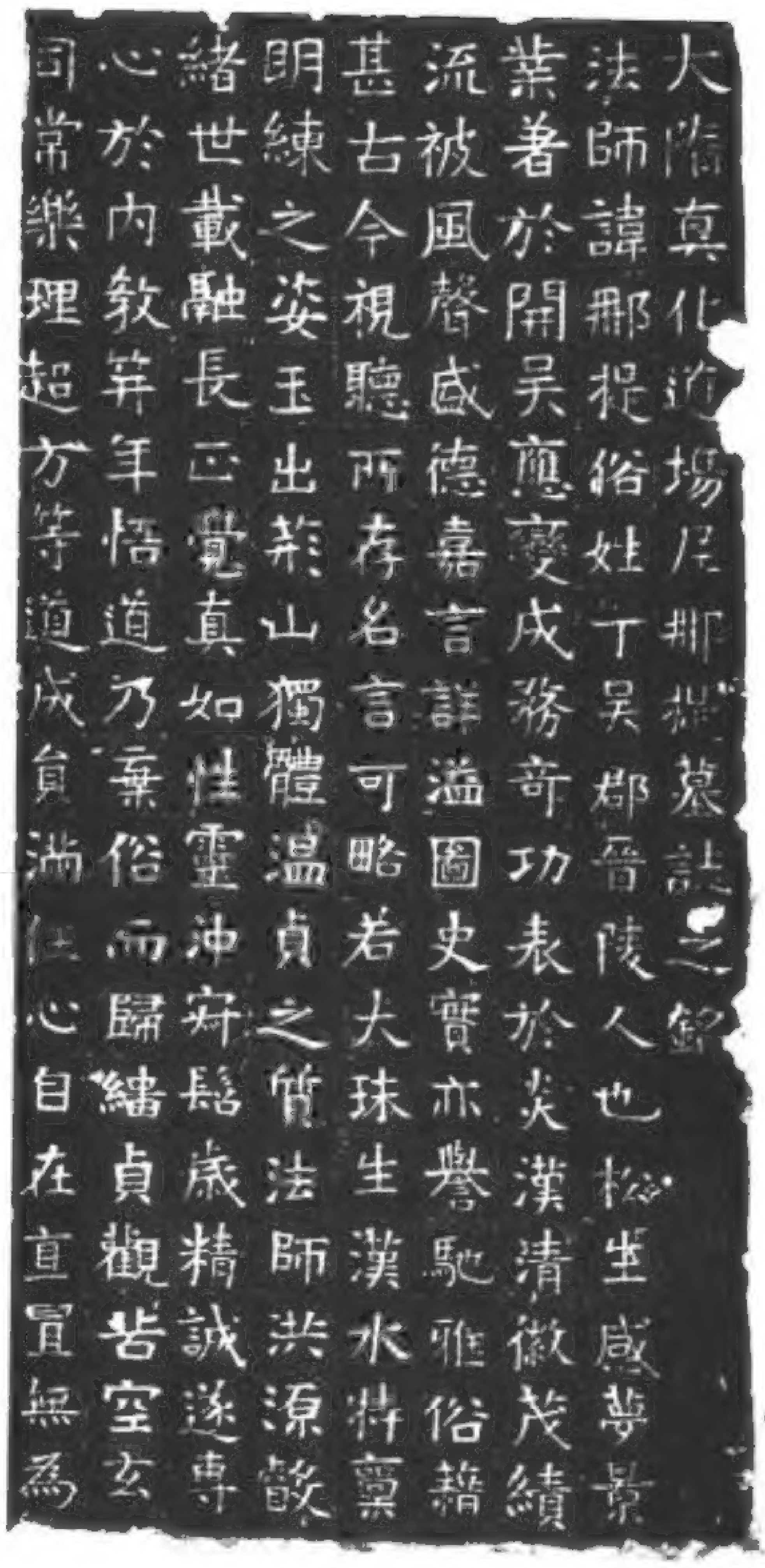


图 24　隋尼那提墓志

图 26　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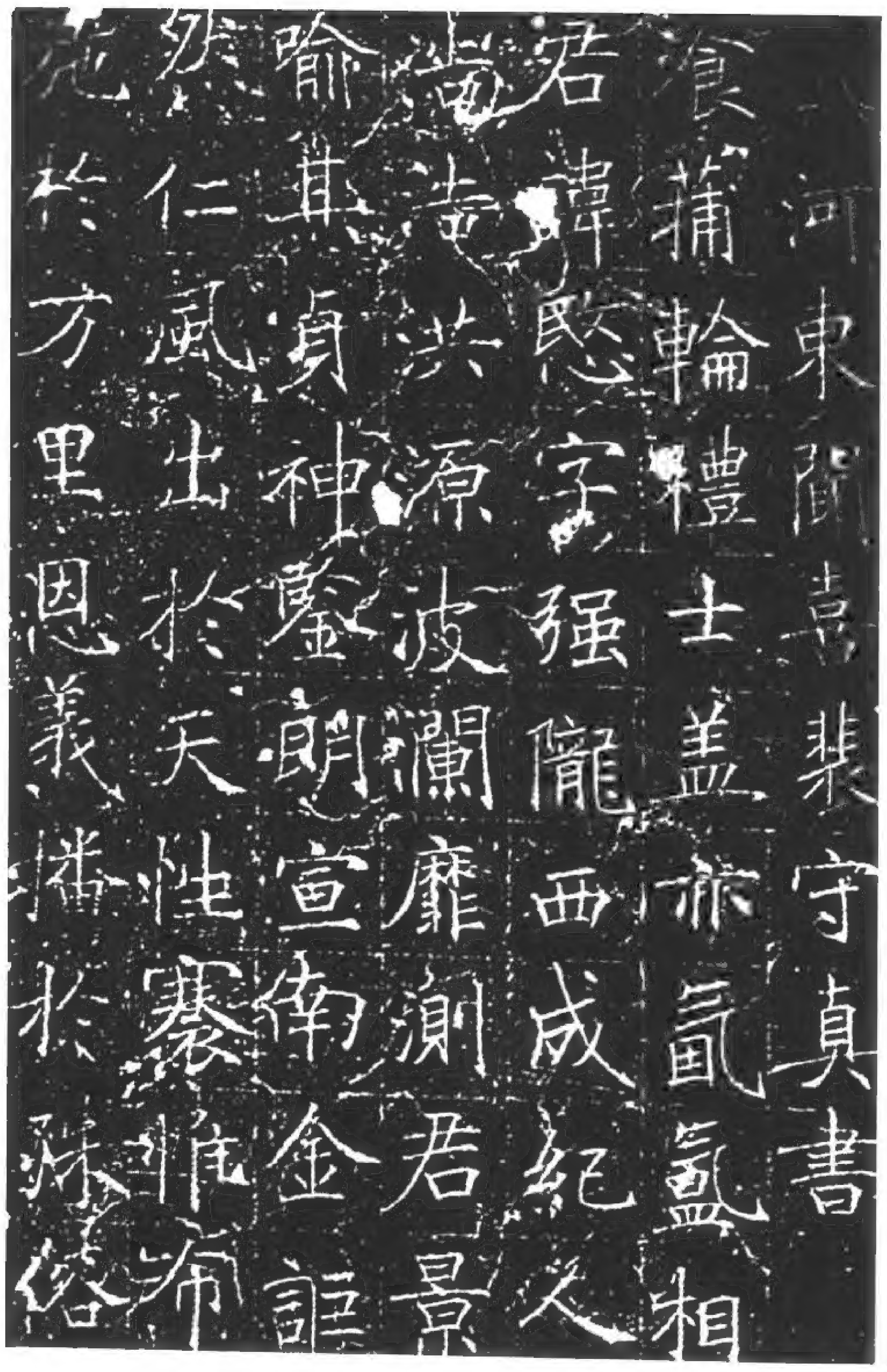


图 27　李愍碑

图 28　唐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局部文字

图 29　颜氏家庙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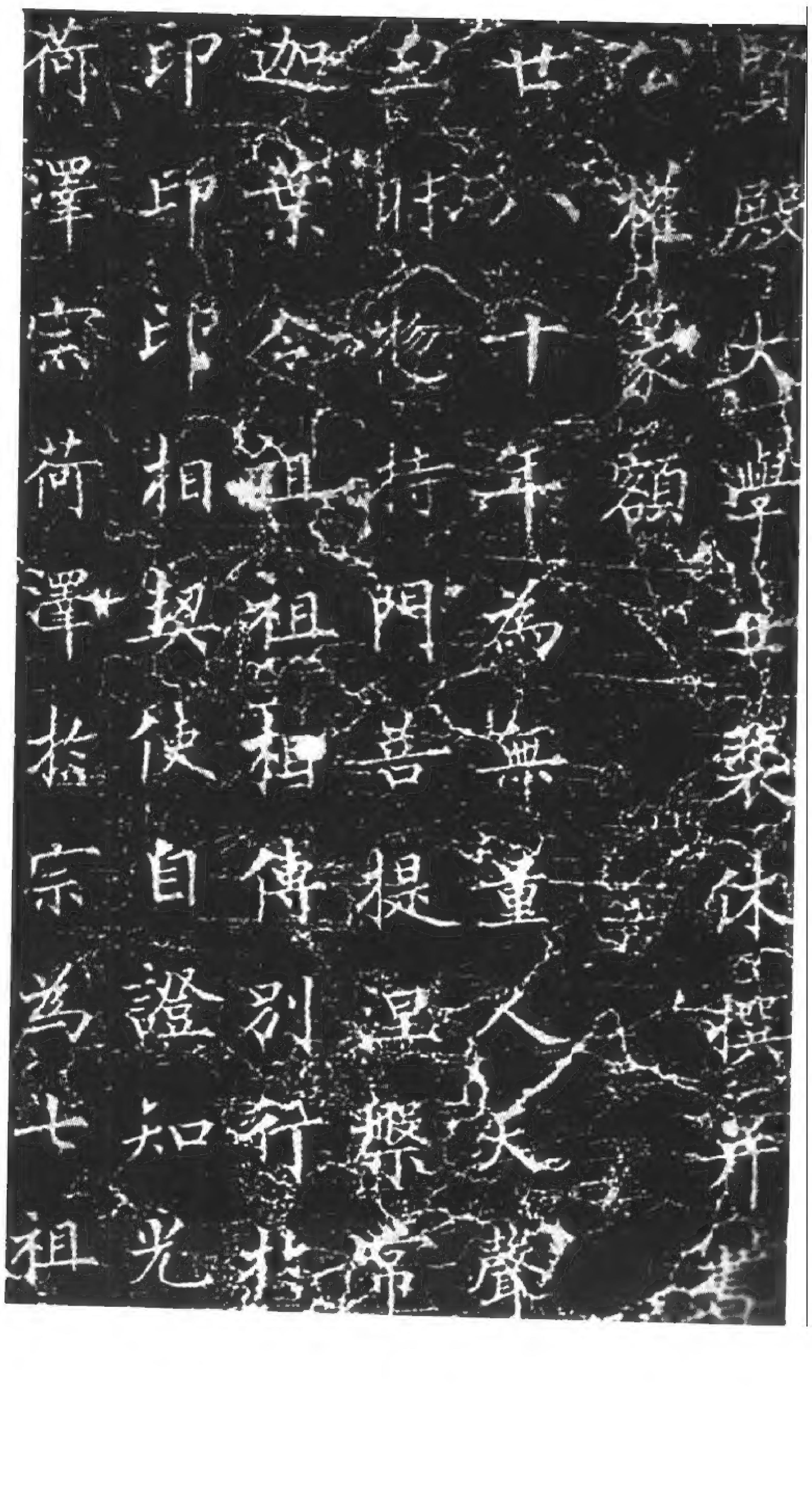


图 30　唐柳公权书圭峰禅师碑

图 31　唐开成石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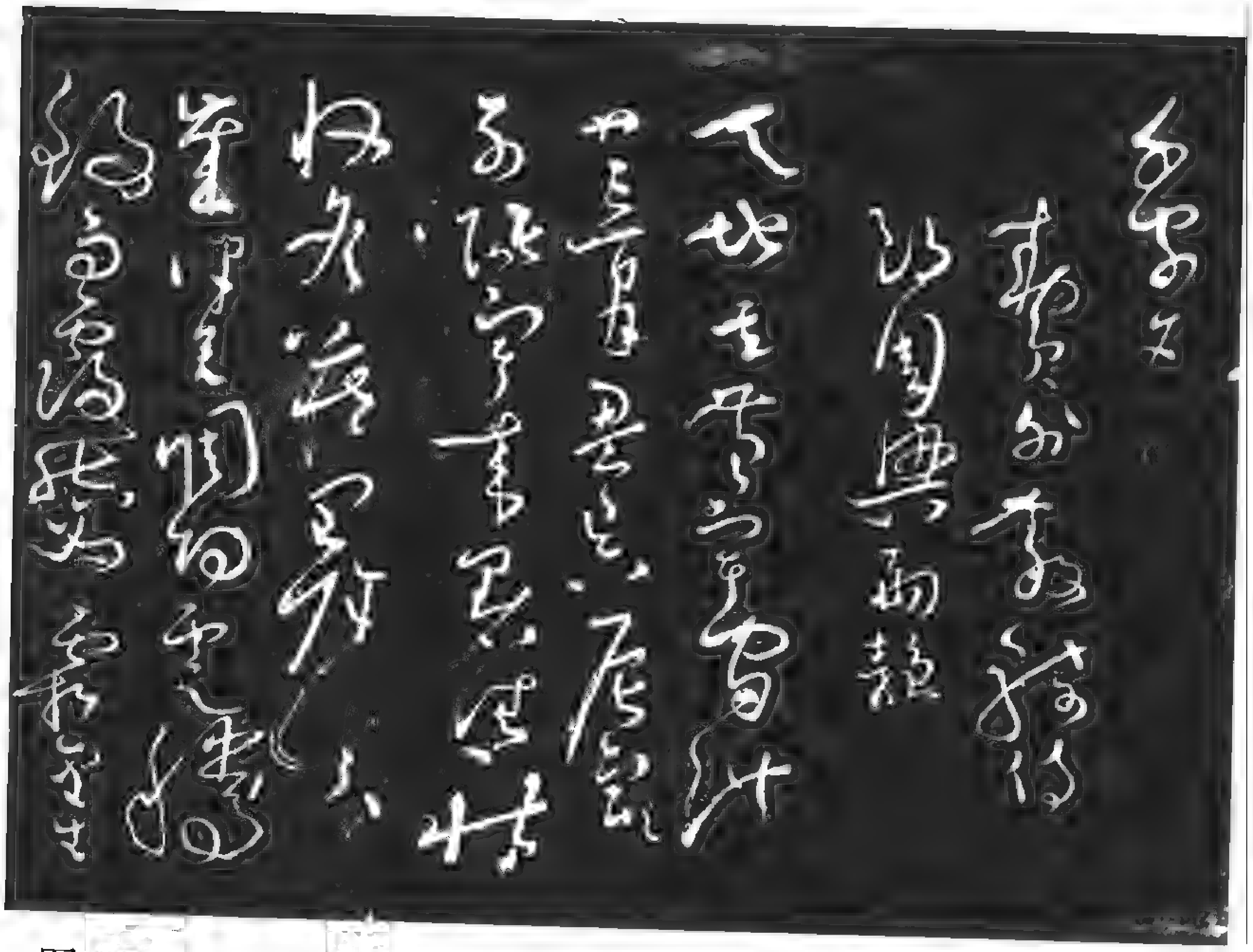


图 32　唐怀素书千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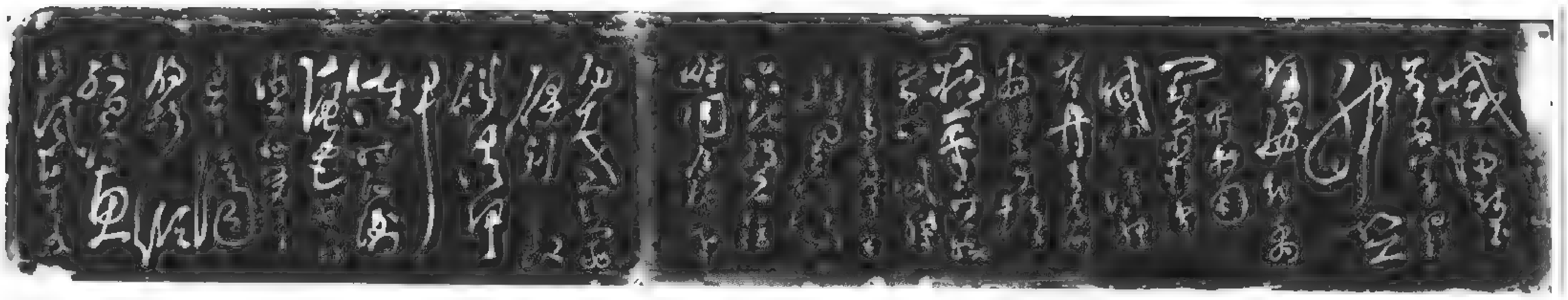


图 33　唐张旭草书断千字文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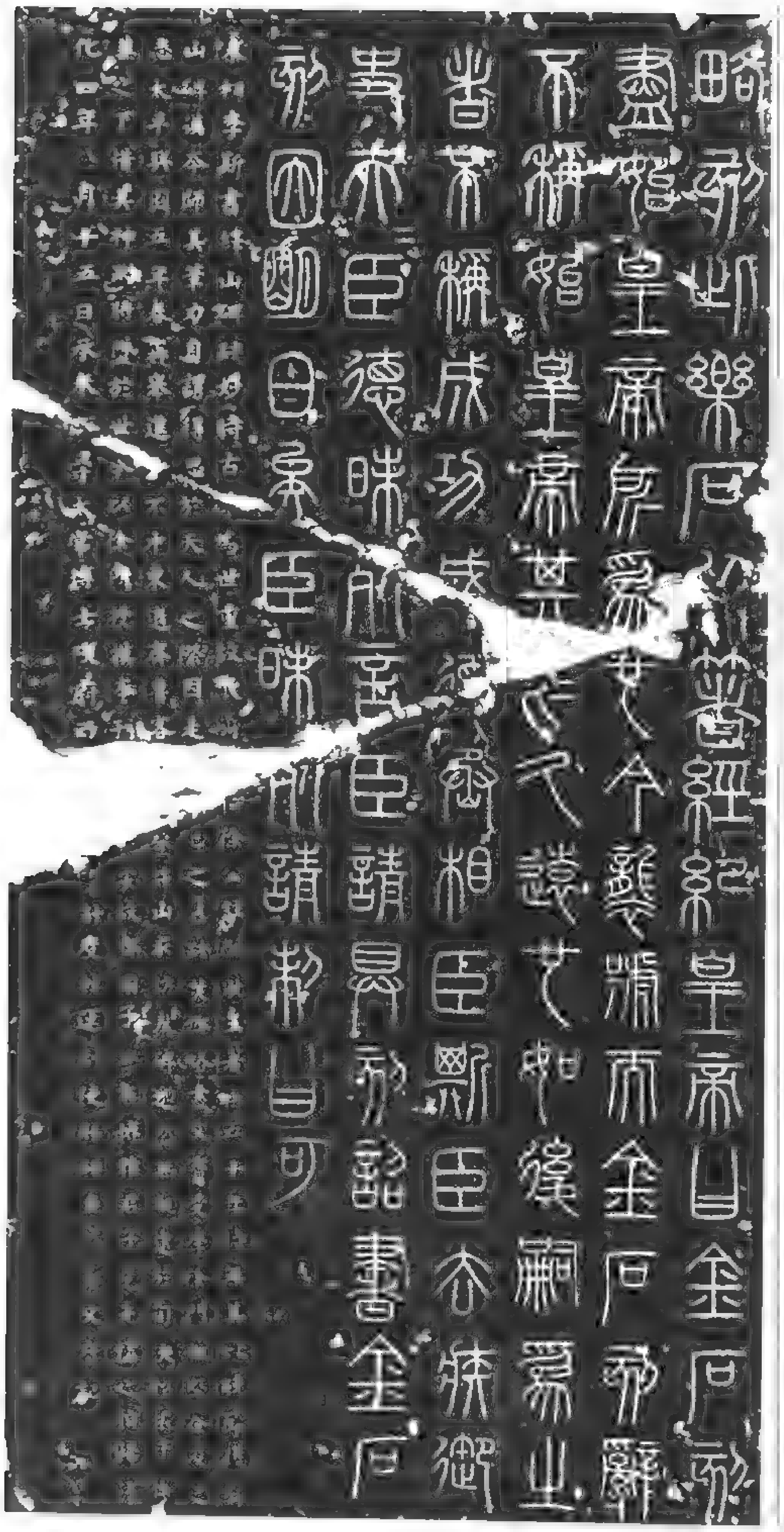


图 34　峄山刻石局部

图 35　李阳冰书栖先茔记碑局部

序一

李域铮同志的新作《陕西古代石刻艺术》，最近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值此出版之际，李域铮同志要我为该书写篇序，我深感才识浅薄，不敢当，但有感于李域铮同志多年辛勤笔耕，白天忙于繁忙的文物保管工作，在百忙之中抽暇写作，实为学习楷模，感召之力，远胜浅识陋见之虑，故乐于为之撰文作序。

陕西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先后曾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地上和地下，古文化遗址和文物相当丰富，石刻、碑碣、墓志，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我国古代的石刻艺术可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大类，每件作品都是我国古代工匠们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这些古代石刻艺术，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据史书记载，从秦代开始，已能制作大型石雕像，但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西汉霍去病墓前的一批石雕像，最具有早期代表性。其特点是利用天然巨石，采取圆雕、线雕等手法，就地雕琢出“马踏匈奴”、虎、牛、蛙等各种动物形象，简洁明快，栩栩如生。到了东汉虽有了创新，但仍保留着造型雄伟、线条简单、构图丰满、淳朴而又生动的遗风，较霍去病墓石刻更加形象生动。如陕西咸阳沈家村附近出土的东汉时代一对双兽，昂首鼓胸，曲腰疾走，四肢挺拔有力，更以夸张硕壮的长尾倍增了走兽全身

的气韵，构成了矫健完美的造型，充分体现了当时工匠们的高超雕刻技巧和创造才能。东汉画像石也是我省的重要石雕艺术作品之一（分布在陕北、绥德、米脂、榆林一带）。当时富人死后，兴起用石板装饰墓室，并在石板上满刻生动的生活图画和时间、地点、人名等题记，俗称画像石。每石自成一体，有的由五石合成一具石门。雕刻质朴、简洁、装饰性强，在结构上突破了以几何图案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局限，成为图案与写实相结合的综合造型体，采取以减地平雕手法，雕刻出了概括性很强的人物和图案，取材于现实生活，如放牧、牛耕、狩猎、出行、乐舞和饮宴、神话传说等等，形象生动，富有情趣，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既是艺术佳作，又是历史的真实纪录。

东汉、三国、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里，留下了鲜明的烙印。此时的雕刻家们，在继承和创造自身优势雕刻艺术传统的同时，注意吸取和融合了外来艺术的优秀成果，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石刻艺术的发展。南北朝前期造像，显得体态健硕，神情端庄，浮雕《弥勒造像》的主像上下部位，衬托的伎乐、飞天、狮子等既古雅，又活泼。中期造像，眉目疏朗，脸型瘦长，通称秀骨清相。如《皇兴五年造像》和《永平二年造像》，正面主像精美，背光上均浅浮雕佛本生故事，生动活泼。与《景明二年浮雕释迦牟尼造像》都是北魏中期的代表作。浮雕《弥勒释迦造像》的垂幔和透空的忍冬花纹，优美自然，显示出雕刻家的卓越技巧。这一时期佛教造像盛行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引起的多年战争，致使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不满，加之社会贫富悬殊太大，贫者求富，富者求安，因而求助释迦，希望在来世得到快乐。所以不少贵族和平民都互相仿效，在寺庙里造像题名，有的一人或一家造一像，把自己和家属的姓名刻在佛像背面或下面；有的是数十、百家合造一像或数像，把造像人的姓名（有时连家属的姓名）刻在佛像座或造像碑阴、碑侧，有的甚至还把造像人的生像也刻在姓名的旁边。这些造像题记，都是研究古代部族的分布、部族阶层在一定时期的分化，各部族聚居和各部族杂居、婚姻关系以及各部族姓氏变化等等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如耀县药王山的《姚文迁造像碑》，西安碑林的《朱黑奴四面造像碑》、《荔非氏四面造像碑》和《田良宽造像碑》、《骑马仁四面造像碑》等等均反映了这些问题。

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期，体现在古代石刻艺术方面，即在广泛吸收外来艺术的基础上从广度、深度、内容题材等各方面，创造出了更富有民

族传统风格的丰富多彩的新作品。

在陵墓石刻方面著名的唐代十八陵及其陪葬墓，每座帝王陵墓的司马道两侧均置有数量不等的石人、石兽、石马、石华表、石碑等石刻，被誉为“唐代露天石刻艺术馆”，其中收藏在碑林博物馆的唐高祖李渊献陵的蹲狮、石犀、石虎和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昭陵六骏”浮雕，三原县唐李寿墓石椁、龟形墓志等，都是唐代石刻中的珍品和精华，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体态雄伟，比例匀称，刀法娴熟，气魄盖世，线条简洁流畅，造型优美，观后令人赞叹不已！

在宗教石刻方面内容也极为丰富。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外友好交往“丝绸之路”的起点，佛道寺观林立。石刻造像佳作比比皆是，如1959年西安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的一批10多件白玉雕像。其雕刻之精美、刀笔之洗练、造形之优美，为唐代雕刻艺术中所罕见，陈列于碑林石刻艺术室的《虚空藏菩萨像》即是其中的一件，其人物造型、肌肤、璎珞、披巾和莲瓣，无不栩栩如生，恰到好处，都雕刻得极其精致入微。西安东关景龙池庙宇发现的《观音菩萨像》头戴宝冠、胸饰璎珞、手持莲蕾，盘膝莲台之上，面容丰美，一派庄严华贵相。圆雕《武士像》不但造型气魄雄壮，而且是研究唐代武士服饰制度的实物例证。浮雕的塔门及其周围衬托的缠枝牡丹，雕琢细腻。又如《吴文残碑》和《大智禅师碑》碑侧的雕刻，显得十分华丽。诸如此类无不说明到了唐代我国的石刻艺术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在艺术成就上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北宋建都河南开封，自此西安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到了宋代，从总体上说佛教已不如前代那样兴隆，开凿石窟塑造佛像之风已逐渐衰退。可是陕北地区的子长、黄陵、延安、富县等地仍开凿了不少石窟，水平也相当高。这与地处僻野，开化较迟有关外，加之是通往金、辽、西夏的交通要道，因而陕北地区成了当时军事、商业的集散地之一，战乱促使人们更加笃信佛教，因而凿窟造像之风仍较盛行。其制作数量和雕刻之佳，在全国石雕艺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雕刻艺术水平，虽不及唐代，但却继承了唐代造像的长处，更趋于写实和世俗化，风格多样：或古朴大方，简洁明快；或玲珑纤巧，精细入微；或姿态柔美，潇洒自然；或造型逼真，栩栩如生。

元代的《大德造像》，装饰较前更为繁丽。明代造像，在造型和技艺上表

现了刚劲中兼具柔和的风格。清代石刻造像在陕西各地留存甚少，但收藏在西安碑林的清代石刻画较多，著名的有《观音菩萨像》、《太白山图》、《华山图》、《关中八景图》、《松鹤图》以及《白衣大士像》等等，雕刻细腻，吸收了元、明以来各种绘画技法，并有创新，在人物衣褶的“折笔”，或者在山石的“皴笔”和“点苔法”等方面，都使用了以前石刻画没有过的表现技巧。把我国的石刻艺术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碑石、墓志书法艺术，是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西安碑林、昭陵碑林是国内外注目的书法荟萃之地。目前在碑林集中的历代碑石和墓志约达二千八百多块。这些碑志书体俱全，有真、草、隶、篆、行和飞白书等，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如著名书法家蔡邕书的汉石经《周易》残石，唐虞世南书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书的《皇甫诞碑》、《温彦博碑》，欧阳通书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书的《同州圣教序碑》、《房玄龄碑》，王知敬书的《李靖碑》、《尉迟敬德碑》，殷仲容书的《马周碑》，颜真卿书的《臧怀恪碑》、《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柳公权书的《玄秘塔碑》，唐高宗李治御书的《李勣碑》，张旭草书的《肚痛帖》，怀素草书的《千字文》，李阳冰书的《三坟记碑》。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宋徽宗书的《大观圣碑》、宋代的《黄庭坚诗碑》，元代赵孟頫书的《游天冠山诗碑》及明代董其昌书的《秣陵旅舍送章生诗碑》等等名碑，样样俱全，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学、艺术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

无数事例说明，只有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才能促进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古代书艺之花越开越艳，当与历代帝王将相一般都喜爱书法有关，有的甚至就是书法家，他们重视和提倡书法，加之历代书法家的勤学苦练，精收博览，有的甚至是文学家或诗人，有的是画家、雕刻艺术家等等，思想敏捷，富于创新，造诣很深，功底扎实。他们留下的笔迹，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的遗产之一。

李域铮同志长期从事博物馆工作，而专长碑林石刻研究，功力深厚，经验丰富，先后著有《西安碑林书法艺术》、《碑林名碑》、《西安碑林》等。这本《陕西古代石刻艺术》是他在多年研究碑林的基础上，又加以扩充，以陕西地区的石刻艺术作品为代表，用较多的文字和图版，总结分析了我国古代

石刻艺术的不同风格，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省石刻艺术品类及其艺术特色，是一部融石刻、书法史及其艺术鉴赏于一体的好书。我相信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喜爱。

陈全方书于西安

1995. 6. 5

序二

众所周知，由于古代长期以西安为都，因而分布在今陕西地区留存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及文物十分丰富，石刻、碑碣、墓志等雕刻艺术品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陵墓雕刻与宗教雕刻则是构成中国古典石刻的两大基本类型。

中国的古典大型石刻，约开始于秦汉。就目前保存较完好的来看，以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最富代表性。其造型雄伟生动，线条简练流畅，构图丰圆淳朴。这一特点也表现由咸阳沈家村出土的东汉时代双兽身上。双兽造型昂首鼓胸、曲腰疾走，四肢挺劲，再配以夸张硕壮的长尾，构成了矫健完美之躯，使其全身气韵倍增。东汉时，厚葬风靡，就连边远的陕西北部“上郡”（今绥德、米脂、榆林一带）也深受影响，出现了大批装饰墓室的石板。这种石板上面满刻了生动的图画，优美的边饰花纹，有的上面还刻着文字以记述时间、地点和人名。因时间限于东汉，出土地点多在陕北，故而被称为“陕北东汉画像石”。其内容大多源于生活：放牧、牛耕、狩猎、出行、乐舞、饮宴等场面，也间有东王公、西王母等神话传说，形象生动，意趣盎然，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画像石既是一种艺术的创造，也是东汉时陕北地区生产和生活状况的真实记录。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经东汉、三国、两

晋到南北朝时期，普遍传播开来，佛教文化对中国的石刻艺术影响甚大，佛、菩萨、天王、力士不期进入雕刻领域，甚至有权威的姿态，以带垄断的势头，迅速占领了雕刻阵地，现存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的《皇兴五年造像》、《永平二年造像》、《景明二年释迦牟尼浮雕造像》、浮雕《弥勒造像》、《朱黑奴四面造像碑》、《田良宽造像碑》等等，都是作为这一时期的石刻代表作品被保存了下来。

唐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兴盛繁荣的高峰，石雕作品，无论是陵墓石刻，还是宗教石刻，其质量均前所未有。唐代的雕刻大师们，吸收了外来艺术的营养，并溶化于传统的民族艺术之中，开创了唐代所特有的崭新风貌。

在陵墓石刻方面，京城长安渭水流域以北，东起蒲城，西至乾县，在绵延 300 余里的北山峰原之间，排布着唐代 19 位皇帝的 18 座陵寝。每座陵前，都存置有数量不等的石人、石马、石兽、石华表、石碑等巨大而精美的石刻，有“三百里唐代石刻露天艺术馆”之誉。高祖献陵前的蹲狮、石虎，太宗昭陵前的“六骏”，皇亲李寿墓中出土的石椁、龟形墓志等等，都作为中国大唐时代的精粹至今还收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刻艺术室之中。

在宗教石刻方面，因为长安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故而道观、佛寺林立，虽然由于政治变迁，曾有过毁佛事件发生，但至今遗存下来的石刻作品不少。诸如西安东郊属唐代安国寺遗址出土的白玉石雕像就有十多件，且件件都精美绝伦，景龙池庙宇发现的《观音菩萨像》，分布在陕西彬县的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保存的唐代摩崖造像及麟游千佛院摩崖造像、慈善寺石窟等等，其艺术造诣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北宋建都开封，虽然政治重心东移，但陕西北部的延安地区，却因为天时及地理环境的得天独厚，留存下来的石窟雕像，不仅数量多，而且颇具艺术价值。宋代陕北石窟雕像，虽不及唐代那样宏伟，却继承了唐代造像的长处，更趋于写实和世俗化，形成了多样的风格，为研究宋代石窟雕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元代造像装饰繁丽，明代造像刚劲中兼具柔和，清代石刻造像在陕西的留存甚少，而石刻线画遗存却较多，且多有巨制，收藏在西安碑林的如《观音菩萨像》、《太白山图》、《华山图》、《关中八景图》……，都刻得比较成功。在人物衣褶的“折笔”，自然山石的“皴笔”和“点苔法”等方面，使用了石刻画中从未有过的表现技法，把元、明以来的各种绘画手法又向前推进

了一步。

碑石、墓志书法，也是中国古代石刻的重要方面，它们多大量地集中在西安碑林和昭陵博物馆，就内容讲为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不少参考的资料；就书体而言，真、草、隶、篆、行书和飞白书无不具备。书者皆属历代名家，蔡邕、虞世南、欧阳询、欧阳通、褚遂良、王知敬、殷仲客、史维则、李阳冰、颜真卿、柳公权、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张旭、怀素、宋徽宗、赵孟頫、董其昌以及现代书法家于右任等等，他们的佳作佳品荟萃，使西安碑林和昭陵碑林获得了“书法艺术宝库”的荣耀。

《陕西古代石刻艺术》一书，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积众多成果于一体，就陕西现存纷杂的石刻作品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253件，并详细介绍了每件作品的创作时代、尺寸、收藏地点，及其准确的评析，脉络清晰，图文并俱，为深入地了解西安碑林及陕西各地石刻提供了方便，对于文史工作者、美术研究者和爱好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西安碑林博物馆
副馆长　邢忠强
1995年6月

目　　录

序(一) …………………………………………… 陈全方(1)
序(二) …………………………………………… 邢忠强(6)
一、陕西石刻概述 …………………………………… (1)
1. 霍去病墓石刻 ……………………………………… (12)
2. 车马出行图 ……………………………………… (13)
3. 东王公会西王母故事图 …………………………… (14)
4. 迎宾客、六博图……………………………………… (15)
5. 蹴鞠、击剑图……………………………………… (15)
6. 画像石墓门 ……………………………………… (16)
7. 歌舞和博山炉图 …………………………………… (17)
8. 西王母、博山炉图…………………………………… (17)
9. 轺车、辎车出行图…………………………………… (18)
10. 建筑斗拱、羊群和牛耕图 ………………………… (19)
11. 执戟门吏………………………………………… (20)
12. 朱雀、铺首、青龙门扇…………………………… (20)
13. 朱雀、铺首、白虎、独角兽门扇 ………………… (21)
14. 朱雀、铺首、应龙、独角兽门扇 ………………… (21)
15. 白虎、铺首、朱雀门扇…………………………… (22)
16. 主客贽见、杂技表演图 ………………………… (22)
17. 西王母、牛车图 ………………………………… (22)
18. 西王母、执彗人、牛车图………………………… (23)
19. 西王母、耦耕图 ………………………………… (23)
20. 执彗人、拾粪图 ………………………………… (24)
21. 歌舞图…………………………………………… (25)
22. 歌舞、喂马图 …………………………………… (26)
23. 东王公和西王母图……………………………… (26)
24. 围猎、神兽云车图 ……………………………… (26)
25. 狩猎、阙楼、七盘舞图………………………… (27)
26. 游猎图…………………………………………… (27)

27. 狩猎、出行、放牧图 …… (28)
28. 墓室方形门框 …… (28)
29. 墓室方形门框 …… (29)
30. 墓室石门 …… (29)
31. 走　兽 …… (30)
32. 宜君道教石窟 …… (30)
33. 道佛造像碑 …… (31)
34. 皇兴造像 …… (33)
35. 姚文迁造像碑 …… (34)
36. 释迦牟尼造像 …… (34)
37. 景明造像 …… (36)
38. 佛菩萨造像 …… (37)
39. 刘宝生造像 …… (38)
40. 永平二年释迦造像 …… (38)
41. 朱双炽造像 …… (39)
42. 普泰造像 …… (40)
43. 朱辅伯造像碑 …… (41)
44. 朱黑奴造像 …… (42)
45. 弥勒菩萨造像 …… (42)
46. 双龛弥勒释迦造像碑 …… (43)
47. 魏文朗造像碑 …… (44)
48. 正光造像碑 …… (45)
49. 李昙信造像碑 …… (45)
50. 蹲　狮 …… (46)
51. 武成造像碑 …… (46)
52. 武成二年造像碑 …… (47)
53. 释迦佛立像 …… (48)
54. 天和四面造像碑 …… (48)
55. 建德四面造像碑 …… (49)
56. 建德三年造像碑 …… (50)
57. 释迦牟尼造像碑 …… (51)
58. 开皇造像碑 …… (52)
59. 大夏石马 …… (53)
60. 大统三年造像碑 …… (54)
61. 千佛造像碑 …… (54)
62. 西魏文帝永陵立兽 …… (55)
63. 四面佛造像碑 …… (56)
64. 荔非明达等四面造像碑 …… (56)

65. 弥勒菩萨坐像……（57）
66. 观音菩萨像身躯……（58）
67. 菩萨立像……（59）
68. 释迦牟尼立像……（60）
69. 释迦牟尼佛立像……（60）
70. 一髻文殊立像……（61）
71. 提篮观音菩萨像……（61）
72. 菩萨首……（62）
73. 黄花石观音菩萨像……（62）
74. 李小孩(静训)石棺……（63）
75. 永康陵蹲狮……（64）
76. 翁仲像……（64）
77. 石　犀……（65）
78. 李寿墓石椁……（65）
79. 李寿墓墓门……（66）
80. 献陵石虎……（71）
81. 昭陵六骏……（72）
82. 昭陵石狮……（74）
83. 卧　牛……（76）
84. 端陵驼鸟……（76）
85. 杨执一夫妇墓门线画……（77）
86. 韦顼石椁线画……（78）
87. 兴福寺残碑碑侧花纹……（80）
88. 大智禅师碑碑侧花纹……（81）
89. 道德寺碑及碑侧花纹……（81）
90. 慧坚禅师碑碑侧花纹……（82）
91. 白玉石佛坐像……（82）
92. 释迦佛立像……（83）
93. 释迦佛立像……（83）
94. 释迦佛立像……（84）
95. 菩萨残像……（84）
96. 残菩萨坐像……（84）
97. 观音菩萨像……（85）
98. 虚空藏菩萨像……（86）
99. 随心金刚造像……（87）
100. 马鸣大士像……（87）
101. 白石菩萨头……（88）
102. 马头明王像……（88）

103. 石刻密教造像……………………………………………（89）
104. 天王残像……………………………………………（89）
105. 天王像……………………………………………（90）
106. 天王残像……………………………………………（90）
107. 观音残像……………………………………………（90）
108. 石刻残像……………………………………………（91）
109. 释迦牟尼坐像……………………………………………（91）
110. 菩萨头……………………………………………（91）
111. 释迦牟尼像……………………………………………（92）
112. 释迦佛立像……………………………………………（92）
113. 释迦佛立像……………………………………………（93）
114. 塔饰造像……………………………………………（93）
115. 塔门造像……………………………………………（94）
116. 释迦降伏外道造像……………………………………………（94）
117. 法藏佛方座……………………………………………（95）
118. 乐舞佛座……………………………………………（96）
119. 老君像……………………………………………（96）
120. 武士残像……………………………………………（97）
121. 持弓天王像……………………………………………（98）
122. 石　灯……………………………………………（98）
123. 石栏板……………………………………………（99）
124. 螭　首……………………………………………（99）
125. 昭陵石刻……………………………………………（100）
126. 乾陵石刻……………………………………………（101）
127. 顺陵石刻……………………………………………（102）
128. 建陵石刻……………………………………………（103）
129. 桥陵石刻……………………………………………（104）
130. 惠陵石刻……………………………………………（105）
131. 泰陵石刻……………………………………………（105）
132. 崇陵石刻……………………………………………（106）
133. 献陵石刻……………………………………………（107）
134. 景陵石刻……………………………………………（107）
135. 光陵石刻……………………………………………（107）
136. 药王山佛龛造像……………………………………………（108）
137. 千佛院摩崖造像……………………………………………（108）
138. 大佛寺石窟……………………………………………（109）
139. 慈善寺石窟……………………………………………（109）
140. 子长钟山石窟……………………………………………（111）

141. 延安万佛洞石窟 …… (112)
142. 黄陵千佛洞石窟 …… (113)
143. 富县阁子头石窟 …… (115)
144. 富县直罗塔石雕像 …… (115)
145. 罗汉残像 …… (116)
146. 阿耨观音像 …… (117)
147. 青头观音 …… (117)
148. 富县石泓寺石窟 …… (118)
149. 大德造像 …… (119)
150. 富县石佛堂石窟 …… (120)
二、西安碑林中的书法艺术 …… (121)
1. 峄山刻石 …… (131)
2.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 (132)
3. 郭稚文墓门框文字刻石 …… (133)
4. 石门颂 …… (134)
5. 苍颉庙碑 …… (135)
6. 西岳华山庙碑 …… (136)
7. 郙阁颂 …… (137)
8. 杨淮表记 …… (138)
9.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 (139)
10. 曹全碑 …… (139)
11. 三体石经 …… (141)
12. 永安侯墓石 …… (142)
13. 张永昌墓碑 …… (143)
14. 夫人天水赵氏墓碑 …… (143)
15. 菅氏夫人墓碑 …… (143)
16. 司马芳残碑 …… (144)
17. 三藏圣教序碑 …… (145)
18. 兴福寺残碑 …… (146)
19. 邓太尉碑 …… (147)
20. 广武将军□产碑 …… (147)
21. 松滋公元苌温泉颂 …… (148)
22. 魏文朗造像碑 …… (148)
23. 晖福寺碑 …… (149)
24. 姚伯多造像碑 …… (149)
25. 石门铭 …… (150)
26. 毛遐造像碑 …… (150)
27. 西岳华山庙碑 …… (151)

28. 毛明胜造像碑 …… (151)
29. 张僧妙碑 …… (151)
30. 贺若宜碑 …… (152)
31. 孟显达碑 …… (152)
32. 道德寺碑 …… (152)
33. 智永真草千字文帖 …… (153)
34. 断千字文 …… (155)
35. 皇甫诞碑 …… (158)
36. 昭仁寺碑 …… (159)
37. 九成宫醴泉铭 …… (159)
38. 温彦博碑 …… (160)
39. 张琮碑 …… (161)
40. 段志玄碑 …… (161)
41. 陆让碑 …… (161)
42. 孔颖达碑 …… (162)
43. 褚亮碑 …… (162)
44. 豆卢宽碑 …… (163)
45. 樊兴碑 …… (163)
46. 房玄龄碑 …… (164)
47. 万年宫铭 …… (164)
48. 周护碑 …… (165)
49. 李靖碑 …… (165)
50. 兰陵长公主碑 …… (166)
51. 尉迟恭碑 …… (167)
52. 杜君绰碑 …… (168)
53. 同州三藏圣教序碑 …… (168)
54. 道因法师碑 …… (169)
55. 程知节碑 …… (170)
56. 于志宁碑 …… (171)
57. 令狐熙碑 …… (171)
58. 吴广碑 …… (172)
59. 越国太妃燕氏碑 …… (172)
60. 马周碑 …… (172)
61. 李勣碑 …… (173)
62. 述圣纪碑 …… (174)
63. 美原神泉诗序碑 …… (174)
64. 顺陵残碑 …… (175)
65. 契苾明碑 …… (175)

66. 符璘碑 …………………………………………………… (176)
67. 于知微碑 …………………………………………………… (176)
68. 李思训碑 …………………………………………………… (176)
69. 御史台精舍碑 …………………………………………………… (177)
70. 杨孝恭碑 …………………………………………………… (177)
71.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 (178)
72. 代国长公主碑 …………………………………………………… (178)
73. 大智禅师碑 …………………………………………………… (178)
74. 石台孝经 …………………………………………………… (180)
75. 杜居士碑 …………………………………………………… (181)
76. 谒金天王神祠题字 …………………………………………………… (181)
77. 多宝塔感应碑 …………………………………………………… (182)
78. 大福和尚碑 …………………………………………………… (183)
79. 争座位稿(帖) …………………………………………………… (183)
80. 三坟记碑 …………………………………………………… (184)
81. 李氏栖先茔记碑 …………………………………………………… (185)
82. 颜勤礼碑 …………………………………………………… (185)
83. 颜氏家庙碑 …………………………………………………… (186)
8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 (186)
85. 广智三藏不空和尚碑 …………………………………………………… (187)
86. 慧坚禅师碑 …………………………………………………… (188)
87. 回元观钟楼铭并序 …………………………………………………… (189)
88. 开成石经 …………………………………………………… (190)
89. 大遍觉法师塔铭 …………………………………………………… (191)
90. 基公塔铭 …………………………………………………… (191)
91. 玄秘塔碑 …………………………………………………… (192)
92. 刘沔碑 …………………………………………………… (193)
93. 孔子庙堂碑 …………………………………………………… (193)
94. 令狐德棻碑 …………………………………………………… (195)
95. 彦修草书及肚痛帖 …………………………………………………… (195)
96. 东陵圣母帖 …………………………………………………… (196)
97. 藏真、律公二帖 …………………………………………………… (198)
98. 怀素草书千字文 …………………………………………………… (198)
99. 篆书千字文及隶书释字 …………………………………………………… (199)
100.《佛说摩利支天经》附图 …………………………………………………… (200)
101. 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 …………………………………………………… (201)
102. 大观圣作之碑 …………………………………………………… (201)
103. 黄庭坚诗 …………………………………………………… (203)

104. 大开元寺兴致碑 …… (204)
105. 游天冠山诗 …… (204)
106. 祝允明草书乐志论 …… (205)
107. 鱼篮观音像 …… (205)
108. 月桂赋 …… (205)
109. 义勇武安王像 …… (206)
110. 寇准像 …… (206)
111. 中和二字 …… (207)
112. 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像 …… (207)
113. 秣陵旅舍送章生诗 …… (208)
114. 苏氏笔法论 …… (208)
115. 淳化秘阁帖 …… (209)
116. 千字箴 …… (209)
117. 白衣大士像碑 …… (210)
118. 关中八景图 …… (210)
119. 松鹤图 …… (211)
120. 三圣母像 …… (212)
121. 虚中君子图 …… (212)
122. 宁静致远四字 …… (212)
123. 太华山图 …… (213)
124. 太白山图 …… (213)
125. 御书高松赋 …… (214)
126. 心画初机 …… (215)
127. 文　赋 …… (215)
128. 林则徐游华山诗 …… (216)
129. “福”字 …… (216)
130. 一笔“虎”字 …… (217)
131. 大“寿”字 …… (217)
132. 于右任草书正气歌 …… (217)
133. 杨松轩墓表 …… (219)
134. 朱子桥纪念碑 …… (219)

三、收藏宏富的历代墓志 …… (220)

1. 元桢墓志 …… (224)
2. 元简墓志 …… (225)
3. 元珽墓志 …… (226)
4. 元定墓志 …… (227)
5. 穆亮墓志 …… (227)
6. 元诱妻冯氏墓志 …… (228)

7. 张整墓志 …………………………………………………… (228)
8. 李蕤墓志 …………………………………………………… (229)
9. 奚智墓志 …………………………………………………… (230)
10. 元鉴墓志 …………………………………………………… (230)
11. 元嵩墓志 …………………………………………………… (231)
12. 武卫将军侯氏张夫人墓志 ………………………………… (232)
13. 元融妃穆氏墓志 …………………………………………… (232)
14. 元愿平妻王氏墓志 ………………………………………… (232)
15. 杨阿南墓志 ………………………………………………… (233)
16. 元保洛墓铭 ………………………………………………… (234)
17. 杨颖墓志 …………………………………………………… (234)
18. 封昕墓志 …………………………………………………… (234)
19. 鄯乾墓志 …………………………………………………… (235)
20. 贵华恭夫人王普贤墓志 …………………………………… (236)
21. 高祖充华赵氏墓志 ………………………………………… (237)
22. 长孙瑱墓志 ………………………………………………… (237)
23. 显祖嫔成氏墓志 …………………………………………… (238)
24. 山晖墓志 …………………………………………………… (238)
25. 王祯墓志 …………………………………………………… (238)
26. 皇内司吴光墓志 …………………………………………… (239)
27. 元广墓志 …………………………………………………… (239)
28. 元遥墓志 …………………………………………………… (240)
29. 邓夫人李槼兰墓志 ………………………………………… (241)
30. 元珽妻穆玉容墓志 ………………………………………… (242)
31. 元遥妻梁氏墓志 …………………………………………… (242)
32. 杨胤季女墓志 ……………………………………………… (242)
33. 元晖墓志 …………………………………………………… (243)
34. 穆亮妻尉太妃墓志 ………………………………………… (243)
35. 元孟辉墓志 ………………………………………………… (244)
36. 元夫人赵光墓志 …………………………………………… (244)
37. 刘阿素墓志 ………………………………………………… (245)
38. 叔孙协墓志 ………………………………………………… (245)
39. 穆纂墓志并盖 ……………………………………………… (246)
40. 张安姬墓志并盖 …………………………………………… (247)
41. 傅母王遗女墓志 …………………………………………… (247)
42. 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 …………………………………… (248)
43. 卢令媛墓志铭 ……………………………………………… (248)
44. 镇远将军前军将军赠冠军将军正平太守元仙墓志

铭 ………………………………………………………… (250)
45. 假节督洛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洛州刺史河南元秀墓志 ………………………………………………………… (251)
46. 龙骧将军元引墓志 ………………………………………… (251)
47. 傅母宫大监杜法真墓志 …………………………………… (252)
48. 殷州刺使崔楷墓志 ………………………………………… (252)
49. 武阳县开国公侯刚墓志 …………………………………… (253)
50. 伏波将军尚书北主客郎中大司农丞穆彦命妇元洛神墓志 ………………………………………………… (254)
51. 元鉴妃吐谷浑氏墓志 ……………………………………… (254)
52. 冀州刺史博野县公苟景墓志 ……………………………… (255)
53. 冀州刺史赵郡开国公尔朱绍墓志 ………………………… (255)
54. 尔朱袭墓志 ……………………………………………… (255)
55. 昭玄沙门大统僧令杜法师墓铭 …………………………… (256)
56. 平北将军殷州刺史元瑗墓志铭 …………………………… (257)
57. 闾仪同伯升及夫人元仲英墓志铭 ………………………… (257)
58. 李挺命妇元季聪墓志铭 …………………………………… (258)
59. 源磨耶圹记 ……………………………………………… (259)
60. 征西将军上洛县开国男元了邃墓志铭 …………………… (259)
61. 新义郡公韩木兰墓志 ……………………………………… (259)
62. 通直散骑常侍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高僧护墓志铭 ………………………………………………………… (260)
63. 伪齐俗赠车骑将军时珍墓志 ……………………………… (260)
64. 襄城顺阳二郡太守寇炽墓志 ……………………………… (261)
65. 李和墓志 ………………………………………………… (261)
66. 寇炽妻姜敬亲墓志 ………………………………………… (262)
67. 来公静墓志 ……………………………………………… (262)
68. 平安郡守谢岳及夫人关氏墓志 …………………………… (262)
69. 张通妻陶贵墓志 ………………………………………… (263)
70. 独孤罗墓志 ……………………………………………… (263)
71. 左籍直长王荣及妻刘氏墓志 ……………………………… (263)
72. 李文都砖铭记 …………………………………………… (264)
73. 刘尚食墓志铭 …………………………………………… (264)
74. 宫人归义乡君司玺元氏墓志铭 …………………………… (265)
75. 宫人司乐刘氏墓志铭 ……………………………………… (265)
76. 宫人五品司仗程氏墓志铭 ………………………………… (265)
77. 宫人典彩六品朱氏墓志铭 ………………………………… (265)
78. 宫人司饎六品贾氏墓志铭 ………………………………… (266)

79. 宫人尚寝衣魏氏墓志 …………………………………… (266)
80. 廉德将墓志 …………………………………………… (266)
81. 宫人采女田氏墓志铭 ………………………………… (267)
82. 宫人司宝陈花树墓志铭 ……………………………… (267)
83. 樊三品宫人墓志 ……………………………………… (267)
84. 明云腾墓志 …………………………………………… (268)
85. 宫人采女田氏墓志 …………………………………… (268)
86. 宫人司䌽丁氏墓志铭 ………………………………… (268)
87. 翟突娑墓志 …………………………………………… (269)
88. 桃林县令王衮及妻任城夫人合葬墓志 ……………… (269)
89. 东垣县主簿张浚墓志 ………………………………… (269)
90. 宫人司言杨氏墓志铭 ………………………………… (270)
91. 王成墓志 ……………………………………………… (270)
92. 安定胡永及妻张氏合葬墓志 ………………………… (271)
93. 李寿墓龟形墓志 ……………………………………… (271)
94. 处士张叡墓志铭 ……………………………………… (272)
95. 静信乡君张夫人妃墓志铭 …………………………… (272)
96. 李绍墓志 ……………………………………………… (273)
97. 张仲宾及夫人刘氏合葬墓志 ………………………… (273)
98. 右勋卫宣城公武希玄墓志铭 ………………………… (274)
99. 化度寺僧海禅师坟记 ………………………………… (274)
100. 刘世通夫人墓记……………………………………… (274)
101. 安万通墨书砖墓志…………………………………… (275)
102. 尉迟恭墓志…………………………………………… (276)
103. 张雄墓志铭…………………………………………… (277)
104. 何刚墓志铭…………………………………………… (278)
105. 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爽墓志铭…………… (278)
106. 赵府君德合及夫人杜氏合葬墓志铭………………… (279)
107. 费智海墓志…………………………………………… (279)
108. 雍王李贤墓志铭……………………………………… (279)
109. 五品宫人墓志………………………………………… (281)
110. 王定墓志铭…………………………………………… (281)
111. 八品亡宫志铭………………………………………… (281)
112. 亡宫墓志……………………………………………… (282)
113. 大周七品宫人墓志铭………………………………… (282)
114. 九品亡宫人墓志铭…………………………………… (282)
115. 七品亡宫墓志铭……………………………………… (282)
116. 五品亡宫志文………………………………………… (283)

117. 八品亡宫志文一首 ……………………………… (283)
118. 珎州荣德县丞梁师亮墓志 ……………………………… (283)
119. 上柱国杨基及夫人能氏合葬墓志 ……………………………… (284)
120. 同州清河县尉柱国房逸及夫人李氏合葬墓志铭 ……………………………… (284)
121. 智惠墓志 ……………………………… (284)
122. 永泰公主墓志铭 ……………………………… (285)
123. 游击将军上柱国南阳赵智俭及夫人宗氏合葬墓志铭 ……………………………… (286)
124. 亡宫七品志铭 ……………………………… (286)
125. 亡宫七品墓志 ……………………………… (286)
126. 亡宫七品墓志铭 ……………………………… (286)
127. 五品亡宫墓志铭 ……………………………… (287)
128. 五品亡宫墓志 ……………………………… (287)
129. 亡宫九品墓志盖 ……………………………… (287)
130. 韦泂墓志 ……………………………… (287)
131. 魏国夫人河东裴觉墓志 ……………………………… (288)
132. 许君及夫人华阴郡君杨氏合葬墓志 ……………………………… (288)
133. 冠军大将军行右卫将军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杨执一妻新城郡夫人独孤氏志铭 ……………………………… (289)
134. 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 ……………………………… (289)
135. 万泉县主薛氏墓志铭 ……………………………… (290)
136. 韦顼墓志 ……………………………… (291)
137. 李嗣庄墓志铭 ……………………………… (291)
138. 阿史那勿施砖墓记 ……………………………… (292)
139. 龙兴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 ……………………………… (293)
140. 索崇墓志 ……………………………… (293)
141. 八品亡宫年卌墓志铭 ……………………………… (294)
142. 七品亡宫志文 ……………………………… (294)
143. 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执一墓志铭 ……………………………… (294)
144. 刘浚墓志铭 ……………………………… (295)
145. 亡宫八品年五十八墓志铭 ……………………………… (295)
146. 亡宫八品墓志 ……………………………… (296)
147. 王祖亐夫人衡氏合葬墓志 ……………………………… (296)
148. 亡宫墓志 ……………………………… (296)
149. 张去奢墓志 ……………………………… (297)
150. 陆琛振墓志铭 ……………………………… (297)

151. 南川县主墓志 …………………………………………… (298)
152. 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张元忠妻雁门郡夫人令狐氏墓志铭 ………………………… (299)
153. 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 ………………………………… (299)
154. 立功臣冠军大将军右龙武军大将军张登山墓志 ………………………………………………… (300)
155. 六品亡宫墓志 …………………………………………… (300)
156. 太原王府君玭墓志 ……………………………………… (300)
157. 处士徐怀隐墓志 ………………………………………… (301)
158. 亡宫七品墓志 …………………………………………… (301)
159. 唐长安县主簿李公故夫人司马和墓志铭 ……………… (301)
160. 左相兼兵部尚书集贤院弘文馆学士崇玄馆文学士上柱国许国公陈希烈墓志 ………………………… (302)
161.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颖王府司马元怀墓志 ……………… (302)
162. 行内侍省内常侍孙公故妻彭城郡夫人刘氏墓志铭 ………………………………………………… (303)
163. 唐故凤翔观察使神策行营兵马上都留后段晏墓志 ………………………………………………… (303)
164. 行内侍省给事周惠墓志铭 …………………………… (304)
165. 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义忠墓志铭 …………………… (304)
166. 唐故游击将军守左领军卫曹惠琳墓志铭 …………… (305)
167. 朝散大夫行太守洗马上柱国萧季江墓志铭 ………… (305)
168. 唐故彭王赠司空李仅墓志铭 ………………………… (306)
169. 郯国大公主墓志铭 ……………………………………… (306)
170. 唐故宣德监右银台门进奏使张明进墓志铭 ………… (307)
171. 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弇夫人京兆韦氏墓志 ……………………………………………… (307)
172. 宜都公主墓志铭 ………………………………………… (308)
173. 驸马都尉柳昱墓志铭 ………………………………… (308)
174. 太原府参军事苗蕃墓志铭 …………………………… (309)
175. 河南少尹裴复墓志 ……………………………………… (309)
176. 李日荣墓志铭 …………………………………………… (309)
177. 定远将军守左龙武军翊府中郎张涣墓志铭 ………… (310)
178. 会王墓志 ………………………………………………… (311)
179. 崔慎墓志铭 ……………………………………………… (311)
180. 殿中侍御史陇西李虚中墓志 ………………………… (312)
181. 李术墓志铭 ……………………………………………… (312)
182. 河间郡太夫人宋氏墓志铭 …………………………… (312)

183. 宣州司功参军魏邈墓志……………………………（313）
184. 殿中试御史陇西李府君夫人范阳芦氏墓志铭
……………………………………………………（313）
185. 驸马都尉张怙墓志……………………………………（313）
186. 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韦端玄堂志铭
……………………………………………………（314）
187. 许遂忠墓志……………………………………………（315）
188. 行内侍省奚官局令祁宪直墓志铭……………………（315）
189. 京兆真化府折冲都尉鲁国车佥墓志铭………………（316）
190. 郯王墓志………………………………………………（316）
191. 贾温墓志铭……………………………………………（317）
192. 卢岑墓志铭……………………………………………（317）
193. 前河阳三城节度视察处置等使怀州刺使检校尚书
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澧州长史开国男食邑三千户上
柱国李泳夫人太原君王氏墓铭………………………（318）
194. 安王墓志………………………………………………（318）
195. 太原府参军赠工部尚书员外郎苗蕃夫人河内县太
君张氏玄堂志铭。……………………………………（319）
196. 顺阳范氏幼女眉孙墓志………………………………（319）
197. 奚官局梁元翰墓志铭…………………………………（319）
198. 张渐墓志………………………………………………（320）
199. 宣功参军钜鹿魏邈夫人赵氏墓志……………………（321）
200. 王氏故笄女十六娘墓志铭……………………………（321）
201. 裴氏小娘子墓志铭……………………………………（322）
202. 宋伯康墓志铭…………………………………………（322）
203. 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韦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同
国政墓志铭……………………………………………（322）
204. 鲁氏子谦墓志铭………………………………………（323）
205. 湖南监军使正议大夫行内侍伯太原县开国男食邑
三百户赐绯鱼袋太原王公素墓志铭…………………（323）
206. 李敬实墓志……………………………………………（324）
207. 田师巽母夫人清河郡张氏墓志铭……………………（325）
208. 狄玄勰墓志……………………………………………（325）
209. 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已墓志…………………（325）
210. 翟庆全墓志铭…………………………………………（326）
211. 妓人清河张氏墓志……………………………………（327）
212. 楚国夫人赠贵妃杨氏墓志铭…………………………（327）
213. 朗宁公主墓志铭………………………………………（327）

214. 狄公妻骆氏夫人墓志铭……………………………（328）
215. 张叔遵墓志铭…………………………………………（328）
216. 郭克勤墓志……………………………………………（329）
217. 阿娘砖墓记……………………………………………（330）
218. 朝散大夫汉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推墓志铭…………（330）
219. 吴兴钱氏女乌娘墓志…………………………………（331）
220. 亡尼七品墓志铭………………………………………（331）
221. 亡尼六品墓志…………………………………………（331）
222. 亡尼九品墓志…………………………………………（332）
223. 亡尼七品大戒墓志……………………………………（332）
224. 亡宫墓志铭……………………………………………（332）
225. 师弘礼墓志铭…………………………………………（332）
226. 贞士韦君墓志…………………………………………（333）
227. 李令崇墓志铭…………………………………………（333）
228. 僧实贻墓志……………………………………………（333）
229. 简州长史孙府君夫人独孤氏墓志……………………（334）
230. 鄷王王妃崔镇墓石记…………………………………（334）
231. 静难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前守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戶石彦辞墓志铭…………（334）
232. 推诚翊戴功臣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太傅知定州军州事充本州马步军部署管内制置营田使并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定郡开国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实封六百戶赠太尉安守忠墓志铭……………（335）
233. 提点梓州路诸州军刑狱公事朝奉郎尚书度支郎中上柱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姚奭墓志铭…………………（335）
234. 朝请大夫尚书礼部中上护军范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戶赐紫金鱼袋祖士衡墓志铭……………………（336）
235. 朝奉郎直龙图阁权知陕州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兼提举商虢等州兵马巡检公事飞骑尉赐绯鱼袋借紫游师雄墓志………………………………………（336）
236. 金京兆刘处士墓碣铭…………………………………（337）
237. 辅昌砖墓志……………………………………………（337）
238. 安西路耀州尹耶律世昌墓志铭………………………（338）
239. 夫人李氏墓志…………………………………………（338）
240. 永寿王府奉国将军诚流淑人杨氏合葬圹志…………（338）
241. 永寿王府辅国将军公辂圹志铭………………………（339）
242. 永寿王府奉国将军诚漖淑人任氏合葬圹志…………（339）

243. 宗室辅国将军公锴夫人雷氏合葬圹志 …………………(339)
244. 秦府承奉副鹤林王泾墓志铭 ……………………………(339)
245. 淑人孟氏圹志 ………………………………………………(340)
246. 秦藩典宝正崔廷玺墓志铭 …………………………………(340)
247. 秦府引礼舍人王琮配璩氏合葬墓志铭 …………………(340)
248. 昭勇将军西安左卫指挥使琢吾杨玠墓志铭 ……………(340)
249. 儒官肃轩李拱及元配王氏继韩氏张氏合葬墓志铭 ………………………………………………………………………(341)
250. 冯毅苍妻墓志 ………………………………………………(341)
251. 墓志盖 ………………………………………………………(341)
252. 周显继妣李太孺人墓志 ……………………………………(341)
253. 山西灵石县知县前翰林院士顾夔墓志 …………………(342)

一、陕西石刻概述

石刻艺术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堪与古代希腊、罗马、埃及、亚述以至欧洲近代石刻名品相媲美。

中国的石刻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从类型上，大体可分为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而且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其雕刻手法有线刻、浮雕与圆雕之分。塑造的形象有高达数十米的巨型摩崖或窟龛雕像，有取材数十吨、气势雄浑的圆雕石犀、石虎、石狮等；也有体形较小、高仅盈寸、重不过斤的单个造像和各种圆雕动物形象。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一般都雕刻得细腻、逼真。这些作品都是由古代的艺术家们深入洞察人的情感和各种社会生活，大胆地接受前人和外来艺术的表现技法，并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以简洁、明快、准确优美的线条，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

陕西曾先后是11个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历时达1000余年。这些王朝的帝王、贵族死后，大都埋葬在陕西境内。他们的陵墓内，有大量的豪华贵重的随葬品，陵墓上下几乎都有成组的大型石刻仪卫作为装饰，显示出严格的等级制度。陵墓石刻促进了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兴平县霍去病墓周围的一批大型石雕，是西汉时代优秀的圆雕石刻艺术品，保存完整，最具有艺术价值。城固张迁墓和汉中李固墓前，各有石兽一对，是中国现存守墓兽中最早的作品。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收藏有东汉时期一对走兽，造型风格及表现手法，基本上与张迁墓前石兽一致。就其形象来说，既类狮，又似虎，可能是虎的变形。因为在中国美术史上，真正写实的狮子形象，是随着佛教的传入才出现的。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章帝元和四年(87)，大月氏与安息国各遣使来贡狮子。一般人认为，这就是狮子输入中国的最早时代。但其形象见于雕刻者，除佛教造像外，只有山东武梁祠前的石兽与狮子形象较为接近，其他汉墓石兽多界于狮、虎之间，更近于虎。到东

晋时期，帝王陵墓前置麒麟，文武大臣陵墓前则置石辟邪。西魏至唐初，帝王陵墓前置石虎、石犀，文武大臣陵墓前则置石羊。隋、唐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使封建权力逐渐趋向高度集中。隋唐两代帝王、贵族，多半埋葬在长安、洛阳两京附近。特别是唐代帝王，连同他们的先祖，葬埋在陕西关中渭河以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六个县的长达约150多公里的山区和高原上。陵墓前的石雕造像，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以唐高宗李治的乾陵为例，陵山前、后、左、右四门，各有石刻。陵山前置有石狮2对，文武侍臣20对，外国番使像61位，石马5对，朱雀1对，翼马1对，华表1对，无字碑1座；陵山后置石狮1对，石马4对；陵山左和陵山右，各有石狮1对。共计有108件。这和东汉、西魏的陵墓前仅列置石兽1对，阙门或华表1对者简直不可相比！这108件造像，都是选用形体巨大、质地细密的岩石雕造而成。雕刻制作工程宏大，既反映了唐代政治的稳定，文化发展的水平，也说明了唐陵石刻在中国雕塑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汉、唐时期的帝王及文武大臣陵墓前，为什么要列置石兽和众多的其他石刻呢？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寝有石麒麟、石辟邪、石兕、石马之属；人臣墓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之类，皆表饰坟垅，如生前仪卫耳。""后汉太尉杨震，葬日有大鸟祥之，因立石鸟像于墓。""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嵕山，门前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官名。"《风俗通义》说："《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臣不能备方向，乃立其像于墓侧。罔象畏虎与柏，故于墓前立虎与柏也。"不难看出，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帝王、大臣陵墓前，设置石兽等石刻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陵墓上的装饰，主要是想制造迷信气氛，藉以护卫自己的故茔。因此，他们往往将认为最凶猛的狮、虎形象，予以神化，加上双翅，来显示神怪的威力，并造出如"天禄"、"辟邪"等神秘的名称，以期达到为死者镇驱邪祟的作用。

目前，碑林博物馆收集的陵墓石刻中，有一批包括门楣、门框、墓门在内的东汉浮雕画像石；有南北朝时代的立兽、石马；有隋唐时期的石椁、墓门、石犀、石虎、石狮，及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浮雕等。这些杰作正是我国古代陵墓石刻的一个缩影。

我国东汉时代，由于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厚葬习俗，各地盛行用雕刻画像石装饰墓室，遗物最多的有山东、河南、四川等地。陕北榆林地区的

无定河、秃尾河流域的绥德、米脂、神木一带，建国后也陆续发现了大批东汉的画像石。这些发现，填补了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群到赫连勃勃石马的500年之间，陕西地区石刻艺术的空白。陕北东汉画像石被发现之后，有很大一部分收藏在碑林博物馆内，成为该馆陵墓石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陕北的绥德、榆林、米脂一带，在秦汉时属“上郡”范围。上郡始建于战国末年。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于秦，秦于是修筑长城。秦始皇对上郡极为重视，曾遣大将蒙恬驻守，并派长子扶苏监军。到东汉时，该地仍为通往边境的军事要道。自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夺取朔方，大破北匈奴后，西域五十余国均与汉建立外交关系，上郡也就成了内地与边塞的交通要冲。在比较安定的局势下，这里的农、牧业得到了发展，出现了大地主和大牧主。同时，还因为东汉时盐铁由官营改为私营，而上郡地处边境，常与南匈奴进行贸易，一些由经营工商业起家的人便各自富有一方。另外，一些终生驻守此地的文武官员和“实边”移民中的富户，组成这个地区的上层集团。这些人，生则恣情享乐，死则极力厚葬。上郡一带又盛产砂石，易于采运和雕刻，从而给他们营建墓室时广饰石刻画像，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陕北东汉画像石的特点之一是，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尤其是反映生产劳动的画面，实为其他地区所罕见。最突出的如永元十二年，绥德王德元墓中的“牛耕图”：一个画面上，刻着一个农民，一手扬鞭，一手扶犁，进行耕作（图版1）；另一个画面上，有一耕者双手扶犁，腰微弯屈，俯首缓步，好像在察看新翻的泥土似的。犁前有两头牛，被一根绳子系在一起；牛颈上抬一横杠，曳引耕犁，蹄步蹒跚。耕犁由铧、床、柱、辕、梢等部件构成。图形十分清晰。铧作等腰三角形，当是铁铸的发土利器。犁前接一长辕，辕首又置横木为轭，压于两牛颈上。铧是安装在犁床的另一个部件上的，这是为了在它与铧柱的交叉点上加穿楔木，以定耕地之深浅。这称为“二牛抬杠”犁，就是汉代赵过发明的“耦耕”。两汉时期，极力发展水利事业，又曾大力推广牛耕和铁制农具，因而形成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绥德、米脂出土的牛耕图画像石，说明了在1800多年前的汉代，即使是偏僻边远的“上郡”，也已经使用了“耦犁”耕种。这种耕作方法，比欧洲早了近千年，它反映了我国汉代农具的很大改进和耕作技术的高度发展。在米脂官庄出土的“牛耕图”上面一格，刻有12株茁壮的谷子。谷穗下垂，类似象形文字的“禾”字字样，朴素大方，寓意深刻。它象征着辛勤的耕耘已获得了好的收成。

谷又名“禾”,《氾胜之书》记载:“三月,榆夹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种谷在二三月,天气尚冷,牛耕图中的农民,头戴帽,身穿长袄,正反映了雕刻家们的写实精神,值得称颂。

陕北,是农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墓主人多是中、小地主和牧主阶层。在绥德王德元墓中的一画像石上(图版2),刻有大片畜群,牧主夫妇对坐楼下。楼的一边是马群,一边是牛羊群,各有一骑马的牧人在后边放牧,还有许多鸟兽飞鸣奔驰其间,使画面充满了活力,好一派兴旺景象。

在绥德园子沟出土的画像石上(图版3),刻绘着由双阙合成的二层楼阁。阁内呈现出主客欢聚的场面,室外有车马侍从。屋正中竖一高竿,上覆瓦顶,顶下挂着腊制禽兽,似有夸耀富贵之意。二室内各有二人,左二人似在对语寒暄,右二人正作“六博”游戏(六博是汉代民间娱乐游戏的一种),案上置六枚竹箸。

1971年,米脂官庄出土一块宴会场面的画像石(图版4),画面中心为两层楼房,主人夫妇对坐堂上,户外站立着侍役和跪献东西的人。楼两旁有阙,阙上凤凰作展翅欲翔状。阙外各有一队车骑自远奔来,有人在阙旁迎接。阙是建在大门两旁的高楼,登临其上,可以远眺,所以也叫“观”,是用来保护院落的堡垒式建筑。此画面活生生地反映出富有阶层者的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农民的恐惧心理和防范措施。

车马狩猎形象,是汉代画像石应用最多的题材,因为这是当时地主、牧主和官僚们普遍喜欢的一种娱乐活动。米脂官庄的石刻画中,有猎虎、搏熊、射羊、逐兔等狩猎场面(图版5)。猎者使用弓、箭、戟、斧、矛、盾等武器,步骑结合,前后夹击,围猎野兽,气氛热烈而紧张,构图明快活泼,把各种动物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鹿兔狂奔逃命,猎犬追逐其间;虎态凶肆,张牙舞爪;熊急则直立,与人搏斗,令观者为之一惊,真有身临其境之感。绥德苏家圪凹出土的一门楣画像石(图版6),侧面刻着四个姿势不同、健壮有力的骑马者,正在射猎。被追逐的鹿、狐等兽,受惊急促奔命,其仓惶神态,跃然画上。

陕北东汉画像石中所反映的车骑,一般都是轺车和容车。轺车往往排列在前,容车一般排列在后。车后边都跟有骑吏和侍从。如绥德苏家圪凹出土的门楣石(图版7)上边,饰刻一辆轺车,一辆容车,三个持弓箭棨戟的骑吏,两个侍僮。一对官吏夫妇,坐着肥壮骏马所拉的腾骧奔驰的轻车,骑吏、侍从成群跟随着出行。还有拥彗的清道夫,执戟的守门人,耕作的农民,以及

跪拜着等形象。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田连阡陌，牛羊成群，出则车马侍从，入则花天酒地；可劳动人民，则被剥削得贫无立锥之地，不得不供人驱使，受人奴役。陕北东汉画像石，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为我们研究东汉的阶级状况、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陕北东汉画像石中的神话故事，以西王母、东王公最为常见。绥德刘家沟出土一东王公访西王母的画像石（图版 8），两端各刻一圆壁形画面。右为金乌，左刻蟾蜍，以象征日、月。左侧西王母戴胜端坐，旁跪三人，或许是祈求仙药的使者。还有持物跪见的羽人，取食的三足鸟、九尾狐，捣仙药的玉兔、蟾蜍。左侧东王公驾云车，前有迎接的三足鸟，作前驱的虎，持戟的大行伯等等。人物活泼生动，刀法严整，实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米脂官庄出土的一画像石，门框上刻西王母坐在云气缭绕的树梢上，两侧各有一个跪着的侍者，一个持笏，兔形，另一个作伸手状。西王母座下有飞鸟和狐狸，狐尾雕刻甚大，当是三足鸟和九尾狐的写照。

墓门上多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和独角兽等，有守卫四方、辟除邪祟之意。其他像翼龙、怪兽、羽人、神仙、奇花、异草等多种题材，也都表示吉祥符瑞，禳厌妖魔的意思。从这些神话故事中，可以窥见秦汉以来巫风盛行，以及统治阶级宣扬的“五行”和“谶纬迷信”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除以上题材之外，陕北东汉画像石中，还有蹴踘、击剑、舞蹈、拾粪、牛车等画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长袖宽裙的舞伎，刻画洗炼，姿态轻盈，服饰与楚器物上所画的颇为相近，很是引人入胜。

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之多，是陕北东汉画像石的又一个显著特点。计有牛、羊、马、鸡、狗、猪、猴、蛇、虎、鹿、蟾、鹭、雁、鹤、孔雀、松鼠、狐、鱼等等，近 20 种。它们有的穿插于边饰中，有的配合在人物中间，有的则自成体系，反映出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些动物画像，都是研究陕北古生物的宝贵资料。

汉画像石是在钢铁工具被劳动人民掌握的时代的产物。它以中国装饰图画为特征，混合用阳刻和阴刻线纹的技法，来表现形象，在石刻技术上称为平雕。平雕是继承了商周青铜器的雕饰花纹艺术，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在风格上，汉画像石开拓了中国绘画的道路。

平雕和圆雕不同。平雕能表现比较复杂的故事情节和较广阔的场面，具有绘画趣味。制作时，先在平面的石材上以硃或墨描绘出所要表现的形象，然

后再刻画雕琢。碑林博物馆收藏的汉画像石，有好几块上还残留着显著的墨线和硃彩遗迹。这在汉代毛笔发现绝少的情况下，使我们能看到近两千年前的绘画真迹，诚为难能可贵。

收存在碑林博物馆的刻有文字的陕北东汉画像石仅有四块：一块为绥德王德元墓出土的单行石条墓记，上刻“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德元室宅”14字；另两条出土于绥德郭稚文墓内，一刻“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12字，一刻“永元十五年二月十九日造作居”13字（图版9）。此二石与文字并行处，都刻有花边装饰，下部刻一马站立树荫下，正拟就槽进食。还有一块出土于米脂官庄，上刻“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千岁室，长利子孙”19字，字边刻几何纹。四石刻字字体均是含有篆意的隶书，极其规则匀正，健劲有力。这些墓记文字和发现的汉镜、汉印上面的字纹，多有相似之处。而郭稚文墓内两石的题字，与一般汉碑、摩崖、石阙及汉画上的汉隶不同，可算是我国早期图案字的一个体例。

魏晋南北朝以来，陵墓石刻主要是石柱、石人和石兽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有西魏文帝元宝炬陵上的石雕立翼兽（图版10），大夏赫连勃勃时期遗留在长安附近的石马，以及北周时期的石狮（图版11）等几件。其中1955年西安市出土的一尊白石圆雕蹲狮，高仅22.3厘米，仰首凸胸，前肢斜撑，雄劲有力，显得十分健美威武，属这一时期小型石刻中的精品。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的朝代。这一时期的石刻艺术，不但继承了前朝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大胆地吸收了外来艺术的优点，并达到水乳交融，恰到好处的地步，创造了唐代石刻特有的风格。这个时期的石雕，气魄宏大，造型瑰丽，刻画简练而又精美，件件作品都显示出了强盛、奋发的精神。

在陕西境内，东起蒲城，西至乾县，绵延300里的北山峰原之间，排列了唐代18座帝王陵寝。每座陵前都遗存有一批数量不等的精美的巨型雕刻，被誉为“唐代的露天石刻艺术馆”。这些陵墓雕刻，一般都形体庞大，气势壮伟，多是用来守护陵墓门的，故而都是近于装饰化了的坐狮。唯李世民的父亲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前用虎。圆雕石虎，高达2.09米，呈走动状(图版12)。这种造型在唐代陵墓雕刻中，非常特殊，它纯系写真，不曾有半点守门卫户的意味。但从其挺拔的形体，威严的头部来看，仍然有很大的震慑感。此虎原来雕刻有8个，分置在献陵周围四门之外，现仅存一件，被移置在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内。这一具有纪念碑式的瑰丽雕刻物，从整体的形象结构来

看，是非常生动而和谐的，头部稍倾斜，做出阔步向前搜寻的姿态，正表现了虎特有的典型性格。无论是作为独立的雕刻艺术作品来欣赏，还是作为一种威严的守护者来要求，都是非寻常可比的。献陵前的石犀，也是我国古代石刻中罕见的题材。石犀高 2.3 米，重约达 10 吨左右，用整块巨石雕成。躯体直立、硕壮，细目束口，四肢坚实有力，身披坚厚的鳞纹皮，实为我国古代石刻艺术宝库中一件佳作。

唐代外交频繁，不少友好国家或国内边疆地区，经常进贡珍禽异兽。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内收藏的石狮和驼鸟等，是唐王朝睦邻友好外交关系的见证。馆内收藏的石人，被称作翁仲，或称为直阁将军，体型魁伟，头戴冠，腰束带，宽袖长袍，双手置前柱剑，目视前方，神情威严，气宇轩昂，是唐代武将的写照。

唐太宗李世民昭陵上的浮雕六骏，是驰名世界的不朽之作。所谓“六骏”，就是为唐太宗李世民曾立过赫赫战功的六匹骏马。贞观十年（636）十一月，埋葬文德皇后长孙氏之后，李世民为了追念他自己昔日的战绩和战马，诏令雕刻而成的。六骏的形象、名称及其来历，史籍均有记载。据说：雕刻六骏时，由大画家阎立本绘制图样，李世民亲自为六骏作赞，每骏四句，由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刻于马头上角方块石处，但因年久，风雨剥蚀，至宋代，字迹已漫漶不清。六骏中，三匹站立，三匹奔驰，皆体态壮硕，雄健有力。雕刻手法简洁，富有艺术感染力。站在它们面前，仿佛又看到了它们当年驰骋沙场的雄姿，想到它们为李唐王朝开创江山所建立的赫赫战功。

在陵墓石刻中，石刻线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唐代石椁、墓门、墓志上的石刻线画，其内容之丰富，艺术之精湛，都是十分罕见的。碑林博物馆收藏的 1973 年由陕西三原县陵前公社发掘的唐李寿墓石椁，椁外有浮雕，并绘有描金的四神、武卫、文武侍从以及驭龙跨凤的仙人等。里面线刻乐伎、舞伎、男女侍从，天象星宿图等。各种人物都富有韵律和节奏感。椁底四周，线刻十二肖兽。墓门由门扇、门槛、门框、门墩石等组成。双扇门外，以减底平雕的手法雕成一对朱雀和一对孔雀，造形简练优美。背面为阴线刻天王像，线条熟练流畅。门楣为浅浮雕大兽面，门槛上平雕蔓草花纹，门墩上刻雄健的双蹲狮，并有线刻忍冬和动物纹饰。这是唐代墓门中很优秀的作品。

韦顼石椁上，有石刻画 13 幅，其中 7 块一面刻，3 块两面刻，共 13 面线刻画。每一幅画面上，都是一个或两个不同姿态、不同身份的妇女形象。她们有的穿着唐代流行的大开领胡服，颈上戴着串珠项链；有的穿着禅衣拖地

裙，手中或捧盘、或持扇。她们或是主妇，或为侍女，或调鹰戏鸟，或扑蝶观花。其服饰、发髻、神情各有特点。画面空隙处，还配有花鸟，线纹流畅。总之，这组线画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豪门世家骄奢淫逸的生活情景，为我们提供了唐代贵族妇女的服饰佩戴及生活情趣等方面的资料。

宗教石刻，主要是佛、菩萨、力士造像。在我国，佛教石刻始于北魏，盛行于唐代。大约在古印度阿育王时代（公元前232年以前），佛教徒为学习释迦牟尼的苦修，在僻静的山中开凿石窟，称为“石窟寺”。他们在石窟寺中修道，白天到城里去行乞，或者到山谷中去汲水，一生只有三衣一钵，日夜带在身上，过着所谓离欲清静的生活，最后默默地死去，称之为“苦修僧”。信徒们为表示对佛的虔诚，祈求福禄，就捐舍“净财”，邀请能工巧匠，在石窟里雕凿佛像，称为“石窟造像”；或在巉岩峭壁上，开龛凿像，叫作“摩崖龛像”；或在露天石壁上雕造佛像，称为“摩崖造像”。这样的造像传到中国，便产生了如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等宏伟的艺术宝库。

除以上几种造像外，还有碑形造像和单身圆雕造像。碑形造像和单身圆雕造像，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由于陕西曾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封建帝王建都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中西人民友好交往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种种宗教团体在这里大力传经布道，先后建立过许多寺庙道院。据韦述《两京新记》记载，天宝（742）以前的唐长安，就有僧寺64座，尼寺27座，胡祆祠4座，计113座。这些众多的寺院道观，几乎都雕有各种造像来供奉，其中以佛教题材为内容的居多。在我国历史上，虽有过几次较大的毁佛事件，使不少宗教石刻连遭损坏，但遗存至今的精品却仍然不少。如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北魏“皇兴造像”（图版13），座后刻有大段铭文，字体刚劲，在北魏的石刻造像中是少有的。造像的记时为皇兴辛亥，应是北魏献帝拓跋宏皇兴五年。在时间上，距离名僧昙曜于和平三年刻的举世闻名的云冈灵严五窟有九年，风格应属云冈初期。雕刻形式为交脚弥勒佛像，面相圆胖，唇厚项粗，波状发型前卷，为吉祥海云相。衣褶线条并行，手相不作上下重叠，而为前后重叠的本印。舟形背光。边沿刻着己字形火焰纹带，内间以忍冬纹带和火焰化佛，围绕着莲花纹圆光。须弥座边雕双卧狮。这些都是民间艺术家依仿西域间接传入的粉本（印像）式样，用中国传统的浮雕手法刻出的。背光及座边，分格雕出佛本生故事及供养人名字，更显得生动活泼。造像保持了东汉以来画像石减底平雕的惯用手法，造型比例匀称，刀法

劲健流利，充分显示了云冈初期浑厚的风格，是这一时期的一件精美制作。与此造像相类似的还有北魏永平二年释迦造像及1983年西安西郊出土的佛菩萨像，背光均雕有释迦佛降生等故事画面，也是难得的佳作。北魏“太和造像”（图版14），佛头大，且向前微倾，与瘦小身躯比例不称。这是仿照石窟壁刻大像的手法，为使人仰视感到庄严雄伟而以夸张手法雕造的。像座用楷书刻“大代太和二十年佛弟子天郁造释迦文佛”等字样，当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第二年。从时间上讲，已进入石窟艺术的龙门时期，但这尊造像仍是云冈晚期的遗风，可说是一件由云冈向龙门过渡时期的作品。北魏“景明造像”，题记是北魏宣帝景明二年（501）雕造，上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仅有七年，相当于龙门早期作品。景明造像为一碑型浮雕释迦牟尼四面造像，布局匀称，装饰富丽而多变，刀法流利精细，格调上，不但具有云冈时期的浑厚，而且已显示出龙门时期的俊丽，是当时的代表作。“普泰造像”（图版15），为北魏普泰元年（531）的四面龛刻作品。就龙门石窟艺术而言，这尊造像应属中期作品。整体镂刻细致，刀法丝毫不苟，衣纹线条由并行转变为波纹线，袖口衣襟对称的三角形褶纹更趋柔软秀美。虽然佛、菩萨的脸面被破坏残缺，但正面龛内左右上角留存有完整的小菩萨像，以及左右侧连弧忍冬纹倒卷凤头衔叶的莲花拱，都表现出劲健、严整、俊丽的技法，是这一时期一件小型的精美作品。

隋、唐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体现在我国古代宗教石刻艺术方面的是：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兼之吸收了当时西方艺术的优点，于是便创造出更加生动和更加完整的新作品。碑林博物馆保存的隋代“四面造像”（图版16）正面上部，满饰璎珞，幔楣拱龛，雕造得精细繁丽，而不显堆砌紊乱。帷幔的挂钩、束带、条理顺适的皱纹，给人一种轻盈飘动的感觉。龛内有六阶大小不同的小龛，佛与供养菩萨，形式各异，展现出一种和谐美。背面和两侧，各雕数层佛龛。这是陕西地区留存的北魏以来千佛式造像中一件较好的作品。隋“弥勒菩萨像”（图版16），是头戴宝冠，身佩璎珞，交脚坐形的弥勒菩萨像。造像比例匀称，雕工精致，特别是脚趾下触莲台的姿态十分生动，衣裙下褶纹飘逸，合理逼真，实属难得。隋“菩萨头”（图版17），近年来在西安西郊发现有数十件，然而这些造像的身躯佚失，仅留头部，可能与北周或唐代的毁佛事件有关。但这些作品却是隋代写实主义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杰作。这件菩萨头像，眉修目长，鼻隆耳秀。丰腴的脸庞，微带笑涡的口角，似笑非笑的神情，给人以美感。束发的璎珞、宝冠和耳饰，秀丽的波状发结衬托，显

得庄严、高贵又俊美温柔。这是艺术家以女性美来概括高尚理想美的表现。

唐代造像，大多肌肉丰润，衣褶圆细，面部曲眉丰颐，柔和自然，栩栩如生。唐“观音菩萨像”（图版 18），是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唐代造像中最精美而且是最完整的写实主义的石刻艺术代表作之一。造像原在西安东关景龙池一废庙中，1952 年才入藏该馆。此像虽然头戴佛冠，胸饰璎珞，手持莲蕾，全跏趺莲台上，是六观音形像的一种，但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位雍容高雅的世俗美女。盛唐时代崇尚健美，当时的壁画、线刻中的人物形象，莫不如此。这尊造像，面庞丰腴，胸部、臂膊、手足圆润，双腿丰盈健美，雕刻得细腻而不繁芜。下配束腰莲台。莲台上的莲花、缠枝莲蕾，以及基座上的乐人，布局合理，更衬托出造像整体的端严、肃穆、绮丽、大方。在佛教圆雕造型艺术中，它虽然是小型作品，但实为国宝之一，十分珍贵。唐刻“残菩萨像”（图版 18），是建国前该馆原藏品。造像手、臂、腿部都残缺，仅就残余躯体，仍可看出它是唐代一件极其精美的佳作。造像胸部丰满，膝部微屈，细腰丽姿，斜披轻纱，衬以精致的串珠项环、胸饰，给人以女性绰约多姿丰美的真实感。造型比例适度，刀法流畅简洁，标志盛唐石刻艺术的成熟阶段。唐刻“虚空藏菩萨像”（图版 19），秀美庄重，如实地雕刻出纤巧的手指及其曲折的身姿。宝冠、璎珞及褶披巾、腰衣也都雕刻精细，令人享受到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美。整体的气派，均衡的比例，莲座装饰的精工细作，显示出雕刻家深厚的功底。“持弓天王像”（图版 20），坐在被降伏的夜叉背上。这松弛了弓弦的天王形象，应是佛寺碑上的装饰品。夜叉雕造成毛发竖起，双爪交叉，驯服跪地。天王虽头部残缺，而披甲、护膝、尖靴以及紧握弓的手臂，都表现得雄健逼真。在碑林博物馆的众多藏品中，还有 1958 年从西安东郊电厂路出土的一批白玉石贴金造像。这批造像出土的地点，应属唐长安城的兴宁坊。据记载，兴宁坊南，靠东侧，有隋代建造的清禅寺，唐大中六年改为安国寺。还有天宝六年，以高力士宅舍改建的华封观。这批造像包括“虚空藏菩萨像”、“白石观音头”、“马鸣大士”、“马头明王”、“降三世明王”、“随心金刚”等十多件，可能是安国寺或华封观的遗物，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毁佛中被埋在地下的。这批造像于千年之后又重见天日，虽有残缺，雕造却很精美，这就告诉人们，唐代在雕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它们堪称为不朽之作。唐浮雕“塔门造像”（图版 21），是一名高僧舍利塔上装饰塔门的造像。门框内浮雕韦陀护法像，门前为宝供和两沙弥，门顶、门楣、门框都刻以减底阳刻缠枝宝相花纹并两童子。柱础上的两个雄狮，以及花鸟人物细部，都采用浮

雕、平雕、线刻等装饰雕法，有汉代的传统技艺。陕西省碑林博物馆还收藏有唐代为寺院和尚们雕刻的功德碑，也归于宗教石刻的一个方面。除螭首龟趺、长方形碑身的一般形制外，雕刻家们还各展奇技，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图并茂、令人不胜惊叹的雕刻艺术品。如《大智禅师碑》、《道因法师碑》、《兴福寺碑》碑侧等。其中《大智禅师碑》碑，螭首、龟趺。螭首作左右各三条并头，碑额周缘刻云纹，三角形处刻一坐佛。这是摆脱了当时一般碑额雕刻形式的一种崭新手法，意匠独具，技巧纯熟。碑侧有线刻和减底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装饰，将茂密的蔓草、栩栩如生的凤凰、骑狮、仙童、瑞兽和伽陵频迦等穿插布置，使人领略到一种繁茂、绮丽又生机勃勃的气息。刻工精细，是唐代碑侧花纹中首屈一指的艺术品。《道因法师碑》碑额雕饰三尊佛像，碑侧以双波纹作干线，左右对称，用古玉上的螺纹连续起来构成纹饰，碑座左右又刻有各具情态的人物画像，别具一格。

五代的石刻艺术继承了前朝传统，风格无特殊变化。

宋代佛教造像，一般玲珑纤巧，接近于反映现实生活，制作手法趋于写实。造像中的佛和菩萨，原本是天界的神，但一经宋人雕出，却都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些美的典型。如该馆所藏的宋“阿耨观音像”，屈右腿坐于岩石上。衣带褶纹柔和舒展，刀法简洁流畅，尤其手臂雕琢得自然逼真，舒适安闲。虽是粗砂石雕刻，且头部残缺，然而却丝毫无损于这一造像的艺术价值。另一件“残大士像”（大士是菩萨的通称），属于陕西地区遗存的一具有代表性的宋代作品。造像身披袈裟，胸部微倾，双手置于腹前，站在莲台上。雕刻刀法流利，比例合度，接近真实人体。给人有一种亲切之感。中唐以后，泥塑盛行，取材施工容易得多，于是渐渐取代了石刻造像，因而使这些保留下来的石刻艺术品更加显得珍贵。

碑林博物馆收藏宋、元时期宗教方面的石刻线画和反映明、清时代社会思想、意识观念方面的线画以及陕西关中民间遗留的一些栓马桩等石刻艺术品，也应该重视的。

总之，陕西地区保存的我国古代这些内容丰富，造型精美，生气盎然的石刻艺术作品，都是千余年来未留名姓的历代雕刻家们辛勤劳作，巧运匠心的结果。这些作品不仅形象地记录了历史进程，也为后世留下了各个朝代陵墓装饰和宗教发展情况的实物资料，应当倍加珍视。

1. 霍去病墓石刻

西汉（前 140—前 117） 霍去病墓在陕西兴平县汉武帝陵的东北侧。

霍去病是西汉时期的青年军事家，曾先后六次出兵塞外，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贵族侵略者的多次入侵，保障了西汉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促进了西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汉武帝以其功高，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元狩六年（公元前 117 年）病死时年仅 24 岁。生前曾有过“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千古传诵。死后，汉武帝为纪念霍去病河西抗敌大捷的战功，特为修建墓冢，形式象征祁连山，并雕刻各种巨型石人、石兽作为墓地上的装饰。

大型的石雕像，秦代已经开始，但遗存下来最早的作品却是属于西汉时期的，其中又以霍去病墓前这批石刻最具有代表性。它出于官府工匠之手，其中有两件分别刻着“左司空”官署和“平原乐陵缩伯牙（亦释年）霍臣孟”隶字的题铭。

这批石刻中最著称的是“马踏匈奴”像，据文献记载，它原置墓前，由此推断它可能是该墓的主像。石马与真马大小相近，昂首站立，肌肉硬突，尾长拖地。马腹下仰卧一老朽，头对马嘴，两颊有稍长胡须，面目狰狞，两足上曲，手持凶器，作垂死挣扎。这种用一匹威武的战马来象征反侵略者的胜利，而把侵略好战的匈奴奴隶主踏于马下，是受到正义的惩罚。并且巧妙地利用了战败者倒卧的躯身，正好填满了马腹下的空隙，使雕像成为坚实稳定的整体。其设计和表现手法，很为高超，堪称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件雕刻艺术杰作。

此外，尚有石刻跃马、卧马、石人、猛兽食羊、牯牛、人与熊、小猪、石鱼等 15 件，都是很质朴、生动、雄浑、深沉，反映西汉社会的富庶和国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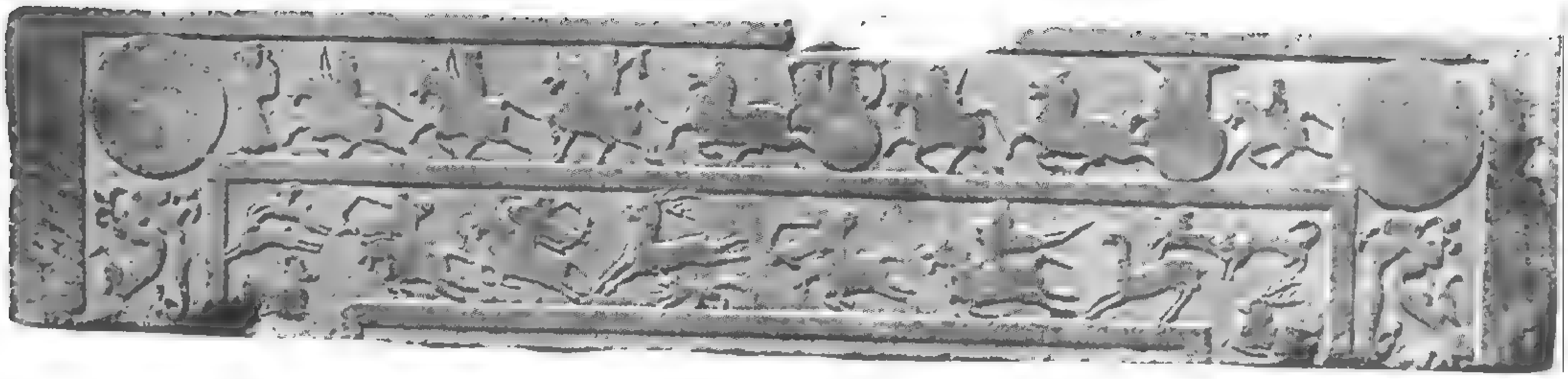
强大，高度体现了汉初沉雄、博大的时代精神和艺术风格。这批大型的石刻，亦是我国目前保存的古代成组大型石刻艺术中，时间最早、驰誉中外的划时代杰作。目前这批珍贵文物均保存在茂陵博物馆内。

2. 车马出行图

东汉（25—220） 高 193 厘米，宽 33 厘米。1971 年米脂县官庄村四号汉墓出土。

秦汉时代，帝王生前即为自己预营陵寝，称为“初陵”，东汉时则称为“寿陵”。一般臣民亦生时自营冢茔。这种墓茔建筑，日趋庞大、复杂。当时的坟冢高、宽有等级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见《周礼·春官·冢人》郑注引《汉津》）。对于一些特殊人物，还建以特殊墓冢。如霍去病起冢，形似祁连山；卫青起冢庐山（在塞外，非江西九江的庐山）等。墓旁起祠堂。祠堂多以石筑，壁间往往雕刻人物画像。山东长清县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即今东汉孝堂祠。另嘉祥县武翟山有武氏祠，也是东汉祠堂，现仅部分遗存。墓前起双阙，墓旁起楼、筑池，还有筑神道。神道之外，列石人、设石兽、树石柱，墓前还有刊立石碑的。墓内除陪葬玉饰珍宝外，还有印绶、金银财物、食物、饮食用具、日常用器、乐器、兵器、飞禽走兽以及偶车马桐人和其他伪物（明器）等，又广列石室，上刻各种人物画像活动，以象征死者生前的享乐生活。

解放后，在陕北榆林、绥德、米脂、神木等地区，发现了大量的这种东汉画像石。此幅车马出行图即为其中之一。除简单、明快的植物花纹图案外，



画面上部刻一辆轺车和一辆容车。轺车在前，容车启后（轺车是一马的小车，容车是盖施帷帐，贵族妇女乘坐的车）。每辆车前后均有骑吏前驱或侍僮随后，表现出了汉代官吏夫妇坐着腾骧奔驰的轻车出行游乐，气宇轩昂的场面。

另一石车马出行图为1957年，绥德出土，形象与上同，不过画面下部有射猎的场面，内容更加丰富。此石高38厘米，宽175.5厘米。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 东王公会西王母故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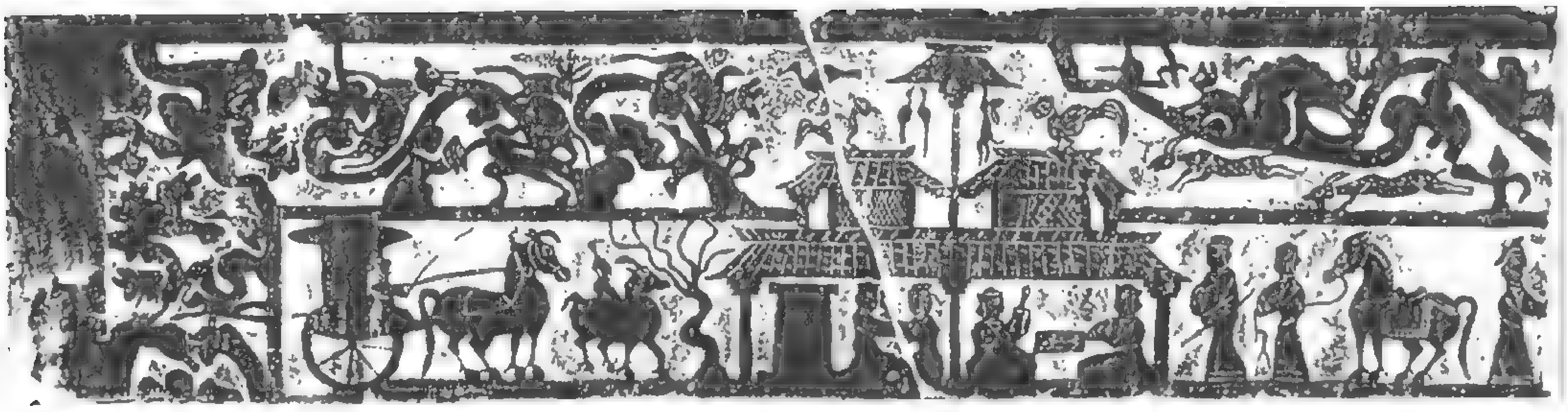
东汉（25—220） 高38厘米，宽167厘米。1955年绥德刘家沟出土。

此石为墓室的门楣，刻绘了东王公会西王母的故事，反映秦、汉间神仙长生的神话传说。画面两端各一圆璧形，右刻金乌，左刻蟾蜍，表示日、月。左侧西王母头戴胜，着宽衣，拱手踞坐。旁跪三人，或许是乞求仙药的使者；旁又有持物跪见的羽人，取食三足乌、九尾狐，持杵在捣仙药的玉兔、蟾蜍等。西王母原属我国西部地区远古时代的一个部落，后来演化成为西仙之首，掌管不死之药的神人，因此，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的传说。古代认为三足乌为西王母驱使的，《汉书·司马相如传》引《大人赋》：“低徊山阴，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而穴处兮，有三足乌为之使。”九尾狐传为神物，食其肉可辟除邪恶。《山海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食者不蛊。”画面右侧刻东王公驾云车，前有去迎的三青鸟及作前驱的虎和持戟的大行伯等等。东王公仍是东仙之长，与西王母友谊亲善。《神异记》有“昆仑之上有大鸟焉，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复东王公，右翼复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东王公岁登翼上会西王母。”各种神异动物，构成传说中的故事场面。石刻边饰雕凿秀丽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人物活泼生动，刀法简洁严整，为一件精美的画像石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 迎宾客、六博图

东汉（25—220）　　高 40 厘米，宽 139 厘米。绥德园子沟出土。



此长方形门楣石上，刻着由双阙合成的二层楼阁，呈现着主客欢聚的场面。室外有车马侍从，主人与接踵而来的宾客握手相迎。屋正中竖立一高竿，上覆盖瓦顶，顶下挂着各种风干猎禽兽，似反映了佳肴美味，宾客盈门的富贵生活。二室内各有二人，左二人正在对语寒暄，右二人正在作“六博”之戏，案上置六枚竹箸，宽衣跽坐，双手前伸，作对博的姿态，形象生动逼真。所谓“六博”，本作“六簙”，是我国古代相对弈棋的一种。关于这种棋艺，著名爱国诗人屈原、曹植等在他的作品中都作过吟咏。如屈原《招魂》云：“菎蔽象棋，有六簙兮。分曹并进、遒相迫兮。成枭而牟，呼五白兮。”曹植《仙人篇》说：“仙人揽六箸，对博太山隅。”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六博”棋艺的具体博法，没有记载而早已失传。可 1972 年，在河南灵宝县张家湾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博局和对博俑，加上这块东汉画像石上六博图，便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六博”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总之这块画像石内容丰富，布局严紧，层次清新，富于表现力，为陕北东汉画像石珍品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 蹴鞠、击剑图

东汉（25—220）　　高 150 厘米，宽 180 厘米，绥德大坬梁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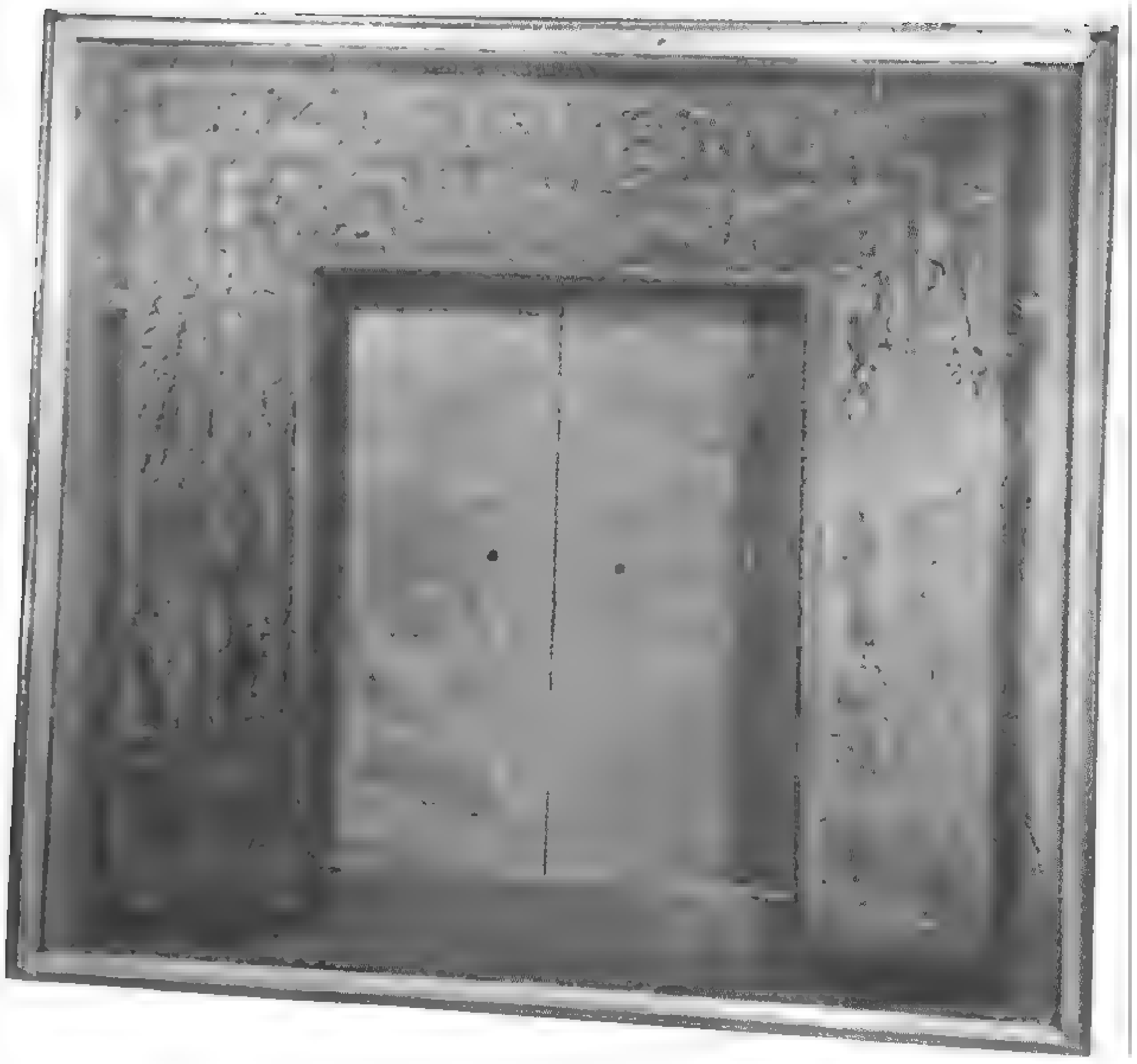
这门楣石上，刻一组作蹴鞠（踢球）表演，左右二人扬手顿足，各踏一球上并且两肘抵一大球进行表演。画面左侧一组刻二人作击技表演，左人持

剑，右人掌钩镶，人物姿态刻画生动。右侧是一组达官贵人高坐饮食观览技艺表演的场面。右三人，主人居中座席上，前后各有侍者跪地进食，主人前方有盛食器，似所谓斛与铁复合饮食器，上方三枚乂状器不知何物，疑为“仪礼”中所说的“毕”，毕为木乂，祭时作乂肉用，虽为古祭器，但汉时可能沿用，在饮馔中出现尤其近视。整个刻石画面内容丰富，形象逼真，特别是提供了汉代已有蹋球活动这一新的实物资料，颇为珍贵。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 画像石墓门

东汉（25—220） 高 175 厘米，宽 185 厘米。



这套浅浮雕完整的石刻墓门，是 1971 年由陕北米脂城西五里无定河西官庄村二号汉墓出土。门框两侧刻有伏羲、女娲像，着冠服，人首蛇身，手上各捧日、月。日月中并有用墨线分别绘画的金乌和蟾蜍。另外还有羽人、奇花、怪兽等表示祥瑞。且刻有一牛车和一辆驾驭的乘人轺车。门扇上用减底阳刻手法，刻有朱雀衔环铺首及独角兽，取镇守四方，僻除邪恶之意。雕刻手法灵活生动，想象力丰富，是一套华丽、完整的东汉墓室石门。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 歌舞和博山炉图

东汉（25—220）　高 145 厘米，宽 38 厘米。绥德县出土。

石为一竖长方形，刻有举手长袖折腰，姿态婀娜，舞姿翩迁的舞伎，蹲狐、人物、博山炉，画面结构严密，内容丰富多彩。所谓“博山炉”为汉代常见的殉葬之物。据目前发现的“博山炉”有陶制的、瓷制的、铜制的或在铜胎上鎏金或错金银而铸成的，更加富丽堂皇。一般“博山炉”的制作，炉盖设计成为山峦起伏形状，在奇峰怪石之上，雕有猎人和各种动物。盖上面均匀地散布着许多小孔。传说博山常年是云雾缭绕，这种炉点燃香后，从细孔徐徐冒出轻烟，构成一幅宛如博山云雾弥漫的景象。由汉到唐代均有使用。所以在唐代诗人温庭筠《咏博山炉》诗中生动地写道：“博山熏香欲成云，锦段机丝妬鄂君。粉蝶团飞花转影，彩鸳双泳水生纹”的诗句，不仅形容了飘渺的香霭，而且还描述了熏炉制作的素绮富丽。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 西王母、博山炉图

东汉（25—220）　高 115 厘米，宽 36 厘米。米脂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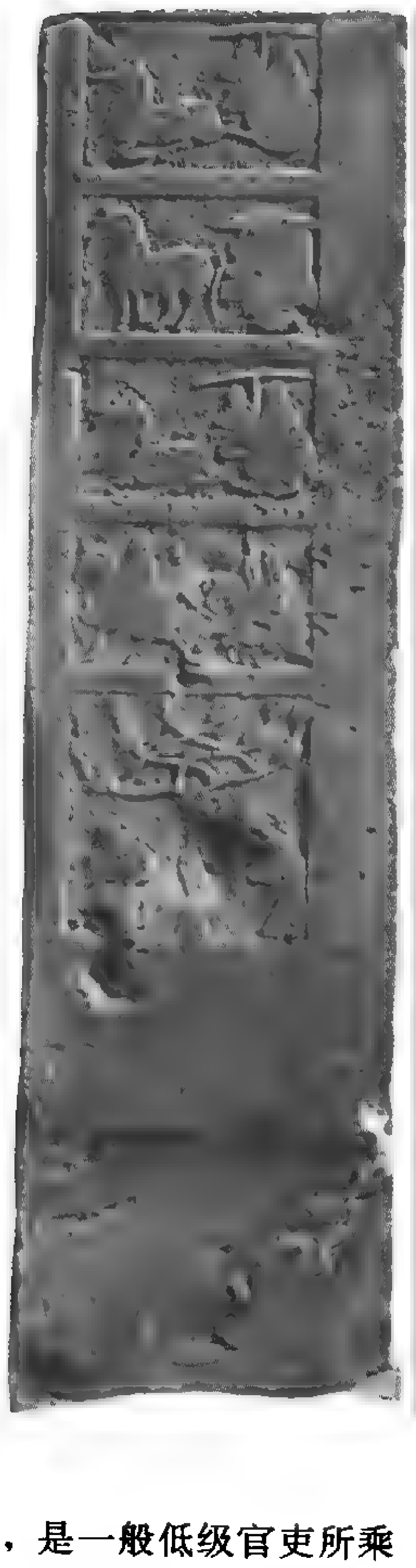
刻石为竖长方形，画面分为两栏，左栏分作七格，上浅浮雕玉兔捣药、主客贽见、卧鹿、走羊、站鹅、卧狐等。右栏分作四格，上刻西王母，中刻主从人物、站鸭，下雕一具博山炉。

西王母形象，在陕北出土东汉画像石中很多，有刻一人拱手曲足端坐，更多的则是人物端坐在云气萦绕的树稍上。关于西王母的传说故事，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相当丰

富，有记为地名的，如《尔雅·释地》载“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但更多的都记为神人之名。如《尚书·大传》载：“西王母来献白玉琯。”《荀子》载：“禹学于西王母。”《山海经·西山经》载：“玉山、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载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等等。这些传说从战国开始至汉代广为流传。这无疑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初期人们的愚昧、迷信以及统治阶级追求长生不老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现今民族学、考古学观念来研究，西王母不应当是什么住在西方的大神仙，也不是什么豹尾虎齿的怪物，而应是远古时期生息在中国西部高原的过着母系氏族生活的原始人群象征。西王母传说的主要内容，都可以用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理论和材料进行合理的解释。这些神话传说，为我们研究中国西部远古时代的原始社会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素材。

石刻上雕刻着西王母坐于云气萦绕的扶桑树上。整个构图匀称，内容丰富，可称为陕北出土东汉画像石中较好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 轺车、辎车出行图

东汉（25—220）　高 140.5 厘米，宽 38 厘米。绥德县出土。

此石为竖形门框，画面分作五格，刻轺车两辆、辎车一辆、骑吏和迎谒者。轺车、辎车（注），上各乘二人，前边为执辔的御者，后边坐作主人或官吏，车前各驾一骏马负辕，昂首奔驰。辎车作站立状，图上的骑吏手各执物，驱马前行。二迎谒者，宽袖长袍，曲身前倾，双手拱站在树下，似等待着轺车和辎车上的贵宾到来。雕刻技法简练、概

注：①轺车：有车盖，但无屏蔽，一马架的轻车为轺车。《说文》“轺，小车也”，是一般低级官吏所乘的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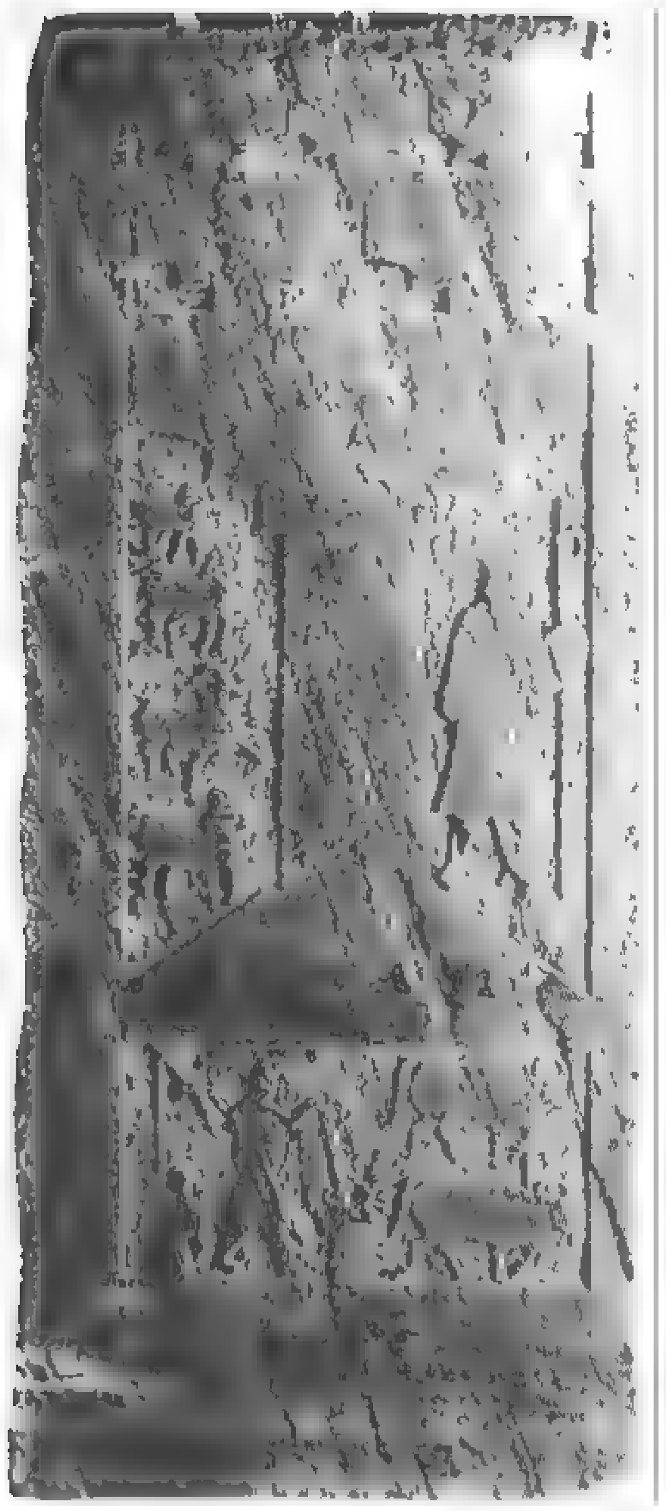
②辎车：车盖与周围屏蔽很严密，多为贵族妇女所乘坐；由于此车便于卧息，亦适宜于老弱和病人乘坐。

括，人物不同的神情动态鲜明生动突出。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 建筑斗拱、羊群和牛耕图

东汉（25—220）　高 114 厘米，宽 52 厘米。1962 年绥德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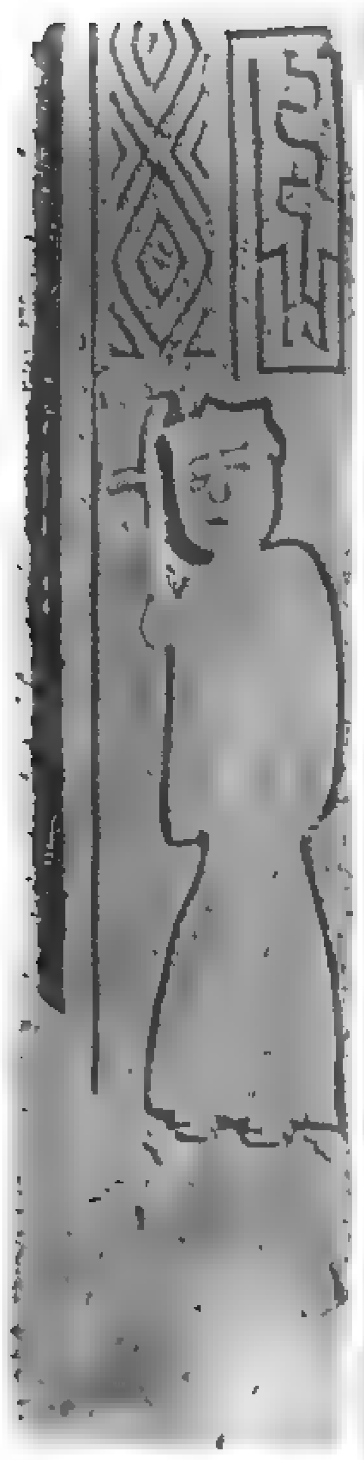
依据考古材料得知，汉代房屋一般系土木结构，砖在汉代虽已大量生产，亦有用于居住建筑，在遗址中也曾发现过砖墙壁，但并不很多。推测当时一般的房屋，可能系用木板作壁，用夯土筑墙。至少在东汉，屋顶已具备了后代所有几种主要形式，一种是“悬山式”，只有一道屋脊；一种是“四角攒顶式”，有四道屋脊，当时为了减少梁和柱的剪刀，在高级的建筑上已经相当普遍地使用了斗拱；它可以兼作装饰，也可使房屋增加美观。斗拱的形式，在当时以“一斗二升”为最流行。屋柱子的形状除圆形以外，还有八角柱，但后者多系石墓和石祠中的石柱。柱础多系以石质打磨。此石刻画面中雕一圆柱上承双层宏伟的斗拱。正是研究汉代建筑的实物资料之一。

在斗拱两侧还刻有羊群和一持戟门卒。下刻一组耕牛图，前为二牛抬着一部起步的犁，后为耕者，一手撑犁一手扬鞭，缓步在前行，耕者后似为一宽衣长袖，手持物的播种者。这种二牛抬扛的耕田图，再现了汉代陕北劳动人民辛勤耕作的一种方法，这种画面雕刻的出现，表明了当时民间艺术家在热爱熟悉生活的情况之下才能创作出如此现实的题材。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 执戟门吏

东汉（25—220） 高 121 厘米，宽 30 厘米。绥德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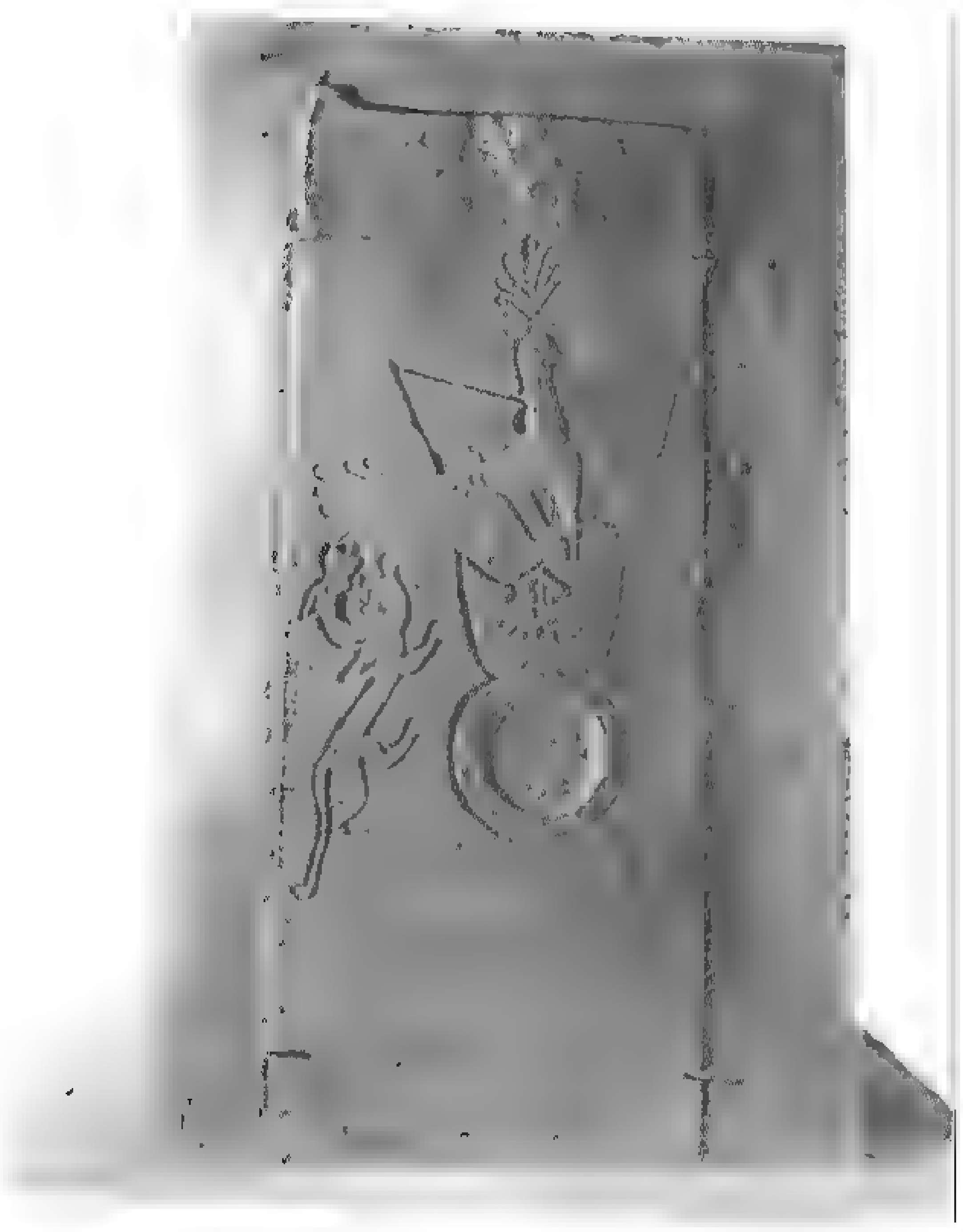
此石以阴线纹刻，上部表现有规整的几何纹图案，下刻一个身穿长袍、手持戟的门吏，雕刻手法粗犷朴实、生动简明，这种构图内容在陕北东汉画像石中较为罕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2. 朱雀、铺首、青龙门扇

东汉（25—220） 高 112.5 厘米，宽 42.5 厘米。1957 年绥德县出土。

此石呈竖长方形，为墓室门。汉代高级建筑物的大门，常饰有铺首，往往铜上鎏金，所以被称为金铺首。铺首在汉以前多施用于器物之上；在居住门上施用铺首是汉代才流行的。铺首是用于敲门，兼以增加房屋的美观；它还被统治阶级用来壮声势、助威仪。司马相如在他写的有名的《长门赋》中说："挤玉户以撼金铺兮，音噌吰而似钟声"，就是描绘铺首的威势。近年来还在陕西兴平茂陵汉武帝陵附近，发现有青玉制作的全国罕见的一件大铺首，造型优美，气势壮观。



此石上刻的展翅翘尾朱雀及向上奔腾的青龙和兽面铺首，均为减底雕刻，部分减底似未完雕饰而即被使用了的门扇。但能以简洁的手法刻成粗壮有力的阴线，显示出生动灵活的形象，成为汉代石刻画中独树一格并能充分表达汉代艺术健康、质朴、雄伟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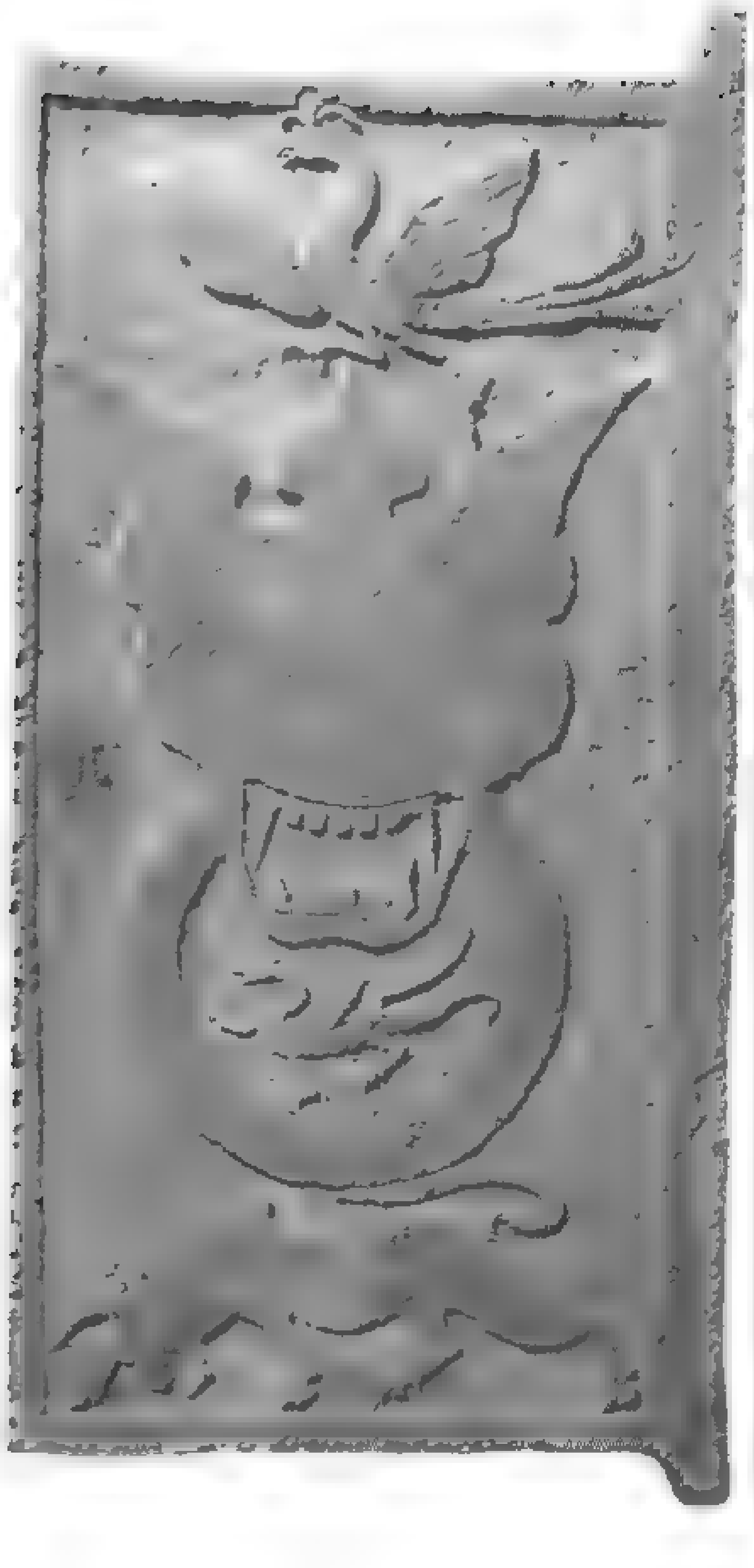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3. 朱雀、铺首、白虎、独角兽门扇

东汉（25—220） 高111厘米，宽49.8厘米。1955年榆林县古城滩南梁村出土。

这块竖方形石门上刻朱雀衔环铺首，环上兽面站立展翅欲飞的朱雀，环中雕一走形猛虎，下刻一独角猛兽，作者除了应用概括集中的手法外，又善于挪动几根主要的轮廓线，使被刻画的对象适应不同的环境和石材的面积要求，如墓门上刻的朱雀，一般地都保持着威武的姿态，但由于石门长短、宽窄的不同，因而朱雀的形象也随之有了各种不同的改变，并且为了使它发挥守卫墓门的作用，作者更把美丽的孔雀在神态上进行加工，雕成了威武的朱雀。画面上的头生巨角，或系由犀变形而成，姑称之为独角兽，形象威猛，突出了兽类的犷野性格。雕刻者运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不仅把独角兽的弯曲的四条腿刻画得健劲有力，而且刻出它尾部用劲高翘上卷，头部低下作俯冲而前的凶猛姿态，有如怒奔的斗牛，令人感其锐利的锋芒，达到了作者的预期效果。门扇石上朱雀四周空隙中，还添刻有小鸟、羽人、走虎等，使整个刻石画面成为一件有性格，且具特色的优秀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4. 朱雀、铺首、应龙、独角兽门扇

东汉（25—220） 高107厘米，宽52厘米。1964年绥德县贺家沟砖窑梁出土。

此石上刻兽面铺首，兽头上站立一展翅朱雀，环中雕以飞腾的应龙，下刻低头作俯冲高翘长尾的独角兽，画面整个构图采用了阳刻加阴线的手法，使画题内容浮出石面，然后在铺首兽面以阴线加刻两眼和朱雀的双翅。这种手法在山东武氏祠、河南南阳、四川新津等地画像石中应用很多，它在陕西东汉画像石中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5. 白虎、铺首、朱雀门扇

东汉（25—220） 高 115 厘米，宽 53 厘米。绥德县出土。

此石上是以阴线雕出兽面铺首，面目狰狞，口衔圆环，也叫“饕餮”。汉代人认为它贪婪凶猛，又积财善守，所以常把它刻在门上。兽头上还刻一昂首跳跃弯身怒吼狂奔的白虎，环下站立一只翘尾挺胸昂首顾盼的朱雀，为陕北东汉画像石题材和技法中仅见的作品，值得珍视。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6. 主客赞见、杂技表演图

东汉（25—220） 高 88 厘米，宽 34 厘米。1955 年绥德刘家沟出土。

石上刻几组人物，上两组以为赞见和击剑，下二组涵意不明，似为杂技表演，最下层雕有龟蛇组成的玄武和双头人面兽，各组画面之间均看不出相互关系，但人物造型极为生动，比例适当，动作准确，虽有残缺，但仍属陕北东汉画像石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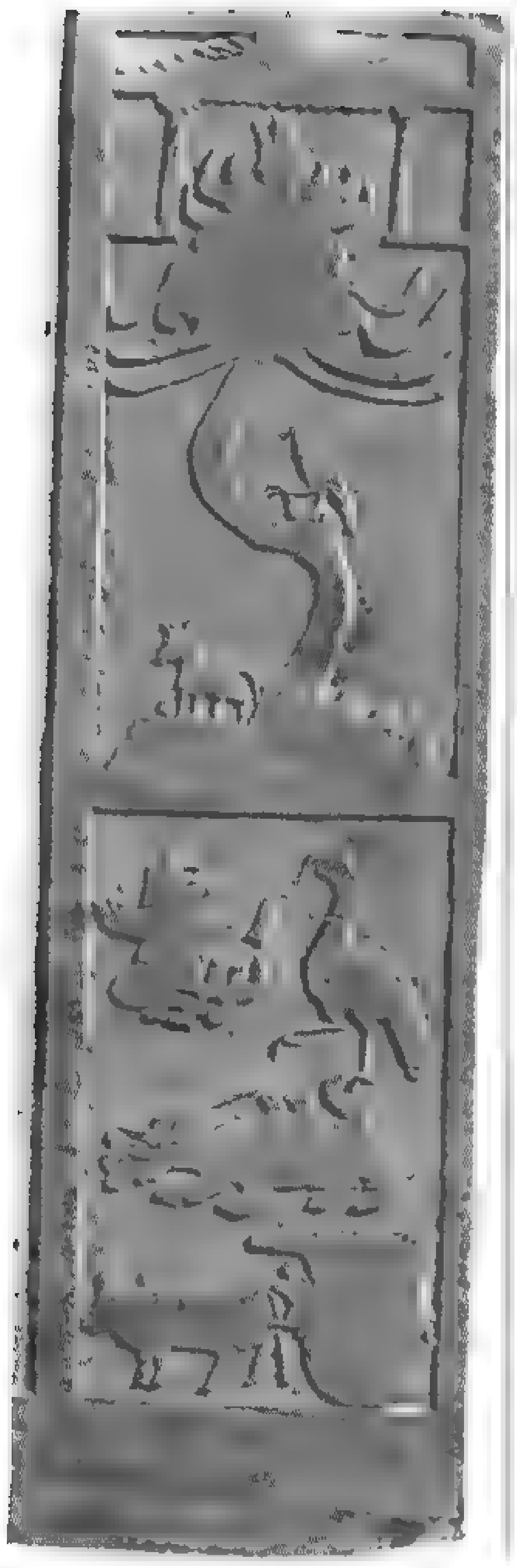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7. 西王母、牛车图

东汉（25—220） 高 113 厘米，宽 33.5 厘米。1957 年绥德县出土。

石为竖长方形，上部刻一曲身大树，树上坐一神人，顶上有锯齿形云朵，树下站立一马。下部刻一羽人、仙鹤、怪兽，最下部为一乘牛车，驭者坐在车辕上，身略前俯，从容的任牛缓步前行。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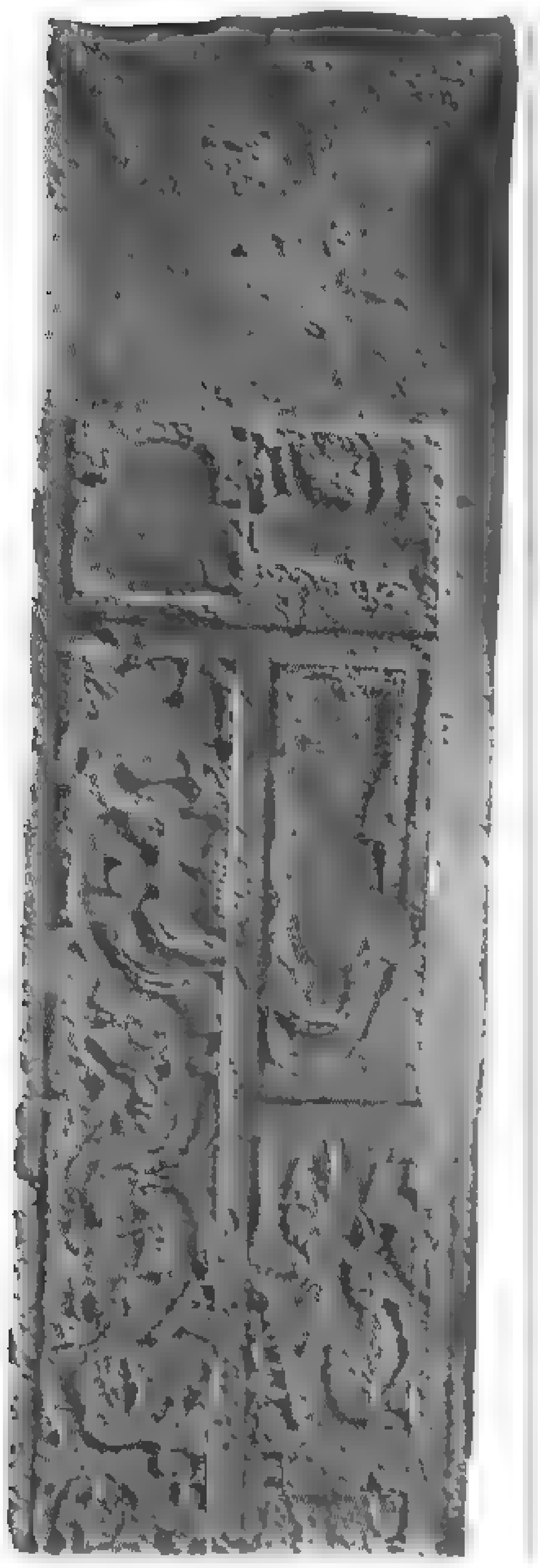


18. 西王母、执彗人、牛车图

东汉（25—220） 高104厘米，宽36厘米。绥德县出土。

此石共分四个画面，上部三格，左一格，上为西王母坐在青云缭绕的树梢上。下格为站立一头戴冠帽，身穿长袍，手执长柄彗，恭立的侍者。汉代礼节，客人来，主人拥彗立门而迎，以表示把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恭候宾客光临。右格满刻装饰性的连方花纹。下部刻一乘牛车。牛车是汉代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史书有记载，墓葬出土亦有牛车实物。但在全国各地出土汉画像石中少见，而在陕北东汉画像石上却作了真实、具体的表现，为我们研究汉代交通工具及研究我国交通史方面，均提供了实物资料，值得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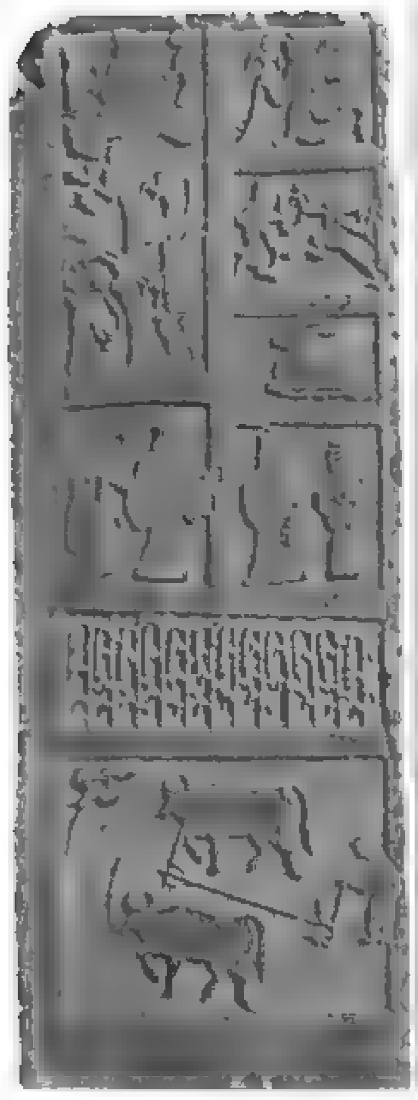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9. 西王母、耦耕图

东汉（25—220） 高104厘米，宽33厘米。1971年陕北米脂县官庄出土。

此石上画面共分七格，上部左边刻西王母端坐在彩云缭绕的树梢上，两侧各有一个跪着的侍者，一个持笏，兔形。另一个作伸手状。西王母座下刻飞鸟和奔跑的狐狸，当是三足鸟和九尾狐。下刻一跪和站立的赞见人。上部右刻羽人、卧鹿和仆人等。石下部刻一耕者双手扶犁，腰微弯曲，俯首缓步，好像在察看新翻的土壤，两头牛用一根绳子系在一起，牛颈上抬一横杠，曳引耕犁，蹄步蹒跚。耕犁由铧、床、柱、辕、梢等部件构成，图像画面清晰，这部耕犁和"二牛抬扛"，便是汉代赵过发明的所谓"耦犁"。所谓"耦犁"，就是两牛合成为一部耕犁。我国牛耕的历史很早，《山海经·第十八·海内经》载："……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叔均是始作牛耕"。清代赵春沂在他所著的《牛耕说》上，主张"牛耕当始自神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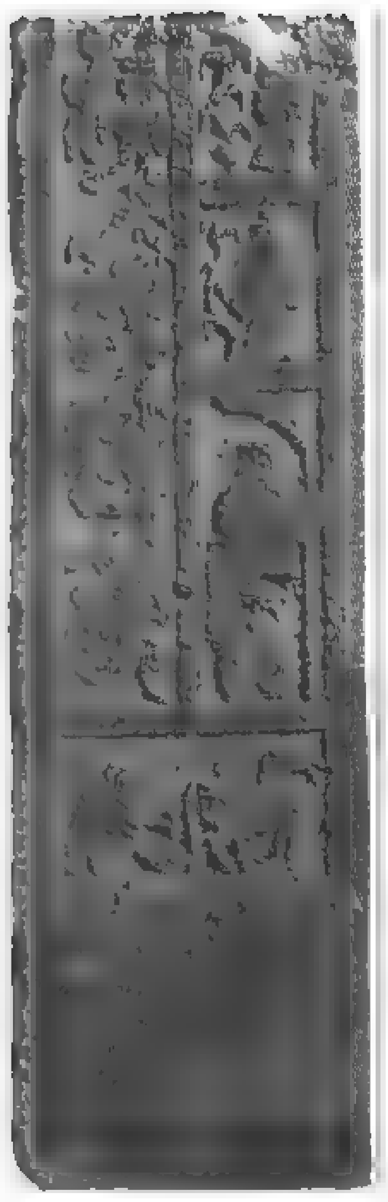
氏”，这种主张似乎偏早。近年来，我国学者根据考古学及出土的实物研究，已肯定牛耕至晚应开始于殷代武丁到帝乙之时（前1324—前1155年），即已有三千二百年左右的历史了。在西汉武帝时（前140—前78年）赵过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经验，改良了农耕技术，发明了代田法，曾对“耦犁”进行了大力推广，对生产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在贾思勰《齐民要术》序中有“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之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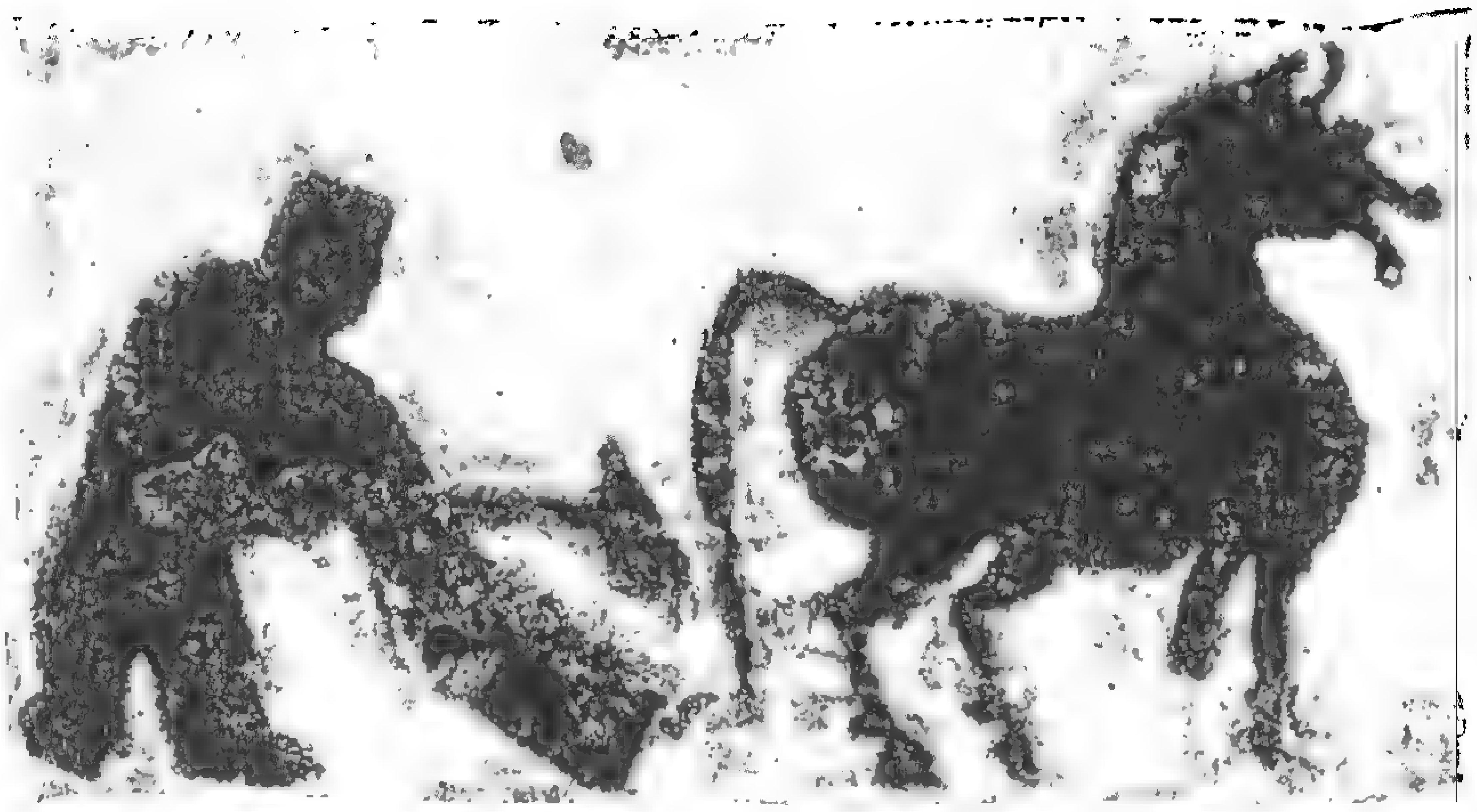
在牛耕图的上面一格，更刻有十二株茁壮的谷子，颗颗谷穗硕长下垂，象征着经过陕北劳动人民辛勤耕耘之后，获得的美好收成。这幅生动的杰作，为我们研究东汉的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均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0. 执彗人、拾粪图

东汉（25—220）　　高118厘米，宽36厘米。绥德县贺家沟出土。





此石右部上两格各刻一宽袍长袖的站立者，两人身后均刻有象征性的谷物一类的植物，下部刻执彗门卒，再下部横格刻一人曲腰双手持清扫之物，在马后作清扫拾粪的姿态，形象生动逼真，反映了民间艺术家深爱谷物，懂得

积肥夺得丰收的道理，这种以真实生活为题材的画面难得多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1. 歌 舞 图

东汉（25—220）　高 130 厘米，宽 33 厘米。1957 年绥德县出土。

此图画面分刻六格，右侧有装饰性的卷草花纹图案，几乎占去画面之半。左侧各格分别刻有主从人物、瑞兽（注）及舞伎等。

我国的乐舞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秦汉以前歌舞已有发展，乐器如金、石、丝、竹、匏、革、土七音齐备。西汉早期，中央王朝对于乐舞艺术更为重视。汉武帝曾设立乐府，广采民间诗歌，由音乐家李延年做协律都尉，张仲春协助其事，创作了不少乐曲。所以在汉代文学作品中有"庭扣钟磬，堂无琴瑟"盛况的记载。陕北属当时的上郡，为通往边境的军事要地及中外交通往来的枢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这里的农、牧业得到了发展，大地主、大牧主、大工商业者以及终身驻守于此地的文武官员，占有着当地的物资财富，经常尽情恣意地享用，至于当时的乐舞艺术的主要观赏者，在陕北地区，无疑也是属这一类人物，他们不仅生前如此，死后仍然渴望能享受这种奢侈的生活，因而反映在陕北东汉画像石上，这些贵族富商往往是坐于厅堂帷幄之下，华筵盛张，艺人身着宴前舞衣，在歌舞声中，正为他们宴饮助兴，倍增欢乐气氛。

这块画像石上刻二个冠带长服，姿态婀娜，长袖翩跹，举手折腰而舞的伎人，似乎在供墓主人恣情观赏。为我们研究汉代音乐舞蹈方面提供了实物资料。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注：瑞兽：汉代百戏中扮成龙、狮、象、麟、怪兽等兽形，以为祥瑞之兽。

22. 歌舞、喂马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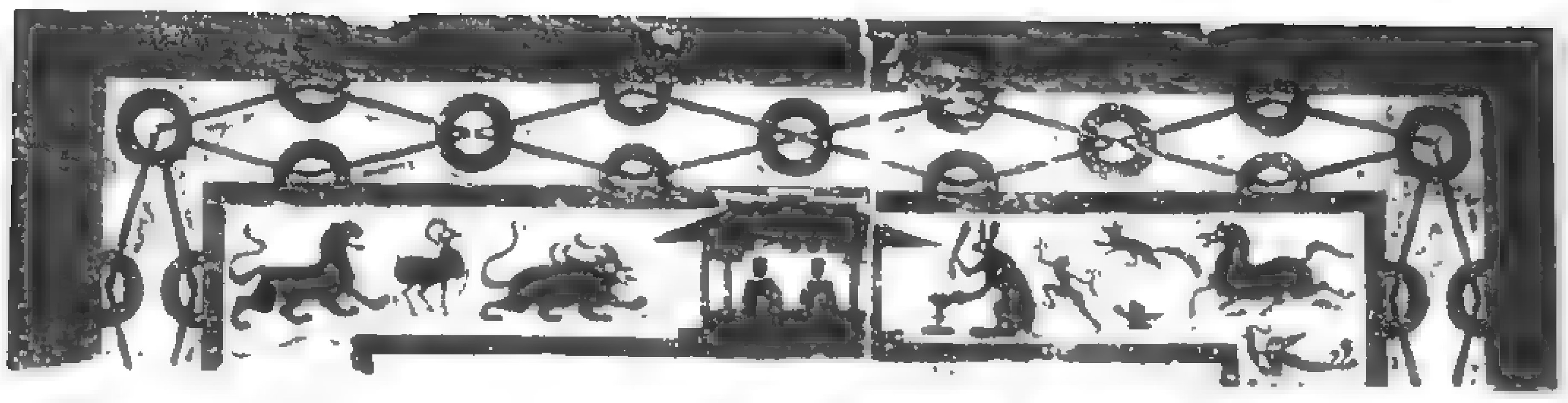
东汉（25—220） 高104厘米，宽33厘米。1957年绥德县出土。

图上部刻主从二人及乐舞伎人，下部刻一扶桑大树，上拴一乘驯马在等待主人喂食的情景，雕刻手法朴素、简练，是一件优美的艺术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3. 东王公和西王母图

东汉（25—220） 高173厘米，宽39厘米。1971年米脂县出土。



图中心为东王公和西王母坐于正厅对话，屋外雕玉兔捣药、九尾狐、青鸟、奔马、虎、羊、翼兽等，边饰为秀丽的几何图案，刀法简洁严整，为汉代一件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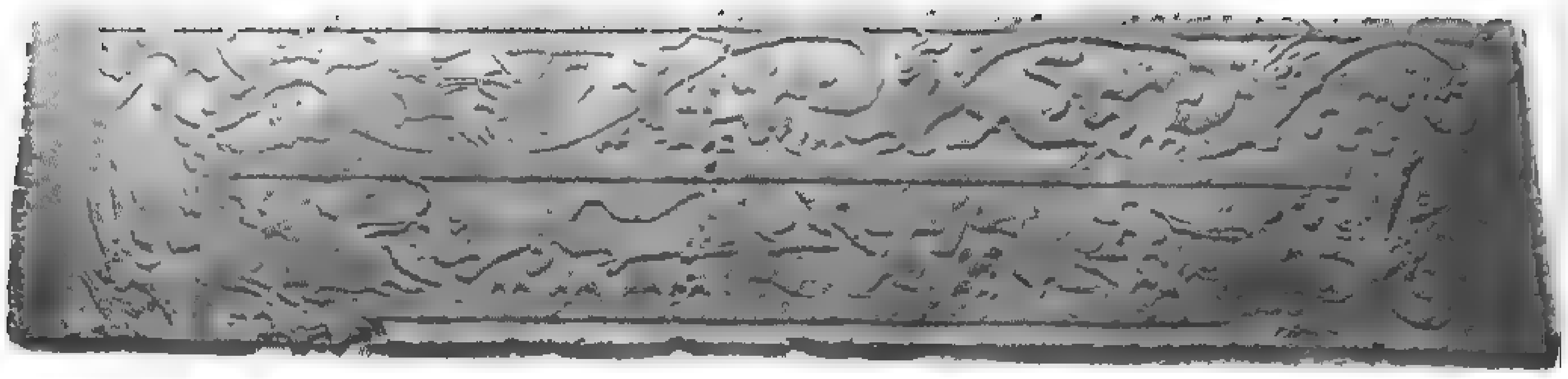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4. 围猎、神兽云车图

东汉（25—220） 高39厘米，宽173厘米。1971年米脂县官庄出土。

此石画面分为两栏，是陕北东汉画像石应用最多的题材之一，为当时贵族有闲阶级的一种娱乐生活。上部刻卷草边饰花纹，间刻人物、神兽拉云车、奔兽等。下部刻有猎虎、搏熊、射羊、逐兔等打猎场面。猎者使用弓、箭、戟、斧和矛、盾等武器，步骑结合，前后夹击，围猎野兽。构图明快活泼，气氛

紧张，把各种动物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如鹿、兔狂奔逃命，猎犬追逐其间，而虎态凶肆，张牙舞爪，熊则怒而直立与猎者搏斗，形态生动、逼真。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5. 狩猎、阙楼、七盘舞图

东汉（25—220）　高 136 厘米，宽 38.5 厘米。1957 年绥德县出土。

此石画面上格两个猎者乘坐奔马，手持弓箭，瞄准猎物，箭镞待发，猛虎隐藏在丛树之间。另刻两人作搏斗姿态。下格左方刻二乘轺车，上各乘坐二人，车驾一马，另一人扶辕而行，车后站立一拱手侍从。右方刻有接近绘画构图的七盘舞场面和一座高大宏伟的阙楼，惜石有残损，不能观其全貌。所谓阙，古代又名“观”，《尔雅·释宫》：“观谓之阙”。刘熙《释地》：“阙、在门两旁，中央阙然为道也。”“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总之，它是体现封建礼仪的一种装饰性建筑。所以《汉书·高帝纪》有：“（高祖八年）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上见其壮丽……”的记载。此画像石阙楼高耸，引人注目，是研究汉代建筑装饰方面的写实资料。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6. 游　猎　图

东汉（25—220）　高 91 厘米，宽 32 厘米。1957 年绥德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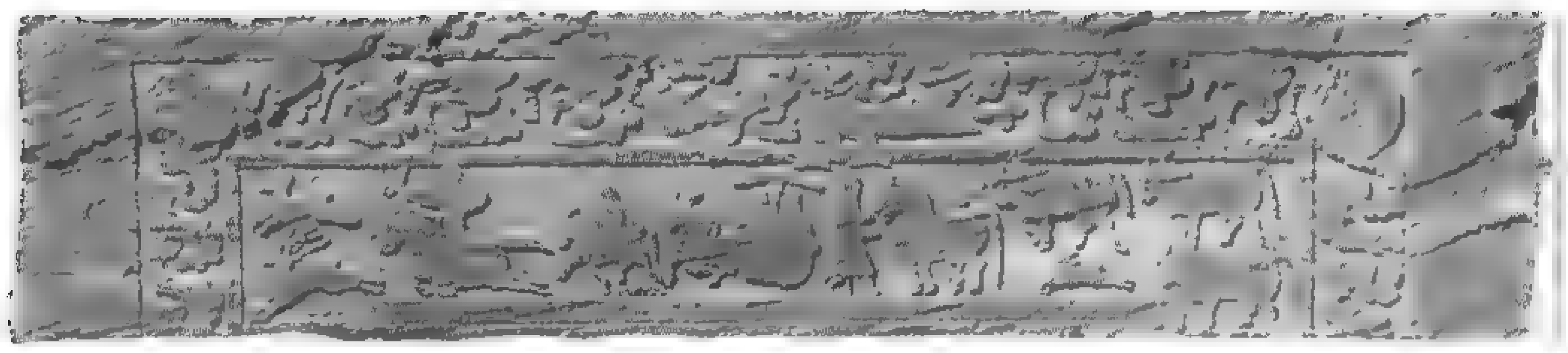
石上边饰卷云图案，整齐匀称。下刻猛兽禽鸟狂逃奔命及骑射与车马追

逐猎物，画面紧张热烈。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7. 狩猎、出行、放牧图

东汉（25—220） 高36厘米，长179厘米。绥德县出土。



这二石以纤细流利的刀笔，刻画着严肃、紧张、生动、活泼的狩猎、出行、放牧场面。猎人手持待发弓弦，追赶着惊慌奔命的兽群，被射中的猎物在拚命逃窜中仓皇回顾。轺车上坐着观赏的贵族。侍从前导驾车，后有后卫及牛群。蔓草作为陪衬，反映了汉代推行了“全民得牧边县”的政策后，畜主、贵族在陕北地区“畜主用谷量牛马”，“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及“致马牛羊数千群”等兴旺发达的农牧生产和富贵生活场面。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8. 墓室方形门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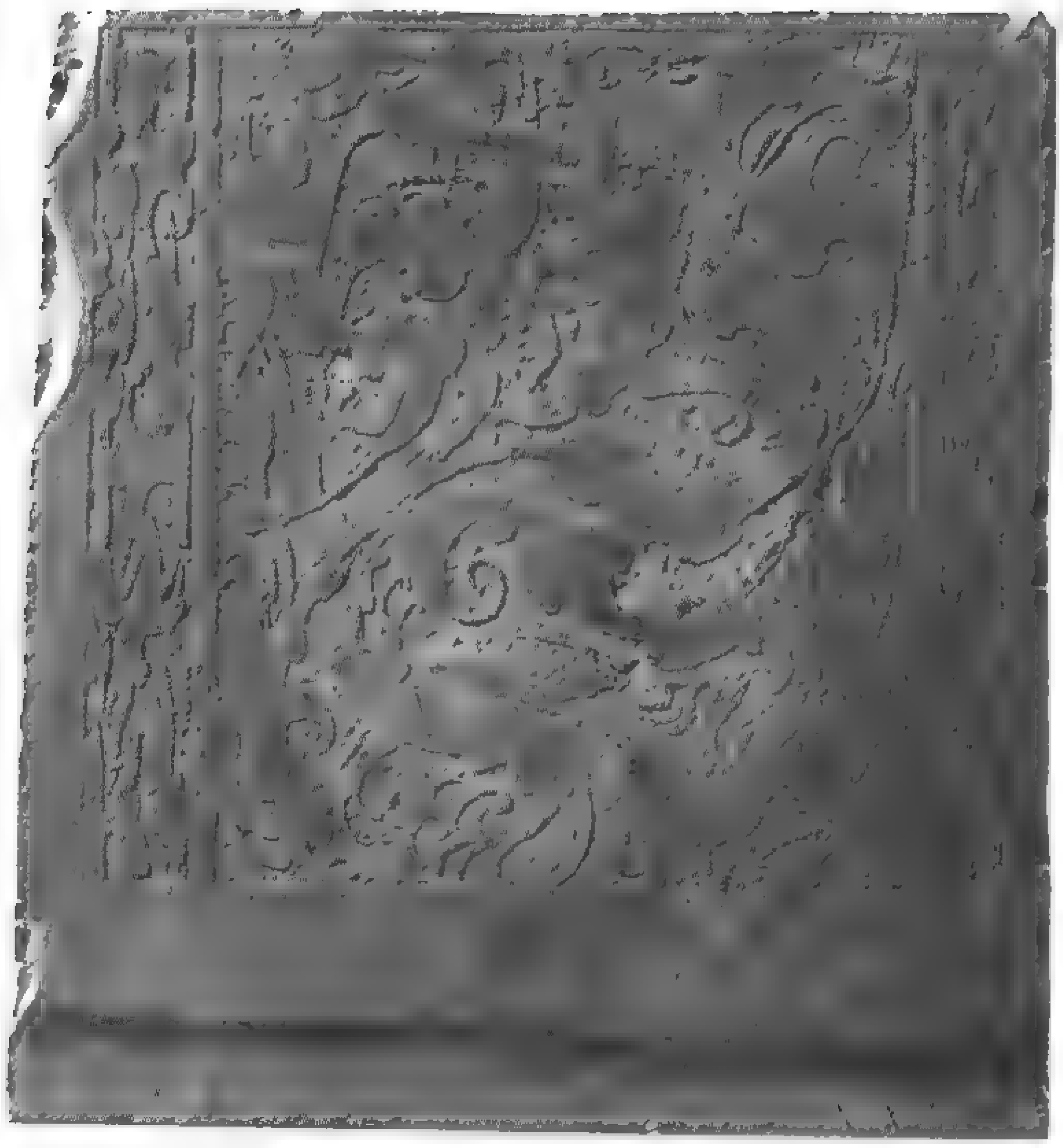
东汉（25—220） 高127厘米，宽116厘米。绥德县五里店出土。

此石为四方形，画面构图丰满，内容神奇，石上满布流云、飞鸟、异兽等花纹图案，左下角刻有拥彗的门卒，还刻有形象生动的骑马猎者、奔命的鸟兽与穿插其间的流动飞云等，不拘大小远

近，布局丰满，气氛紧张活泼流畅，与汉代漆器上的纹饰一脉相承。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29. 墓室方形门框



东汉（25—220） 高 132 厘米，宽 114 厘米。绥德县五里店出土。

这石作风与前石完全相同，只是图案中没有门卒，不知是否作为门框用，所不同处刻有花纹流云又似卷草，其间夹刻着鸟兽纹饰，可借以看出这是由秦汉流行的流云花纹向唐宋繁柔富丽植物纹转变过程中的装饰演变。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0. 墓 室 石 门

东汉（25—220） 高 155 厘米，宽 182 厘米。1951 年绥德县思家沟快华岭汉墓出土。

这套完整的墓门由楣、框、扉五石组成，门楣、门框以阴线刻成规则严整的几何纹图案，两门框下刻由龟蛇组成的玄武，门扉中部刻铺首衔环，铺首顶雕朱雀，在扉环下雕青龙、右扉环下雕白虎。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这是中国古代代表四个方位的动物，所以《三辅黄图》卷六云：“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也有被称为“四神”，山东武梁祠画像石，祥瑞图的题榜写道：“白虎，王者不暴虐而白虎至，仁不伤人。”“此翼鸟，王者德及高远则至。”也亦有“祥瑞”之意。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1. 走　兽

东汉（25—220）　高104厘米，长205厘米，1960年咸阳市城西北出土。

秦汉以来，封建帝王豪富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死后在陵墓前，雕造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四不像”石刻雕像作守卫，以显其威仪。《西京杂记》中就载有“五柞宫西有石麒麟二、头高一丈三尺，乃秦始皇骊山冢前物”的形象。西汉陵墓前，似乎亦有这种设置，但因年代久远，灾患变迁，竟致淹没，也未可知，现可见者多系东汉的遗物。

这两件石兽，为青石雕刻，它是综合了狮、虎的造型特点，而雕刻的司守坟墓的石兽，亦被称为“辟邪”。这对石兽从颈部至尾部，背脊成曲线形，昂首鼓胸，曲腰疾走，四肢挺拔有力，神态矫悍，威武异常，特别是夸张的硕壮长尾，更倍增了猛兽的雄健气魄和震慑之威。它充分体现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为汉代罕见的石刻艺术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2. 宜君道教石窟

北魏（386—534）　此道教石窟，位于宜君县福地水库南侧，西距宜君县城15公里。窟高2米，宽1.8米，深1米。

石窟的雕刻内容，多沿用佛教造像形式，只在服装上有道教的一些装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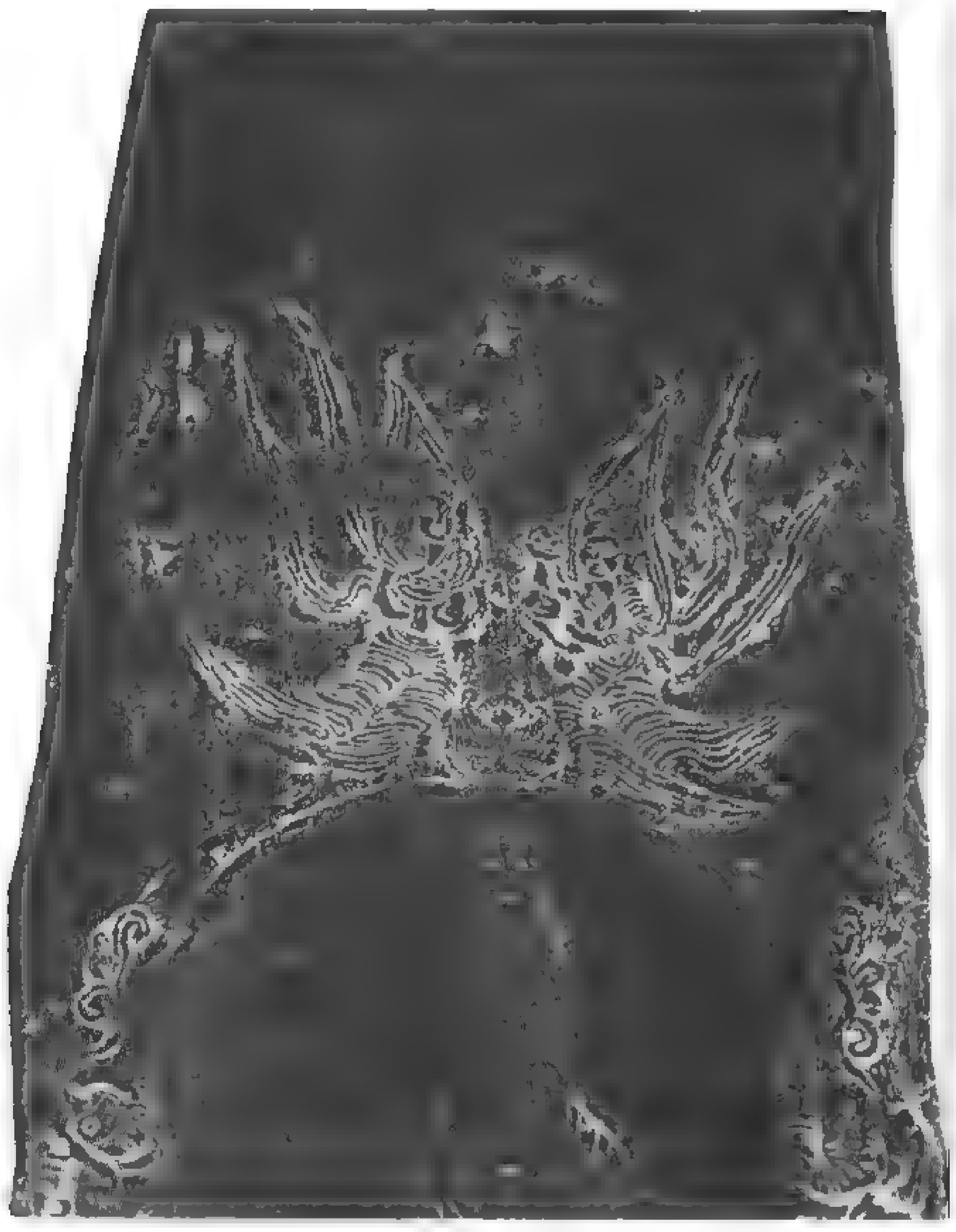
但又不同于其他的道教造像常有天尊的出现，这里的造像不仅佛龛是模仿佛教，连龛内造像也多是“一佛二菩萨”的形式。石窟前壁残损严重，可看出有一个较大的龛楣及其他小龛造像。龛楣还是用佛教常见的莲瓣尖拱式，并有火焰及蛟龙等北朝佛教造像常见的纹饰。各小龛内只雕出单一坐像，虽然简单，但都是北朝雕刻造像的典型形式，身体平直，衣纹为平行排列的阴刻线，形象古拙，具有北朝早期风格。窟正壁主像释迦牟尼交脚盘坐，形象服饰也都是佛教造像所常见的，只是发髻上所用的簪子具有道教的形式。龛楣上雕有一排半身浮雕像，共十尊，显然是受北朝石窟龛楣上常见的七佛的形式而雕出的。再上方，有七个凌空翱翔的伎乐，飘带向上扬起，似双翼在飞舞，显得轻松活泼，这种形式即在佛龛飞天造像中，也是不多见。左侧由上而下为四铺造像，一、二层坐佛，三层左为两侍女，右为两个正在摔跤的男子，四层为供养人，旁有题记“道士吕清黑”、“道民功曹孟永兴”、“妻白颜容”等字样，供养人的形象服饰及文字书法，均属北朝风格。窟外右侧壁上雕有一组骑马出行图，虽有风化，但从隐约的轮廓仍可看出马的形态是很生动的，表现了北方牧区的风光。特别是群马左侧由S形“卷草纹”组成的花边纹样，与云冈石窟中最常见的边沿纹饰完全相同，更足以证明宜君道教造像的时代。

现存陕西宜君县福地水库南侧。

33. 道佛造像碑

北魏（386—534） 碑高154厘米，宽43厘米。1949年前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这件四面造像碑，正面龛以浅浮雕刻作屋形，脊两端有鸱吻，檐角翘起作翚飞式，屋面雕椽式纹，檐下雕有丝织束幔，两侧方柱上有斗拱承檐角。屋顶中央刻铺首式兽面，两边上方刻双凤衔八褶形花纹。龛前为供桌形，桌前刻有席纹、菱格纹、卷蔓纹装饰，中置宝供，均是阴线雕成。龛内浮雕三尊



形，中尊脸长方有胡须，大耳垂肩，项有三道弧线，发髻是并行线，戴道冠，腰束玉带，右手执羽扇，左手平伸置腿上，盘膝而坐。两旁亦有道冠胁士，立于莲台上，衣纹为紧密的并行线。造像右侧龛刻弧形莲花拱，两边梁端为凤头衔忍冬三叶上附龛侧。拱上正中为铺首形兽面，上刻供养飞天。龛内一尊像右脚仰掌趺坐，右手作施无畏、左手作与愿印。脸型发式衣纹均与正面相同，龛前亦为供桌。正面左侧两龛内均为老君坐像。左侧龛下有邑子 45 人建立石像的题记及道士景仵勋、道民田安都等 10 人题名供养像。正面龛下也有邑子正田格、道士田阳生、道民田维诚等 31 人题名供养像。至于造像背面右侧均为佛龛。龛形为莲花拱，拱面作已字形火焰纹饰，龛上雕有飞天，中刻莲花、飞天上雕双凤。龛下刻卷尾双狮，中为蹲形力士举双手承座阴雕刻。龛内浮雕坐形释迦佛，涡状发亦有胡须，半跏吉祥坐，右手为施无畏，左手为与愿印相。右侧龛内一佛作无量形，两手置腿上作定印。帷龛下宝供旁刻一合掌、一执莲花的比丘尼供养像。正面右侧刻供养人十六及沙弥惠香、长座弟子郑欢、维哪、田洪保等 27 人题名。

此造像碑就造型艺术论，屋形龛、鸱吻、翚飞式檐角、铺首兽、供桌、席纹、菱格纹、玉带、羽扇等等雕刻形象，都是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而三尊像、手印、弧形莲花拱、忍冬纹飞天裹足穿肥垂衣裙、紧密并行线纹等等雕刻形象，却是早期传来的揵陀罗艺术形式。所以说这尊佛道造像，可能是云冈以前，北魏初期太平真君时代稍后的作品。

另外在一石上，同时雕刻有佛道两家代表人物形象，可反映了当时在民

间不是佛道两家势不两立，而是佛道两家处于和平共处的时代观念。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4. 皇兴造像

北魏 皇兴五年（471） 高 87 厘米，宽 55 厘米，建国前陕西兴平县出土。1953 年收购入藏陕西省博物馆，今陈列碑林石刻艺术室内。

此像是以圆浮雕雕成，座后刻有铭文，书法楷书，字体刚劲豪放，在北魏的石刻里不可多得。记时为“皇兴辛亥”应是北魏献帝拓跋弘皇兴五年造，在时间上，距名僧昙曜刻的云冈灵严五窟仅晚九年，作风属云冈初期。雕刻形式为交脚弥勒佛像，面相圆腴，微带笑容，唇厚项粗，波状发形前卷，为吉祥海云相，衣褶线条并行，手向前垂叠，表情慈祥，体现了佛的大慈大悲的神情。舟形背光边沿巳字形火焰纹带，间以忍冬纹带和火焰化佛围绕莲花纹圆光。须弥座边雕双卧狮。像背及座边分格雕出佛故事，上层画九龙灌顶释迦指天地声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和树下思维。第二层画骑象入胎，仙人占相和太子诞生。第三层为诸天去说释迦离家修道、释迦顺从。中间一层画画释迦前生为儒童时，因买瞿夷的莲花献给燃灯佛，佛授记儒童将来成正果。第五层是儒童买花和阴魔首中见到铁锅煮人等恐怖情节。第六层是释迦牟尼在般荼婆上修道收目犍连、舍利弗为弟子、终成正果。最下一层刻勇猛跏趺坐四佛像与佛传故事无关。每个场面都间以方格，以减底雕刻手法，突出人物故事情节，生动活泼，且富于变化，它既有佛传入我国初期的形式和

风格，又不失我国汉代画像石之传统，也是碑林博物馆现存石刻中北魏时期最早的一件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5. 姚文迁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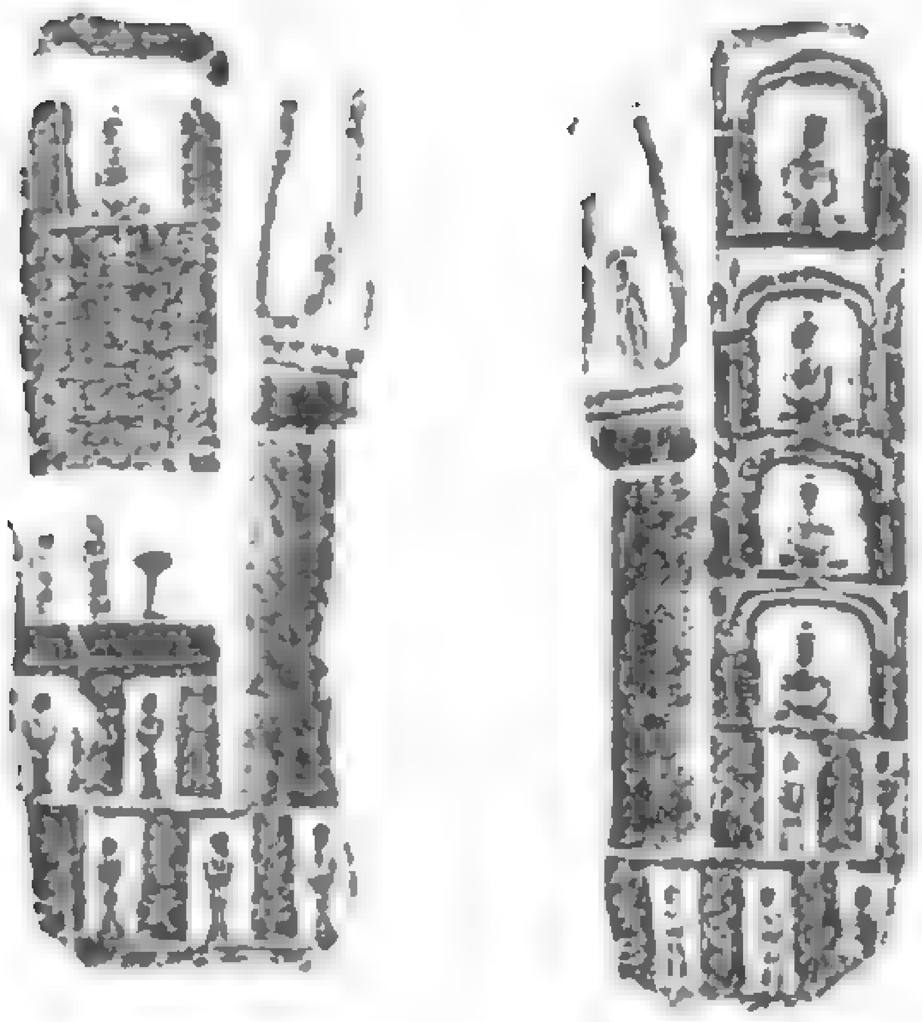
北魏　太和二十年（496）　石呈长方形，高140厘米，宽70厘米，厚30厘米。正面上部一龛，内为三尊像，下边是刻铭，背面上部上下二龛，上龛内坐像一尊，下龛为三尊像，两侧上部线刻供养人，左侧五人，右侧一人，题名：“道民姚文迁供养”背面及两侧下部均有刻字。这就是多年来风传全国的“姚伯多造像”。由于它雕法的古朴浑厚，书法劲健有力，解放前一直被称为国内三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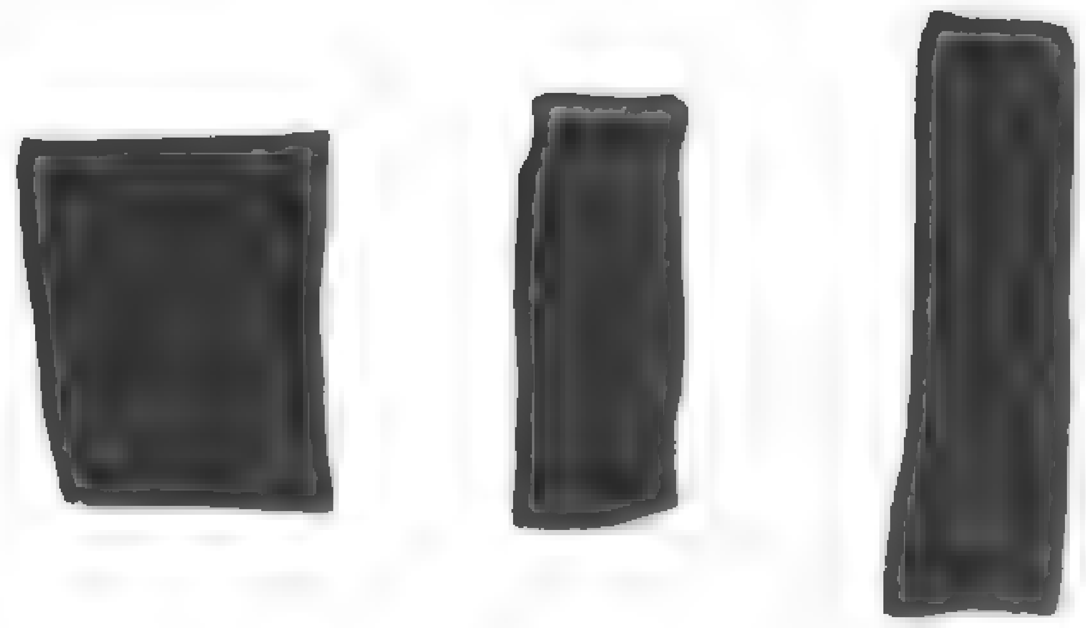
现存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36. 释迦牟尼造像

北魏　太和二十年（496）　高33厘米，宽32厘米。1955年西安南郊瓦胡同出土。

此像雕为龛形，龛内浮雕释迦牟尼结迦趺坐，臂下垂双手结定印置腿上，两旁浮雕胁侍菩萨站立，衣褶均为密集并行纹。佛头上发髻波纹前结卐字形，头、耳稍大和全身比例不匀衡，系受云冈期石窟造像风格的影响。龛形为尖拱式，上雕七尊衬圆形光轮化佛，拱梁下压成扁平形，显示出富有弹力。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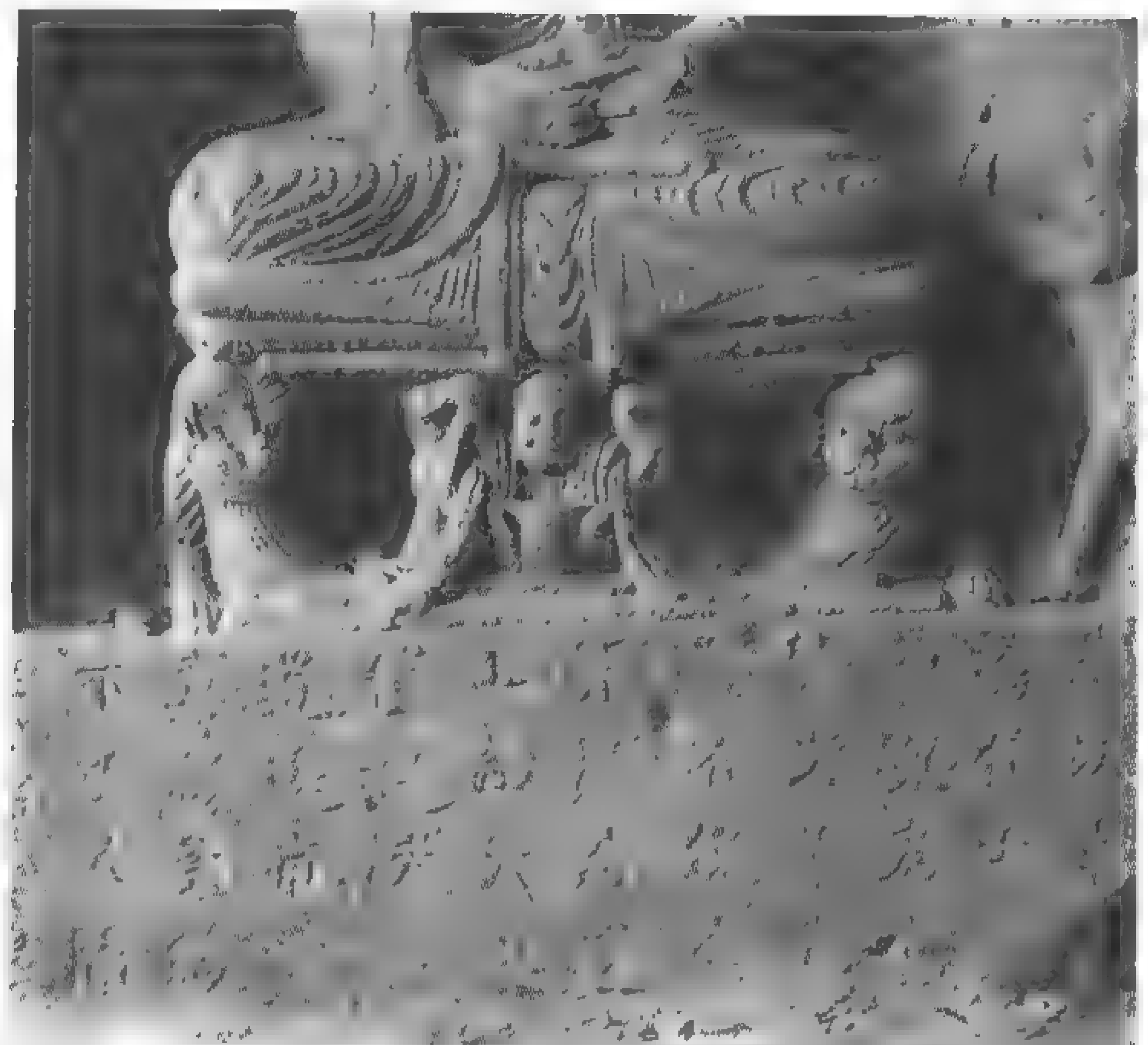


端雕仰首凤头形，下作束幔式由方柱上承，是北魏佛龛的常见形式。柱上有阴刻题记。龛下正中浮雕宝供，两旁及柱前共刻供养人十位，各有题名。右侧上一小方龛刻坐佛，有题名，下顺次三方龛，各刻供养人一、二、三不等。左侧上下四层小尖拱龛，内各刻坐佛，下有两层共刻供养人五个，也各有题名。根据题记此像为太和二十年天郁造，为北魏迁都洛阳后二年即龙门时期，但此像在造型上，特别在拱梁风格上，仍表现出云冈式的特点。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7. 景明造像

北魏　景明二年（501）　高60厘米，宽56厘米。长安县查家寨出土，1953年碑林博物馆征集入藏。



造像为四面雕刻，正面刻铭文14行，行4字，共计56字，铭文首两行有“景明二年岁次”等字样，可知是北魏宣帝元恪景明二年（501）雕造。铭文楷书，笔致挺健俊秀。为距元宏迁都洛阳仅七年，时间相当龙门石窟艺术初期的作品。此造像碑，正面和左右两侧，都是以化佛为饰的莲花拱龛，龛

内均为一佛二胁侍菩萨，拱两端下垂而上卷，有凤口衔丸、龙头、鹦鹉等雕刻，下垂束幔华台柱，佛的背光是火焰化佛串珠纹带，舟形背光中嵌以莲花圆光。正面龛内上方刻双飞天，衣带飘扬颇为生动，龛外上角刻思维菩萨、下贯化佛护法神王，边沿刻龙衔流苏下垂。两侧佛双狮座及胁侍莲台下，均刻力士屈膝擎举，姿态不同而有力，后面下作龛形，以舟形背光及力士肩承莲台代龛，周边以三尊、两尊小化佛龛为饰。正面佛螺发，后面胁侍饰璎珞，衣纹仍用并行线而多褶式衣襟，长垂座前，其两襟接处用三角形对称褶纹，都是前所没有。尤其是佛的两颊趋瘦、项长，虽是龙门初期作品，却与云冈造像有显著的变化。造像布局匀称，装饰富于变化，格调仍具云冈时期的浑厚，但却也显示龙门时期的俊丽，是南北朝早期的精美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8. 佛菩萨造像

北魏（500—503） 高 38 厘米，宽 29 厘米。1983 年西安市西郊通信学校出土。

此造像为碑形，中龛帷幔上刻有形象生动的飞天及意态虔诚作跪拜状的供养人，下刻交脚弥勒佛及二菩萨同二比丘，面部柔和俊丽。中龛上下刻小龛多处，均刻坐形佛菩萨。

造像碑背面分格雕刻释迦佛降生故事等，侧面各浮雕有巨龙和展翅飞翔

的凤鸟。整个造像虽是沙石质底，但刻工装饰华丽，镂刻精致，刀法严整，构图富丽多变，属南北朝时代一件精湛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39. 刘宝生造像

北魏　景明年间（500—503）　高108厘米，宽54厘米，1952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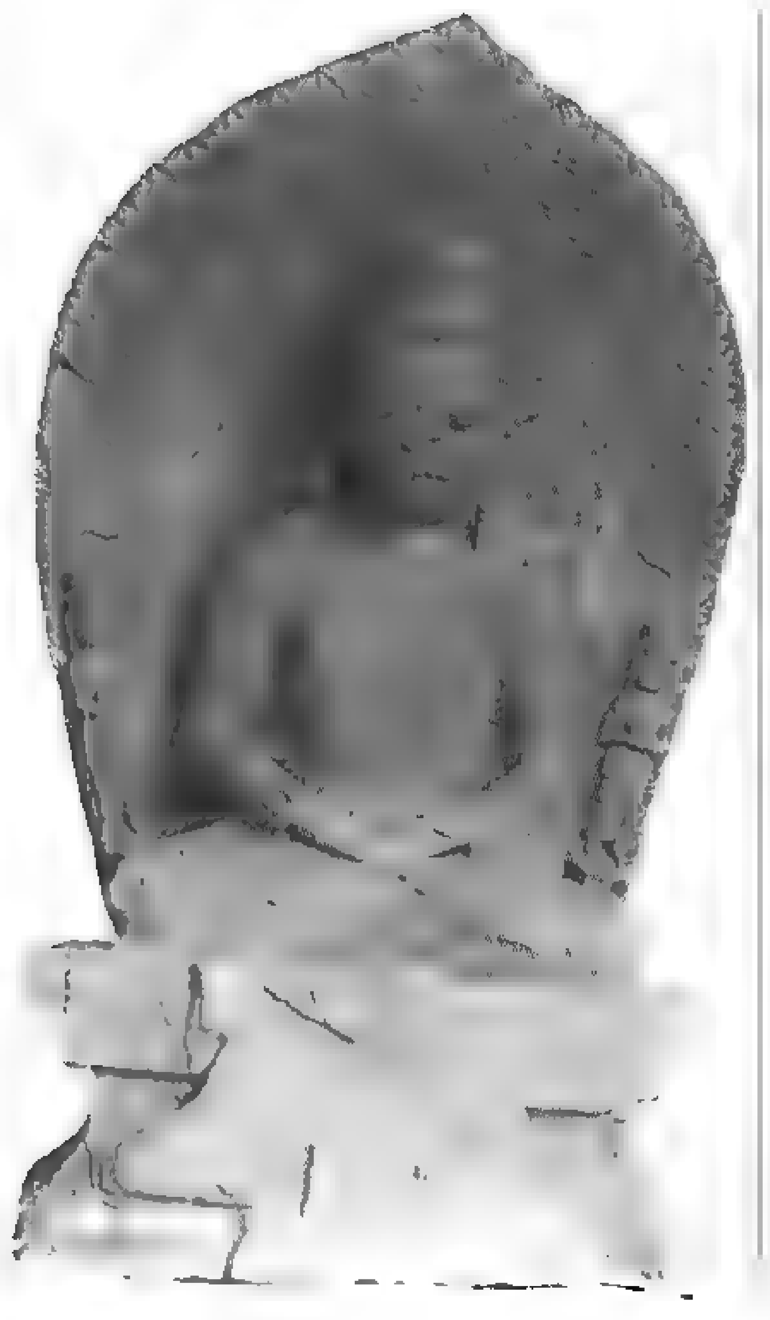
此像俗称交脚弥勒。成半圆形，佛为涡纹发型，大耳垂肩，脸形丰满，额有珠光，鼻直、眉眼秀长，口角下显露着庄重而微笑姿态，颈肥，衣覆双肩，两手右前左后相置胸前作定印，交足坐形，衣褶线条并行密集，头后莲花背光围以七尊坐佛圆带，边饰为已字形火焰带，两胁侍合掌立形，舟形宝珠背光，座下中刻宝供，两旁浮雕刘宝生夫妇持绶带、茎莲供养像，及题记五行“清信士刘宝生、清信女王媚美，为三女英洛敬造石弥勒像一躯并有奉上”30字楷书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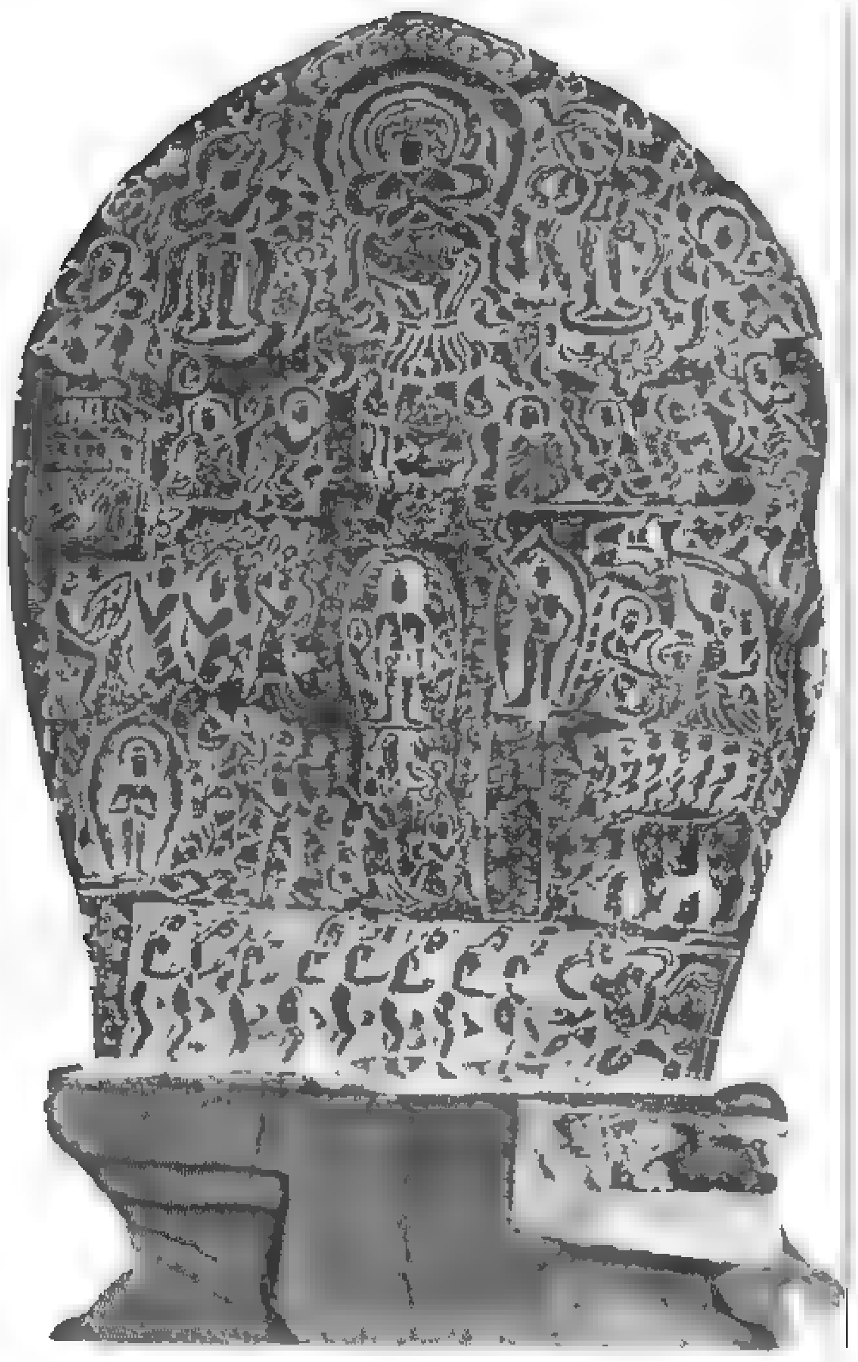
由题记知此造像与碑林博物馆存的景明三年刘宝生另一造像无量佛像的雕刻手法相同，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交脚弥勒像为北魏时代所盛造，到了隋以后就很少见。这像雕造与皇兴造像形式也大体相同，面像基本相同，只是增添了两个胁侍菩萨，减少了双狮座的侏儒而代以刘宝生夫妇的供养像。石质刻工虽不如皇兴造像细致，但面像却表现得更为柔润秀丽，应说是雕技上的进步和发展。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0. 永平二年释迦造像

北魏　永平二年（509）　像高65.5厘米，宽37厘米。1974年西安市西关王家巷出土。





根据题记，此像为永平二年（509）造，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十五年龙门期的作品。像制是以圆浮雕雕成，释迦牟尼结迦趺坐，臂弯曲，双手结定印置腿上，两旁浮雕胁侍菩萨，姿态各异，衣褶均为密集并行线纹。佛头发髻波纹状，面相圆腴，唇厚项粗，大耳垂肩，系受云冈期石窟造像作突出表现风格的影响。舟形背光，由火焰纹带及化佛层层排列组成，雕法精美细腻。像背光雕刻佛本生故事，生动活泼，保持了东汉画像石减底平雕的手法，人物姿态动作富于表情，类似我国早期的连环画之杰作。

整个造像雕刻比例匀称，刀法劲健流利，是一件精美完整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1. 朱双炽造像

北魏 延昌元年（512） 像高 125 厘米，宽 53 厘米。1950 年华县瓜坡支家村出土。

这件四面造像，主像为一佛二菩萨，飞天龛楣，构图和谐，主龛下浅浮雕宝供、供养人、大象、狮兽等，特别是两对雄狮的形像罕见。铭文中有：“中军将军武都太守朱双炽，延昌元年七月廿五日”为楷书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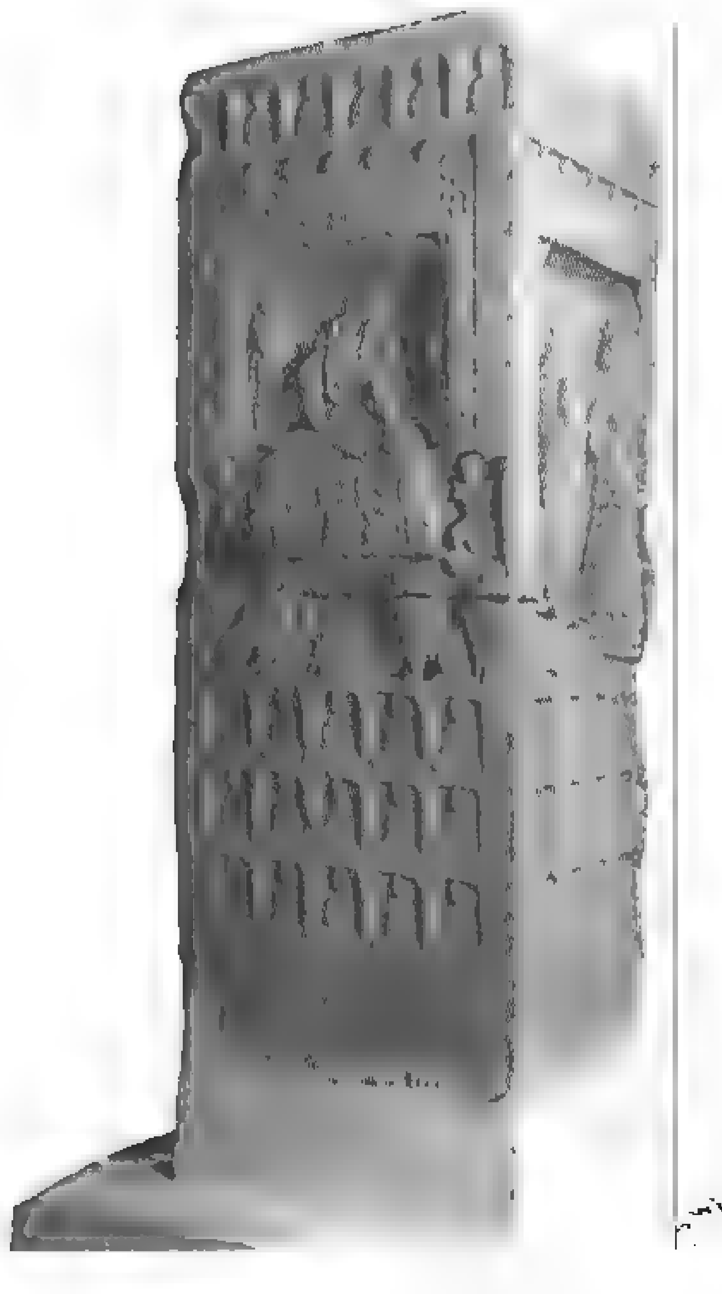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2. 普泰造像

北魏　普泰元年(531)　　像高115厘米,宽45厘米。建国前陕西乾县出土,1953年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

据题记载:"大魏普泰元年岁次辛亥五月三日四时邑子合有一百人敬造石像释迦"等楷书文字,知为100人集资所造,因而通称一百人造像。按普泰后三年(534)北魏即分裂为东西魏,所以由此像可看出北魏末期石刻艺术的风格。

造像为竖方四面龛形,以圆浮雕雕成。正面作屋式方形龛,屋脊正中为



两层瓦形纹叠以锯齿纹,下为椽形纹,饰以五朵莲花吊穗的磬,两端磬下垂流苏覆壁柱,龛内圆雕释迦说法立像,右手作施无畏印,佛、菩萨面像有残损,胁侍背光左上角有完整的侧头小菩萨,雕刻得特别巧妙,龛顶、龛下共刻四列千佛式小龛。其余三面基本上与正面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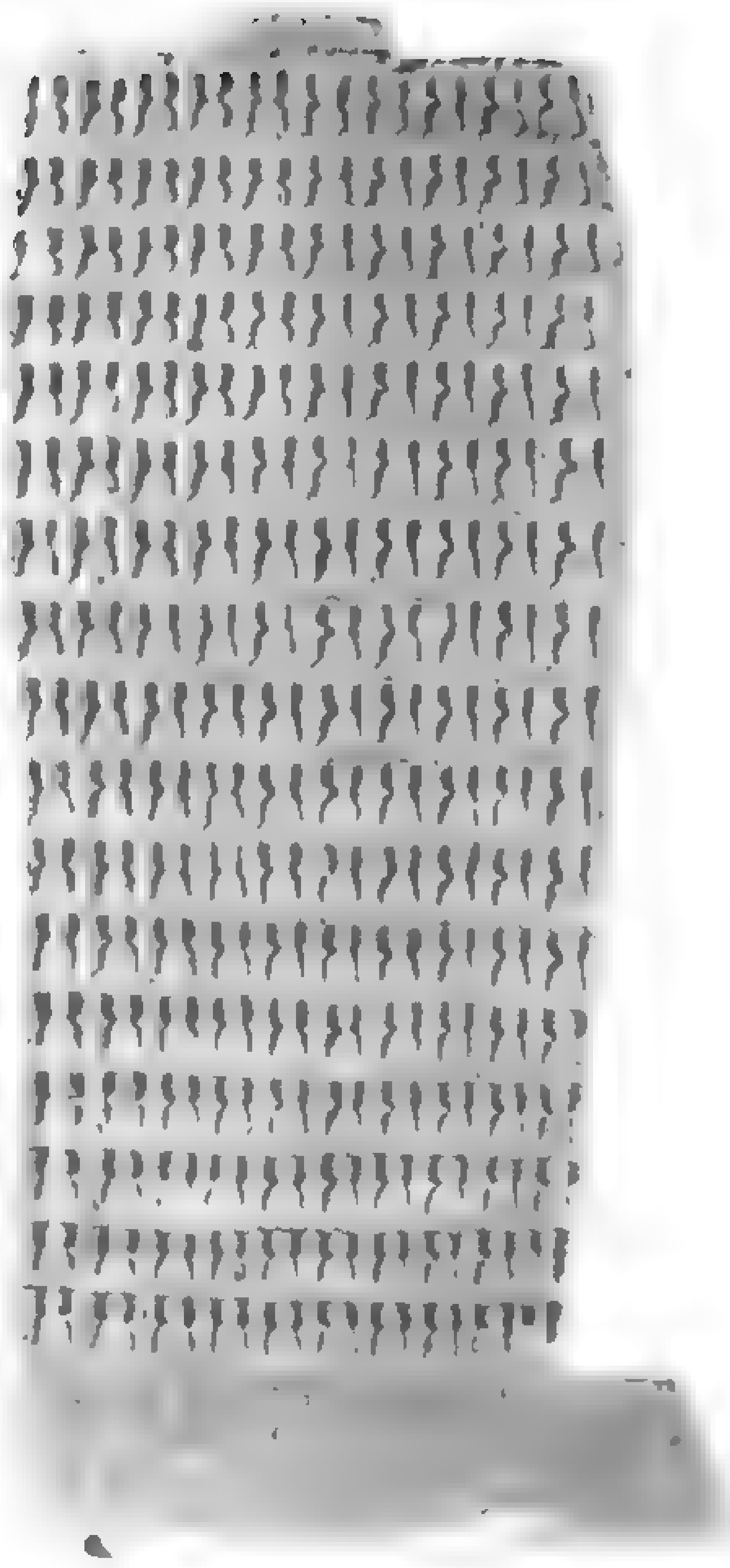
此像整体镂刻华丽、庄严、细致,刀法严谨不苟,衣纹线条并行转化为波纹线饰。袖口衣襟褶纹,柔软而秀美轻飘而舒展。虽然佛、菩萨脸面有残损,

但正面龛内留存的小菩萨像面容秀美栩栩如生，娉婷婀娜。左侧连弧忍冬纹倒卷凤头衔叶莲花拱龛，都表现出严整流畅华丽多采。为北魏晚期一件代表作。

造像四面周边及下层刻铭文及题名 200 余字，书法秀美，多有残损，属北魏书体中最成熟的标准楷书，很值得鉴赏。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3. 朱辅伯造像碑



北魏　普太元年（531）

像高 150 厘米，宽 51 厘米。1959 年由陕西华县瓜坡支家村出土。

竖形四面雕刻造像，正面中间两层作方形火焰纹拱龛，主像是一佛二菩萨，主龛上部雕小佛龛 40 尊，下部浮雕线刻供养人和车骑出行场面，其余三面共刻龛形小坐佛 240 余尊。碑底部前后和左侧，都刻有题记铭文多行，其中有“大代普

太元年七月廿二日象主比丘僧□为一□法界众造二百一十五躯石”、“朱辅伯”等楷书题记。此像与同坑出土“建明二年朱辅伯造像”风格相同。佛、菩萨面相瘦长，颈细肩窄，衣纹多褶式波状，长垂座前，像的高低比例匀称，雕刻技法娴熟精巧，两造像可能是出自一人的刀笔。充分地表现出了“景明”“普太”时期北朝石雕的艺术风格。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4. 朱黑奴造像

北魏（386—534） 像高173厘米，宽54厘米。1959年陕西华县瓜坡支家村出土。

这件四面造像，共雕出大小佛、菩萨近百尊。正、背两面均作三层大龛，主像为一佛二菩萨二比丘或一佛二菩萨。龛楣，作折拱形或作飞天并为龛楣。佛像均梳成高肉髻，面形瘦削秀丽，双眉弯如新月，眼角细长，双手作说法状，盘膝而坐，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衣裙在佛座长垂作重叠式，显得厚重，有飘动的韵味。菩萨面形也多如佛，但并非公式化，其装饰绚丽，亦多有变化。四周小佛均作龛式坐形。造像下部中刻有线纹宝供及刻铭，中有“像主朱黑奴”等供养人姓名楷书字迹，因称《朱黑奴造像碑》。

整个造像构图和谐，与碑林博物馆现存普太元年（531）造《朱辅伯造像》同坑出土，且作风类似，是北魏晚期一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5. 弥勒菩萨造像

北魏（386—534） 像高93厘米，宽61厘米。碑林博物馆旧藏。

造像为五折格式楣拱龛，龛面不作一般莲花饰，中格刻正反忍冬连弧花纹，旁四格以伎乐、飞天及露脚供养飞天为饰，拱檐垂束幔，龛上浮雕一马前足作跪势，右侧似一人拉马行状，左侧四人姿态各有不同，手各作上举状，

大概为一段佛故事，惜已残剥不清。龛下中刻宝供及两供养人，两边蹲狮右为雌，项鬣作卷毛，左为雄狮，项鬣为圆形，髭毛翘尾形态别致生动。龛中一尊佛，冠后垂两条发辫，造像中是比较少见。胁侍一为翘膝坐形，一为左手持羽扇。像为沙石质，上部虽有风化，但仍能看出是北魏中期一件装饰性较强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6. 双龛弥勒释迦造像碑

北魏（386—534）　　碑高 119 厘米，宽 58 厘米。西安市西郊出土，1951

年经原西北文化部移交碑林博物馆。

此造像碑为一面刻上下两龛式。上为莲花束幔五折拱龛楣，龛内为半圆形，内三佛并坐后立二比丘。中尊为无量寿佛交脚坐于双狮座上，右手仰掌作施无畏印，左手屈无名指，掌心下垂。两旁二坐佛两腿下垂座前，两掌向外垂伏于膝上。衣褶层次分明，纤细流畅。两胁侍为罗汉。下龛为镂空缠枝忍冬纹盘绕，形成宝盖式样的尖拱，夜叉肩承十化佛代柱龛形，内雕释迦说法三尊像，中尊右足仰掌半跏吉祥坐形，衣襟下垂，右手作施无畏印，右衣襟搭左腕上，左手及头部均残缺，胁侍皆有宝珠圆光，衣襟向外作锯齿形褶纹，新颖奇妙。莲台下雕狮、象、文殊、普贤二菩萨。龛下一列拱手站立虔诚的供养人。整个造像布局匀称；肃穆、庄重、玲珑、巧丽，佛菩萨细项长方秀容，与云冈时期有显著变化，可说是龙门时期一件较杰出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47. 魏文朗造像碑

北魏（386—584）　高 120 厘米，上宽 64 厘米，下宽 67 厘米，厚 30 厘米，直形。

四面有造像。阳面凿一方龛，龛顶刻双龙交颈，口衔莲花。龙两侧刻飞舞状的飞天。龛内造释迦、多宝说法相，左佛外衣的右襟由臂后甩到胸前。右佛穿中国式双领下垂外衣，宽带束胸。两佛座于禅座之上，床两侧各有一胁侍。龛侧有两朵团花，一只奔鹿。龛下分三层，第一层刻二人对一博山炉合十礼拜。第二层为“魏文朗乘马逐第一”的供养图。最下一层为一排供养人，似为主子的子孙辈。

阴面凿圆拱龛。龛首为双龙交尾，龙首反顾。一对雄鸡立于拱额之上，鸡侧各有一体飞天。龛两侧刻文殊、维摩诘坐于屋下。龛内雕思维菩萨坐于禅床上，床前卧一对狮子。龛右下侧有一只奔鹿，龛下刻有博山炉，炉周围刻道女数人。再下面有发愿词：“始光元年北地郡毛原县民、[阳浪川忠] 佛弟

子魏文朗，家多不赴，皆有违劝，为男女造佛道像一区。拱养平等，每过自然，子孙昌荣，所愿从心，眷属大小，一切劳鸳，如是因缘，使人□扬”。书法楷书。

左侧龛额为楣拱。龛内造一佛二胁侍。龛下刻戴冠骑马人，马后有伞，有三位持矛骑护随后。

右侧凿上下龛。内凿一天尊，二胁侍。天尊座下有托座侏儒。

此碑为佛道混合造像，是北朝并崇佛道二教的有力见证。同时，碑的发愿词为研究地理沿革提供有力证据。

现藏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48. 正光造像碑

北魏　正光五年（524）　石呈长方形，头已残，高 100 厘米，宽 18 厘米。正面上部一龛头残缺，从下剩部分看系一佛二僧，再下刻有“正光五年岁次甲辰七月□□十五日，万□雄州北地三原县□□……”楷字。背面与正面略同。右侧素面，左侧是左氏宗族的题名，这尊造像碑由于文字较多，极为重要，其刻字更是北魏书法的典范，深受国内外书法家重视和欢迎。解放前不少人曾以高价购买此造像碑拓片。

现存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49. 李昙信造像碑

北周（420—581）　高 121 厘米，上宽 47 厘米，宽 51 厘米，厚 28 厘米。

李昙信造像碑阴阳两面除主尊造像一面为佛，一面为道外，大致雷同。碑阳凿矩形龛，有尖拱额，其上有天盖帷幕。龛内造天尊，戴冠蓄髯，手执羽扇，褒衣褶襞不像北魏末那样宽大。佛座是线雕的覆莲座。胁侍立于束腰仰覆莲座上。龛侧有力士，龛下为阴刻的博山炉，炉两侧刻有狮子。再下有供养人。碑阴有门师、幢主等供养人。

碑两侧刻尖拱龛，各造一菩萨。菩萨体态已趋圆浑，立束腰仰覆莲座上。菩萨帔于腹前交叉。交叉处有环饰。龛下为博山炉，左侧博山炉下为两排供养人。右侧有楷书的发愿词：“夫真容隐晕，正化亭响，太空辽廓、非像无以表其质。是佛弟子李昙信等，减割家珍，敬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其菩萨石像一区，其功悉就，上为皇帝留国公延祚无穷，万方归化，下及师赠父母、兄

弟、妻嫂子侄寿命修延、咸保福禄。□□□□，学者玄悟，爵位无穷，使君相及，大趣典生，同善□者，咸蒙斯愿，成无上道，所愿从心。

保定二年岁次壬午十二月丙申朔十五日功讫。”

此造像碑的发愿词为研究历史地理提供很好的依据。

现藏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50. 蹲 狮

北周（420—581） 蹲狮通高 25.3 厘米。1955 年西安西北郊出土。

此件石狮为蹲状，长方形座。狮仰首挺立，大眼齐鼻，张口卷舌，项鬣及颈下为半螺形卷毛，胸腔前胯，肌肉分明，丰满突出，后腿蹲座，前腿挺立，有正反骨筋饰纹，爪趾肥大有力，表现出雄健威猛的形象，与后来唐代早期永康陵上的蹲狮很为接近。它的体积虽小，但较完整，具有浑雄的气势，雕刻手法也趋于写实，尤其颈部鬃毛，是运用了装饰性样式，使整个雕像更为精美，表现了北周雕刻由南北朝向隋唐过渡中的时代特有风格。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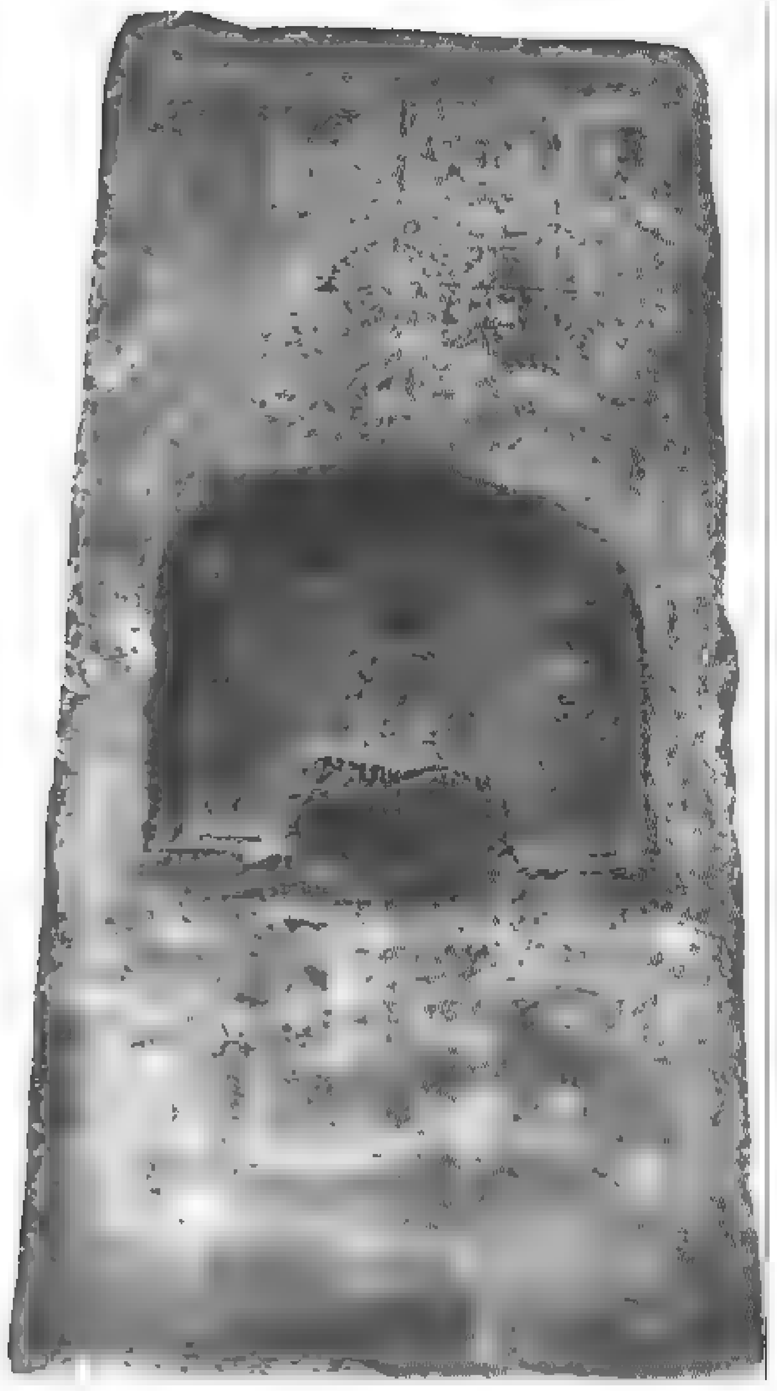
51. 武成造像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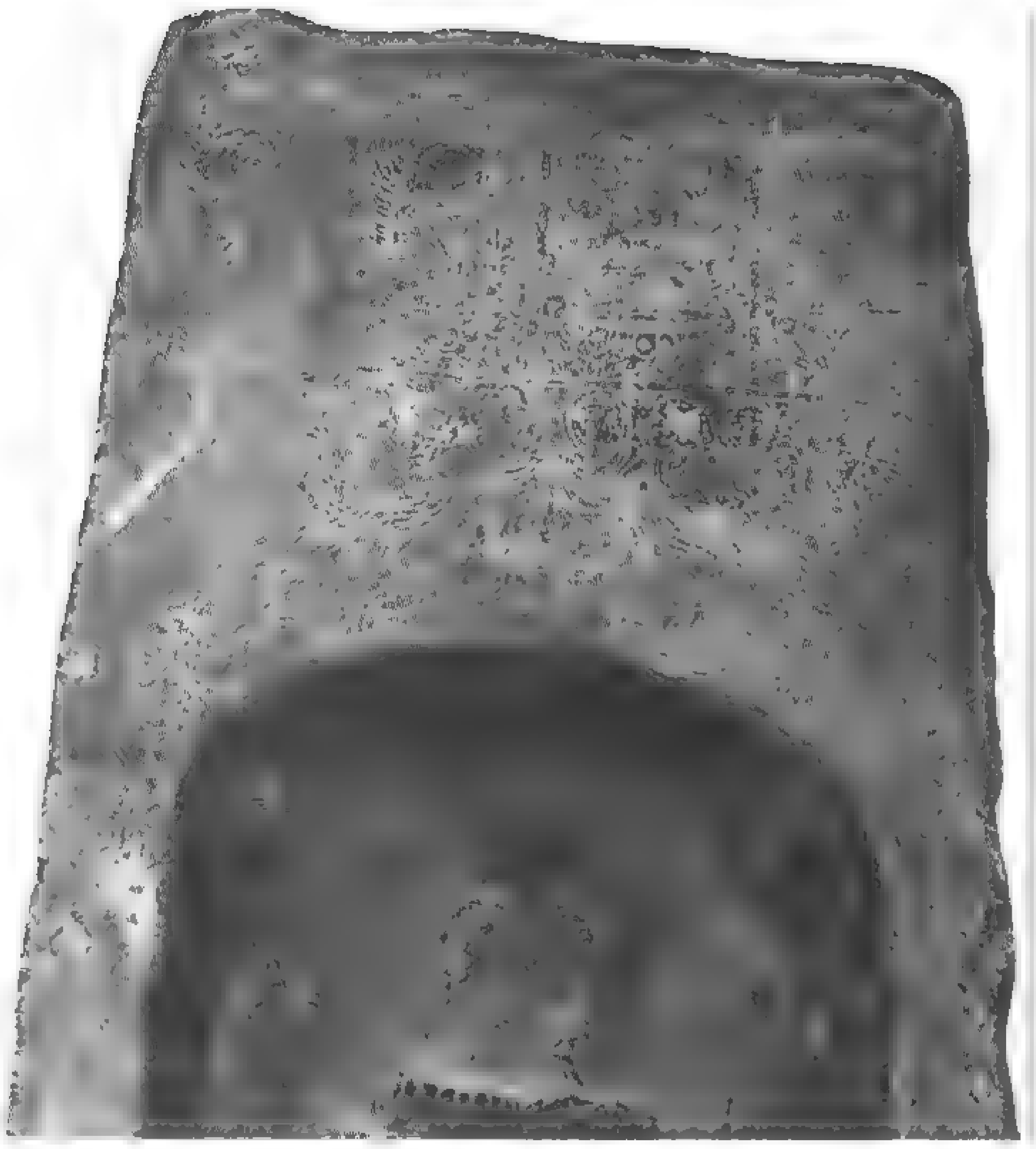
北周武成年间（559—560） 石呈长方形，高 175 厘米，宽 80 厘米，厚 30 厘米。正面并排龛内为老君与坐佛，其衣纹垂至龛下。龛楣作几何纹为第一层，忍冬纹为第二层，线雕拱与椽、鸱吻为蟠虺所代。再上一层是三副二龙戏珠，最上层为二飞天。龛楣拱的两边为线雕的四层塔。龛下分四层，一层正中二神僧面对一高颈炉，两边为供养人骑马。马后侍从为主人打伞。二、三层是并排的供养人，四层为楷书题字，有武成年号。背面除一龛三尊像外，其余布局构图与正面略同。右侧上部题字。再下一层是并排四个供养人，左侧与右侧略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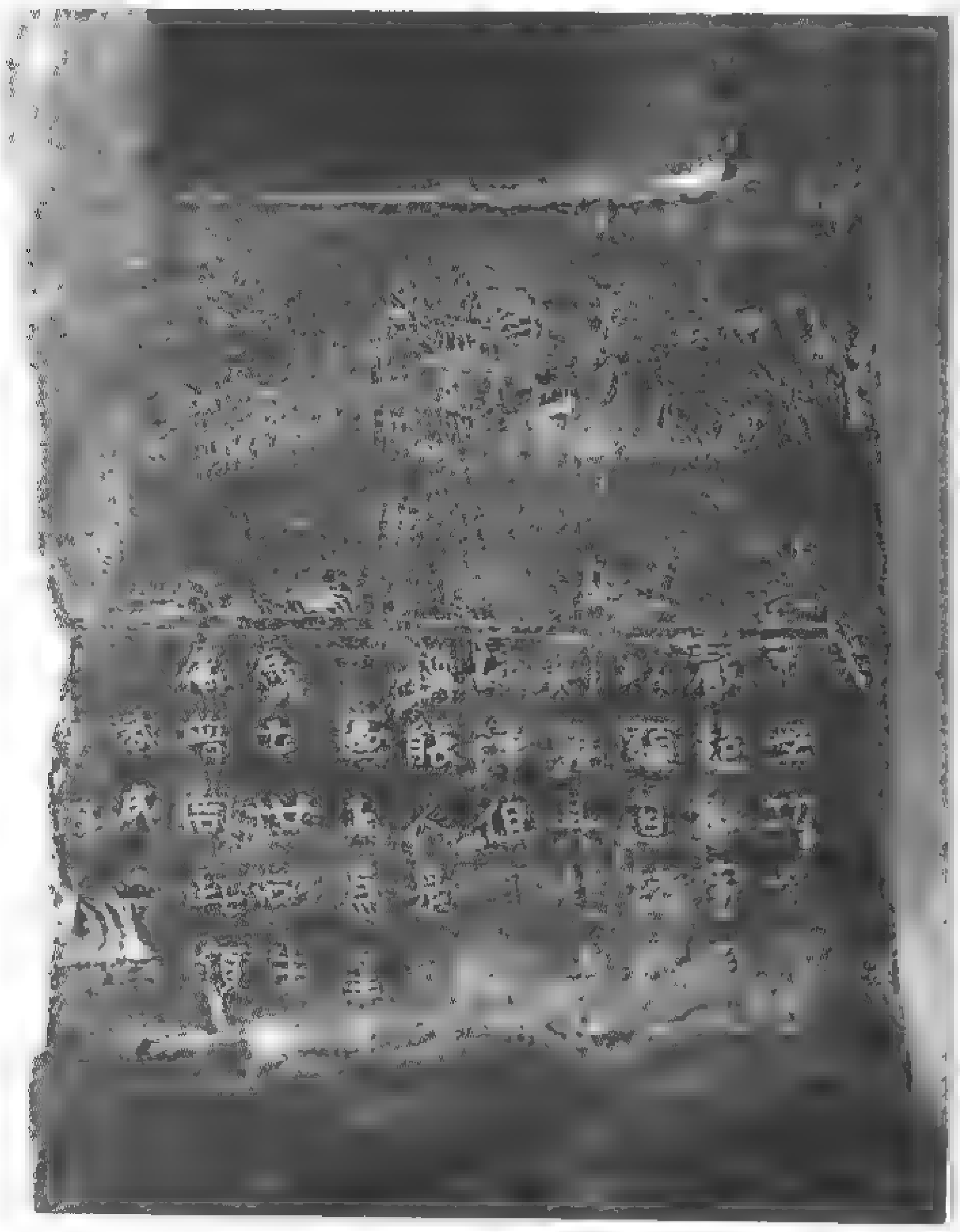
现存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52. 武成二年造像碑

北周　武成二年（560）　碑高 112 厘米，宽 53 厘米。1949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这像为竖方形，以浮雕线刻混合手法雕刻四面龛形，均为尖拱式，前后龛内均雕三尊像，两侧各为一尊像，四面龛上下均线刻坐佛、沙弥、供养人、蹲狮、宝供等纹饰，场面庄重、华丽。左侧下部有“武成二年”记时题铭十行，行五字楷书。是北周时期一件具有参考价值的艺术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3. 释迦佛立像

北周　武成二年（560）　通高 250 厘米。1953 年由陕西渭南移来入藏陕西省博物馆。

佛像长方脸型丰满端穆，高发髻阴线螺纹刻出，额有珠光，长耳、直鼻，口角涡下呈微笑，身穿轻柔袈裟，右手断缺，左手指残，站立方座莲台之上。方座四面满刻供养人及武成二年题记，是原陕西省博物馆藏存这类佛菩萨像唯一有年号的雕像。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4. 天和四面造像碑

北周　天和（566—572）　碑高 140 厘米，宽 45 厘米。1952 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竖形四面浮雕造像，正面雕上下两龛，上龛楣阴刻“圣大觉如来”五字楷书，龛内刻三尊像，中尊戴宝冠交足坐形，衣襟并垂座前，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伸食中二指下垂，两胁侍为沙弥，胁侍上各刻交脚化佛。下龛楣上阴刻“圣阿弥陀佛”五字楷法，内中尊左右两足仰掌作全跏吉祥座，衣垂座前，两手右置左上作定印，大耳额有珠光，项有三弧线。胁侍左为观音、右为势至。上刻思维化佛。座下力士屈膝而坐手掌宝供，两旁府坐供养沙弥，边刻双狮。龛

两旁各刻九层小坐佛龛。背面上龛为释迦如来坐形，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执衣襟当腹，半跏吉祥座，衣襟垂于座前。两胁侍翘足立形，交手胸前，头上雕两化佛。下龛为无量寿佛坐形，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伸食中二指下垂，半跏吉祥坐，衣襟垂座前，两胁侍为沙弥。龛两旁各刻坐佛龛，形式大体与正面相同。左右两侧亦各刻小坐龛佛。左侧下阴刻题记数行，由于漫漶，仅可看出“周天和”，“无量”五字。

此像，面相丰满、项肥、肩及衣褶，都给人以柔和感觉。而龛形简单，背光仅以线条表现，不作雕饰，都显示出北周雕刻作风特点，为原陕西省博物馆保存北周浮雕造像中的上乘。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5. 建德四面造像碑

北周　建德元年（572）　碑高 130 厘米，宽 52 厘米。1949 年前陕西省博物馆移交收藏。

此像为竖方形，四面以浮雕、线刻混合手法雕成。四面龛为莲花拱。正背两龛浮雕老君屈膝坐像。正面老君右手持水莲，背面右手执羽扇，左手均断。头戴道冠，三列长须，身披袈裟。两龛胁侍均双手覆袖下掬置胸前执笏，短衣覆膝穿裤，头戴双开巾或虎头帽，造形服饰奇异。正面龛旁线刻戴盔武

七，龛下中线刻莲座醮盆形供物，可能象征丹炉，两旁置有带盖宝盒，中刻牛车及有台阶楣拱的柴门两人三物。左侧及背面龛外饰纹，中刻道民富平县主簿锜马仁及其弟子侄等供养像并楷书题名。正面下方由六世祖锜祟起到右侧及左侧下方遍刻各代祖及父、叔、祖母、姊妹、妻女等等供养像并题名。像的题名中有“锜马仁……敬造石老君一区“及”壬辰十二月己丑日”记时，所以此像也称“锜马仁造像”。

关于像上壬辰记时，壬辰为北周武帝宇文邕天和七年，同时改元建德。因记时壬辰十二月，故定时代为建德元年造的像。魏太武帝崇道废佛以后，不久盛弘佛造像，自南北朝以至隋唐，道教造像时有所制。《周书》载有“建德元年正月戊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杂事。”又有“三年五月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沙门道士悉令还民。”据此记载，均可说此像为毁佛道之前的制作。由这件石刻可证明北周这时道教在人民群众中也很被崇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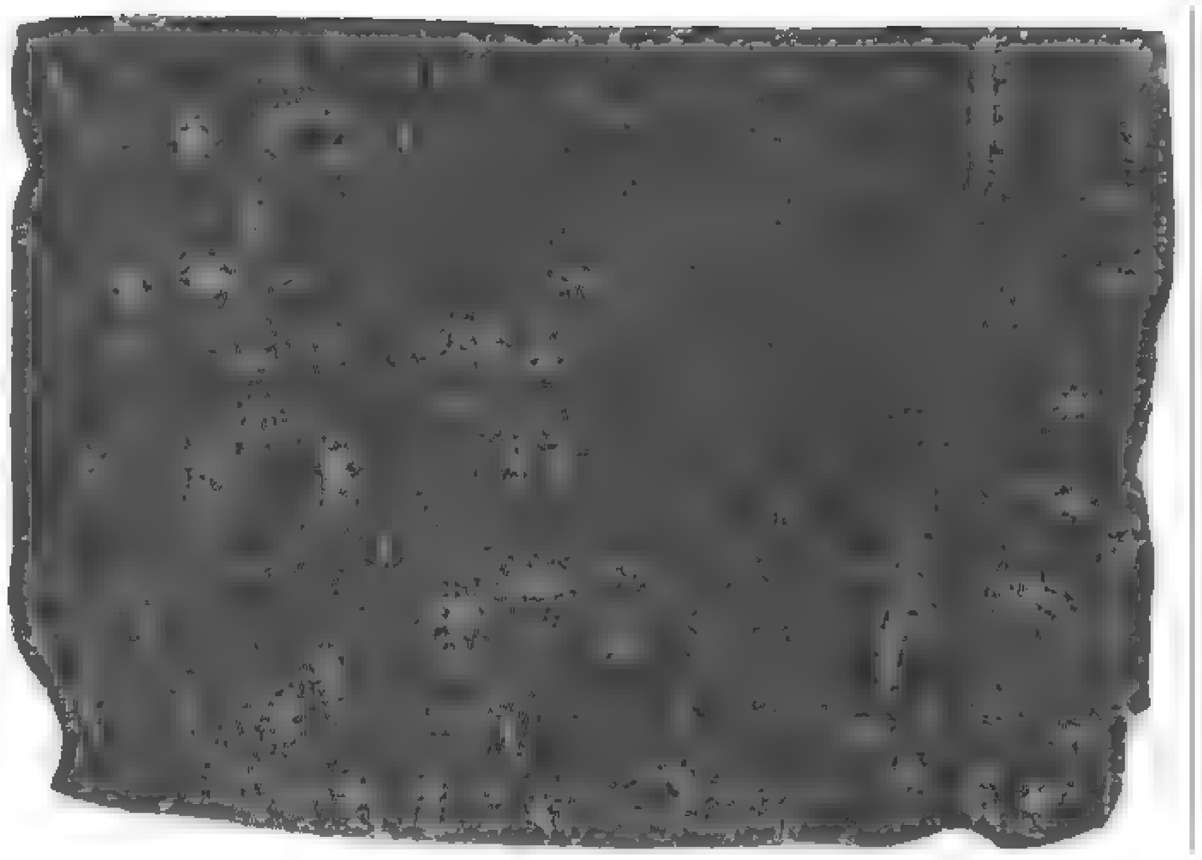
宇文周是鲜卑族，与北魏同是北方兄弟民族，在这一件造像上很明显表现有民族融和的象征。例如手执笏是中国最古的一种制度，大概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后中断。宇文邕保定四年三月初令百官执笏。此像胁侍手均执笏。又袈裟是印度佛教的服饰，此像老君亦穿这类服饰。穿裤虽不始于北族，但短衣覆膝、虎头帽、双开巾，可能是北族的装饰。可是这些装饰混合雕饰在同一造像上，更加表明当时民族文化的融和。更由造像上戴盔的武士、羽扇以及雕刻生动的牛车，有台阶楣拱的柴门等等，并可看出当时的风俗习惯、用具及建筑的结构等方面的形式。这件石刻确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北周时代文化艺术方面的历史实物资料。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6. 建德三年造像碑

北周　建德三年（574）　　碑高 111 厘米，宽 50 厘米。1954 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此造像碑两面浮雕佛龛，螭首圆顶两边二螭式，手法纤细已启唐碑螭首作风。碑额正面为方形坐佛龛，背面刻建崇寺三字。碑身正面作屋形楣拱，脊雕有鸱吻宝珠饰间以缘觉头四个。脊下为莲瓣式瓦纹两列，拱两端仰首鸟衔三珠吊磬穗形式柱。龛顶雕一列七佛小龛。主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二罗汉共计五尊像。龛下题铭有建德三年（574）记时。背面龛为尖拱卷端式，两旁各



有供养人、飞天、一缘觉头二作饰。龛内为一佛二菩萨、二罗汉、二比丘式七尊像。龛下为题名。此造像的雕刻，在陕西省博物馆艺术藏石中为较好的一件作品。但与北魏各浮雕艺术相比较，无论在形式上技巧上都只保存了些形骸。惟螭首较前制作进步而且生动，似可认为属一件过渡时期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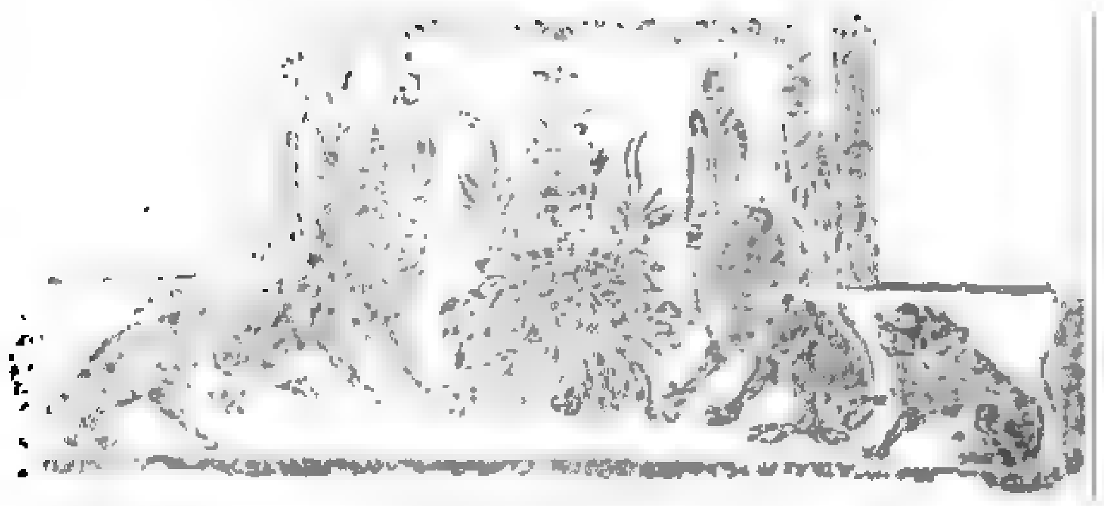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7. 释迦牟尼造像碑

北周（557—581）　碑高 81 厘米，宽 78 厘米。1956 年征集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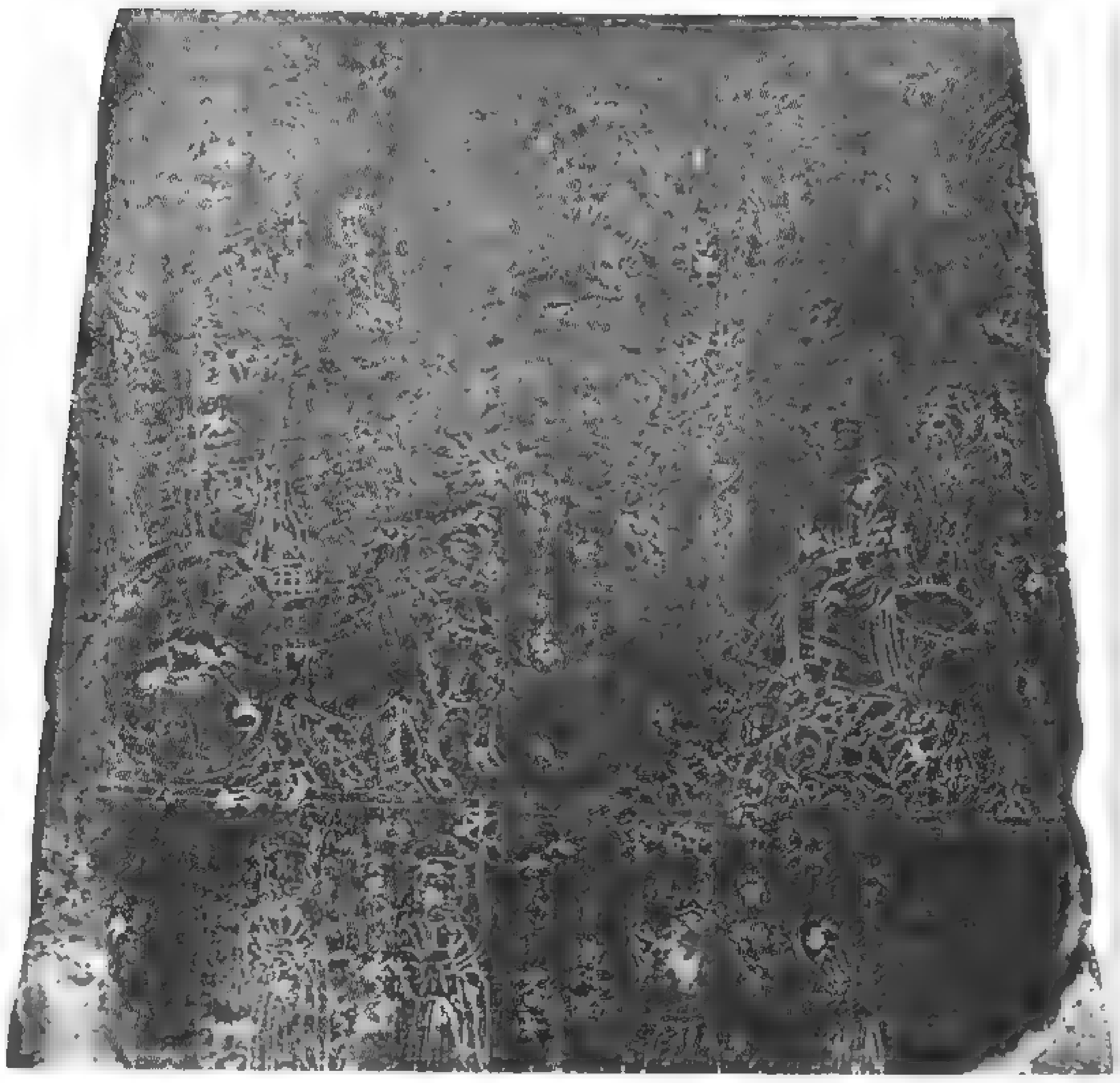
此造像碑为方形，浮雕一面刻。束幔方形龛，幔内以对称的供养飞天作幕檐，龛内为一佛二菩萨和二弟子五尊像。龛两侧雕竖方形小龛，内为立菩萨。龛下刻仰铎内插忍冬花宝供并供养人，两旁雕四蹲狮。飞天飘舞，束幔卷褶自然，佛、菩萨衣纹波状线条舒展生动，特别是衣褶下垂微卷，表现出丝绵的弹力细柔。呈现出北周以后艺术风格的精细新颖特征。虽然形制上还保留有北魏传统样式，但却摆脱了两魏呆滞形骸的刻画。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8. 开皇造像碑

隋　开皇四年（584）　　碑高100厘米，宽44厘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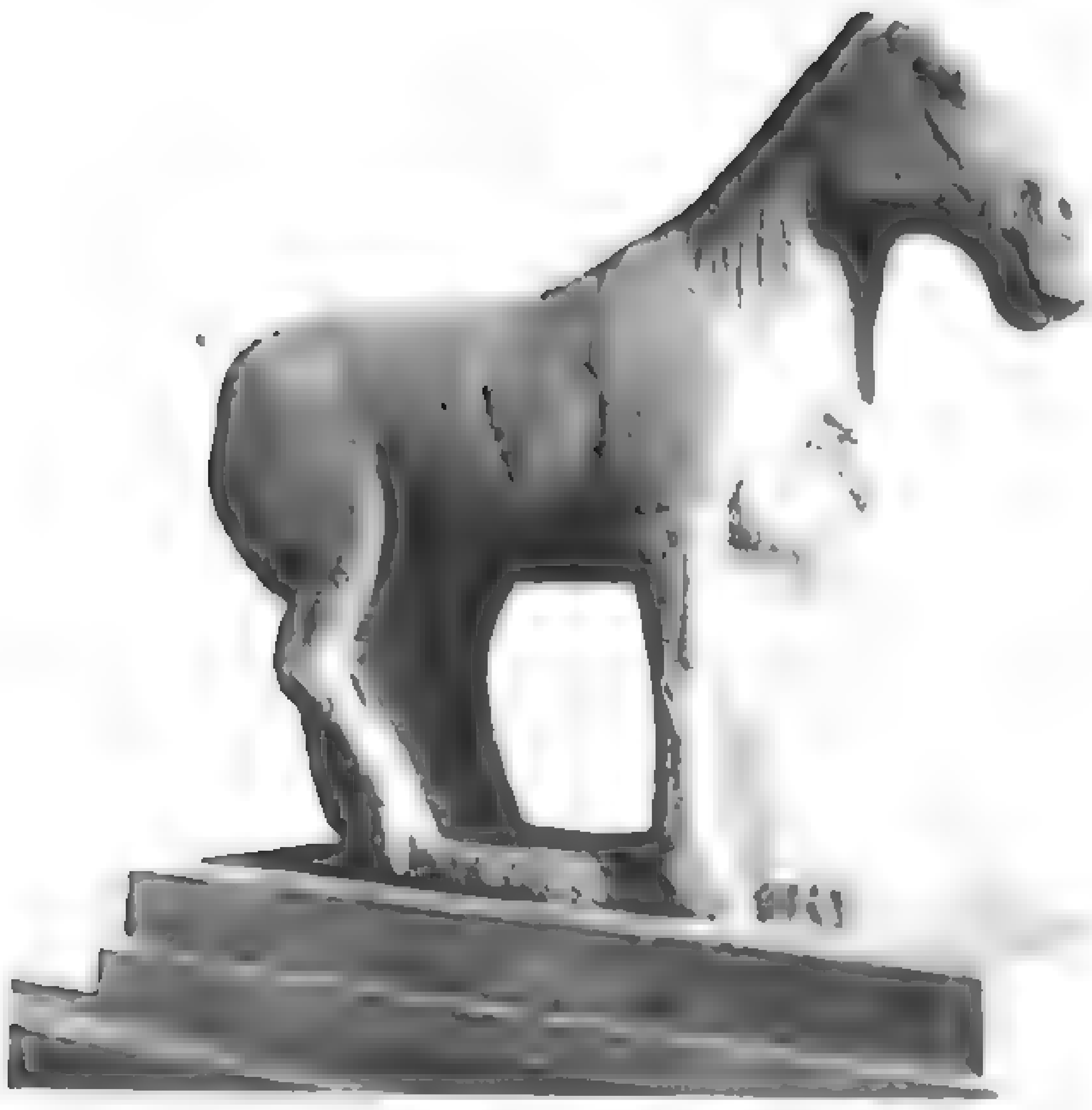
这尊造像碑为竖方形，四面以浮雕、线刻混合雕成。四面龛的形式均为尖拱形，前后龛造像为三尊式，两侧龛为一尊式，龛上下线刻宝供、双狮、坐佛等花纹，雕造极为精致，特别正面左边线刻一骑马、右边一童子御驾一乘牛车，造型别致，可藉以研究当时人物衣冠、车形及马饰等。中题名为"亡姑夫县平望夫蒙钟扶象主亡姑钳耳女休"，下刻供养人及题名"妻党晖容"、

“息钳耳遵略”、“三女夫蒙客女”、“三女夫蒙安庆”。侧面刻铭为“开皇四年十二月□日佛弟子钳耳神猛为亡姑造四面像一区，藉此功德愿使亡者托生西方妙乐□土……”等楷书，书体秀劲，是研究当时的书法资料。而且铭文中的“夫蒙”、“钳耳”等姓氏，更是研究关中部族考方面的有益鉴证资料。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59. 大夏石马

大夏　真兴六年（424）　高 200 厘米，长 255 厘米。1954 年由西安市长安县查家寨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



此马立形，昂首双目前视，鬃毛长佩，腹下前后腿雕成两个屏障，以增强四腿的坚固。屏障底板均雕有云纹图案，以象征着马蹬云驾雾。整个马的造型古拙，风格朴实雄健，前腿下屏壁刻铭，残留“大夏真兴六年”、“大将军”等楷书字样。东晋十六国时代，匈奴族赫连勃勃据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称大夏天王，后一度攻占长安，让其子赫连缋镇守长安，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这件石马即为那时的作品，原在汉长安城遗址附近，是否属陵前仪卫，已不可知。1954 年移入陕西省博物馆石马亭内。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0. 大统三年造像碑

西魏　大统三年（537）　碑残高 89 厘米，宽 83 厘米。1960 年由陕西富平县小学移存陕西省博物馆。

此造像碑为竖方形三面浮雕，有残损，正面雕佛菩萨像、宝供、车骑、雄狮、供养人等，内容丰富多变，并有“大统三年题记”，是研究西魏石刻造像及其人物服饰方面的仅有实物资料，虽有残损但很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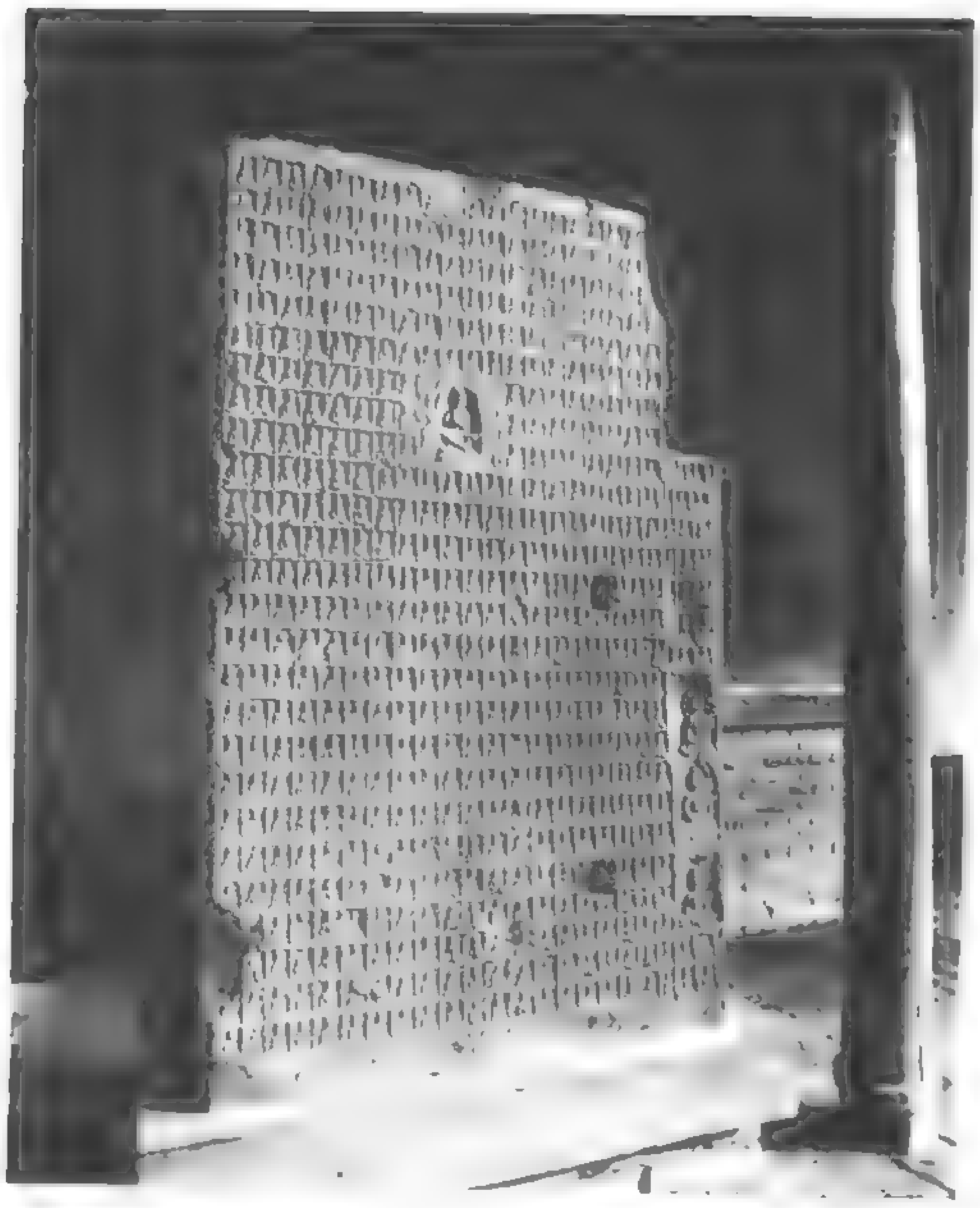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1. 千佛造像碑

西魏（535—556）　碑高 144 厘米，宽 87 厘米。1949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此造像碑竖方形三面刻，前方作阶式，很为少见。阶上正面浅浮雕龛形释迦三尊像，右侧上部雕龛形弥勒三尊，左侧正中部雕大龛，内浮雕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有宝珠背光，龛及背光均无雕饰。阶下层左右两侧各刻坐佛龛左七右三。三面龛周均雕千佛多列，数不计。正面右侧均为方格形，惟左侧为并列无间格，虽在一石上，雕法不同，甚为少见。无文字题记，佛并坐，龛不加饰，背光作平板形，衣纹转化为波状线，已为北魏晚期及西魏艺术作风。造型已不如北魏中期，但雕刻重点却逐渐脱离平面转化为高浮雕。所以隋、唐以后圆雕佛像较多起来，大概是由于雕刻倾向这样变迁之故。所以西魏以后浮雕造像，不如北魏时期精美。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2. 西魏文帝永陵立兽

西魏　大统十七年（551）　兽高 109 厘米，长 108 厘米。1959 年由陕西富平县西魏文帝永陵移至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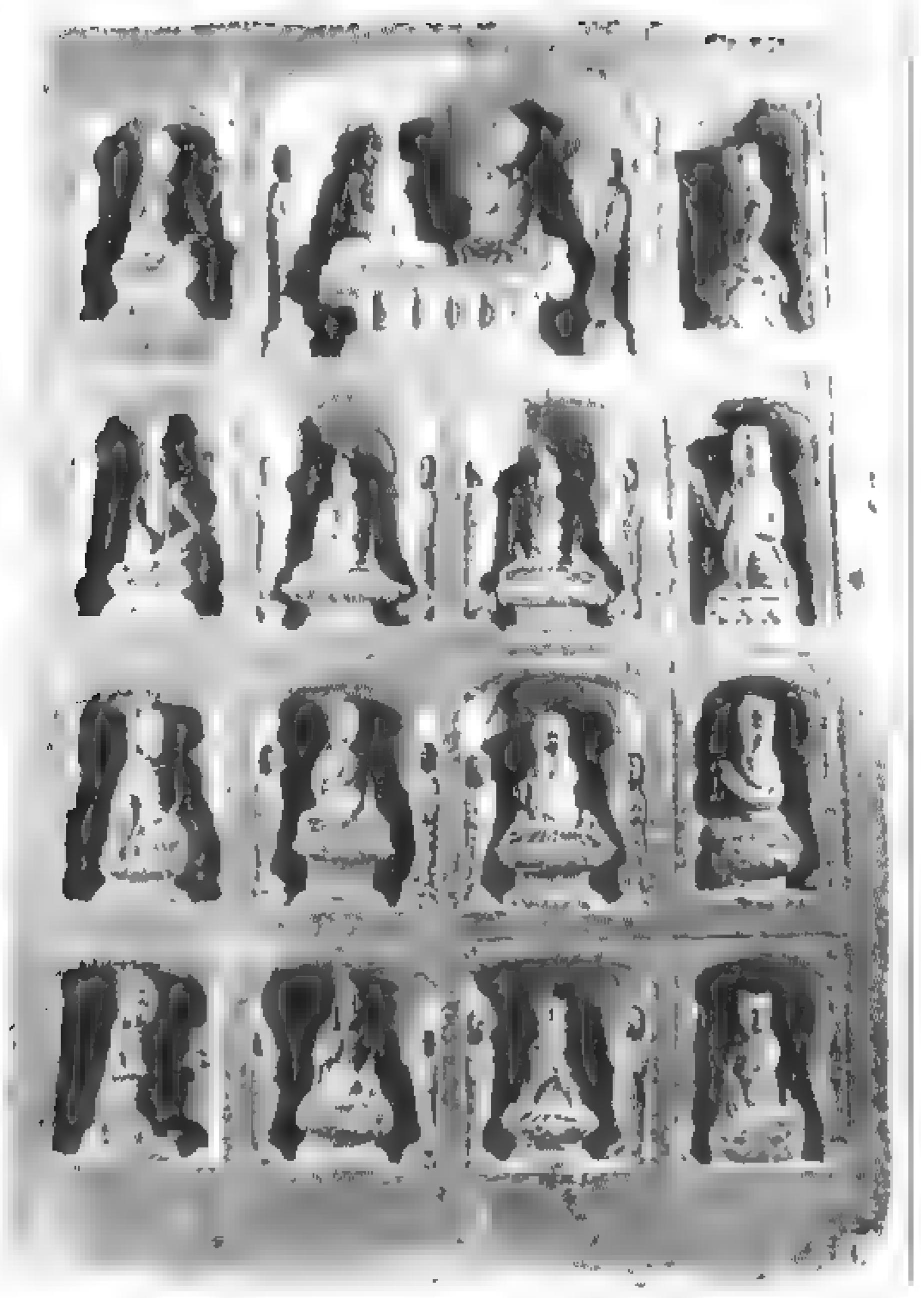
西魏文帝元宝矩永陵，据县志记载，在陕西关中富平县“石人城”一带，今已无石人，仅遗留此巨型立兽。

立兽的造型昂头挺立，头类狮虎，身躯四肢类似骡马，前后肢上端，均雕有阴线火焰纹，象征着双翼。整个体形雕造技法质朴厚重，并无精细雕工，保持着汉石刻艺术的古朴风格，与同时代的南朝陵墓雕刻的瑞兽相比，体现了北朝雕刻气势雄伟，神韵浑厚和民族特有的气质。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3. 四面佛造像碑

隋（581—618） 碑高 125 厘米，宽 80 厘米。1953 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造像碑为竖方形浮雕四面多龛千佛造像，正面上部为满饰璎珞束幔拱龛，雕造得精细繁丽而不显堆积紊乱，帷幔的挂钩束带条理顺适的皱纹给人一种轻盈飘动的感觉。龛内作六阶形大小不同的小龛，佛与供养菩萨都表现出一种调和的美。背面和两侧雕数层佛龛，人物表情生动，神态安详。这是馆藏千佛式造像中一件精美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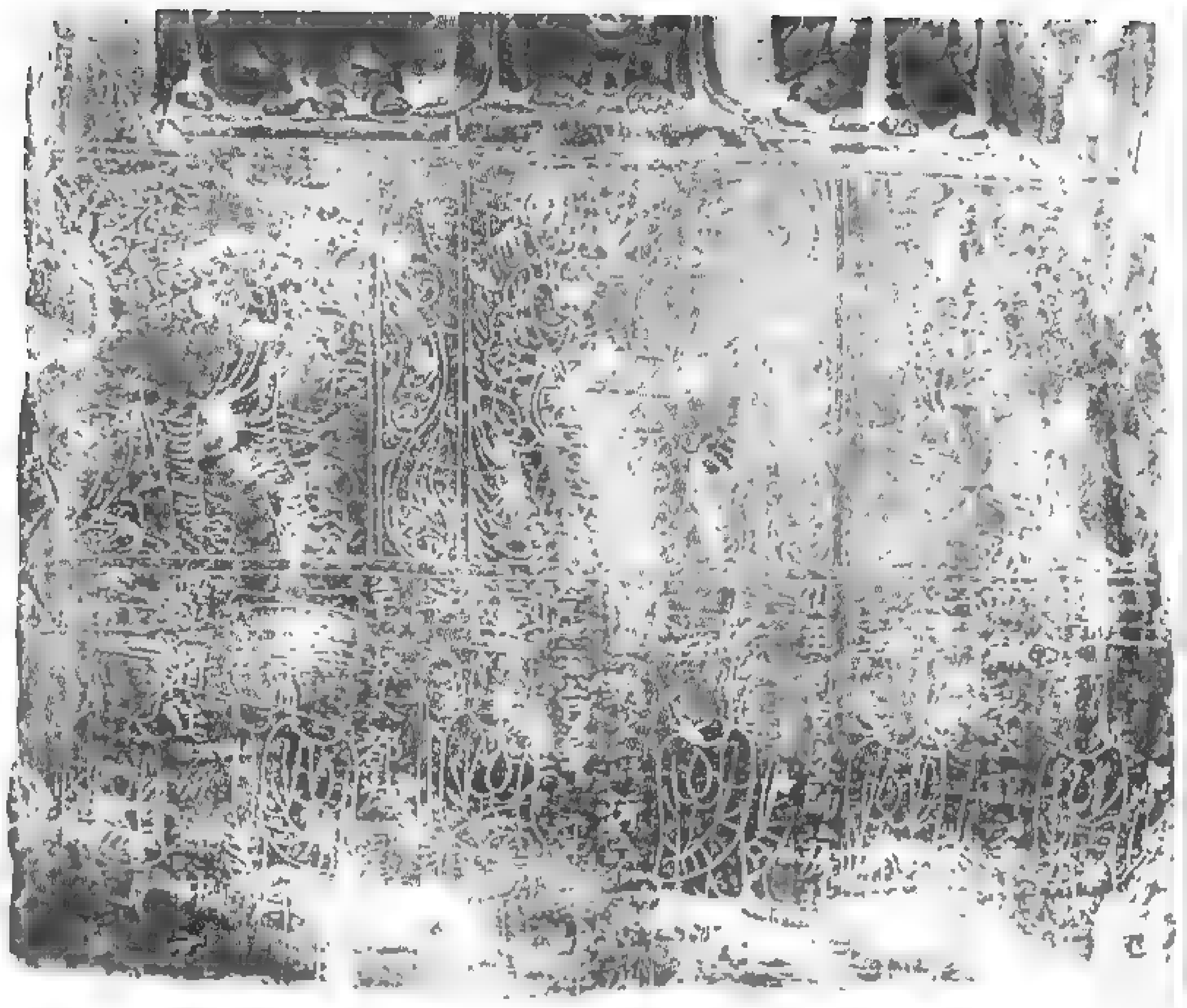
64. 荔非明达等四面造像碑

隋（581—618） 碑高 91 厘米，宽 45 厘米。1953 年由陕西华县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

此像由浮雕和线刻刻成，竖方形，四面各雕一龛，前后各为五尊像，两侧为三尊，龛内存像虽有残缺，但上下线刻拱饰、宝供、双狮等花纹，繁丽多姿，线条刀笔流利。像前后两面下各刻 12 造像人的姓名和官衔，分别为：

“佛擅越主兼录事乡□□□□□

都化主荔非明达



都像主前□□□曹□□□□
都邑主□□□□□平县□□□□
天宫主柱国参军□□□□
开佛光明主东□城□□□□□□
典录裒公记室荔非□□
化主同官烽帅荔非延□
像主越公府参军荔□□□
邑主邑义录事荔非仲□
邑长大都督司铠□□□□
典坐村正荔非仲祥”

由题名可看出此像均为关中羌村荔非氏一族集体所造，像主都是北周至隋代职官名称。按华阴杨素，隋初封越国公，其子均进爵柱国，极为显贵。荔非氏族人可能多为杨素的家将，故这像才能有此题衔。像上虽无记时，但至少为隋初作品无疑。造像不论中尊或胁侍，内衣都雕成左衽，与一般造像不同，是否为北族在汉民族又统一中国后，还有意保存他们的旧习，故作这样雕法。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5. 弥勒菩萨坐像

隋（581—618） 像高 185 厘米。西安市南郊塔坡清源寺出土，1950

年西北文化部移交陕西省博物馆。

据文献记载：隋文帝即位之初，即令全国修复北周毁佛后的所有佛寺和佛像，并令各州郡广建佛舍利塔，民间计口纳粮，抄经造像，宫廷贵族，也信佛成风。《隋书》载：开皇二十年十二月有严厉的诏，告示“敢有毁坏偷佛及天尊像……者以不道德论，沙门坏佛、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所以至文帝仁寿年间，全国共雕金、银、木、牙、石、夹纻等造像十万六千多躯，修复旧佛五十万躯。到炀帝时更甚。至今石窟中的隋代造像存留尚多，寺庙造像则遗存较少。

这件弥勒菩萨像则是寺庙中的遗物，且以蓝田晶莹如玉的黄花石雕，为立体交足坐形，头戴璎珞宝冠，束带飘肩，额有珠光、耳珰、臂钏、胸饰富丽华贵，身饰璎珞，腰衣裙褶，覆腿垂于座前，足趾触莲座上，肌体饱满，面容丰阔，表情温祥恬静，衣着轻柔适体，装饰华丽，体面起伏，线条富于变化，质感很强。从造型上可以看出它既不同于北朝那种保留有较多的外来雕刻特点的造型，又不同于多方面运用写实手法把佛像世俗化了的唐代雕像风格，而是明显地带有由南北朝到唐代的过渡期间的演变痕迹。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6. 观音菩萨像身躯

隋（581—618）　　像高192厘米。1983年西安市西稍门外通信学校出土。

据了解这种残菩萨造像，在此地建国前后共出土过数批。一次是40年代初期出土过数件这种菩萨像躯身缺头（见王子云编《陕西古代石雕刻□》图版74。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5月版）实物至今不知去向，1978年空军通信学校修防空洞时挖掘出14件佛、菩萨头，未见躯身。1982年该校基建工程

又连续两次发现这种菩萨身躯三件及隋唐时代佛菩萨头32件和一件完整的北魏造像碑。虽然这次发现，都是残身躯和头，但造型均极精美，富有活力。

这件观音立像，上身赤裸，薄纱透体，显示出了菩萨肌体的丰美，身饰华丽璎珞，珠玉，分外精美华贵，虽然缺头断臂，但由于肌体表现得生动，令人深感犹具生命活力，不失为精致、洗练的隋代雕刻特色。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7. 菩 萨 立 像

隋(581—618)　　像高232厘米。1983年西安市北郊未央公社张家巷出土。

此像圆雕立形，头戴宝冠、修眉细目，大耳垂肩，赤裸胸际，肩披轻柔薄帛顺势下垂，形成优美的曲线，更加衬托出菩萨匀称的丰肌。右手上举断缺、臂部戴钏，左手下垂持净水瓶，手指雕刻纤巧逼真，具有高度技巧。遍身饰璎珞、珠玉，站立翻连台上，体现了隋代佛教菩萨的特有造型。

像座属唐雕刻，后配。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8. 释迦牟尼立像

隋(581—618)　像高 210 厘米，宽 60 厘米。1949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立像螺发、方脸、粗项，左右手均残断，袈裟覆肩，胸前裹衣束卐字形圆结，两飘带垂腰际，吊有罄形佩饰，衣褶雕作双层。腹微鼓，腿挺立。雕刻比例合度，姿态自然，面容庄严而又谦和。配座为覆钵式双心下翻莲瓣，圆形下连方台。台角上各雕蹲狮，狮形皆前足挺立，后足蹲形翘尾。前两狮均雕刻三层卷毛颈鬣，背后两狮有串珠吊六铃形，颈饰气势雄伟。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69. 释迦牟尼佛立像

隋(581—618)　像高 195 厘米，宽 54 厘米。建国前长安县查家寨出土。1949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此像立体圆身，螺发、方脸，手指略有残断，右手仰掌作施无畏印，左手持宝珠当腰际，两腿挺立在单瓣缩形莲座，身穿袈裟，衣褶袖口都是波纹，是北周以后

雕刻技法作风。像的整体构型匀称并趋向写实，面部表情庄严中显出慈祥。莲座下配覆钵式两层双心瓣莲台，下连方台座，是后配的唐代佛座。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0. 一髻文殊立像

隋（581—618）　　像高 123 厘米。1952 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此立像头加宝额，顶束一髻发式，右手持莲蕾上举，左手执宝环下垂，并足立莲座上，为一髻文殊菩萨造型，亦称一字文殊。面相慈祥，显露有童子模样，带串殊耳珰，有胸饰项链，全身佩挂华丽的璎珞，细长衣带缠左右腕长垂座上。全身构型匀称，比例合度，在富丽的装饰中显示出端庄而带刚劲的气息，为风格完美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1. 提篮观音菩萨像

隋（581—618）　　像高 43.5 厘米。

1963 年陕西蓝田县出土，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按“佛”字涵意来说，是断世俗烦恼的先觉者，造像衣饰庄严肃穆，排除一切华丽修饰，而菩萨则是释迦成道前的形姿，戴宝冠、饰珠玉、披璎珞、挂耳珰、胸饰、戴臂钏等饰物，极尽世间一切华贵的饰姿；立像或坐像都不像佛那样限于严格的姿容，而表现为自由自在安逸的形态。

这件观音菩萨像，头戴花冠，顶梳

高髻，胸前饰璎珞，臂腕戴镯，左手提篮，右手执杨柳枝，神态自然生动。雕刻手法和衣褶的安排，均富有装饰性的美。显得雕工细致玲珑，刀锋犀利明快。特别是莲座左右雕刻的护法小双狮气势轩昂，造型更为生动别致，是小型雕刻中不可多得的一件优秀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2. 菩萨首

隋（581—618）　首高 50 厘米。1952 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这件菩萨首已失去躯身，面容雕刻丰腴，眉目细秀，隽耳隆鼻，在丰腴的脸庞、微带笑涡的口角，呈现出似笑非笑的神情。更以束发的璎珞宝冠和耳饰，以及秀丽的波状发髻来衬托，显示出了庄严高贵而又俊美温柔的女性美，与其说是在表现佛法无边的尊严，不如说是概括地体现了人间的美丽，是一件具有隋代装妆特点的典型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3. 黄花石观音菩萨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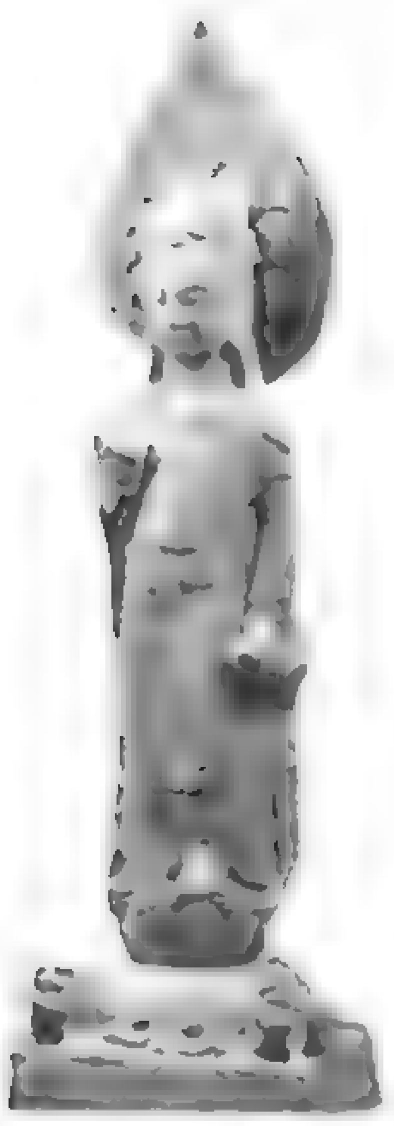
隋（581—618）　像高 103 厘米，宽 29 厘米。1963 年潼关老虎沟出土。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此像圆身立形，长方脸、戴宝冠。左臂下垂，手持净水瓶，瓶口前倾；右臂肘部上曲，手握莲蕾。头后作桃形背光，中间雕刻复莲。臂间衣带垂披座上，颈部饰连珠纹项圈，胸前璎珞结成环状下垂与飘带齐，足踏覆钵式莲座方台，台上两角各雕一蹲狮，形象雄健、威武，特别是左边一狮，正作回首伸舌舔足之状，造型生动。

这尊观音菩萨像，整体雕刻，肌肤饱满，面容丰润，表情温祥恬静，衣着轻柔适体，装饰华丽，且富有质感。比例匀称，雕工精致，可谓隋代风格的典型作品。（见《文物》1965 年 3 期《潼关老虎村一座古代陶窖中出土的隋

唐造像》)。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4. 李小孩（静训）石棺

隋 大业四年（608） 石棺长192厘米，宽89厘米，高122厘米。1962年西安西郊梁家庄出土。

棺呈长方形，是三间房屋式建筑，棺盖是由一块整石雕成歇山式屋顶，正脊中间置一火珠，两端设有鸱尾，屋面以浮雕筒瓦复盖，瓦钩深陷，屋檐雕饰莲花纹瓦当。棺身四壁由六块石板构成，四角转角处为曲尺形的整石，棺壁合缝处扣有铁质“细腰”。前壁正中间隐雕大门两扇，上各饰门钉五行，门各有环，两旁各线刻持器站立侍女一人。两次间各刻直棂窗格各一，窗下刻有卷于云雾之中的青龙、白虎、朱雀及缠枝卷叶花卉等图案。房屋四根立柱上端雕有一斗三升的重叠斗拱。屋右侧壁面亦刻浅浮雕门扉，二侧站立手持兵器侍男二人，棺内四壁原绘有色彩鲜艳的人物、花卉、日月、星辰、禽鸟、建筑等壁画，显得格外富丽堂皇，不仅体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雕刻与绘画的绝妙技巧，而且石椁的优美造型和装饰，也为我们研究隋代的房屋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座隋墓，不仅棺椁瑰丽壮观，而且墓内的随葬品也极为丰富豪华，除有一般常见的陶俑及少数陶器外，更重要的则是出土了大批珍宝文物200余件。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李静训，字小孩，陇西成纪（天水）人，是隋文帝长女周宣帝皇后的外甥女，隋左光禄大夫李敏的第四女，大业四年(608)六月死于汾缅宫，同年十二月葬于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坊，死时年仅9岁。由于李静训是皇亲贵戚，所以其年岁虽不大夭亡，但随葬品尤为丰富豪华，葬具精巧瑰丽。正由于棺内陪葬有价值昂贵的珍宝文物，因而在石棺屋脊正面正中刻有“开者即死”四个醒目添金楷书大字，以威吓盗墓者。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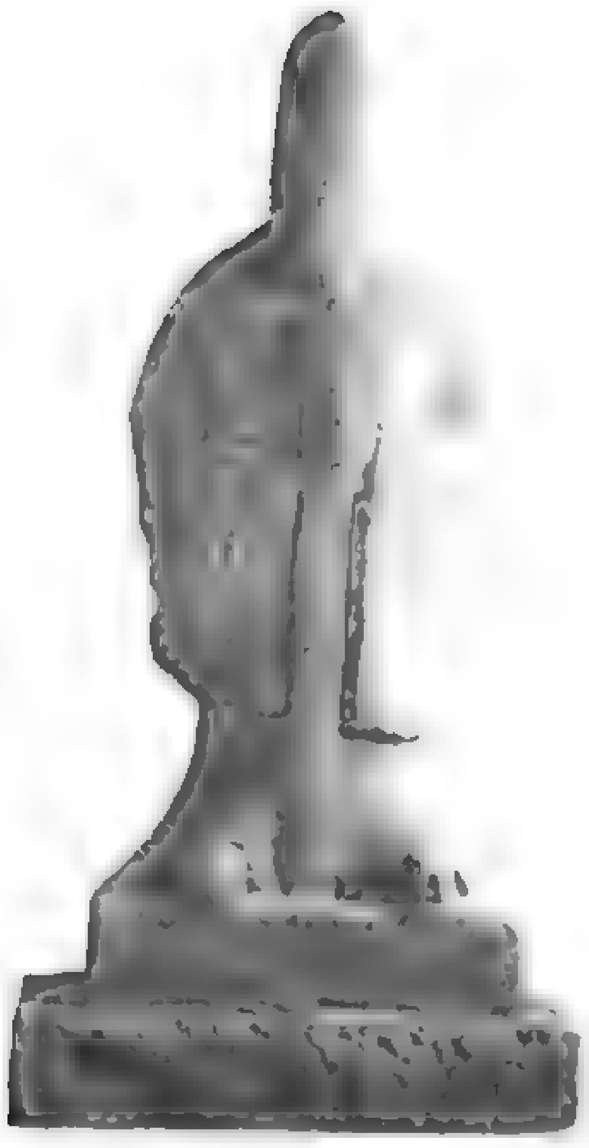
75. 永康陵蹲狮

唐　武德元年（618）　高 205 厘米。原立于陕西三原李虎永康陵前，1959 年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陕西三原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和白渠的地区。亦是唐代皇家贵族的陵园地。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曾被追封为景皇帝，其墓封为永康陵即在这里。陵前原有华表、天禄、石马、石人和石狮，这件护陵蹲狮，即是这些石刻群中的一件，不仅具有北朝和隋代劲健淳朴的造型风格，而又初步趋向于唐代的写实，明显地具有过渡时期的形象特点。

蹲狮整体呈三角形，胸部肌肉丰隆，前肢劲壮挺立，瞪目张口，蹲而前视，颈项上的披毛作尖叶形，颚下有三卷尖形髯，尾端作三叉形，胸前雕涡状卷毛，雄健威武的神态，表现出屹立不拔的气势，是我国早期陵墓蹲狮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唐（827—835）　高 223 厘米。1960 年由陕西三原永康陵移至陕西省博物馆。

此像称翁仲，是人的化身，即当朝的文武大臣。陵墓上饰文武侍卫像，据记载春秋时代就已有之，到了唐代，这种侍卫已发展成为行列，有的多至 20 人，其中文臣、武臣各半。所谓文武仅仅只是服饰装束的不同，从造型上看，都是恭谨直立，文臣持笏，武臣仗剑，其拱手直立姿势大同小异。都具有其时代风格的特点，即雄伟坚实，巍然屹

立，一个个好似小型的纪念碑像。

这件武卫像，头戴高帽，身着宽袍大袖朝服，拱手直立柱剑，面部表情严肃，富有魄势，充分地体现出作为仪卫的身份。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7. 石　犀

唐　贞观九年(635)　高212厘米，长335厘米。原在陕西三原县献陵前，1960年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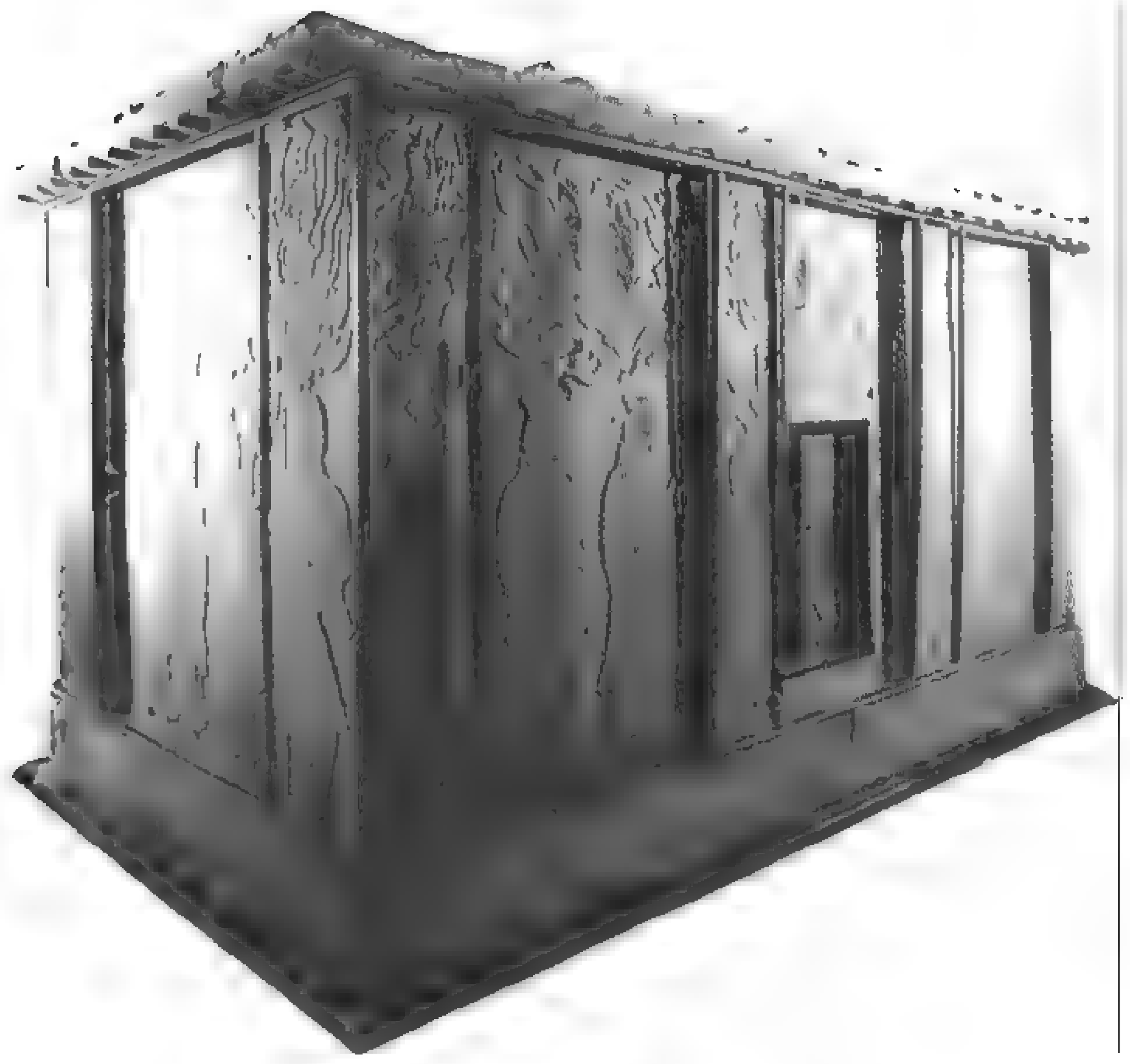
这件巨形石犀原在陕西三原县唐高祖(李渊)献陵前，原物为一对，此为其中之一。犀牛本产于南亚及非洲一带，汉唐史书记载有外国曾向中国赠送活犀的史实。据说唐代工艺家阎立德在任山陵使奉命为唐皇帝营造献陵时，雕刻石犀，置放在陵前作为纪念装饰之一，以显示唐国力的强大。这件比实物还要大的犀牛石雕，是由重达约10吨(两万斤)的整块巨石雕成，它巍然屹立在献陵，形象显得异常高大。在雕刻手法上，雕刻者运用高度的艺术概括，着力表现出犀的一些特征，如躯体硕壮，细目束口，四肢坚实有力，全身只用几条粗壮的线条勾勒出犀牛坚厚的斑皮等，既写实又富于装饰性趣味的处理，都助长了犀牛迟钝而又猛悍的性格特点。特别是周身细线鳞纹刻画得更为真实生动，使这个庞然大物在形体笨重中显露皮毛粗厚的质感。

石犀的右前足的底板上，刻有铭文数字，已漶沕不清，现尚留“□祖怀远之德”字样，查阅《唐书》似应为“高祖怀远之德”。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遗留的一件纪念物。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78. 李寿墓石椁

唐　贞观四年(630)　椁长354厘米，宽187厘米，高195厘米。1972年陕西三原县焦家村出土。



此石椁由顶、身、底三部分构成，椁顶雕成歇山式三间屋顶，由四块青石合缝组成，屋面以浮雕筒瓦覆盖，瓦沟深陷，屋檐雕刻莲花纹瓦当。椁身由八个立柱与八块青石板组成，外形基本和唐代出土的其他石椁相似，都作建筑物状，只是较其他石椁在正面多开了一活动的小门。椁外用减底平雕并绘彩贴金有排列整齐的衣冠人物，有捧笏的文臣，有柱剑的武将，还有执戟的卫士和骑龙驾凤的仙人等，雕刻手法特别朗阔雄壮，人物比例刻画得当，仪态轩昂，服饰清晰，刀法简练、概括。椁内石板阴线刻有多组的侍应宫女，她们手中均捧各种必需的生活用器。还雕有一队乐伎，每人手执不同的乐器，有笙笛排箫，有琴瑟琵琶，启奏着悠扬动听的声乐。更有一组舞袖长拂，舞伎翩翩画面。内容丰富，是死者生前豪华生活的写照，也可能是刻绘者依照墓主人旨意命题的。这批少见的仕女画，细线运转婉曲潇洒流利自如，刀笔准确，可称佳作。椁底由四块青石板组成，周边刻以团花及十二生肖等线画，刀法洗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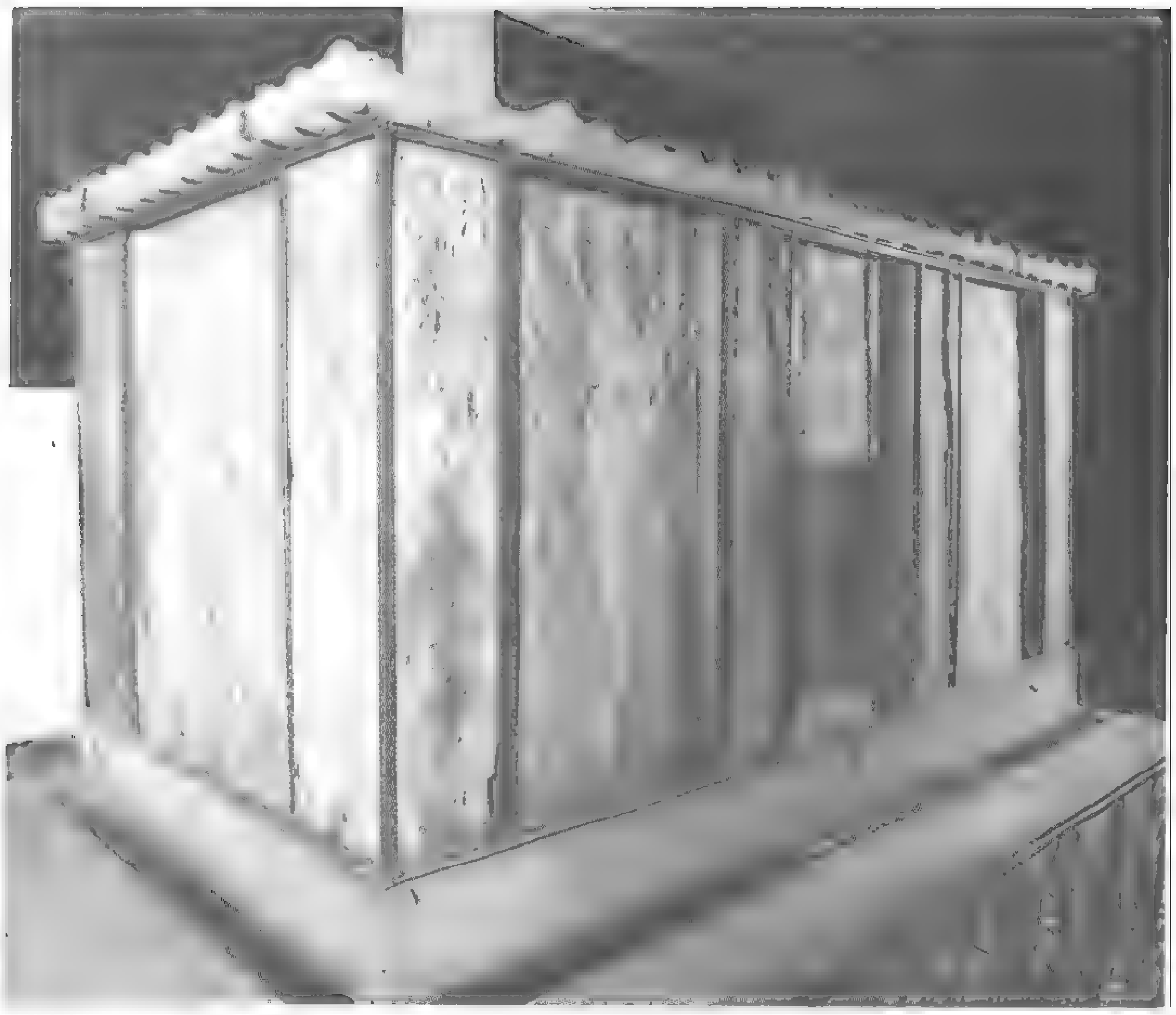
总之整个石椁雕刻华丽、雄伟、气魄壮观，在已发现的唐代石椁中别具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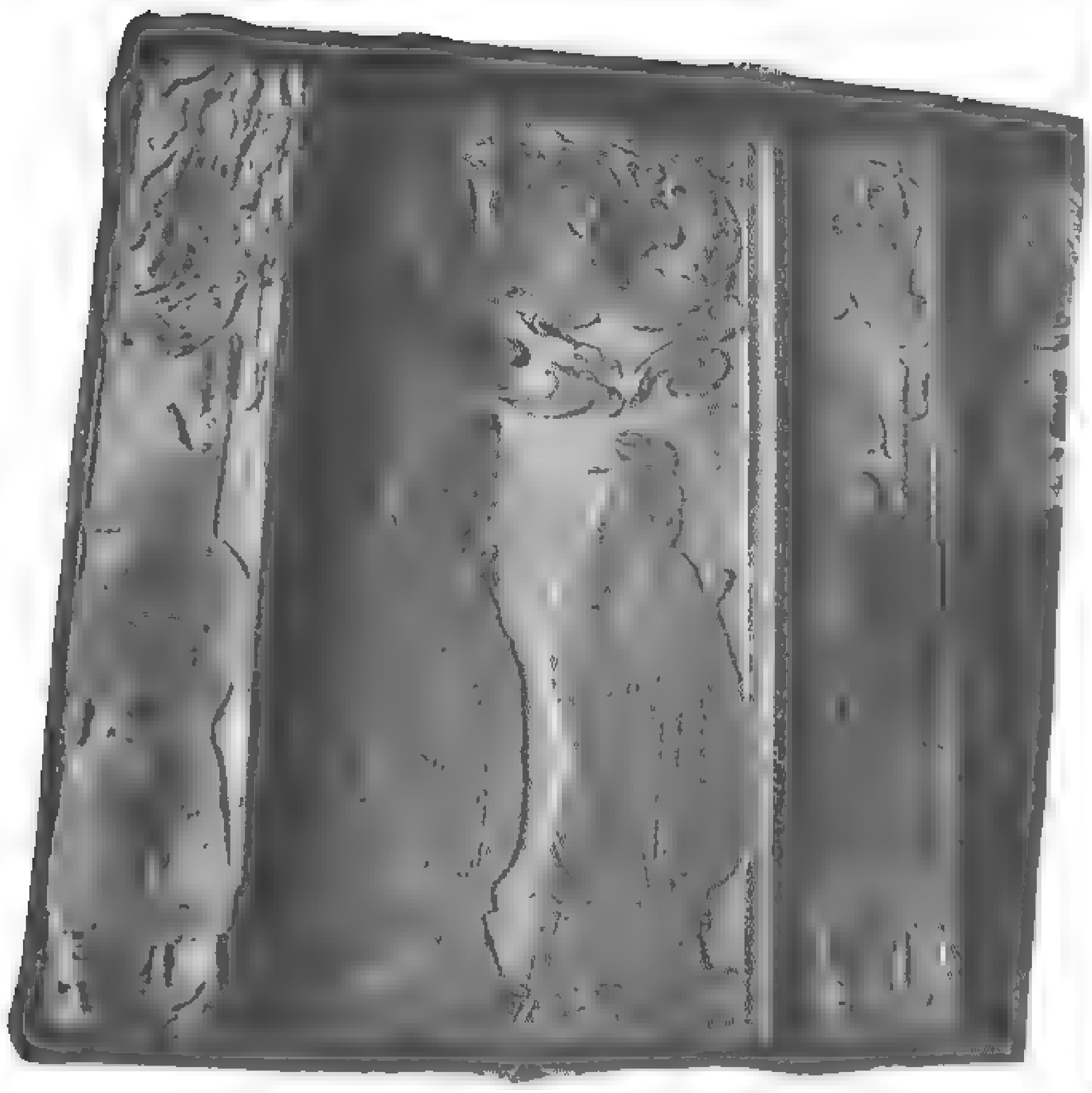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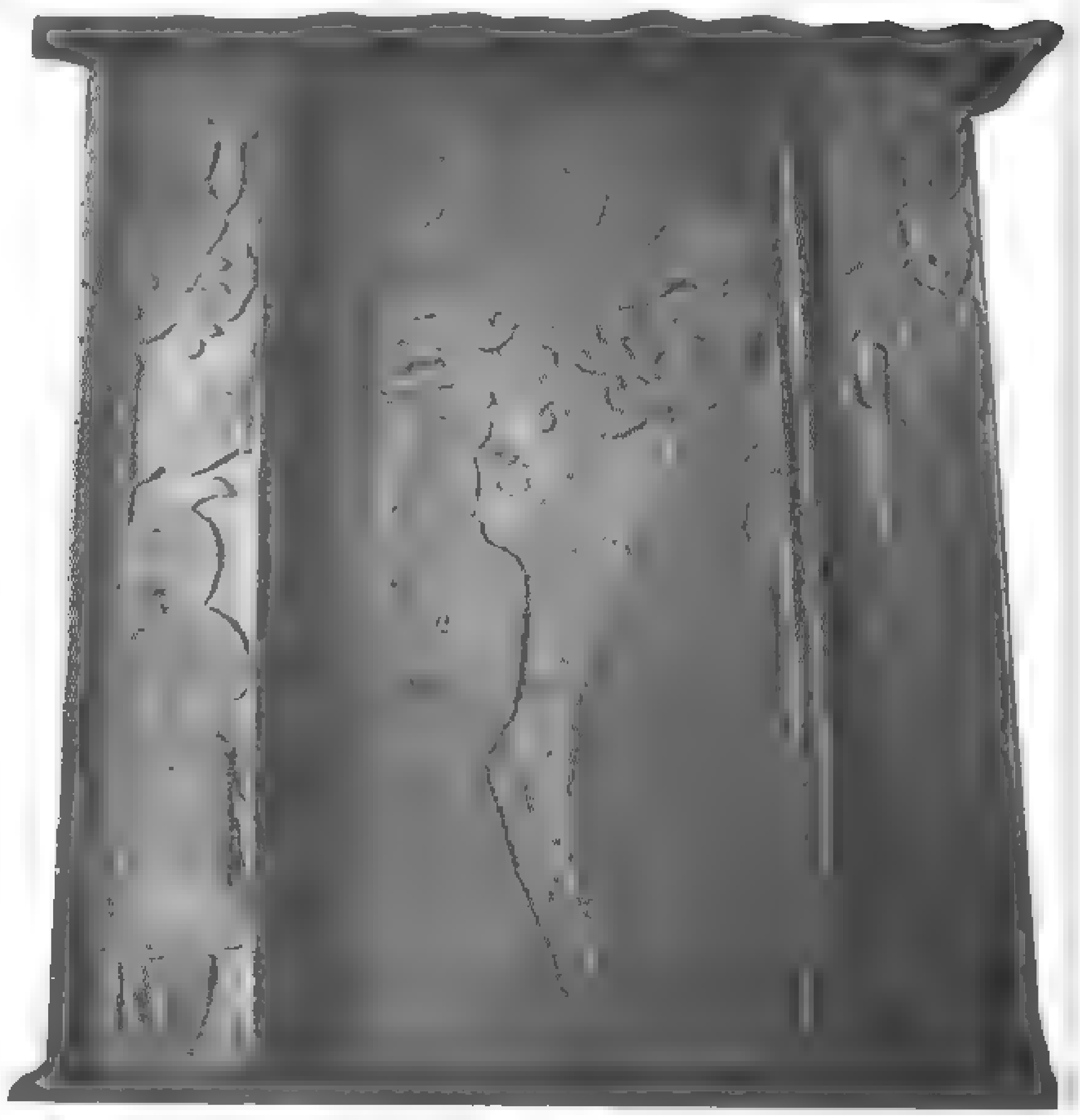
79. 李寿墓墓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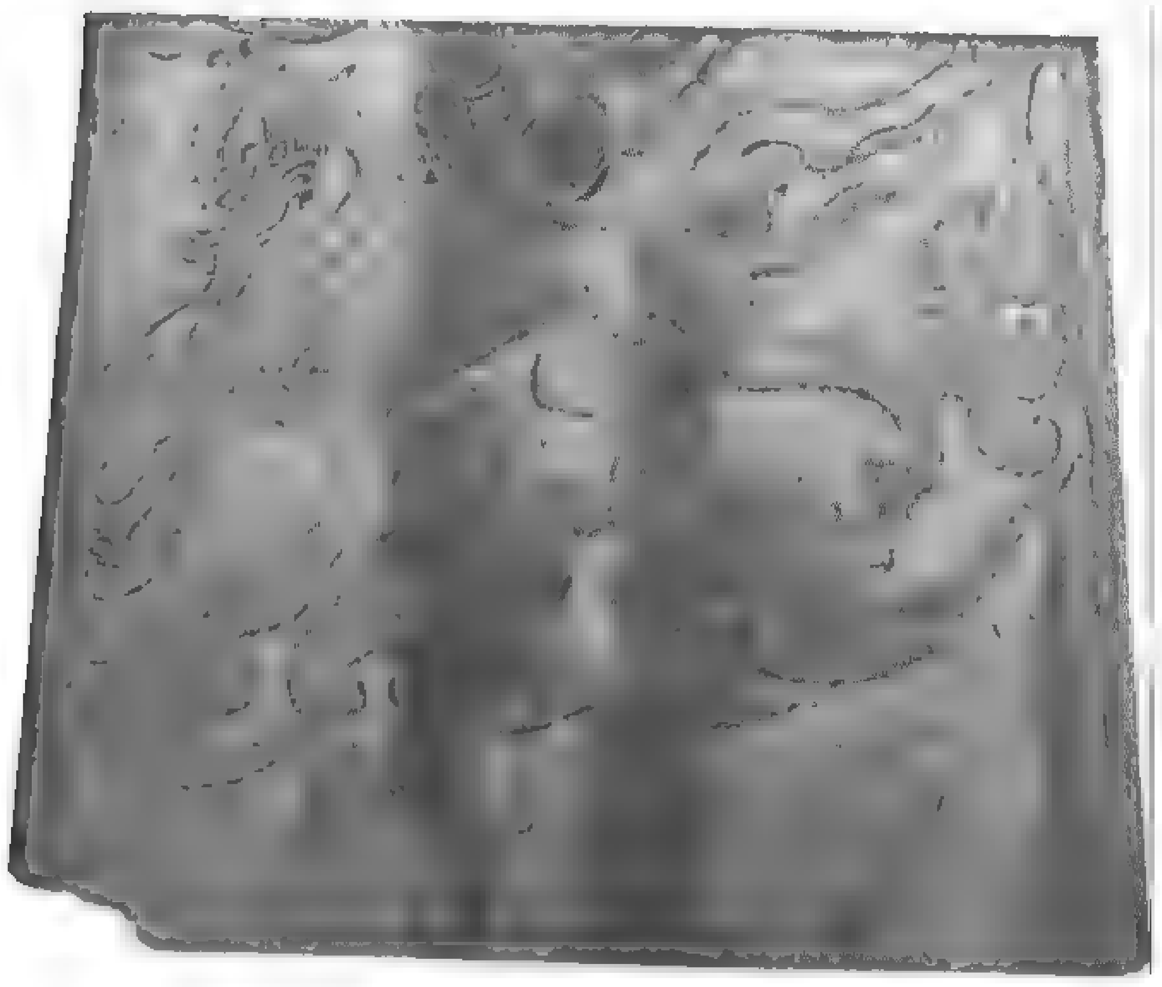
高 204 厘米，宽 18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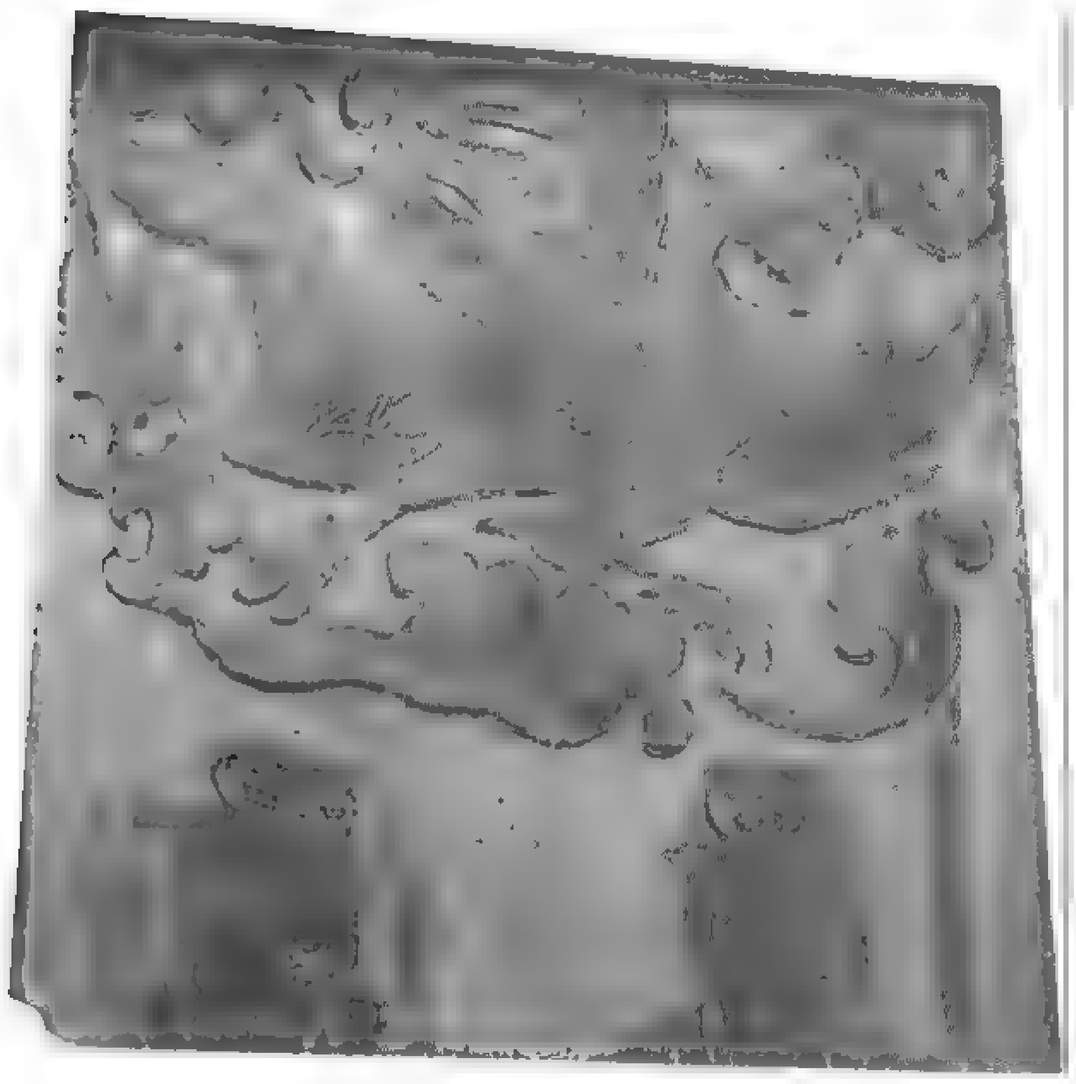
墓门完整无缺，是由门楣、门扇、门框、门槛、门墩石等部分组成。门楣为浅浮雕贴金绘彩的大兽面，气势威严。双扇门扉外以减底平雕的手法，雕凿成一对朱雀凤冠高耸，长尾翘起，展翅欲飞和一对翘着华丽长尾站立的孔雀，都是两两相对，其造型简练，姿态优美。门扉背面为阴刻天王像，面目狰狞，威武魁伟，线条流畅。门框及门槛为平雕双波纹及单波纹海石榴及蔓草。门墩石上刻昂首挺胸、耸耳张口卷舌的双狮，狮身毛纹均以阴线条刻画，狮座上线刻忍冬、动物等纹饰。整个墓门装饰，显得既华丽又森严。这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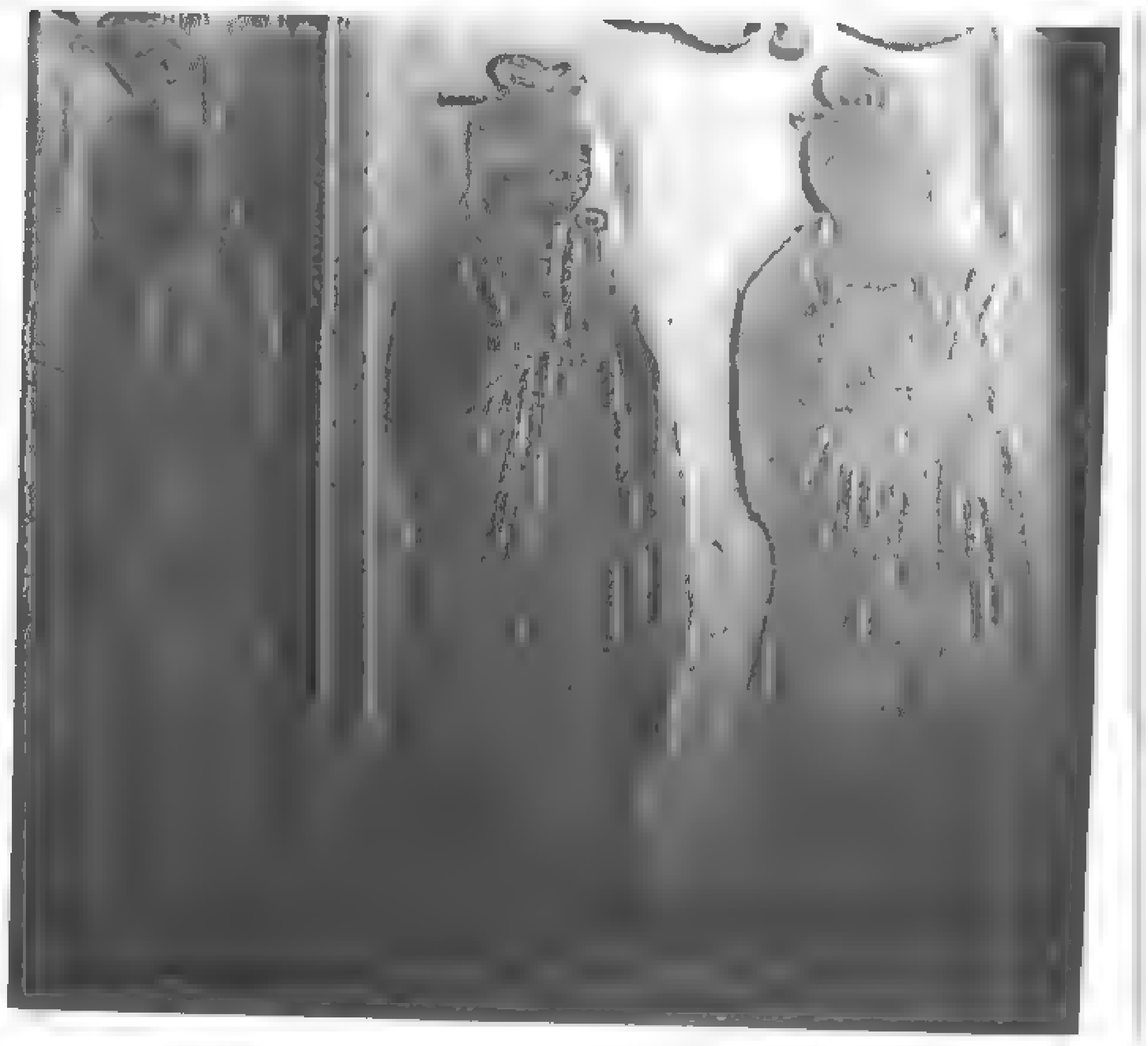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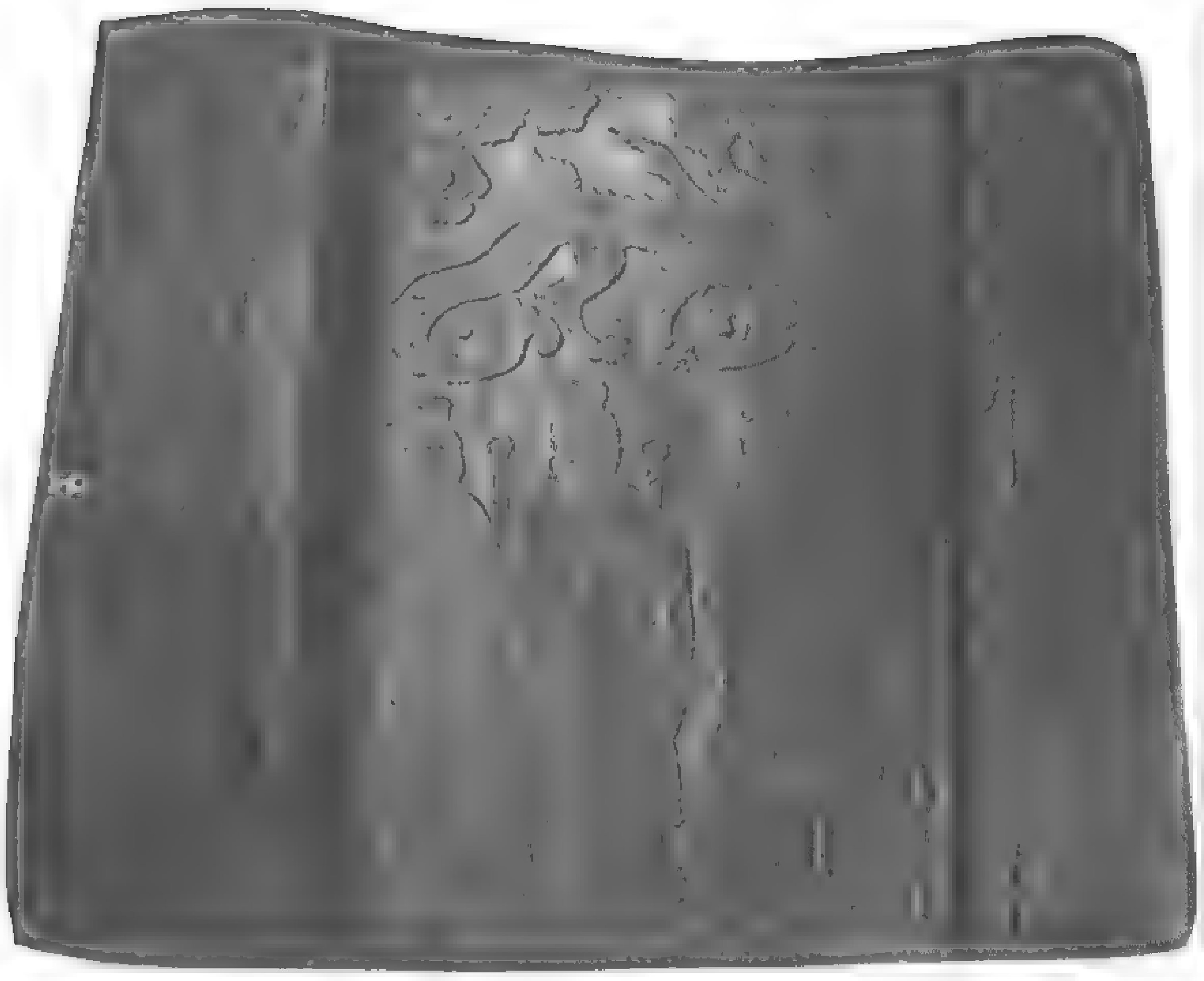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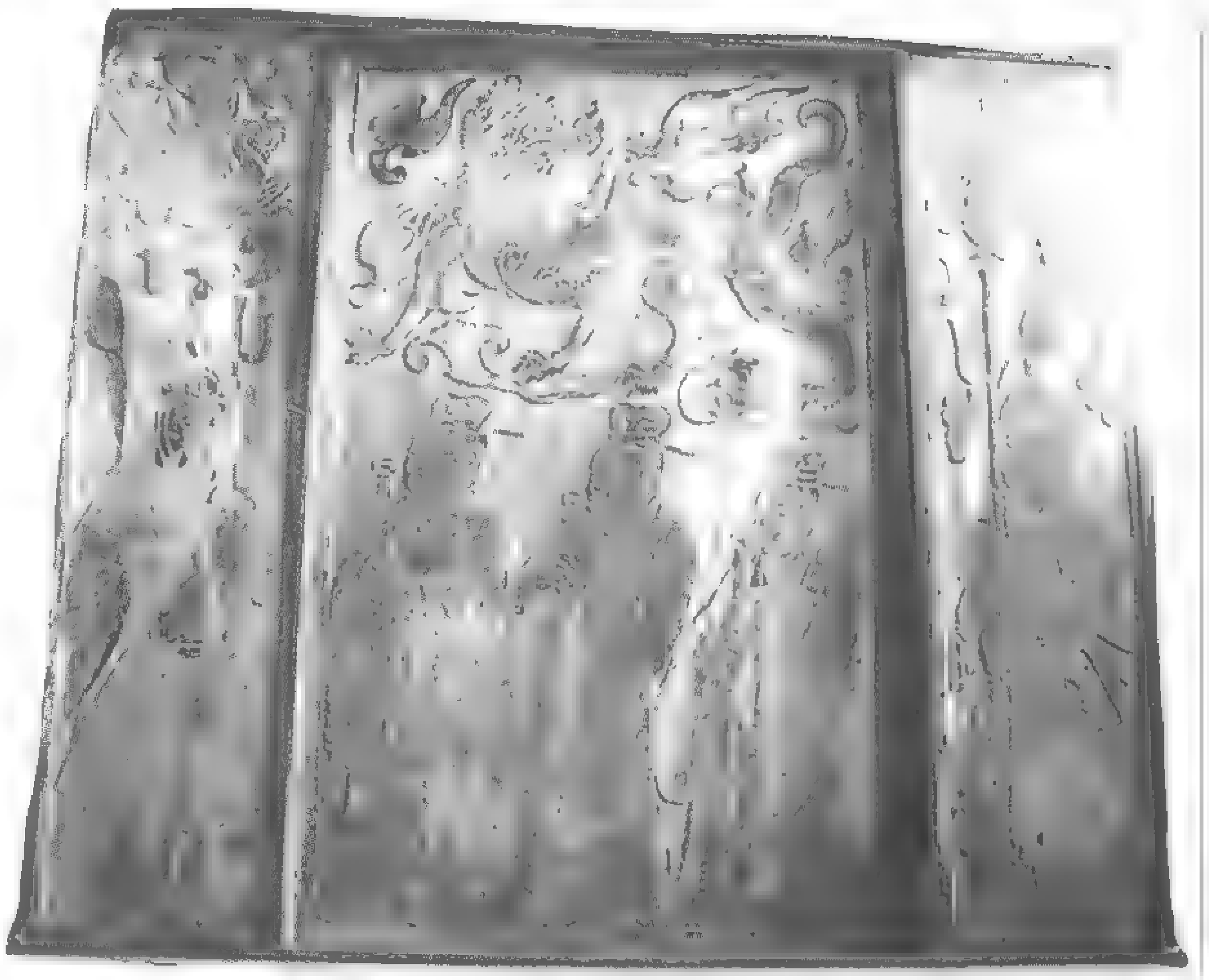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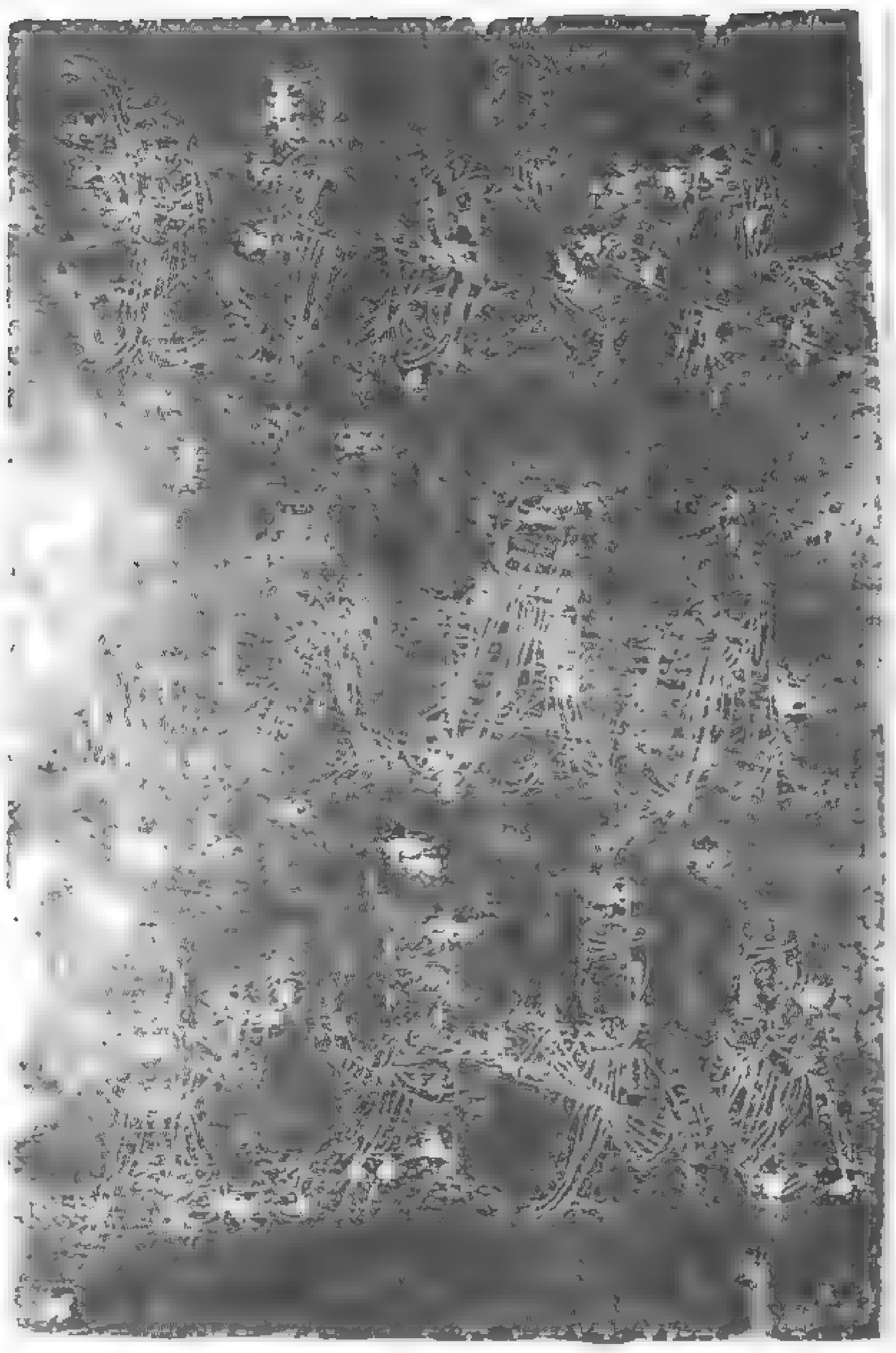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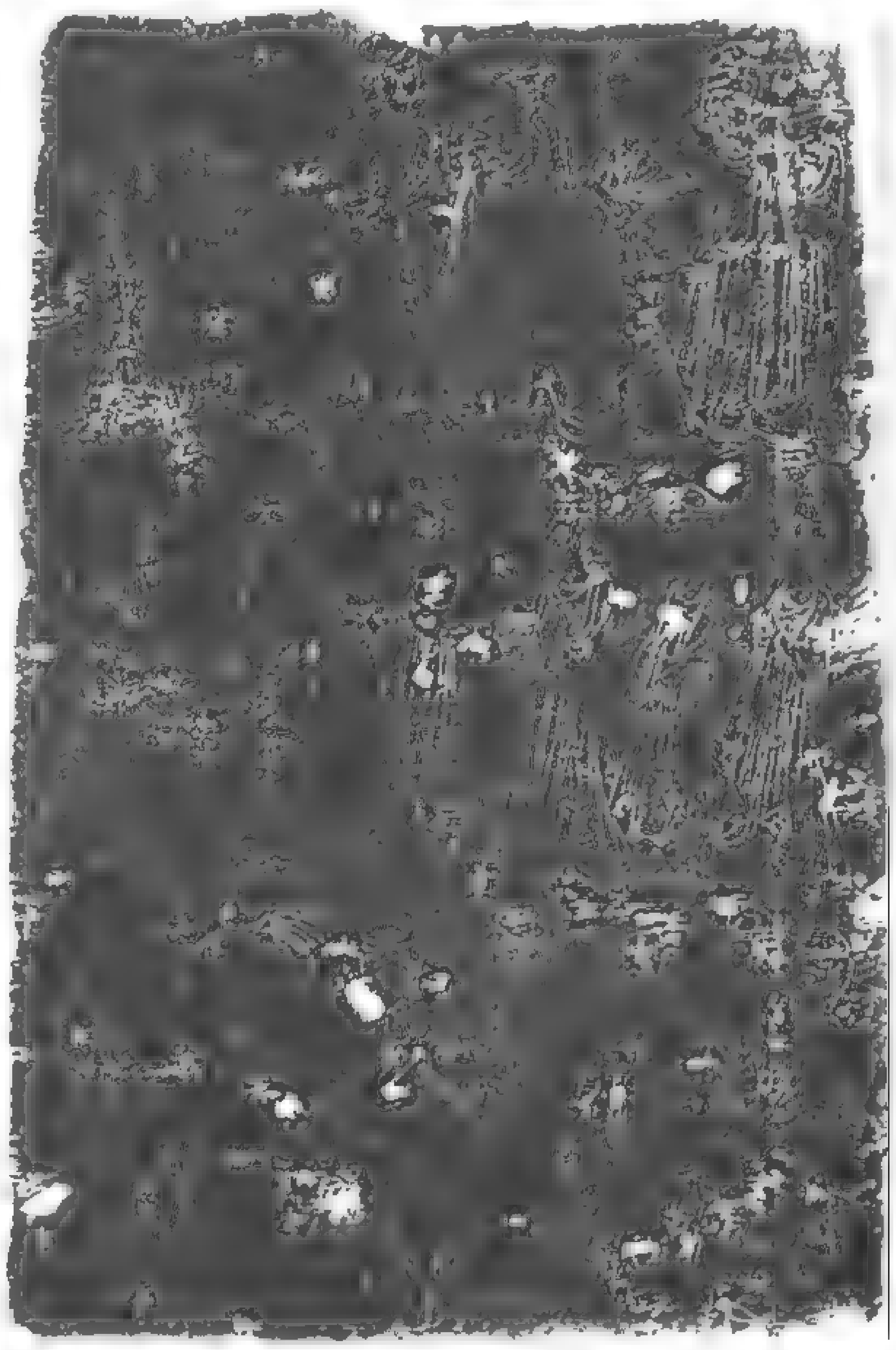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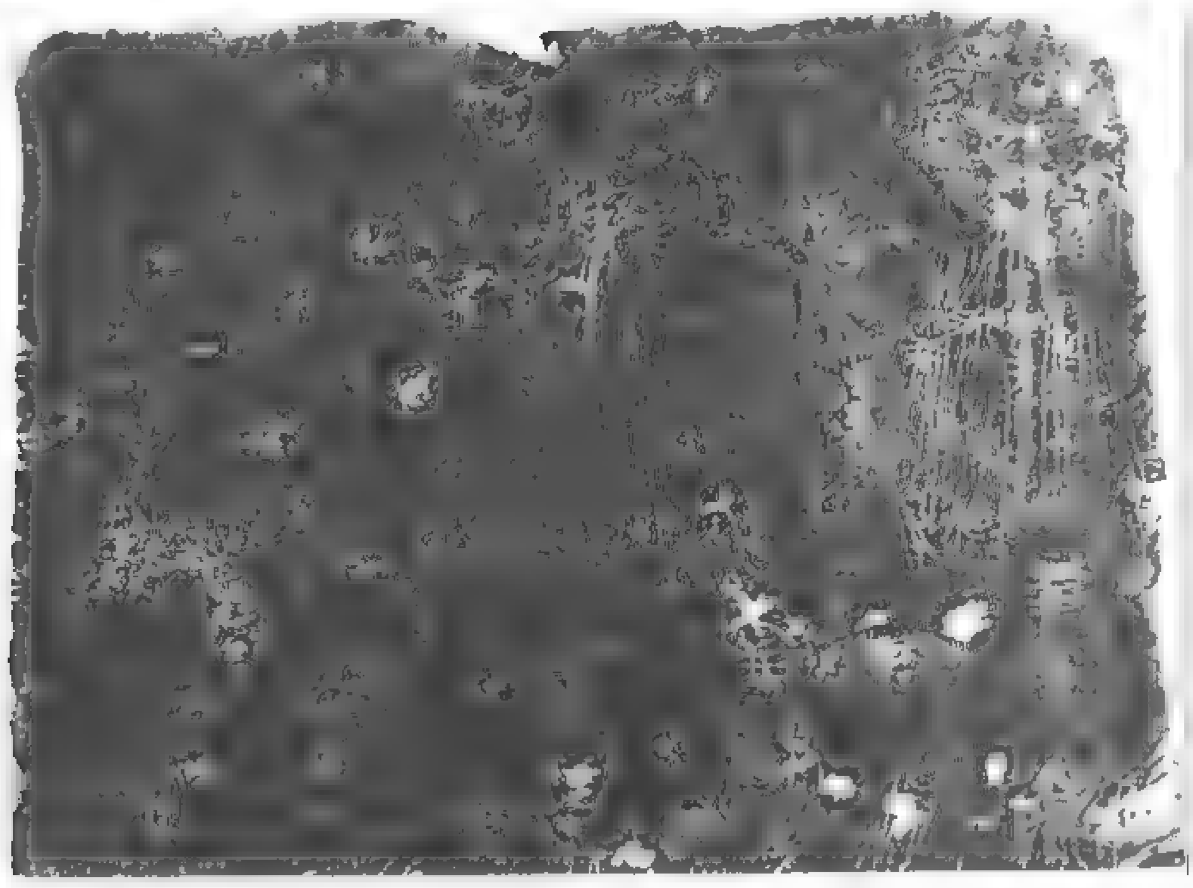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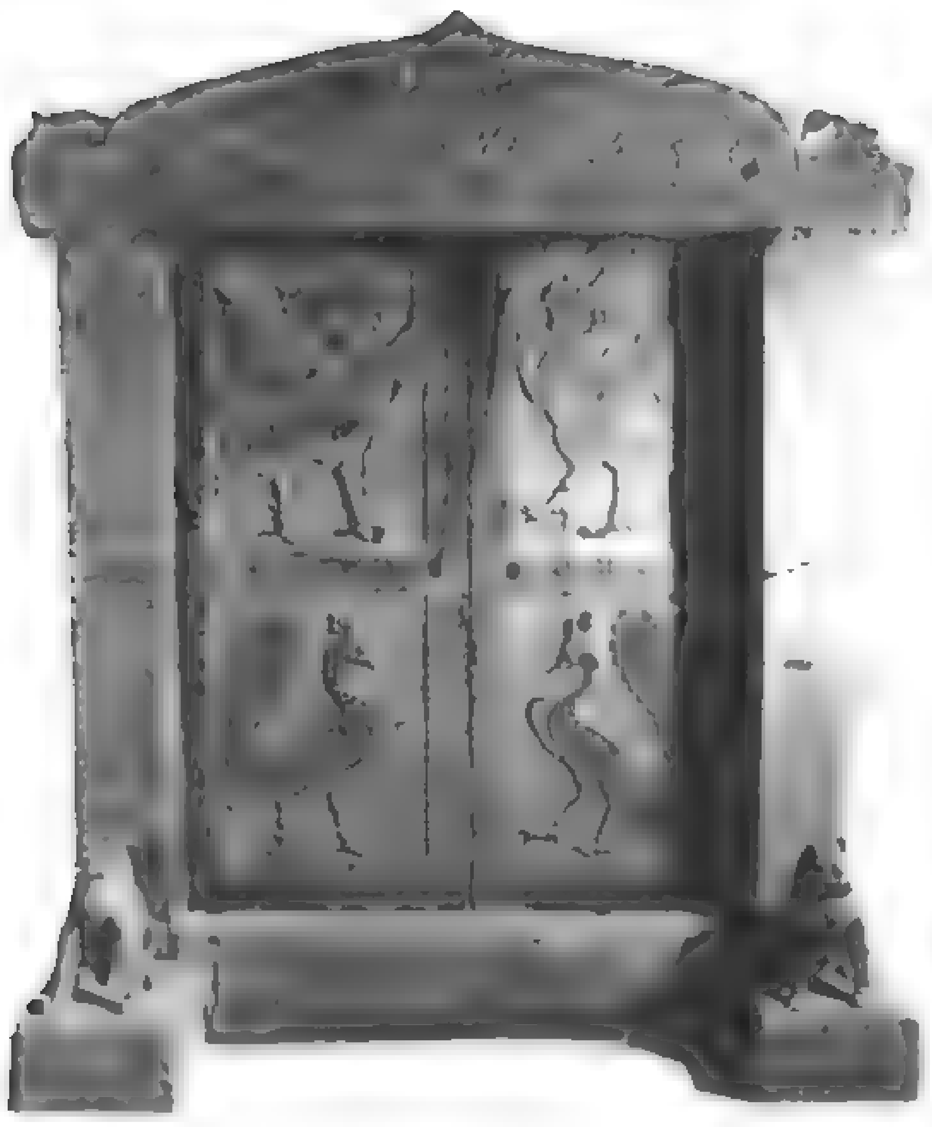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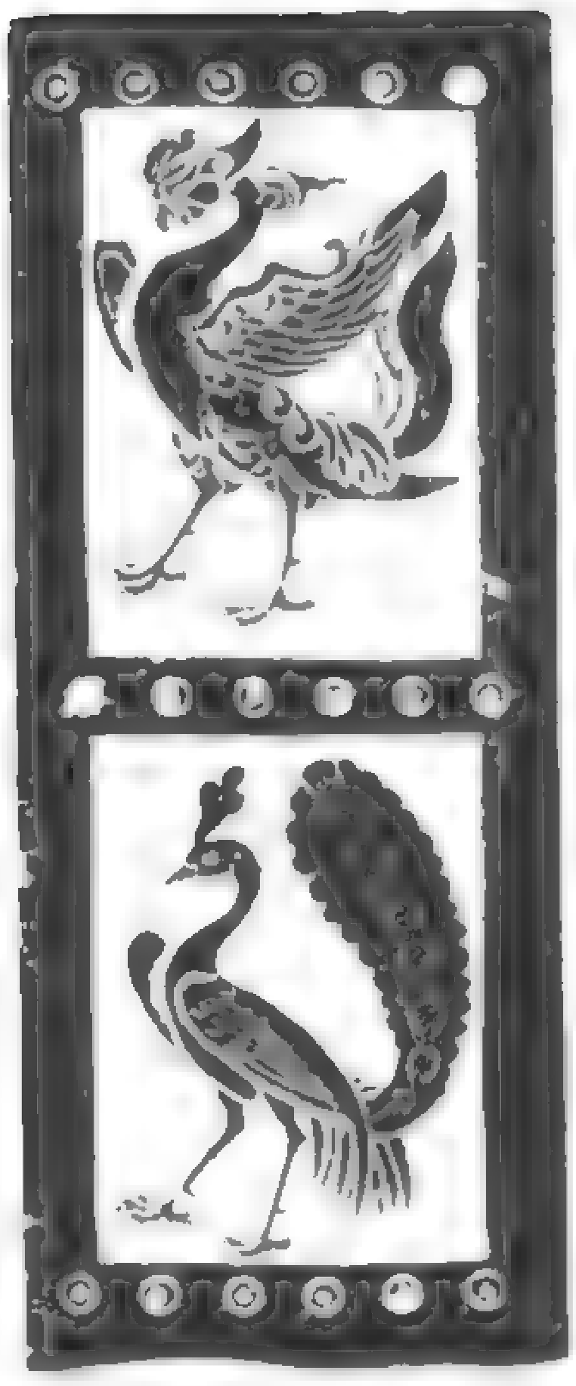




品同李寿墓石椁一样，是经过了巧妙构思设计并加以夸张，以实际生活中的“人”和想象中的“神”、“动物”互相结合构成图案，企图以达到护卫死者的目的。这充分地表现了唐代雕刻者的丰富想象力和表现技巧，均是可称赞的。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0. 献陵石虎

唐 贞观九年(635) 高 209 厘米，长 236 厘米。原在三原献陵，1959 年移存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此件石虎是唐代第一代帝王唐高祖李渊献陵前的石兽群中之一。

中国古代帝王陵前雕置石兽，作为护卫，据文献记载始于春秋时代。但历经战国、秦汉，除少数地方官的墓前有兽外，迄少发现。现有实物可见的，最早有陕西城固张迁墓石兽一对，惜已残损。其次有南朝萧齐、萧梁陵前遗留有巨型立兽一件。在陕西扶风的隋文帝杨坚墓前据说也有，但今已无一遗物可见。而唐代帝王陵墓由于远在深山，所有石雕除有倒毁外，多数至今仍然保留。这件石虎原在献陵共有四对，分守陵园四门，另有石犀两件，置放在正门(南门)，这种布局与以后唐陵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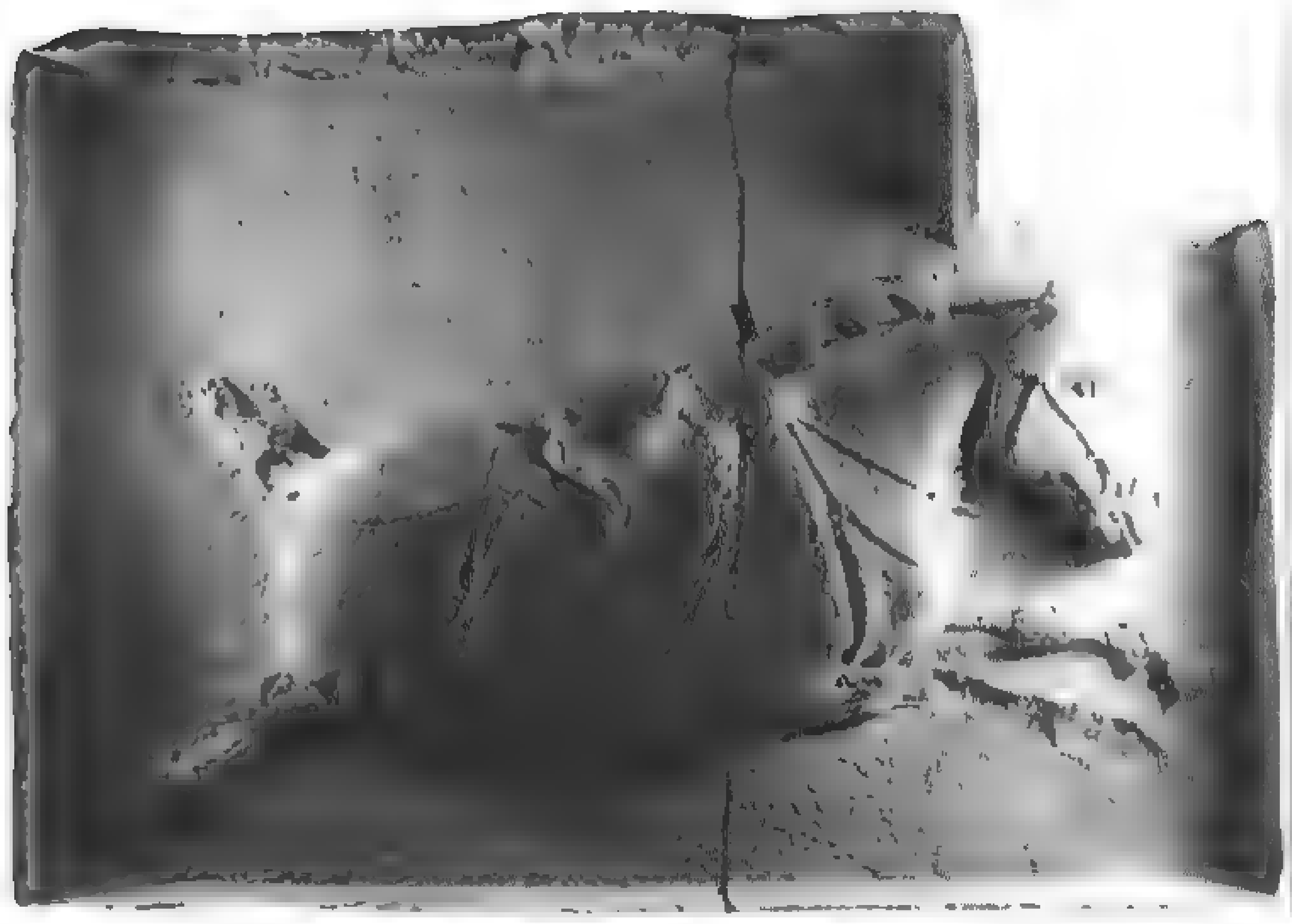
画虎和雕刻虎形，是我国古代一种习俗，人们认为虎可以驱除邪恶。《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山海经》有“画虎于门，当食鬼也”。《酉阳杂记》一书亦有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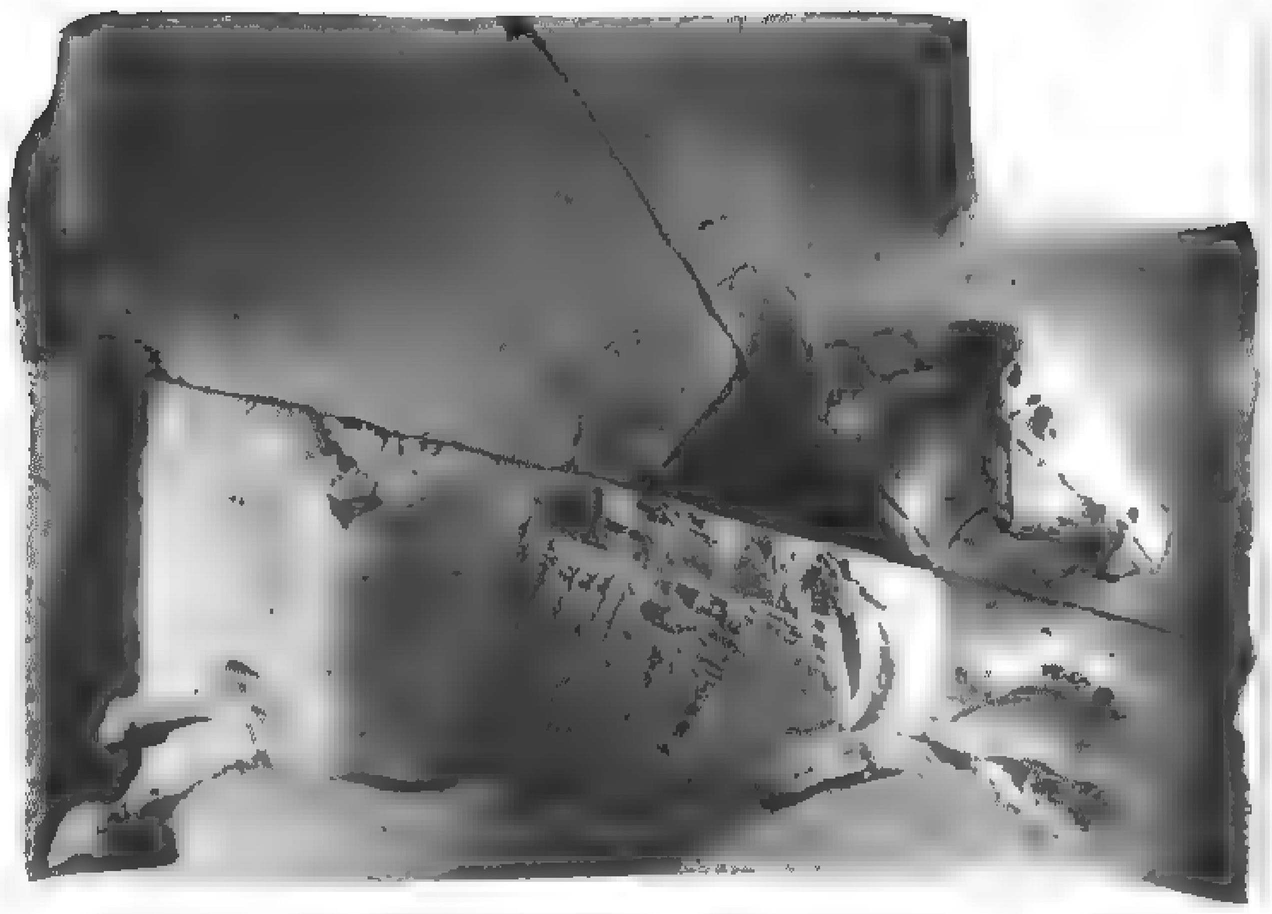
此石虎造型作行走动的姿态，躯体壮实，眼神凝视前方，两腮鼓起作机敏觅食顾盼的神态，尤其是头部的弧线和后腿上的折线，便把猛虎的毛茸、胫骨生动形象地勾勒出来，显示了虎的凶悍和威猛，蕴藏着很强的震慑力。雕刻者重点地刻画了虎的整体形象和神态，手法概括，强调了虎的外形特点，是唐早期陵墓上的卓越石雕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1. 昭 陵 六 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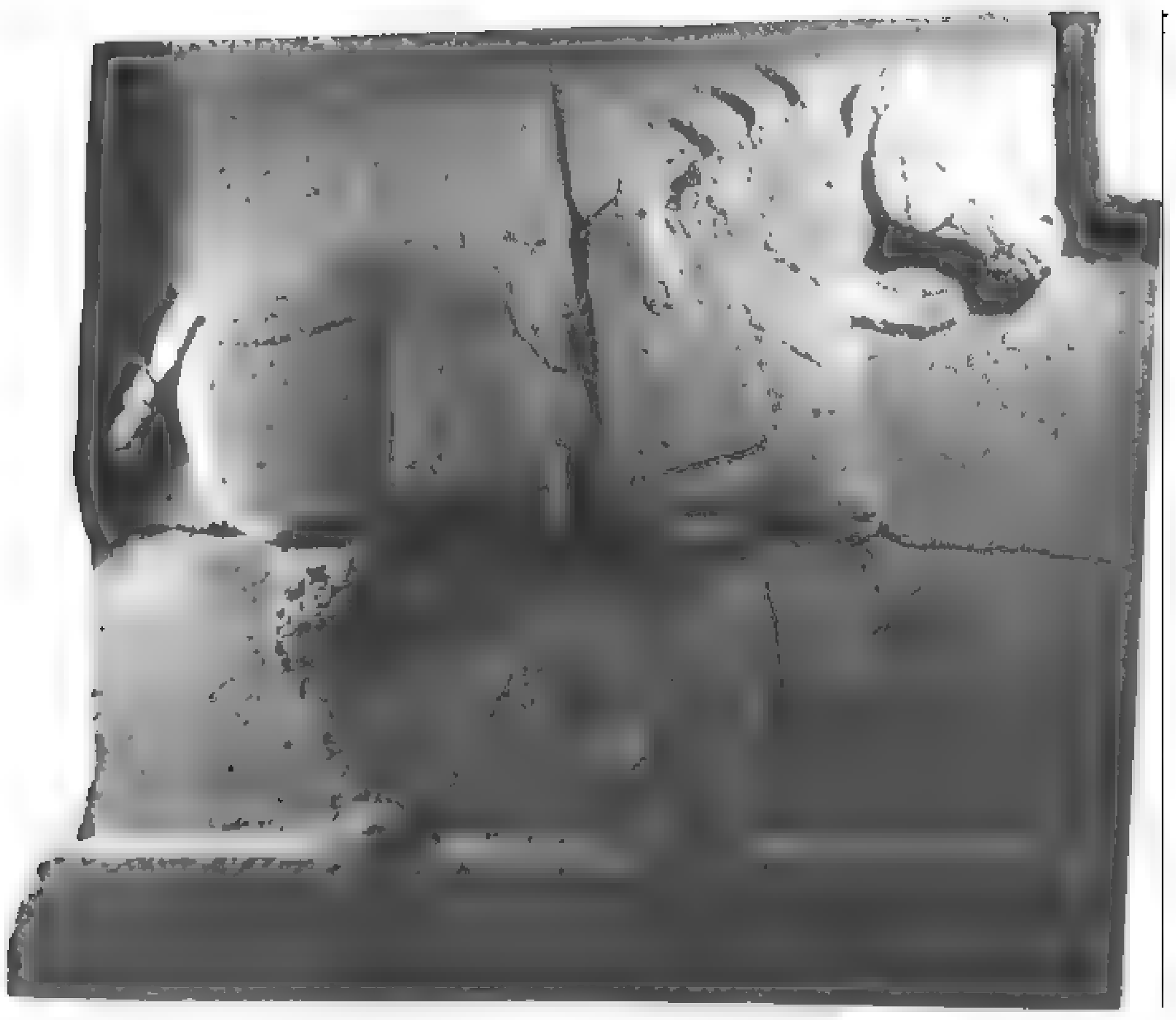
唐（636—649）　　六骏刻石各高 171 厘米，宽 205 厘米。1950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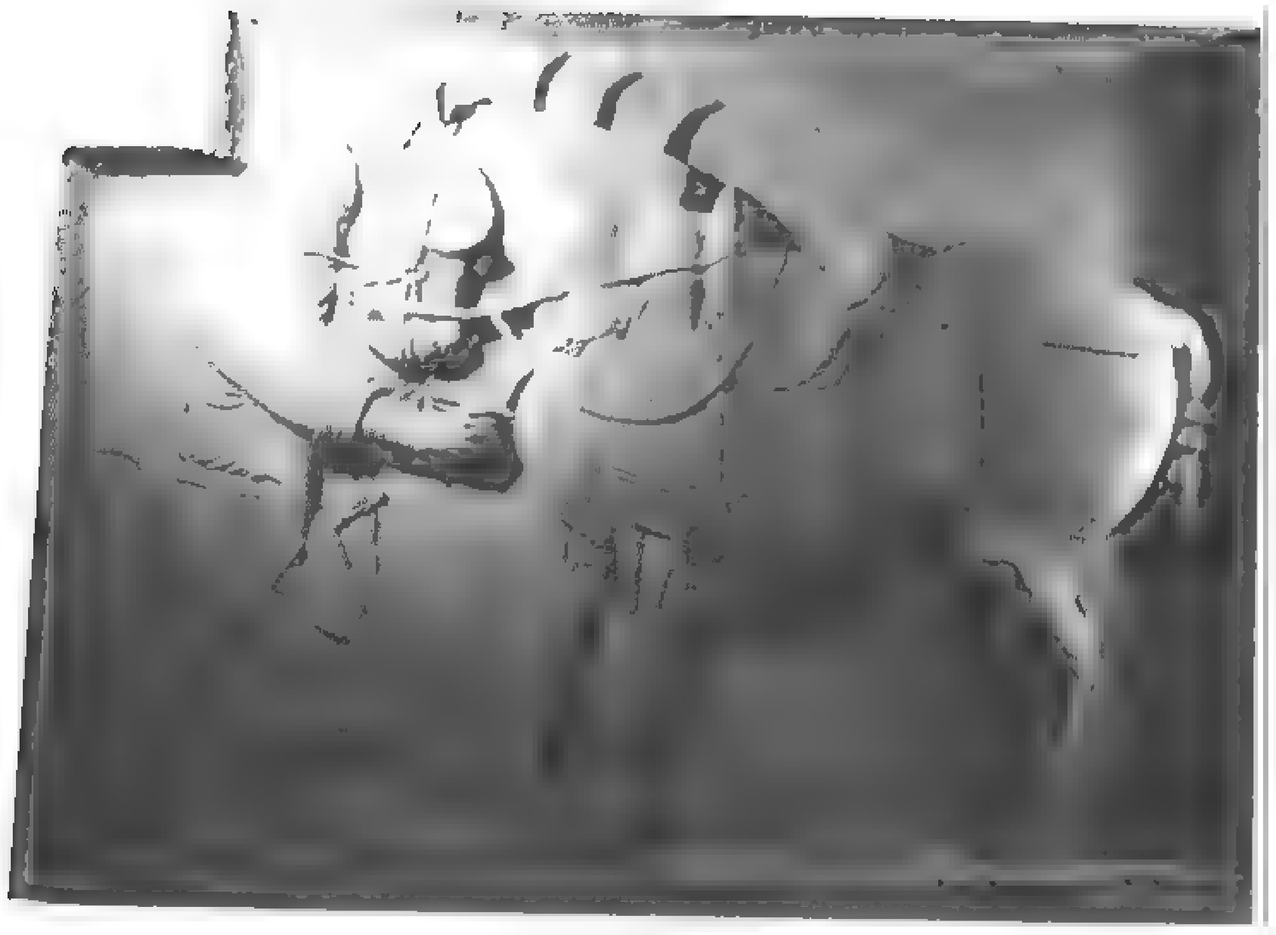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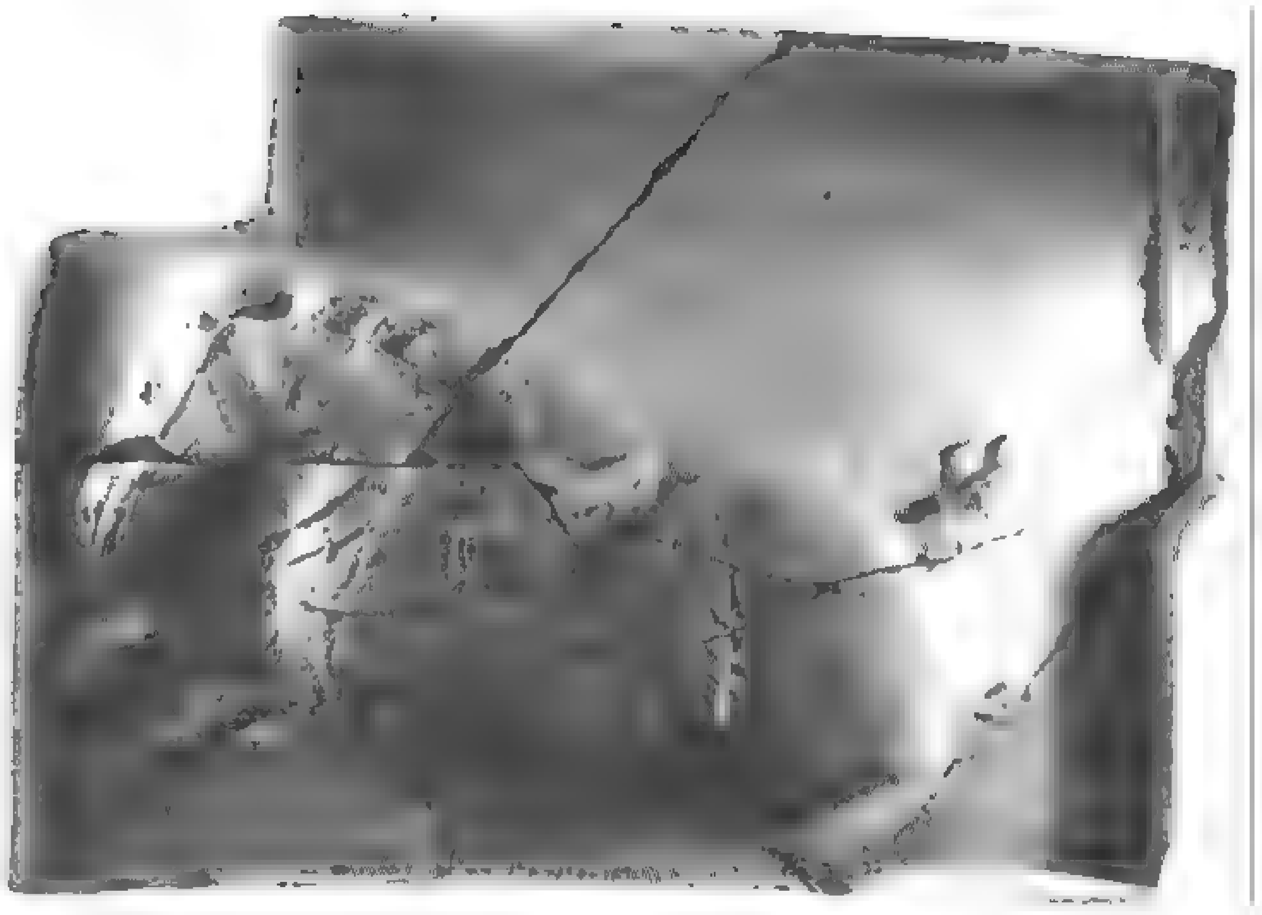
昭陵六骏原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皇后长孙文德皇后合葬墓昭陵上列置的。“六骏”是李世民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在建立唐王朝的征战中骑过的战马。据宋代考古学家游师雄的《昭陵图碑》（现存礼泉县旧县镇）载：它们名称是“飒露紫”、“什伐赤”、“青骓”、“特勒骠”、“拳毛䯄”、“白蹄乌”。这些骏马都曾随李世民冒风霜，临战矢，涉激流，越峻岭，纵横驰聘在广阔的战场上，为大唐帝国基业流过血汗。李世民为了追念这些骏马的战功，特令当代的高手画师、能工巧匠，为它们雕像，预置在自己陵山后阙前，排列的顺序：东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西为“飒露紫”、“拳毛䯄”、“白蹄乌”。这就是昭陵六骏的来历。

六骏石刻，是唐初名工艺家阎立德任营造昭陵的山陵使，经他的指导下雕刻而成，充分发挥了艺术家的智慧和才华。六匹马三匹站立，三匹奔驰，都





是体态壮硕，雄健有力，为唐代“西域”马的典型。雕刻家以简洁的手法，准确的造型，生动而突出地刻画出了马的雄姿、筋骨、性格。其中“飒露紫”是表现在战阵上受了箭伤，内侍从丘行恭为之拔箭一刹那的状况；马的胸前突起，前肢挺立，后肢稍向后坐的微妙神态。雕刻家在处理这一动态时，首先是理解到了马因拔箭所感到的疼痛、紧张然后做出倒退的姿态，同时又能观察到勇敢的战马的神态，从而表达出其刚强坚韧的素质，很好地表达了动物疼痛和战马坚强间的矛盾，逼真地刻画了名马非凡的形象。另一名马“拳毛䯄”（石刻腿已部分残缺），是作走动的姿态，神态自然，显得生动真实，全身驱体，四肢以及关节肌肉的解剖比例，都刻得非常匀称合度，生动传神。唐代有很多的画马名家，如曹霸、韩干等，都是长于写生皇室“御马”的。据说有一次韩干学画马时，唐玄宗李隆基要他拜陈闳为师，他不愿意，对玄宗



说：“陛下厩里马尽可为师。”而阎立本、阎立德更是以实物为师，工于写真。

这六匹名马显然也受到了绘画题材的影响，只是它的立体感与质感却不比绘画丰富。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等造型特点，鲜明地呈现出奔驰飞腾的动态，给人以疾驰如风的印象，与唐太宗骏马赞中“足轻电影”、“朱汗聘足”、“追风骏足”等形容吻合。特别是马奔驰中所露出的激喘神情与肌肉、筋骨的紧张状态，在什伐赤骏马的头部表现得非常明显。整个形体结构和健壮的体躯，都表现出了久经征战的战马应有的姿态。像这样富于写实的雕刻手法，如果雕刻家对良马的性格、动态以至肌肉解剖知识缺乏深刻的了解，是难以达到如此高深的艺术造诣的。至于在马的装饰方面，更为我们提供了参考资料。

“六骏”雕刻，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奇葩。令人遗憾的是，六骏现仅存四骏，1914 年，美国的毕士博与中国反动军阀奸商勾结，盗走了“六骏”中的“飒露紫”与“拳毛騧”，至今仍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其余四骏在 1918 年又企图盗运，已经击破装车，被陕西群众发现拦截下来，先保存在西安南院门今陕西省图书馆，后又移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2. 昭陵石狮

唐（618—907）　高 202 厘米，长 255 厘米。原在陕西礼泉县吴村，1959 年移存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唐代帝王连同他们的先祖，葬在陕西关中渭河以北山区一带的共约 18 座陵墓，占有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六个县长达约 200 公里的山区和高原，陵前的石雕造像，除极个别的仅列置少数以外，一般的其数量之多颇为惊人，如高宗李治乾陵，立有石刻约近百数，而且这些石雕群都是形体巨大，且用细质岩石雕成，雄伟壮观。这和东汉、南朝的陵前仅列置石兽一对、阙门或华表一对者，在数量上有着显著的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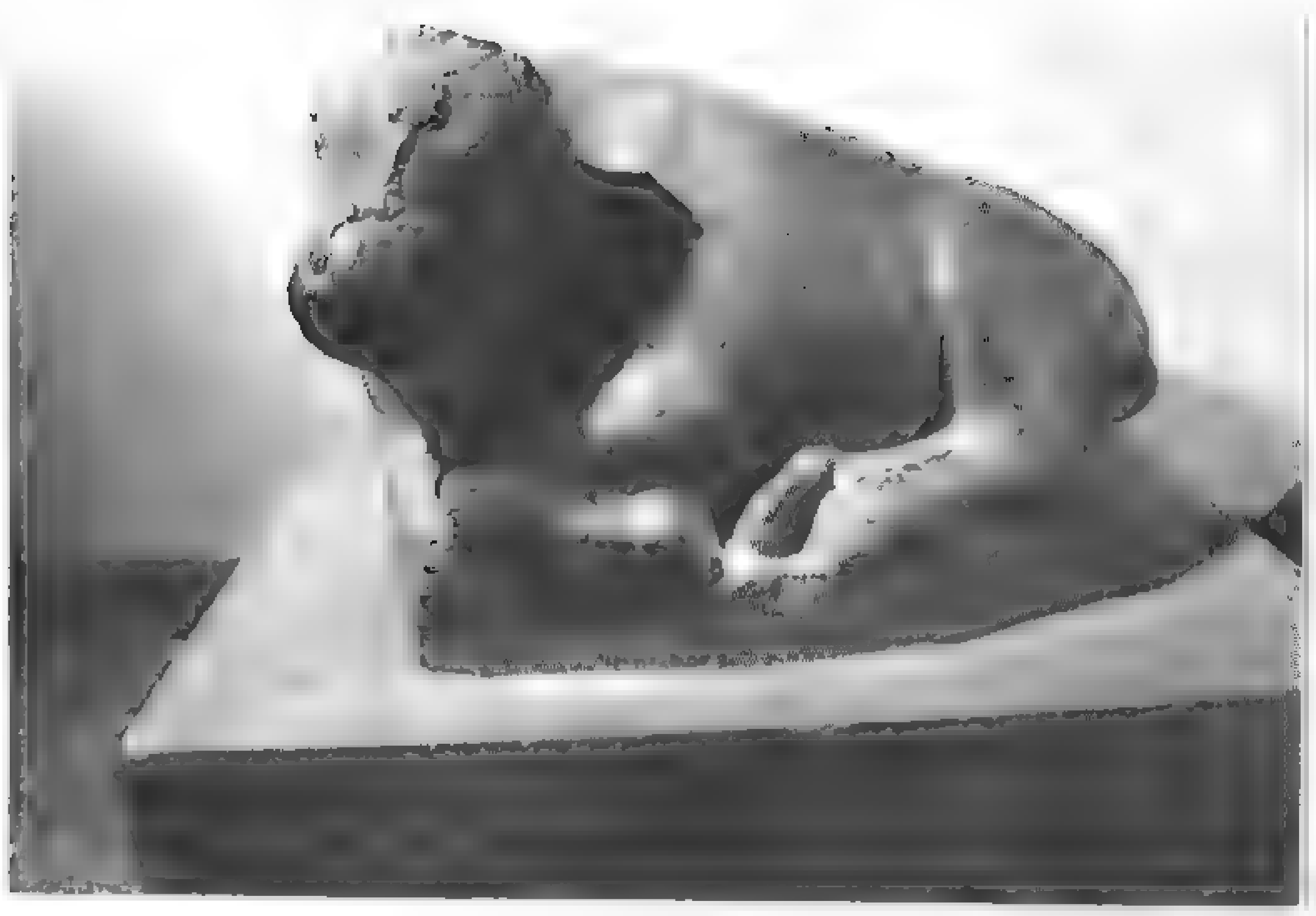
多，足以说明唐陵雕刻的丰富。在中国雕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葬地，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上，从山陵的形势上说，是唐代帝王陵中最高大的一座。就陵园讲，昭陵陵园（唐代称柏城），由于陪葬墓冢很多，范围也极为广泛，包括山北及山南部分平原地带，东西 12 公里，南北 10 公里。在此广阔的“柏城”范围内，所谓“原分山势入宫塞，地匝松阴出晚客。”（见唐代刘沧：《秋日过昭陵》）可知当日昭陵陵园范围之宏伟景象。其陵前石雕造像与其他一般制度不同，也许由于毁坏的关系，以致可以见到的除今仅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内的“昭陵六骏”浮雕以外，已可说无其他雕像可见。这对走狮原在礼泉县吴村，经研究可能是昭陵上的遗物。走狮雕刻比例匀称，造型生动，气派豪壮，狮子的项鬣和锐利肢爪等细部也显得刀法劲健有力，特别是雄狮姿态，全身长毛、侧首昂头、阔步怒吼的形象，正是唐代国力向上发展时期在艺术雕刻上的反映。雌狮身边残存训狮人的形象，虽不能见其全貌，但无损于整个雕刻宏阔完整的气派，属初唐一对富有写实意义的佳作。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3. 卧　牛

唐（618—907）　高 77 厘米。原在陕西乾县西湖村卧牛寺。1960 年移存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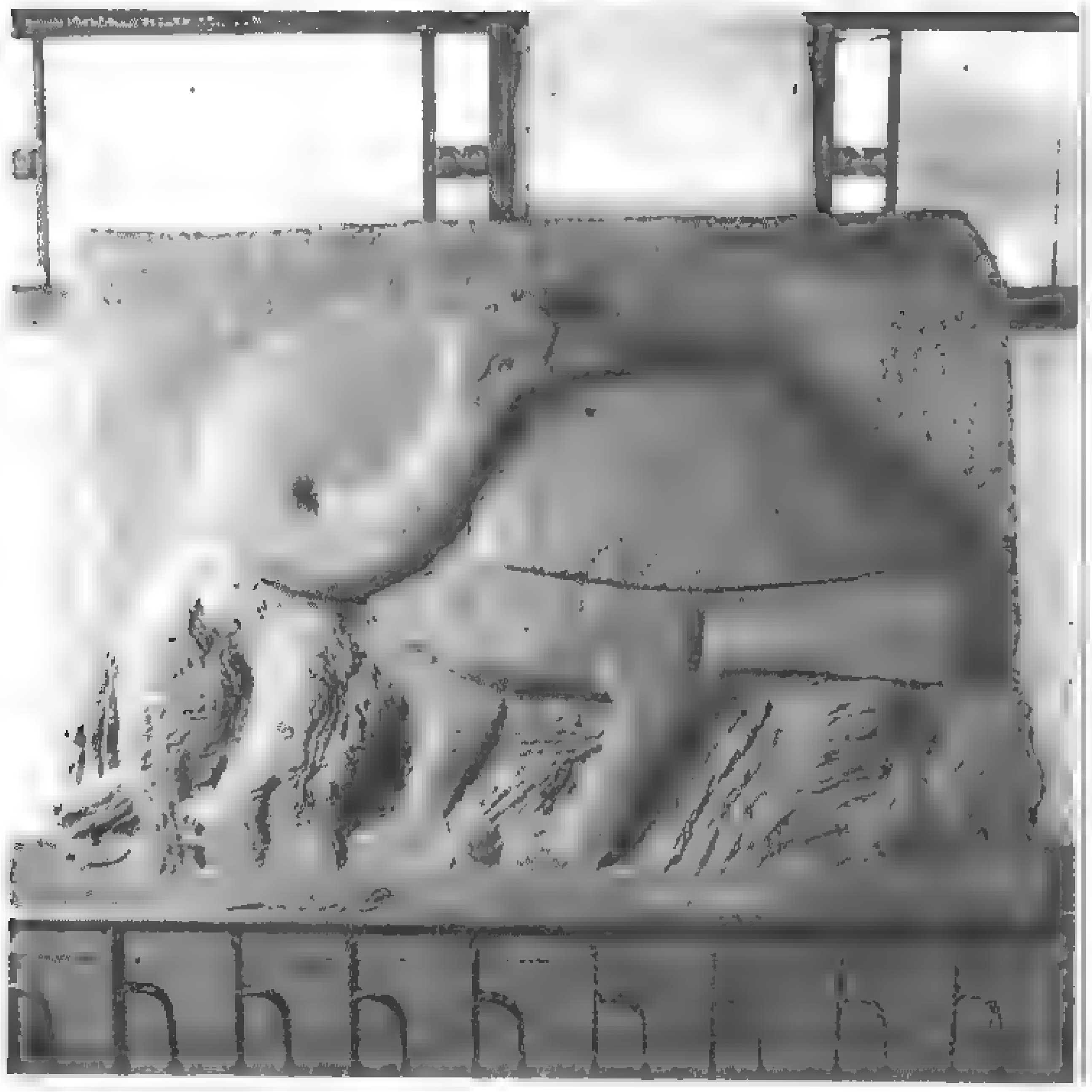
牛从古代以来，就是农耕和运输上的主要动力，根据我国考古学者依考古资料及出土文物判断，在我国利用畜力耕田作为动力和以牛耕的起源，至少开始于殷代武丁与帝乙之间，即约有 3200 年左右的历史。所以在汉画像石上常常见有以牛耕田和驾车为题材的雕刻，隋唐墓葬也曾见有色彩鲜艳、体质雄健的牛耕壁画以及造型生动的陶牛和三彩牛拉车等葬品。到宋代还发现用铁铸大型的牛，立在河边或水池旁似有镇水之意。明、清两代更以牛的形象制作成各种类型的工艺品。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现存明代以物理上的虹吸原理，制作造型新颖的铜牛喝水文物等。都说明了牛的形象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受有崇高的地位。

这件唐代雕刻的石卧牛，原放置在乾县西湖村卧牛寺内，以牛置放寺内，很可能与该村旁西湖水有关。从牛疲困的眼神，微曲的项背，翘尾屈肢侧卧的姿态观察，像是它正喘着气，刚刚躺卧下来休息的形象，真切地体现出了牛的质朴、坚毅浑厚的性格和勤奋耐劳的精神，是一件具有现实生活气味的艺术雕刻。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4. 端陵驼鸟

唐　会昌六年（846）　高 143 厘米，宽 212 厘米。原在陕西三原县唐武宗（李瀍）端陵前，1962 年移存陕西省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驼鸟盛属于热带鸟，我国远古亦产驼鸟，由于气候的变化现今已绝迹。陵前设置驼鸟起首于高宗乾陵，其用意：一是沿袭秦汉用朱雀表现吉祥的象征；另一是表现中外友谊象征，新、旧《唐书》都载有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吐火罗（今阿富汗）曾向唐朝赠送驼鸟的史实；三是沿袭唐代从高宗以后帝王陵前仪卫石刻的定制。而石刻艺术室陈列的端陵驼鸟，是浮雕在一块长方形石上，躯体作半就于山石之间，长颈浮在体上似在悠闲憩息的姿态，只是驼鸟整体雕刻喙长足短，与乾陵、桥陵雕刻的驼鸟相比，似欠真实。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5. 杨执一夫妇墓门线画

唐　开元四年（716）　高 185 厘米，宽 146 厘米。1951 年陕西咸阳市出土。

这套墓门是全部用线刻装饰花纹构成的。石刻线画是我国石刻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唐代石刻线画以构图富丽和刀法流利、线条细劲见长，类似“春蚕吐丝”，因为采用这样的线条形式，是与描写的宫廷式仕女题材内容很相融合的。这不仅能表现人物细致的动作和衣带装饰，而且也可助长整个画面优美纤丽的气氛，这种以内容要求来决定形式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在这组石雕墓门线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墓门、门扇上一面刻一位头梳高髻、身着衣裙、肩披薄纱的贵族仕女。另一门扇绘刻一高髻圆领窄袖双手捧盘的侍女。人物主妇与婢女，身份个性刻画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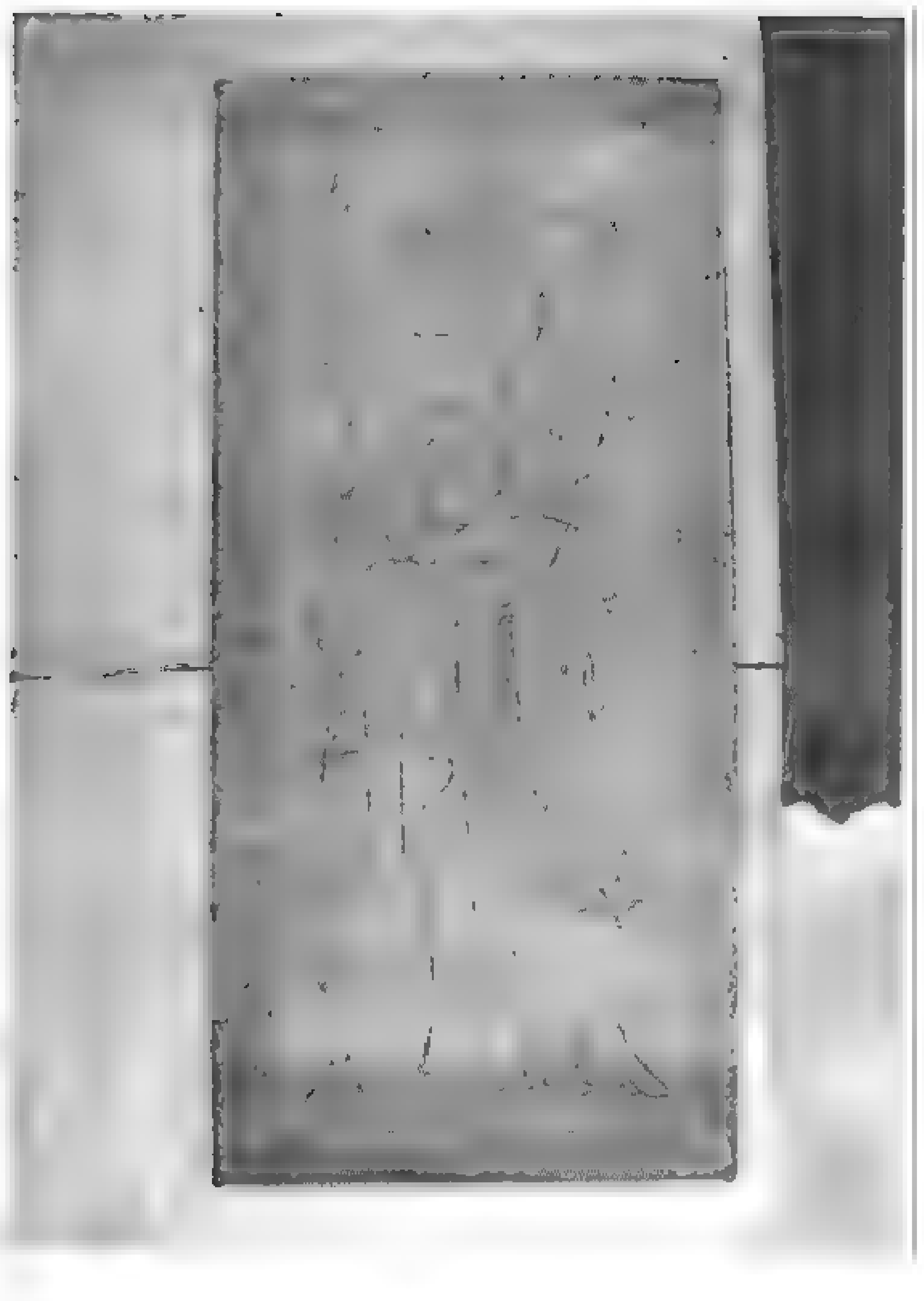
明。在线刻技法上比陕西省博物馆现藏韦顼石椁线画还显得纤细流畅，恰当地表现出了封建宫廷贵族的妇女性格。门楣刻装饰性图案，有双凤飞舞，卷草和宝相花，门框上刻单波纹连方宝相石榴花纹，是一组唐代有代表性的线刻艺术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6. 韦顼石椁线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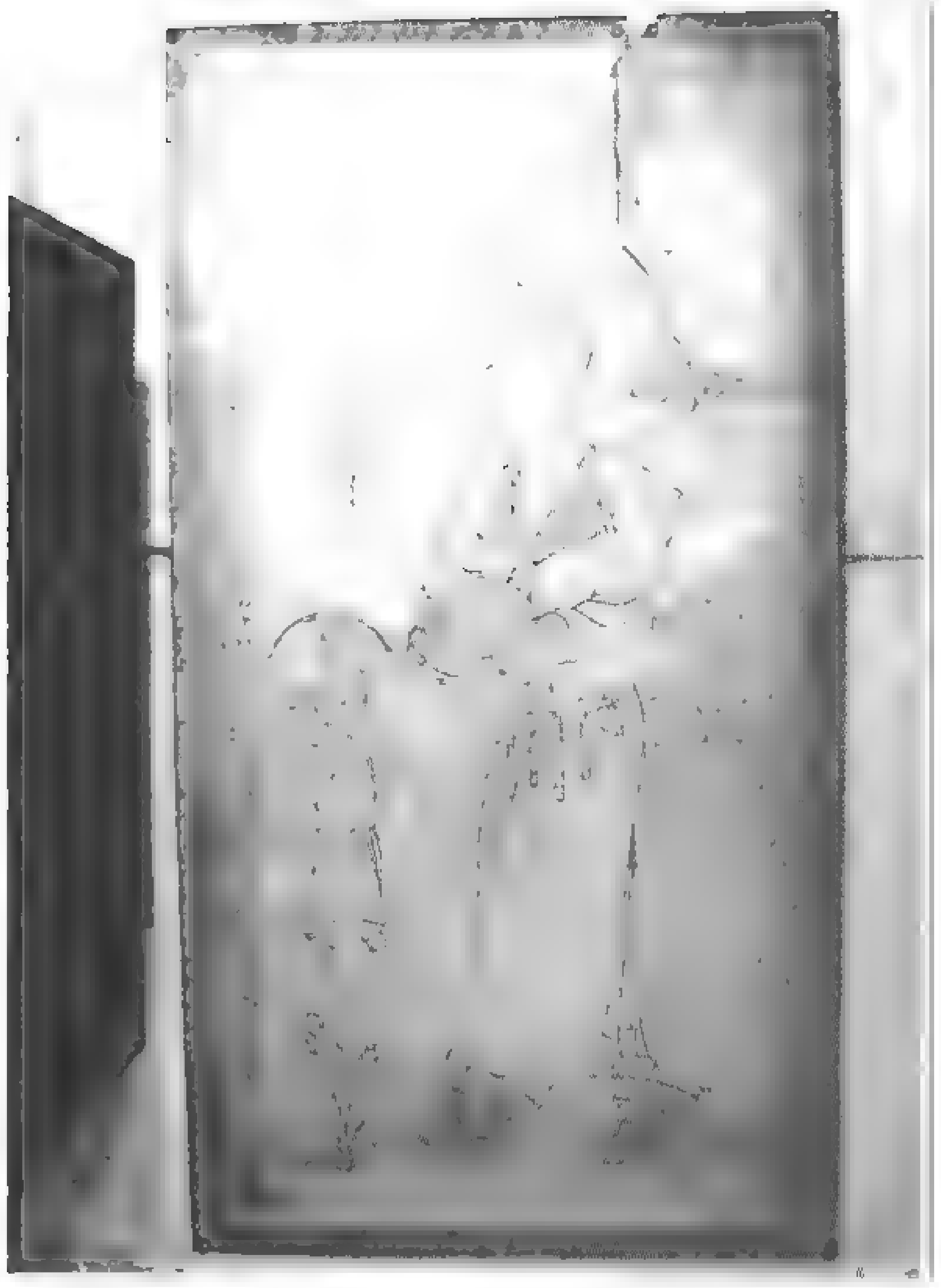
唐　开元六年（718）　1910 年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出土。旧存西安市湘子庙街，1952 年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据墓志记载：韦顼为唐玄宗时代的一个大贵族，死于开元六年（718），死后合葬于魏国夫人之旧茔。墓内除有墓志外，还有大型石椁，其上刻着精美的线刻画。这批石刻线画，共 14 块，其中 7 块一面刻，3 块两面刻。画面人物所雕全为描写墓主人生活的仕女人物，有捧盘的、持扇的、调鹰戏鸟的、捕蝶的。如其中的一幅雕出了一个美貌的青年侍女，手捧果盘，正在送向主人，其神态的活泼稚气而又显得明慧伶利的表情，深刻地刻画出一个青春少女无束的心理动态。又如另一幅线画，雕出中年主妇盛装的形象，其所表现的矜持神态和动作，与青年侍女适成对比。



这组石刻线画的造型特点，在于以优美的背景衬托和人物本身衣饰时世化装的明显突出。如在每一人物四周都雕出了细致的小花、小鸟，飞蝶、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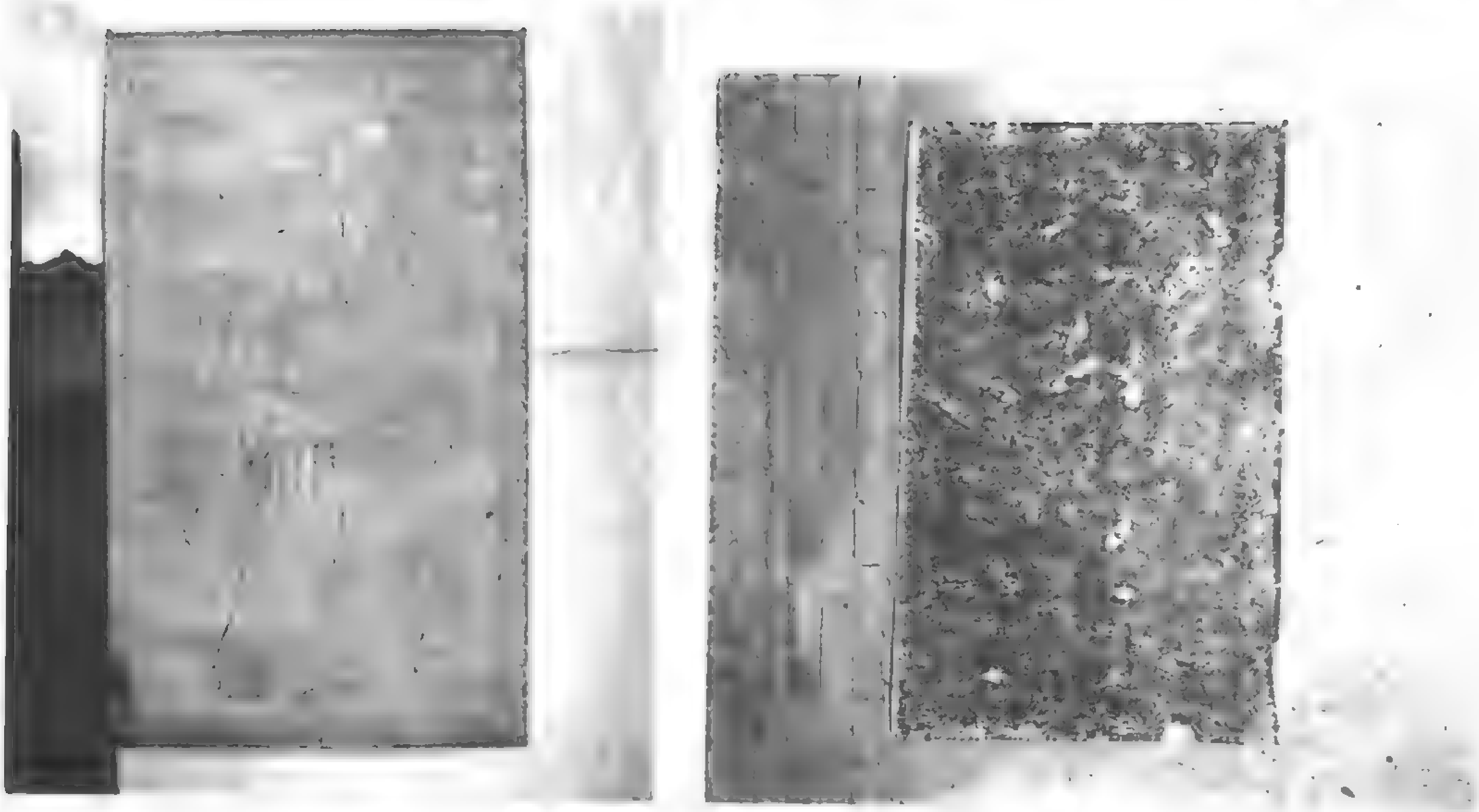
石分列左右，使人物处在春光明媚的百花园中，呈现出活泼愉快的诗意境界，构成一幅幅完整和谐的画面。人物的装束，侍女的发饰和衣、裤、鞋等，都显然是当代青年少女的时世盛装。特别是上身的翻领外衣和内衬的花内衣，以及腰间带束装饰，虽然有些受外来影响，但对于一个体态轻盈的青年少女，是非常恰当而且又显得特别新颖可爱的。对于高贵持重的主妇来说，当然就有另一个美的标准。也正如雕画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裙带曳地，冠戴华贵、晶莹光耀。项上宝石项链，这也是当时盛行的时世装饰，这种形象，正表现了一定的阶级身份和年龄及性格。这些生活细节的描绘，都是雕刻家们经过深刻观察、周密思考以后，才能达到真实地反映了盛唐时代社会的一个方面，并为我们研究唐代文化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



这组石刻线画，其形象装束表现无一相同，这一方面表现了古代雕刻家们丰富的生活基础和创造能力，在画面刀笔的运用上以类似“春蚕吐丝”细劲线条。因为这样的线条形式是与描写宫廷仕女题材内容很相符合的，这不仅能够表现细致的人物动作及衣着装饰，而且也助长了整个线刻画面优美纤丽的气氛。这是从内容要求来决定形式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在韦顼石椁这组石刻线画中表现得很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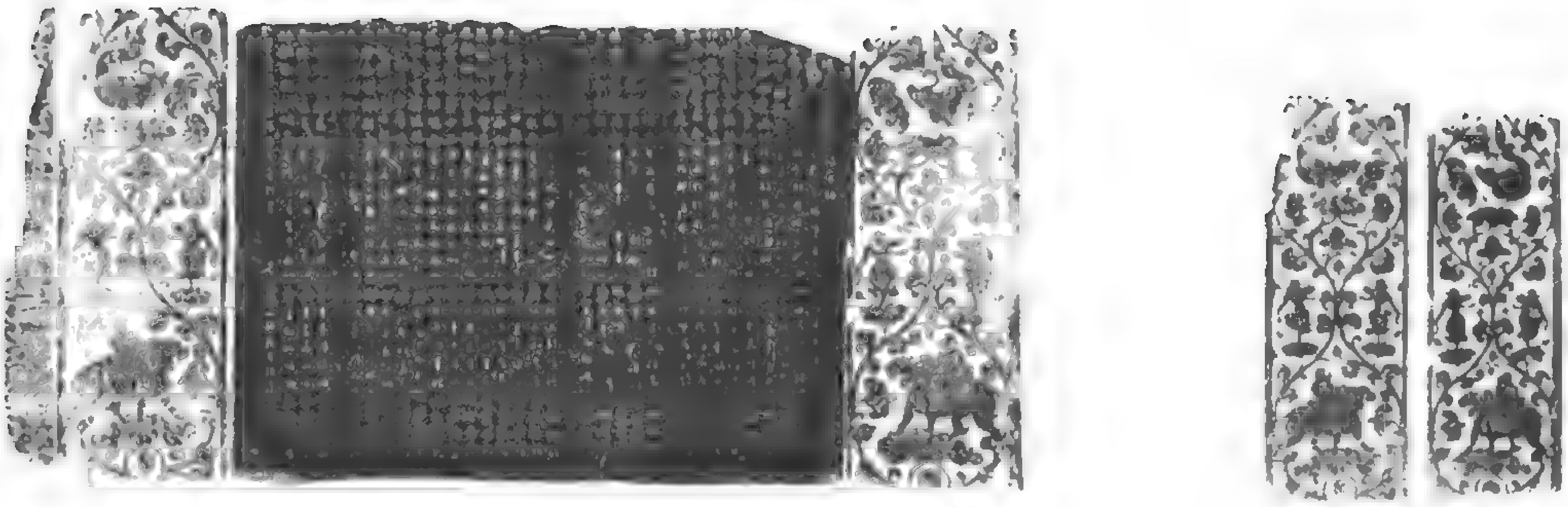
此组石刻线画，因原石出土后，展转流传，一度也曾被当作台阶铺地，所以磨损较甚，为使读者能清晰欣赏，特以白描临摹数幅以供研究。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87. 兴福寺残碑碑侧花纹

东晋，唐　开元九年（721）集刻　残高80厘米，宽103厘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发现于西安市南城壕中，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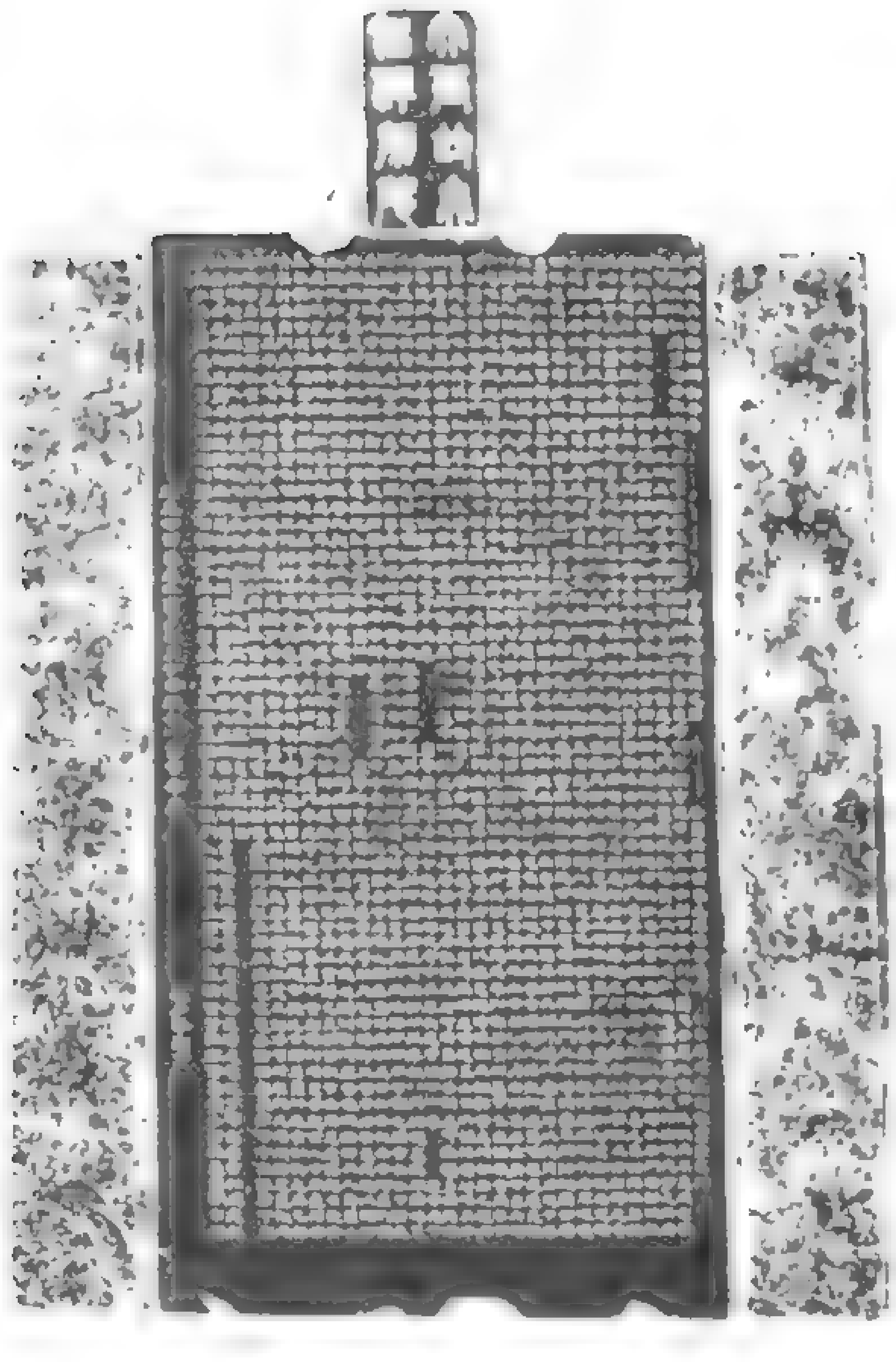
此碑虽由于残断，不能见其全貌，但仍可看出碑侧花纹雕刻的精美。它的图案花纹比《大智禅师碑》疏朗，减底部分近于底面各半，黑白分明，使人感到鲜明舒畅。其图案结构是以双波纹为干线，构成两方连续图案。在波纹上部，刻着一只长尾朱雀；中部是两个甩着长袖翩翩对舞的人；下部刻有一个双手作吹笛状、反身坐在一头雄狮背上的人物。而这一切的立足点都是在轻盈的莲花上！特别是狮子的后足在莲花上放不下了，作者让它踏到波纹式的叶子上去。其构思想象丰富不羁。此碑是明万历年间在西安南城壕中发现的，因只剩半截，故称“半截碑”，又叫“吴文残碑”。此碑是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兴福寺僧大雅集晋王羲之行书字，为宦官吴文所立，故名。碑上唐花、晋字形成双绝，很为美术爱好者所珍视。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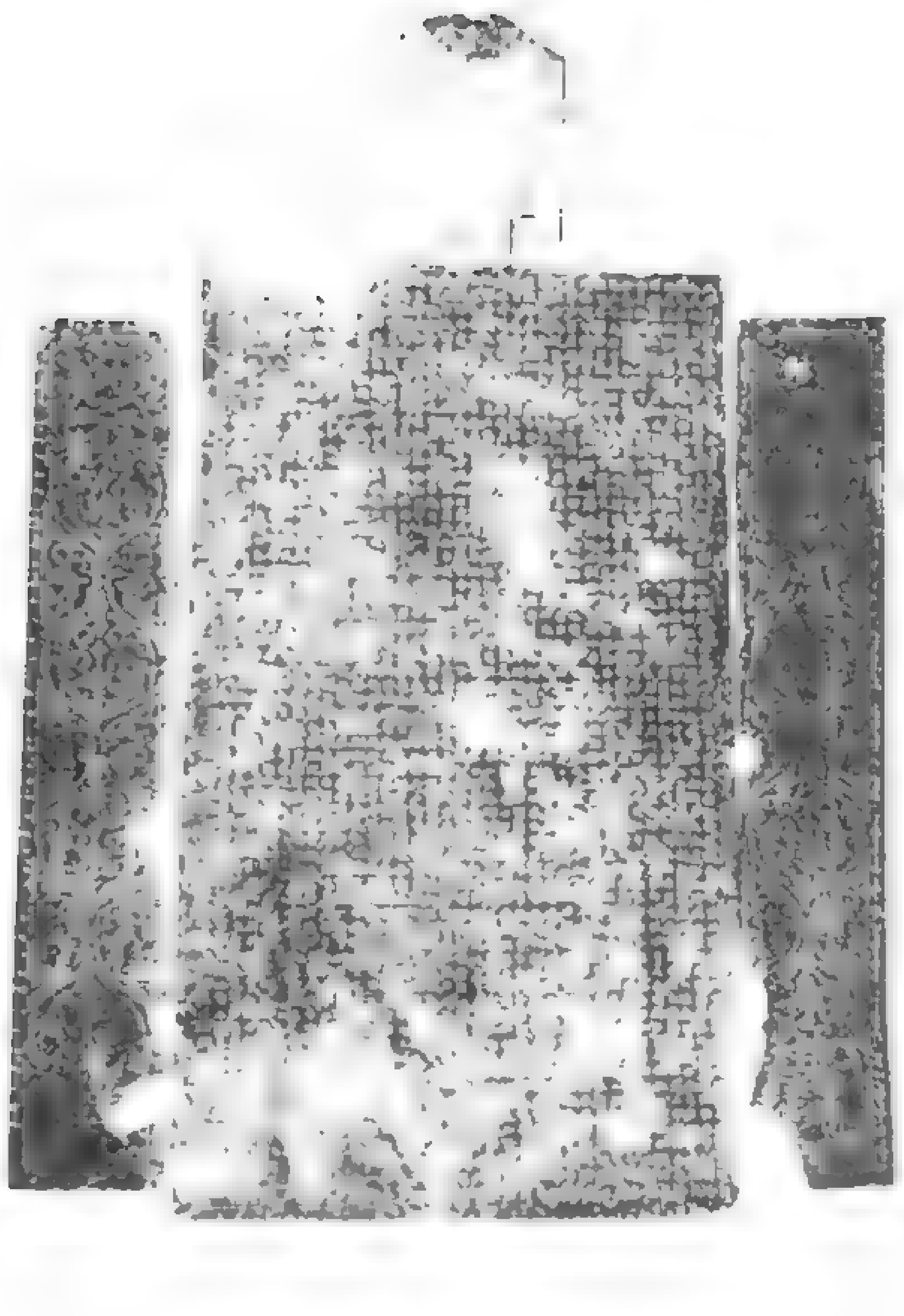
88. 大智禅师碑碑侧花纹

唐 开元二十四年（736） 碑高 345 厘米，宽 114 厘米。西安碑林旧存。

此碑由唐工匠史子华刻，在西安碑林名碑装饰图案中久负盛名。



碑为螭首、龟趺。螭首雕作左右各三条龙，碑额周缘刻云纹，三角形处刻一尊坐佛。这是摆脱当时一般碑额雕刻形式的一种崭新的手法，意匠独具，技巧纯熟，整体透露出一派雄浑豪放的气势。碑侧以线刻和减底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装饰，全部用单波纹构成，在每一波纹中，分别为菩萨、狮子、迦陵宾伽、凤凰等不同的内容，由茂密的蔓草衬托着，非常和谐，均匀地组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互相弥补，是这一图案最成功的特点。例如迦陵宾伽的长尾突破了波纹主线而高翘到花叶之上，上面的花和下面的蔓草，便都有分寸地避开，而由于迦陵宾伽头所占的面积小，则以两束婉约的蔓草便应隙而生地弥补了空白。全部图案都采用这种手法构成，所以特别绚烂多彩，繁艳夺目，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既无空白，又不繁杂，是唐代碑侧花纹中首屈一指的艺术佳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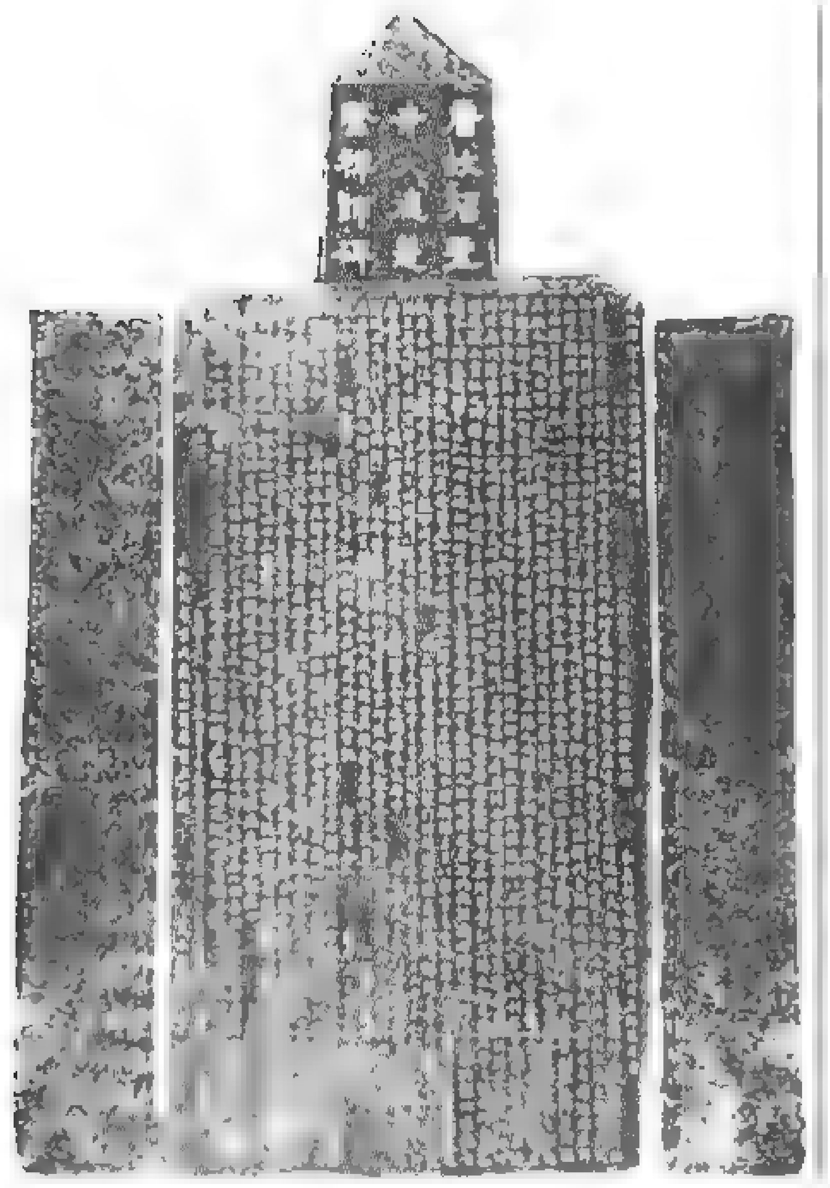
89. 道德寺碑及碑侧花纹

唐（618—907） 高 234 厘米，宽 94 厘米。1960 年由西安市西郊梁家庄出土，出土后即入藏西安碑林。

此碑亦为螭首，碑阴上部浮雕莲花龛三尊

佛像，下阴线刻善慧和玄懿及其弟子的位次图。碑侧减底双波纹线刻图案花纹，与西安碑林所藏《道因法师碑》碑侧属同一类型，构图极为精美。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0. 慧坚禅师碑碑侧花纹

唐 元和元年(806) 高254厘米，宽91厘米。1945年西安市西郊出土。1949年前入藏西安碑林。

此碑螭首，碑侧图案也比较别致，全部以线刻构成，亦是以双波纹为干线，正面和侧面以盛开的花朵作主要内容，中间还穿插有鸟兽、人物。碑左侧刻一振翅欲飞的鸳鸯，右侧刻一挺立的朱雀和一个绕飘带半跪在莲花上的赤身小孩。两侧下部相对刻着长翼半尾、头生锯或独角、遍身花斑的瑞兽。全部构图紧密均衡，生动饱满，富丽堂皇。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1. 白玉石佛坐像

唐(618—907) 像高112厘米。1950年西北文化部交存陕西省博物馆。

坐佛全跏降魔坐形，右手断缺，左手伏膝。圆脸项肥，颈有三轮线。口涡深沉，面颊丰满，修眉细目，显示出庄严而慈悲的面相。螺发卍字结，较为特异。按卍形右旋为梵文吉相，亦称吉祥海云相，为印度相传的吉祥标帜。北魏以来佛首习用波状发纹，额上多结卍形相。隋唐以来佛首用螺发成为定型，而卍字结螺发少见。像袒露丰满的胸肌，

圆润的肩臂，肥胖的腿脚，都给人以活生生的气息。衣褶线条弧线突起，显得柔软而圆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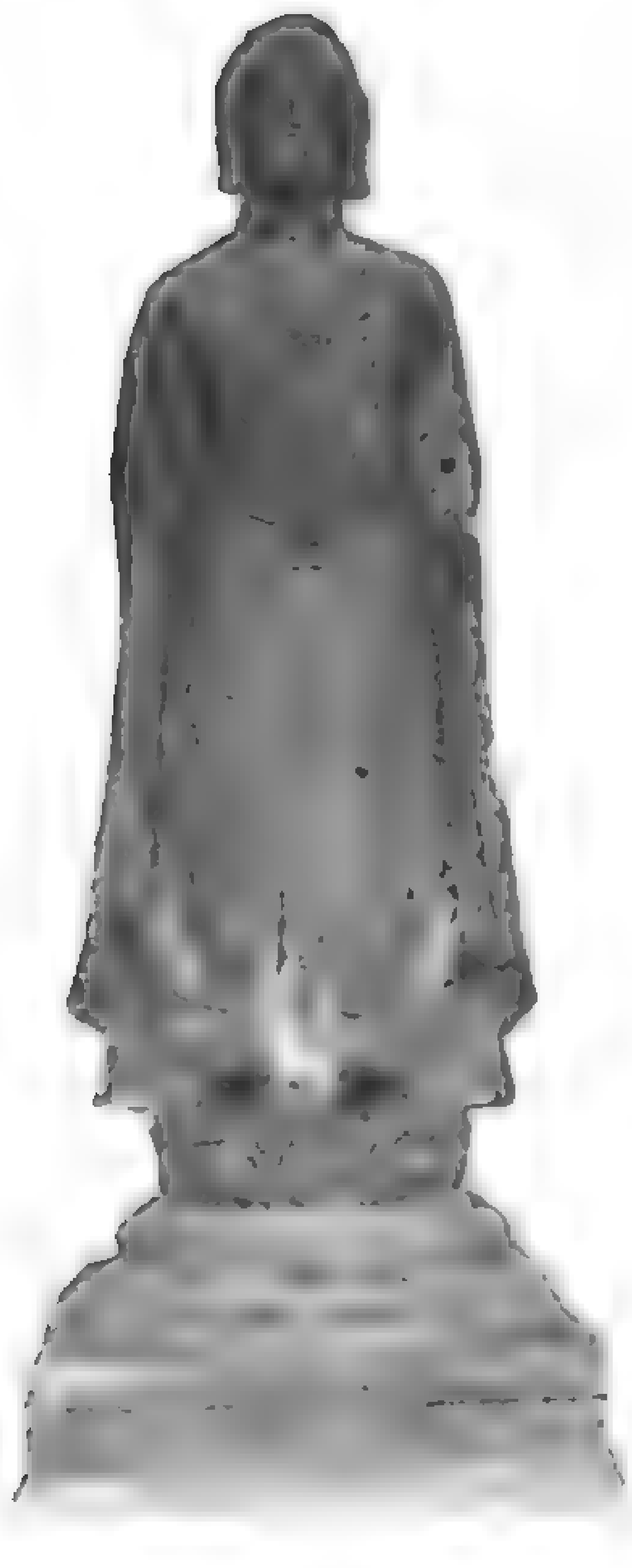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2. 释迦佛立像

唐（618—907）　像通高169厘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此像雕造为圆身立形，足踏双心瓣半开莲座，螺发，圆脸，长眉秀目，大耳丰聃，口角涡沉，项肥，头稍上扬似微笑状。右手断缺，左手执袈裟襟，襟挂垂两肩。衣褶用双突弧线纹显示，在轻薄柔软的袈裟下，显露出丰腴的肌肤。造型比例匀称，为真实的生活中普通人形象的再现，是唐初雕刻上的成熟作品。原座遗失，下配北周武成二年覆钵式莲座。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3. 释迦佛立像

唐（618—907）　像通高199厘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佛足踏双层单瓣莲座，螺发、圆脸，丰腴适度。袈裟覆左肩披背后，左襟作平整的直垂，右襟作简单褶形，褶纹取弧形双突线雕出，而不似一般对称式纹手法。胸前里衣带，结活结微显露袈裟外，腹膝微鼓露出衣下内体。构型匀称，刀法流畅精练，在简练的雕技中，塑造出端正而简素的体躯，是古代工匠掌握了充分写实技艺后，才能够表现出释迦佛内心清纯而伟大

的人物生动形象，给人一种高超俊逸的感觉。是盛唐时代的优美作品。台座系后另配隋制佛座。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4. 释迦佛立像

唐（618—907）　像通高195厘米。建国前西安市长安县查家寨出土。1949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此释迦佛立像，足踏双开敷式单瓣莲座，双手断缺，形制技法与前像全同，面相表情风格无异，可能属同一人同一时期的创作，下配双开敷式带方台单瓣莲台，四侧面线刻花纹。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5. 菩萨残像

唐（618—907）　像残高110厘米。西安火车站出土。

此像圆雕。头部、两臂及膝下均残断，但残像胸部雕刻丰满，膝部微屈，细腰丽姿斜披轻纱露腋，并衬以精致的串珠金环胸饰，给人以绰约多姿女性体美的感受。披巾腰衣突线褶纹处理合度，特别是腰衣在小腹前束结自然舒适，如真丝品那样的轻柔，造型准确，刀法简洁，都显示了盛唐一代石刻艺术的高度水平。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6. 残菩萨坐像

唐（618—907）　像残高66厘米。

1950年原西北文化部移交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雕像首佚，颈留轮线，袒右胸肩，臂饰有宝钏，肩披轻薄袈裟，左手仰置腿上作降魔坐形，左腿残缺。像残躯肌肤圆润，显然为菩萨女性形体。雕工神妙，技巧娴熟，作品似显出内在的生命力。虽然菩萨像有残缺，但仍不失为盛唐圆雕中极其精美的典型制作。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7. 观音菩萨像

唐（618—907） 像通高73厘米。原置在西安市东关景龙池庙宇中，1952年庙毁移交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菩萨头戴化佛宝珠头箍，缯带飘肩而下，细发高髻，脸庞圆润，直鼻秀目，口角含情，长耳半聃，垂珠耳珰，颈显轮线，头部微右倾。两手胸前执莲蕾，赤臂袒腹，身佩珠玑，束带缠胸，背挂臂飘垂挂座上，腰衣褶纹流畅。右足仰掌作半跏吉祥坐，体态丰满，温慈施情，安详高坐于圆形束腰莲台之

上，使人有感观音菩萨，是辟恶扬善，救灾扶难的慈悲化身。座面为带蕊莲蓬，周围三层带苞半开莲瓣，瓣上均雕宝珠。束腰部分为蔓形莲茎叶蕾式浮雕，下为圆形单瓣下敷形带。圆座周分六格，每格长方形有雕饰花边。格内各雕伎乐一人，分别各执排箫、横笛、腰鼓等乐器。台座雕饰浑朴晶莹完美，瑰丽大方，属唐代雕刻艺术精美制作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8. 虚空藏菩萨像

唐（618—907）　像通高75厘米。1959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菩萨一般是作为佛的胁侍，而这尊虚空藏菩萨却是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完全是佛的身份，可能是唐代密宗造像的特有形式。菩萨像貌秀美庄重，雕琢逼真，甚至把纤巧的手指曲伸姿态都如实地准确刻画出来。宝冠、璎珞、褶披巾、腰衣等身饰的精细雕琢，不仅不觉繁芜，而且使人感到一种多层褶复合的美。精丽的须弥座莲台和云波纹台基的形式，更突出地衬托出了菩萨的优美与华丽，也显示出了当代工匠们雕刻的深厚功底和精湛的才艺。

同坑出土的还有《马鸣大士》、《马头明王》、《降三世明王》、《随心金刚》等十多件。这批雕像均为白玉石雕造，上有贴金。出土地点属唐长安城的兴宁坊，据《长安志》载：兴宁坊东南有隋代建的清禅寺，唐大中六年（852）改为安国寺。天宝六年（742）高力士舍宅又兴建了华封观。因而这批石刻可能是这坊的寺院的遗物，亦有可能唐武宗会昌年间毁佛后被埋在地下的，因而多有断缺。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99. 随心金刚造像

唐（618—907） 像通高 71 厘米。1959 年西安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雕像为白玉石贴金造像，裸身赤足，怒目前视，发似火焰，右手举杵，左手握拳，坐于磐石之上，作金刚降伏夜叉的形象，使人望而生畏。值得称道的是古代雕刻家能准确地运用刀笔，掌握形象比例精神气质，使精美的造像适称合度，而且还运用了夸张手法，突出肌肉，助长威势，达到了表现主题的目的。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0. 马鸣大士像

唐（618—907） 像通高 67.5 厘米。1959 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雕像为白玉石贴金造像。身披袈裟，盘足坐于七匹卧马驮伏的宽扩莲台上，被称为马鸣大士说法像。虽然大士头与马头均有残损，但仍可看出整体造型的精美。雕刻刀法的洗练精湛，仍是

一件具有高超艺术价值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1. 白石菩萨头

唐（618—907） 残高16.5厘米。1959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这件白玉石菩萨头，曲眉丰颐，容颜秀丽，梳高髻，上佩金彩发饰。两耳下垂，戴金彩耳饰。这是盛唐时期的妇女形象，以丰腴为美，宗教造像多以此为标准，因之雕工们运用了传统的精湛技艺，吸取了外来造像手法，雕出了一个唐代美女的典型形象、是一件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2. 马头明王像

唐（618—907） 像通高78厘米，宽42厘米。1959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此像为舟形火焰背光，三头八臂，属密宗系统。高冠发髻，圆目前视，袒露上体，右上手执斧，中手持念珠，下手仰掌侧置膝上；左上手执杵，中手上仰作捧物状，下手持莲蕾。正身双手合掌于胸前作说法状，表情威严。身饰璎珞由两肩下垂至腹中系以圆壁形物，垂于翻莲座上，装饰精细华丽。下体着裙，轻薄衣带自头两侧盘绕经腋下飘垂莲座两侧，似有动感。雕刻手法夸张、简练，刀锋犀利，是唐代一件出色的雕刻制作。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3. 石刻密教造像

唐（618—907） 像通高 88 厘米，宽 48 厘米。1959 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像制为三面八臂，头发向上高梳，其上雕有一尊化佛，身后火焰纹背光，表情怒视威严，上半身略向左倾。手各执法器：右上手高举金刚杵，右中手持宝剑，右下手拿箭镞；左上手持三叉戟，中手已断失，左下手持羂索。左右第一手于胸前交叉，小指缠绕系结金刚印。胸前项饰，璎珞从两肩至腹垂于左足和岩石上。腰间系裙，天衣从头的两侧至腋部相卷，垂直岩座。两脚曲伸坐于岩石上作说法状。

此造像表情、手臂、肌肉、璎珞、披饰及各种法器，都雕刻得细腻而不繁芜。刀法精练，形象逼真，应说是唐代雕刻中一件很好的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4. 天王残像

唐（618—907） 像通高 72 厘米，1959 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像为坐形，圆目宽鼻，颜面造型饱满，梳高发髻，项饰精细，袒露上体，斜披纱巾，下身裙带轻薄，自然飘落在岩石上。双臂虽残，但仍能显示出天王威武雄健气势，刀锋流畅刻画精美，雕刻技巧娴熟，堪为唐刻佳作。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5. 天王像

唐（618—907）　　像通高 62 厘米，1959 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此像赤足交跏坐山石之上，两手各持兵器，气势威严，给人以望而生畏的威慑感。面部与发髻虽有残损，但雕刻洗练，仍属唐代佳作。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6. 天王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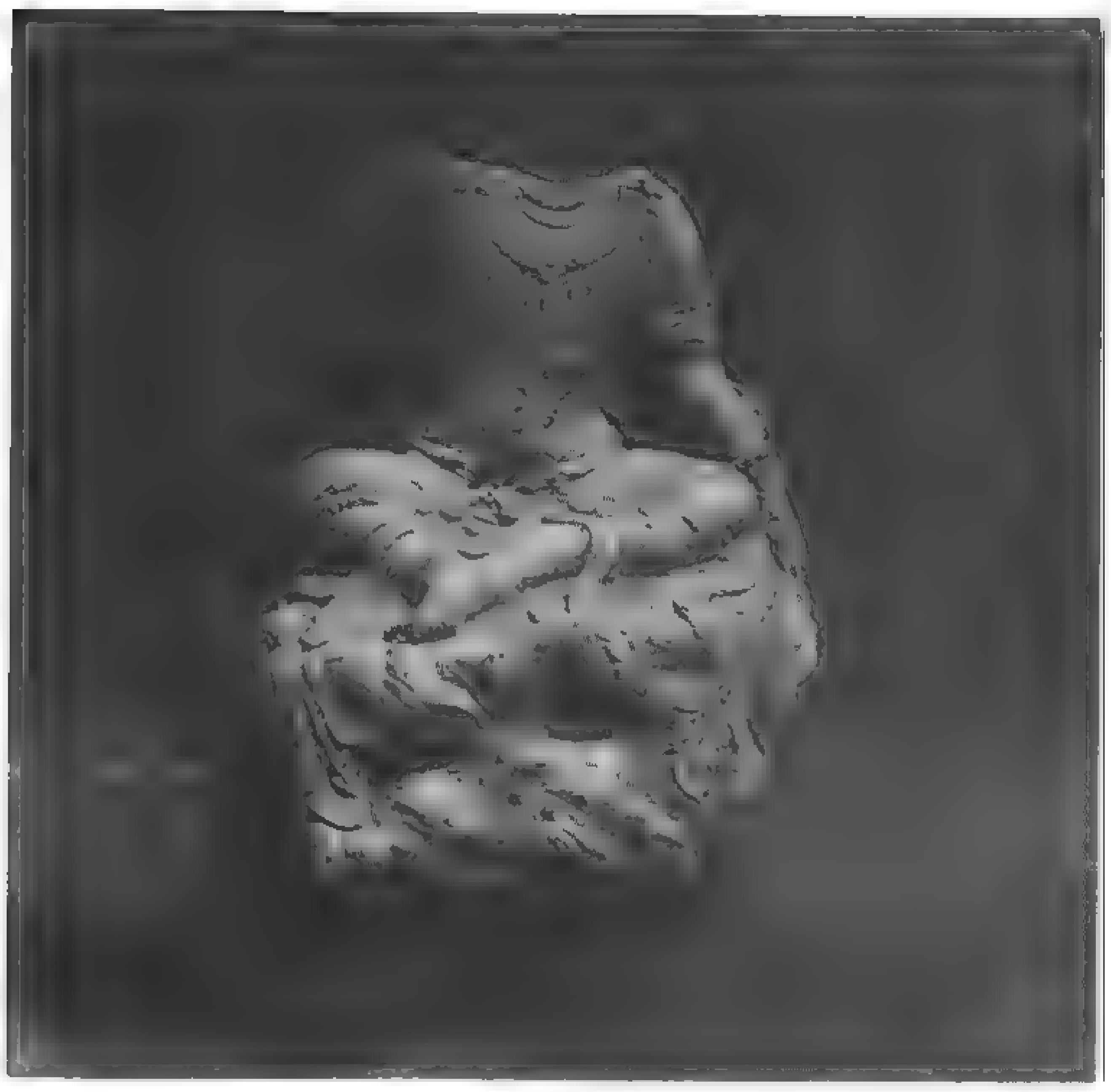
唐（618—907）　　像通高 51 厘米。1959 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此像头与右手残，左手持兵器，袒露上体，项饰精致华丽，衣带斜披自然垂落在交跏盘座岩石上。与前像形式相似。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7. 观音残像

唐（618—907）　　像通高 55 厘米。1959 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观音坐像，虽头臂有残损，但仍能显示出体躯丰盈，比例匀称，姿态自然



的观音菩萨像的典雅优美的神感。佩瓔珞、璧珰及项饰；轻纱锦带轻柔贴身下垂。雕刻精巧、华美、流畅。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8. 石刻残像

唐（618—907） 像残高41厘米。1959年西安市东郊电厂路唐安国寺遗址出土。

此像腿部以上残缺，属何种造像不得而知，座为圆形，分为三层，上层是仰莲，中间为海石榴，底层侧面浅浮雕云纹，造形飞动流畅美观，雕饰精细，整体饱满，是唐刻较好的艺术品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09. 释迦牟尼坐像

唐（618—907） 像通高73厘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像为圆雕，螺髻，面部丰圆，修眉细目，左手残缺，右手伏膝，袒露胸肌，肩臂圆润，均显露在柔纱的袈裟下，作全跏降魔坐形，莲台上飘垂衣褶，线纹起突飘动，似有质感。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0. 菩萨头

唐（618—907） 像首残高22.5厘米。1983年西安市西郊出土。

菩萨头用白玉石雕成，蛾眉凤眼，口唇微启，表现出羞涩腼腆的柔而美的性格，是典型的唐代少女形象。头梳波状高髻，髻周雕八尊菩萨头和一尊

化佛，圆脸、秀目，恬静含情。虽有残损，但雕刻形式，在目前发现的唐代石刻造像中则极为罕见。属唐代的杰作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1. 释迦牟尼像

唐（618—907）　　像通高174厘米。1955年西安市南郊边家村出土，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委员会送交陕西省博物馆入藏。

像为圆雕立形，身着袈裟，褶纹起伏有致，肌腹丰腴，胸腹微鼓，胯足丰圆，站立莲台之上。整体端正简素，内心清纯，丰润多姿，给人一超逸的感觉。雕刻比例匀称，刀法流畅精练，可说是唐代优美的写实作品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2. 释迦佛立像

唐，（公元618—907）　　像高79厘米。1973年西安市南郊沙呼沱村出土。

像为圆身立形，双手作施无畏印和与愿印。螺髻，长眉细目，两眼微闭，口涡深沉，略带笑意，身穿袈裟，呈现出一种庄严慈详的神态。雕刻刀法简练，衣褶婉转自如，衬托出“丰肌秀骨”的体态，具有盛唐时期雕塑特点。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3. 释迦佛立像

唐（618—907） 像通高141厘米。西安市郊区出土，陕西省博物馆旧存。

像为圆身立形，头梳螺髻，五官端正显明，双目瞑闭，仪态安详。右手上举断缺，左手持宝珠，站立莲台上作说法状，显示出佛法无边庄严的气度，造型完美。整个躯体雕刻气势饱满、圆润，肌肤富有质感。袈裟衣褶层次分明，结构优美并富有韵律。反映了初盛唐时代雕刻造像雄浑而又精美华丽的风格，是唐代石雕造像中一件卓越作品。像座后配，属唐雕刻。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4. 塔饰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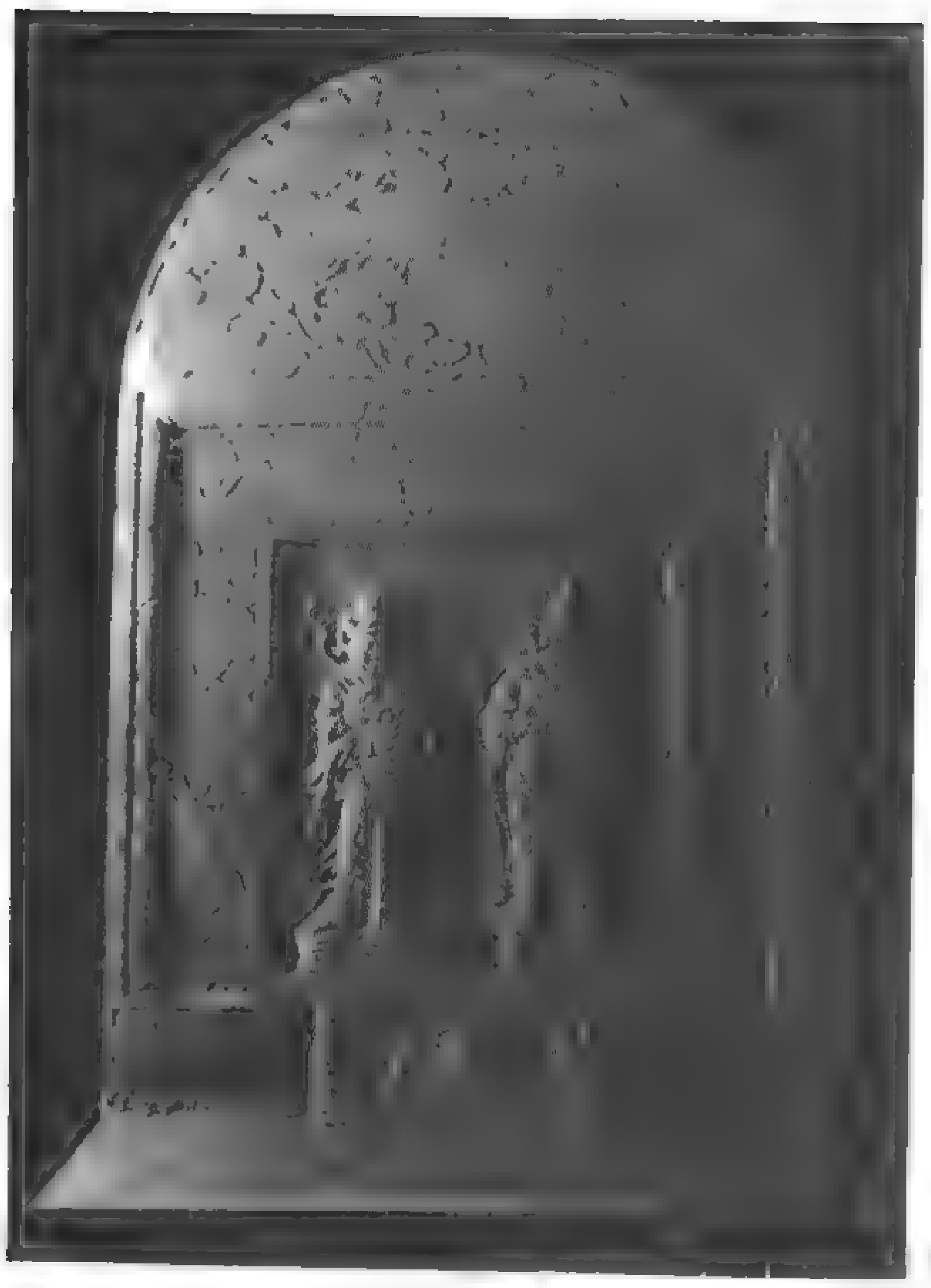
唐（618—907） 像高107厘米，宽74厘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像制为尖形龛三尊造像。龛上两菩提树代柱，界开中尊与胁侍，龛上帷幕满饰菩提花叶。三尊造像各有宝珠形背光内套圆光无雕饰。造像脸手胸腹圆润，弧形线衣褶层次分明而流畅，特别是胁侍的膝胯在薄衣下显出丰盈圆润的质感，充分表现出唐代雕刻艺术达到极为成熟的境界，不失为盛唐代表作品之一。可惜半边残缺。铭文中有“爰凭瑞塔敬勒尊容”等语，可知这件作品是装饰在塔上作供奉的造像，铭记楷书秀丽，惜铭记年月部分残，无从确定其具体年代。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5. 塔门造像

唐（618—907） 像高110厘米，宽73厘米。1955年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送交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圆首门形制，圆首及门楣、门框均减底线雕缠枝牡丹嵌双鸟童子等花纹，华丽生动，具有西安碑林所藏存的唐《大智禅师碑》碑侧花纹雕刻风格。门上浮雕韦陀、护法两立像，甲盔外加衣带随风飘扬，手持法器，威武雄壮，极为生动。门坎下浮雕两生形比丘，中作宝供，门墩下线雕双狮，气势雄伟，属唐代佳作。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6. 释迦降伏外道造像

唐（618—907） 像通高71厘米，宽42厘米。1955年西安市文管会送交入藏陕西省博物馆。

此石为竖方形阶式，半圆雕释迦立像，像为螺发圆脸，颈有三条弧线，袒右胸，披袈裟襟尖垂腿间，腰衣下为褶裙式，赤足站立莲座之上，右臂伸扬仰掌，上浮雕法轮，内为外道坐两头奔马上，双手上举衣带飘扬，左臂向下手伸状。下刻圆轮，内亦有外道坐双马背，仍是双手持带上扬。背有宝珠背光，内刻三法轮无雕饰，外围雕火焰纹带。阶前有“释迦牟尼佛降伏外道时”楷书十字，似为后补刻，但字迹秀劲。雕刻衣纹流畅，臂胸圆润丰满，虽系小型雕作，但却也表现出了唐代写实的风格，仍不

失为较好的作品之一。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7. 法藏佛方座

唐　神龙二年（706）　座通高 39 厘米，宽 53 厘米，长 57 厘米。1954 年征集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这方像座为三阶束腰形，上层倒向内缩，下为较小方柱，正背面各浮雕两比丘头，两侧各有一狮头，柱下三阶外伸，四面浮雕三力士，一跪两坐，两侧各一，是一跪一坐，均是肩承方座为佛尽力。雕刻刀法劲健，形象各有不同，整个作品显得精细别致大方，为盛唐一件艺术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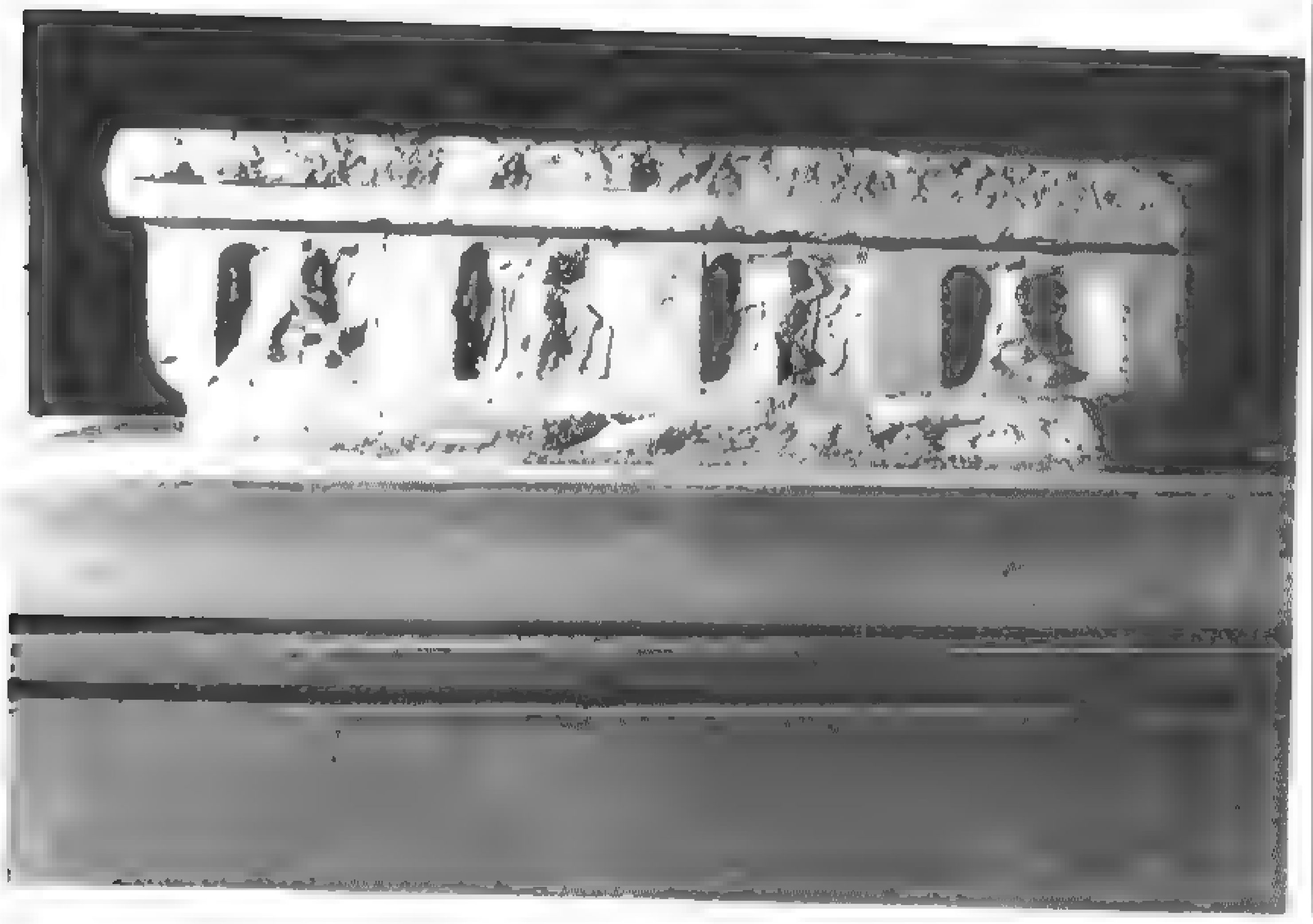
据此佛座形式看，其上佛像可能为精美之作，可惜未能见其原貌。在座上层阶边阴刻有"大唐神龙二年岁次景午正月十五日，西崇福寺沙门法藏，奉为师僧父母法界众生，敬造玉石菩提（萨）像四区置华严塔内，愿尊容久住，众生见闻，同种解脱。"等 61 字楷书题记，书法劲健秀丽。按题记中法藏当为唐华严宗三祖法藏。初祖为杜顺，二祖为智俨，三祖法藏，事实上为唐华严宗的开祖。法藏在俗时曾师事智俨，就精研华严宗妙理，28 岁落发为沙门，后奉勅在太原寺讲华严经，武后深为感动，赐以贤酋大师尊号。他曾参与当时印度高僧实义难陀译《华严经》的译场，又帮助提云般若及义净的译业，一生中在洛阳佛授记寺宫中长生殿及各寺讲华严经 30 多次，著有《华严经旨归》、《探玄记》、《起信伦义记》等 60 余部，大大地发展了华严经的理论，所以一般认为他实际上是华严宗的开祖。他死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70 岁时圆寂在大荐福寺。华严寺在今西安城南少陵原南麓杨万坡西，今有初祖杜顺和尚、四祖清凉国师澄观的塔仍存。相传原有五塔，是否二祖智俨的塔也在寺内无考。据题记说这块像座是置放在华严寺塔内的，可能是安置在杜顺或智俨塔中的，所以可藉以说明今日华严寺塔的建造时间。再崇福寺在唐长安

城的休祥坊，高宗咸亨元年（670）以武后外家故宅为太原寺，载初元年（689）改为崇福寺的。法藏为武后所尊信，可能就长住在崇福寺，故石刻上题记为崇福沙门。又题记中按神龙二年岁次为丙午，题记中写为“景午”，当系为避讳，高祖李渊父名为李昞。“昞”、“丙”二字同音，唐人书为“景”。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8. 乐舞佛座

唐（618—907）　座高26厘米，宽91厘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



乐舞石座，原为造像座，长方形三面八格浮雕。正面四格，格中雕两舞伎，服饰瑰丽，舞姿优美，彩带飞动，轻歌曼舞，优美动人。其他两格及两侧六格中雕坐形伎乐人，持有排箫、觱篥、琵琶、竖笛等不同乐器演奏。雕工洗练精美，是盛唐一件较好的艺术品，也是一件研究唐代音乐舞蹈方面的实物资料。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19. 老君像

唐　开元、天宝间（713—756）

像高197厘米。1960年由陕西临潼骊山移存陕西省博物馆。

此像为道教代表人物老子李耳（亦名李聃）的石雕像。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有着长期的发展历史，相传老子姓李名耳，与唐皇室同姓，大为唐帝国所提倡，尊为国教，借以维护其统治。高宗时，老子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时尤为重视道教，特设崇玄馆博士、学生等，令习道德经，并以此作为考试的内容之一。唐玄宗时又在华清宫朝元阁建有老君殿，作为他敬奉老子的地方，到宋代大概还保存着原来的建筑物，所以，宋人杜常在《华清宫》诗中写有“行尽江南数十里，晓风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扬作雨声。”朝元阁老君殿中这尊老子像，当地农民叫玉石老君，传系由唐代西域名雕刻家元伽儿所制作。像的造形老君正襟危坐高台之上，形象雍容、恬静，在深思熟虑的意态中，却又显露出温厚、肃穆的气度。特别是台座之下满雕富丽堂皇、气势饱满、布局匀称的牡丹花饰图案，刀工洗练大方，堪称盛唐一代具有代表性的艺术作品。1960年由陕西临潼县骊山老君殿移来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陈列室，供广大群众和艺术爱好者欣赏。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20. 武士残像

唐（618—907）　像通高110厘米。陕西省博物馆旧存。

武士雕像身稍左倾，左腿向前，右腿稍后，作行进姿态，刚健威武。身着护身光明甲，腰束玉带，胸前佩瓔珞穗带。短跨束结膝下，尖靴腿甲装饰

华丽。腰衣及腹前束巾的波状褶纹，都及其柔软自然。对武士像这样盛加雕饰，由唐代开始。

武士雕像在艺术上，充分表现了盛唐的饱满瑰丽的风格，虽有残缺，但却能透过紧束的盔甲和袍带飘舞的英姿，看出武士躯体的劲健和豪放。是典型的唐代艺术华丽风格的典型之作。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21. 持弓天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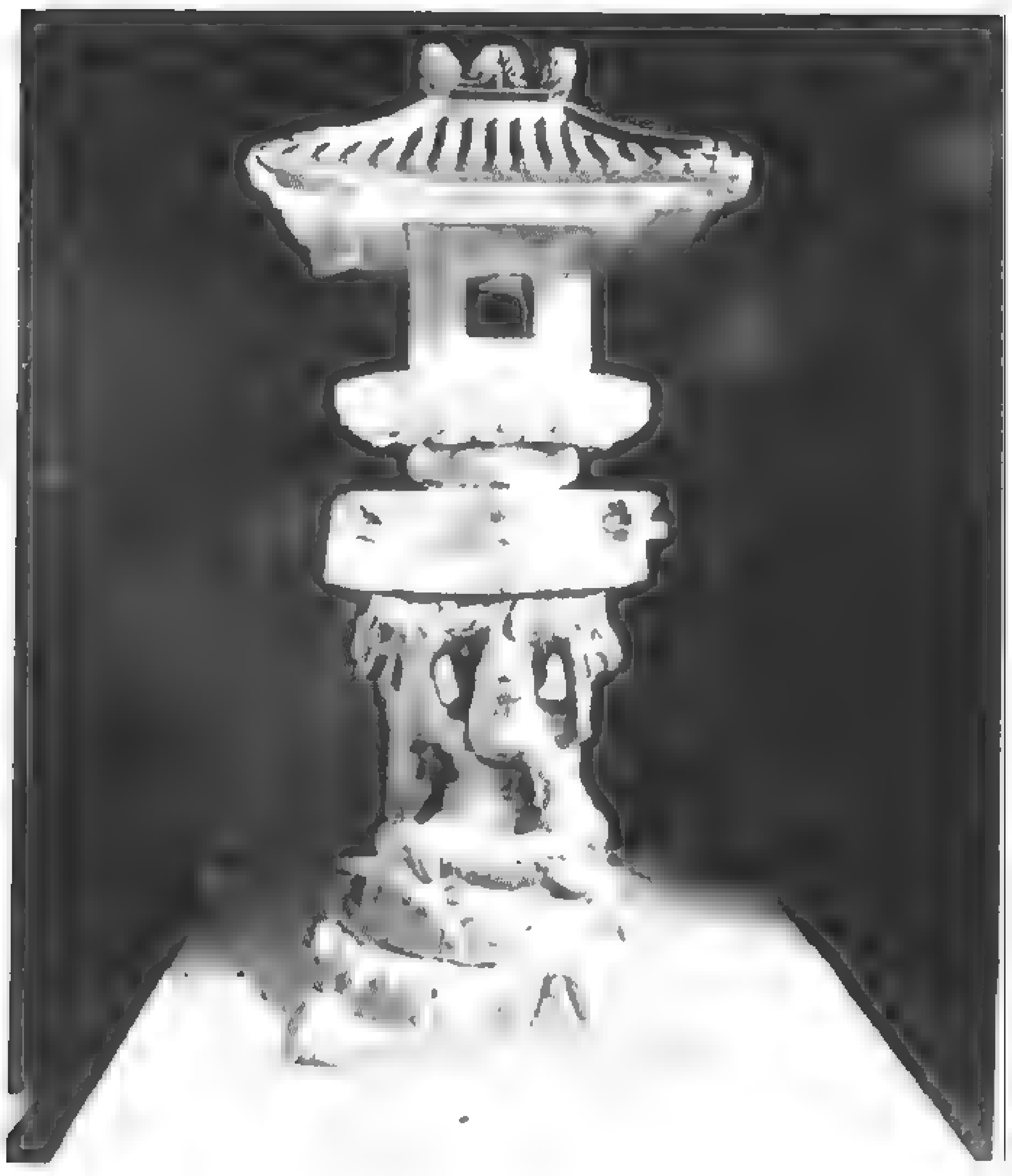
唐（618—907）　像高 71 厘米。1957 年西安市唐太极宫遗址出土。

雕像为宫廷建筑装饰，是一威武的天王坐在被降伏的夜叉背上，弛松了弓弦的形像，夜叉雕造毛发竖起，双爪交叉，驯服的跪地神情；天王头部残缺，而皮甲、护膝、尖靴以及紧握弓的手臂，都表现得极为逼真有力，显示了唐代民间艺术家的智慧和技能的高超。

作为宫殿建筑壁饰，以高浮雕手法刻出，象征着大唐帝国的国力强盛、文治武功。题材新颖，在唐石刻遗存中甚是罕见，视为珍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22. 石　灯



唐（618—907）　石灯高 194 厘米。1959 年由陕西乾县西湖村石牛寺移存陕西省博物馆。

石灯由八层构成，松紧相间，灯座雕作山岳式并刻有佛龛，由四龙蟠绕，蜿蜒而上，形成灯身，上设莲花灯座，方形灯室，四坡流水屋形式灯盖，结构紧凑，通体协调，是以圆雕、浮雕、线刻综合雕成的一件石刻艺术品，是寺院门前照明的石灯，这种灯的形式目前在日本寺院留存较多。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23. 石　栏　板

唐（618—907）　　栏板高50厘米，宽130厘米。1955年西安东郊唐兴庆宫遗址出土。

此石雕为一长方形，可能为唐兴庆宫建筑上的遗物。中间透雕花饰，错落有致，疏密相间，特别是两匹在云烟翻滚中飞驰的翼马，饱满生动，富于运动感，有着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为唐代石刻装饰遗存中一件精美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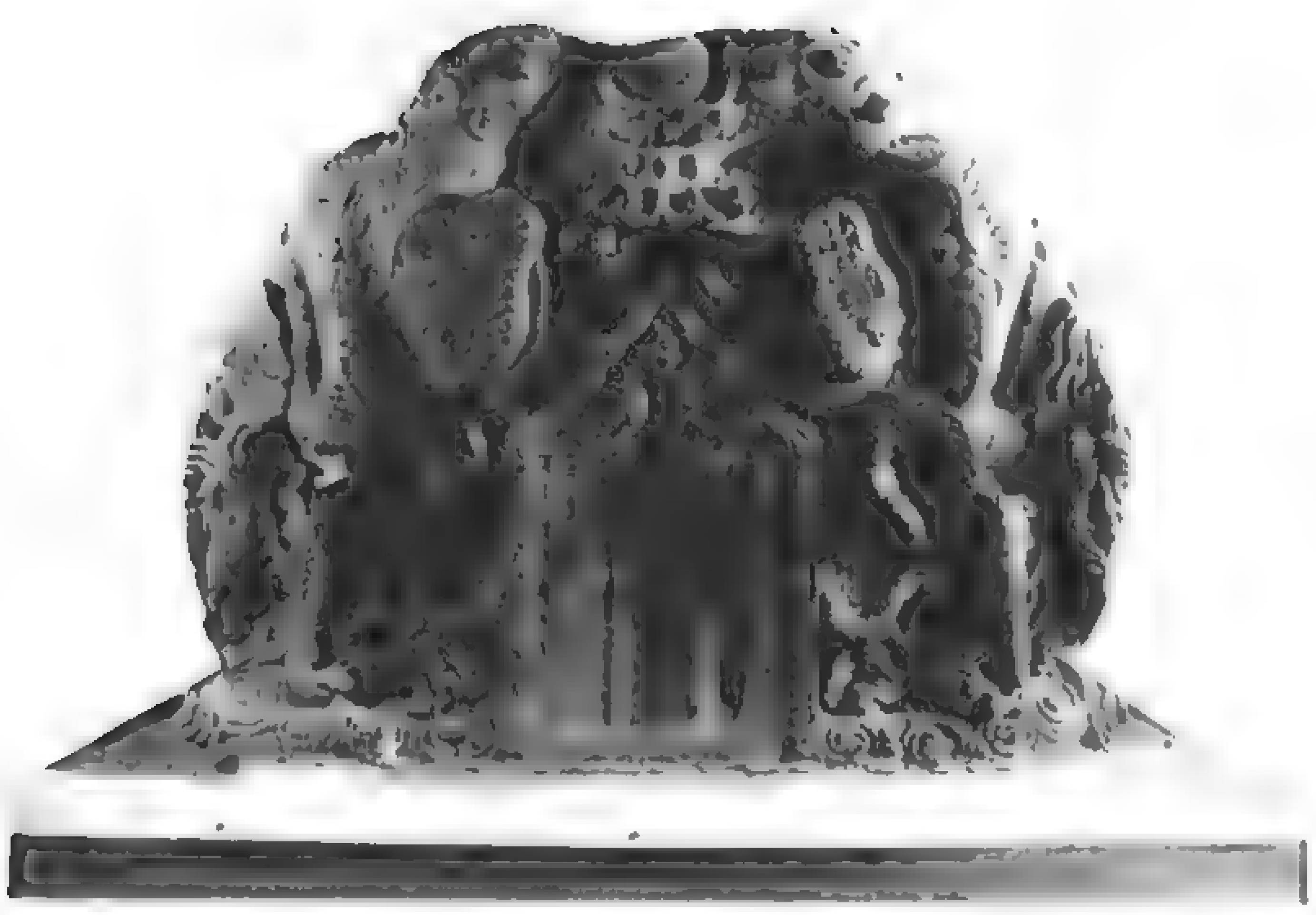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24. 螭　　首

唐（618—907）　　通高124厘米，宽157厘米。1951年由西安东关中兴路出土。

此螭首是石碑的碑头。两侧各雕三螭吐水云形纹，三螭身躯互相缠绕，构成正背两面雕饰，上部为两爪捧莲台宝珠饰。下为尖形碑额，正面雕迦陵频伽，手捧宝相花盆，背面刻双鸟衔蕃莲宝供。

螭，《说文》解释为“若龙而黄”，是说是一种黄色的龙。在我国奴隶社会的青铜器上，早就已有夔龙的形象，这可能是由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变而来。后世画龙，多作腾蹶而起的姿势，象征着腾空万里，前途无量。这种动物可伸可屈，可装饰各种器物，这也许是在汉代碑首仅有几道浅漕弧线逐渐演变为饱满矫健的螭首装饰的原因吧。《唐六典》中说：“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龟趺，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说明在立碑的制度上有官阶区分。此螭首应是



五品以上衔人所用，但碑头额上尚未刻字，可能是雕成之后尚未运用。

螭首整体雕刻，刀笔精巧瑰丽，舒展流畅，表现出了唐代造型艺术的雄伟壮丽气魄，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内。

125. 昭陵石刻

唐（636—649）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峰顶，是李世民生前亲自选定的墓地。由于他是唐帝国的重要奠基人，曾为开国创业东征西讨（包括镇压隋末的农民起义），建立了大唐王朝，开创了"贞观之治"，使社会生产力恢复，也促使了文化艺术长足的发展，不论在绘画、石刻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其卓越的成就。如昭陵周围重要陪葬墓上的碑碣和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什伐赤、青骓、特勒骠、飒露紫、拳毛䯄、白蹄乌）浮雕等等，就是具体表现之一。这些石刻不仅构成了昭陵陵园雄伟的气势与谐和的美感，而且也提供了为研究初唐石刻艺术和文化的资料。

"昭陵六骏"是李世民在征战中与之同甘苦、共生死的六匹战马。李世民为了追念其战功，特令当代名雕刻家把六匹骏马雕成六块浮雕，列置在自己陵前。

六骏浮雕，具有我国雕刻史上黄金时代唐代艺术的许多优点，饱满、生动，富有运动感和蓬勃的生气。由于高超的雕技，使马的造型不论是哪种姿势，都令人感觉到充沛的生命力溢出石外。

这六匹石马雕于贞观十一年（637），原列置在昭陵北阙西廊，三跑三立，各有专名，其中飒露紫、拳毛䯄二骏，于1914年被帝国主义盗窃分子勾结卖国军阀盗走，运存美国费城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6年又将余下的四骏打碎，准备盗走，运至潼关，被陕西人民发觉追回，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126. 乾陵石刻

唐（628—705）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

高宗李治（628—683），系唐太宗第九子，其母为长孙皇后，得母舅长孙无忌的帮助，被选为太子，650年即位，公元683年死于洛阳贞观殿，葬于乾陵。

武则天（624—705）名曌，山西文水人，其父武士彟为利州都督。武则天原为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太宗死后她削发为尼、出家感业寺。654年，唐高宗从尼寺里接武则天入宫，大加宠爱，拜为昭仪。655年，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平时体弱多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武则天从659年起便接替高宗管理朝政，威势与帝无异。684年，高宗李治死后，她突破太后不能临朝称制的惯例，先后废中宗、睿宗，自称皇帝，改国号曰周，赐帝姓武氏，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共21年，传位于中宗，便徙居洛阳，尊号则天大圣皇帝。705年，死于洛阳，后与高宗合葬乾陵。

乾陵，在陕西乾县北门外的梁山上，海拔1047.5米，气势非常雄伟，陵上不仅有宏大的建筑，而且有重要的石雕像依次排列在陵山前的神道两侧，由里向外，其顺序是：

1. 护陵蹲狮：	一对
2. 文武侍臣：	十对
3. 鞍　马：	五对
4. 瑞禽（朱雀或驼鸟）：	一对
5. 瑞兽：	一对
6. 华表：	一对

以上的制度是从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的。在高宗以前的太宗（昭陵）、高祖（献陵）以及高祖的父亲（兴宁陵）、祖父（永康陵）等四陵，所置雕像则各有不同。如昭陵仅有六马浮雕和立狮；献陵只有石虎、石犀；兴宁陵和永康陵则为瑞兽、蹲狮和鞍马。这大约是乾陵以前帝王陵墓石刻情况。

另外，在乾陵朱雀门外东西，两侧还有两座大丰碑。左为"述圣记碑"，碑共七节，所以又称为"七节碑"，碑身通高630厘米，碑每边宽186厘米，碑上层为屋形式房盖，中间五节为碑身，下层为碑座，其文为武则天所撰，唐中宗李哲书字，内容是颂扬高宗的文治武功，共约八千余字，笔画都用金填，

现在个别字的黄金还依然保存，闪闪发光。右为无字碑，高亦为630厘米，宽180厘米，厚130厘米，碑额刻八条螭首，两侧刻有线雕大龙云纹。初立时表里未刻一字，是表示帝王“功高德大”，取意孔子《论语》中说“民无得而名焉”的意思，故曰“无字碑”。宋金以后始有游人题字，据《金石萃编》载：宋金时代共有十三段题字，但字多漫漶，惟金代天会（太宗）十三年的“郎君行记”保存比较完整，它是用女真文字刻写的，旁有汉字翻译；契丹文字今已绝迹，此幢保存的这些文字是研究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在这两通碑的紧北边还竖立着61躯外国和少数民族王宾们的石像。他们一个个都拱手肃立，多为翻领束腰的“胡服”装扮，背后还分别刻有国籍和姓名。（现只能识别的仅有“于阗国□尉迟璥”，“吐火罗王子持羯达健”，“木俱罕国王斯陀勒”等数人）他们是在高宗安葬时，代表本国前来致吊，武后为了炫耀大唐国威，特命雕工把他们的形像雕置陵前，留为纪念。可惜的是这些石像的头部已全遭盗窃毁坏，造成在艺术上和历史考证上极大的损失。

127. 顺陵石刻

唐　咸亨元年（670）　顺陵，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陵墓，在咸阳市秦都区底张乡韩家村东。

杨氏死于咸亨元年（670），以王礼葬。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1）称帝改国号为周，追封其母为孝明高皇后，因此将墓改为陵。陵园周围雕有大量石

刻。保存到现在的还有石人十三尊，石羊三只，石坐狮一对，莲花座一个，华表顶一件，石础一对，石走狮一对，天禄一对。在陵的东、西、北三面各有石狮一对。陵北石坐狮，再北还有石马一对。特别是石走狮和天禄是顺陵石刻中的精品。

石走狮，体积巨大，造型雄伟，作阔步缓行的动态，和其他唐代石狮不同，与唐高祖李渊献陵上的行虎相类似。整个雕刻气势磅礴，威武有力，特别是高高突起的健壮胸肌和向前迈步的腿足部分，比例匀称，极富质感。头部披有卷毛，突目隆鼻之下是丰颐利齿，阔口半开，令人如闻吼声。石刻整体虽然达 4 米之高，但却不因庞大而忽略了细节，也不因细致地刻画了细部而影响了整体的气势。

天禄（又名独角兽）头似鹿，身如牛，有双翅，双翅上雕有华丽的卷云花纹，足为马蹄，尾垂与石座相连。这两件石刻体积都非常高大，腹下可坐数人，雕刻极有气势而又细致生动。

顺陵石刻除艺术品之外，原还建有顺陵石碑，是武则天为其母所立。碑刻于长安二年（702）正月，系武三思撰文，相王李旦（即唐睿宗）书，字体方正，稍兼隶篆，与景云钟铭相同。此碑原很丰伟，可惜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陕西发生大地震时倒仆，断为数节，今仅存八块，藏于咸阳市博物馆。

128. 建陵石刻

唐　宝应二年（763）　建陵，是唐代第八个皇帝肃宗李亨的陵墓，在陕西礼泉县东北的武将山上，也是依山为陵。

据《五代史·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获掘之。"建陵自建成后，屡遭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显然并非原来的面貌。保存在地面的石刻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布在陵园四门前的蹲狮，每门前各二，共计八只，狮高 145 厘米，宽 90 厘米。另一类是南门外的整群石刻，共约 40 余件，计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驼鸟一对（一只现移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

室内），石人十对，石马五对，每匹马左前方各有牵马人一个，均系武士装，这在唐陵石刻中还是少见。总观建陵各类石刻，较以前诸陵体型略小，但雕刻技巧却超越前代各陵。如陵前的鞍马，完全是采用了写实的手法，体形优美，肌肉饱满，雕刻手法简洁明确，就连马的辔结都交待得很具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置于马鞍上的“障泥”（鞯），表现得轻柔细薄，具有较强的质感。它与同一陵前的蹲狮、翼马同为唐雕刻中的优异作品。

129. 桥陵石刻

唐　开元四年（716）　桥陵是唐睿宗李旦的陵墓，在今陕西蒲城县西北的金炽山，坡头乡安王村。这座陵墓现存留的地面石刻，有石人十对，石马五对，石狮、石驼鸟、独角兽、华表各一对。此陵石雕的水平，达到了唐帝王陵石雕艺术的饱和点。在写实手法上尤为突出。由于时处盛世，即开元、天宝的前夕，一般的工匠们都得以发挥其艺术才能，制作出各种出类拔萃的新奇作品。如唐陵石雕中最常见的蹲狮，一般多是正面蹲坐，昂首吐舌，似已成定型，而在桥陵陵垣的东门前，雕工们竟独出心裁地雕出了一对转头狮，

雌雄两狮相对而视，好像彼此在倾诉山野中日夜守望的寂寞之情。这种富有生趣的蹲狮形象，出现在唐睿宗时代，正是符合于历史实际的。再将此陵的石狮和乾陵、顺陵同类制作相较，体积相类似，但明显地感到这一处狮子的形象更加写实。并可以看出在表现手法上已由对于形体的夸张而转向为对形体的美化。在体躯结构上注意到每一细小的变化，使形象更加真实，说明雕工们已完全掌握了狮子这一兽类的造型规律，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写实的手法，

表现出盛唐前期雕刻艺术所应具有的瑰丽风格。在唐18陵中，此陵为地面石刻存留最完整的一座。在碑石中，如《凉国长公主碑》是苏颋撰的文，《鄎国长公主碑》是张说的文章，《金仙公主碑》是徐峤之的文章。苏颋当时被封为许国公，张说属燕国公，二人皆能为文，被当时称为燕许大手笔，这三通碑，都是唐玄宗亲手以隶体书写。更有李邕撰书的，为世人推重的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也在此地。

130. 惠陵石刻

唐　开元二十九年（741）　　惠陵是唐睿宗嫡长子李宪的陵墓，因让位于其弟玄宗李隆基，故史称让皇帝。其陵在陕西蒲城县西北三合乡三合村。

《新唐书》卷八十一《让皇帝传》："睿宗将建东宫，以宪嫡长，又尝为太子，而楚王（李隆基）有大功，故久不定。宪辞曰：储副，天下公器，时平则先嫡，国难则先功，重社稷也。……帝嘉宪让，遂许之。立楚王为皇太子。以宪为雍州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后徙王宁，累封至五千五百户，开元二十九年（741）薨。"帝以宪实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号不称，乃追谥为让皇帝。"葬桥陵之旁，号其墓曰惠陵。

现陵前石刻有：石马、石狮各一对，石碑一通尚完好。

131. 泰陵石刻

唐　广德元年（763）　　泰陵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陵墓，在陕西蒲城县东北金粟山，今属保南乡敬母寺村。

根据《唐书·代宗本纪》载："广德元年（763）三月辛酉葬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于泰陵。"《大唐新语》又载："玄宗常谒桥陵，见金粟山有龙盘凤翔（疑虎踞二字）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宝应初，追述先志，而置山陵焉。"陵内陪葬人，一是元献杨皇后，一是内侍高力士。现有高力士石碑，立于大历十二年（777），已移至蒲城县文化馆。

陵前的现存石刻，有石人十对，石马二对，石狮一对，石浮雕驼鸟一只，瑞兽一对及华表等。就其陵前残存的侍臣石雕像看，周身比例适度，神态息然，衣褶的线纹流畅而写实，是属于盛唐时期的优秀作品。并且不同于一般侍臣雕像仅穿朝服，而在朝服之外加披了一件有似武将甲衣的无袖短褂，是

其特之处。唐玄宗时，侍臣已逐渐蒙宠操权，他陵前的石像，虽未刻姓名，但却令人容易联想到当时的宠臣如高力士之流的人物形象。另外在唐代各帝王陵瑞兽翼马雕像上虽属同一题材，但风格各有不同。在玄宗泰陵以前各陵，如乾陵翼马具有写实的作风，而定陵和桥陵则有着“四不像”的一些特征，而泰陵翼马则比乾陵更为写实，且富有矫健的形态。马腹下满布流云，与肩上的飞翅同样雕刻得绚丽生动，好像瞬间即可腾空飞去，这一翼马也正代表了盛唐时期的雕刻艺术风格。

132. 崇陵石刻

唐　贞元二十一年（805）　崇陵是唐德宗（李适）的陵，在陕西泾阳县北 20 公里蒋路乡蒙家沟的嵯峨山南麓。

唐德宗是一个极其昏庸的君主，在他统治的 25 年（780—805）期间，藩镇跋扈，京师曾发生泾原兵变，朱泚称帝，德宗被迫逃往奉天（乾县）。后又发生李怀光之乱，他又跑到汉中。京师仓库被乱兵抢劫净尽，几乎做了亡国之君。805 年死后，葬于泾阳县崇陵。

崇陵石刻今已大部损坏，但就残迹看，雕刻手法亦颇精致。自陵的朱雀门向南有石人十对（左为文臣，右为武将），石马五对，朱雀一对，飞马一对，华表一对。四门均有石狮一对。北门外又有石马三对，残破比较严重。朱雀门西有石础三个，旁有石人无头而仆，身穿斗篷，可能是当时少数民族的立像。

此陵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33. 献陵石刻

唐　贞观九年（635）　献陵是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陵墓。陵在三原县徐木乡永和村。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九年（635）冬十月庚寅葬高祖太武皇帝于献陵。"

陵前饰有大型华表、石犀，特别是石虎、石犀，体态雄健，沉毅、昂扬，除其中一石犀、石虎已移入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外，其他的石刻均尚置陵前。

134. 景陵石刻

唐　元和十五年（820）　景陵是唐宪宗李纯的陵墓，在陕西蒲城县西北的丰山，今三合乡义隆村。

据《新唐书·穆宗本纪》载：元和十五年"五月庚申，葬圣神章武孝皇帝于景陵"。陵内陪葬的有懿安郭后、孝明郑后、王贤妃并有惠昭太子宁，附葬于陵南下宫。

陵园内的石刻，有石人十对，石马五对，石狮一对，浮雕石驼鸟一对，独角兽一对，又有华表和石碑等等。而这些石刻中最突出的要算浮雕的驼鸟和石狮、独角兽等，不仅体积高大，气势雄壮，而且雕工也非常精美生动，都足以能够代表我国古代造型艺术隆盛时期的风格，可惜今日多有残损。

135. 光陵石刻

唐　长庆四年（824）　光陵是唐穆宗李恒的陵墓，在陕西蒲城县北尧山，今翔村乡光陵村。

据《新唐书》载：长庆四年"十一月庚申，葬睿圣文惠孝皇帝于光陵。"陵园内陪葬着两个皇后，一是恭僖王后，一是贞献肖后。

陵园内的石刻，原存石人八对，石马三匹，石狮一对，华表一对，石碑一通，现多有残损。

136. 药王山佛龛造像

隋·唐·金　此佛龛造像在耀县药王山太玄洞东行 0.5 公里许，路经关帝庙北约十步处。窟内共有大小佛龛 7 个，像 40 余尊，雕刻时代包括了由隋唐以至金代。

第一龛观音立像，高约 180 厘米，赤足立于莲台之上，右臂下垂，手残，披巾袒胸，腹结宽带，上部衣纹细若轻纱，下部较厚，运用高浮雕的形式雕刻在龛内前壁上部，形象完美，雕刻手法工整细致，宝冠璎珞还表现了隋代造像的一些特点，可能属隋末唐初的作品。

第二龛仅坐佛，高 3.18 米，花冠袒胸披巾，左臂曲折平放于左膝之上。右腿盘坐，左腿下垂自然落于莲台之上。造像两侧正壁间有“华原县尉薛楷华原县主簿刘宪前周至县尉孙维肖……”等题名。依据造像作风与题名官职判断，属隋末唐初的遗作。

第三龛保存比较完整的四尊浮雕像，分上下两层排列，上层立像三尊，高约 0.60 米，宝相冠，斜披巾，右手上举，左手下垂。右像躯体略小，姿势相同。左像举左手，右手下垂，为唐代遗作。

第四龛内左上方，坐佛，高约 1.5 米，高肉髻袒胸，伽服座，右手下垂，左手置于膝上，其下立像三尊，右上方雕二像高约 1.1 米，中雕一立像，形制作风与第三龛相同。时代亦不会相差太远。

第五龛，雕浮雕像五尊，上有思维菩萨，高约 1.62 米，花冠、项饰璎珞垂于胸前，左手垂膝，下层立像四尊，似为金代刻像。

第六龛坐佛，高约 4.10 米，高肉髻袒胸，两腿下垂，双足并踏莲台，其下雕四螭首，具有明代造像作风。

第七龛，作浮雕像五尊，分上下二层，上层为一佛二僧，下层为菩萨立像，造像作风亦属明代作品。

137. 千佛院摩崖造像

唐(618—653)　此摩崖造像在陕西麟游县城西南约 20 公里的百尺崖。

千佛院建于唐代，现已片瓦不存，仅有石窟崖造像尚存，即崖面雕凿像龛、佛、菩萨、天王、力士及罗汉等像，躯身高大，壮丽多姿。从其造像风

格、衣纹、装饰等方面观察，应属唐代初年作品，与该县慈善寺石窟年代相近。

138. 大佛寺石窟

唐　贞观四年（630）　大佛寺石窟，旧名庆寿寺，建于唐贞观三年（629），寺位于彬县以西10公里泾水岸边的山崖上，是长安通往甘肃敦煌、新疆一带“丝绸之路”的通道。所谓大佛寺，实际是一个高大摩崖的三尊像窟龛，后代在外部建有三层高阁，在高阁的左右，又有些摩崖窟龛，东面是“千佛洞”窟，西面是些小窟群。

大佛连佛座高约24米，螺髻、面方、耳垂，披衣袒胸，腰下系结佩带两条，盘膝坐于莲台之上；佛的左手着膝盖，右臂上弯，手掌向内，手指微屈；全身姿态自然，肌肉丰圆，面相端严。虽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多次修饰妆銮，仍显出原来魁伟的造型。但泥塑的味道很浓，尤其是两手的塑造，更失去唐代原有风格。在大佛龛的附近，有唐贞观四年的题记，说明大佛为唐代初年的作品。佛身后背系就崖壁刻成，背光上饰有蔓草、火焰、化佛、飞天等纹样，从作风看，仍多属唐代原作。其他各窟都是千佛及佛故事浮雕，无不维妙维肖，栩栩如生。

139. 慈善寺石窟

唐　永徽四年（653）　此石窟在今陕西麟游县城东南约2.5公里处。石窟包括两个洞窟及附近崖面五个佛龛。西窟高度约5.6米，南窟深2.56米，窟顶较平；造立佛一尊，高4.6米，巍然屹立，造型完美，外轮廓完整，头作高肉髻，双目瞑闭，仪态安详，面容肌肉丰腴，五官非常端正明显，具有雍容庄重的风度，尤其是作说法式的两手的刻画，更为饱满、圆润，富有肌

肉柔软感。在表现衣纹的雕法上，立佛像有很多独到之处，如袈裟披肩衣褶的反转变化，层次分明，结构优美，富有韵律，下身衣褶能勾画出体态结构，运用写实手法，使褶纹的粗细厚薄具有多种变化。北壁有尖拱形的佛龛一个，每边长 1.25 米，内雕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两边胁侍菩萨有共同特点，都是头戴宝冠，上身赤裸，仅佩璎珞、臂钏和锦带，下身裙带显得轻而薄，从整体结构看，除头部稍大外，全身的姿态、比例以及肌体刻画，都是很出色的，可以说是把丰润多姿的神态完美地表现出来了。裙带衣纹刀法简洁，也是很可取的。南壁也有小龛一个，雕一佛二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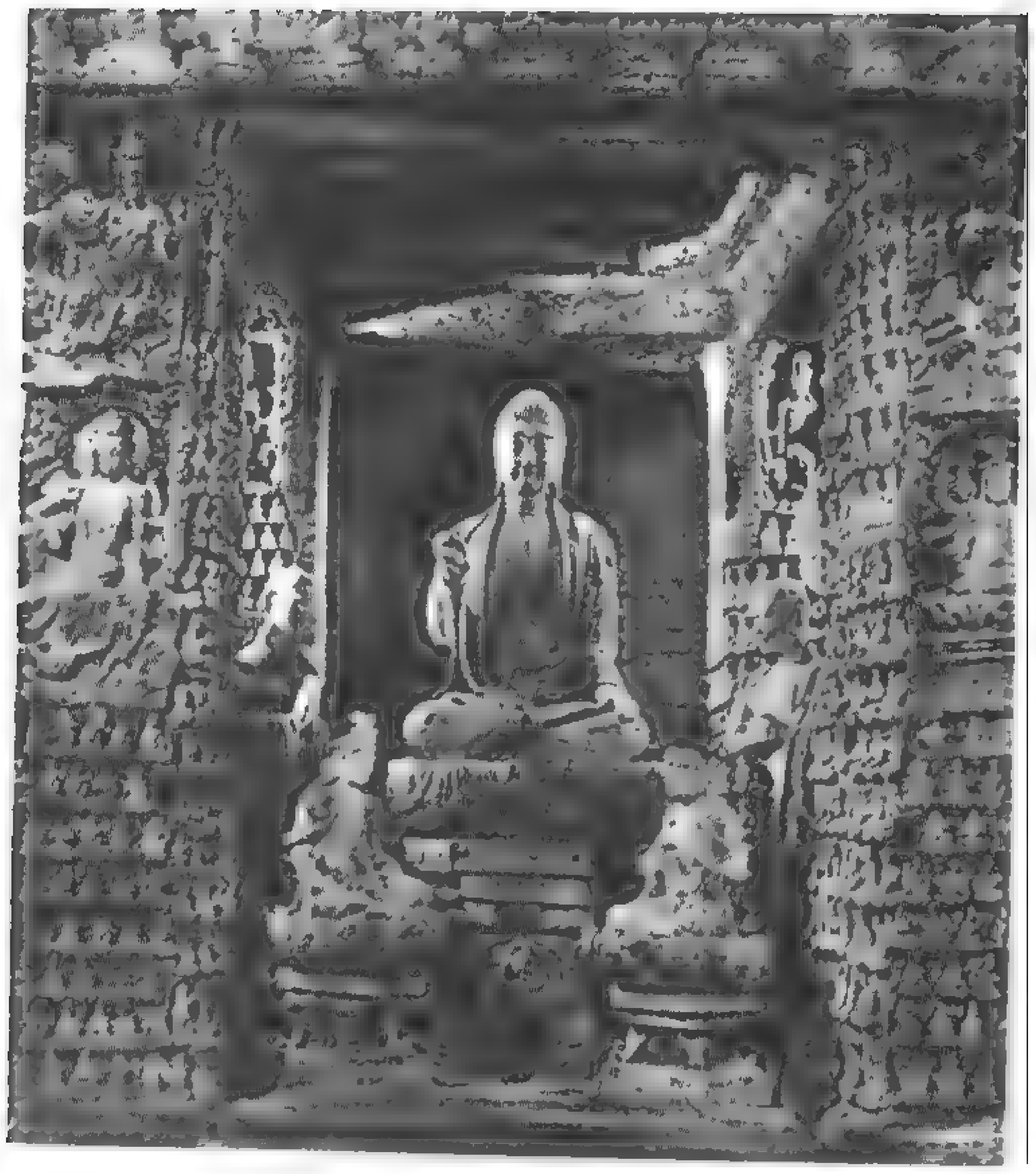
北窟深达 6 米，窟顶略呈弧形，造佛二尊，高约 3.5 米。壁上也凿有南、北两个窟龛，南龛内雕立像一尊，北龛则无所有。

附近崖壁五个佛龛，平面都呈方形，每边只有 1 米多，龛内雕有造像一至五不等。

这批石窟造像，保存基本完好，据县志记载：慈善寺崖壁间有石佛像，工巧妙绝，是唐永徽四年（653）的作品。特别可贵的是慈善寺现存两个石窟中南窟立佛，未经后代装修过，仍保持了初盛唐时代原有造像雕刻特点，无论从大刀阔斧的整体雕刻，还是精雕细凿的细部刻画，无不反映了初盛唐时代雕刻造像的浑雄而又精美细致的高超手法，并且成为唐代石雕像在刀法上的一种典范。

140. 子长钟山石窟

北宋　治平四年（1067）　钟山石窟，又名石宫寺，位于陕西子长县城西15公里的安定镇钟山山麓。据明嘉靖四年《重修普济寺万佛岩楼记》记载："……治平四年（1067）学佛人张行者偕石工王信辈之所凿焉。"石窟内造像记，有北宋熙宁、元丰、元祐和靖康等纪年，说明此石窟雕像是北宋治平四年以后20多年间的工程。



钟山石窟现存一大窟六小窟。小窟中雕像有一部分风化，一部分尚完好。具有代表性的是大窟内的雕像。钟山大窟石窟平面呈长方形平顶式，高5.5米，宽16.4米，深9.5米。中央佛坛上下连接的八根方形石柱，排成前后两行，四柱间各有一佛二胁侍的三尊像，形成三世佛的格局，结构较为复杂。石柱四面满雕小千佛，间以佛说法及佛传故事的龛像。三尊像顶各有复斗形藻井，雕像全部已被后代妆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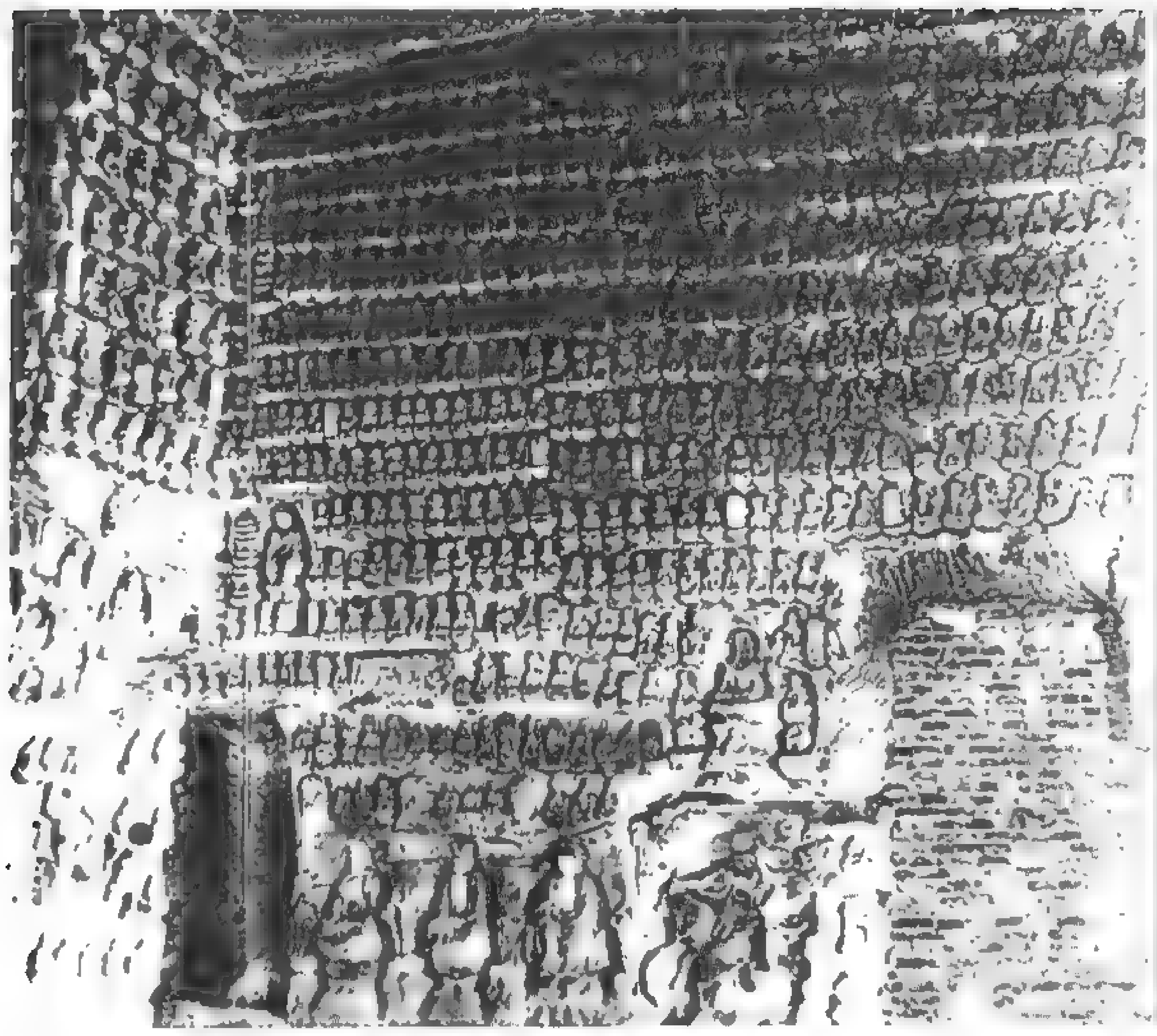
钟山石窟中的雕像，都雕造得生动优美，口目传神。如大窟中的三世佛，倚坐作说法状，比例匀称，形象具有地方特色。整个雕像运用写实手法，衣褶显得柔软多变，佛手的雕塑（很可能是塑成的）尤富有真实感。从整体造型看，表现出了宋代雕刻进一步走向反映真实的时代风格。特别使人值得欣赏的是佛的右手刻画，手势自然，指间变化起伏微妙，依稀可见筋肉骨骼和血脉的活力，富于质感。胁侍菩萨上身虽残，下部躯体仍不失为一件优美的艺术作品，菩萨的体态造型和衣纹的起伏变化都显示出高度的写实手法，虽然是残躯，犹能展现出宋代雕工们在菩萨造型上的才艺。另在大窟佛坛上的坐式菩萨雕像，面目清秀，服饰华美，整体完好，可与唐代同类造像比美，只是宝冠和衣饰稍嫌琐细。在雕刻手法上，这一造像的衣纹、裙带的体面转折犹如泥塑般的柔软多变，亦显示了宋代石雕的成熟技艺。在石窟前壁下方16尊高约70厘米左右的罗汉造像，他们并坐一排，动态神情各异，有的合目诵经，有的恍然深思，有的侧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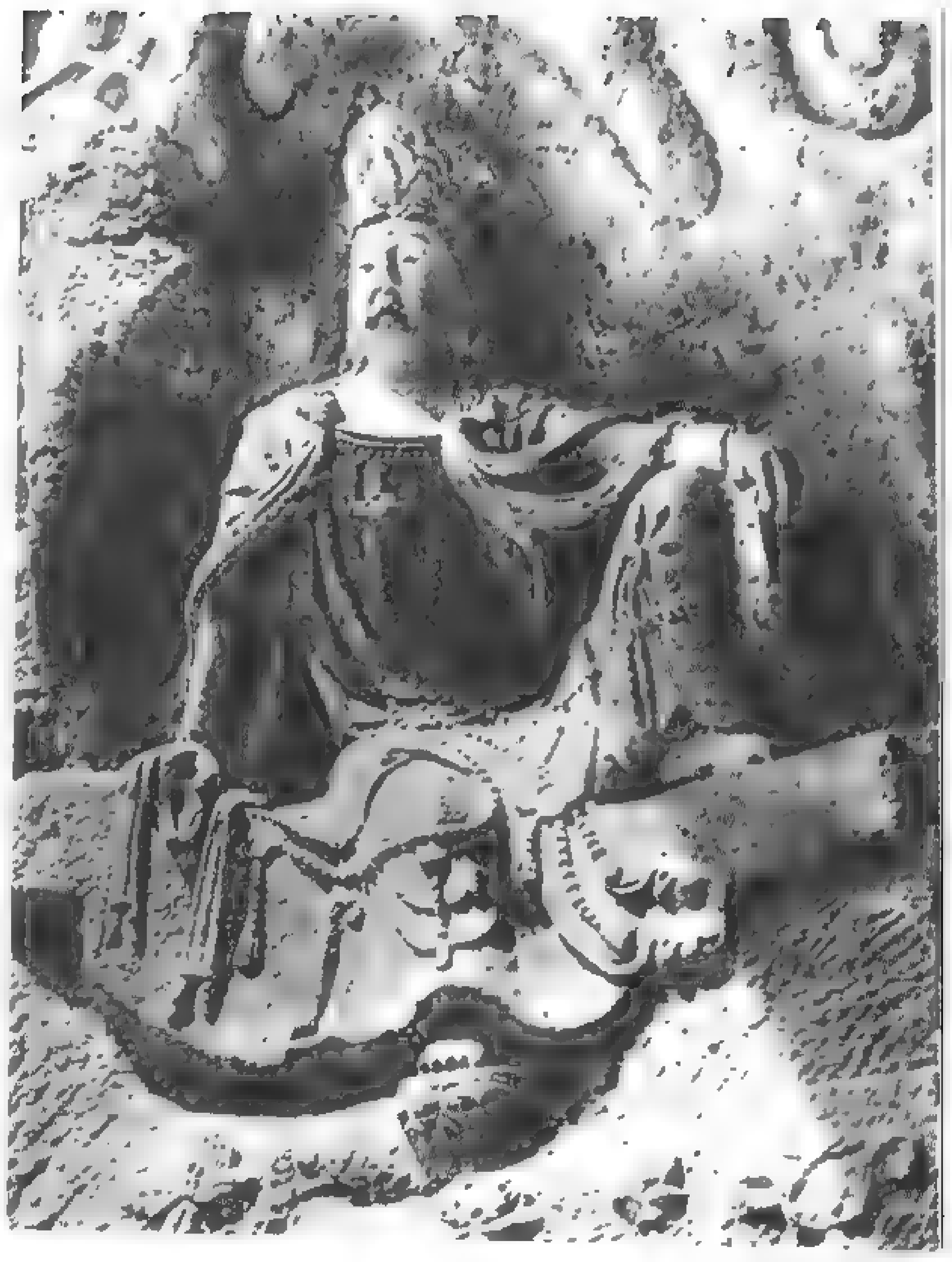
的垂眉，有的微笑，有的怒视，形体虽小，却具有宋代一般罗汉像雕塑的造型特点。上部的千佛雕刻，也各具神态，显得充满生气，像这样精工的千佛像，是其他各地所不多见的。窟左壁一组佛涅槃图，“功化已毕，入寂灭乐”的释迦仰身而卧，众弟子有仰面嚎啕，俯首饮泣，有的沉思，有的侧目凝视，神情动态维妙维肖。更有中央佛坛另一尊三世佛，交伽趺坐作说法状，螺发、袒胸，坐式优美，衣褶自然下垂莲座上，左右侍立迦叶、阿难二弟子，形象亦很生动，佛坐前还有左右相对的胁侍坐菩萨，盘腿趺坐于莲台之上。这种构成形式较为罕见。整个组像造型优美完好，连同周围的石柱龛像，形成钟山宋代佛教雕像佳作的汇集。

141. 延安万佛洞石窟

宋 元丰元年（1078） 万佛洞石窟，位于延安市旧城东门外清凉山西麓。依崖凿石而成，下临延水，据洞内造像题记知，该窟为北宋元丰间所造。石窟现共计一大窟，三小窟。

万佛洞石窟，第一号窟为大窟，即主窟，窟平面呈不规则的四边形，前部宽约 16.5 米，深 13 米，高约 8 米。四壁满雕千佛，姿态各异。并间有释迦、弥勒、多宝等佛像及观音、文殊、普贤菩萨造像。





万佛洞第二号窟位于一号窟的左侧，窟面近似梯形，前面宽 5 米，后面宽 5.7 米，深 4.6 米，高 4.6 米，窟无前壁，呈敞口状。窟左右壁前侧各雕

天王像一尊，双手扶钺，上下贯通一气，浑然一体，甲胄紧束，袍带飞扬翻卷，气宇轩昂，显得威武健壮。身躯肌肉虽没有唐代天王像那样饱满，亦颇浑厚，服饰还遗有唐代风格，但较唐代更显得富于装饰性。此洞之中还对称地雕有骑狮乘象的文殊、普贤菩萨。狮与象雕一猛一驯，性格迥然各异，对比强烈，饶有趣味。窟后壁还雕有三世佛及左右胁侍，其下还有一排罗汉像与左右两壁相连共 16 尊，形象姿态很有变化，生动可亲。

二号窟左上方为三号窟，窟宽 7 米，深 9 米，高 5 米。窟中央多级莲台坐弥勒佛，袒胸露脐，阔鼻薄唇，两耳垂肩，左腿下垂，右腿上屈，给人以亲切可爱之感。窟顶藻井别具一格，由内向外，依次为八卦图案、迦楼兰、二龙戏珠；莲叶荷花、宝相花及佛传故事等造像，雕刻风格类似陕西东汉画像石，刀法娴熟，形象传神。

四号窟面近似梯形，前面宽约 4 米，后面宽 5.9 米，深 5 米，高 3 米。窟壁用深浮雕手法雕刻成山崖、岩石、行云、流水、亭台楼阁及佛传故事，布局精妙，错落有序。窟顶中央为一复斗式莲花藻顶。藻井周围凿成棋格式天井，格内雕有宝相花、如意云纹、飞龙、朱雀、花卉及几何纹等图案。尤其还雕有一组飞天，围绕中心花卉急速旋转，翩翩起舞，衣带飘扬，极富有运动之感，技艺高超。

142. 黄陵千佛洞石窟

宋　绍圣二年（1095）　　黄陵千佛洞石窟，又名石宫寺或石空寺。位于黄陵县城西 40 公里的双龙镇附近。石窟开在半山高处，下临沮水，是陕西通往甘肃的右道。

此石窟开凿于宋绍圣二年，窟平面呈“凸”形，分为通道、佛坛和四壁三部分。甬道长 3.7 米，窟宽 9.2 米，窟深为 8.4 米，窟中央为“回”形佛坛，南、北、西三面为背屏式石壁，上接窟顶。窟口为三开间的檐廊，檐间有斗拱素枋等。

窟中央佛坛雕释迦、燃灯、弥勒及三世佛造像。窟后壁为五百罗汉及一百徒众浮雕造像。窟右壁为三尊立佛，各高 3.15 米，造像形体大而比例合度，肌体饱满丰润，衣纹随体起伏得当。窟左壁前侧为一尊高 2.55 米的高大药师佛，轮廓简洁，体态丰满凝重，但微有臃肿之感。面容亲切，衣纹用大纹条刻画，在静中微有动势，富于韵律。佛右下雕有七层宝塔，塔下两供养童子

对话，神态生动。龛顶壁浮雕两飞天，手持药钵，卧于彩云中，构图完美。以上部分都刻画得细小精微，更加衬托出佛身躯的伟岸和雄浑的气势。

窟前壁甬道口上方，为千手千眼观音，左侧为文殊、普贤、地藏、观音等，右侧从上至下为释迦、西方三圣、十方立佛等。十方立佛高约 80 厘米，脚踏云彩，依次横列，姿态相似，但手势不一，却彼此相互呼应。十尊立佛雕刻比例匀称，衣纹概括而富有韵律，庄严和谐而不呆板。由于有变形的云朵相衬托，更加富于装饰意趣。

甬道南北壁为日光、月光菩萨，两像相对站立。佛教造像中的日光、月光菩萨，即是认为司日、月之神。这两尊菩萨雕造是赤足立于莲座之上，手中分别承托日及月，体形健美，神态端庄、雅静，面部丰满，表情动人，宝冠披带，璎珞璧珰，华美灿然。雕刻手法相当熟练，刀法多变，很好地表现了质感。但人物比例下部较短，身上饰物也过于细腻琐碎。

甬道北壁中部为佛涅槃图。释迦侧身而卧，寂然入灭，周围众弟子悲啼哀号，痛不欲生。人物虽然不多，但结构布局紧凑，弟子们各种不同的痛苦表情和动作，把悲剧气氛渲染得异常浓厚。上方云端，雕出释迦之母摩耶夫人由两侍女搀扶，低头俯视，掩面而泣，这种富于人情意味的图景，与哭泣在佛周围的众弟子形成一个统一整体。雕刻手法简洁熟练，富有真实感。就连雕在佛床前的一组因悲痛过度而倒地的佛徒和两个嚎叫着的护法狮子，在形象刻画上都是很成功的。在甬道的南壁中部还雕有佛说法图，不仅造像雕刻精细，形式别致，其中还穿插了不少的听众人物；具体构图是佛安坐在祇园精舍的佛床上，作说法状，床前弟子围坐静听，有的侧耳，有的沉思，有跪有站，姿态不一，但神情都集中于聆听佛的说法上，就连护法狮子也昂首静听，气氛显得肃穆而和谐。雕工们以纯熟的技巧，洗练的刀法，将这一内容很完美地表现出来，成为千佛洞中较好的一组雕像作品。此千佛石窟从造像题记看，石窟为北宋绍圣、政和年间雕成，共花费了 20 年时间才完工。尤其在石窟中刻有雕刻师介端、介元、介子用、介政等的留名，在其他石窟中

是少见的，因而亦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143. 富县阁子头石窟

北宋 政和二年（1112） 阁子头石窟，又名段家庄石窟，位于富县城南约15公里处，窟是依崖石开凿成，仅有此宋窟一处。窟前有后代所建的佛殿。窟面呈长方形，高2.8米，宽4.2米，深3.8米。窟内有两根依地接顶的石柱，满刻小千佛像。窟后壁雕有三世佛及二胁侍，均经后代装修。东壁浮雕说法图及五百罗汉多有残损。西壁浮雕佛涅槃图尚完整：其中把佛像缩小，四周弟子们虽同样悲痛，但各自神情并不相同。有的掩面而泣，有的悲痛昏倒，有的捶胸顿足，有的甚至悲恸得呼天抢地，跌倒一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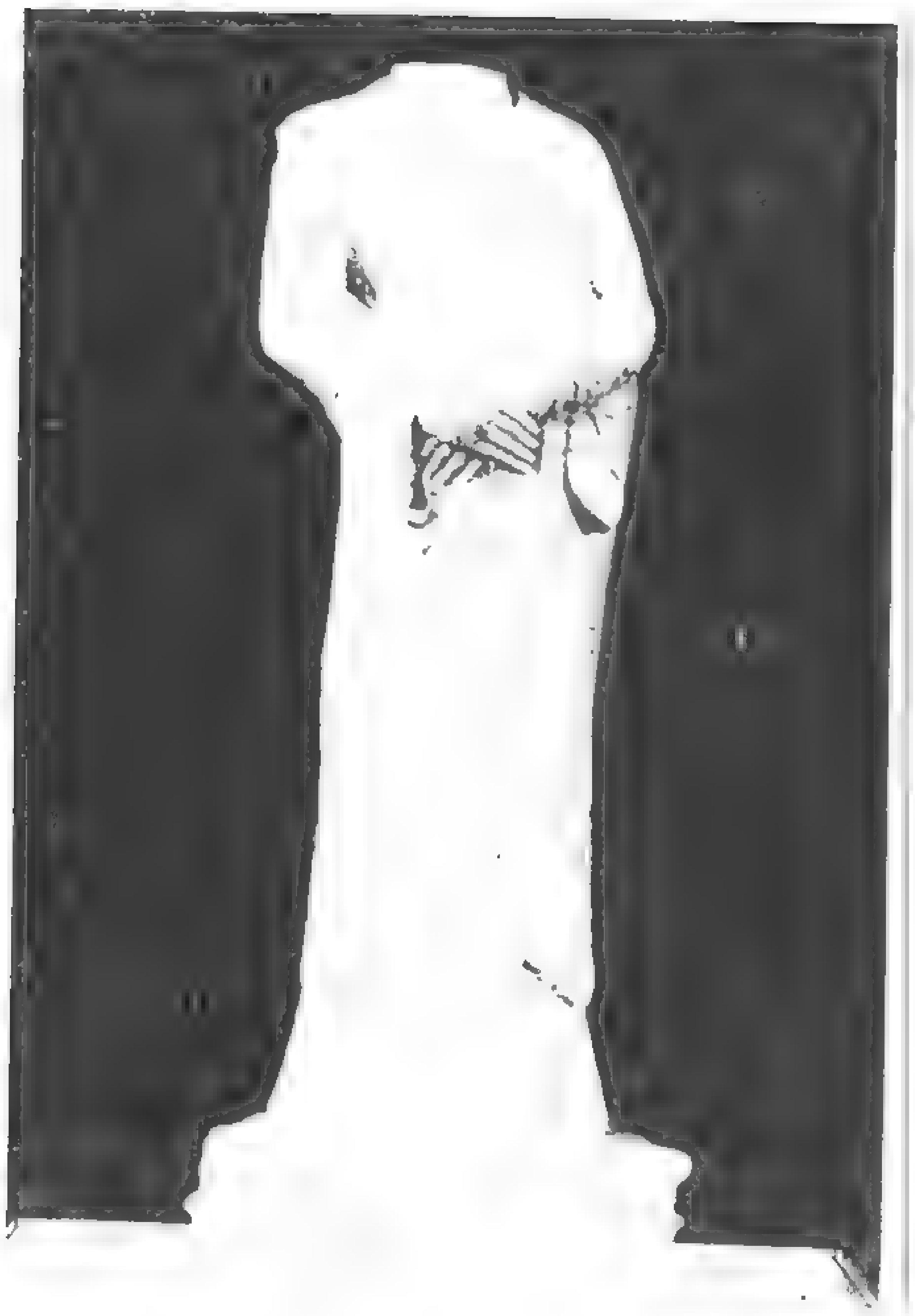
特别是佛床前两只狮子，仿佛也通人性，也正在悲号呜咽。所有人物层层排列，最下层匍匐在地，似在祈祷，表现了佛弟子们的虔诚。整个场面构图紧凑，排列有序，用祥云和菩提树相衬，便更完整而富于装饰意趣。雕刻手法具有浓厚的民间木刻形式。在石窟的造像中有北宋政和二年的开窟题记。造像刀法娴熟、洗练，简洁明快，反映了宋代无名匠师的艺术成就。

144. 富县直罗塔石雕像

宋（960—1279） 富县直罗塔在县城西45公里的直罗镇北，原为柏山寺旧址。在塔的第三层龛洞中，存有一组石雕罗汉和天王像，其中六躯为罗汉像，四躯属天王像，惜有的已残损。关于佛塔的建造时代，尚待考证；但从雕像的共同风格及雕刻手法来看，仍然和富县北宋佛造像是同一时代作品。其中一罗汉坐像，身着连有头巾的袍，安坐于双层座上。面像类似佛弟子中的迦叶，具有印度人的形象。从表情上看，显得生动自然，神态安详自若，富于个性，衣纹的刻画简练概括，刀法流畅明快，富于装饰情趣，不论在造型

或雕法上都与陕北黄陵千佛寺，特别是富县阁子头寺具有木雕趣味的宋代罗汉雕刻基本上是一致的。另一罗汉由于身份的不同，形象除与其他罗汉像相类似外，在座下却衬托有腾浪的蛟龙。还有一尊罗汉像，从形象上可以看出和一般的佛胁侍阿难弟子很相类似，表现了汉族僧人的形象。在雕刻的手法上除与其他各尊罗汉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可能由于罗汉名称的不同，因此人物形象、坐式及身旁的立兽，都有其特定的用意。从整体上看，这尊造像更显得完整而富有情节。至于塔中的四尊天王像，人物表情的刻画和躯体的结构，都表现出了宋代佛教雕刻中的一般程式。如延安万佛洞第二洞中的天王像，在造型风格上与这里的造像相类似。只是直罗塔中的天王雕刻手法很简洁概括，富有装饰意趣，从形象上看，它和同组的罗汉雕像都应是出自宋代雕刻名工一人之手，都是宋代石刻艺术中的佼佼者。

145. 罗汉残像



宋（960—1279）　　像残高 95 厘米。1949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此像圆身立形，颈断首缺，身躯完整，站立于带瓣莲蓬座上，双手交叉腹前，内衣小袖外披袈裟，左胁旁结挂钩式带扣，为宋后期式样；衣褶突起，线条简洁，承袭了盛唐艺术遗风。晚唐以后，泥塑兴起代替了石雕，到宋以后塑像盛行，石雕造像制作较少。此像胸部微向右倾，构型均衡，比例适度，神态自然，特别是手足丰圆，衣褶生动，给人以活的生命气息，十

足表现了写实的风格，是宋代典型作品的遗存，值得珍爱。虽然头部残缺，但身躯非佛的端严姿态，又无璎珞钏饰，亦非菩萨形式而站立莲台之上，当为罗汉造型，故列名罗汉残像。

现藏碑林博物馆。

146. 阿耨观音像

北宋（960—1127）　像残高 78 厘米。1949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此像造型为圆身，屈右腿坐岩石上，作观海状，座下缚龙，是配合《法华经·普门品》所谓“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的意思而雕此菩萨像，名为阿耨观音，是 33 观音之一。宋代海上交通发展，佛教国际往来多取道海上，有求于菩萨的保护，故多造此观音形像供奉，因而宋时这种菩萨形像较多流行。

像屈膝坐形，姿态舒坦安闲，虽是粗砂石雕刻，且头部残缺，但毫不损伤这一造型的艺术性，应是北宋时期一件成功的作品。至于腰束玉带、胸部雕造不如唐代造像丰满，这是时代风格的变化，也是宋代一般的习惯作法。

现藏碑林博物馆。

147. 青头观音

北宋（960—1127）　观音像通高 100 厘米。1957 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

观音头戴宝冠，梳高髻，波状发束垂两肩，面容清秀，耳垂珠珰，臂腕有钏，胸饰、腿饰及束带均为编珠式。身坐断岩上，衣带垂披岩前轻柔自如，曲右足，右手置于膝上，左腿盘膝赤足仰掌，左手伏置岩石上，姿态安详。为

一粗砂石雕刻，在断岩石上的坐式菩萨像。被称为青头观音，属 33 种观音之一。所谓 33 种观音菩萨，是中国、日本佛教徒据《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所载 33 身观音，包括杨柳观音、青颈观音、威德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延命观音、众宝观音、岩户观音、泷见观音、施药观音、鱼篮观音、德王观音、水月观音、一叶观音、能静观音、阿耨观音、阿么提观音、叶衣观音、一如观音、不二观音、持莲观音、洒水观音、琉璃观音、多罗尊观音、蛤蜊观音、六时观音、普慈观音、马郎妇观音、合掌观音等 33 尊，其中除白衣、青颈、多罗尊、叶衣、阿么提五观音形象。

这尊青头观音（亦名青颈观音）雕刻，手臂的柔和及衣纹刀技的熟练，虽稍逊于阿耨观音的技巧功力，但仍应是同一时期的好作品。

现藏碑林博物馆。

148. 富县石泓寺石窟

石泓寺石窟，亦名川子河石窟。位于富县城西约 60 公里处。石窟是依崖凿成。

石泓寺石窟共集中在七个洞窟内。由南向北，第一窟造像具有明代的风格，第二、第三两窟内均有佛坛，上有五尊像，四壁有千佛及佛龛雕像。第二窟有宋开宝二年（969）的题记，第三窟有唐咸通三年（862）的题

记。第四窟中央佛坛上为文殊乘狮像，并有后周显德元年（954）的题记。第五窟佛坛上，有三尊像，窟壁上有千佛像及佛龛像，在菩萨的背屏上，有“郑文雅造像，唐景龙□年”的题记，第六窟为主窟，前佛殿即正对着第六窟佛坛，窟平面呈长方形，深10.7米，宽10.3米，高约5.4米，造像共计有3000余尊，窟内造像有金皇统元年（1141）、贞元二年（1154）题记。第七窟结构特别，三面均有并排泥塑像，从风格上看，显得是明代作品。

由窟内造像记有唐咸通三年（862），后周显德元年（954），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等，又据调查1982年又在窟内发现了隋炀帝大业三年（607）的造像题记。但从窟口右内侧的一铺造像风格来看，似是北朝造像，故此石窟也很可能始凿于北朝。似乎可以说富县石泓寺的开凿年代，建于隋大业间，唐、宋、金、明、清各代均有雕凿。

在石泓寺众多的雕像中，特别值得提到是窟内的罗汉半倚坐像，自在适意的神态，很富有个性。像的衣纹和坐石的雕刻刀法块面分明，犷爽有力，简练而概括。对苦修的山林环境，表现得很真实、自然，是一具艺术性较高，也是宋代造像中较好的作品之一。

149. 大德造像

元　大德四年（1300）　像高111厘米，宽58厘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移交入藏。

白石圆首碑形石上，浮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像后线刻圆光，头戴佛冠，雕饰繁丽，脸形扁平，左手持钵，中置一瓶内插柳枝，右臂曲于胸前手拈柳枝，左足仰掌盘膝座上，右足垂座前莲蓬上，旁雕蚌形荷叶及莲蕾，为唐宋以来传统手法。胸饰璎珞周身衣带褶皱极其繁复，表现了元代的雕刻技法和风格。元人以剽悍的游牧民族，继承宋传统文化，在宗教上对西藏采取怀柔政策，定喇嘛教为国教，因而在雕刻上虽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作风，而大量参杂了喇嘛

雕刻技法。所以形式上承袭了前代，而在艺术风格上比照唐、宋造像作风却大不相同，表现极为繁杂。元代石刻作品全国遗存甚少，在陕西尤为罕见，这尊造像有具体记年，可作为元代一件典型制作来看。像背右上方刻“大德四年庚子”的记时和奉佛弟子窦进室索氏一家筹建的记事，左方刻“汤泽造”字样。在历代造像中记雕刻者姓名者极少见。而这件造像留有雕者姓名，是值得注意的。

现藏碑林博物馆。

150. 富县石佛堂石窟

明（1368—1644）　石佛堂石窟，位于富县张家湾乡石房头村南二里处。共有四个窟。二号窟系主窟，高 2.16 米，宽 4.9 米，深 4.7 米。该窟没有发现造像题记。但从造像风格判断，应属明代早期或中期。窟内造像充满世俗味，有的甚至是活脱脱的人间生活写照。这为我们研究石窟艺术的发展史，提供了参考的实物资料。

二、西安碑林中的书法艺术

铭刻碑碣之学，在我国古代称为金石学，具有肇始之功的是被称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的青铜器和碑碣，降至清末，随着地下文物大量出土，类别增加，甲骨、简牍、玺印、泉刀、镜鉴、砖瓦等等，都成为金石学的内容。由于金石文字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和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所以，很受学者们的重视；同时，铭刻碑碣又包容了历代书法作品，吸引着无数书法爱好者，并成为学书者取法的楷模，西安碑林多年来，就是古代碑石墓志的集中地，早为国内外所瞩目。以下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略作赏析和概述。

所谓碑，本来只是一块大石板，上端中间穿圆孔（见西安碑林中的《唐公房碑》）立在墓穴边，用来穿系绳索，把棺木缓缓放入墓穴。公卿大夫家门口也立有石头，用以系马，即是后世的拴马桩。宗庙祠堂前也立有石头，用来拴祭祀用的牺牲，这些石头，通称之为碑。所以，《说文》解释“碑”为“竖石也”。石上原来没有文字，大约在西汉晚期才开始刻以文字，记述墓主人姓名、官位、卒葬年月，成为墓前的识记，称为墓表，（在此以前亦有过刻石记事，如《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等，但都称之为刻石，而不叫碑）以后刻的文字逐渐增多，详细记述死者的姓名、家世、生平事迹，还有颂扬和悼念的诗铭，称为墓碑，也称丰碑。后来凡刻有文字的石头都称作碑。而现今所说的“碑刻”，实则包括了庙碑、墓碑、墓志、造像、经幢……等等。广义地说，还可以包括天然崖壁上的题刻。

碑帖是学习研究书法的范本，是碑刻和法帖的通称。实则碑和帖不同。碑，一般由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早期的碑头成简单的圆首或尖首，这些形式，可能受周代琬圭和琰圭两种礼器制式的影响。在圆首形碑上刻有弧形的几道浅漕 —碑晕。在碑的上端镂有一个穿透碑身的圆孔，称碑穿。到魏晋时期，碑晕逐渐发展成盘螭形装饰。螭，传说是龙的一种，也是青铜器

上常见的纹样，可能是由原始社会的图腾演变而来。

碑身是碑的主要部分，一般用竖长方形的巨石雕成，历代变化不大，碑的正面谓之阳，背面谓之阴，左右谓之侧。碑阳刻文字，也有刻人物、山水、花草、禽兽、地图等。古代刻碑的通例，碑额为标题，碑阳为文，碑阴和碑侧为题名。碑石刻文的制作，先用朱笔把碑文写在石面上，称为“用丹”或“书丹”，然后刻工就在字迹上刊刻。因为书法有优劣，镌刻有精粗，碑刻文字便出现种种不同风格和面貌。碑侧除刻题名之外，亦常常刻一些精美的图案花纹。

安放碑身的石座，称为趺。早期碑座为简单的长方形，上面往往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南北朝时出现龟形碑座，称为龟趺，也叫赑屃（bì xì），当是由早期碑座上雕刻的玄武发展而来。也可能是龟象征长寿，将碑座琢成龟形，冀望石碑保持永久。不过唐碑也不尽全用龟趺，《唐六典》中说：“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龟趺，降五品为碣方座圆首。”说明龟趺的使用还有官阶的区别。

帖，则是把前人的墨迹，摹刻于石上或木板上，以供学习书法者临摹，后来遂通称为“帖”。在书体上，帖上少有篆、隶两体，以行、草、楷书居多。

另外，人们通常看到的黑地白字的碑帖，则是从石刻或其他质地的刻物上，用纸以墨椎拓而成的。这种从碑刻上拓制下来的文字或图像等，称之为“拓片”或“拓本”，因为是从实物上打取的，所以也称“脱本”。也有称拓本为“榻本”的。但古时所谓的榻本，是专指摹搨而言，即从真迹上以双构填墨摹制的副本。唐人摹搨精工，所谓“下真迹一等”。唐太宗时还设有专门的搨书人，著名《兰亭序》的摹搨者冯承素，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刻帖和椎拓的盛行，摹搨本逐渐为拓本所代替，宋元以后，搨拓二家，遂常常混为一谈，而双钩廓填的榻本则别称为“摹本”。

古时拓碑先用水蜡（后改用白芨）涂于碑上，然后上纸，为使拓本精良清晰，还必须把纸椎拍陷入字画内，才可拓墨，也可拓成朱色，碑帖即成。为防止虫蛀，往往在拓片表画涂 -层薄蜡，故椎拓也称“毡蜡”。

有了椎拓这个方法，无论金、铜、玉、石、砖瓦、陶器上刻铭，以及摩崖、造像等的文字，都可如实复制下来，形成拓本。各种拓本也是重要文物或珍贵艺术品，特别是在原器物失传或损毁的情况下，拓本的价值就一纸千金了。宋代黄庭坚曾说：“孔庙虞书（孔子庙堂碑）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拓本的珍贵和受人的重视，由此可以想见。

碑刻、法帖、拓本，都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实物资料，其中不少可以视为国宝，能够目睹，实是一种幸运。

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它以独特的风格，丰富多采的形式，光耀于世界艺术之林。西安碑林有幸珍藏着一大批古代碑刻，不少是属于书法艺术的精品，有篆、隶、草、真、行等多种书体，各具丰采，令人赞叹不已。

在篆书方面，西安碑林保存有著名的秦代《峄山刻石》，虽系宋代翻刻，但神韵尤存。《峄山刻石》，亦称“峄山碑”。峄山又名邹山，在山东邹县东南。山势高峻，峰峦连绵起伏，络绎不绝，故又名“峄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曾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祭山川之事。”相传《峄山碑》上的文字为秦丞相李斯手书，是小篆正宗。惟其石久佚，有宋代郑文宝据拓片摹刻者，为最有名，西安碑林中的《峄山刻石》即此。碑上小篆为秦统一中国后规定的汉字标准书体，后世称之为“秦篆”。唐张怀瓘的《书断》列秦丞相李斯的小篆为“神品”，赞之“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长风万里，鸾凤于飞”。其书法特点是：用笔“骨气丰匀，方圆绝妙”，结体平庄匀称，法度谨严。

《峄山刻石》而外，碑林中唐代篆书有李阳冰书写的《三坟记碑》、《栖先茔记碑》和《颜氏家庙碑》碑额，以及尹元凯书写的《美原神泉诗序碑》等，都颇具盛名。宋代僧梦英的《篆书偏旁字源》，也是篆书名碑。

隶书，最初是小篆的简便写法，把圆转的笔迹，改成方折；原来连续不断处，大部拆开，点、画都具备了固定的样式和轻重姿态，这便是今天所见的“汉隶”。汉字发展到隶书，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也是我国书法史上一大进步。碑林中的隶书著名碑石有汉《苍颉庙碑》、《仙人唐公房碑》、《曹全碑》等。其中《曹全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185），碑的石质，一反一般汉碑的粗拙、灰涩，而是黑亮如涂油脂，光可鉴人。像这样碑身完整、字迹清晰的汉代碑石，实属罕见。碑文书法秀美婉畅、神韵飘逸，有如飞掠晴空的行行白鹭，为东汉隶书极盛时期的精品，向为历代金石家和书法家所称道，屡见于各家著录。

碑林中唐代隶书名碑较多，有梁守谦的《御史台精舍碑》，史维则的《大智禅师碑》，韩择木的《告华岳文》及唐玄宗亲自作序、注释和书写的大名鼎鼎的《石台孝经》等，都是盛唐时期的隶书代表作。1983 年 12 月在西安西郊三民村发现的唐《杨孝恭碑》，碑文书法也是隶体。

草书，是起草文稿时用的一种迅速方便的字体。就章草说，始于东汉，而

今草则始于晋代。宋代以后，今草特为通行。草书又有大草、小草、行草和狂草的区别。碑林中以智永、张旭、怀素等人写的《千字文》为最著名。

智永，为南朝陈永欣寺僧，号永禅师，浙江会稽人，俗姓王，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善书，能兼长诸体，草书尤胜。他统一了张芝、二王各家的今草笔书。后人评其书法“骨气深稳，体兼紧妙”，连唐初三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都“承其矩矱，莫敢僭越”。他所写的《真草千字文碑》中的真书更是化方为圆，秀润有劲。据说当时向他求书的人很多，住处的门槛都被踏损，不得已包以铁皮，人称“铁门槛”。他临书二四十年，发誓“学不成，不下楼”，他用过的秃笔头投在竹簏里，没有几年，五簏皆满，埋起来像冢一样，给后世留下了“退笔冢”的佳话。

碑林第三室保存有《断千字文》五石，书法逸势奇状，连绵回绕，妙绝古今，传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张旭所写。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一带）人，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他往往喝酒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笔意纵横，淋漓酣畅，自成一家。他也精通楷法，但以草书知名，被时人称为“张颠”。杜甫《饮中八仙歌》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名句。在唐文宗（李昂）时（827—840），李白歌诗，裴旻舞剑，张旭草书，被称为三绝。颜真卿也曾向张旭请教过书法，据说他传给了十二草意。

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笔法，而以“狂草”得名，为后世学者所效法。碑林中有唐僧怀素的草书《千字文》、《圣母帖》、《藏真帖》、《律公帖》等。这一幅幅帖页，小字如春花初放时的清新秀丽，大字如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奔放洒脱。唐代诗人李白、苏涣、贯休、任华、戴叔伦等，都亲眼看见过怀素挥毫作书的气势，并用诗歌的形式抒发过他们的感想和赞叹，其中李白的《草歌行》更是脍炙人口：“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独称少；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每一个读过此诗的人，谁个不渴望来看看怀素的手迹呢！

楷书，也叫真书、正书。从汉字字体变迁上说，它是隶书的变体。楷书在魏时已经出现，晋代稍有变化。那时楷书和隶书在形体上差不了多少，字体稍方扁，不像现在是正方形的，在魏晋期间，凡是工于正书的人，一般都善隶书。西安碑林收藏的1952年在西安市广济街出土的《晋司马芳碑》，虽

已残断，但为陕西第一次发现的晋代碑石，笔法刚健古朴，形体当在隶书和楷书之间，是一种从隶到楷的过渡字体。北魏《元桢墓志》，字体刚劲豪放，上承汉魏隶体余韵，下开隋唐楷书先河。此外，北魏《元简墓志》、《穆亮墓志》、《元辉墓志》、《元秀墓志》、《元灵曜墓志》和“皇兴造像”、“景明造像”、“田良宽造像”上边的铭文，以及《晖福寺碑》等，都是碑林中保存的北魏书法珍品，它们和《元桢墓志》在书体特点上属于同一类型。

到了唐代，楷书基本定型，字体多接近正方形，这个形体一直保持到今天。碑林中有代表性的楷书作品，多出自诸名家之手，下边略举数例：

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于志宁撰文。字体点画清劲绰约，格局峻峭，虽传为复刻，但神韵犹在，向为初学书法者奉为楷模。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少年博学经史，尤精于“三史”，隋时任太常博士；唐高祖时任给事中；唐太宗设弘文馆，精选人材研究书法，欧、虞（世南）是当时第一流的书法家，都被指定传授楷法。欧阳询被授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又因曾任太子率更令，故他的楷书又被称为“率更体”。唐人评他的书法，若“草里蛇惊，云间电发”，又如“金刚瞋目，力士挥拳”，可以想见其风格。欧阳询的书法是融合了魏晋菁华，于劲险中见规矩，于平正中见险绝；变二王体而自创新风格。《皇甫诞碑》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又是一初唐碑刻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学家和书法家们称道不已的作品。欧、虞并称为初唐两大书法家，二人都学王羲之，但各有所得。虞世南从释徒智永传笔授笔法，声誉当时在欧阳询之上。其书法笔力坚挺，外柔内刚，用笔点画显得沉厚安详，有韵度，前人曾以“沉粹”二字形容他。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学书，也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写了“晋”字后，令虞世南填“戈”字，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看了后说：惟“戈”字笔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当时虞世南的书法是非常受唐太宗重视的。唐张怀瓘评论欧、虞书法，“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对虞更加推崇。《孔子庙堂碑》初书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碑文内容是记述唐朝皇帝封孔子的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孔子庙等事迹的。书品位高，被誉为唐碑第一。据说此碑刻成后，曾经是“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见清孙承泽撰《庚子销夏记》），所以没有多久，碑石即被毁坏。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复刻，后又佚失。因此碑文原拓极为珍贵，宋代黄山谷（即黄庭坚）曾有“孔庙虞书贞观刻，千

两黄金那购得”的诗句，足见原刻拓本在北宋时已经不易得到。现存碑林的这块碑石，是宋太祖建隆、乾德年间（960—968）由王彦超摹刻的。另外，在山东城武（今成武）还有一块元代摹刻的《孔子庙堂碑》。一般称西安这通碑为“西庙堂”，称成武那通碑为“东庙堂”。

褚遂良是继虞世南之后的又一大书法家。他曾奉诏在长安写过一份《圣教序碑》，于唐永徽四年（653）将序和记分刻两碑，现存立在大雁塔南门两侧。世人称之为“雁塔圣教序碑”。褚遂良因坚决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至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在那里，他又写过《圣教序碑》，在他去世后被刻立于同州，世称《同州圣教序碑》。碑林第二室东侧有一通特别高大的方座石碑，座上四面浮雕有唐代风趣的天王像，即是褚遂良书写的《同州圣教序碑》。碑文书法刚劲，被誉为“铁画银钩”，一如其人之刚直敢言的性格。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杭州市）人。他在初唐书法家中，年辈较晚，很受欧阳询的赏识，因而名声很大。唐太宗有一次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再没有值得与之论书说法的人了。魏征立即推荐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体”。太宗即召入侍书，并将所有购求来的王右军墨迹拿来，让他鉴别，结果一无错处，可见其功夫之深。

碑林第二室陈列有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碑》，也是留存至今的唐代楷书名碑。欧阳通是欧阳询的儿子，新、旧《唐书》均有传记。他幼年丧父，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书。通过锐志钻研，刻意摹习，得以继承家法，父子齐名，世称“大小欧阳”。欧阳询所书碑帖国内尚流传有数种，而欧阳通所书碑石却很少看到，除今河南开封博物馆所存《全男生墓志》外，就唯有此碑了。《道因法师碑》书法秀整遒劲，英气逼人，是喜爱欧体字者欣赏和学习的良好范本。欧阳通书写此碑时，正是初唐书法已经发生新的变化的时期，他却仍然以“善学父书”而著称，因而《道因法师碑》完全是步趋《皇甫诞碑》的风格，但也有人评论它“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的（见汪珂玉《珊瑚网》）。清代何绍基对此碑甚为推崇，认为“险劲横铁，往往突过乃翁”。

中唐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的笔迹，在碑林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颜书有《多宝塔碑》、《颜氏家庙碑》、《郭家庙碑》、《颜勤礼碑》、《臧怀恪碑》等等。这些碑石都是一碑一貌，各具不同风格，早已为国内外书法爱好者所推崇。《多宝塔碑》，刻于天宝十一年（752），徐浩题额；《颜氏家庙碑》，刻于建中元年（780）李阳冰篆额。《多宝塔碑》书体锋芒锐利，笔姿峥嵘；《颜氏家庙碑》却寓刚于柔，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臧怀恪碑》则介于两者之间。

从这些碑石的书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书法家的成长过程。《颜勤礼碑》由于出土较晚，拓印者较少，得以完贞葆全。故更显得笔笔丰满，棱角峻峭，使人更真切地感受到颜体书法的绰约风姿。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新（今山东临沂县）人。曾作过平原太守，又曾被封为鲁公，故有颜鲁公之称。他在书法上总结了前人的优点，“融篆、隶之法入行、楷”，用笔奇伟，功力深厚，法前人而寓新意，创造了唐代盛行的新体——颜体字，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极为深远。

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刻于唐武宗会昌四年（841）。碑文内容主要是讲述大达法师在唐德宗、顺宗、宪宗时受到朝廷恩遇的情况。碑石原立于唐长安城内安乐坊（后改为延政坊，在今西安东郊电厂路一带）内的安国寺中，宋元祐年间移入碑林。《金石萃编》第一百一十四卷有著录。柳公权，字诚悬（778—865），京兆华源（今陕西耀县）人，元和时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太子少师，死后追赠太子太师。《新唐书》、《旧唐书》均立有传。据记载柳公权12岁时，便能作诗，后来对《诗》、《尚书》、《左氏春秋》、《国语》及庄周文章，都曾深入地研究并有精辟的见解。他特别爱好书法，对笔、砚、图书之类，亲手管理；而金银财宝则交给仆人经管。据说他的仆人保管一箱金银酒器，本来贮装封锁严密，可是后来开箱时却空空无物，他问酒器何在？回答说不知如何丢失了。于是他笑着说：“银杯不羽化耳”不了了之。可见他的为人态度。唐代很重视书法，翰林院有侍书学士；国子监有书学博上；科举有“书科”，吏部也以书判定选额，故而书法也是当时读书人进身途径之一。柳公权在唐穆宗时被召为翰林院侍书中禁，当时公卿大臣为其祖先树碑立传，都求柳书，足见柳公权在当时是极负盛名的。在书法上，柳公权善章草，尤工于楷书。初学王羲之，后遍阅唐初诸名家书法，而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笔力雄健，自成一家，与颜真卿一起开创了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代新风，世有“颜筋柳骨”之称。柳公权一生中所书写的碑石、墓志很多，仅宋代《宣和书谱》中就收录有数十种。惜历经动乱，已所余无几，现保存在陕西的，计有《玄秘塔碑》、《冯宿碑》、《符璘碑》、《刘沔碑》、《李晟碑》、《圭峰禅师碑》的碑额，以及《淳化阁帖》中的柳体字帖等。《玄秘塔碑》写于他64岁时，是存留下来的柳书真迹中的精品，字迹清瘦，神韵刚健，最能体现柳书的特点，向为人们学习“柳体”字的范本。此碑阴刻有大达法师弟子正言购买庄宅一所，内庄宅使发给执据等情节，更是研究唐代寺院经济的珍贵资料。

行书，笔画简易流利，是介于正楷和草书中间的一种字体。由于楷书过

于拘束，而草书又难于辨认，于是在三国末期，行书始与正楷同时流行，互为补充。西安碑林中行书的代表作是唐僧怀仁集王羲之字于咸亨三年（672）刻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此碑虽系集字摹刻，但那秀劲超群、美若簪花仕女的王羲之字，分行布白，笔意俱存，俨然一气写成，令人称赞不已。王羲之，字逸少，东晋时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官至右军将军，因而世又称之为王右军。其书法擅长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各体。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得力于张芝、钟繇，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草隶尤为古今之冠。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他把行、楷、今草等各种新体，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书法艺术在东晋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羲之评价自己："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又曾说过："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在他看来，只要下苦功夫，没有学不成的，足见他学习书法，也是经过一番废寝忘食、刻苦练习过程的。王羲之的笔法丰富多彩，善于变化，人们称他是书法集大成者，有"书圣"之称。梁武帝评王羲之字迹"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碑文中有"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的佳句，这固然是唐太宗李世民赞扬玄奘的语句，而用来形容王羲之的书法，却也恰如其分。王羲之生前，其书已颇受重视。相传山阴（今浙江绍兴）有一道士想请王羲之为他写一本《道德经》，恐其不允，便想了个妙法：道士听说王羲之喜爱白鹅，常仿效鹅掌拨水的动作来锻炼腕力。于是他就购买了一群小鹅精心喂养。几个月后，小鹅长得遍体雪白，丰满可爱，他就有意把它们赶到王羲之经常路过的地方。果然被王羲之发现，要求道人卖给他。道人乘机提出请他写《道德经》的要求，王羲之欣然答应，这就是"书成换白鹅"一典故的出处。盛唐时，王羲之的墨迹更是风靡一时；或以他的字刻碑；或重金购求、收藏他的笔迹；或临摹他的文帖。唐太宗李世民也很喜欢王羲之的字，曾下诏全国，收买王羲之的墨迹。太宗死后，还将著名的《兰亭序》随葬于陵墓中。据《五代史·温韬传》：温韬曾盗掘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看见内部"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置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书画，钟、王墨迹，纸墨如新"。唐高宗李治与太宗时间相接，想来陵内大约也如此。李治生前尤喜爱王羲之字，曾多方收集，临终遗嘱把他生前收集的书帖全部随葬（见《乾陵述圣记碑》）。上有所好，下必有应，唐人多有喜欢王羲之字的。怀仁和尚为集刻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曾带领弟子，苦心搜求 20 多年，以"一金易一

字”，才集成此碑，故后人称之为“千金帖”。

碑林中还有僧大雅集王羲之字刻成的《兴福寺碑》（已残断），字体秀美，一如《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此碑建于唐开元九年（721），碑主生前为内侍官员，所以有可能借得内府所藏王书真迹，从事摹集。此碑也向为书法家们所重视。

颜真卿书写的《争座位稿》（又名《致郭英义书》），也是碑林中行书的一种。它是人们熟知的《祭侄文稿》、《祭伯文稿》、《争座位稿》三稿之一。字里行间，涂改处历历可见，全篇书法圆劲，许多字还写得豪宕尽兴，姿势飞动。因此碑是以颜氏致友人的书信文稿本摹刻的，不比一般专为刻石而书写的文稿，更能直接显示作者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此碑在书法艺术上与《兰亭序》堪称行书双璧。

宋代山谷道人黄庭坚所书诗文，分刻在碑林第四室东侧的五块长方形碑石上。内容可能属对汉城的怀古。其书法特点是运笔圆劲苍老，结体紧密，脱胎于颜真卿行书，又参以《瘗鹤铭》笔法，论精神不在他的著名墨迹《松风阁诗》卷和《刘宾客伏波神诗》卷之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浓，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对黄书十分推崇。

碑林中《游天冠山诗碑》是元代首屈一指的大书画家赵孟頫所书。据《元史·赵孟頫传》：“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明陶宗仪《辍耕录》也称：“孟頫以书法雄一世，画入神品。其书，人但知自魏、晋中来，晚年则入李北海耳。”可知对赵孟頫的书法，历来评价都很高。《游天冠山诗》是清初邓霖以西安碑林唐、宋刻石累累，唯无赵文敏（孟頫）字，特为摹刻的。

此外，碑林中还有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书写的《秣陵旅舍送章生诗》；清玄烨（康熙皇帝）临米芾的《赐吴赫书》；清刘墉（石安）书的《初画心机》碑；以及林则徐的《游华山诗》等等，都是难得的佳作。

碑林中收藏的《大观圣作之碑》，刻于宋大观二年（1108）。碑身形体高大，碑额是当时权相蔡京所写。碑文是宋徽宗（赵佶）所撰并书写的。由李雍摹写上石，摹工精良。

宋徽宗赵佶（1082—1135）文韬武略不怎么样，却是一个风流皇帝，能书善画。曾广泛搜集过流散在民间的文物，特别是金石书画。他还网罗书画名家，扩充翰林画院，命群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

图》等。大观年间，他又把内府所藏前代书法家的墨迹，让大臣重新摹刻于大清楼，这便是著名的《大观帖》。不仅如此，在书法上，宋徽宗还自成一家，创“瘦金体”。其书笔画纤细优美，体势劲逸。实际上，“瘦金体”也并非宋徽宗首创，早在唐高宗末年至武周中，就曾有过所谓“瘦劲书”。1945年《书学》第四期中引游寿《书苑楼锦》说：“近者常玩唐人石刻，高宗末年，伊洛石刻，甚好尚常丑奴之瘦劲，至武周中此瘦劲书成一风气。每画起至用笔顿挫，特见锋芒。尤以宫人墓志全是此种书体。与宋徽宗之瘦金书相似，唯唐人书多筋劲，宋书柔媚，结体较胜。此种书体石刻之最大者，即登封石源南北崖二刻，云是薛曜正书，大径寸，其点画波撇，瘦金书全取法于此。”陶宗仪《书史会要》说赵佶的字学薛稷而“变其法度”。蔡絛《铁围山丛谈》说赵佶师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否认宋徽宗确实是在前人书法的基础上创出了瘦金体。宋代以降，瘦金书虽然流传，但如断崖弱藤，颇有难续之势，多被用作工笔花鸟画的特用题款书，柳贯题宋徽宗扇面诗有“轻纨留得瘦金书”句。瘦金体确实别有其纤秀妩媚之处，应该在我国书法艺术的百花园中占一定位置。《大观圣作之碑》除西安外，当时还分刻于河南、山东、江苏等省。西安碑林所收藏的这通碑，字体较赵佶其他手迹瘦直、挺拔，横笔收笔带钩而竖笔收尾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兼以石工精湛，突出了“瘦金体”的特点，为宋徽宗“瘦金书”的代表作品之一。

清代费甲铸翻刻的《淳化秘阁帖》，共145石，均两面刻。所谓“淳化阁帖”，原是宫廷制品，宋太宗（赵光义）于淳化三年（992），命翰林侍书王著将宫廷里所藏的历代帝王将相及名书法家墨迹，编次摹勒在枣木板上，共分十卷。前五卷是历代帝王、名臣及书法家的真、草、篆并古文各体；后五卷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的草书。刻好后藏在皇宫书库里，拓印墨本，颁赐给登二府（指宋代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管政务的中书省，为当时最高的国务机关）的大臣。由于此帖是淳化年间的宫廷制作，刻好后又藏于内府，故名之为“淳化秘阁帖”，简称“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刻成不久即毁，由宋到明，公私复刻本很多。明朱元璋在封第十四皇子朱楧为肃王时，特赐宋本《淳化阁帖》一部。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肃宪王绅尧以宋帖为原版本，命温如玉、张应诏临摹上石，历时七年，用富平石144块刻成。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刻成后存于兰州藩署，世称“兰州淳化阁帖”。西安碑林所收藏的是清顺治二年（1646）用兰州本复刻的，亦称“西安淳化阁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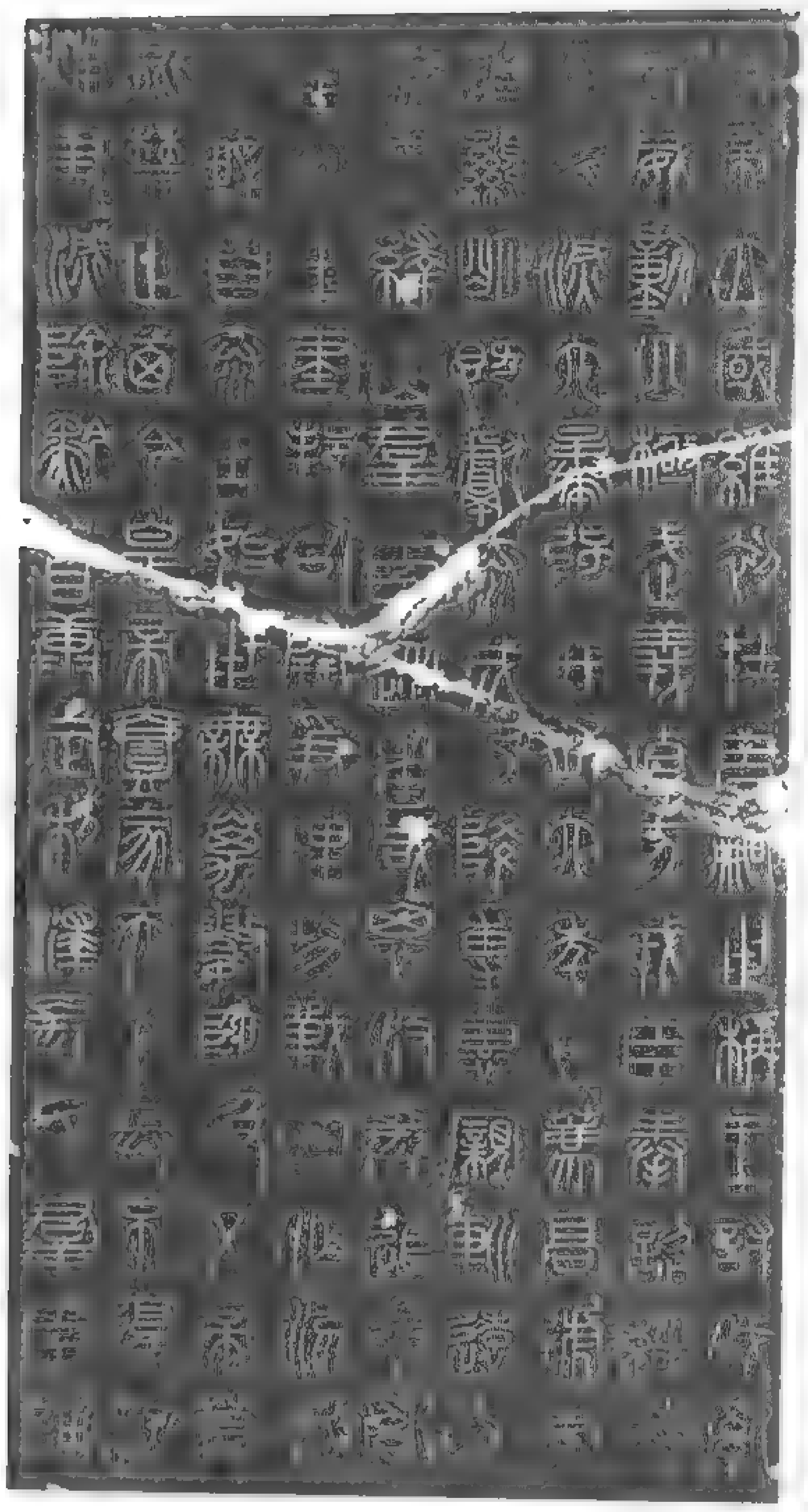
《淳化阁帖》是集我国历代书法作品之大成的一部法帖，由于各种书体所书时代不同，风格各异，很像是一曲大型交响乐，急管繁弦，配合和谐，又各有优长，别具特色。其中有世称“草圣”的敦煌人张芝的作品；有以“银钩虿（chài）尾”著称的西晋索靖的作品；还有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王羲之父子的草书等等，均为书法爱好者所称道。这部法帖还给我们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类别和演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碑林中还收藏有我国现代著名书法家、诗人于右任在1938年草书的《正气歌》刻石六块。字迹苍劲雄伟，被誉为于氏书法的代表作。于右任，原名伯循，号骚心，陕西三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64年病逝于台北。他的书法，早已驰名中外，蜚声书坛。他晚年在台湾生活苦寂，常缅怀往事，写下了不少爱国思乡的感人诗篇。他学识渊博，收藏宏富，曾将其《鸳鸯七志斋》中苦心经营、收集的汉、魏、六朝、隋、唐等各代墓志刻石290余方，捐献给了西安碑林，成为今日碑林展出的一个重要部分。于氏早期书法工行、楷，西安碑林博物馆目前收集到的楷书中，还有他为对陕西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杨松轩先生而书写的墓碑，以及为耿直写的《耿端人纪念碑》等。他后期致力于草书的研究，曾编著《草书部首》，提倡“标准草书”，影响深远。他的草书融汇了章草、今草、狂草各体的精髓，雄浑奇丽，仪态万千，晚年在书法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随意挥洒，皆成佳作。于书《正气歌》，是体现其标准草书“易识、易学、准确、美丽”原则的典例。《正气歌》是南宋文天祥在监牢里作的抒怀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此诗经于右任草书上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作，已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 峄山刻石

秦 宋淳化四年（993）重刻。 此刻石圆首方座，通高218厘米，宽84厘米，两面刻文，共15行，满行15字。相传为秦丞相李斯小篆书。

李斯（？—前208），秦丞相，文学家和书法家。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少年为郡小吏，后任客卿、廷尉乃至丞相。秦二世时，被赵高所杀。他的文学作品，多载于《史记·李斯列传》及《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在书法方面，李斯精妙于大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他曾主持以秦国通行的文字形体为主，确立了小篆。亦称玉箸篆。《峄山刻石》，字画清晰，方圆合度，



很能代表玉箸篆的特点。唐张怀瓘在《书断》中，列秦丞相李斯的小篆为“神品”，赞之“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长风万里，鸾凤于飞”，称其书法特点为用笔“骨气丰匀，方圆绝妙”，结体稳健匀称，法度谨严。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曾多次出巡。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巡郡县，上邹峄山立石，曾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祭山川之事”，始皇曾上峄山（今山东省峄县境内）立《峄山刻石》；又上泰山，立《泰山刻石》；再东行至琅琊（今山东胶南县西南），立《琅琊台刻石》，其内容皆为歌颂秦皇之功，颂秦皇之德的。《峄山刻石》是立的第一个刻石颂扬其废封、立郡县的功绩。其形式皆为四言韵文。字迹横平竖直，布白整齐，笔画挺匀刚健，风格端庄严谨，一丝不苟，对后世碑刻铭文书法都有一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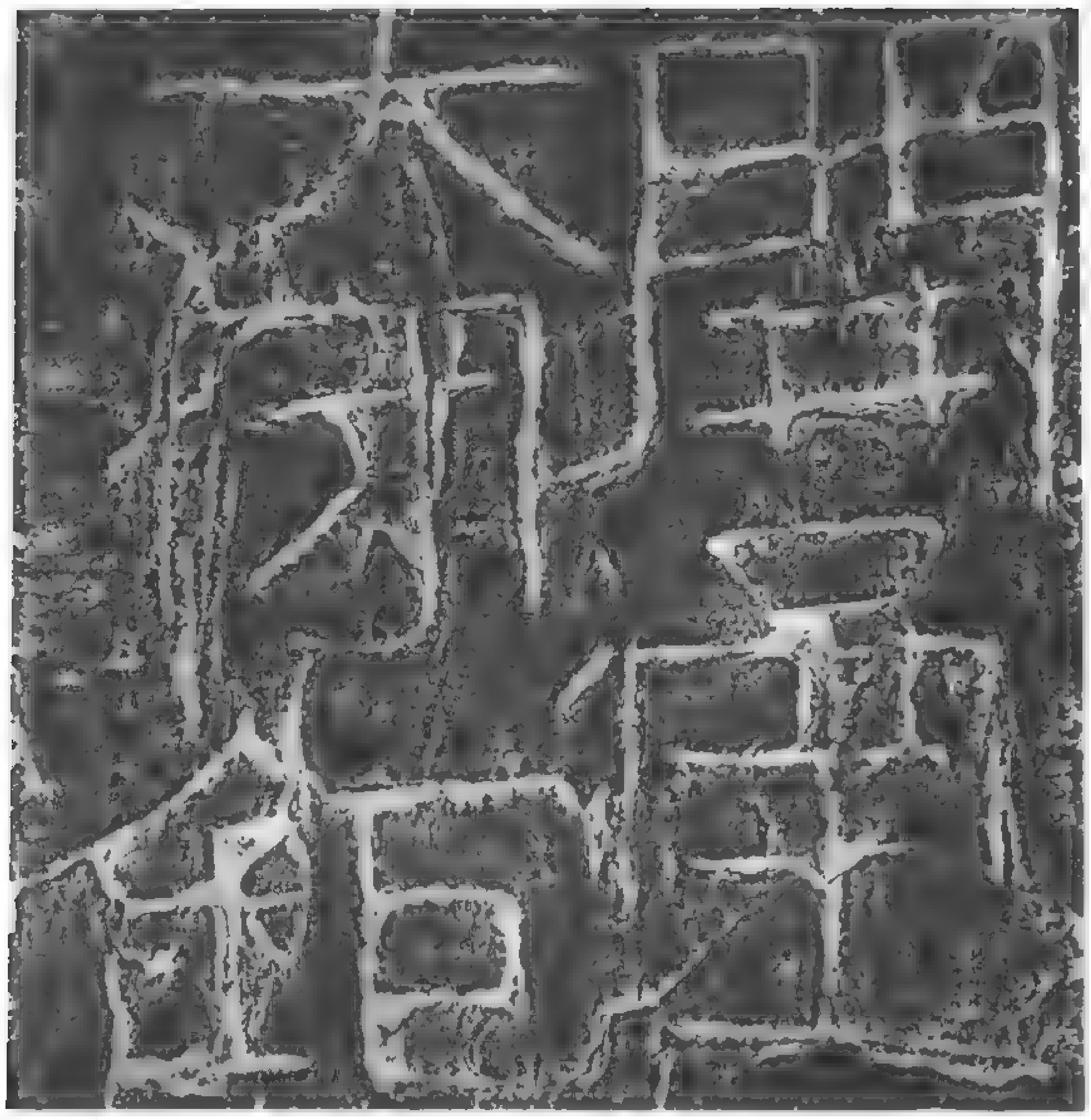
《峄山刻石》唐代时被野火焚毁，当时已有摹本，杜甫诗文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就是说的这件事。翻刻峄山碑的郑文宝，在《宋史》里有传，说郑善篆籀书，师事徐铉，西安碑林所藏《峄山刻石》，便是用徐铉所藏模本重刻的。

明代杨士奇《东里续集》，称峄山刻石有七种翻刻本，即“长安本”、“绍兴本”、“浦江郑氏本”、“应天府学本”、“青社本”、“蜀本”、“邹县本”等，其中推“长安本”为第一。“长安本”就是指西安碑林所藏郑文宝重刻石，此石刻于宋淳化四年（993），距今约有九百余年的历史。

现存西安碑林第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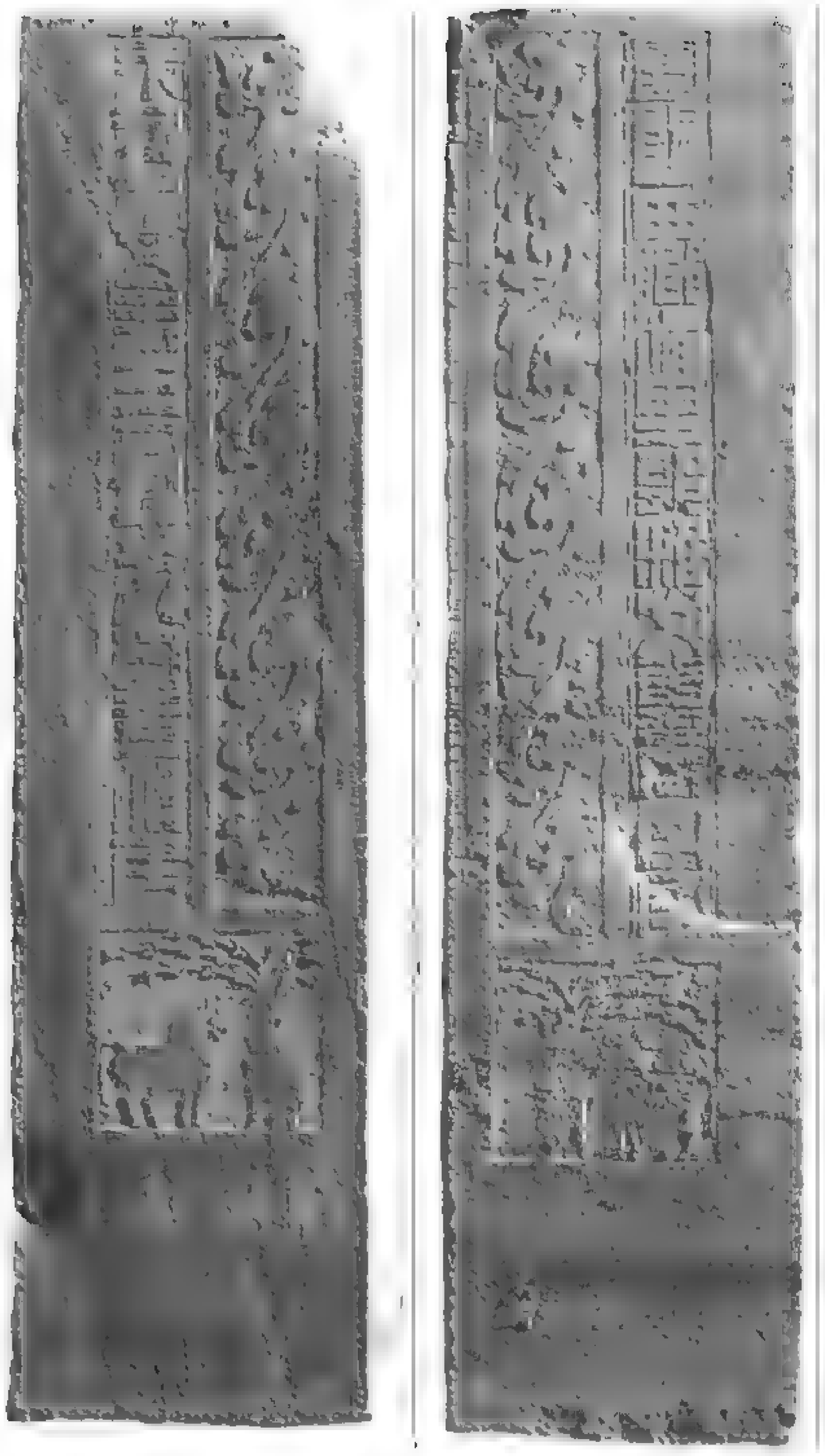
2. 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东汉　永平六年至九年（63—66）　此摩崖刻石有文无题，历代金石家皆以文义命名，有称《开通褒斜石刻》（见《金石萃编》），或称《开通褒斜道摩崖》（见《关中金石记》，亦有叫《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开通褒斜道碑》（见



《褒谷古迹辑略》等等。石通高可分三段：前段 80 厘米，中段 103 厘米，后段 125 厘米，上沿宽 272 厘米，下沿宽 276 厘米；文 16 行，行 5—11 字不等，字径 9—16 厘米；原镌于汉中褒谷石门西南半华里许的山崖间，1971 年前迁入汉中市博物馆。刻石内容叙述汉中太守鄐君受诏承修褒斜道，详计用工料及钱、粮和修桥柱并大桥的间数亭所及里程数字等等，为研究褒斜栈道的沿革和我国古代交通桥阁建筑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刻石书法是介乎于篆隶之间的一种过渡的书体，字甚方正，但长短广狭不一，亦为研究书法艺术方面提供了参考资料。

现存汉中市博物馆。



3. 郭稚文墓门框文字刻石

东汉　永元十五年（103）　此墓石 1957 年由绥德五里店汉墓中发现。高 138 厘米，宽 37 厘米。我国在东汉时代，由于发展殷周以来厚葬的风习，各地盛行用平雕的画像石装饰墓室，遗物最多的有山东、河南、四川等处，建国后在陕北绥德、米脂一带，也陆续发现了大批的这种画像石。

画像石是混合用减底阳刻（平雕）和阴刻线纹（线刻）的技法来表现形象。平雕与圆雕不同，不是表现单一或少数立体形象，而能表现较复杂成组的故事场面，但有别于弧面的浮雕而是平面的。因而是绘画趣味

的。制作时先在平面的石材上以朱或墨绘成所要表现的人物故事，然后再奏刀刻画雕琢。陕北出土的画像石中，有好几块石刻上还残留着显著的墨线和朱彩，这在汉代毛笔画保存绝少的情况下，使我们能看到近两千年前的绘画真迹，是特别值得珍视的。

陕北东汉画像石，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社会面貌各个方面，从题材上，有西王母、东王公、青鸟、蟾蜍、玉兔、九尾孤等反映汉代黄老长生思想的神话传说；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有出行、宴饮、六博、蹴鞠、击剑、舞伎、射猎等反映当时社会风俗习惯的；有楼阁、斗拱、铺首等房屋建筑样式。特别有牛耕、拾粪、牛马羊牧群等反映当地人民农牧生活的，在各地画像石中是罕见的。在陕北东汉画像石边缘装饰上盛用植物花纹，在卷草中还雕以鸟兽等。虽然手法朴素，但为后代，特别对唐代极其富丽堂皇绚烂茂密的装饰花纹的出现给了一定的启示。这些手法简练、造形生动的石刻，既是艺术创作，又是历史记录，为我们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墓石共二块，上均刻有文字，一石上刻“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13 字。永元十五年是郭稚文墓纪时的题字，近年来陕北发现汉画像石有纪年题字的除永元十二年王德元墓及永初元年牛文明墓纪时题字外，就只有此墓。永元是东汉和帝（刘肇）的年号，永元十五年为公元 103 年，是近两千年的石刻。另一石上刻“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13 字。石上“圜阳”是陕北神木县在东汉时旧名，“室宅”是汉代人用来称呼墓室的。用“万岁”二字，当时还不是帝王家独占，一般人也可以用来表示永久颂扬的意思。刻石字体系含有篆意的隶书，极其规则匀正。两石上花纹用减底阳刻匀整的卷草，下均刻一马，行近树前正拟就糟进食，装饰性很强，是值得注意的艺术作品。

现存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4. 石门颂

东汉　建和二年（148）　石门颂亦称“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原刻在褒城石门穿道西壁的摩崖上，其原址在古褒斜栈道南端即今

陕西省汉中市褒河公社境内的褒谷之中。1967年因国家在石门所在地修建大型水库，乃将摩崖刻字从崖壁中凿出，于1971年移至汉中市博物馆建立专门陈列室保存。此摩崖刻石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上有王升题额一段，高54厘米，宽35厘米。文22行，行30、31字不等，刻石是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同郡王升为歌颂杨孟文开通陕西褒谷石门的功绩，就石壁刻此颂文，书法隶体，笔法纵放，洒脱自然，挺劲多姿，堪为汉隶中具有鲜明个性的杰作。其中如“高祖受命”的“命”字，“王升”的“升”字，“世世叹诵”的“诵”字三字垂笔甚长，特别是命字长过一二字之多，与所见敦煌汉简等书迹相同，书法天真流露，极飘逸新奇，很具个性。杨守敬《平碑记》称：“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石门颂》摩崖是我国著名汉隶石刻之一，素为历代名家所称颂，自北魏郦道元、宋欧阳修、赵明诚、洪适到清代王昶、冯云鹏等诸家，皆对此摩崖作过考释，金石著录多有异议的记载，近人郭荣章又写《石门摩崖刻石研究》一书可作为参考。

现存汉中市博物馆。

5. 苍颉庙碑

东汉　延熹五年(162)　此碑原在陕西白水县苍颉庙内，1975年入藏西安碑林。碑为尖首形，高147厘米，宽79厘米，24行，行字数不等。由碑顶至下60厘米处有圆形穿孔一处，直径13厘米。是东汉延熹五年为纪念苍颉而立的。苍颉相传为皇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远古文字是社会群众的创造，不是一个人所能独创。《荀子·解蔽篇》载：“好书者众也，而苍颉独传壹也。”他可能只是作为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据碑记载，碑阳、碑阴及碑两侧均刻文字，但因年久隶书字迹剥蚀严重，今存清晰文字不多。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6. 西岳华山庙碑

东汉　延熹八年（165）　此碑立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为著名汉碑之一。高 254 厘米，宽 119 厘米，碑额书“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篆书，碑额文 22 行，满行 38 字，碑额左右有唐大和三至四年（829—830）李商卿、张嗣庆、崔知白、李德裕、崔瑨、王式等人题名。碑右下方，五、六、七三行空白处，有元丰乙丑年（即元丰八年，1085）王子文题跋，可知此碑在唐宋时即被重视，是有名的汉碑。碑原在陕西华县西岳庙中，明嘉靖三十四年，陕西关中发生大地震，碑被震毁，今碑已毁。

碑文隶书，结体方整匀称，气度典雅，点画俯仰有致，富于变化，波磔分明多姿，遒劲秀丽，是汉隶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代表。历代书评家和金石家曾给此碑的书法艺术多有很高评价。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清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中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评说：“朱竹垞于汉隶最推是碑”，“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观前后变割之所以然，则于书道源流是碑为易见也。使人易见者，非其至者也。”

汉碑极少有留书碑者姓名的，而此碑末则刻有“京兆尹敕都水椽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佑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颍川邯郸公修……”，历代文人学者如唐徐浩《古迹记》、宋洪适《隶释》、明郭宗昌《金石史》及赵崡《石墨镌华》、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顾南原《隶辩》及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都对“郭香察书”作过考证，有人主张书都为郭香察。

西岳华山碑，在唐宋两代即已被人重视，当时传拓的拓本一定不会少，可是唐代拓本却已不见流传于世。是碑在宋代早期尚完整，到了晚期，碑身中间偏右损坏百余字，直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陕西关中发生大地震，碑被震成碎石，再不能传拓。存世的拓本，目前所知的有四，即“长垣本”、“华阴本”、“四明本”、“玲珑山馆本”。

“长垣本”为河北长垣王文荪所藏，后归商邱宋荦，为宋拓本，后又归日本国中村不折氏。

“华阴本”原系陕西关中东云驹藏，清初为华阴王宏撰所得，也因此而得名。此本传拓，工精墨细，其上多有明清两代名人题跋，故比“长垣本”多

损数十字。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四明本”为明丰道生藏，故而得名，后又归宁波天一阁范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玲珑山馆本”为清初马日璐、马日琯兄弟玲珑山馆所藏，后归李文田。此拓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

7. 郙阁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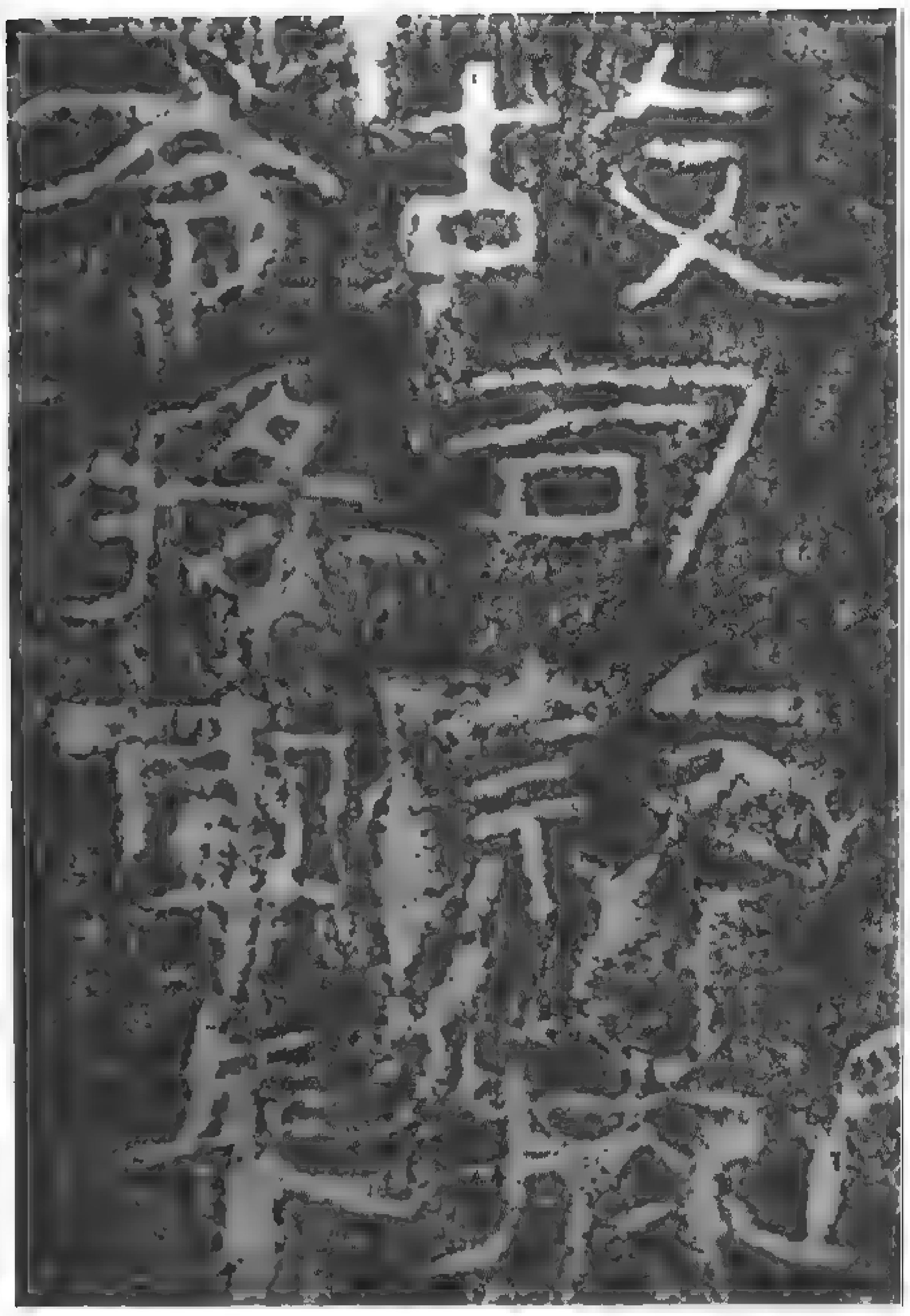
东汉 建宁三年（170） 《郙阁颂》又称《郙阁铭》，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颂》。摩刻高170厘米，宽125厘米，19行，除第六、十二行为11字，第十五行为18字外，其余均是满行27字，共472字隶书。此摩崖刻字在今陕西略阳县西南五里白崖。因为它露处江边，东距水约5米，常受夏秋季洪水冲刷，更因距今1800多年，所以剥蚀严重，左下角剥落了长宽各约50厘米，右上角剥落了长70厘米、宽60厘米、斜度约90厘米的三角形，靠江的一边，有古代拉船纤夫磨下的绳痕七道，摩刻四周，砌有砖墙，是近代为了保护加固而砌的。此现状与清道光二年（1822）续修的《略阳县志》记载基本相符。《郙阁颂》是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三年（170），武都郡太守李翕倡导修建栈道析里桥郙阁后，当时人们在石崖上给他刻的颂扬文字。摩刻到南宋时，字已经剥落得相当多。略阳县令田克仁，用他所得旧墨本（拓本），在略阳县南七华里的灵崖寺，又仿原样复制了一块摩刻，右侧还刻了一段序言，到明代申如埙又在宋代田克仁复制的《郙阁颂》摩刻剥落了的右上角加一补刻，并加上了“知县申如埙重刻”七字。所谓“重刻”即是指补刻而言。

《郙阁颂》的书法为隶书，在唐宋以前就已经出名，拓片流行全国，清代《广艺舟双楫》称：“吾尝爱郙阁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法、结体，独有此意”，又说“琅琊密集书成，郙阁、褒斜章法精。能成

熹平变疏匾，仅得古法彦云铭。（原注）秦（李）斯琅琊刻石，茂密极矣，汉隶郙阁惟有此意，褒斜异笔而同意。熹平以后，隶法大变，今楷出焉，惟鞠彦云墓志独有郙阁之法”。因为《郙阁颂》的书法出了名，接着就出现了“是谁写的”争论，过去陕西省、府、县志都记载为“汉，中郎将蔡邕作铭，隶书”。1976 年《文物》第 6 期，载有汉中地区文教局及略阳县文化馆撰《郙阁颂》摩崖刻石一文，考证其是在建宁三年为不知名的小人物仇绋书写的。

8. 杨淮表记

东汉 熹平二年（173） 杨淮表一般称为“卞王摩崖”，黄门卞玉为文，原镌于陕西汉中褒谷石门西壁《石门颂》摩崖之南侧，通高 216 米，上沿宽 67 厘米，下沿宽 50 厘米，文七行，行 24—26 字，字径 5—7 厘米。书法隶书。1971 年前迁入汉中市博物馆，近拓除个别字漫漶外，余字皆清晰可见，且保存完好。全文共 173 字为：



故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举孝廉尚书侍郎，上蔡、雒阳令，将军长史，任城、金城、河东、山阳太守，御史中丞，三为尚书、尚书令，司隶校尉，将作大匠，河南尹。伯邳从弟讳弼字颖伯，举孝廉，西鄂长。伯母忧，去官。后举孝廉，尚书侍郎，迁左丞、冀州刺史、太医令、下邳相。元弟功德牟盛，当究三事，不幸早陨，国丧名臣，州里失覆。二君清廉，约身自守，俱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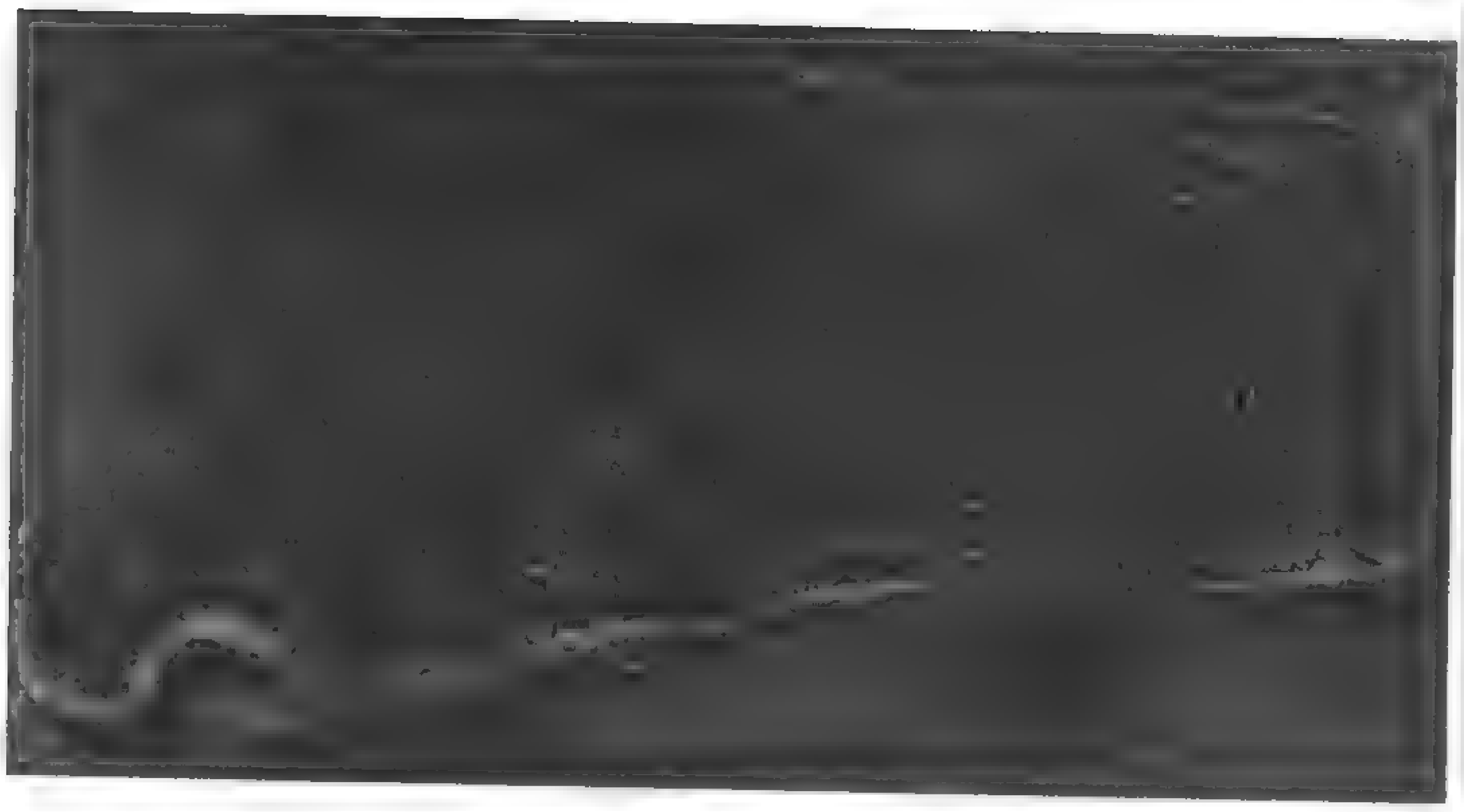
黄门同郡卞玉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谒归过此，追述勒铭，故赋表记。

文的内容是杨淮同卞玉追述淮功，所以勒铭表记。此摩崖宋欧、赵未见，洪适《隶续》始录，其后释者颇多，然各执一说。近人郭荣章又著有《石门摩崖刻石研究》一书，补释前人各说，可作参考。

现存汉中市博物馆。

9. 熹平石经《周易》(残石)

东汉　熹平四年（175）　中国自汉以后，儒家学说便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其著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喜爱并加以提倡，当时雕板书籍尚未发明，书籍多赖手抄流传，错误在所难免。东汉灵帝熹平四年，由当时的文史学家、隶体尤为精工的著名书法家，把《周易》、《书经》、《诗经》、《礼记》、《仪礼》、《春秋公羊》、《论语》等经书写好，到光和六年刻成，石共46块，立于洛阳太学，供读者传抄校对。这部石经在东汉末年遭受破坏，现在国内仅散存残石。西安碑林存有《周易》残石一块，两面各刻《周易》一段，一面尚余27行，共计264字，上刻《文言》和《说卦》。另一面余21行，共191字，上刻《家人》至《归妹》。现残石呈一斜方形残断。总计全石存450余字，为全国现存汉石经残石中字数最多的一块。



这段残石以经学方面说，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可供校正五经文字参考，还不断为后人仿效另刻新的石经，如其后的正始三体石经（用古文、小篆和隶书三体镌石）、唐开成石经（始用楷书）、五代后蜀石经、宋仁宗至和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石经等亦提供了依据资料；从艺术方面讲，文字相传是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这块残石原系洛阳出土，后于右任从古董商人手中购得。解放后入藏陕西省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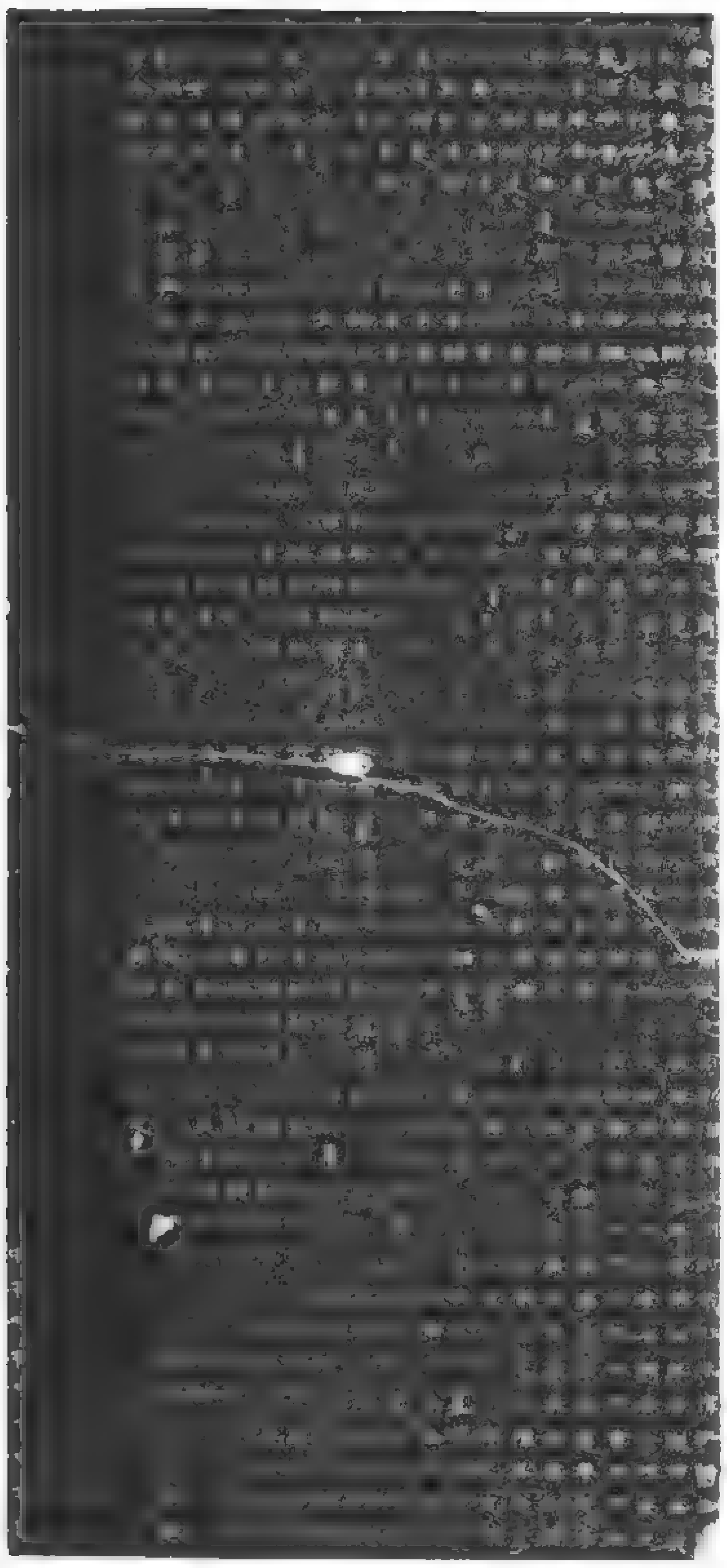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10. 曹全碑

东汉　中平二年（185）　《曹全碑》，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也叫《曹景完碑》。碑为竖方形，高272厘米，宽95厘米，碑阳20行，满行45字，

碑阴有五列题名。

此碑刻于东汉中平二年，距今有1800年。明万历初年由陕西合阳故城（今合阳县东40里莘里村）出土。1957年移至西安碑林。



碑文称曹全此人，号景完，在汉灵帝光和六年（183）举孝廉，任郎中，后又转任合阳县令。他的门属官王敞等乃为之刊石纪功，建立此碑。碑文内容除颇详地记叙了曹氏世系外，且载有汉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文中有“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和德面缚归死”等语，这与文献记载不同，可作为订正历史的参考。特别碑文还记载了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当时已波及到陕西，合阳县民郭家等起而响应酿成“燔烧城寺……三郡告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及反抗官兵的事实，为研究东汉末年农民斗争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弥补了史籍的缺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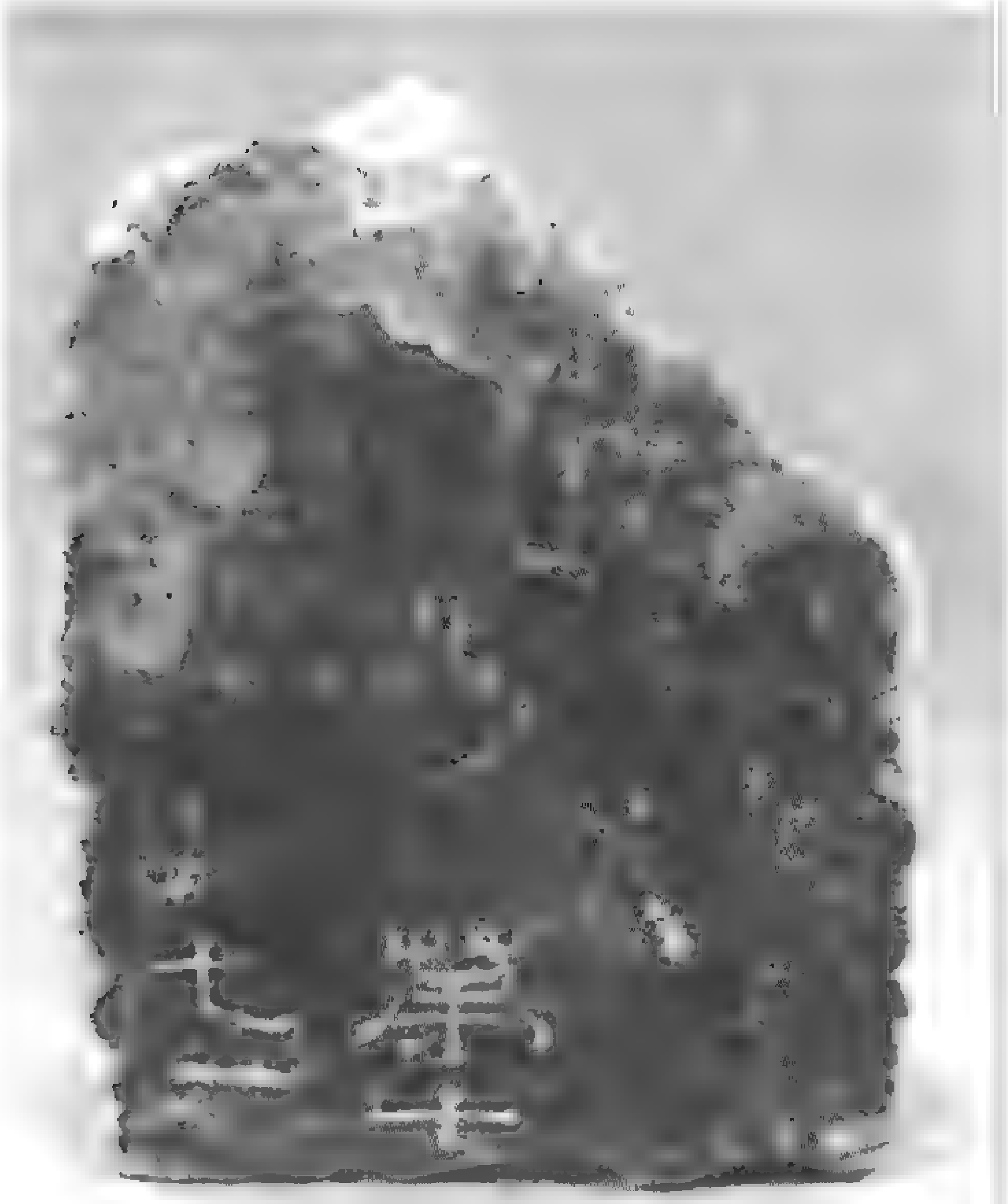
这碑和其他汉碑一样，没有撰、刻人的姓名。碑文的书体属标准的汉隶。隶书萌芽于古，趋用于秦，定型于西汉、东汉之际，文字学家把隶书的定型化过程叫“隶变”。隶变，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大作用的变革，由汉初至东汉桓、灵之世（147—189），定型的隶书，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

这一时期留下的碑版、金文、砖文、印章文字，以及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的竹简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东汉时树碑立传风俗特别盛行，因而所遗留下的碑版也特别多，碑文字画也最精湛。我们通常说的汉隶，主要即指这类碑版。据统计，今传世的东汉碑版达170余种。这些碑版书法风格多种多样，书风有茂密雄强、浑穆厚重的；有方整劲挺、斩截爽利的；有舒峭拔峻，烂漫多姿的；还有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立汉碑风范的，这类碑刻在汉隶碑刻中居多。《曹全碑》即为此类书风的代表作之一。此碑初不显于世，埋没地下千百余年，一但出土，风靡一时，数百年来为金石学家和书法家所喜爱，是我国现存汉碑素负盛名的重要碑石之一。碑文隶书文字清晰，字体扁平而匀整，用笔方圆兼备，以圆笔为主，清秀婉畅，美妙多姿，为东汉极盛时期的精品。碑阴书法与碑阳不同，质朴直率，草草不经，错综变化，妙趣横生，绝无刻意求工之气，在汉隶书法中别具一格。碑初出土时完好无缺，今已断为两截，合缝黏接。流行的拓本多为碑断后拓，断前拓本世间罕见。据清方若《校碑随笔》载："最旧为未断本，明季初出土拓本也。"

碑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11. 三体石经

魏　正始二年（241）　《三体石经》（残石），于1957年6月在西安



市北大街青年路西段挖修下水道时出土，为一不规则的正方形残石。残高38.3厘米，残宽30厘米，两面刻文，一面表刻《尚书·梓材篇》，余10行，共34字；另一面刻《春秋》文成公元3年纪事文，余10行，共50字。

汉末魏初，古文经学已很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曹魏明帝（曹睿）正始年间，又刻了三种古文经，内容有《尚书》、《春秋》及《春秋左氏传》。由张揖伟、恒稽康等人书写。每行三体，先古文，次篆书，再隶书，因称《三体石经》。石经刻成后，原在洛阳太学。北齐高欢执政时，由洛阳徙于邺都（今河南安阳北），行至河阳，一部分因黄河岸崩陷于河中，北周大象元年（579），由邺都运回洛阳。隋开皇六年（586）又自洛阳迁移到长安。唐初兵变时，被废作柱础，到贞观初年，魏征搜集残石，已十不存一。所以自宋以来未闻著录，直到清末以至民国初年，在洛阳才先后有《尚书·君奭》及《无逸·君奭》、《尚书·多士》篇几段出土。1945年在西安市许士庙街也有三体石经《尚书·康诰》篇残石一块出土，残高26厘米，残宽18.5厘米，一面刻字，残存7行，共30余字，另一面残而无文。1957年6月在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发现的《三体石经》残石，是西安第二次发现，残石上刻有“始二年三”字样，可以证明《三体石经》是“正始”二年三月刻的，在此以前未见有年月的刻石，所以前人著录也均无具体年月。这块刻石发现以后，即入藏陕西省博物馆，为碑林增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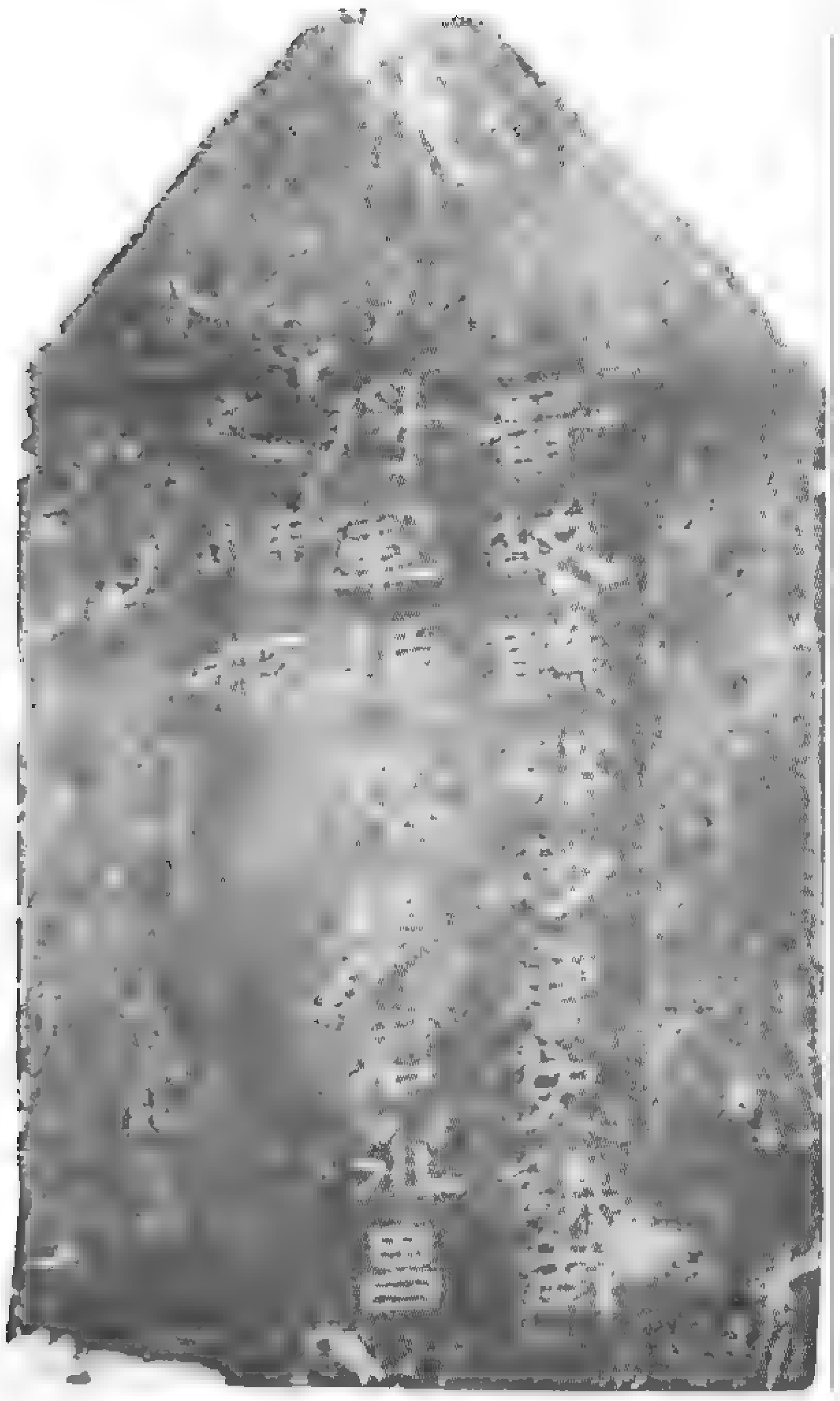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12. 永安侯墓石

两晋 （265—316）

此墓石为横方形，石高13厘米，宽63厘米。中横书“晋永安侯墓”五字隶书，字迹方正，无年月题字，两端各减底阳刻龙马怪兽搏斗纹饰，有动有静，别具风趣。雕刻作风与东汉王德元墓画像石类似，可能为墓中石室前横额残石。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3. 张永昌墓碑

西晋　(265—316)　此墓石作尖首碑形，高 26 厘米，宽 10 厘米。题字 3 行，首行 9 字，次行 8 字，末行 3 字。书法隶体。尖额减底阳刻双蟠纹，碑身两侧各刻一供养人，宽袍大袖拱手站立。中阴刻“晋故谯郡功曹吏镇南将军颍阴张君永昌之神柩”系记墓石，与夫人天水赵氏墓碑形制相同。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4. 夫人天水赵氏墓碑

西晋　泰始四年（268）　尖首形，高 27 厘米，宽 10 厘米。中阴刻隶书题字二行，为“夫人天水赵氏，泰始四年七月三日造”，书法秀逸遒丽。碑身两侧各刻供养人一，着抿襟大袖裙，头戴冠饰，相向站立。人物娉婷修美，衣纹遒劲古朴。碑头尖额以减底刻法，雕双兽纹饰。碑高不盈尺，反映了魏武帝（曹操）之后禁止厚葬风俗，墓室石刻画像渐绝，而转向墓碑发展的过渡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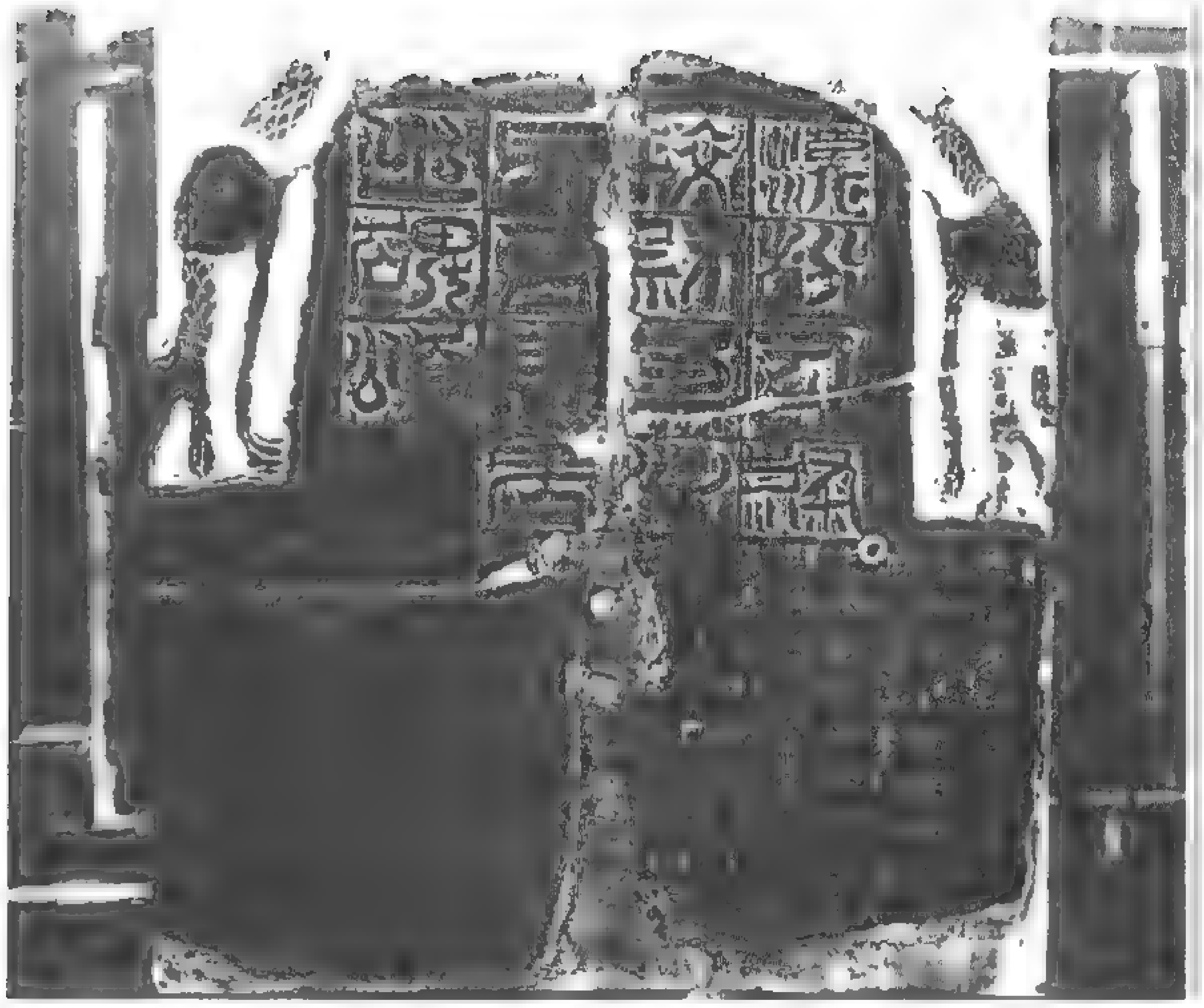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5. 菅氏夫人墓碑

西晋　永平元年（291）　碑高 59 厘米，宽 25 厘米。碑阳并阴都刻有文字，正面 11 行，满行 16 字，阴面刻文 7 行，行 10 字。碑头为圆首形，上刻三条弧形晕线，边晕下端刻有简单的螭首形状，当系由汉碑形制蜕变而来。在圆首形的碑额内刻“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

墓碑”。碑身正面刻有死者行状、葬地年月。碑阴刻铭文。属碑形墓志。当时严禁立碑，按《宋书·礼志二》记有：“汉以后天下送死者靡，多作石室、石壁、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魏武帝（曹操）以天下凋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并记有“高贵卿公（曹髦）甘露二年（257）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只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又晋武帝司马炎咸宁四年（278）亦诏禁立碑云：“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这是魏晋间碑刻遗存甚少的主要原因。但悼念表彰死者习俗当时已深入人心，不能立碑而想法制作小型墓碑埋于墓中，菅氏夫人墓碑并阴即是一例。由这些小型墓碑，后逐渐演变成墓志形式。因此，可说这块墓碑是碑碣与墓志中间的过渡式样，为我们研究碑志的演变过程，提供了参考资料。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6. 司马芳残碑

东晋 （317—420） 此残碑1952年西安市整修下水道时，在西大街广济街口发现，为陕西省首次发现的晋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

按《水经注》记载，此碑原在汉长安故城，以后被后人移入西安城内。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芳之碑，首行：“君讳芳字文豫，河内”（下残缺）。第五行：“显考儁，以资望之重”（下缺）。第十行“昊天不吊”（下缺）。第十一行“炎德告微”（下缺）。碑额称“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碑残文与《晋书·宣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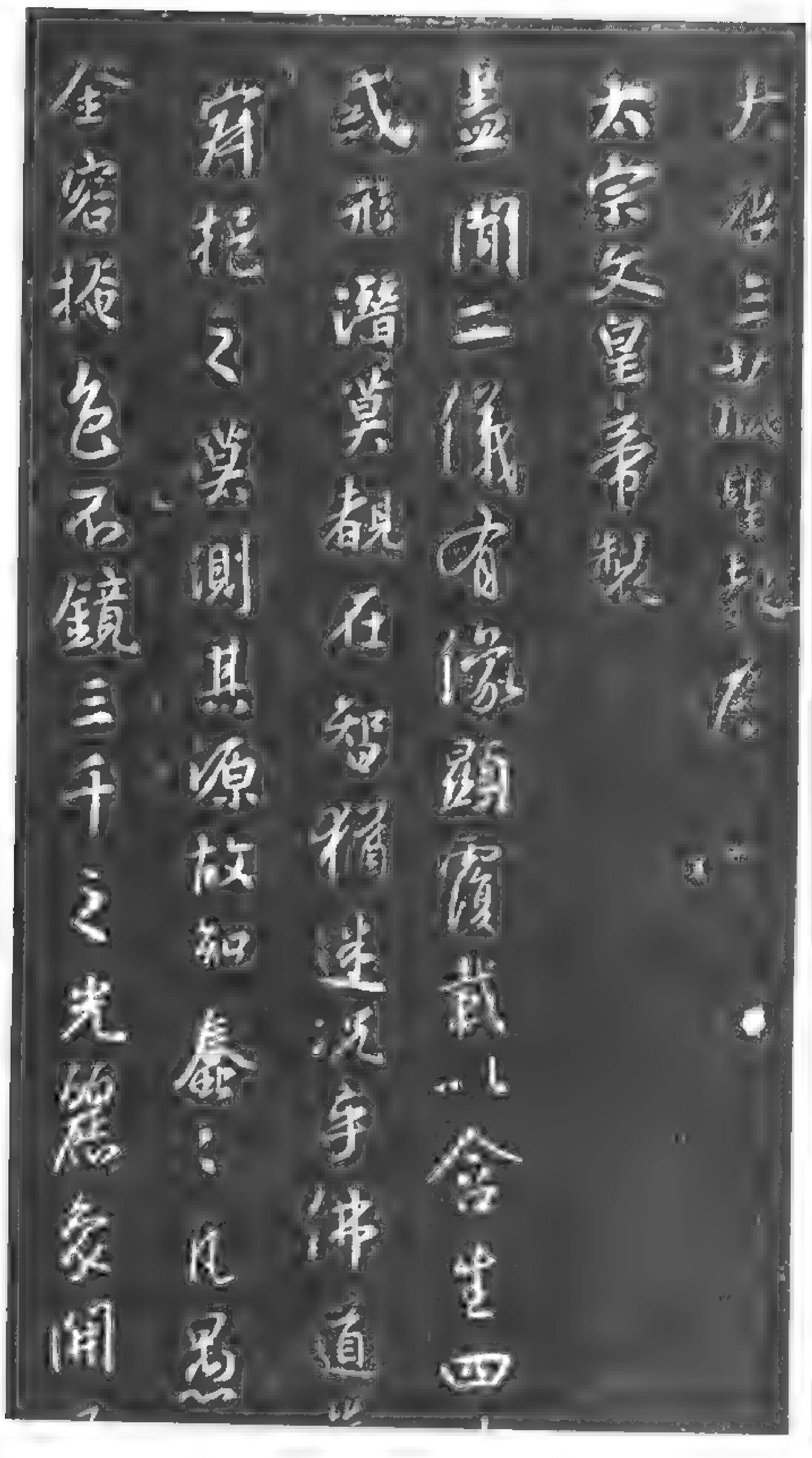
记》相校，芳的官职、族望以及其卒年，与史俱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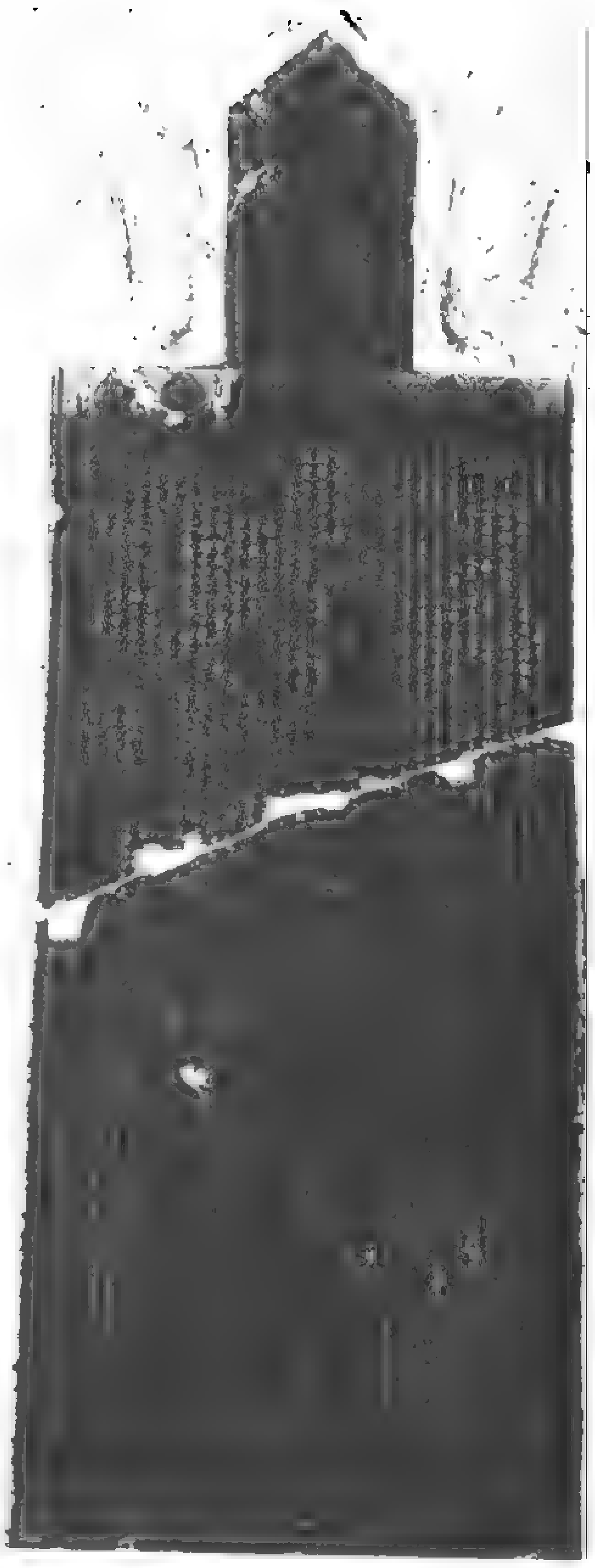
此碑碑额雕蟠螭纹，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首向隋唐碑首过渡阶段。以书法论，书体在隶楷之间，也是由隶转向楷书的一种过渡书体，且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17. 三藏圣教序碑

东晋　唐咸亨三年（672）**集刻**。　此碑螭首方座，高 350 厘米，宽 100 厘米，30 行，满行 83 字、84 字不等。是唐太宗李世民为唐僧玄奘法师翻译佛经作的序文，并有太子李治（即高宗）作的记和玄奘写的谢表及心经，通称《三藏圣教序碑》。又因碑头上横刻七尊佛像，也叫《七佛头圣教碑》，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内容叙述玄奘赴印度取经和回国译经的史实。字虽是和尚怀仁从晋王羲之遗墨中选集的，但那秀劲超群，美若簪花仕女的王氏字迹，分行布白，笔意俱存，俨然一气写成，令人称赏不已。





王羲之，字逸少，是我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久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亦有称之为会稽人，出身世家大族。初任秘书郎后历任征西参军、江州刺史等职，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永和十一年（355）称病离郡，誓不出任，卒年59岁。性爱山水，善为文章。他的《兰亭集序》是宴游诗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记述了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羲之和当时名士谢安等41人宴集于山阴兰亭的盛况，文笔清新幽雅，自然有致。其书法擅长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各体。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得力于张芝、钟繇，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草隶尤为古今之冠。在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把行、楷、今草等各种新体，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书法艺术在东晋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王羲之评价自己："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又曾说过："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在他看来，只要下苦功夫，没有学不成的，足见他学习书法，也是经过一番废寝忘食、刻苦练习过程的。王羲之的笔法丰富多彩，善于变化，人们称他是书法集大成者，有"书圣"之称。梁武帝评王羲之字迹说："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碑文中亦有"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的佳句，这固然是唐太宗李世民赞扬玄奘的语句，而用来形容评价王羲之的书法，却也恰如其分。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18. 兴福寺残碑

东晋　唐开元九年（721）集刻　此碑明万历年间（1573—1620）发现于西安市南城壕中，出土时只存下半截，故通称"半截碑"，也叫"吴文残碑"。残高80厘米，宽103厘米，35行，行字不计。碑是唐玄宗开元九年为宦官吴文所立的，由和尚大雅集晋王羲之的行书刻成，原立在唐长安城兴福寺（在今西安市西关中段路北，寺已毁），此碑书法秀劲，向为历代书法家喜爱。

碑侧雕刻，由于残断，不能见到全貌。但仅就现存的一段，也可看出雕刻精美别致。它的图案结构是以双波纹作干线，在波纹里外很有匠心地安排题材，上部是一只由孔雀或凤凰演变成的长尾朱雀，中部是两个甩着长袖，翩翩起舞的舞伎，下部刻一个双手作吹笛状的人，身坐在一个雄健壮硕的狮子

背上，而这一切立足点却都是轻盈的莲花，处理手法大胆。特别是狮子的后足，在莲花上放不下了，作者干脆使它踏在波纹的叶子上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无拘泥的气派！使这块残碑形成唐花晋字，相得益彰，堪称双美。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19. 邓太尉碑

前秦　建元二年（366）　此碑全名为《冯翊护军郑能进修邓太尉祠铭》，又名《修邓艾祠碑》。是前秦冯翊护军郑能进建立的。碑原在陕西蒲城县东南的邓公（邓艾）祠内，祠侧有邓公墓，系衣冠冢。碑为尖首形，上有穿孔，高 170 厘米，宽 64 厘米，全文隶书 9 行，满行 29 字，文中有不少字漫漶。碑文内容是叙述冯翊护军所辖的五部城堡和部族名类，最后还详记了军府将左题名 26 人姓名。这些对我们研究冯翊护军所辖的少数民族部族关系及关中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情况，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碑年月与《广武将军碑》相隔一年，但碑文隶书已多杂楷法，大概此时书法，已由隶入楷，故在笔法上不严格区别，但亦属我国书法名碑之一。此碑 1972 年入藏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20. 广武将军□产碑

前秦　建元三年（367）　碑为尖首，高 147 厘米，宽 73 厘米。两面刻文，阳面 17 行，行字多下部不清，碑额刻《立界山石祠》五字，但因过去许多人不曾看到碑额，只依据碑正文内第一行有《广武将军》字样，于是称之为《广武将军□产碑》后被一般人通用而称之。碑阴 18 行，行字 32 字，有方界格，碑首题名 15 行。碑两侧刻部将姓名。此碑内容除有碑主的姓氏外，同时反映有前秦时关中渭北疆域的划分，职官设置、部族的分布以及碑主所

统辖的吏民数目等，都是研究前秦历史方面的重要资料。

碑文书法全属隶书，古朴稚拙，天趣浑成。可惜碑面有残剥，文字许多不清，但前秦石刻极少，除《邓太尉祠碑》外，仅有此碑。(碑全文见《金石萃编》)。现代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曾对此碑大加推崇，作有《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诗》加以赞扬。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21. 松滋公元苌温泉颂

北魏（386—534）　此碑圆首方额，高153厘米，宽73厘米，21行，行30字楷书，书法整练，古厚精劲，有似《敬使君碑》，惜文字剥落太甚。碑额篆书“魏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雍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雍州刺史松滋公河南元苌振兴温泉之颂”36字，篆字特佳，结构奇诡。碑侧有题名6字行书，另有5字隶书，碑无年月，考证及全文《金石萃编》均有记载。碑文内容是为陕西临潼县骊山之下华清池温泉作的颂文及元苌出钱为温泉修建房屋等事。

现存临潼县华清池文物陈列室。

22. 魏文朗造像碑

北魏　始光元年（424）　此造像碑高125厘米，宽70厘米，厚25厘米。四面刻：正面龛内刻佛像一尊，帷上刻飞天和天马等装饰，龛两旁刻供养人、花盖及动物图案等，线条比较粗率，但生态栩栩，写实味道极浓，尤其是还保留着浓厚的汉代画像的作风。正面下刻题记十一行，界以不规矩的方格格，书法楷书，全文为：

始光元年北地郡　□□□□三原县民

[阳][汤][姚][忠]佛弟子魏　文朗□□不赴皆有　建劝为男女造　佛道像一

区供养　□□[再]过自然子孙　冒疾所愿从心眷属　大小一切家□　如

是因缘使　人后扬

这块造像碑是现存北魏造像中较早的一块，它比沙门昙曜开凿的云冈五窟早26年，并且是魏太武帝大举毁佛前的佛教艺术品。太平真君七年(446)，魏太武帝下诏灭佛，以至塔庙只要“在魏境者无复孑遗”。魏文朗造像碑或许就是这次浩劫中的侥幸者，因而它为研究魏太武帝灭佛前北朝佛教

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现存陕西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23. 晖福寺碑

北魏 太和十二年（488） 此碑是北魏太和十二年在李润镇（今陕西澄城县）建成晖福寺后所立。高 294 厘米，宽 90 厘米，24 行，满行 24—26 字不等。碑头雕蟠螭盘绕。碑额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碑额下有穿，碑身上部雕作方形，下部两侧以弧形向内收缩。方座式样别致。碑文内容记述王庆时监修寺院的经过和寺院豪华壮观的情景。

王庆时是羌族人，是出身于冯翊李润羌酋大姓的宦官。他在李润镇北乡（今澄城县北寺村）造晖福寺三级佛图。建寺造像的目的，第一是为“二圣”（文明太后和孝文皇帝）祈福，第二是为父兄子弟消灾。总之，这是一种佞佛、媚主而又浪费的行径。但此风一开，关中州郡的不少贵族和平民都仿效之，并在寺庙里造像题名。有的一人或一家造一像，把自己和家属的姓名刻在佛像的背上和下面；有的是数十、百家合造一像或数像，把造像人的姓名（有时连家属的姓名）刻在佛像座或碑阴、碑侧上面，有时甚至把造像人的像也刻在姓名的旁边。此碑碑阴刻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姓氏，通过这些题名，也为我们研究古代部族在这一地区的分布、部族阶级阶层在这一时期的分化、各部族的聚族而居的情况和各民族之间杂居情况、婚姻关系及各族姓氏的变化等，都提供了资料。碑文楷书，在北魏遗留书法中非常著名。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24. 姚伯多造像碑

北魏 太和二十年（496） 此造像碑刻于北魏太和二十年，高 140 厘米，宽 70 厘米，厚 3 厘米，正面上部雕一龛，龛内有三尊像，下部题刻的铭

文23行，行28字楷书，背面上部上下二龛，上龛内雕座像一尊，下龛为三尊，两侧上部线雕站立供养人，左侧五人，右侧一人，题铭为："道民姚伯多供养"七字，背面及两侧下部均刻楷书文字。这就是数十年来风传全国的姚伯多造像。由于造像雕法古朴浑厚，书法劲健有力，解放前一直被称为国内三绝。

现存陕西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25. 石门铭

北魏　永平二年（509）　此刻石，原在陕西褒城石门穿洞东壁之南，铭石高162厘米，宽212厘米，28行，行22字，题额"石门铭"三字，低于正文四字，书法楷书，系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太原郡王远撰文并书，河南郡洛阳县石师武阿仁凿字。内容记载了北魏永平中褒斜道改道和复通石门的经过，并表彰请求改道的详址和具体参与改道的贾三德两人的功勋。

《石门铭》的书体，介乎隶楷之间，融隶楷为一炉。"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是我国文字由隶到楷的佳作。近代书法家称：《石门铭》体态飞逸，被誉为"书中之仙品"，堪称北碑中的精萃。近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师法《石门铭》，卓然自成一家。他在《右任墨缘》中曾有诗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就是对此刻石的很好赞誉。《石门铭》的书者王远亦是善文工书，其文如万倾波涛，层层叠嶂，其书似凤栖绿茵，俊伟飞逸。今观《石门铭》书法，随崖面石势而分行布白，其"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通风，若瑶岛散仙，骖鸾跨鹤"美不盛赞。

现存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26. 毛遐造像碑

西魏　大统元年（535）　此造像碑，高132厘米，宽62厘米，厚27厘米，上刻题记十五行，书法楷体，全文为：

夫至道幽玄，非有非无，慈氏见化，莲叶就应。是以诸邑子仰感[圣]善，心住觉□，迭相劝率，减割家珍，敬造石象一区。慈颜端姒，立在迪衢。愿使天下太平；皇治永康，七世所生旷劫，先佛因缘，善为超度，八黇历传诸佛，龙华三会，愿在先首。大统元年岁次乙卯二月十□日造讫。大行[台]尚书北雍州刺史宜君县开国公毛遐。

这块造像碑是耀县魏碑中唯一见于《北史》记载的人物。《北史》卷四九有毛遐及其弟毛鸿宾的传记。传记中说毛遐为北地三原豪右，与其弟鸿宾在底定萧宝寅的叛魏事件（527）中，为魏室出过力，因此魏帝封遐为“兼尚书二州行台”，后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毛遐造像碑是大统元年（535）之物，上距底定萧宝寅叛魏已经8年，但经过这么长时间，毛遐的官职还未更改，造像碑可为《北史》作一点补充。

现存陕西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27. 西岳华山庙碑

北周　天和二年（567）　此碑高396厘米，宽132厘米，20行，行55字隶书，碑额篆题“西岳华山神庙之碑”8字，刻成二行，碑文由万纽于奉敕撰文，赵文渊隶书。全文考证，《金石萃编》、《金石录》均有著录。明郭宗昌等评此碑谓“尽缅古法，浅陋鄙野”。但杨守敬《平碑记》云：“文渊在周甚有书名，是碑前人嗤为恶札，为分书罪人。余谓以分书论之，诚不佳，若以其意作真书，殊峭拔。”

现存陕西华县西岳庙。

28. 毛明胜造像碑

北周　天和五年（570）　此造像碑是1963年6月在耀县城内发现的第一块造像碑，高80厘米，宽80厘米，厚18厘米。一侧刻文8行，行12字楷书，其全文为：

夫先玄妙□生□迩圣容□□形教游存自唯福浅生遭□□处于五浊无常身命□歿难□知毛宝可凭□为国主及七世父母法界众生敬造石像一区匠画殊容众相具足借此□□四方宁泰行同此愿□□□□天和五年五月廿五日□□□。

另一侧刻龛内造像和供养人。

现存陕西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29. 张僧妙碑

北周　天和六年（571）　此碑23行，行46字楷书，书法瘦劲平整。

碑原立于“崇庆寺”，此寺与“华龙寺”、“延昌寺”为古代耀州三大名刹之一，原址在今耀县西乡文家堡附近。据碑文记载：崇庆寺建于北周武帝天和五年以前的十年间（561—570）当无疑，明弘武年间似曾修葺过一次，今已无迹可考。

现存陕西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30. 贺若宜碑

隋　开皇十六年（596）　此碑文字28行，行67字楷书，无撰书人姓名，书法字迹工整为隋刻之佳作，惜下半截字迹模糊不清。贺若谊《隋书》有传，碑文记载多与隋书记载相合。碑的全文见《金石萃编》。碑额题“大隋使持节□国灵州总管海陵郡贺若使君之碑”20字篆书，碑阴宋人刻有《夫子庙堂记》及《大观圣作之碑》内容。

现存陕西兴平县文化馆。

31. 孟显达碑

隋　开皇20年（600）　此碑螭首，高250厘米，宽67厘米。1910年于西安城南李王村发现。唐书项石椁的盖利用此碑刻成，因而碑阴刻成屋顶形。碑额篆书“魏故假节龙骧将军……泾州刺史孟君之碑”等20字，笔力浑厚。碑文前后残缺，内容叙述孟显达参与贺拔胜大破东魏侯景军战役等事。孟死于北周武成元年（559），经过40年到隋开皇二十年才埋葬立碑，因而孟显达虽是西魏、北周间人，其碑仍属隋碑。碑文书法瘦劲端整，楷笔中间作隶书，是隋人书写习惯。碑石出土后原存西安市湘子庙街，1948年入藏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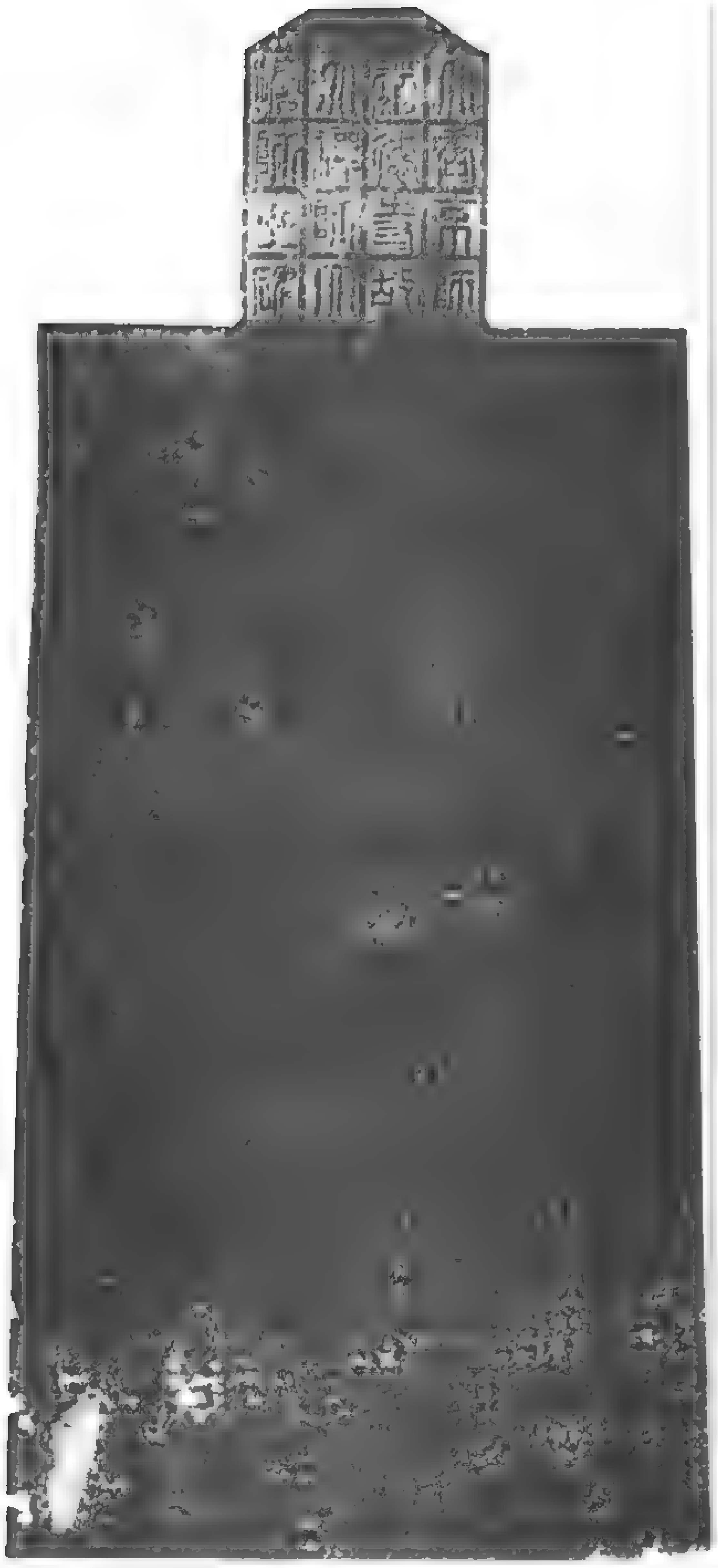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32. 道德寺碑

唐　（618—907）　此碑螭首，高234厘米，宽94厘米，37行，满行67字。碑额篆书“大唐京师道德寺故大禅师大法师之碑”16字。没有立碑年月，书者到范，生平事迹不详。其书法笔迹出自欧阳询，笔力劲秀，具有初

唐书家风韵。据碑文所叙，此碑是十善尼姑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给她师母、善慧和玄懿立的，述说善慧等在隋宫廷里的活动情况。寺原在长安城弘德坊，后移至休祥坊。碑于1950年由西安城西郊梁家庄出土，即移存西安碑林。今梁家庄即唐长安城内休祥坊范围。碑阴上部浮雕莲花龛三尊佛像及二天王像，场面威严。龛下碑面线刻善慧和玄懿及其弟子的位次图，人物形象逼真。碑两侧雕减底双波纹线刻图案花纹，与碑林中道因法师碑侧图案花纹属同一类型，都是以双波纹作干线，左右对称。但由于道德寺碑侧是全部用线而道因法师碑侧适当地凿有减底部分，并下端刻了一对美丽的卷毛狮子，因此前者显得较为华丽，而后者显得较为严谨，但都是古代雕刻艺术的宝贵资料。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33. 智永真草千字文帖

隋　宋大观三年（1109）重刻　真草二体千字文帖，螭首方座，高268厘米，宽97厘米，两面刻文，正面刻文六段，背面刻文两段。原为隋智永禅师书。智永，名法极，浙江会稽人，是永欣寺僧人，亦称“永禅师”，王羲之的第七代孙，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后代。他的书法严格尊守家法，为隋唐间学书者宗匠。平时习练书法非常刻苦，冯武《书法正传》说他居永欣寺阁上，学书凡34年，发誓“学不成不下楼”，朝夕勤学苦练，废寝忘食。曾手书《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分赠江东诸寺各一本。平时求书者如市，所居住的门槛都被踏损，裹以铁皮，号为“铁门槛”。所退废的笔埋起成冢，后人传颂为“退笔冢”。他所写的真草千字文，真书化方为圆，秀润而健劲，草书更优，传为“二王”笔法，“骨气深稳，体兼众妙”。连初唐三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都承其矩矱莫敢僭越。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示”，“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

沉著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清何绍基评论他所写的《真草千字文》说：笔笔从室中来，从空中住，气韵飞动，犹入神品。从碑中细观《真草千字文》笔迹，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所谓“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返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知奇趣”。

梁武帝酷爱王羲之书法，大量收集真品，命殷铁石拓出1000个不重复的字，供给诸王临写，又命周兴嗣把1000个不同的字，编成四言有韵的文章，周兴嗣一夜编成一篇完整的《千字文》。武帝很为惊服，给予奖励。据说周兴嗣，一夜之间鬓发尽白，谓心力极于此。

《千字文》是每句四字，两句一韵，举凡天文、地理、宫室、器服、礼乐、法制、饮食、游观以及制作、技艺、敦品、励学等等，无所不包，用王体书写，作为识字、习字、读书三位一体的教课书。一经颁布，便成为人人必读、必写的范本，流行一千多年。最初写《千字文》的，并非是智永，而是他的启蒙老师萧子云。智永花费了几十年功夫，写出多至八百本千字文，字字不同，而又具有王羲之的笔法结构，流传民间，甚受欢迎。唐、宋以来的名书法家，都受其影响。从智永写出真草二体千字文之后，各家竞写，成为风气。千年来不少书法家从中吸取营养，可见影响之大。

智永《千字文》真迹，今存两本，一本为元和顾氏藏本，现已散失。另一本则在日本，由东京二玄社影印，是800种中唯一珍本。西安碑林所藏的这块真草二体千字文帖，据碑阴薛昌嗣跋，此碑于宋大观三年以长安崔氏藏智永千字文刻石。这块宋刻值得珍视。又据张佑余跋，明初此碑在迎祥观（今西安广济街处），后因观毁才入藏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34. 断千字文（部分文字）

唐　（618—907）　《断千字文》石为长方形，共六块，高宽各不等。书法草书高妙，历来传说是唐代张旭书写。

张旭，字伯高，吴（今苏州）人。主要活动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据闻一多先生遗著《张旭年考》一文，认定张旭生于唐代显庆三年（658），没于唐代天宝六载（747），享年90。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是一位划

时代的草书名家。他所写的“狂草”，极尽夸张笔法之妙，用抽象简单的线条，组织成绚美繁多的“画面”，能准确运用和处理草书结体用笔中的“擒纵”矛盾，较好地表现了狂草书体特殊的艺术美。对草字笔画作了较大增减，笔道上下勾连，字形变化很大，不易辨认，达到了变化万千、奇状莫测的境地，被人尊为“草圣”。《新唐书》里称，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著名的诗篇——《饮中八仙歌》里对张旭有极生动的描绘：“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诗人李颀也说：“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赠张旭》）。大诗人高适在《醉后赠张九旭》里说：“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一位书法家能赢得这么多的著名诗人讴歌，在唐代，甚至在整个古代也是不多见的。正因为张旭嗜酒语颠，行为奇特，被人称为“张颠”。唐文宗时曾下诏以李白的诗、裴旻的舞剑、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颜真卿曾向他请过教笔法，怀素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草法，也以“狂草”得名，为后世学者所取法。张旭精通楷法，以草法最为知名。他的楷书《郎官石记》甚为有名，草书散见在历代集帖中。西安碑林所藏他的草书《断千字文》共六石，笔画淋漓酣畅，大小错落，粗细相间，笔意纵横，豪放又不失规矩。是值得珍视的书法作品。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断千字文》六石释文如下：

第一石

1. 犹子比儿孔怀
2. 兄弟同气连
3. 枝交友投
4. 分切磨
5. 箴规仁慈
6. 隐恻造次弗
7. 离节义廉

第二石

1. 功茂石勒
2. 碑刻铭
3. 磻溪伊
4. 尹
5. 佐时阿衡
6. 奄宅曲阜
7. 微旦孰营桓公
8. 匡合济
9. 弱扶倾
10. 绮回汉惠
11. 说感武丁

第三石

1. 灭虢践土
2. 会盟何遵约法
3. 韩弊
4. 烦刑起翦
5. 颇牧用
6. 军最精宣
7. 威沙漠驰
8. 誉丹青九洲
9. 禹迹百

10. 郡秦并岳
11. 宗恒岱禅
12. 主云亭雁门紫塞
13. 鸡田赤城
14. 昆池碣石钜
15. 野洞庭旷远

第四石

1. 委翳落叶
2. 飘摇游鹍
3. 独运凌摩
4. 绛霄耽
5. 读玩市
6. 寓目囊箱易
7. 輶攸畏属耳
8. 垣墙具膳
9. 餐饭适口充肠
10. 饱饫烹
11. 宰饥厌糟
12. 糠亲戚故

第五石

1. 煌画眠夕寐
2. 蓝笋象床弦歌
3. 酒宴接杯举
4. 觞矫手

第六石

1. 佳妙毛施淑
2. 姿工颦研笑年
3. 矢每催
4. 羲晖朗

5. 旋玑悬斡晦
6. 魄环照指
7. 薪修祐永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35. 皇甫诞碑

唐　贞观年间（627—964）　这碑螭首，高 268 厘米，宽 96 厘米，28 行，满行 59 字。碑原在长安县鸣犊镇，后移西安城内孔庙，解放初入存西安碑林。

皇甫诞为隋朝的大官僚，在争权斗争中被杀。到唐时，他的儿子皇甫无逸于贞观年间要求当时宰相于志宁撰文，并请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刻成此碑。欧阳询，字信本，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所以后人常称他“信本”或“率更”。唐太宗设弘文馆，精选学生研究书法，命欧、虞传授楷法。《旧唐书·询传载》：“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高丽帝遣使求之。”可见欧书在当时已驰名国内外。他平生所写的字，除汇帖不计外，据郑樵《金石略》记载，有 22 种，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房彦谦碑》、《化度寺邕禅师碑》、《九成宫醴泉铭》、《温彦博碑》及《皇甫诞碑》等。欧取王羲之楷则，又行以隶法，晚年字形修长，笔势方而危劲整炼，人们形容他的字“森森然，如武库之矛戟。”以点画精细、结构端庄劲挺见称于世，历来研究楷书间架结构多以欧书为典范。因为《皇甫诞碑》捶拓甚于他碑，故字形枯瘦，然欧体神致尤在，仍不失为碑林名碑。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36. 昭仁寺碑

唐 贞观四年（630） 此碑螭首，高470厘米，宽112厘米，40行，行84字，朱子奢撰文，碑额题“大唐邠州昭仁寺之碑”9字篆书，碑文书法楷体，书迹秀丽而刚劲，书者未见姓名，故后人有著多为书者姓名进行争论，有说为虞世南书，有云为王知敬书，还有认为欧阳询所书。碑文长达3000余字，保存基本完好，经过千余年现仍巍然树立于昭仁寺内。

昭仁寺，在陕西长武县城内，系唐贞观年间(627—649)李世民为纪念与军阀薛举、薛仁杲作战阵亡的将士而建立的寺院。617年，割据天水、兰州一带的薛举集团，率军10万进犯关中，被李世民击败。次年，薛举勾结突厥再攻长安，唐用金帛拆散了薛举与突厥的联合，双方对垒于高墌（今长武乡北）。唐军因轻敌，被薛举击败，唐将慕容罗侯、李安远、刘弘基被俘，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同年11月，李世民接受前次失败的教训，坚守不战，相持60余日，薛举粮尽，加以部将翟长、孙钟相继投唐，李世民令庞玉以少量兵力将薛举前锋主力宋罗睺吸引于浅水原（长武县西北），自率劲旅从邠栒北境直捣薛军背后，大胜。随后薛举见大势已去，率军向李世民投降，陇东地区从此就置于李唐集团控制之下，巩固了西北基地。贞观三年李世民下诏为作战阵亡部将建寺并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立碑以作纪念。此碑全文及考证均见于《金石萃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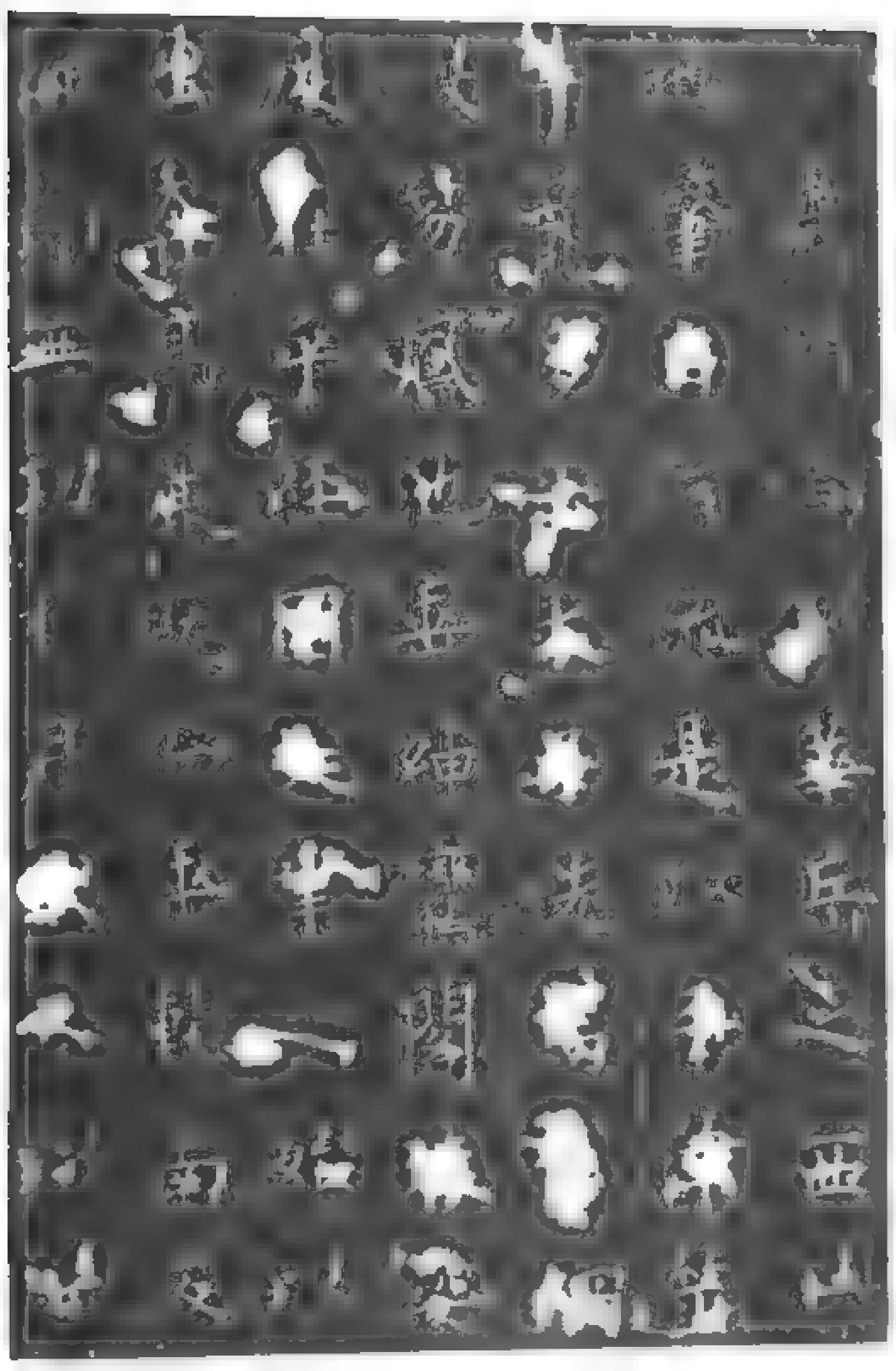
现藏陕西长武县昭仁寺内。

37. 九成宫醴泉铭

唐 贞观六年（632） 此碑螭首、龟趺，刻于唐贞观六年四月，内容是记载唐太宗贞观六年避暑麟游，将隋仁寿宫，改成九成宫的事。碑铭中还描写了九成宫：“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竦阁。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仰视则遒遭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

映，金碧相辉，照耀云霞，蔽亏日月。”当年结构宏伟、气象豪华的情景。碑是由魏征撰文，唐代名书法家欧阳询楷书，24 行，行 50 字，书法圆润中见峭劲，兼有隶书笔意，气韵生动，为欧阳询晚年的代表作品。他在贞观六年，书付善奴授诀中说：“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心眼准程密疏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常形枯；复不可肥，肥即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要妙处。”《九成宫》碑书于贞观六年四月以后，在授诀前的三个月，诀中所说正与《九成宫》笔法相合，所以可以认为欧阳询笔诀正是写了他最得意的作品《九成宫铭》以后，总结出来的精论。不过这一碑刻历代锤拓过多，磨损很利害，自宋至清，原石经过几次开凿，有时过肥，有时过瘦，晚近拓本，细瘦枯瘠已失欧阳询书本来面目，只有北宋拓本，才能体现欧阳询楷书的精妙，现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二，北京图书馆有宋拓一，这些都是此碑的极早拓本。

现存陕西麟游县西碑亭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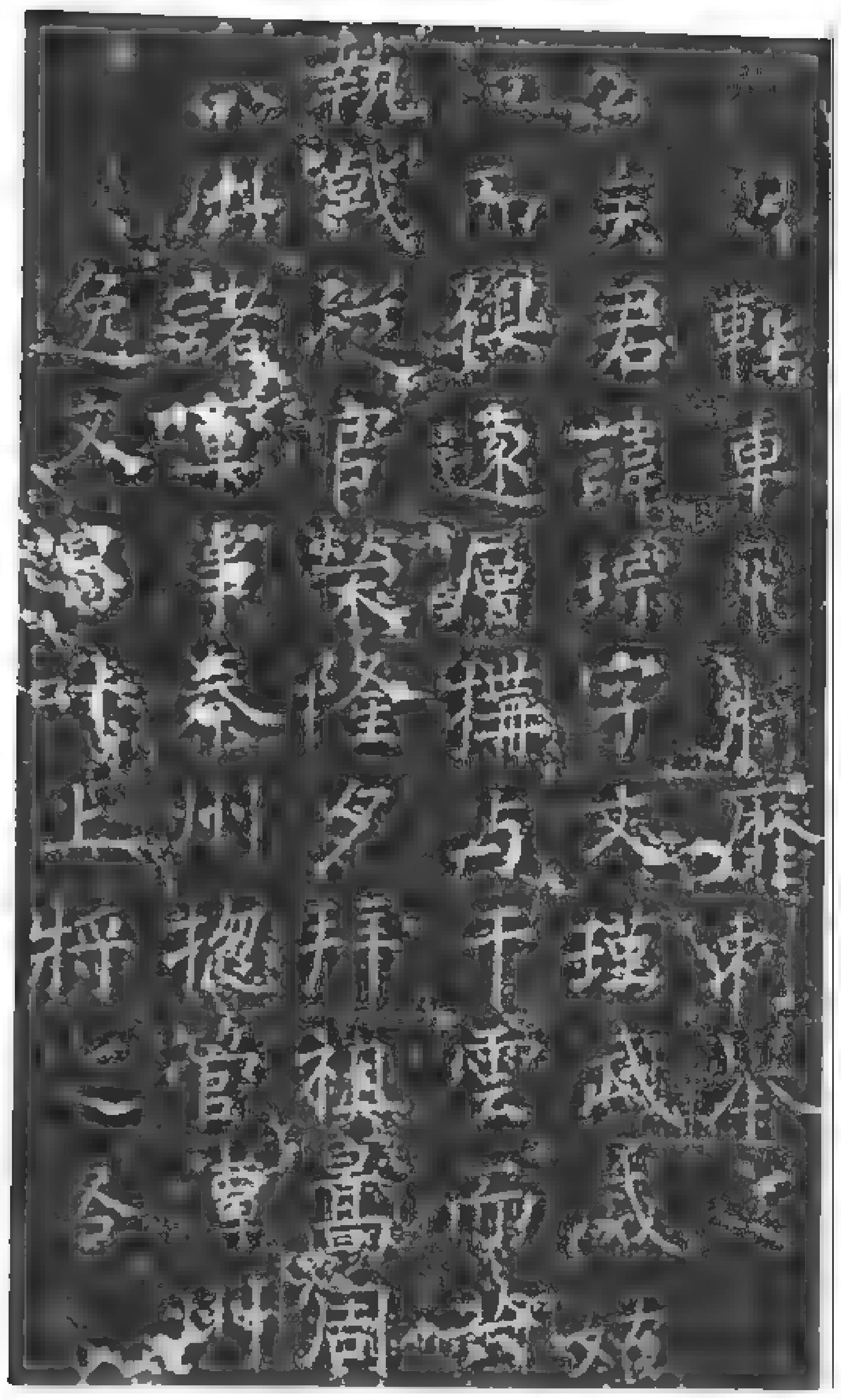


38. 温彦博碑

唐　贞观十一年(637)　　此碑螭首方趺，高 343 厘米，宽 105 厘米，36 行，行 77 字，岑文本撰文，欧阳询楷书，碑额题“大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之碑”篆书 17 字。碑文全文约 2800 余字，内容主要是颂扬温彦博的事迹。温彦博(573—637）唐初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人。隋末从罗艺为司马，后归唐，官中书侍郎。武德八年(625）从张瑾进攻突厥，任行军长史，兵败被俘。突厥贵族问以唐虚实，兵马多少，他坚不吐漏，被迁于阴山苦塞之地，太宗即位后回朝。贞观四年（630）任中书令，主张把突厥降众迁置河套以内，为唐太宗所采纳，贞观十一年死后，陪葬于昭陵。并

为其立碑。由欧阳询书字，字字丰骨整肃，神采奕奕，是欧书中的典型作品。碑文虽因捶拓与剥蚀，字多漫漶，然上部四分之一保存较好，足可睹其原书的风貌。今存最古拓本仅有800多字，故宫博物院还有二本都是宋拓中比较早的版本。

现存陕西昭陵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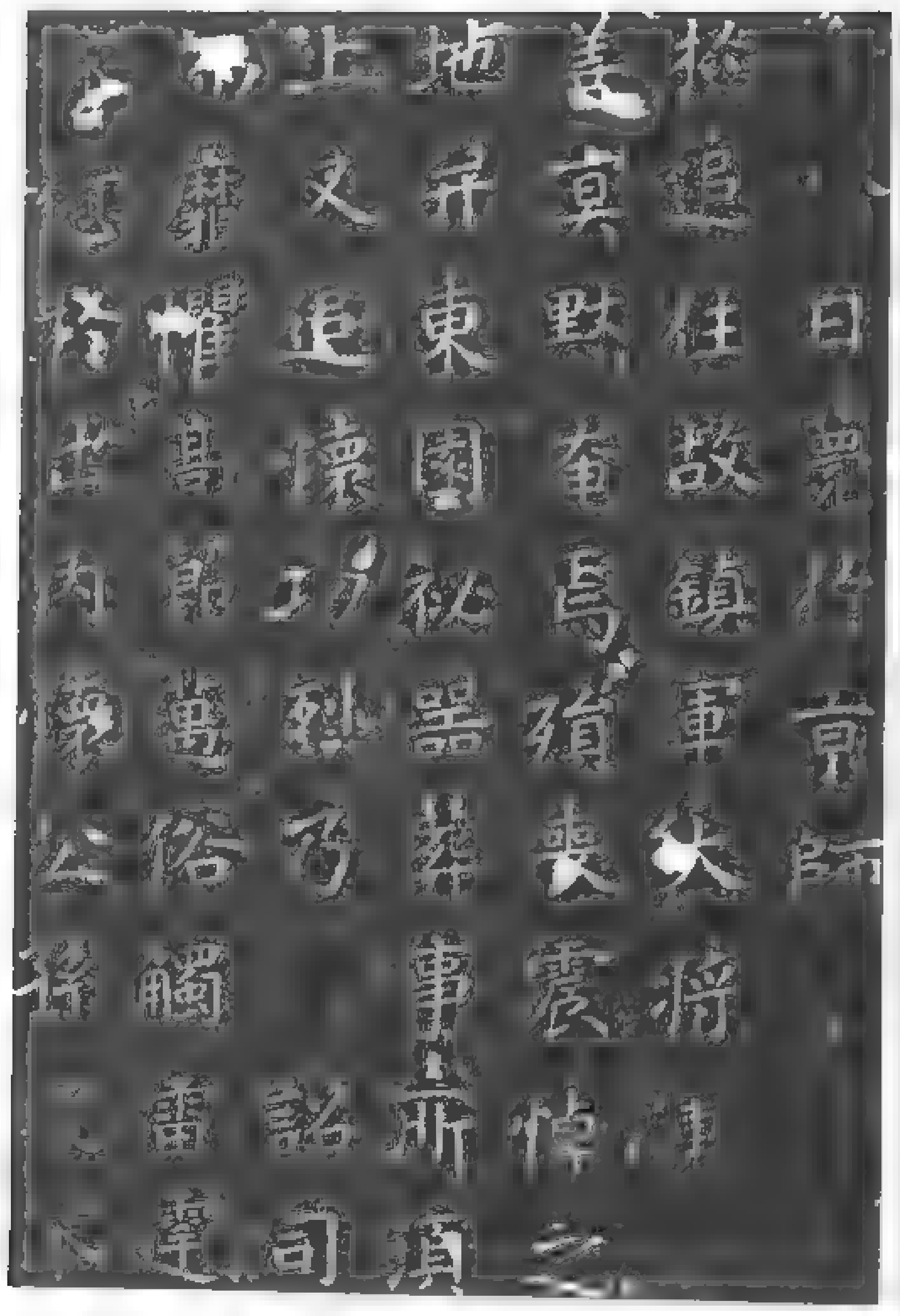


39. 张琮碑

唐　贞观十三年（639）　此碑螭首，碑额题“唐故□□光禄大□张府君□”12字篆书，由于志宁撰文，碑无书写人姓名，书法楷书30行，行59字，书法遒劲，颇近欧虞笔法，为初唐的书法佳作。

现藏咸阳市博物馆。

40. 段志玄碑



唐　贞观十六年（642）　此碑螭首，碑额篆题“大唐故右卫大将军扬州都督段公之碑”16字，碑无撰书人姓名。书法楷书，字迹方整，间有隶意，32行，行65字，碑全文约2000字，然碑版上部20字以上字迹清楚，20字以下部分字迹多泐漶不清，全文及考证见《昭陵碑考》。碑现保存在昭陵碑林第一室。

41. 陆让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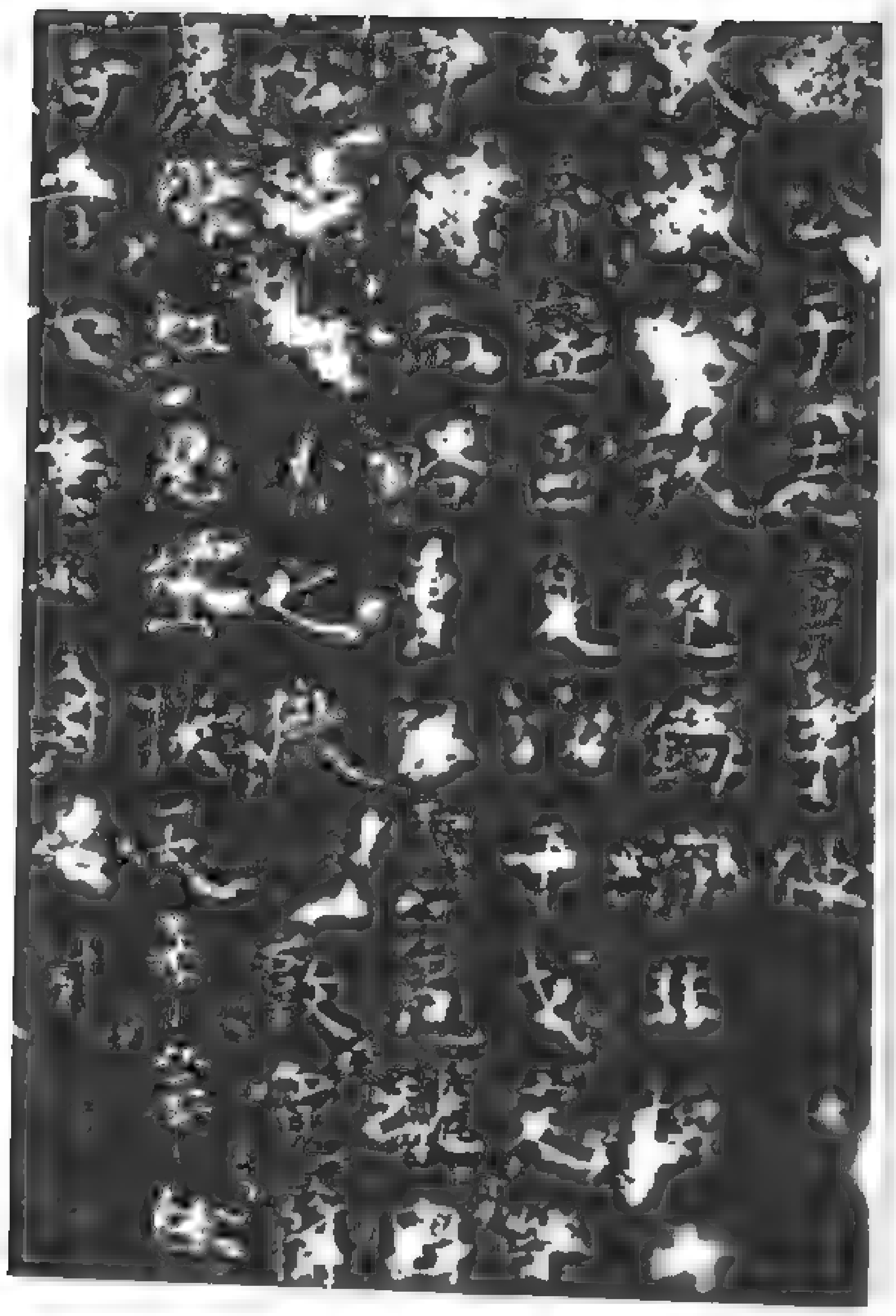
唐　贞观十七年（643）　此碑螭首，额篆题“隋文州总管光禄卿陆使君碑”12字，郭俨楷书，34行，行51字。笔致整洁俊逸，结体近似《崔敬礼碑》，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赞美《崔碑》为颗颗明珠，但较之此碑似略逊一筹。碑文字文剥落甚多，陆让史书缺传，碑可补史籍的不足。全文和考

证《金石萃编》有载。

现存陕西三原县三家店村。

42. 孔颖达碑

唐 贞观二十二年(648) 此碑螭首方趺，高350厘米，宽104厘米，碑额题“大唐故国子祭酒曲阜宪公孔公之碑铭”16字篆书。碑文35行，行76字楷书，碑文记述李世民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孔颖达生平事迹甚详。碑是由于志宁撰文，无书字人姓名，笔法遒媚，曾被人认为为虞世南所书，但实系善于摹仿虞派人所书，因虞世南比孔颖达早亡十年，树碑立传，歌功颂德，十年之前岂可定论。故宫博物院有此碑的宋代拓本。1974年，发现碑座铆口两侧刻有字迹，右侧22字，左侧18字，其中有楷字28字，其余为行书。经研究这些字迹楷书有类欧、虞书迹，行书含二王气韵，均系工匠们习刀直接刻书，未经描红，由此可了解初唐书法艺术的发展水平。



现藏昭陵博物馆碑石展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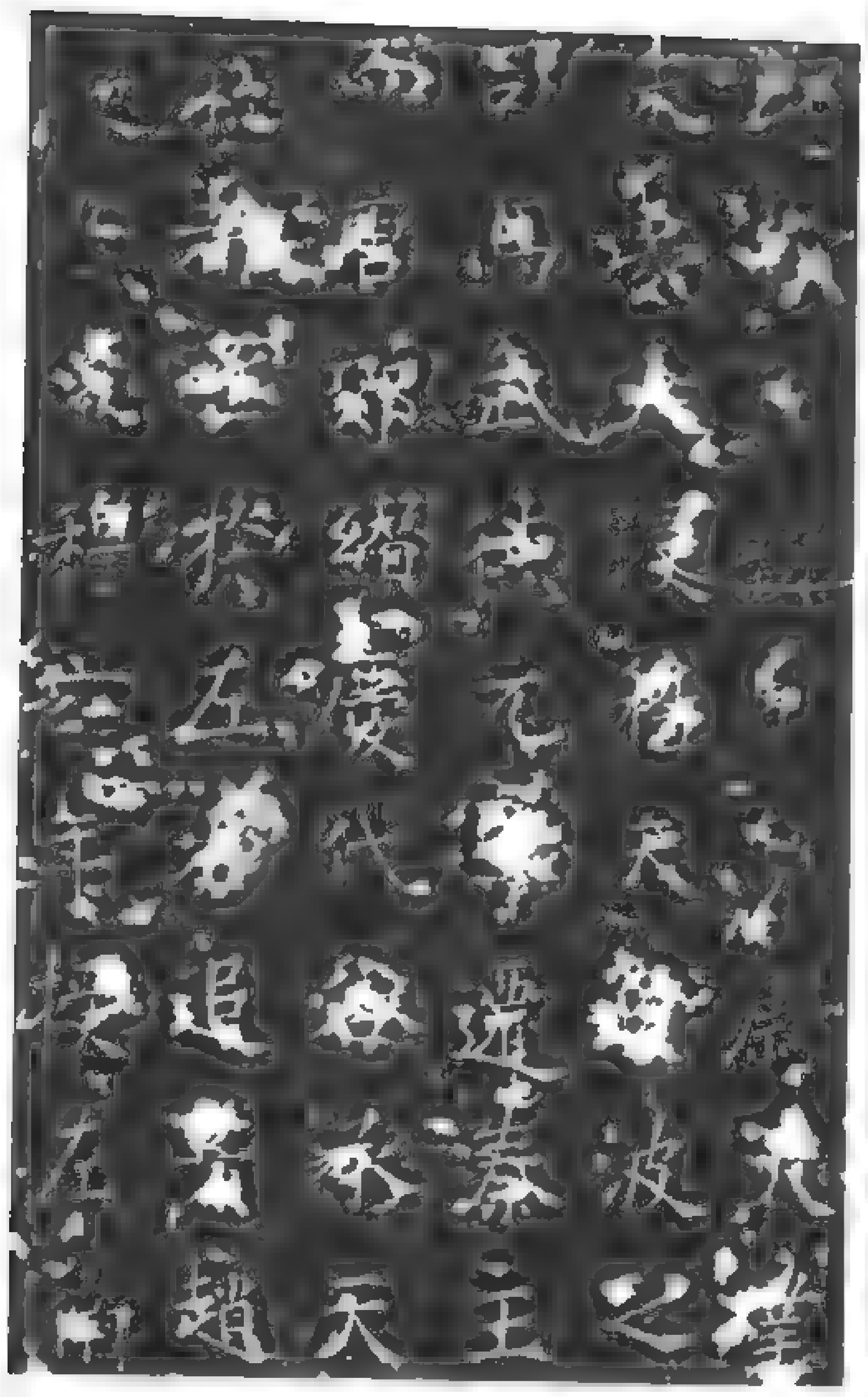
43. 褚亮碑

唐 贞观二十二年(648) 此碑螭首方趺，高300厘米，碑额篆书阴刻“唐故褚卿之碑”，碑文28行，行65字隶书，书法端妍细劲，匀整秀丽，迭宕飘逸之中，又蕴汉隶的凝重与质朴，堪为唐隶上乘。此碑因年久，磨灭较甚，惟上截有字，书者姓名据明赵崡《石墨镌华》云：“分隶与《马周碑》如出一手，疑亦殷仲容书”恐非虚拟。

殷仲容，唐陈郡（今河南淮阳）人，曾任礼部郎中、申州刺史。工篆、隶，尤精题署。贞观二十三年，曾书昭陵石刻十四国酋长像座题名。武后时，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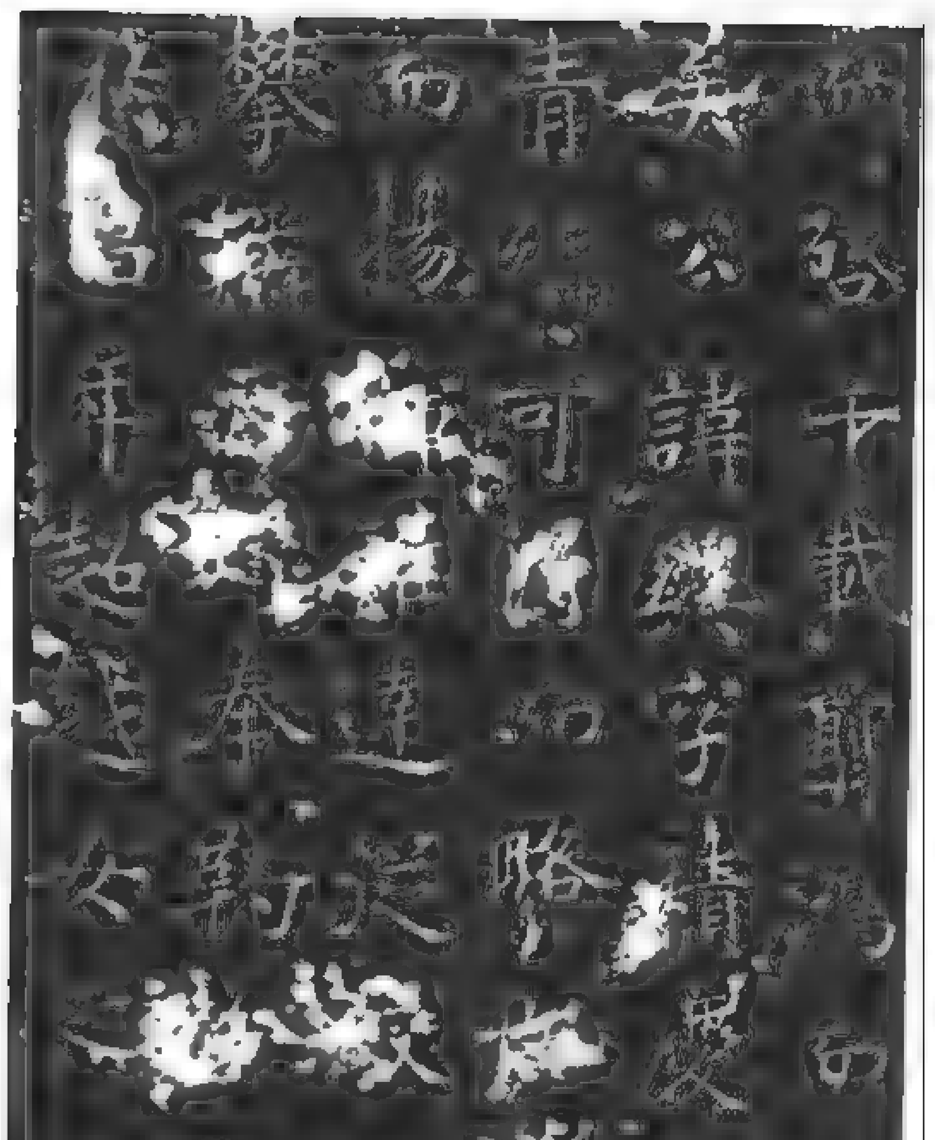
王知敬齐名。开元（713—741）中，尚奉唐玄宗敕摹拓孔子传世书作《比干墓铭》和《季札墓碣》。殷仲容生平事虽不可考，但知他自贞观末年乃至开元中的六七十年间，一直以书得名。他不但享书名较早，而且是一位享年相当高的书法家，他在昭陵留下的书法作品除石刻十四国酋长像座题名外，还有《马周碑》和这通《褚亮碑》。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是书法名家褚遂良之父，曾为薛举黄门侍郎，薛举灭，遂归唐，为李世民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秦王每征战，亮在军中，参于密谋，有裨辅之益。阎立本奉教画“十八学士写真图”，亮为之作赞。年 88 岁病卒，赠太常卿，诏陪昭陵。树碑立于墓前。今收藏在昭陵碑林之中。

44. 豆卢宽碑



唐　永徽元年（650）　此碑螭首方趺，高 352 厘米，宽 104 厘米，33 行，行 69 字，李义府撰文，无书者姓名，碑文书字楷体，精健有法，碑首题衔全泐漶，碑文磨泐也特别严重，一行仅存四五字，内容不能详为论断。碑额题“唐故特进芮定公之碑”九字篆书。豆卢宽《唐书》有传，碑全文见《昭陵碑考》。

现存昭陵博物馆。



45. 樊兴碑

唐　永徽元年（650）　此碑螭首，碑额题为“左监门大将军襄城郡公樊兴碑”篆书 13 字，碑文 31 行，行 61 字，书法楷书，无撰书人姓名，笔法类似褚遂良，似为学褚笔法者所书，但字迹劲健，亦为初唐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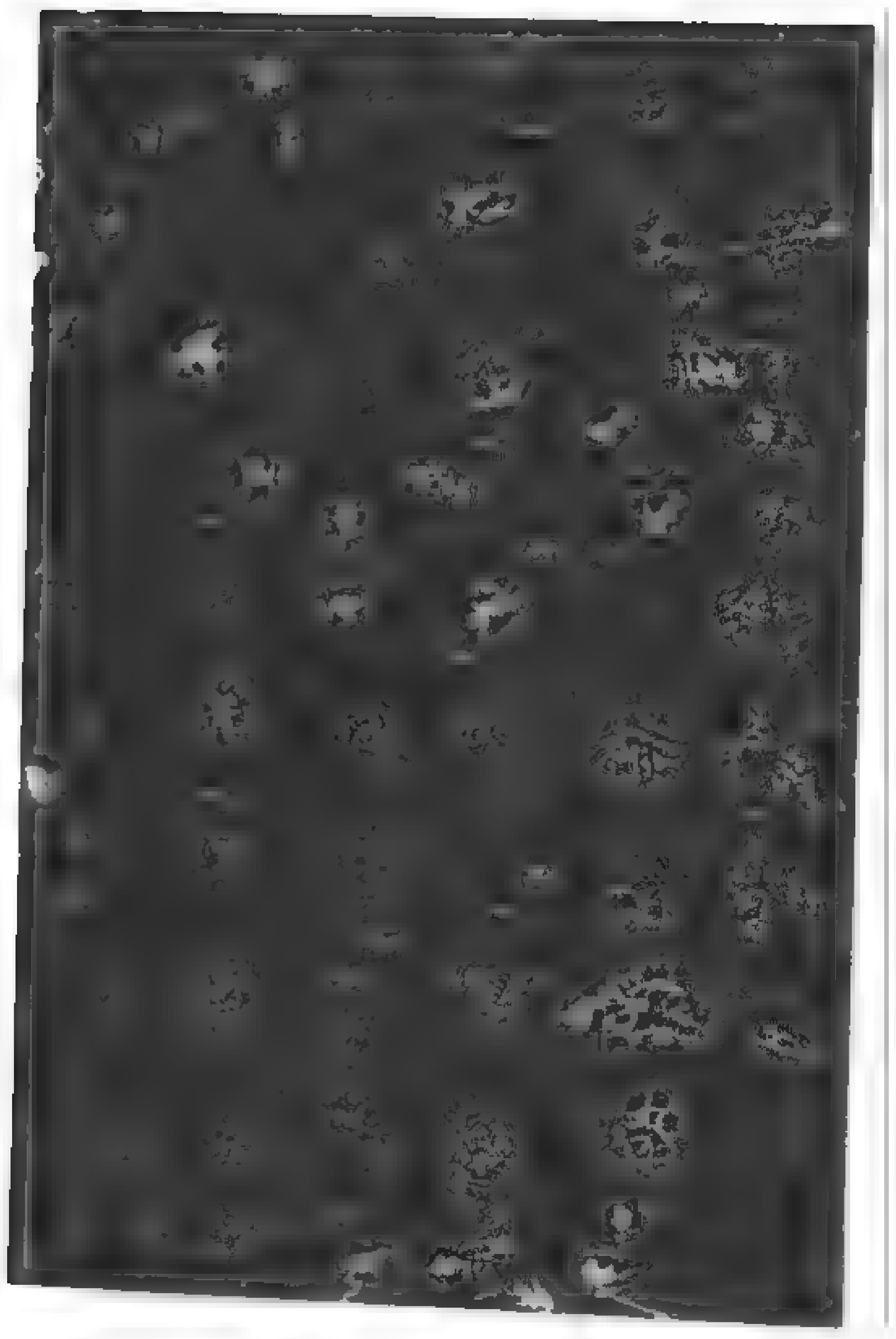
碑文内容主要述叙樊兴为唐室屡立战功而受加封的情况。碑原立在三原县献陵，清道光八年周贞木学使移于三原县学使署中，现存三原县城内土产公司门市部。碑文下部和右部有部

分文字残缺，碑后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沈兆麟等题刻者为新拓，无题刻者为旧拓。全文见《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

现存三原县城内。

46. 房玄龄碑

唐　永徽三年（652）



此碑螭首方趺，高375厘米，碑额篆题“大唐故左仆射上柱国太尉梁文昭公碑”16字。碑文原有2000余字，北宋以后碑面渐蒙损伤，至今虽漫漶严重，但上部仍有300余字清晰可见。碑文书字为当时名书法家褚遂良所写，笔法疏瘦劲练，属“褚书”中的精品。从其字迹笔法上细观“昂右垂左或昂左垂右，貌视殊乖而未离方轨”与“王书”有明显的“不协之处”。落笔之后，即如行云流水，跌宕伏波，常常笔出潇洒而不收敛，与虞书的“缩锋”又迥然不同。运笔圆转而意到笔，顺势出形飒爽挥豁。正如张怀瓘《书断》中评论“褚体”“若美女蝉娟，不胜罗绮。”

碑文内容主要记叙房玄龄的生平事迹。房玄龄，字乔，唐齐州淄博（今山东济南淄博）人，唐初大臣。隋末举进士，任隰城尉。唐兵入关中，归李世民，任秦王府记室。协助李世民筹谋统一，取得帝位。贞观元年（627）为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他长期执政，与杜如晦、魏征等同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助手，为促成贞观之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历史上有名的贤相。后封为梁国公，曾受诏重撰《晋书》。其言论见于《贞观政要》。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以71岁病故，诏陪葬昭陵。

此碑即为房玄龄墓前之碑，传世的宋拓本仅有清人李芝陔所藏一部，已经影印。

现藏昭陵博物馆。

47. 万年宫铭

唐　永徽五年（654）

此石额刻“万年宫铭”四字，万年宫系九成宫

改名，即隋代的仁寿宫。碑文26行，行37—42字不等，书法行体，为唐高宗（李治）撰文并书写，此铭笔致生动，有晋人风度。因唐太宗（李世民）好二王书法，故其子高宗受太宗的熏陶，笔法圆美流畅，有一定的造诣。碑阴刻有中书门下及文武三品以上并学士自书名位，分上下二层，皆22行，行字不等，大小不一。碑原立于永光门外，不知何时移置至九成宫遗址。以往凡拓醴泉铭者，也顺手拓一纸，所以万年宫铭石面较为模糊。全文见《金石萃编》。

现存麟游县文化馆。

48. 周 护 碑

唐 显庆三年（658） 此碑螭首，许敬宗撰文，王行满楷书。清毕沅在《中州金石记》中，盛誉王行满书法说："观其用笔，端方绵密、绰有姿致，不在褚遂良之下。"今观周护碑，知毕沅评说及是，王书在"端方"之中又见茂爽、"绵密"之外又具疏朗，对欧、虞有兼收并蓄之处；又别具棱角严伟之貌，另具一番韵味，与初唐各书法名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行满书迹知名的除有此《周护碑》外，存世者还有《洛阳圣教序》及《韩仲良碑》等。《周护碑》1974年由陕西礼泉县昭陵出土。其碑在历代金石学家的著录中均无记载，当是北宋时就倒仆入土的。因埋入地下年深日久，因而受风雨剥蚀及人为破坏较轻，在现存2000多字中，半数以上字笔画崭如新刻，不仅是书法艺术上的珍品，而碑文内容亦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现存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49. 李 靖 碑

唐 显庆三年（658） 此碑高430厘米，螭首方趺，碑侧雕缠枝蔓草连方花纹，碑额题刻"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司徒卫景武公碑"阴刻篆文20字。碑为许敬宗撰，王知敬楷书，文39行，行82字。碑虽经年久侵蚀，下部多有漫漶，但上部三分之一字迹尚很清晰，王知敬的书风仍历历在

目。王知敬，洛阳人，是唐高宗（李治）时第一流的书法家，武则天时，官至太子家令（后人亦称他为王家令）麟台少监，工于草、行，尤善章草，与殷仲容曾奉武则天诏各书一寺额，殷题“资圣”、王题“清禅”，皆称一时之绝。唐张怀瓘《书断》曾列王知敬行、草、章草书为能品。“昭陵碑林”现存的《李靖碑》、《尉迟敬德碑》均是他的代表作品。他的书法由虞、褚而来，又含北派风格，所以规矩谨严当中，别有一种婀娜的风致。张怀瓘曾评“知敬书肤骨兼有，弋戟足以自卫，毛翮足以飞翻”。今观此碑，王知敬书法确有“麒麟将腾，鸾凤欲翥”之姿。

碑文内容主要是颂扬李靖的功勋。李靖，唐初的军事家。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三原县东北）人。精熟兵法，为其舅韩擒虎所称道。隋末任马邑郡丞。高祖时任行军总管，率军从李孝恭征服萧铣，并取得岭南地区，任岭南道抚慰大使，又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祐起义军。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著有《李卫兵法》，原书今佚，《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由于李靖为唐室建立过特殊功勋，死后陪葬昭陵山南台阶地上，被称为“上山冢”。起冢象阴山，积石山，中为圆锥形，两旁平面作长方形，东断西连。这种山形起冢，无疑是仿汉代卫青、霍去病墓的旧制，墓前立有石人、石羊、石虎，竖碑螭首方趺，碑身刻文以叙其功。

现藏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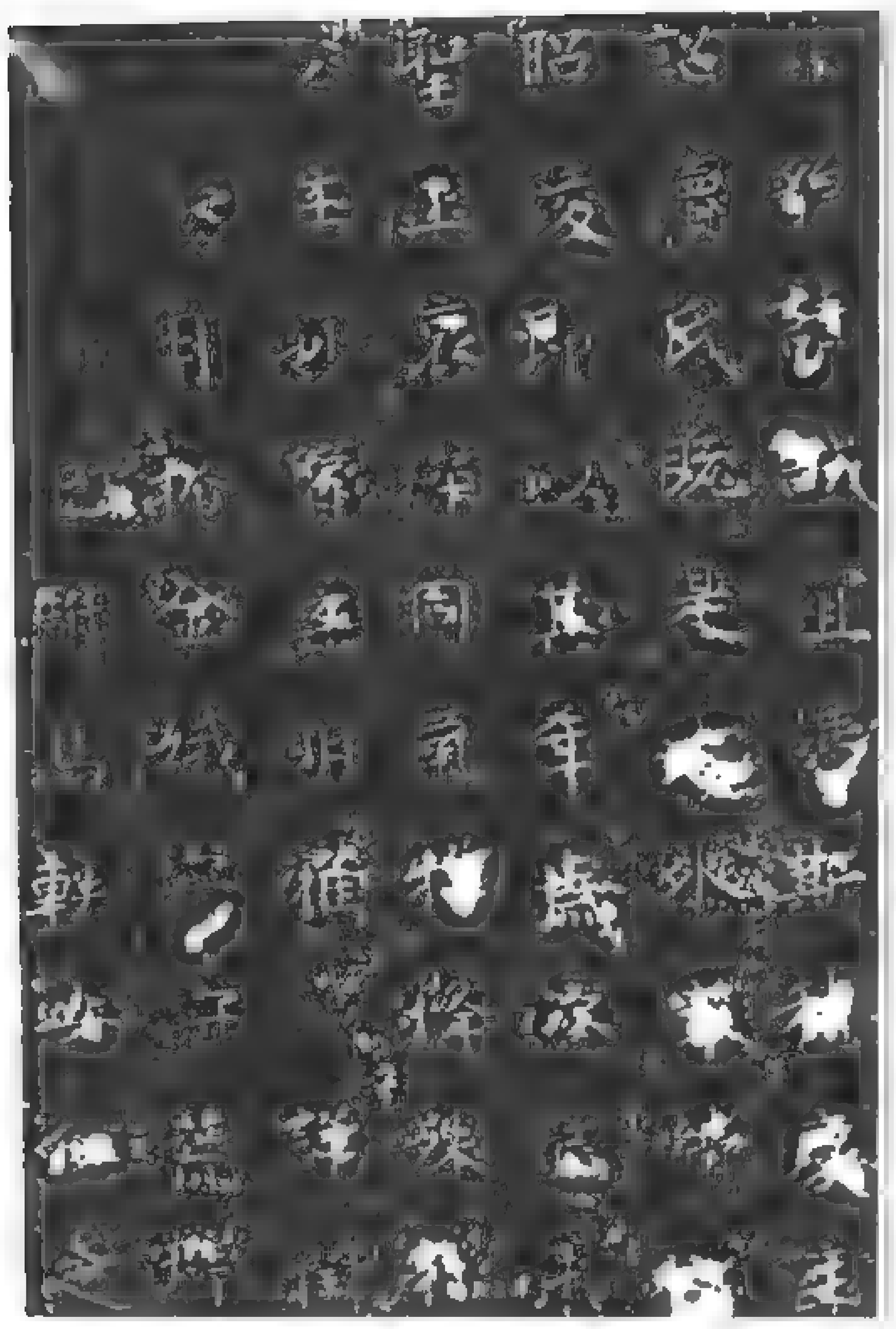
50. 兰陵长公主碑

唐　显庆四年（659）　　此碑螭首方座，碑额书“大唐故兰陵长公主碑”楷书 9 字，文 31 行，行 70 字，书法亦为楷体，字迹遒美。李义府撰文，窦怀哲书字。

兰陵长公主，名淑，字丽贞，唐太宗（李世民）第十九女（新、旧《唐书》有传可考），下嫁驸马窦怀哲，高宗显庆四年卒，陪葬昭陵。此碑是窦怀哲为其妻书碑以寄哀思，书法娟秀有致，骨肉得宜，被誉为“书家倾国”，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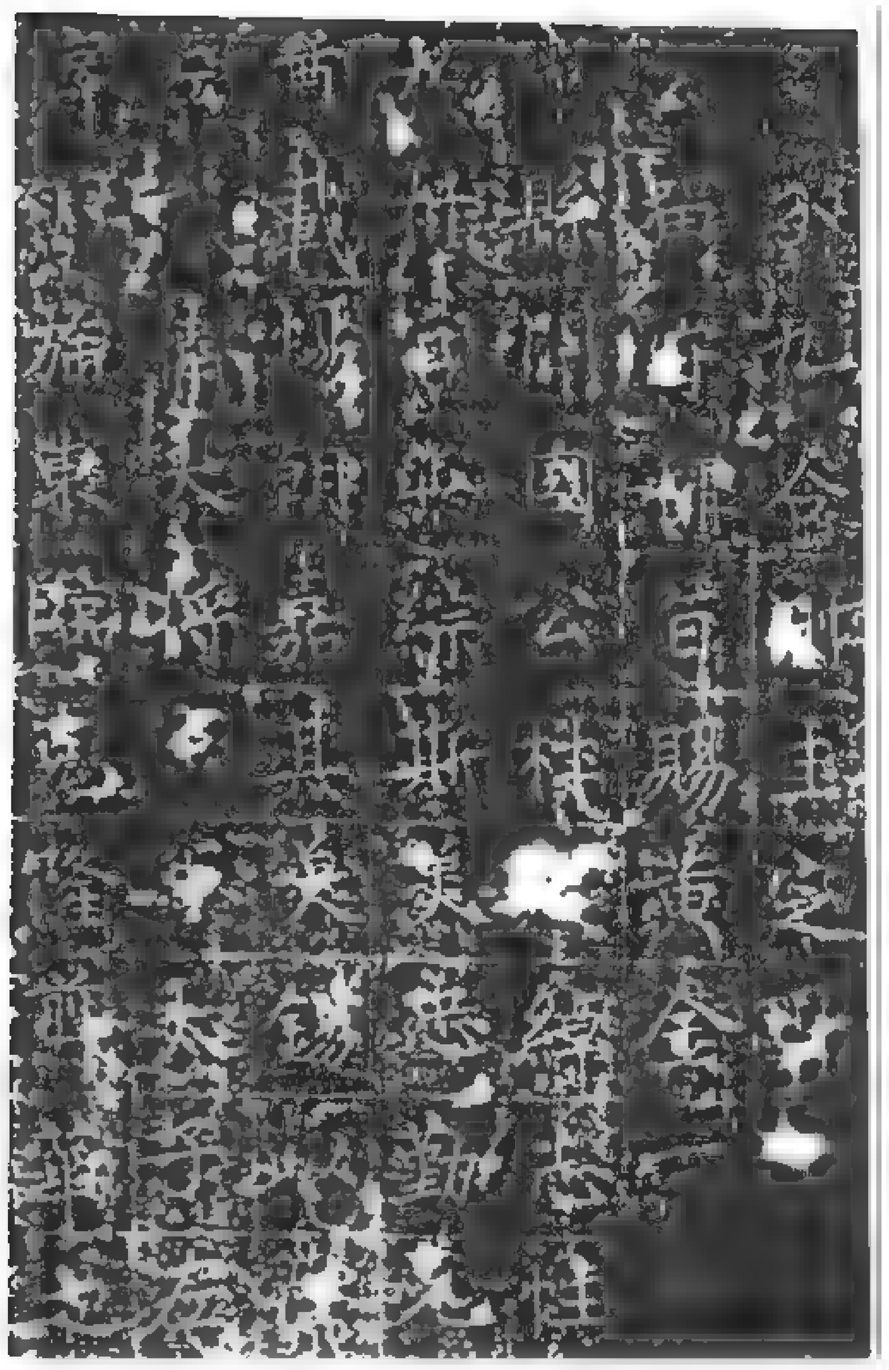
之似《同州圣教序碑》,而又饶有虞世南笔意,为唐碑中的杰作。

现藏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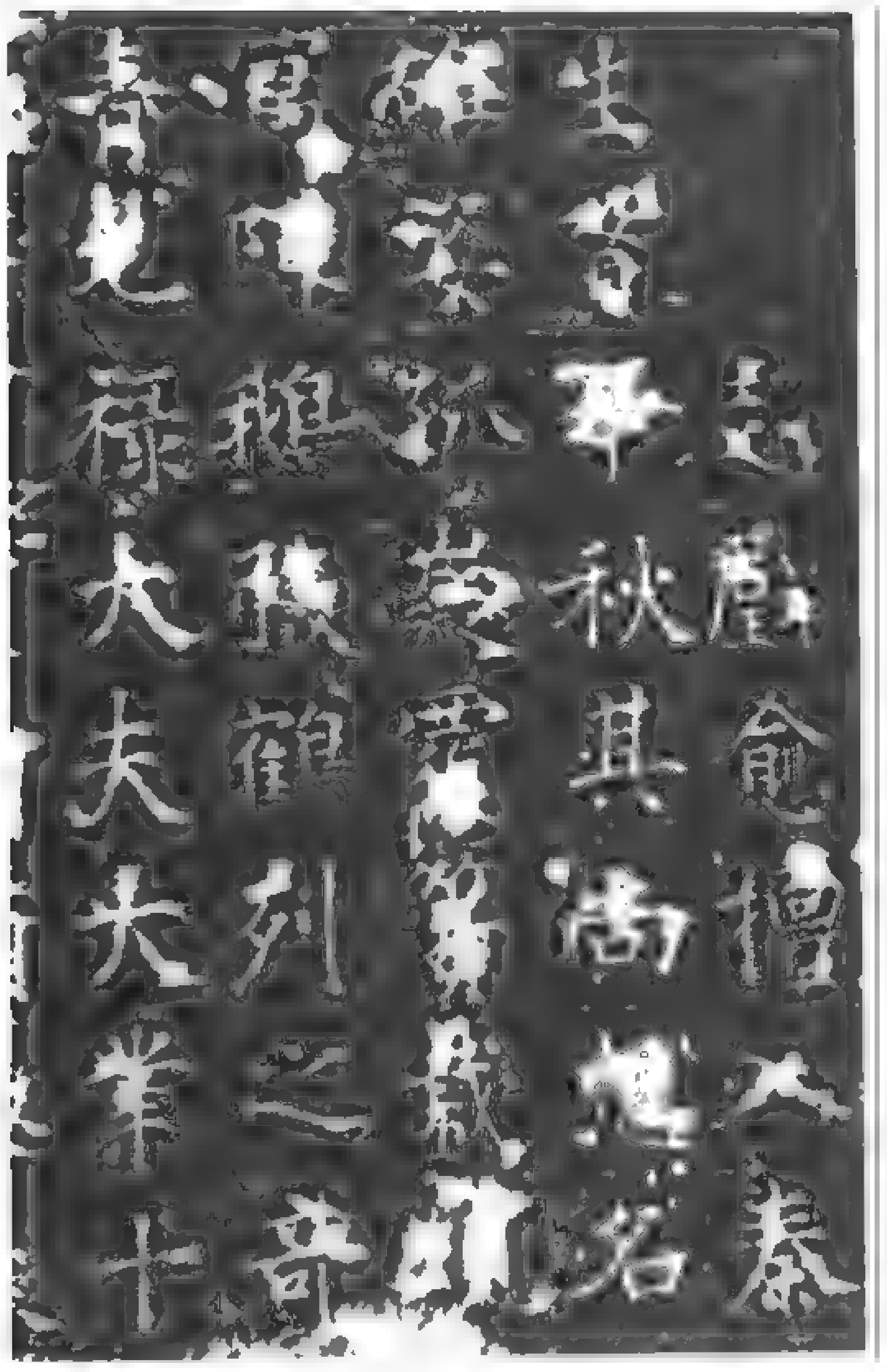
51. 尉迟恭碑

唐 显庆四年(659) 此碑螭首方趺,高445厘米,宽194厘米,其高大仅次于李勣碑,为昭陵陵园中最大碑石之一。碑侧各雕有繁缛精美的蔓草浮雕图案,下刻兽面纹饰,刀法精湛。碑额刻“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忠武公之碑”16字篆书。许敬宗撰文,王知敬楷碑文,书风俊伟,惜碑面文字剥蚀严重,碑下部仅存三分之一文字。此碑原文收入《文苑英华》,与今本对照,可补碑的缺文。碑文据记载得知,书文40行,行78字。以记叙尉迟恭生平事迹。



尉迟恭(585—658),唐初大将。字敬德,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人。隋末从刘武周为将,后降唐。曾击败王世充军,并参加了镇压窦建德、刘黑闼起义军。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等职。晚年笃信方术,杜门不出。死后陪葬昭陵。近年来昭陵文管所配合当地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对“封地内周一百二十里”(见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全部面积和计3万多市亩的唐昭陵陵园,个别墓作了重点清理,首批发掘的陪葬墓群中有尉迟敬德墓。此墓清理时发现已被盗过,随葬器物多遭劫掠,仅余者亦多残破。惟出土墓志两合十分完整,石门、棺床等石刻颇为精美,是研究唐代雕刻艺术的佳作。

现存昭陵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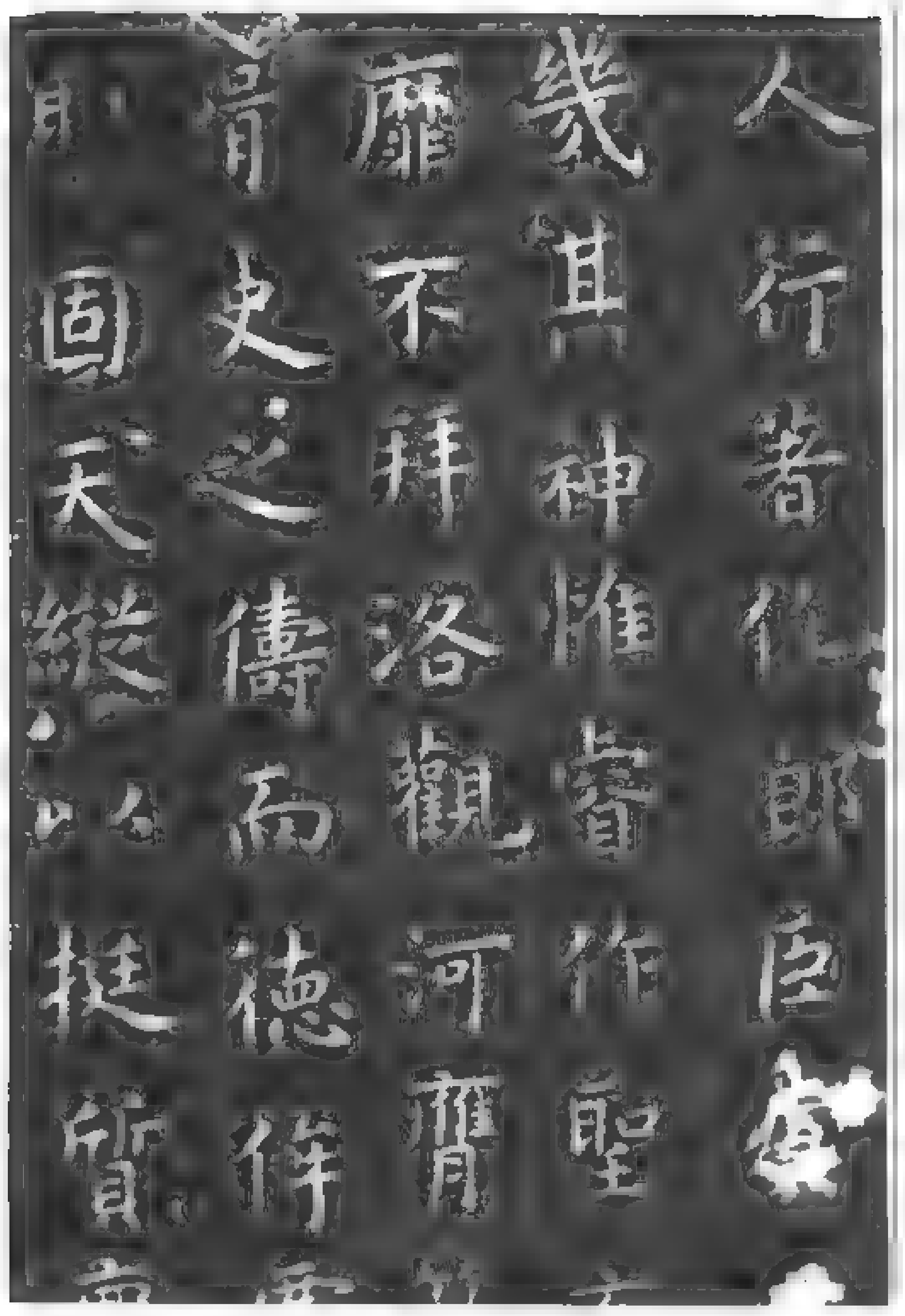
52. 杜君绰碑

唐　龙朔三年（663）　此碑螭首方趺，高361厘米，宽115厘米，碑额刻“大唐故左戍卫大将军太子左典戍卫率赠荆州都督上柱国怀宁县开国襄公杜公碑”34字篆书。碑由李俨撰文、高正臣楷书，碑文39行，行约76字。书法通篇骨气秀逸超群。碑文内容是为杜君绰树碑立传，表彰其功绩。杜君绰，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封上柱国、怀宁县开国公，龙朔二年（662）十月卒，年62岁，次年二月，陪葬昭陵，谥曰襄。碑原立在墓前，因年久碑面刻字上部多漫漶，下部虽经捶拓与剥蚀，半数字迹仍清晰可辨。

现藏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53. 同州三藏圣教序碑

唐　龙朔三年（663）　此碑螭首四方形座，座四周浮雕力士等人物，形象生动，倍增碑的庄严高大。碑高414厘米，宽113厘米，29行，满行58字。碑的内容与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雁塔圣教序碑》及河南王行满书《圣教序碑》都相同，是褚遂良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写的，因称“同州圣教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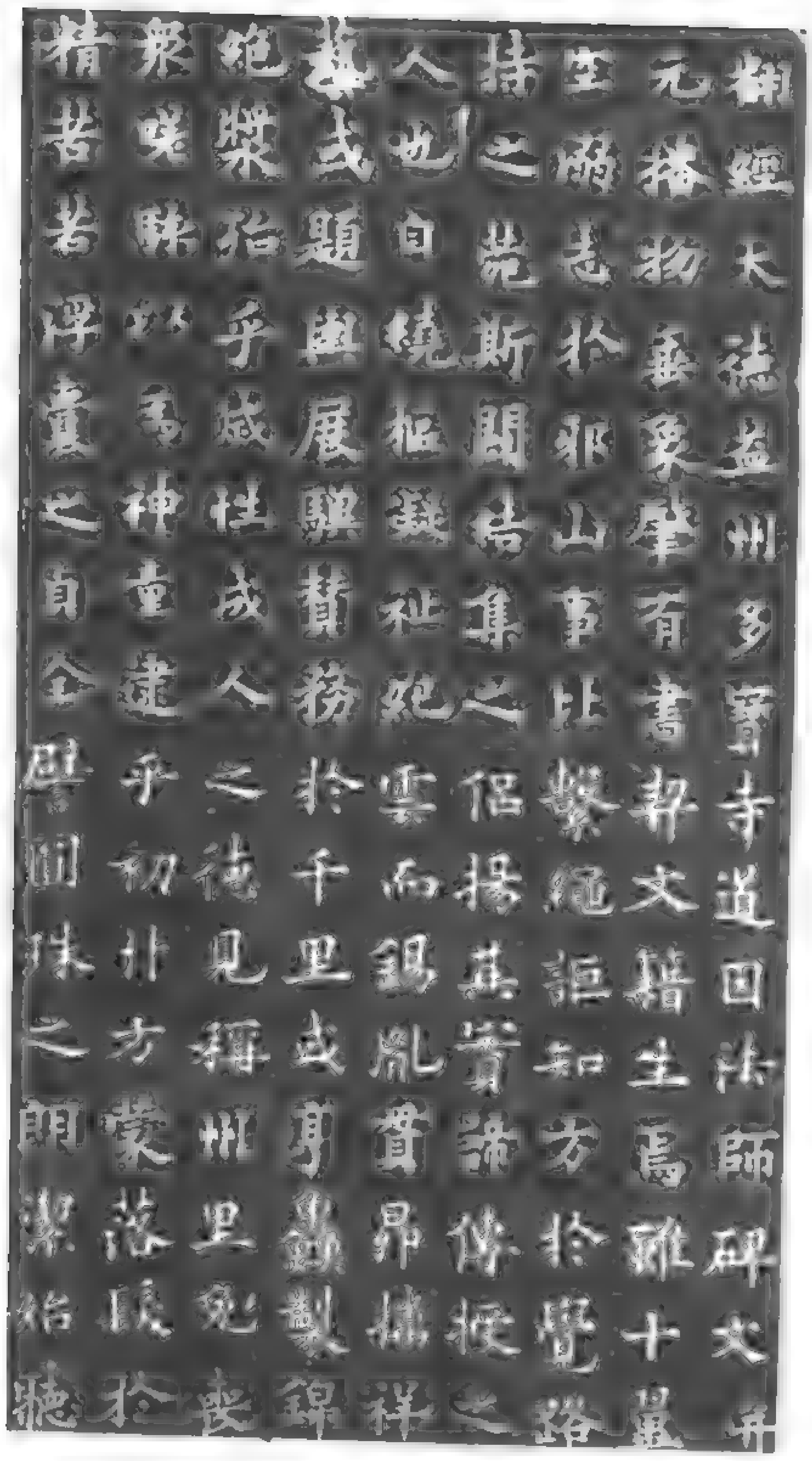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阳翟人，官至右仆射、河南公，所以人称褚河南。他工隶、楷书法，据说唐太宗因虞世南去世，认为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当天即召褚遂良为侍书。传世名碑有《伊阙佛龛记》、两种《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等，均代表褚遂良不同时期的书法面貌。他的字以妍华遒逸，在欧、虞外树新帜，不为前人束缚，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都是在褚的基础上再创新风。《同州三藏圣教序碑》和《雁塔圣教序碑》都

是褚遂良晚年的杰作，以疏瘦劲炼的书法著称，对书法界有很大影响。此两碑一出，摹学褚书成为一时风尚。此碑于1974年由陕西大荔县移至西安碑林。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54．道因法师碑

唐　龙朔三年（663）　此碑高312厘米，宽103厘米，34行，满行73字。碑头雕作螭首，碑额处雕饰佛龛，龛高45厘米，龛内浮雕释迦牟尼观自在、大势在、大势至三尊佛像。龛下横书“故大德因法师碑”七字。碑两侧浮雕华丽的波状二方连续花纹图案。碑座龟趺两边，用线刻两组主从各异的人物，卷发深目，异国装束，形象生动，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碑阴上部刻北宋“咸平元年（998）僧梦英诗。”为虚岳僧王蒙书，共分六截。额处亦凿有小龛。龛内浮雕梦英和尚像。龛下沿横行书“梦英大师真”五字。

碑文34行，书法楷体。道因法师俗姓侯，原出家成都多宝寺，唐贞观年间，曾在长安大慈恩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因而碑文首题有“翻经大德”之句。龙朔三年，他的弟子玄凝请欧阳通书立《道因法师碑》来纪念他。



欧阳通，字通师，湖南长沙人，是欧阳询的儿子。他童年时期，父亲去世，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书，锐志钻研，刻意摹习，得以继承家法，成为唐代名书法家，与其父齐名，有“大小欧阳”之称。周武时，他曾任过宰相，因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被来俊臣所害。

在欧阳通学书时期，正值初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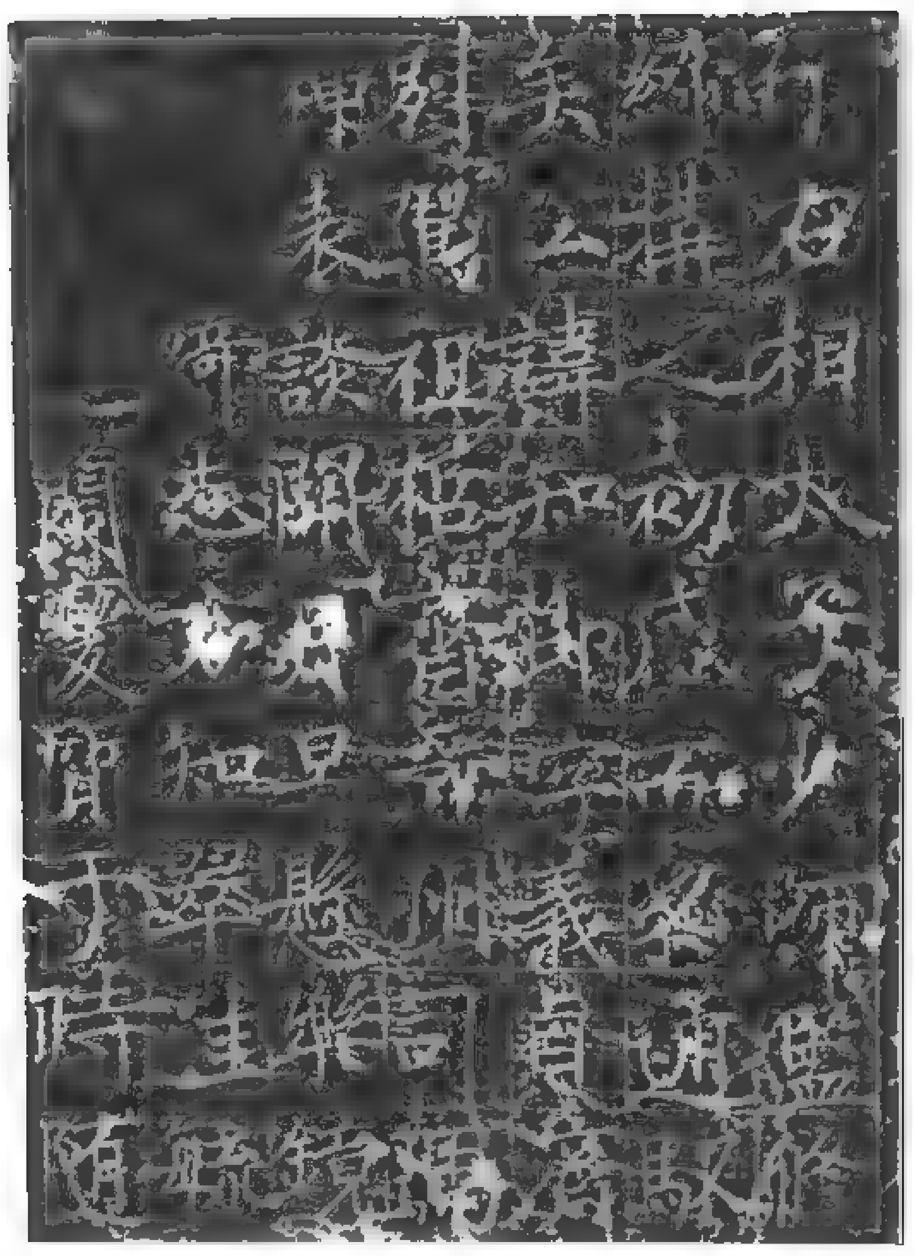
法发生变化时期，他以“善学父书”著称。由于欧字结体严谨，平稳端正，所以后世在科举取士时，就以欧字为考卷标准书体。欧阳通所书的刻碑，到目前为止，除 1992 年洛阳出土的一方《全男生墓志》外，传世的仅有《道因法师碑》。一般人对此碑的艺术评价，多称它“克继家法”，但也有认为“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的。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对此碑甚为推崇，认为“险劲横跌，往往突过乃翁”。

总之小欧阳书的《道因法师碑》，书法严谨、笔力遒健，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可视为学习欧书的门径。

此碑拓本，目前存世的有宋拓本；明中叶拓本；明拓本；清初拓本；乾隆前拓本；嘉、道时拓本及影印本。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55. 程知节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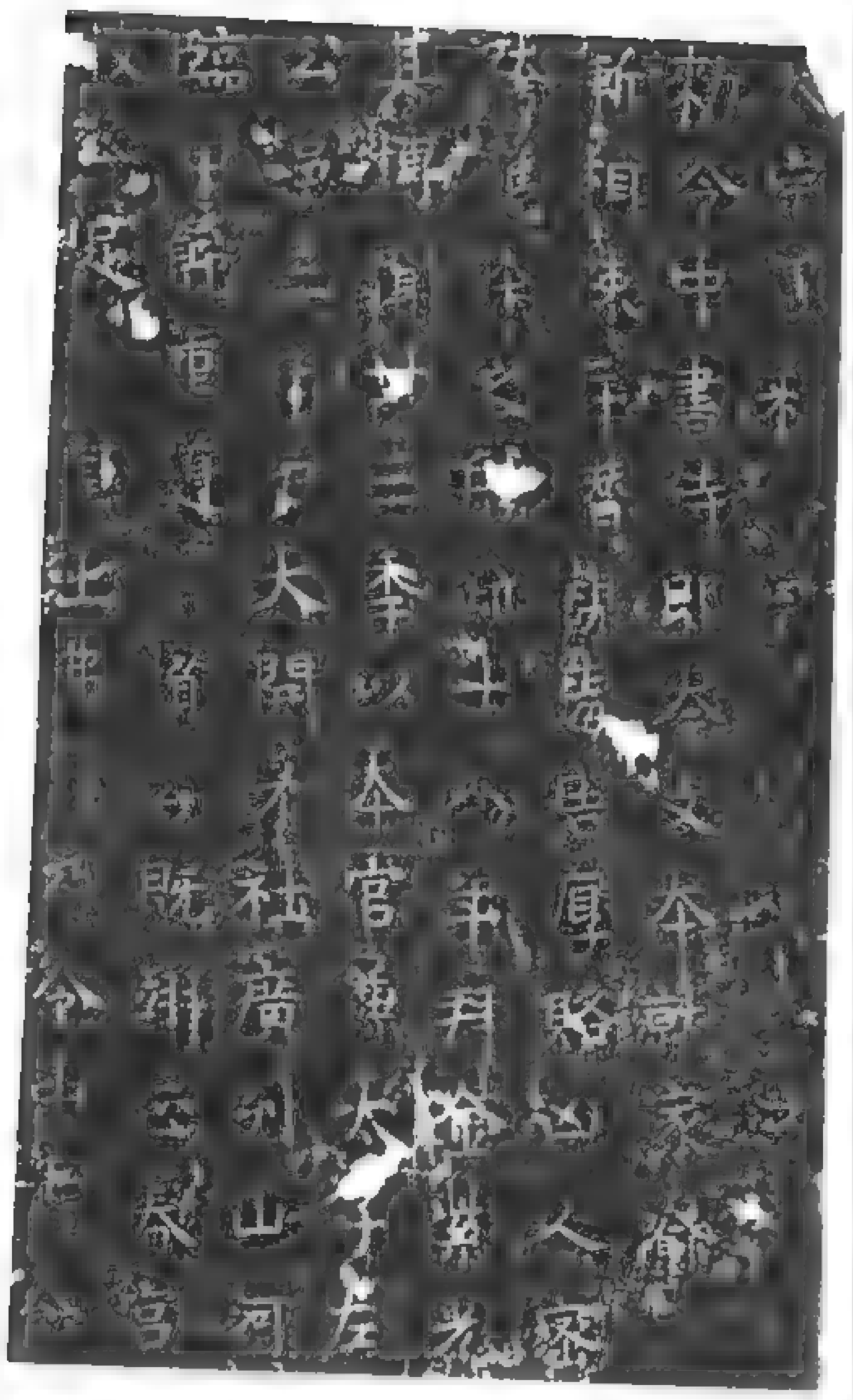


唐　麟德二年（665）　此碑已残断，残高 145 厘米，宽 103 厘米，仅留残字 36 行，共约 1692 字，许敬宗撰文，畅正（畅，又作扬）楷书，字迹瘦劲挺拔。此碑金石著录多无记载。程知节（？—665），字待宾，俗称程咬金。唐济州东阿（今山东阿镇）人。隋末从李密，为瓦岗军主要将领之一，以骁勇著称，任内军骠骑。密败，属王世充。归唐后，屡建战功，为唐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官至左卫大将军，封卢国公。卒于麟德二年，诏陪葬于昭陵。墓上立碑由畅正书，此人工于书法，为程家书有此碑外，还有《清河公主碑》。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贤，唐太宗女，下嫁程处亮。处亮，是程知节子，公主于高宗麟德元年陪葬昭陵，《清河公主碑》亦是畅正书。署衔“品子”，“品子”，即品官的子弟，属未入仕者，可知畅正青年时期就有书名。笔法拓落淋漓，不拘一格，刚挺劲

健的风骨，是大胆创新的笔意。清代叶昌炽称其书“劲拔如张千钧之弩，彀满而后发，上之虽未能抗薛纯，下之可平视薛曜”。

现存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56. 于志宁碑



唐　乾封元年（666）　此碑螭首，碑额书“大唐故柱国燕国公于君之碑”12字篆书，碑为令狐德棻撰文，于立正楷书，书法极为精整，此碑字体在唐碑结构中为最小，碑文及考证见《金石萃编》，仅存2000余字，清翁方纲收入《唐碑选》中。于志宁（588—665），唐京兆高陵（今属陕西）人。字仲谧，贞观三年（629），任中书侍郎，太子左庶子。曾多次劝谏太子承乾，几乎被太子派人刺死。永徽二年（651）升尚书左仆射。参予编撰各种法令、礼典，并与李勣主持修定《本草》并图，共45篇。善长书法，所书张琮碑楷法遒劲，颇近欧虞笔法。

现存陕西三原县三家庙店村。

57. 令狐熙碑

唐　乾封二年（667）　此碑螭首，碑额刻“隋故桂州总管武康郡公之碑”12字篆书，碑文35行，行78字，全文约2700余字。因年久泐漶尚能看清者仅千余字，撰人仅存德棻二字，书人仅存□□秀书，名不可知，传者以文献求得，可能属子（令狐德棻）为父（令狐熙）撰碑。碑全文及考证均见清王昶《金石萃编》。

现藏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58. 吴　广　碑

唐　总章二年（669）　此碑螭首，楷书，无撰书人姓名。碑身中断。断口处字有残损，末行全泐，其余字迹均保存完好。书法谨严浑古，丰腴敦厚，于丰腴之中蕴秀气，拙朴之外具圆润。突破了初唐书法以“瘦硬”为时尚的范围，别开生面自树一格。

现存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59. 越国太妃燕氏碑

唐　咸亨三年（672）　此碑为螭首，建于唐咸亨三年为唐太宗燕妃所立。早年倒仆入土，1964年重新出土，碑面刻字剥蚀较严重，从留字得知为唐代书法家高正臣所书，字体规整严谨、凝重而含秀气。唐张怀瓘《书断》评其书法“少卿习右军书法，脂肉颇多，骨气微少，修容整服，尚有风流”。清代叶昌炽《石语》言其书风“高正臣，风骨凝重，精光内含，是善学褚者。”

现存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60. 马　周　碑

唐　上元元年（674）　此碑螭首方趺，高360厘米，碑额篆书“大唐故中书令高唐马公之碑”阳文题字，隶书37行，行约65字，碑文下部漫漶严重，上部仅存200余字清晰可见。撰书人姓名磨泐不明，但据宋赵明诚《金石录》载，为许敬宗撰文，殷仲容书，观其碑文书法，精工之甚，与《褚亮碑》似出殷仲容一人之手无疑。

马周，字宾王，唐博州茌平（今属山东）人，官至中书令。他以平民出身而擢居相位，1000多年来，累被传为佳话，载于史籍。据载马周“深识事端，忠直敢言，裁处周密，动无不中”，深为唐太宗器重，用为贤相。贞观二十二年（648），以48岁病亡，诏葬昭陵。其碑立于唐高宗上元元年，今存于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61. 李　勣　碑

唐　仪凤二年（677）　　此碑螭首龟趺，高 6.65 厘米，是昭陵众多墓碑中最大的一通。碑额题刻“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贞武公碑”15 字篆书，碑文 32 行，行约 90 余字。为唐高宗李治撰文并行书，字迹清晰，书法圆美，确有王派秀逸洒脱的风韵，其碑“后半部尤纵横自如”，可真实地反映出李治书法的造诣。碑题下有御制御书四字及仪凤年月几字楷书。碑阴刻宋王持补刻楷书 12 行，行 18 字，全文见《金石萃编》。此碑是李勣去世八年以后，即仪凤二年（677）高宗李治为其立的碑。光宅元年（684）十一月，李勣虽蒙“剖坟斫棺”之灾，但其墓碑由于御治御书而幸免劫难，经 1300 多年至今一直还竖在墓前，(即今昭陵博物馆院内中心)。

将墓碑文与李勣本传对照，史实略同，惟讨刘武周一节，传不如碑，中称王世充为王充，称窦建德为窦德，这可能是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造成的。李勣死于总章二年春秋，在世 76 岁，但本传说 86 岁，可以碑补正史料的错误。又将李勣碑与墓志互相参证，知瓦岗军起义的时间系在隋大业七年（611）和王薄在长白山起义是同一年，这应当是可靠的第一手记录，解决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瓦岗军起义时间的问题。

李勣（594—669），唐初大将，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家富有，隋末农民大起义时，投瓦岗军，瓦岗军失败后又降唐，任武侯大将军，封曹国公，赐李姓，因避太宗讳，单名勣。从李世民镇压了刘黑闼与窦建德等起义军。贞观三年（629）与李靖出击东突厥，因战功被封为英国公。死后赐葬昭陵前，高宗李治曾为之立碑，并亲撰文书字。

碑现存昭陵博物馆。

62. 述圣纪碑

唐 文明元年（684） 此碑由七块大石积累而成，故俗称“七节碑”。碑身通高700厘米，四面各宽186厘米。最上一层为屋顶形盖子，最下一层为方形基座，基石每边宽297厘米，上有阴线刻瑞兽及花纹图案。中间五层为碑身，大小相等，有榫扣接。自上而下第一层原无字，仅四角各雕一力士像，其余四石南面刻述圣记全文。现除第三石全部漫漶外，第一、二、四石尚能看出很多字，书法整勒，文为唐初盛行的骈文，共46行，行120字，记约8000字左右，可谓我国碑石中的巨制。据光绪十年乾州志稿载：“述圣纪碑文为武后所撰，中宗（李显）所书，字法遒健，深得欧虞遗意”，碑文内容是颂扬高宗一代的“功业”。又据乾嘉间林侗著《耒斋金石刻考略》载：“高宗乾陵有述圣纪，石来自于阗，填以金屑，照耀陵园，后仆为数段，万历间赵子涵见其两段，予登陵不见此石矣”，可见这个碑倾倒很早，至少在明万历以前。因此许多金石书中，都未录其全文，仅清乾隆嘉庆年间，王昶在其所著的《金石萃编》中录有第一石的文字。至于《述圣纪》碑的现存全部文字，在1957年乾县人民委员会按照省文化局的指示，对《述圣纪》碑按原来的形式和位置，作了较彻底的修整，贺梓城同志在1961年《文物》第3期，对碑的全部文字作了详细记录，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现存陕西乾县唐高宗陵前。

63. 美原神泉诗序碑

唐 垂拱四年（688） 碑为尖首方座，高182厘米，宽65厘米，17行篆书，满行25字。碑额有“美原神泉诗序”6大字篆书。此碑文是贾言淑等赋诗，韦元旦、徐彦伯制序，尹元凯篆文，书法篆势分韵多纡回之势。内容是歌颂美原县金粟山（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区）中一个所谓“神泉”。

碑首尖形，在唐碑中甚为少见，疑由汉碑改制。1929年由陕西富平美原镇附近搬到西安市新城内，1948年移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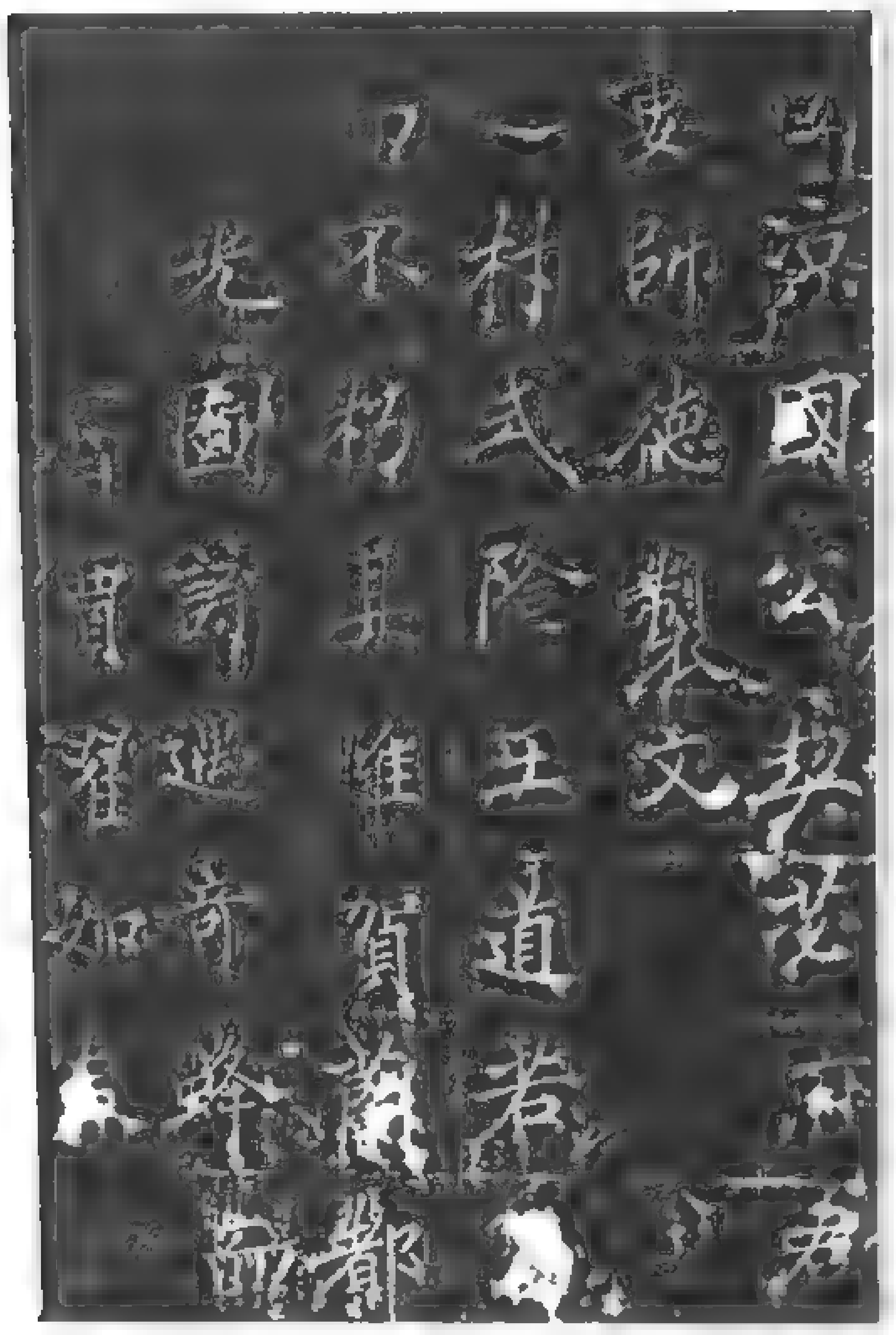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碑廊。

64. 顺陵残碑

唐　长安二年（702）　此碑是武则天追封其母杨氏为“孝明高后”并尊其坟为“顺陵”而立的丰碑。根据《金石萃编》记载，碑立于长安二年正月，由武三思撰文。当时睿宗李旦还是相王，敕书写碑，字大一寸五分，多用武则天所创新字，字体方正，健壮有力，楷书稍兼篆隶，古雅拙朴。其书法与今碑林博物馆陈列的《景云钟》相同，是唐睿宗在景云钟之外，唯一传世的真迹刻石。碑原很丰伟，惜到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时倒塌，断为多节，当时县令取之修筑渭河堤岸。后来从河岸中发现二段残石，仅存百余字，已不足《金石萃编》所录刻碑文字之半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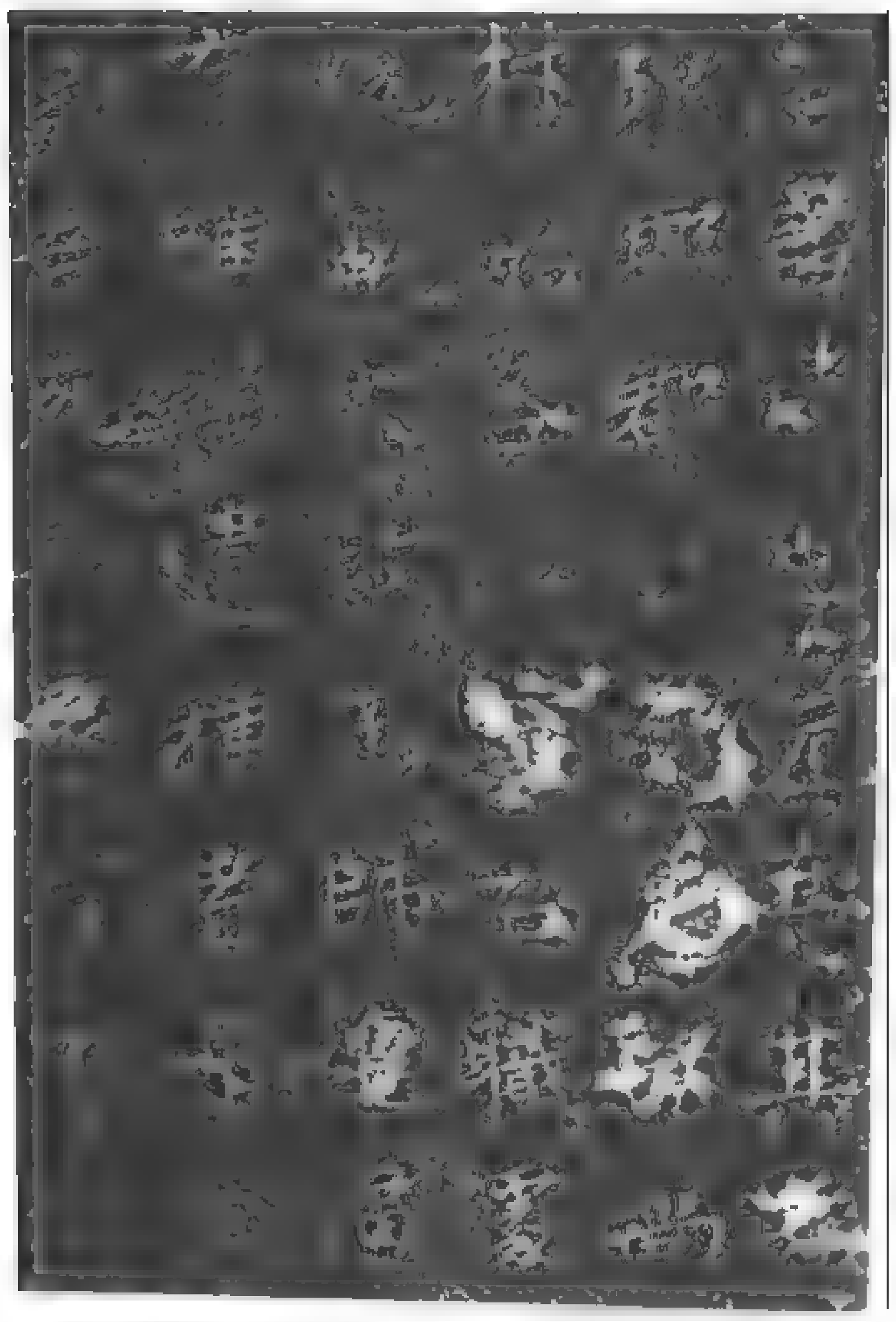
现二残石藏咸阳市博物馆。

65. 契苾明碑



唐　先天元年（712）　此碑螭首，额题“大唐故将军凉国公契苾府君之碑”篆书，娄师德撰文，殷元祚楷书，碑文 36 行，行 77 字，字用武后新制字，惟府君之“君”、圣人贞观之“圣”均未改动。书者殷元祚为殷仲容子，殷令名孙，三世都是善写书家。此碑书法瘦劲，属唐碑佳作。碑主契苾明是契苾何力（碑作河力）之子。契苾何力，属唐铁勒部人，贞观六年（632）与母率部千余人投唐，后历任葱山道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等职，封郕国公。曾参加过对吐谷浑、高昌、龟兹、西突厥等讨伐战争，有功于唐王朝。契苾明为其子，必在这些讨伐战争中建立过功勋，因而被加封。碑全文及考证见《金石萃编》及《关中金石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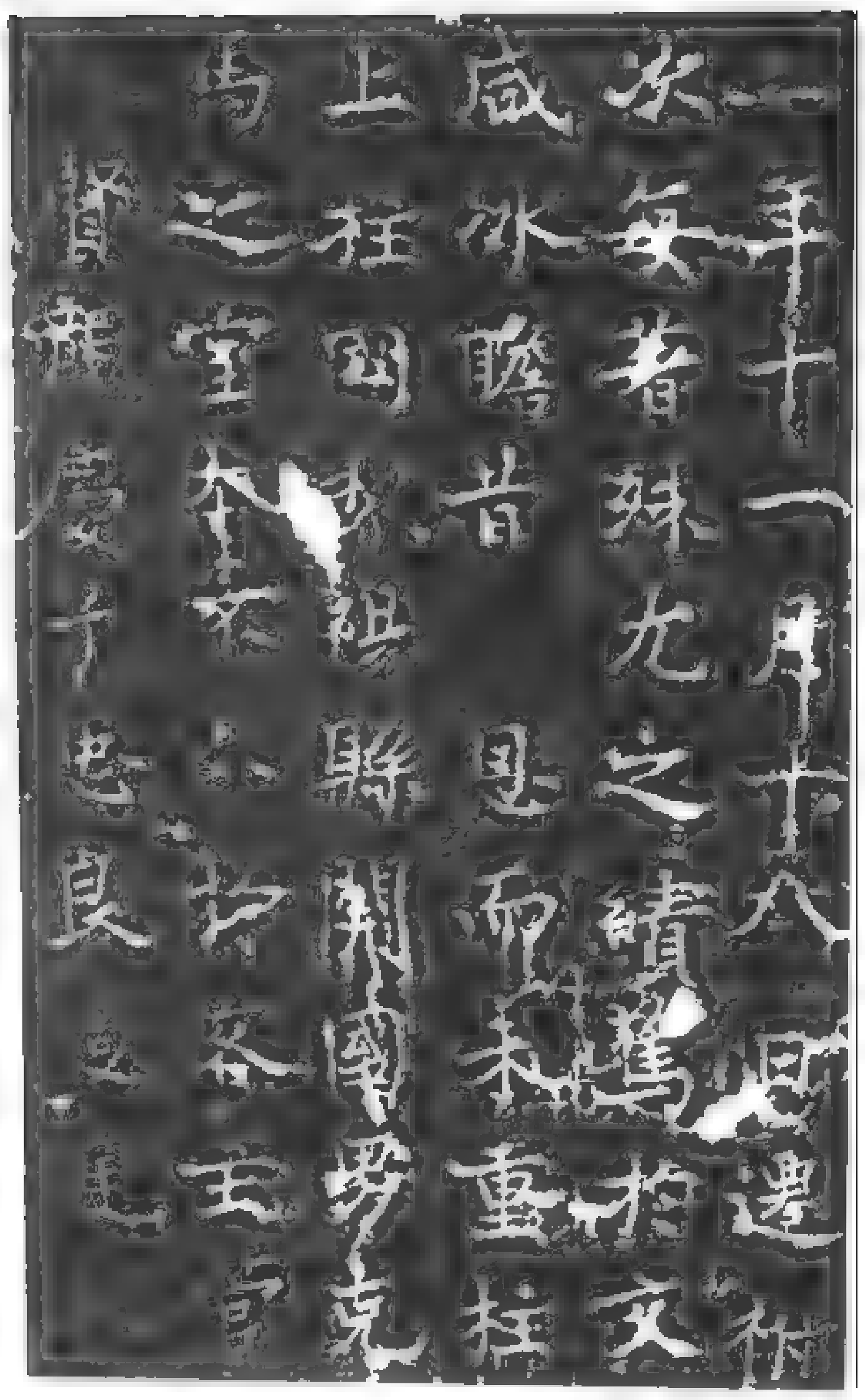
现藏咸阳市博物馆。



66. 符璘碑

唐　贞元十四年（718）　此碑螭首龟趺，高330厘米，宽99厘米，31行，行62字，李宗闵撰文，柳公权楷书并篆额。笔力清瘦劲健，结体峻整，为柳书中比较精练的作品之一。碑全文及考证见《金石萃编》。

现存富平县文化馆。



67. 于知微碑

唐　开元七年（719）　此碑螭首，文34行，行75字，碑下部泐漶不清，为姚崇撰文，书者姓名不详，但碑文楷法，字体瘦劲。全文及考证见《金石萃编》及《雍州金石记》。

现存三原县三家店村。

68. 李思训碑

唐　开元八年（720）　此碑螭首，高149厘米，宽333厘米，30行，行70字，由李邕撰文并行书。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人亦称李北海，为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之一，李阳冰称他为“书中仙手”。他的书字，以遒逸著称，长于行书，著录他写的碑版约达八百余通，而残留至今著称的仅有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麓山寺碑、东林寺碑、少林寺成坛铭、法华寺碑等。

《李思训碑》，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孙承泽《庚子销夏记》都有著录，其行书笔法用笔自然，瘦劲异常，且具规模，遒劲而妍丽，历来被称

为李邕行于世的行笔佳作。

现存蒲城县桥陵。

69. 御史台精舍碑

唐 开元十一年（723） 碑呈竖方形，螭首，方座，高 145 厘米，宽 65 厘米，18 行，满行 30 字。此碑立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御史台是唐代的监察机关。从碑文可知御史台设有监狱，并在监狱旁设有精舍（即佛堂），企图利用佛法来麻痹被监囚的人，要他们不可怨天尤人，只有痛自忏悔，求佛来度难。碑阴及两侧满刻先后作过御史的 700 多人姓名，其中亦有重名，如颜真卿的姓名两见，苗晋卿的姓名三见等，大概这些人都是几次作过御史。碑文是唐代名书法家梁升卿写的隶书，笔法浑厚雄健，是一通很有历史和书法价值的碑石。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70. 杨孝恭碑

唐 开元十五年（727） 碑为竖方形，螭首，缺碑座，高 283 厘米，宽 105 厘米。30 行，满行 52 字，崔裴士撰文，陆尚宾隶书，笔法清隽秀健，亦是唐隶书中的佳作。

碑主人杨孝恭史籍无传可考，但据碑文记载：杨孝恭是京兆长安人，其先在汉武帝官居弘农，有功德，食邑二千石，其曾祖慧章、父寿风均未作官，杨孝恭以其季子右卫将军杨崇庆受朝廷之宠，因而赠封其父杨孝恭为唐游击将军左武卫翊府右郎将，即所谓以子宠而父荣。

碑侧以浅浮雕和线刻二种并用手法，雕出单波纹茂密盛开的宝相花纹，构图和谐严谨，雕刻手法娴熟生动，属唐代碑侧花纹中的精品。

此碑 1983 年由西安西郊三民村出土，入藏碑林，金石著作从未见有过著录。

现存碑林博物馆。

71.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唐　开元十六年（728）　此经幢高 175 厘米，宽 150 厘米，56 行，行 67 字，为杨淡立楷书，字体精整。《关中金石存逸考》、《关中金石记》等书均有著录。

现存陇县藕莲池。

72. 代国长公主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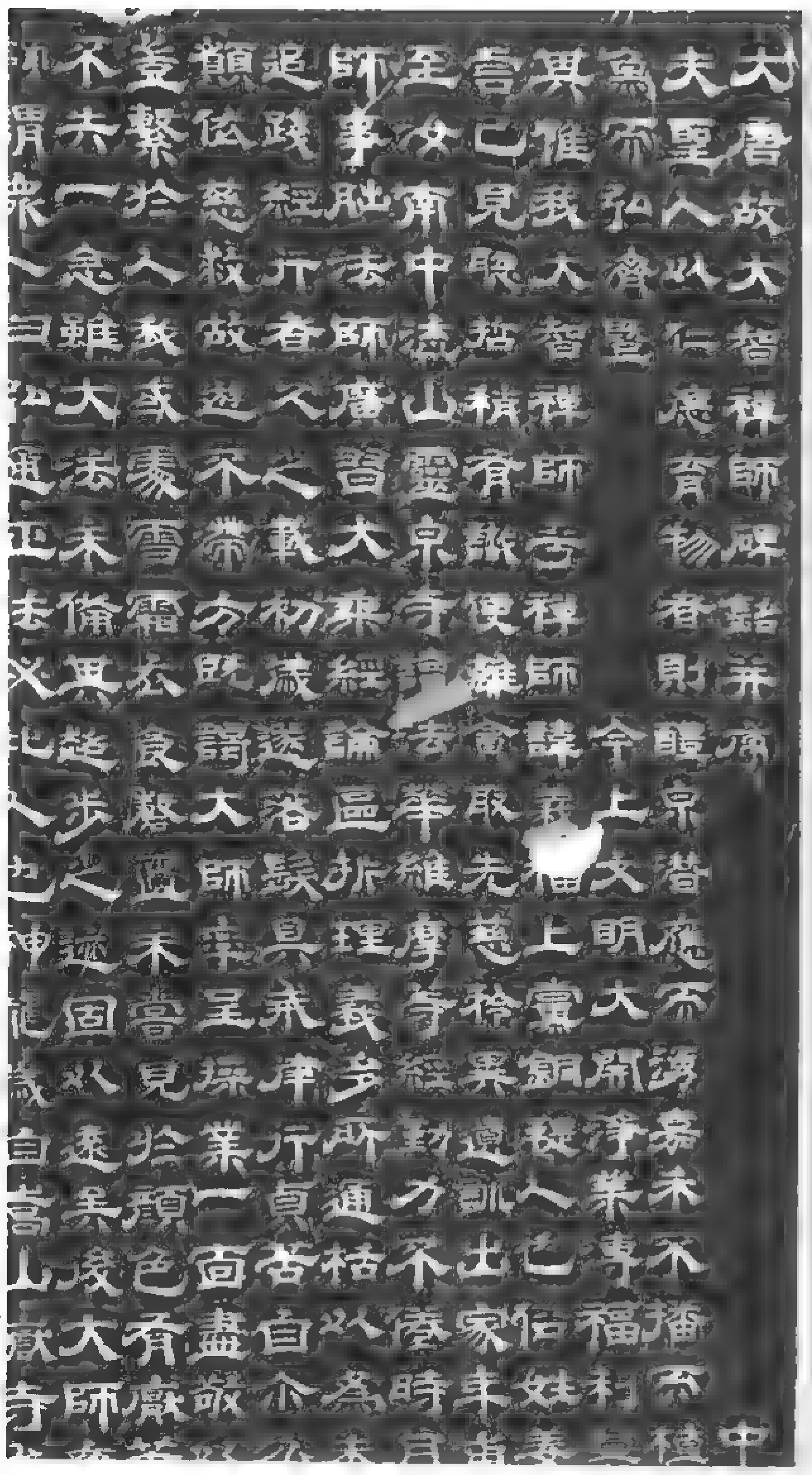
唐　开元二十二年（734）　代国长公主，名华，字华婉，为唐睿宗第四女，死后陪葬桥陵。碑为郑万钧撰文，男聪书碑，楷书 31 行，行 61 字，书法婉丽，极似褚遂良笔意。万钧即为驸马都尉，聪即为其子，故此碑为夫为妻撰文，子为母书碑的一例。《金石萃编》载：郑万钧父子都善长书法，但万钧名不如聪，聪之能书源出于家学，对研究盛唐书法文字亦有参考价值。

现存蒲城县唐睿宗桥陵。

73. 大智禅师碑

唐　开元二十四年（736）　此碑是为慈恩寺和尚大智禅师义福所立。义福是盛唐时所谓佛教十大宗派慈恩宗的第七代的代表人物。碑是严挺之撰文，由唐代隶书名家史维则书写，字迹丰润有力，是隶书中不可多得的标准唐隶。

史维则，又名维则，字天问，吴（今苏州）人。也有人说他名诰，字惟则，广陵（今扬州）人。生卒年代不详。只知道他主要活动于唐玄宗、肃宗两朝。天宝中，任尹阙尉，集贤院直学士和奉使晋州推事等官。其人善书，《集古录》中说他“工八分、飞白、二篆（大篆、小篆）”。唐代窦蒙在《述书



赋注》里说，史维则能成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家，是受有家庭很好的教育和薰陶的，加之经过自己刻苦努力，书艺后来凌驾于父亲之上。窦臮在《述书赋》中说，史维则"心优世业"，正是指他继承书艺的渊源。

史维则擅长八分书，宋代朱长文在《墨池编》一书里，对唐代八分书法家评论时说："择木尤妙，名重当时，惟则可亚之。"由此可知，他在当时是仅次于韩择木的一位有代表性的八分书法家。

史维则所书的"八分"体，是一种笔画有波磔的"唐隶"，在他以后不少书法评论家眼里，都认为是"超凡脱俗"的艺术佳品。前人评他的书艺则用"雁印平沙，鱼跃深渊"（《墨池编》）。他的字写得那样深厚，又是那样飞动跳跃，真是力和美的有机结合。《书史会要》评史维则书风"如王公大人，进退有度"那种从容不迫，磊落大方的气势；那种动辄有法，挥毫守矩的态度，都跃然于纸上，给作品增添了不少神采韵味。所以窦臮评他的书法特点是："古今折衷，大小应变。如因高而瞻远，俯川陆而必见。"

在唐代隶书名家中，八分书以史维则的传世作品最多，有《大照禅师碑》、《舞阳侯祠堂碑》、《春申君庙记》及此《大智禅师碑》等。

《大智禅师碑》是史维则在唐代开元二十四年（733）九月书。碑高345厘米，宽114厘米，32行，满行61字。书法苍老庄严，具有骨力，清代孙承择等推为"开元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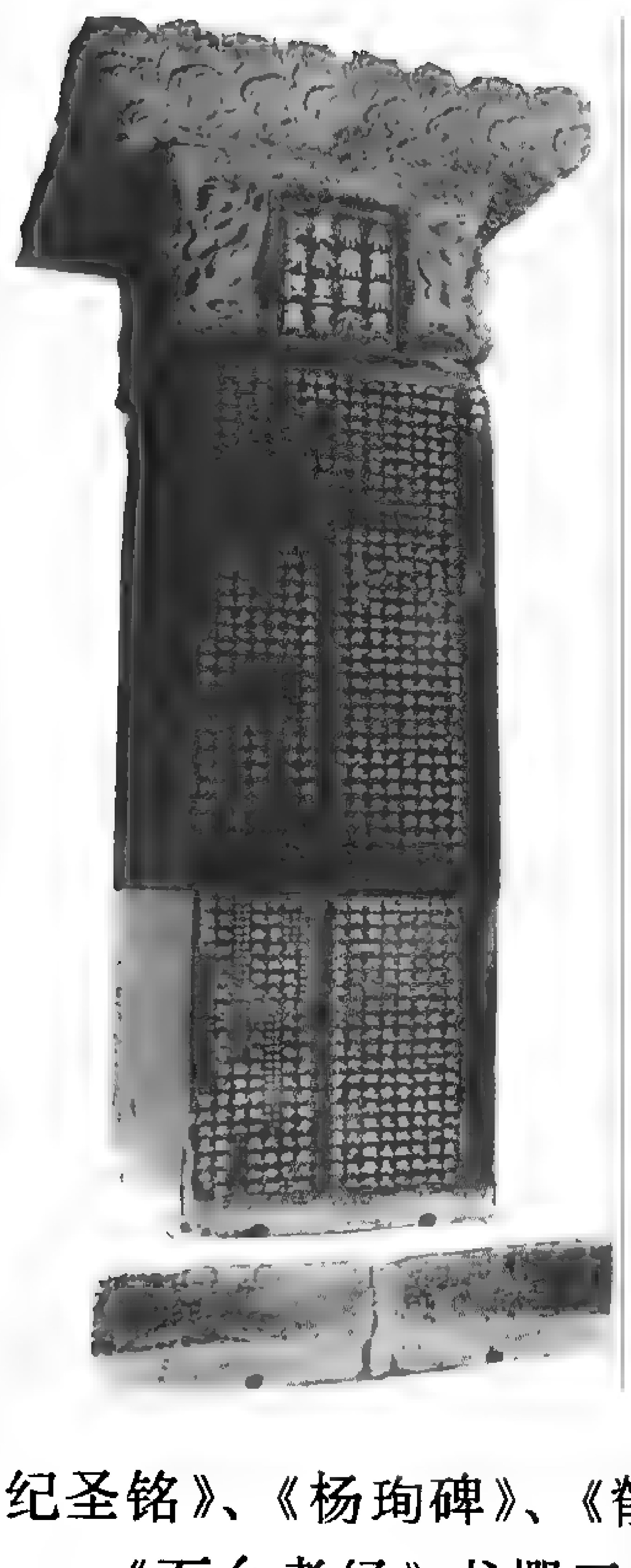
此碑的形制，为螭首、龟趺。螭首左右各雕三条龙，并头吐气，互相蟠结，举起后爪撑着座在云中的佛像，这是摆脱当时一般碑式样的一种崭新手法，意匠技巧纯熟精练。碑身两侧以线刻和华丽的蔓草、凤凰、骑狮、仙童和瑞兽及迦陵频伽等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是唐代名碑花纹制作中首屈一指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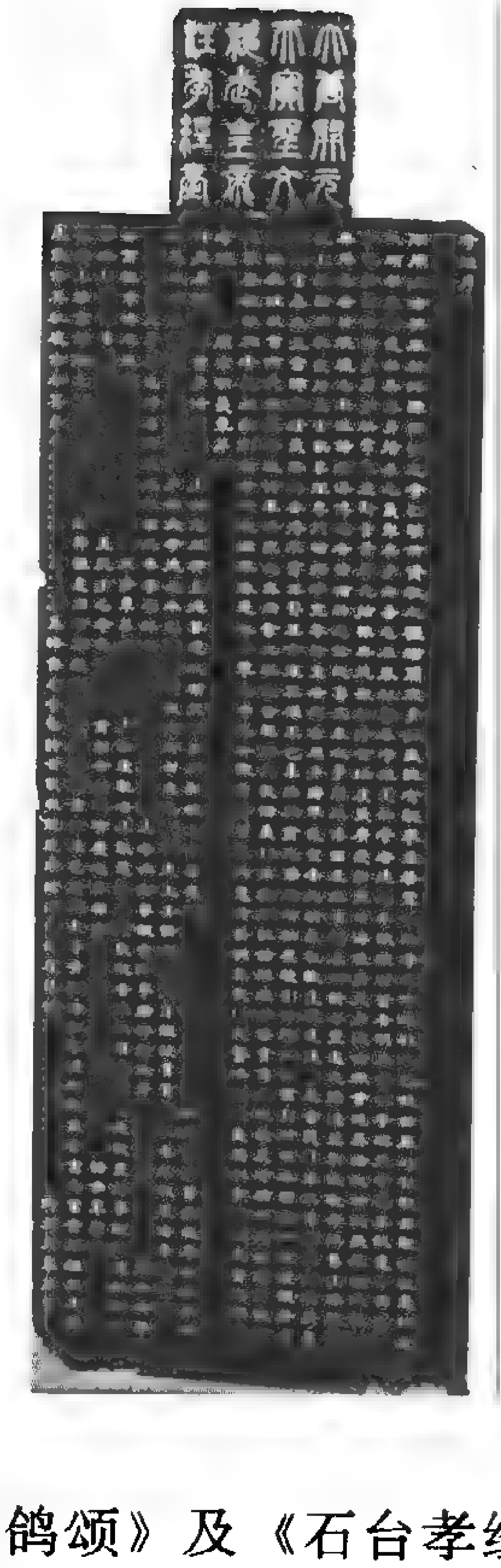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74. 石台孝经

唐 天宝四年（745） 《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书。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睿宗第三子，初为封王，长寿三年（693）改封临淄郡王。景龙三年（710）韦氏皇后毒杀中宗，临朝称制，重演武则天故事。时李隆基为潞州别驾，发动羽林军平定内难，诛韦氏，因功进爵平王。睿宗恢复帝位，即立隆基为皇太子，延和元年（712）睿宗让位于隆基，是为李唐第六代皇帝。





玄宗开元间，励精求治，重振太宗遗风，不独贤相名将辈出，彦才哲士亦济济于世，竞相为其用之。故是内治外交，政绩显殊，经济繁荣，国威远扬，且求宏硕，讲道艺文，几超贞观。

至于书法，真、行、草、篆各体皆备，且各立门户，开宗创派，盛况空前。玄宗对于书法更为喜爱而善书，《旧唐书·本纪》称玄宗："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他的书迹，陈思《宝刻业编》收有石刻 33 种。《宣和书谱》记当时内府收有书迹 25 种，现传世的有《凉国长公主碑》、《赐益州长史张敬忠敕》、《纪太山铭》、《庆唐观纪圣铭》、《杨珣碑》、《鹡鸰颂》及《石台孝经》等数通。

《石台孝经》书撰于开元十七年（729）。著录首见于赵明诚《金石录》，由于此碑特别高大，不便于捶拓，故传世甚少。

《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与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是讲孝、悌二字。

这碑是李隆基以隶体书写，书法工整，字迹清晰，秀美多姿，淳整艳丽。

史称为玄宗皇帝第一手笔，几现盛唐气息，在唐代书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明赵崡《石墨镌华》谓：此碑书法与《纪太山铭》相同。宝泉所评"如泉吐凤，为海吞鲸"，非虚语也。碑末批答文为玄宗行书，更是豪爽飞动，有雄逸之气。其篆额为太子李亨题，书迹丰润淳劲。

此碑形体高大别致，是以四块高590厘米，宽120厘米，长方形，色如墨玉光可鉴人的细巨石合成而刻的。碑头上加方额，方额左右各浮雕瑞兽，上下刻涌云，上承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出山岳形，碑下面有方形台阶石座三层，因称石台孝经。石台三层四面都有线刻纹饰，特别是最下层，满刻着唐代惯用的茂盛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这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本难组织在一起，但作者将蔓草纹刻得回卷扬仰，有如风呼云涌，不但画面融洽无间，还突出了怪兽的威势，整个结构给人以威武、活泼、蓬勃的感觉。属盛唐时代艺术的精华。

此碑刻成后，原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太学内，于天祐元年（904）迁至唐尚书省西隅（今西安市社会路），到北宋元祐五年（1090）因尚书省"地处洼下，随立辄仆"又"徙置于府学北庸"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距今已有900余年的历史，是碑林中最早的展品。

现存西安碑林孝经亭内。

75. 杜居士碑

唐　天宝六年（747）　　此碑螭首，题额为"大唐故杜居士神道碑"9字楷书，由范炭题字，李邕撰文，段清云楷书。碑文27行，行55字，碑文内容是记叙杜居士的生平事迹。其有三子，都是宦官，长名处宾，次名思宾，三子为元礼官至行内侍省内侍，加银青光禄大夫，碑文多述其战功。《唐六典》载："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龟趺，降五品为碣方蚨圆首"，但杜居士无爵位，而立碑于法，可能是因其三子元礼官爵显要而越例吧！

现存三原县鲁桥镇。

76. 谒金天王神祠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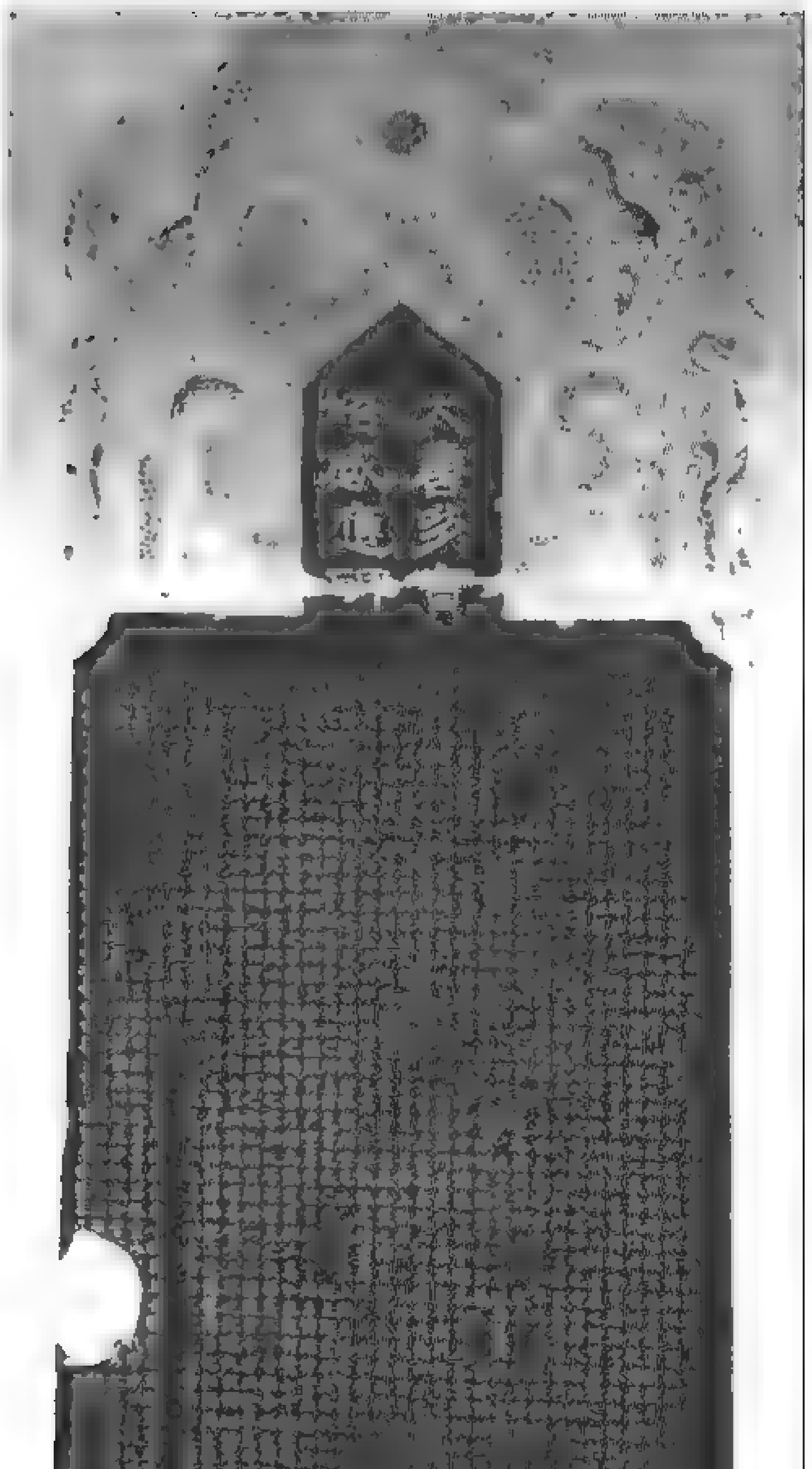
唐　乾元元年（758）　　此为颜鲁公题名共84字，书于周天和年《华岳颂碑》碑侧。高167厘米，宽32厘米。乾元元年（758）三月，颜真颜自蒲州刺史封丹阳县侯，同年九月作《祭侄文稿》，十月受御史唐旻诬劾，贬为饶州刺史，东行至华阴与王延昌、穆宁、张澹、刘嵩、郑镇等同谒金天王神

祠时题字。由于境遇特殊，心情异常，发之毫端，神气不凡。书法楷书，大字疏朗，雄姿英发，正气凛然。字迹奇伟，酷似《东方朔画赞碑》。至东京（今洛阳）拜扫又作有《祭伯文稿》。

现存华阴县西岳庙。

77. 多宝塔感应碑

唐　天宝十一年（752）　此碑螭首、龟趺。高 285 厘米，宽 102 厘米，34 行，满行 66 字。碑原在唐京城安定坊千福寺（今西安市西关），宋代移存碑林，为颜真卿楷书，岑勋撰文，徐浩题额。



颜真卿字清臣，山东临沂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由郎官而至节度使、尚书，进爵鲁郡开国公，是唐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一位重要成员。他在政治上坚决维护中央集权和全国统一，为此同安禄山、李希烈叛乱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以身殉。他立朝刚正，敢于同杨国忠、卢杞等权奸针锋相对，为后世所称赞。

他的书法在唐代享有很高的声誉，苏轼曾评论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颜真卿一生中书法作品传世很多，墨迹有《自书告身》、《祭侄文稿》、《刘中使帖》；刻帖有《争座位稿》，丛帖有《忠义堂帖》；碑刻有《中兴颂》、《麻姑仙坛记》、《李靖玄碑》、《臧怀恪碑》、《颜勤礼碑》、《郭氏家庙碑》、《颜氏家庙碑》及《多宝塔感应碑》等。这些碑刻都是一碑一貌，面目各异。《多宝塔感应碑》是颜真卿最早写的一通碑，书法瘦劲，笔锋锐利，笔姿峥嵘，具有初唐书风。宋《宣和书谱》说他"早年书千福寺碑，已与欧、虞、徐、沈暮年不相上下。"明赵子崡说他的"正书唯此碑最著"。据清王昶考证《多宝塔感应碑》是颜真卿 44 岁写的。把他 60 岁以前写的《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和 70 岁后写的《颜氏家庙碑》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一个书法家的艺术发展道路。

《多宝塔感应牌》内容是叙述和尚楚金禅师创建多宝塔的经过。文中说是唐玄宗曾赠钱五十万、绢千匹帮助工费。楚金禅师死后，他还派使吊唁并监

护丧事。可足以看出当时政教合一的微妙关系。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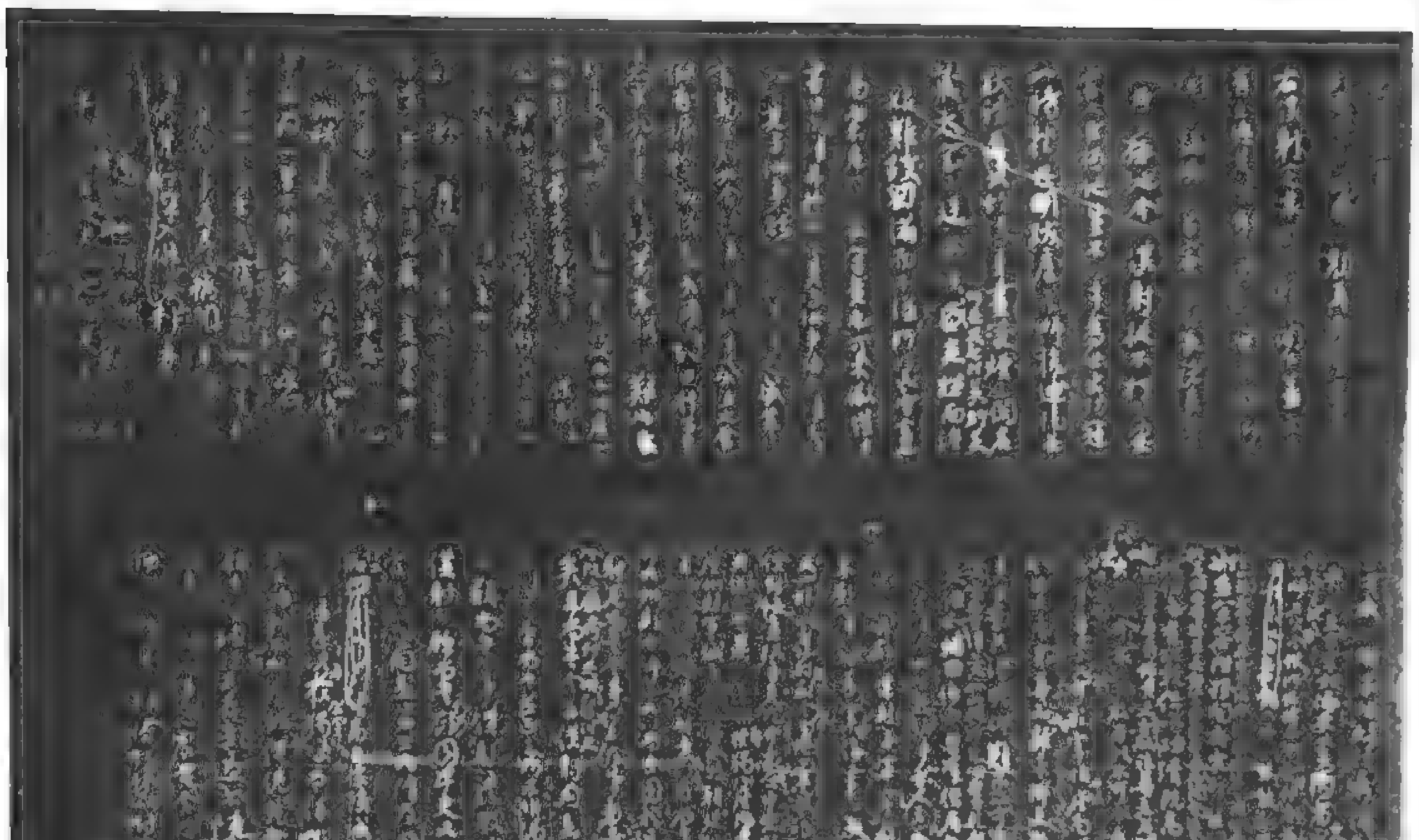
78. 大福和尚碑

唐 宝应二年（763） 此碑螭首龟趺，高500厘米，21行，行60字，碑文记载了大福和尚的生平事迹。阴面并载有渭南、蓝田两县知县把附近土地强迫划归空寂寺耕种的告示和70多个给大福和尚立碑者的姓名。碑是由"尚书主客员外郎陆海撰文，安国寺沙门惟嵩书，刻字比丘实悟"，碑首雕刻玲珑，螭首盘绕，碑文行书字迹颇佳，大有李北海笔意。宋代陈思《宝刻丛编》、《京兆金石录》、王志沂《石刻题跋索引》、《关中汉唐存碑跋》、新风权《关中金石文字存佚考》等，均记录有此碑。清末民初此碑被发现。《蓝田县志》中录有此碑全文。

现存蓝田县厚镇东嘴村原空寂寺内。

79. 争座位稿（帖）

唐 广德二年（764） 此稿为竖方形横刻，高152厘米，宽81厘米，分二段书，上段32行，下段亦32行，旁添二行。是颜真卿在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以行草书写给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的书信稿。内容是说郭英义为了谄媚宦官鱼朝恩，在两次隆重的集会上指示百官就座，任意抬高鱼朝恩的座次。为此颜真卿在信中对



他作了严正的告诫，并斥责他的行为"何异清昼攫金之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鱼朝恩在当时是一个大权在握，骄横跋扈、朝野侧目的人物，颜真卿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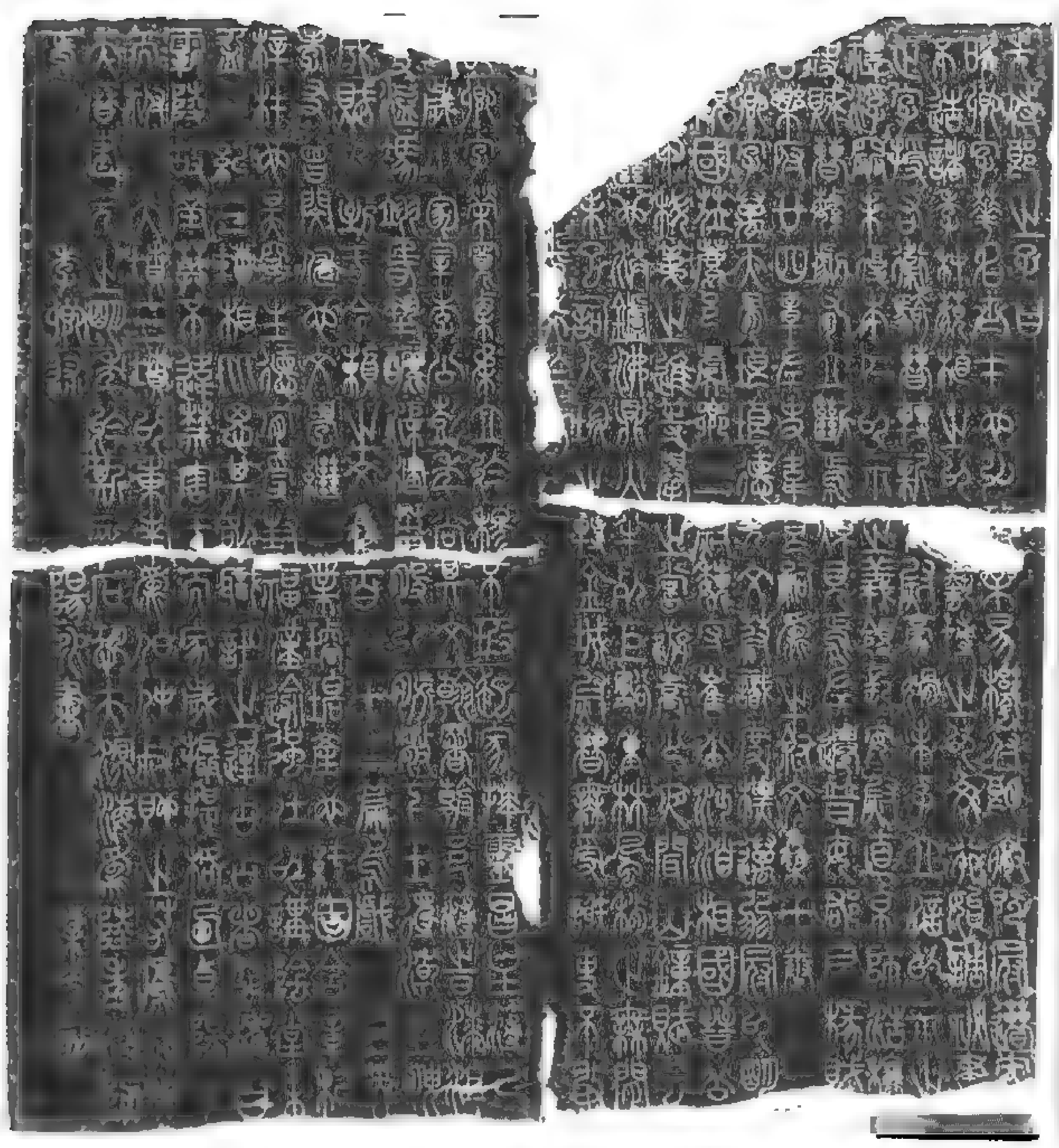
种不畏强暴的作法，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所以世人称这书稿为《争座位稿》亦名“与郭仆射书”。是颜真卿生平中所书的《祭侄文稿》、《祭伯文稿》、《争座位稿》三稿中的一稿，笔饱墨重，挥洒自如，字迹清楚，连涂改字迹都清楚可见。全稿书法圆劲，许多字写得豪宕尽兴，姿势飞动。由于此碑是以颜氏致友人的书信稿摹刻的，不比一般专为刻石而写的文稿，所以更能直接显示作者的刚强耿直、朴实、敦厚的性格。在书法艺术上，它与《兰亭序》堪称行草书双璧。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80. 三坟记碑

唐　大历二年（767）　碑呈竖方形，螭首、龟趺，碑身断裂对缝，字有残损。碑残高 210 厘米，宽 82 厘米，两面刻文，共 24 行，满行 20 字。碑文内容叙述李季卿改葬他三个哥哥之事。碑是当时名书法家李阳冰篆写。李阳冰（生卒年代不详）字少温，今河北赵县人，善词章、工篆书，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曾任缙云县令，官至将作少监。精思学习篆书 30 余年矢志不移。得法于《秦峄山刻石》，变化开合自成风格。其篆字形体稍长，盘曲变化更大，伟劲飞动。他的篆书亦名“玉筋篆”，为后来学篆者多宗之。

当时颜真卿以楷书名世，为人书碑，必得李阳冰篆碑额，欲联璧之美。李阳冰曾自言“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被誉为李斯之后写小篆的第一能手，有“虎笔”之称。李白、杜甫曾作诗对他大加赞扬。李白诗中有“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杜甫诗云：“惜哉李（斯）蔡（邕）不复得，吾甥李潮（阳冰）下笔亲”。宋代朱长文在《读书断·书品论》中，列李氏书法为神品，可知历来对李阳冰篆书评价之高。传世碑刻有《城隍庙碑》、《栖先茔记》、《怡亭铭》、《般若台题



名》、《颜氏家庙碑》碑额，和这块宋代重刻的《三坟记碑》等，都是我国书法篆刻中的珍品。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81. 李氏插先茔记碑

唐 大历二年(767)宋代重刻。 此碑螭首，方座，碑身为竖方形有残损。残高27厘米，宽79厘米，14行，行26字。此碑原系唐大历二年(767)刻，宋大中祥符三年又重刻。

插，是迁字的古意。因李季卿此人迷信风水，另选地势，把他祖先的坟墓，由灞河岸迁到凤栖原一带，碑文内容即记此事。是由李阳冰篆书，亦是“玉箸篆”结构笔法，但丰神比他写的《三坟记碑》笔画尚差。碑阴刻有宋代沙门净已写的《禅师述》。书法楷体挺劲。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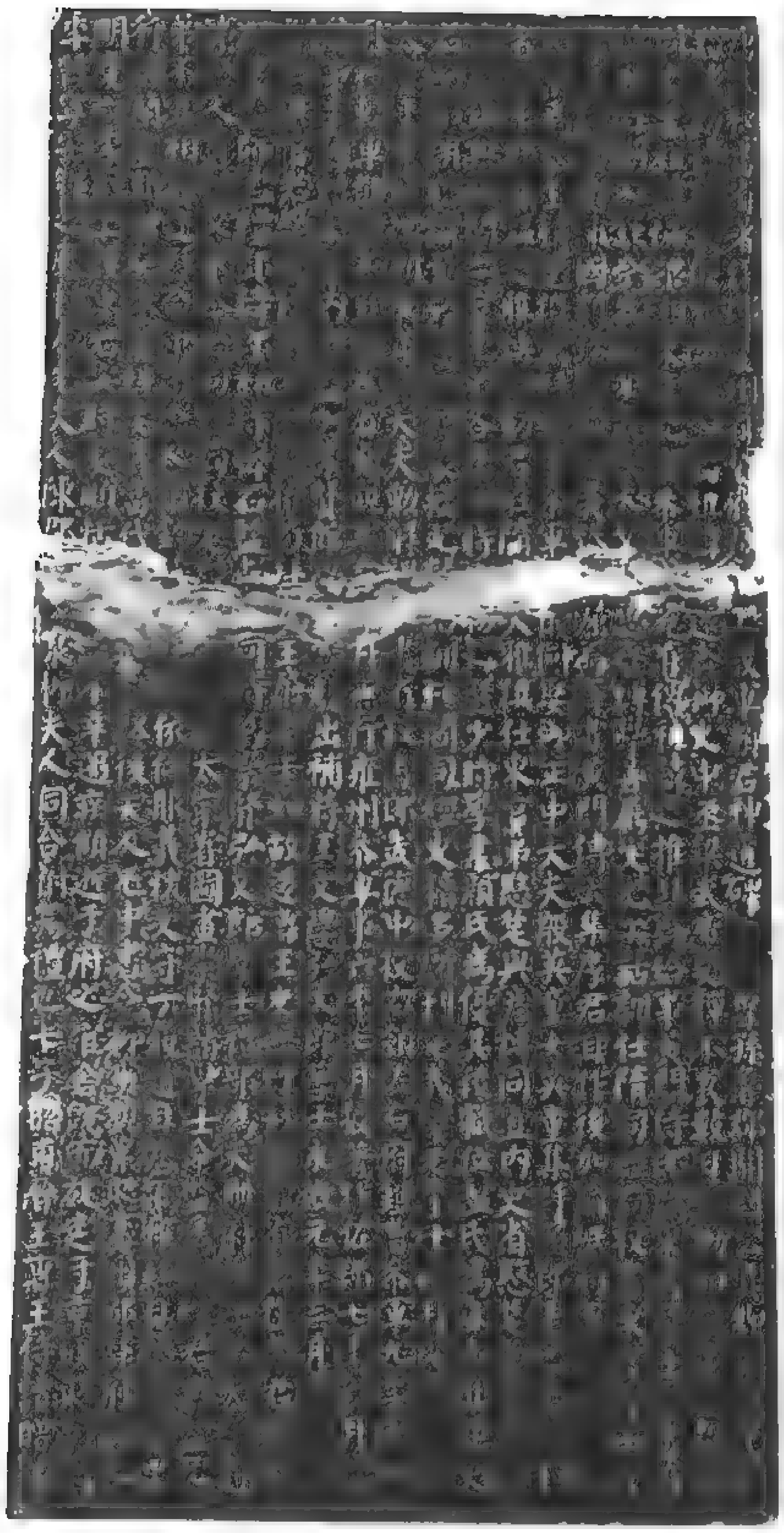
82. 颜勤礼碑

唐 大历十四年(779) 此碑螭首方座，高268厘米，宽92厘米，三面刻文，共44行，满行38字，是颜真卿为其曾祖父颜勤礼立的墓牌。系颜真卿撰文并楷书。书法苍劲有力，和他56岁写的《郭氏家庙碑》相似。此时颜真卿的楷书已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度恢宏，楷法一向有“蚕头燕尾”之誉。这种风格亦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与他高尚的人格相契合，可谓书法与人格美融为一体。他一生中写的碑很多，都题有他当时历官全部职衔，唯独此碑只题“曾孙鲁郡开国公”。据查，当时他已五十八九岁，被贬为吉州司马，是丢掉其他官职期间写的。故官衔仅只有“鲁郡开国公”。

据赵明诚《金石录》说此碑在宋元祐间，被埋入地下。1922年在今西安市社会路出土，后移置新城。碑石右侧刻有宋伯鲁题跋。1948年移存碑林。碑林中所藏颜真卿书碑，多因长期捶拓磨损，有的且经重剜，惟此碑因长期埋

在土中，磨损较少，字迹未失原来神彩，是不可多得的碑林名碑之一。为了妥善保护这些古代文化遗产，政府已有明文规定，今后凡汉唐碑石一律不许捶拓，严加保护。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83. 颜氏家庙碑

唐　建中元年（780）　此碑螭首龟趺，高 330 厘米，宽 130 厘米，碑阳与碑阴各刻文 24 行，满行 47 字。碑两侧各刻文 6 行，满行 52 字。碑立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是颜真卿为他父亲立的家庙碑，叙述了颜氏先世和家族仕官经历以及后裔的学问事业等。碑文较长，四面刻，为颜真卿撰文并楷书，碑额是当时篆书名家李阳冰篆写，世称二绝。因此，“好古之士，重如珠璧”。唐末长安城被毁缩修时，此碑被抛弃野外，宋时吕大忠将它和《开成石经》一同移至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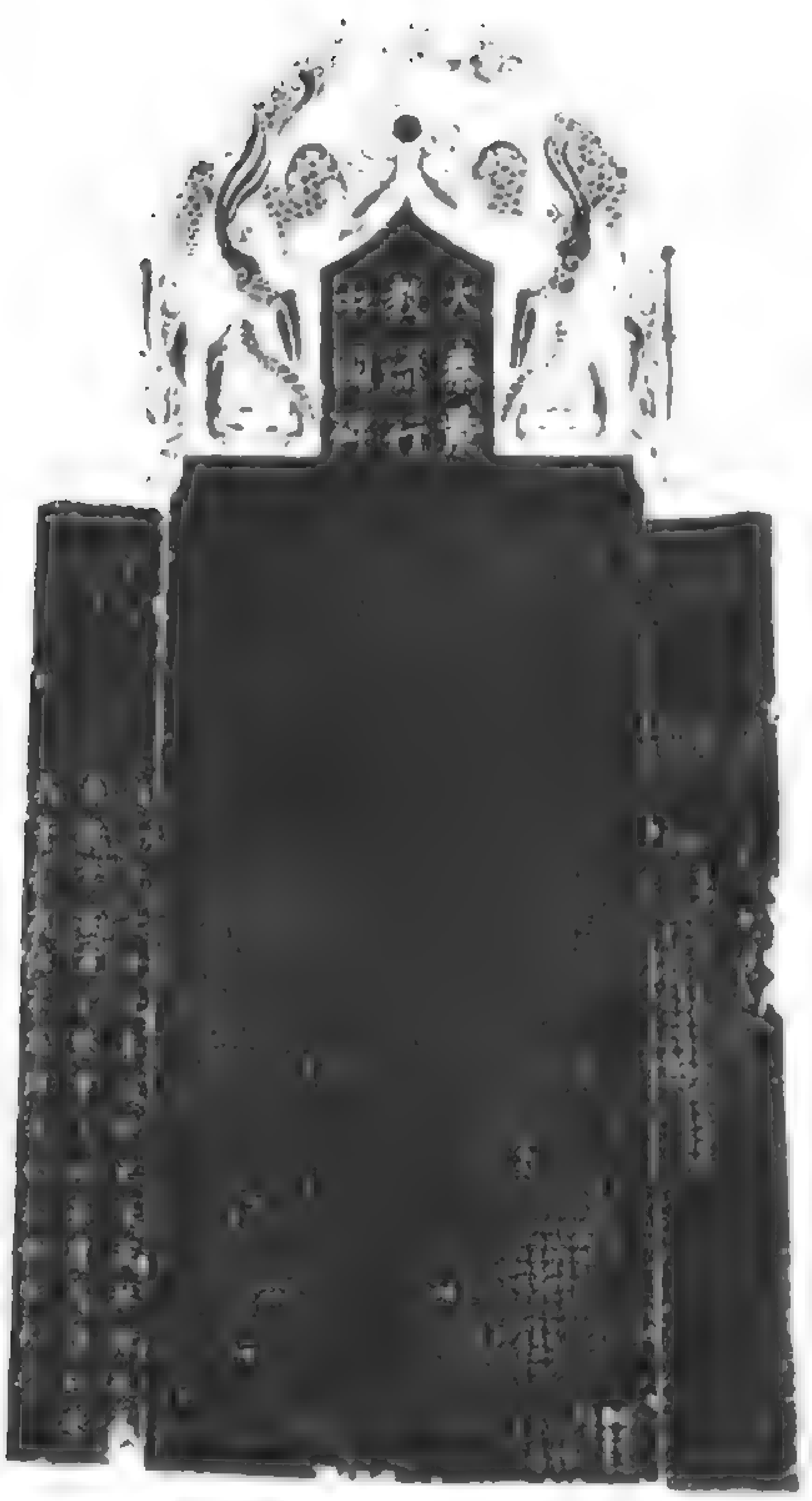
此碑是颜真卿 70 多岁时所写，年高笔老，其书法造诣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颜体”代表作，丰美健壮，寓刚于柔，气韵醇厚，历来被认为是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珍品。在《颜氏家庙碑》侧颜真卿还特意地提到他学习书法的经过说：“家无纸，用树叶练字”，可见其学书之勤苦。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8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　建中二年（781）　碑为螭首龟趺，高 279 厘米，宽 99 厘米，32 行，满行 62

字。碑额上楷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9字，额上三角形处，莲花座上刻十字架。此碑是为基督教在中国流传而立的。碑文内容记载了景教的教规、教义和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说明景教由叙利亚随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往来传入长安的经过。碑中还刻有叙利亚文的职名。是中外驰名的碑石，对研究我国古代和叙利亚、伊朗等国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碑的详细介绍见作者著《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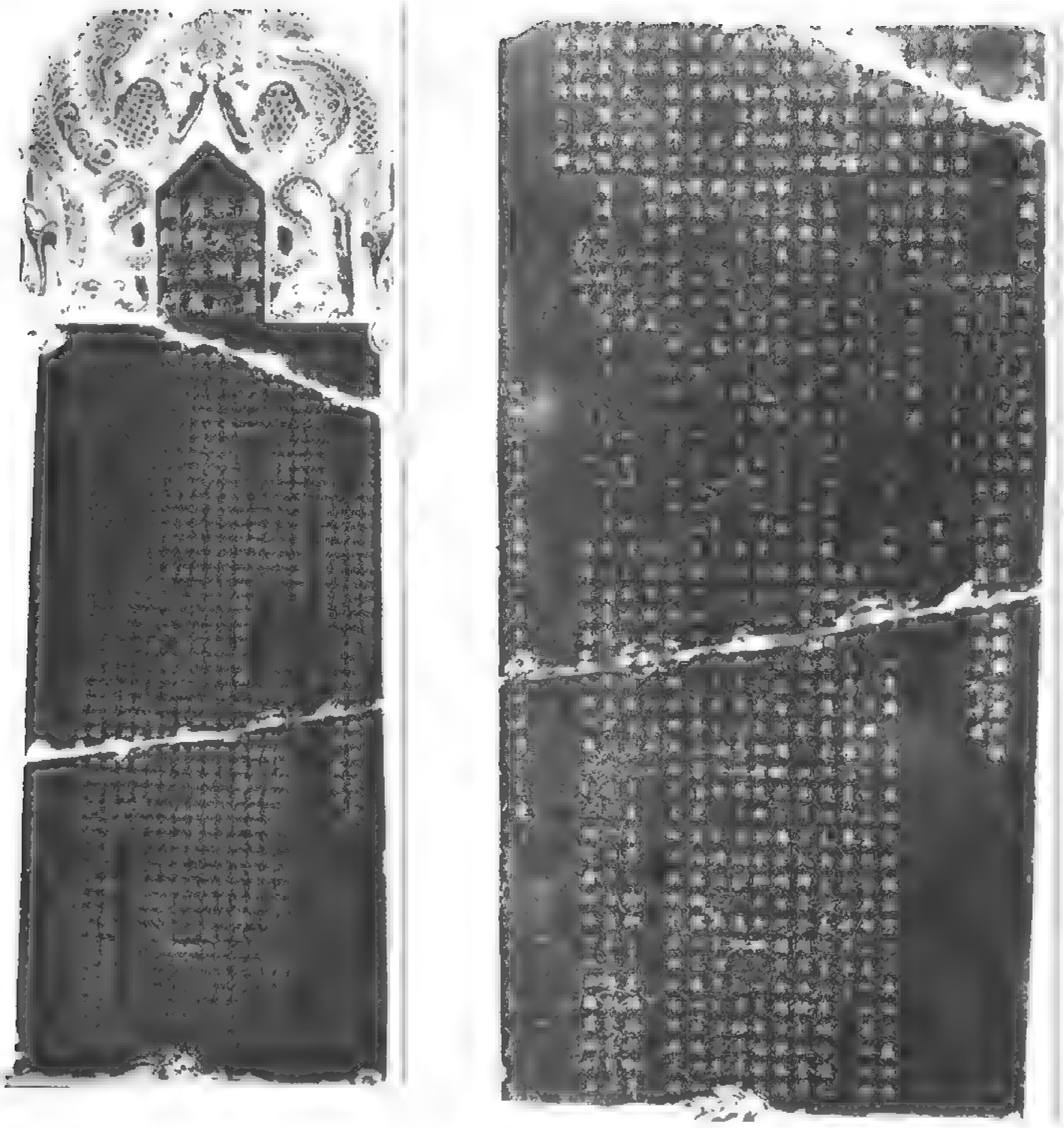
近多年来研究景教碑有不少论文，都争议不大，而1989年加拿大戴维清先生在《文史知识》中撰写了一篇《大秦历史重考》的文章，却认为："大秦不是罗马或罗马帝国，而是希腊，大秦景教是源出希腊的希腊正统教。""此教原名希腊正统教或东方基督教，信徒约有一亿人，其中百分之九十分布于东欧，在美国与加拿大约有300万人，而以苏联的教会为最大。在昔，传教重心是在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及叙利亚，起初以希腊文传教，后因古希腊文渐受淘汰，遂改用较流行的叙利亚文传教。这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亦有叙利亚文的理由。"

"聂斯脱利并不是希腊正统教的创始人。他是428—431年间主持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大教主，因他曾极力推行正统教，此教遂有聂斯脱利派之称。他约卒于451年。635年，景教徒初入中国，时正为唐太宗在位期。"这一新的论点和看法可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景教碑同志的参考。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85. 广智三藏不空和尚碑

唐　建中二年（781）　这碑螭首、龟趺，高305厘米，宽99厘米，24行，满行48字，碑身中部折断有裂缝，文字有残缺。唐德宗建中二年立于兴善寺（今西安城南）。宋元祐五年（109）移存西安碑林。碑由严郢撰文，徐浩楷笔丹书。



徐浩今浙江绍兴人，书学晋王羲之，前人评他的书法，妙在锋藏画心，力出于字外。他写此碑时已79岁，是唐代有一定地位的书法家。徐浩刻碑，存世甚少，据考证，仅有三碑，两碑在河南登封，一即此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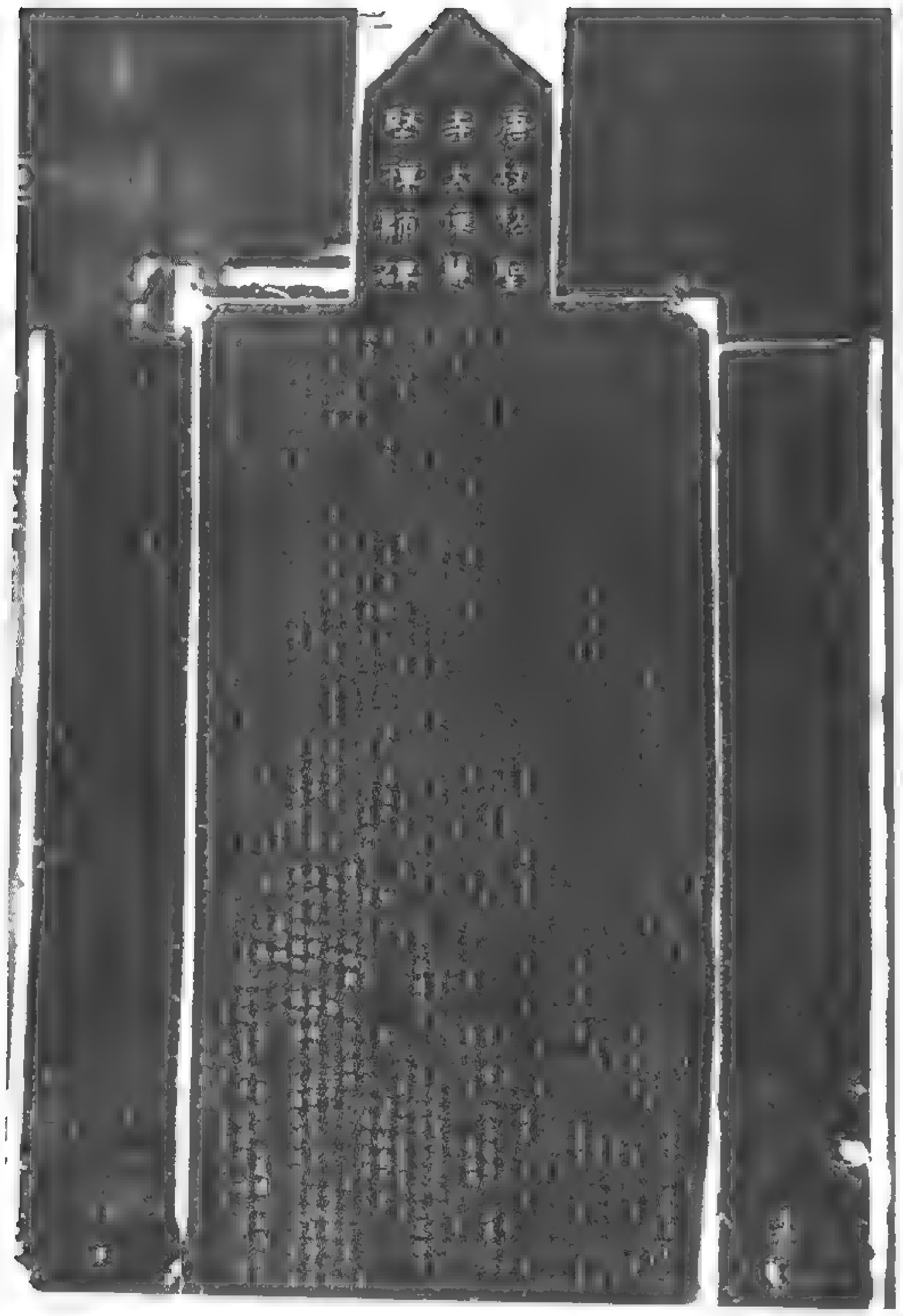
碑文内容叙说不空和尚的籍贯是西域人，曾在唐长安城内大兴善寺宣传佛教密宗，并翻译了密宗经典77部，120卷，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开元间称为三大士之一，后又被誉为国师。他的弟子慧果曾在长安青龙寺，把密宗传给了日本和尚空海，空海回国后不但将密宗传到日本，而且还仿汉字草书，创制了日本文字平假名。空海和尚也精通“二王”书法，被称为日本国“书圣”。他的《风信帖》等，得“二王”书法真谛，是体现了汉字书法的优秀之作。他和嵯峨天皇、橘逸势被誉为日本平安朝时代的“三笔”，在日本受有崇高地位，被追封为“弘法大师”，在今日本高野山还为空海和尚设有寺院以作纪念。因而不空和尚碑亦是与中外文化交流有关的见证作品。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86. 慧坚禅师碑

唐　元和元年（806）　此碑螭首方座，高254厘米，宽91厘米，27行，满行57字。碑建于唐宪宗元和元年，1945年于西安西郊出土，1949年前移至西安碑林收藏。系孙藏器行书，孙的书法是出自王羲之，笔法健劲流畅。碑文内容叙述当时佛教禅宗代表人物慧坚禅师受唐睿宗器重的情况。

碑侧有花纹图案，以线构成双波纹干线，用盛开的花朵正面和侧面作主



要内容，中间还穿插有鸟兽人物。左边碑侧刻有一只生气盎然振翅欲飞的鸳鸯，右侧刻一挺立的朱雀和一个身绕长飘带、半跪莲花上的赤身小儿。两侧的下部对刻着长翼、短尾、头生有独角、遍身花斑的瑞兽，整体构图极为紧密均衡，显得格外生动饱满、富丽堂皇。刻法是发挥了我国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中"线"的特长。线被利用的不但流利灵活，使人有轻快绮丽的感觉，而且在不同性质内容的表现上如花瓣鸟羽、兽角、人物衣褶等都能用"线"刻出不同的质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吸取的艺术技巧。

现存西安碑林三室。

87. 回元观钟楼铭并序

唐　开成元年(836)　此观铭为横方形，长 124 厘米，宽 60 厘米，厚 18 厘米。为银青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上柱国彭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令孤楚撰文。内容主要记述了唐回元观址的历史沿革，及观内景物设施的状况和颂扬铜钟的作用。钟与楼互相依托，名声四传。据观铭记载，此地原在唐长安城的亲仁坊，是玄宗皇帝赐给节度使安禄山的住宅，在安禄山叛乱被杀之后，住宅处被人们认为是污秽之地。到唐肃宗时，改为洞宫，谥曰"回元"，故在观铭中有"天宝初，玄宗皇帝创甲第，宠赐燕戍。无何，贪狼睢盱，豮豕唐突。亦既枭戳，将为污潴"。肃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恶，其地何罪？改洞宫。谥曰'回元'乃范真容，以据正殿，即太乙天尊之座其分身欤。"等语。此观铭于 1986 年 11 月 15 日由西安东郊太乙路西安化工设计院基建施工中出土。随即入藏西安碑林。

此观铭是唐开成元年（836）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778—865）书写。柳公权的书体，初学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又遍习各家之法，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突破了各家的局限，别开生面，体势劲媚，富于变化，外疏

内密，自成一家。因此后世称赞他的作品，既有魏晋时钟、王的风度，又有初唐欧、虞、褚、陆之势。他的书法在当时极负盛名，楷书是那么方整极重，但南宋的拓印工人编的《宝刻类编》说："柳书小字此为最佳。"柳公权曾在皇帝当面，写过三纸，一纸真书 10 字："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是行书 11 字："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 8 字："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几种书体均妙入佳境。回元观钟楼铭，是柳公权的中楷书，观铭共 41 行，满行 20 字，总计 761 字，同其他柳书碑一样由邵建和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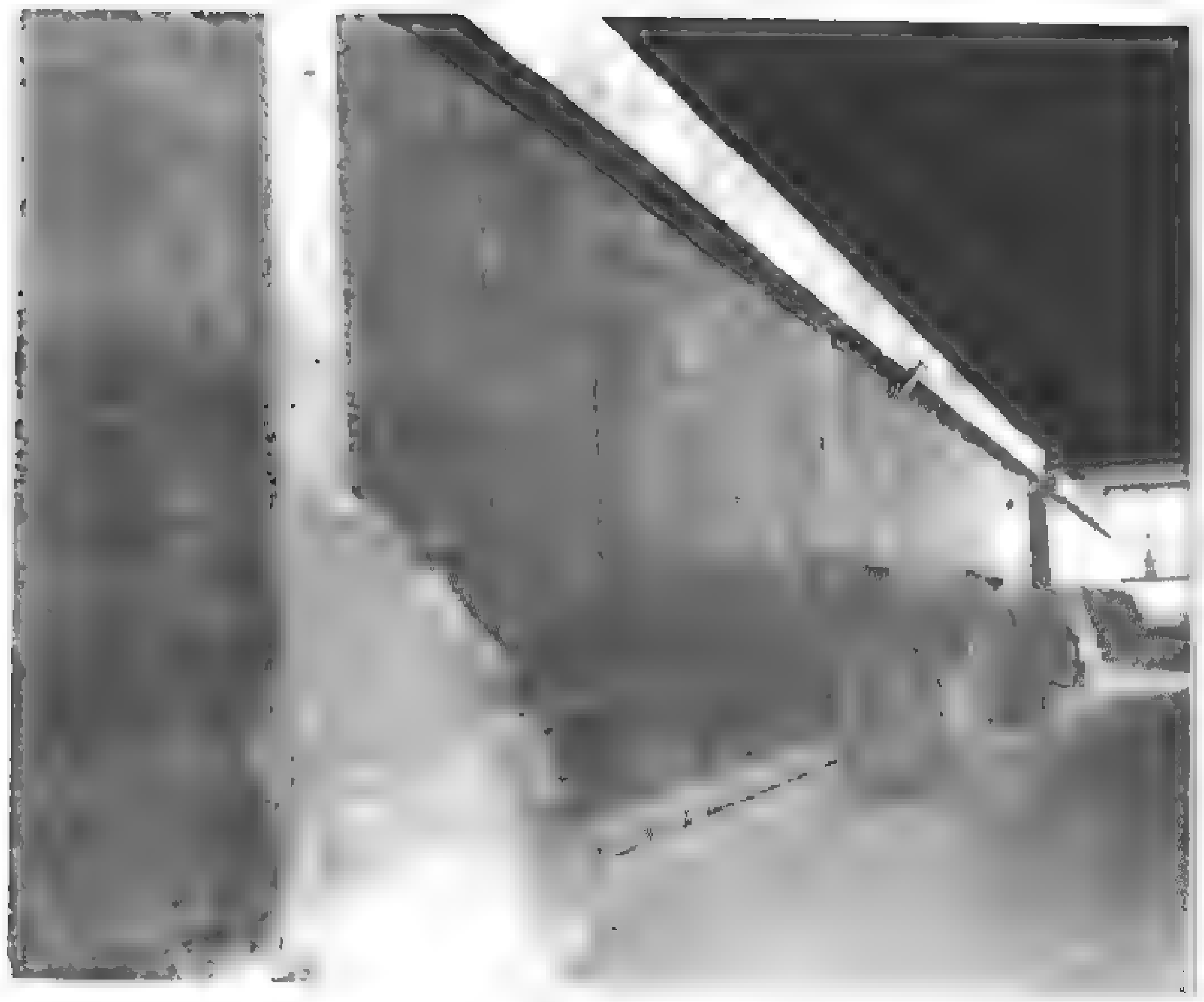
这块观铭从未见有过著录，亦未听说有拓本流传，由于石长期埋没地下，观铭除个别字稍有残损外，文字均未见有后人剜铣痕迹，字口清晰，锋芒棱角，俨然如新，其书法结体严峻，多出欧法，以斩钉截铁之笔，游刃于颜法，势雄力厚之中，刚柔相济，是概括前人楷法中的珍品，为研究柳体书法艺术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现存碑林博物馆。

88. 开成石经

唐　开成二年（837）　此石经刻石均为竖方形，每石高 216 厘米，宽 83—99 厘米不等。唐文宗太和四年（830）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玠等用楷书分写，字体工整俊美。大约花费了七年的时间到开成二年刻成一部石经，称《开成石经》。其中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孝经》、《论语》、《尔雅》等 12 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 114 石，文刻两面，计 228 面，字列八层，共 650252 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是继汉《熹平石经》和魏《正始三体石经》之后又一部大型经书刻石。

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漕运使蓝田人吕大忠，见《开成石经》几经战乱，有毁坏的危险，才命主持京兆府学的教授黎持将石经移置于"府学北墉"，即今西安碑林现址，妥加保护。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关中发生大地震，《开成石经》就有 40 石被折断，未折断的，也多有伤痕。明万历十七年（1589）王尧典等人对石经残损作了补修工作，这次共补刻了 97 石，立在原《开成石经》周围，以补其缺字。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又补刻了《孟子》一书共九石。到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麻尔图又刻了《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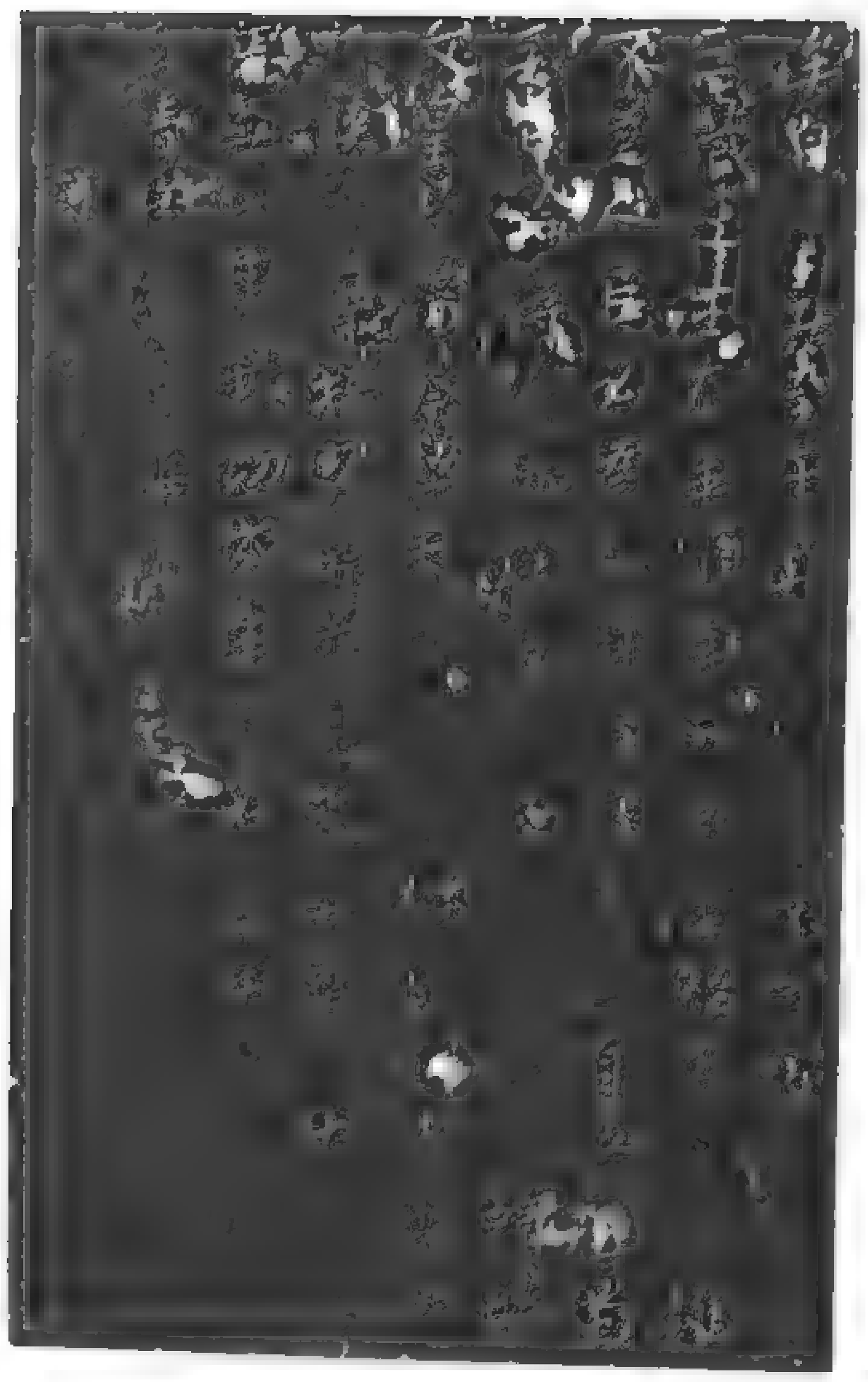


《中庸》共二石，通称《十三经》。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完整地体现在这部石经中，可谓是我国一部完整石质的书库。

现存西安碑林一室。

89. 大遍觉法师塔铭

唐　开成四年（839）　此塔铭高 80 厘米，宽 163 厘米，76 行，行 42 字。内容详细介绍了玄奘的生平事迹。唐高僧玄奘，姓陈，河南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不避险阻困难，贞观初年到印度游学，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十余年，于贞观十九年（648）带佛教经典 657 部，回到长安，对中印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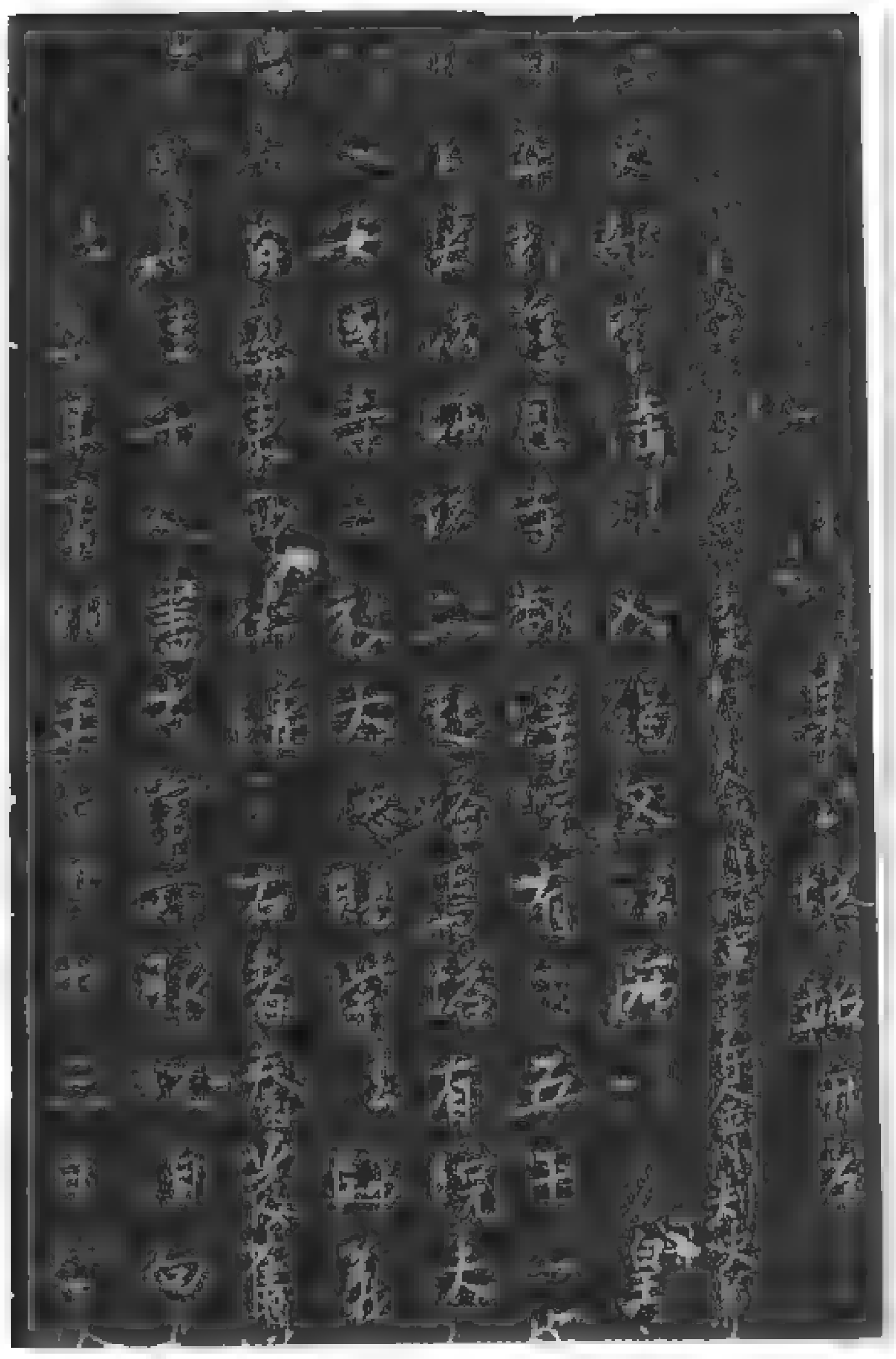


玄奘回国后，历时 19 年，共译出梵文经典 74 部，并将途中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共 12 卷，是研究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历史、地理、民俗、风土的重要参考材料，现在各国都有译本。664 年玄奘圆寂后，初葬于浐水以东白鹿原上，总章二年（669）迁葬于长安县少陵原上，并修寺建塔以作纪念。“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于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沙门令检重修塔时刻镶在五层塔的北面，为刘轲撰文，沙门建初行书，字迹疏朗流畅，似从《集字圣教序》而来，全文《金石萃编》有著。

现存陕西长安县兴教寺内。

90. 基 公 塔 铭

唐　开成四年（839）　此塔铭高 50 厘米，宽 83 厘米。40 行，行 23 字行书。塔铭叙述了基公（即窥基）生平事迹甚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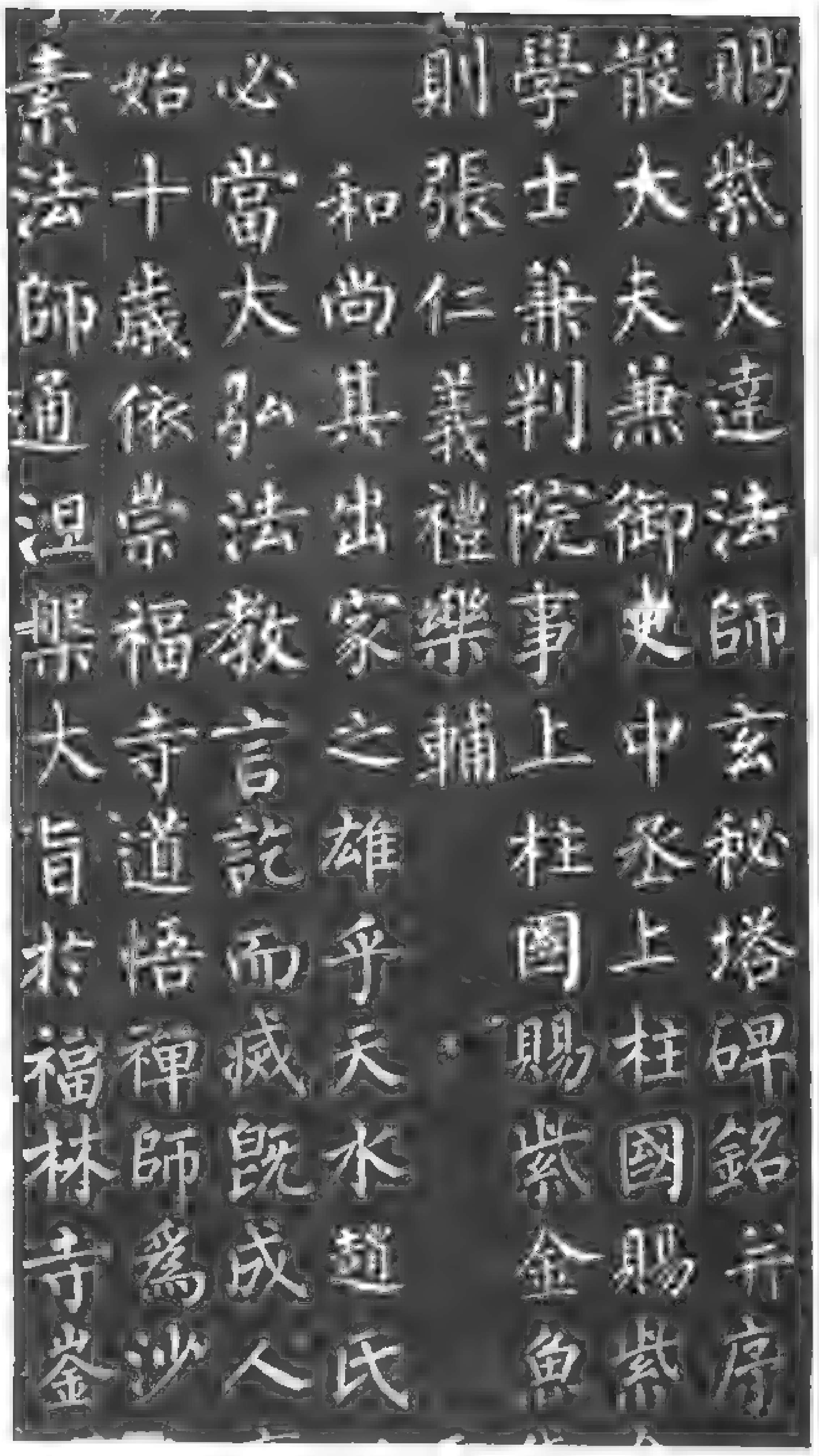


窥基本姓尉迟，字玄道，长安人，生于唐贞观五年（631），是鄂国公尉迟敬德之侄。玄奘由印度回国后，拜玄奘为师，学习梵文，不久曾识讲经论30余部，草疏义100本，当时大行于时，被称为慈恩疏义，又称为日本疏主。高宗永淳元年十一月（682）圆寂于慈恩寺翻经院，年51岁，逾十日葬樊川陪奘公（玄奘）塔，亦起塔并建塔院。唐文宗开成四年僧令检重修塔时，由李宏度撰写塔铭，建初行书于石，字迹清晰，书法秀丽流畅，似从《集字圣教序》得来，为一代书法佳作。

现存长安县兴教寺文管所。

91. 玄秘塔碑

唐　会昌元年（841）　此碑为螭首方座，高386厘米，宽120厘米，28行，满行54字。碑建于唐武宗会昌元年。碑文内容主要讲大达法师在唐德宗、顺宗、宪宗等朝受到恩遇。顺宗对大达法师“亲之若兄弟，相与卧起”。可见当时政教关系的密切。碑文是由当时名书法家柳公权书写。柳公权（778 -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元和年间擢进士第，官至太子少师。早年勤于攻读，12岁时，便能作诗赋词，他精通经史，学识渊博，精研书法有很深的造诣。他崇敬欧阳询和颜真卿，深受他们的影响，造就为一代书法大师。唐代很重视书法，柳公权在唐穆



宗时曾被召为翰林学士，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当时公卿大臣家的碑志，如若求不到柳公权的字据以上石，会被人骂为对祖先不孝。连外国使节到长安向唐王朝进贡，也都另备礼品，用以购买柳书真迹。可见柳公权的书法受当时人的推崇。

柳公权的书法和颜真卿并驾为"颜柳"。颜的书法以丰筋取胜，而柳则偏重于骨力，故而世称"颜筋柳骨"。柳公权擅长楷书，也精于行草，又能作篆书。《旧唐书·柳公权传》中称他的字"体势劲媚，自成一家"。他的楷书代表作作品之一《玄秘塔碑》，结体紧密，力守中宫，神韵刚健，用笔果断，搭配匀称，圆厚中见锋利，犀利准确，笔力极富于长短参差的变化，但法度谨严，虽不属楷书第一，却也是唐代书法的典范，向为人们学习"柳体"的范本。

碑侧平雕人兽花草图案。碑阴刻有大达法师弟子正言出钱，购买到庄宅一所，内庄宅使发给他的执据，这亦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宝贵资料。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室。

92. 刘 沔 碑

唐 大中二年(848) 此碑螭首，文 37 行，行 65 字，碑文主要记叙刘沔生平事迹。刘沔新旧唐书皆有传可查，碑文所载事迹多与史合。撰文人韦博，新、旧《唐书》亦有传，博曾为刘沔从事，故碑中叙事特详。全文见《金石萃编补遗》。碑文为柳公权楷书，唐元度摹勒并篆额。碑因年久下部多漫漶不清，字里行间虽断缺不全，但仅留字迹却神采奕奕，精神焕发，书体劲秀，不愧出自名家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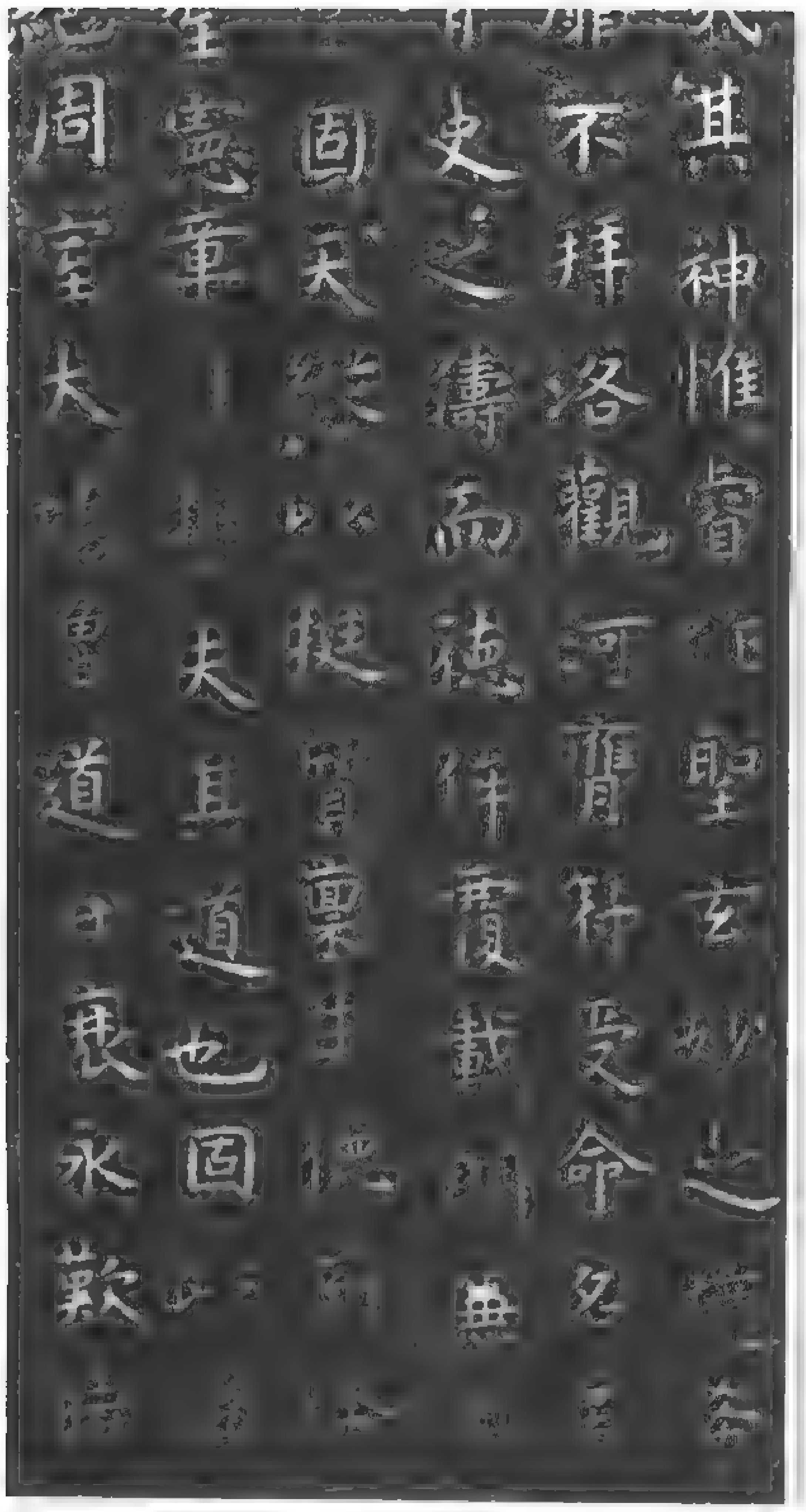
现存陕西永寿县文化馆。

93. 孔子庙堂碑

唐 宋建隆至乾德年(960—967)**重刻** 《孔子庙堂碑》，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家和书法家们所称道不已的作品。

历来，此碑有数种，但以王彦超摹刻虞世南所书的《孔子庙堂碑》最有名，故单称《孔子庙堂碑》或《夫子庙堂碑》。此碑螭首方座，高 280 厘米，宽 110 厘米，34 行，满行 65 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于南朝陈永定二年(558)，



卒于唐贞观十二年(638),享年 80 岁,隋大业间授秘书郎,唐初为弘文馆学士,官至秘书监永兴公,世人称他为虞永兴。初唐两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并称,二人都学王羲之书法,各有所得。虞世南从释智永受其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其书法笔力坚挺,外柔内刚,用笔点画显得沉厚安详,有韵度,丰趣秀逸,前人以“沉粹”二字形容之。

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学书,也以虞世南为师,常说“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写了“晋”字,令虞世南填“戈”字,写成后,让魏征鉴赏。魏征看后说,惟“戈”字笔画逼真。这个故事虽未必真实,但却说明了当时虞世南的书法,颇受唐太宗重视。唐张怀瓘评价欧、虞书法说:“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对虞更加推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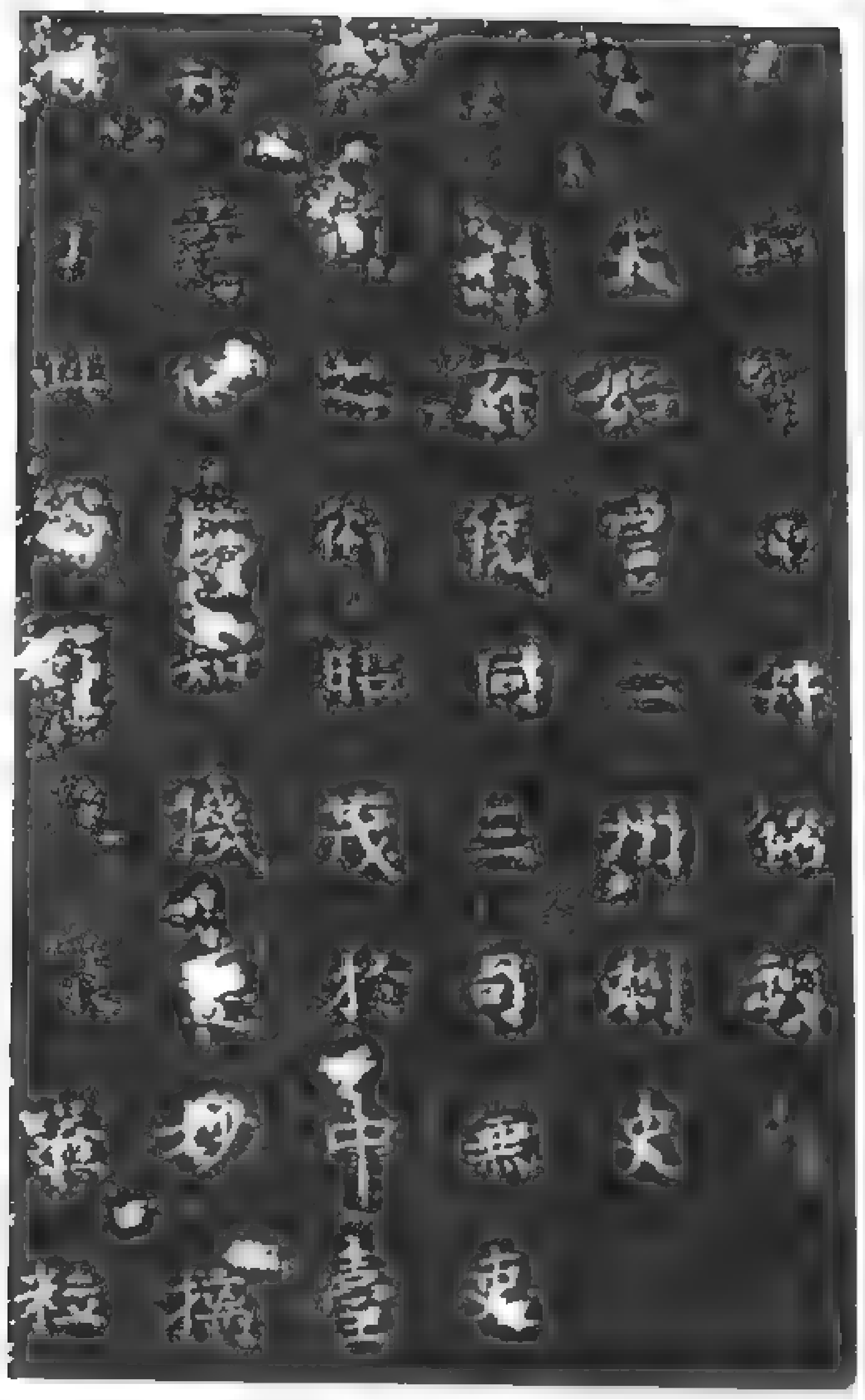
《孔子庙堂碑》初书于唐太宗贞观七年(633)。碑文内容,是论述唐朝皇帝封孔子的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孔子庙等事宜。书品位高,被誉为唐碑第一。据说,此碑由虞世南撰文并楷书,刻成后,曾经是“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见清孙承泽撰《庚子销夏记》。所以没多久,碑文即被毁坏。武则天长安二年(703)复刻,后又佚失。因此,碑文原拓极为珍贵。宋代黄庭坚(山谷)曾有“孔子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的诗句。又据杨宾《大飘偶笔》记载:“庙堂碑刻于贞观间,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未几火烬”,足见原刻拓本在北宋时已经不易得到。

目前所存最早拓本,仅知有清人李宗瀚所藏,称为“临川四宝之一”,原拓已流入日本。

这通碑重新摹刻有数种,现存西安碑林的这一通碑石,是宋太祖建隆、乾德年间(960—968),由王彦超摹刻的。另外,山东成武(今成武)还有一通元代摹刻的《孔子庙堂碑》。一般称西安这通碑为“西庙堂”,称成武那通碑为“东庙堂”。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94. 令狐德棻碑



唐 (618—907) 此碑原文约2700余字，今尚存者不到500余字，可读成文句的不多。碑额刻“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铭”10字篆书，书者姓名仅留□□政，立碑年月亦泐不清。以史藉知令狐德棻为华原（耀县）人，唐史学家，官至宏文、崇贤二馆学士。唐初经籍散亡，他建议政府重价购求，保存了大批书籍，并建议修撰梁、陈、齐、周、隋等史书，自己主编《周书》并参与编纂《艺术类聚》，创造了初唐集体官修史书的成功经验。善长书法，字体类欧阳询、薛稷所书。

现存耀县药王山文管所。

95. 彦修草书及肚痛帖

唐 五代 宋嘉祐三年（1058）**刻** 石呈竖方形，高124厘米，宽56厘米，两面分三截刻，共48行，满行6字。此帖为彦修草书，帖下有嘉祐二年司农少卿和解梁郡李丕绪跋。据说僧彦修为后梁乾化间人，善草书，笔力遒劲酣畅，具有画意，得张旭书法，因惜其名不得传而刻石。草书内容为《寄边衣诗》及《入洛诗》。碑阴下段并摹刻张旭《肚痛帖》29字。笔画逸势奇壮，连绵回绕尤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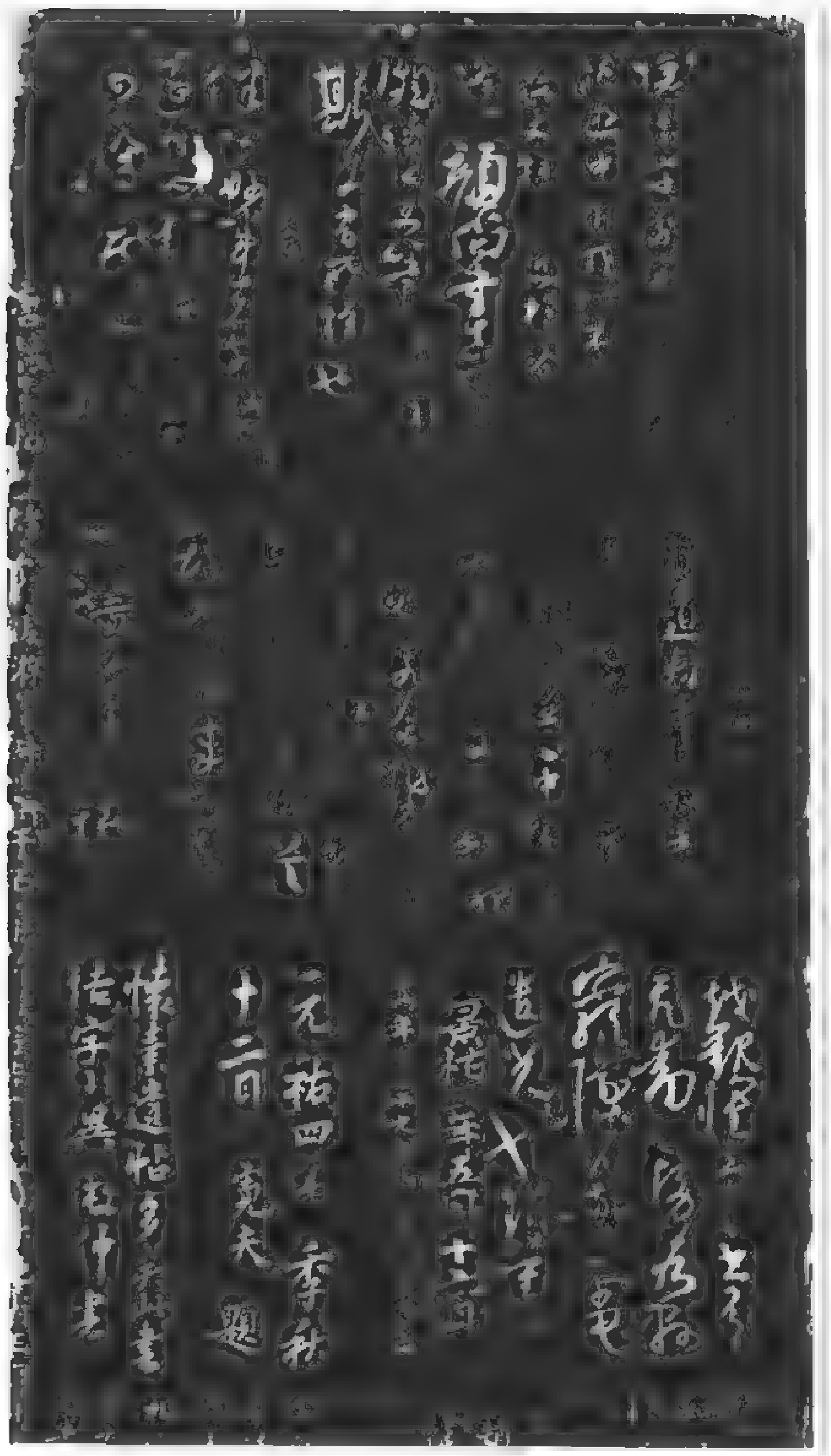
《肚痛帖》释文为：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

取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96. 东陵圣母帖

唐 宋元祐三年（1088）摹刻 此帖系宋代摹刻唐贞元九年释怀素草书，石为竖方形，高 70 厘米，宽 139 厘米，两层刻文，共 60 行，行 2—9 字不等。明赵子崡《石墨镌华》评："此帖轻逸婉转，几贯王氏之垒而拔其赤帜，亦元祐年刻，刻工极佳，与《藏真》、《律公》均不失素师笔意。"释怀素在唐代张旭后，亦为草书中又一杰出书家。据史书记载，他平生衣着不整，举态疯颠，酒量过人，激情所至他就急不可待地"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尤其是酒醉之后，提笔挥毫有如骤风旋雨，急流飞瀑，一泻千里，有排山倒海之势，令人惊心动魄。书法史上早有"颠张醉素"的美称。



此帖草书文字分上下两段书写，其释文如下：

上段

1. 圣母心俞至言，世
2. 疾冰释，遂奉上请之教
3. 旋登列圣之位，仙阶崇
4. 者灵感远，营功迈者
5. 神应速，乃有真人刘君
6. 拥节乘麟降于庭内
7. 刘君名纲贵真也，以
8. 圣母道应宝箓，才合
9. 上仙，授之秘符，饵以珍
10. 药，遂神仪爽变
11. 肤骼纤妍，脱异俗流，
12. 鄙远尘爱，杜氏初
13. 忿，责我妇礼，圣母倏然
14. 不经听虑，久之生讼，至
15. 于幽圄，拘同羑里，倏
16. （忽）霓裳，仙驾降空，卿

17. 云临户，顾召二女，蹑
18. 虚同升，旭日初照，耸
19. 身直上，旌幢彩焕，辉
20. 耀莫伦，异乐殊香，没
21. 空方息，康帝以为中
22. 兴之瑞，诏于其所置
23. 仙宫观，庆殊祥也。
24. 因号曰东陵圣母。家本
25. 广陵，仙于东土，曰东陵
26. 焉；二女俱升，曰圣母
27. 焉，邃宇既崇，真仪
28. 丽设，远近归赴，倾市

下段

1. 江淮，水旱扎瘥，无不
2. 祷请，神贶昭答
3. 人用大康，奸盗之徒，
4. 或未引咎，则有青禽
5. 翔其庐上，灵征既降
6. 必斯获，闾井之间，无隐
7. 匿焉。自晋暨隋，年
8. 将三百，都鄙精奉，车
9. 徒奔属，及炀帝东迁
10. 运终多忌，苛禁道侣
11. 玄元九圣，丕承慕
12. 扬至道，真宫秘府，罔不
13. (择) 建，况灵纵可讯，道
14. 化在人，虽芜翳荒郊，而
15. 奠祷云集，栋宇未复，耆
16. 艾衔悲，谁其兴之，粤因
17. 硕德，从叔父淮南节度
18. 观察使，礼部尚书

19. 监军使，太原郭公，道冠
20. 方隅，勋崇南服，淮沂既
21. 蒸，识作而不朽，存乎
22. 颂声
23. 贞元九年岁在
24. 癸酉五月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97. 藏真、律公二帖

唐 宋元祐八年（1093）摹刻 石为竖方形，高140厘米，宽49厘米。两帖均为唐释怀素草书。

《藏真帖》56字，释文为："怀素，字藏真，生于零陵，晚游中州，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法，若有所得也。"

《律公帖》分为二段，一为25字，释文为："律公好事者，前后数度，遂发怀素小兴也，可深藏之箧笥也，怀素。"另一段67字，释文为："贫道频患脚气，异常忧闷也，常服三黄汤，诸风疾兼心中，常如刀刺，乃可处方数服，不然客舍非常之忧耳。律公能抬步求贫道起草，斯乃好事也。卒复不尽垂悉，沙门怀素白。"

两帖书势皆有"惊蛇走虺，骤雨旋风"之势，笔老意新，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终不离魏晋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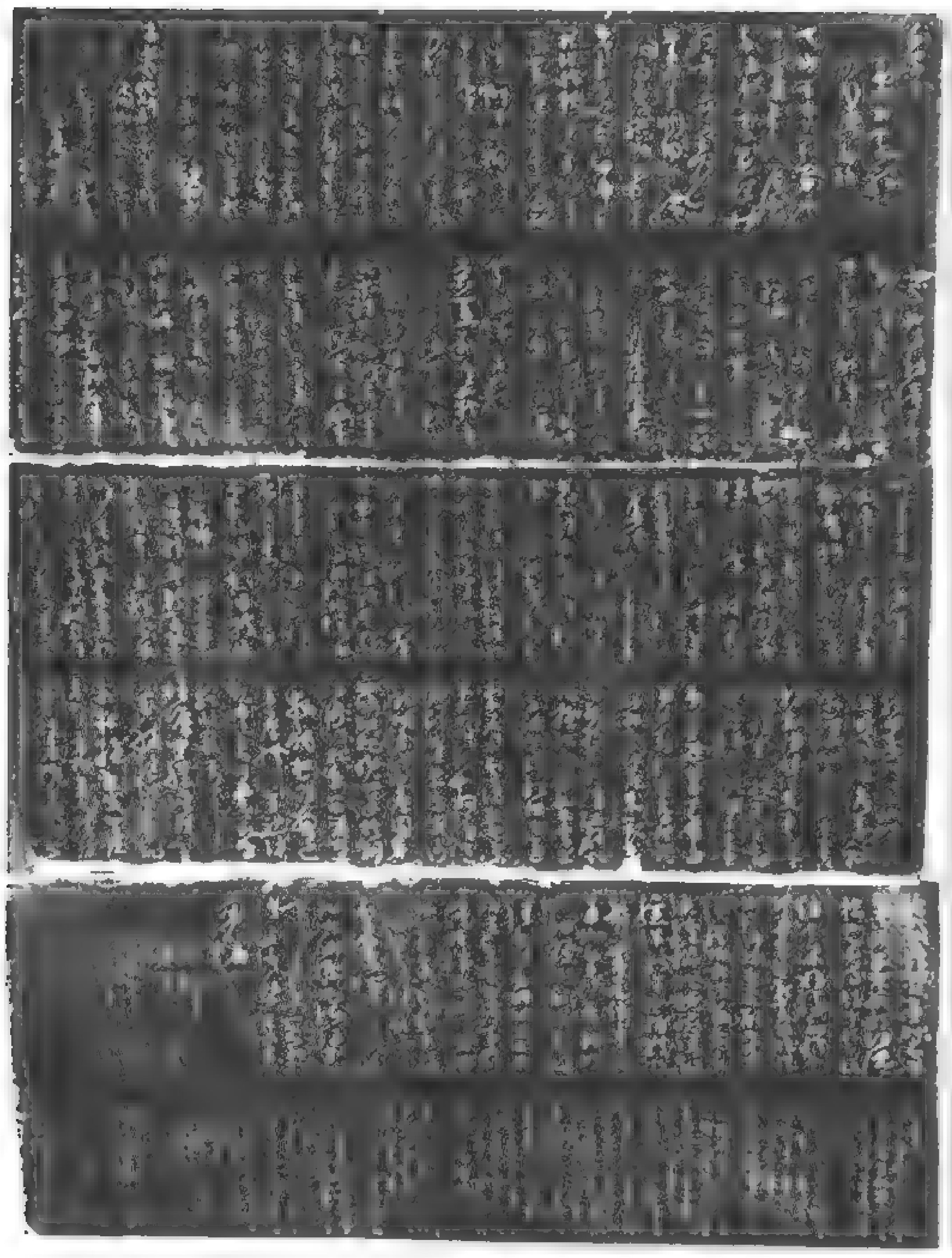
此二帖后还附刻有景祐、元祐间人题跋及游师雄刻李白赠怀素草书歌。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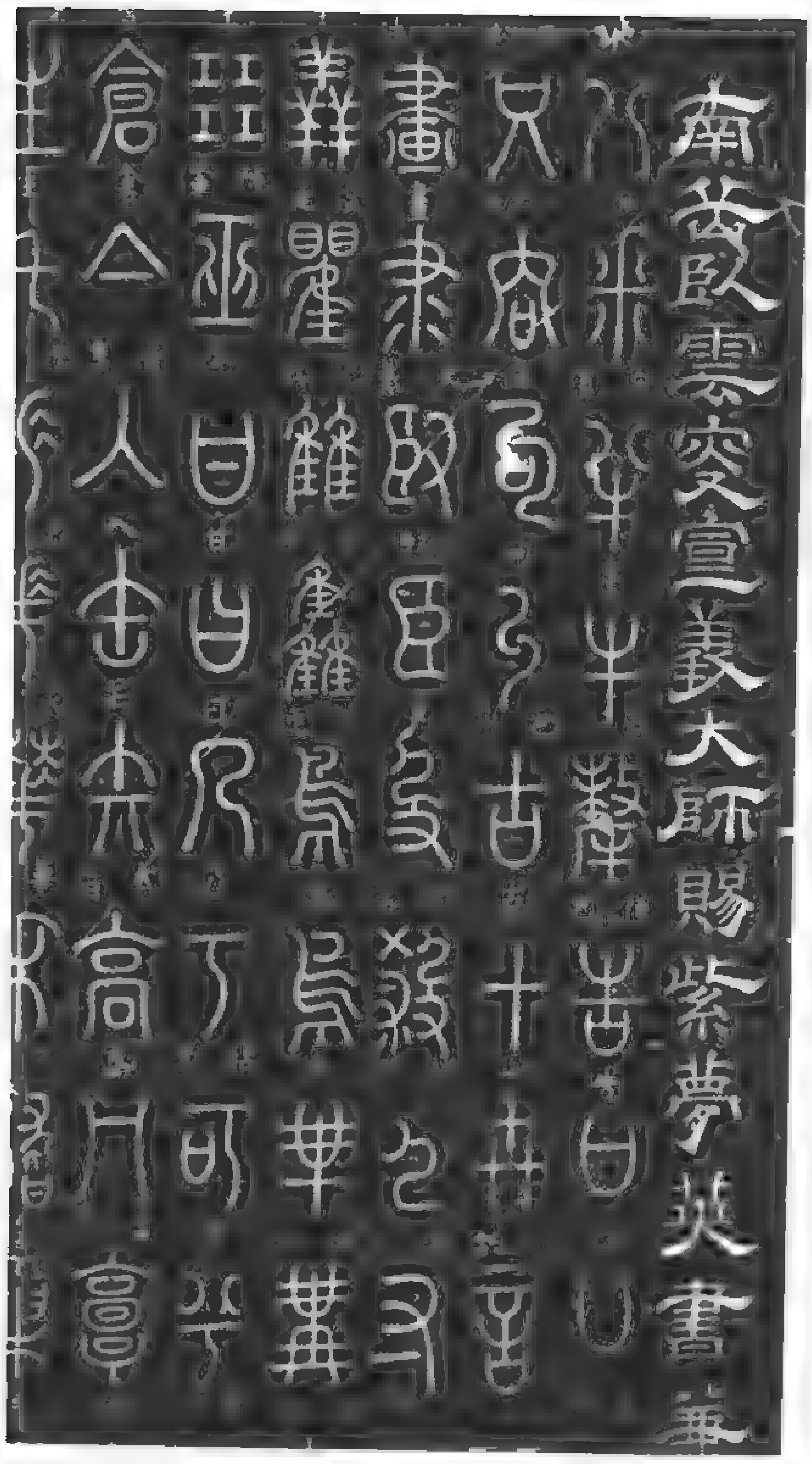
98. 怀素草书千字文

唐 明成化六年（1470）摹刻 此石为长方形，共两石，各高71厘米，宽135厘米，均两面刻，正面分上下两段，每段72行，行7字，背面石上段29行，刻《千字文》。这两块草书《千字文》亦是唐代和尚怀素写的。

怀素和尚（725—785），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据传当时著名诗



人钱起是他的叔父，早年出家为僧，法号怀素，人称“怀素和尚”，是唐代几个著名的僧人书法家之一。擅长草书。相传他为了掌握草书要领，发奋苦练，弃笔成堆，埋在山下，号为“笔冢”。怀素又因家贫，无钱买纸，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芭蕉成林，采蕉叶代纸练字，终以“狂草”出名。“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便是古人对他“狂草”书的形容。怀素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历来书评家认为他的书法继承了张旭而有所发展，称其“以狂继颠”。存世的书迹有《自叙帖》、《苦笋帖》、《藏真帖》、《律公帖》和《东陵圣母帖》等。其中《自叙帖》真迹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运往台湾省。1974年春，日本前外相大平正芳第二次来我国访问，毛主席亲自将精裱的《怀素自叙帖》长卷复制品一册赠送给他，后来大平家失火，他首先想到的、设法抢救的东西，就是那本《怀素自叙帖》。此帖内容主要是怀素记叙他自己学书的经历和别人对他草书的评价。是怀素狂草的代表作。



这两块草书千字文亦是怀素的作品，从石上余子俊跋文知道是明成化六年摹刻。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99. 篆书千字文及隶书释字

宋 乾德三年（965） 此碑竖方形，螭首、龟趺、高327厘米。15行，满行40字。

梦英篆并题额，袁正己隶书释字，安仁和刻。碑阴还刻千字文序。据《石墨镌华》评梦英、袁正己书法说："英公书，正书第一，篆书次，分隶又次之。"，"袁正已习欧阳后更法，隶方劲，非嘉祐后人所能及。"足见此二人都是宋初较知名的书法家。碑上文字完整，为初学篆书的人提供了极好的参考资料。

碑头螭首雕刻刀法纤丽，中龛三尊佛像，龛上三角形处减底阴刻云纹和宝相花纹，碑身并列七尊佛龛，意匠蹈袭唐法，刻工精练，气象壮美，碑边及两侧均有减底连续花纹图案，也都具有唐代风格，为宋初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100.《佛说摩利支天经》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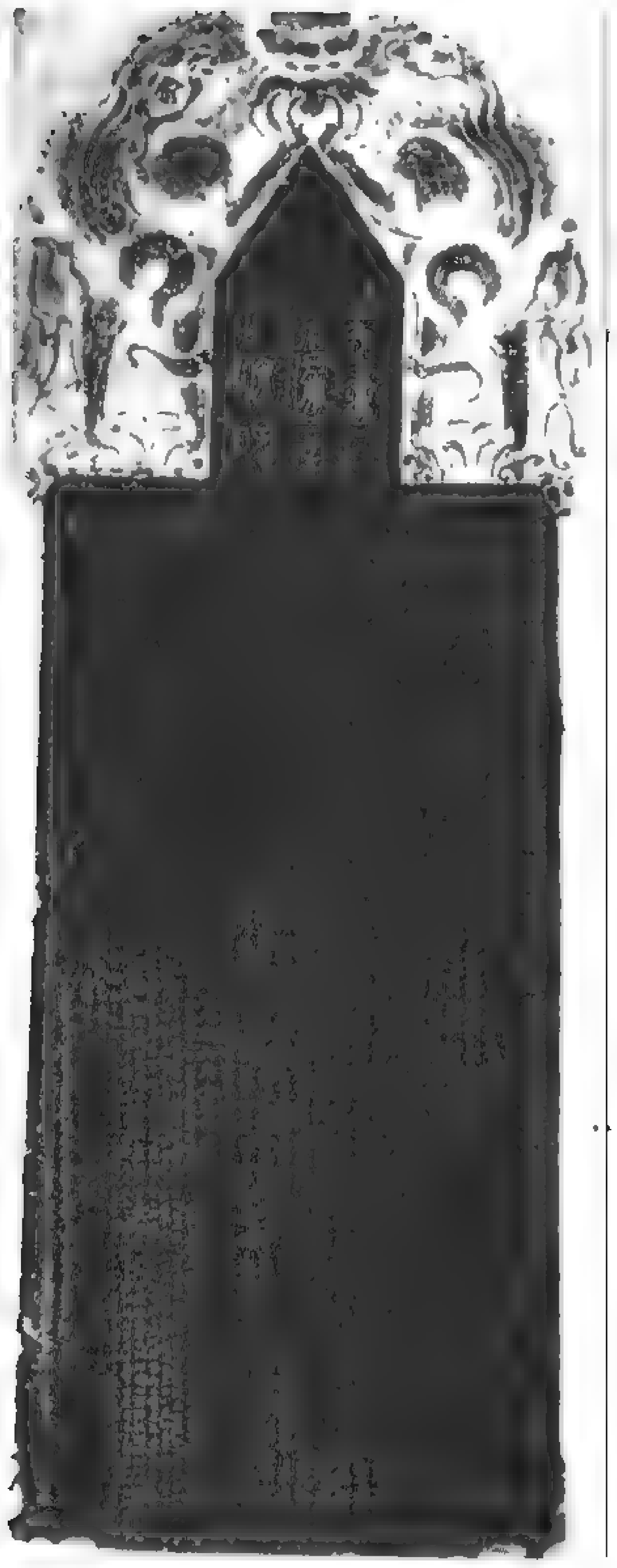
宋 乾德六年（969） 此石呈竖方形，高 132 厘米，宽 68 厘米，上刻宋乾德六年经文及《佛说摩利支天经》、《黄帝阴符经》附图。两附图各高 21 厘米，宽分别为 18 厘米、15 厘米。

摩利支天经译曰"阳焰"又曰"华鬘"，念其经则一切灾厄离身。其图像见述于《陀罗集经十》："似天女形，其像左手屈，屈臂向上，手腕当乳前作拳，拳中把扇，扇如维摩诘前天女把扇。右手伸臂并伸五指，指头下垂……其像左右各作一侍者，其侍者作天女形，种种庄严，作此像已"，附图均与此合。

《黄帝阴符经》为道教经典，旧题黄帝撰，道家传说系由骊山老母传给唐代道士李筌者。另一说李筌修道于嵩山少室，偶于虎口岩壁中得《黄帝阴符经》。内容多谈道家修养，间亦涉及丹

术及部分纵横、兵家之言等等。此附图刻骊山老母手柱拐杖，坐一坡石上授经与李筌的情景，境界悄然，笔法简练苍古。将这两幅画像石上的线刻和《道因法师碑》碑座线刻人物相比，刚劲有力似不及，但纤秀洒脱则有过之。特别是《黄帝阴符经》的附图，已成为一幅典型宋代山水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一定的价值。

经文楷书工整劲拔，为汝南袁正己书，附图分别为李奉珪、翟守素画。现存西安碑林碑廊。



101. 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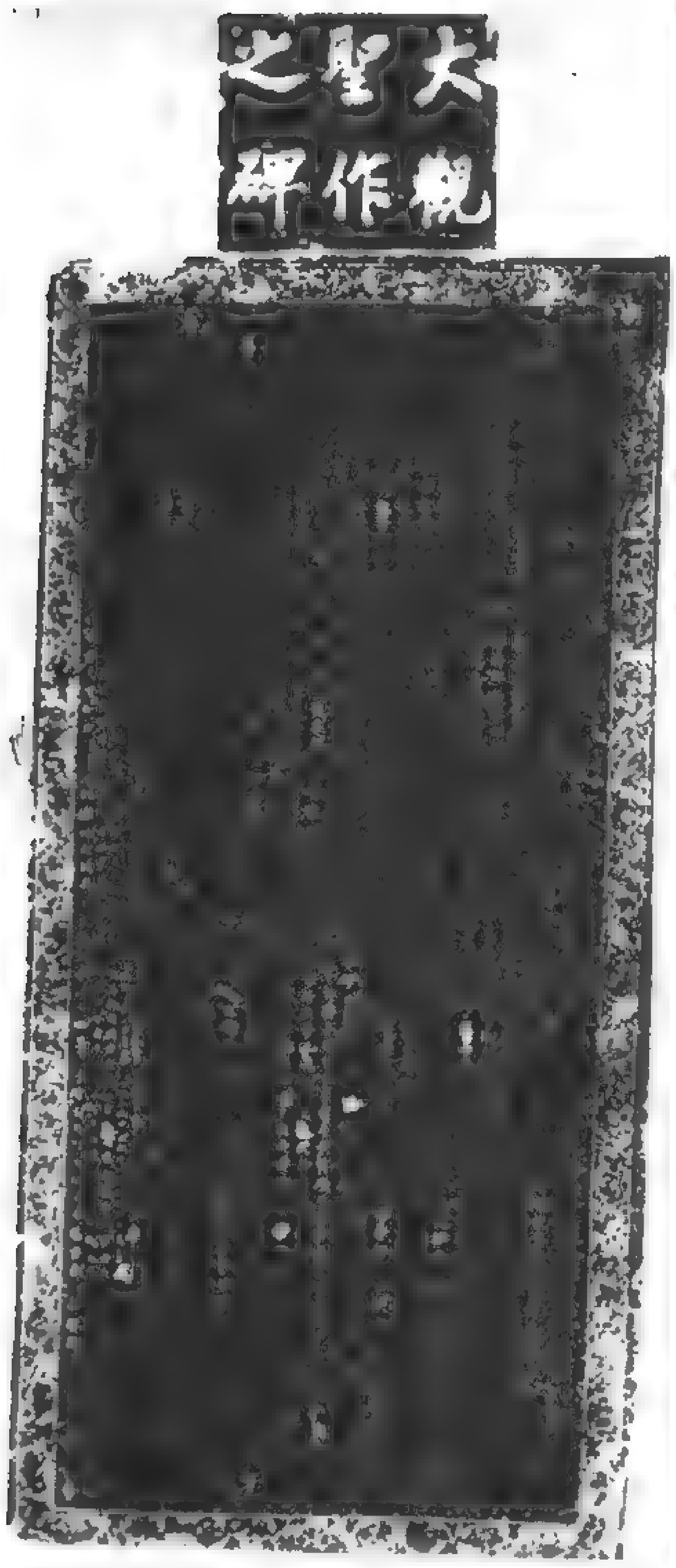
宋　咸平二年（999）　此碑是宋咸平二年据僧梦英篆书刻石的。梦英工玉箸篆，上承秦李斯、唐李阳冰，在宋初和郭忠恕齐名。他把许慎《说文》中部首、偏旁分别篆为540字，加以楷书注音，自作序文说明。并把《郭忠恕答书》一并刻在石上，这对研究中国汉字形体演变以及篆体书法，都有一定的价值。

碑侧图案花纹，刻工亦精，具有美术参考价值。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102. 大观圣作之碑

宋　大观二年（1108）　此碑刻于宋大观二年，碑身体形高大，呈竖形，螭首、龟趺，高378厘米，宽140厘米，28行，满行69字。碑额行书题“大观圣作之碑”六字，是当时权相蔡京所书。碑文系北宋皇帝徽宗（赵佶）所撰并亲笔书。

宋徽宗赵佶（1082 -1135），不善文韬武略，但在艺术上却才华四溢，风流倜傥。他重视晋唐以来书画，曾广泛搜集流散在民间的金石书画。扩充翰林画院，设书画博士，汇编《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各20卷，重修《宣和博古图》37卷。大观年间又汇编内府所藏前代书法家墨迹，重新摹刻于太清楼，这便是著名的《大观帖》。赵佶精书善画，是一位卓越的书画艺术家。宋人《宣和遗事》对他有生动地描写，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



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早年，赵佶就是一个爱好艺术的皇家公子。宋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写道：“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裕陵在蕃时嗜玩，早已不凡，所事者独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而已。”故而，人们亦称他为皇帝书画家。

宋徽宗书法初学薛稷，擅长行草，笔势劲逸，变其法度自成一家崭新的书体——“瘦金体”。宋徽宗书的瘦金体有大字，也有小字。一般而言，过于瘦的笔画，易有抛筋露骨之弊，难以写大字，更难于书碑。然徽宗却偏偏为之，《浓芳依翠萼诗帖》便是大字豪书。其笔法银钩铁画，豪气跃然，绝不出纤弱之态，是大字“瘦金书”的得力之作。至于“瘦金书”碑文，有著名的《神霄玉清宫碑》传世。王弇州有《宋徽宗大观五礼记》跋称：“大观五体礼记石刻，在大名旧城，字画不甚密，而遒朗可取”（见弇州山人稿）。更有这《大观圣作之碑》，堪称宋徽宗“瘦金书”的代表作品。碑文内容，主要记述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学制、学规及其培养人材的标准等。当时，徽宗以此碑文颁之州县，通国皆立。现今存世者，除河南、山东、江苏等省外，仅陕西就有七碑。据清王旭《金石萃编》所载，兴平、淳化、高陵、临潼四县均有树立；而乾县、耀县、蓝田三县，也各存一碑，王氏却未著录。其中蓝田县及王氏所收者，皆系录文上石，耀县者，已剥蚀不清，唯乾县移入西安碑林此碑，文字完好，宛若新刻，犹存徽宗书法面貌。字体瘦直、挺拔，横笔收笔带钩，竖笔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个别连笔则如游丝飞空。兼以石工精湛，绝好地突出了“瘦金体”的特点。

此碑原在陕西乾县，于 1962 年移至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103. 黄庭坚诗

宋　清咸丰三年（1853）重刻　此刻石长方形共五石，各高 53 厘米，宽 102 厘米，30 行，满行 4 字，为黄庭坚行书，清倪人垌重刻并题跋，仇和刻石。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宋史·黄庭坚传》说他“善行草，楷法自成一家”。他在学书的过程中，大量临写过二王、怀素、颜真卿、杨凝式的墨迹，最得力于《瘗鹤铭》，学二王下的功夫很深，他写的字，别人说不像二王，黄庭坚笑而不答。其实他是刻意学二王的用笔，不肖形似。他师承古人，又能入古创新，“点画成金”，“脱胎换骨”。他的字，侧险取势，纵横奇崛，中宫裹束，四肢舒展，成放射状，瘦硬通神，有一种英俊挺拔的神采独具风貌。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对于黄庭坚书法，宋人赵希鹄《洞天清录》里说：“山谷悬腕书，深得兰亭风韵，然行不及真，草不及行。”给他的三体书定了高低。这五块刻石，内容是凭吊汉城遗迹，属怀古。书法行书，运笔圆劲苍老，结体中宫紧密而四出纵横，脱胎于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和梁焦山《瘗鹤铭》。此帖精神不在他的著名墨迹《松风阁诗》和《刘宾客伏波神祠诗》之下。

现存西安碑林第五室。

104. 大开元寺兴致碑

元　延祐六年（1319）　此碑为圆首方座，高163厘米，宽55厘米。上首阴刻“大开元寺兴致”六字篆书，外雕蕃莲和迦楼罗（金翅鸟）及力士等。中刻长安窦恭画唐玄宗（李隆基）和胜光法师于开元二十八年（741）在延庆殿辩释佛法的场面。玄宗与胜光对座，每边各有四名侍者和四名沙弥，代表政教两方的皇帝和寺僧，都刻得不亢不卑，服饰神情，也合乎分寸。线条坚实流利，可与唐刻比美，在人物衣褶的处理上，已采用了后世常用的折笔和顿笔。碑下刻有此图内容及题识和刻字者姓名，书法均为楷体。碑阴刻华藏庄严世界法海图，刻工也较精细。

现存西安碑林碑廊。

105. 游天冠山诗

元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重刻　此碑高158厘米，宽69厘米，圆首方座，分七截刻，每截20行，行1—6字不等，赵孟頫行书，文征明跋，卜世刻，邓霖上石。

赵孟頫（1254—1322），为元代书画家和诗人。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人。宋太祖的儿子秦王德芳之后，宋宗室入元之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书法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精绝。初临高宗赵构，中学钟、王诸家，晚乃学李北海。其书体势紧密，则得之右军；姿态朗逸，则得之大令；书碑，则酷仿李北海。篆、隶、正、行、草为当代第一。所以在《元史·赵孟頫传》中载：“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人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

他也精绘画，博通前人技法，校古能变。山水画、水墨画宗董源、巨然和李成、郭熙等，人物鞍马取法李公麟；并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白”法“画石”，极力摆脱南宋“院体”，自成清腴华润新的风格，评者以为“有唐人之到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书画俱开创一代新风，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他所写碑版甚多，后世称为“赵体”。这块碑是赵孟頫游天冠山（江西贵溪县三峰山）时写的即景诗，书法结体妍丽，用笔遒劲，于规矩之中，有神仙脱骨风度。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邓霖因碑林无赵文敏的字而摹勒上

石。

现存西安碑林第六室。

106. 祝允明草书乐志论

明 (1368—1644) 石为竖长方形，高109厘米，长281厘米，两面刻《乐志论》草书全文，每面文分上下两段，共计93行，行1—3字不等，后有陆师衡草书跋文。

此《乐志论》为祝允明草书。祝允明，苏州人，号枝山，字希哲，因他右手生有六个指头，故自号枝指生。是明代著名书法家，与文征明、王宠、陈道复并称为“吴中四名家”。祝允明小时就天性聪颖，据《明史》记载，他幼小习书，五岁即能写径尺大字，后受善诗、书的外祖父徐有贞及其岳父李应祯的影响，又广临魏晋唐人法帖，集诸家之大成，师古创新，终成一家。他的书法，备精各体，尤擅大草，墨迹韵胜于法，情胜于理，造诣之深，名动海内，被当时的书家推为当朝第一。这篇《乐志论》，草法破毫杀石，气势豪迈，奔蛇走虺，变幻无常，是碑林仅存的祝允明书法佳作，应当特别珍视。

现存西安碑林第四室。

107. 鱼篮观音像

明 景泰二年（1451） 为竖方形石，高58厘米，宽35厘米，石上线刻一位手提鱼篮作行进状的妇女，风格线条均属上乘。此观音像亦称马郎观音，因手提鱼篮故名为鱼篮观音，也有刻画为在水上乘大鱼的形象。此来历出自观音感应传，为陕西唐元和年间观音点化一位马姓青年信佛的传说，明宋濂有《鱼篮观音赞》叙述其故事。此像为傅兴画、秦旺刻。石原在宝庆寺，寺址在今西安市书院门街西端，还仅存一塔，高耸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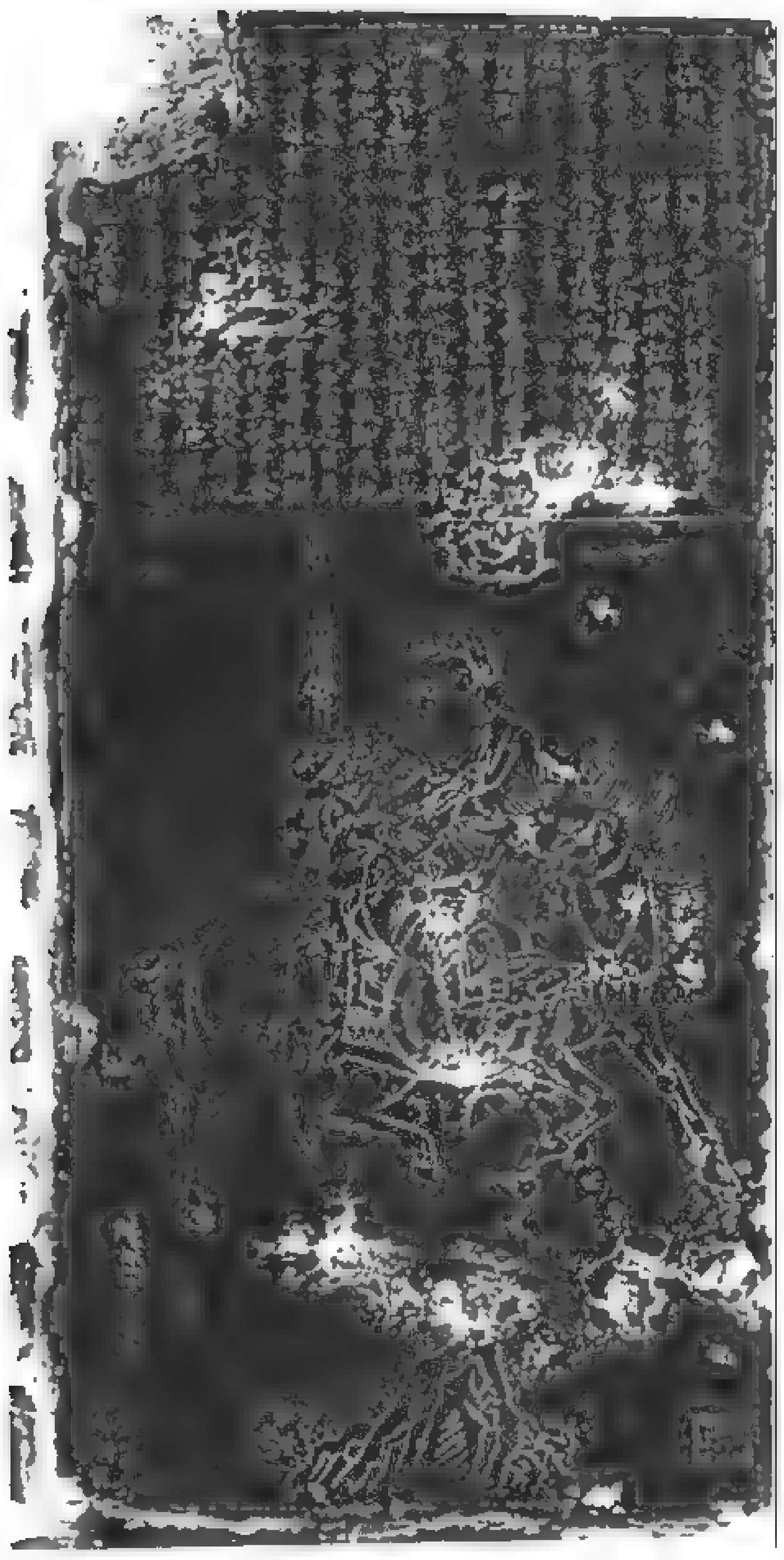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五室外。

108. 月 桂 赋

明 弘治十二年（1499） 此石高120厘米，宽70厘米，石中段线雕中秋圆月，云雾飘渺间隐现蟾宫琼楼，月桂丛中有玉兔捣药，仙境肃然。此

题材是我国汉唐以来久经流传民间的一种美丽的神话。严柳东守长安时，仿欧阳修《秋声赋》，写了一篇《月桂赋》。清词丽句，在当时为人们所称赞。秦藩王府强晟请人绘图并为之题记和刻石，题记楷法严整。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09. 义勇武安王像

明　正德八年（1513）　石为竖方形，高 62 厘米，宽 34 厘米。石分两截刻，上部刻像记，18 行，行 5—17 字不等，书法楷体，间架工整。下部以减底线雕混合手法，刻出关羽身披锁子甲，外罩宽战袍，头戴软巾，隆准凤目，骑坐赤兔马上，手握青龙偃月刀，器宇轩昂，作出征行进中回顾的姿态。须髯、马鬣迎风飘动，更表现出了关羽威武的情态。线刻刀法劲健有力，属一件较好的石刻作品。

关羽即义勇武安王，字云长，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西南）人，三国蜀汉名将，镇守荆州，为东吴所败，后不屈被杀。追赠大将军，葬玉泉山，士人感其德义，岁时奉祀。宋真宗（赵恒）赐庙额曰“义勇”，追封王号曰“武安王”。以后关羽的事迹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渲染，并加以神化，尊为“天公”、“关帝”。这幅画像记正说明了封建社会对关羽的评价和尊崇。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10. 寇　准　像

明　正德十二年（1571）　石为竖方形，圆首方座，高 156 厘米，宽 63 厘米。两面刻。正面阴线刻朝服加身，双手执笏，寇准的半身像。雕刻线条刀笔流利，充分地表现出了一位心胸坦荡、宽怀大度、才智过人的丞相气质。上刻诗赞，下刻刘玑题跋，据跋文知此像为明正德时依照宋刻而覆刻的。碑阴面刻“宁人负我毋我负人”，“宁我容人毋人容我”两行格言共八字隶书大字。书法气度典雅，用笔俯仰有致，方圆并用，其横磔波挑，奥折多姿，体

现出了隶书笔法上的丰富性。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11. 中和二字

明　嘉靖二十六年（1574）　石高274厘米，宽99厘米，竖方形，圆首方座。碑上楷书“中和”两个大字，书法工整劲健，气派宏大，不少游者观后不忍举足叫好。书者陶珪，史书无传可查。

现存西安碑林第五室。

112. 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像

明　崇祯年间（1628—1644）　石为竖方形，圆首方座，高分别为180、189厘米，宽各为60、62厘米。为和尚风颠题跋并绘。一幅画达摩荷杖，挑履踏苇渡江。另一幅画达摩面壁打座蒲团。

达摩或作大磨，全称为菩提达摩，南天竺香至国王第三子。本名菩提多罗，后遇摩呵迦吐第二十七代佛祖般若多罗，受其教而改名达摩。梁普通元年（520）渡海至广州，梁武帝（萧衍）迎至建业（南京），因帝不悟达摩之哲理，遂渡江至北魏，止于登封少林寺，传授禅学，为禅宗之祖师，梁大通二年（528）圆寂。

此两幅画中人物刻画形象突出，两个达摩形象虽有动静、正侧的不同，但都刻画出了精神奕奕的一个印度人的形象。衣纹的疏阔、简练，发须的螺卷，也是相同的。衣纹的刻画特别成功，寥寥几笔，简练扼要，使全画显得大方、有力。如达摩面壁图，因达摩不为梁武帝识，虽北去止少林寺，终日面壁，号壁观婆罗门。图绘菩提达摩手托一钵，坐于棕垫上，须眉长发俱以细笔勾画，卷曲如虬髯，衣着写意，数笔而就，粗中有细，疏密得当。尤其是人物的眼睛点成怒目侧视，颇

有恨萧衍（梁武帝）不悟禅机之意味，可算是明代石刻画的佳作。像石上角均有四句题偈，一石楷书，另一石为行草，上均书有“己巳仲冬”干支记时题字秀劲清丽，不类工匠之作。

现存西安碑林第四室。

113. 秣陵旅舍送章生诗

明　清康熙四十年（1701）刻　此碑螭首、龟趺，高331厘米，宽86厘米，文分七截刻，上五截各15行，行6字，下两截各17行，行8字。为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行书。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亦号香光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善鉴别古书画，17岁开始学书，从颜真卿入手，博涉晋、唐诸家，参合李邕、徐浩、杨凝式等笔意，分行布白，疏宕秀逸，自成一家。他学书临摹真迹至忘寝食，其书不择纸笔，而书辄如意，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六休八法无所不精，圆劲苍秀，对明末和清代的书风影响颇大，与关中米万钟有“南董北米”之誉。兼善山水画，取法董源、巨然，以黄公望、倪玷为宗，落笔苍浑，用墨华滋，有清润明秀之长，但强调“土气”偏重笔墨，脱略形象。

碑为达礼善跋并立石。达礼善当时为陕西布政使，因碑林当时无董其昌书作，因而将其所藏董其昌所书此诗刻石于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第六室。

114. 苏氏笔法论

清　（1644—1911）　此行书刻石为竖方形，高146厘米，宽36厘米，文三行，共计56字，由清人保铁书，内容是保铁对苏东坡的书法进行了简要评论。

保铁，清嘉庆时，官至两江总督，能诗善写，精于行书，嘉庆十四年因故被谪戍乌鲁木齐。此作可能是当时他途经西安所书写的，书法结体紧密，行气宽疏，秀逸典雅，是一幅行书佳作。

刻石现存西安碑林。

115. 淳化秘阁帖

清　顺治三年（1646）　《淳化秘阁帖》原本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把皇宫里所藏历代帝王和名臣及大书法家的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成卷，用枣木板摹刻成帖。完成于淳化年间，并专建“秘阁”庋藏，故名“淳化秘阁帖”简称“淳化阁帖”。

全帖内容共分为10卷。第1卷《历代帝王法帖》，收有自汉至唐19家帝王的书法；2—4卷《历代名臣法帖》，收进汉张芝至唐（刘宋）薄绍之等67家的书法；第5卷《诸家古法帖》收有自苍颉至张旭等17家的书作；前五卷共收进185帖；6—8卷《王羲之书》，9—10卷《王献之书》，收进“二王”书法127帖。此帖篆、隶、草、行、楷，诸体无不具备。存在宫内，拓印墨本颁赐大臣。

原本《淳化秘阁帖》刻成不久即毁，由宋到明，公私复刻本甚多，明太祖朱元璋封儿子朱瑛为肃王，赐原拓本一部，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瑛的后裔宪王朱绅尧，把当日真拓本命温伯坚双钩下来，复刻上石，存在兰州肃王府，称《兰州淳化阁帖》。西安碑林现藏《淳化阁帖》，是清顺治三年，长安书家费甲铸用甘肃府本重摹刻上石，石均为四方形，高宽不一，尺度分计，每石上字8—20行，行6—24字不等，共143石，均两面刻文。现其中九石断，其余大都完好。此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名的大型法帖，可视为集书法之大成。

现存西安碑林第七室。

116. 千　字　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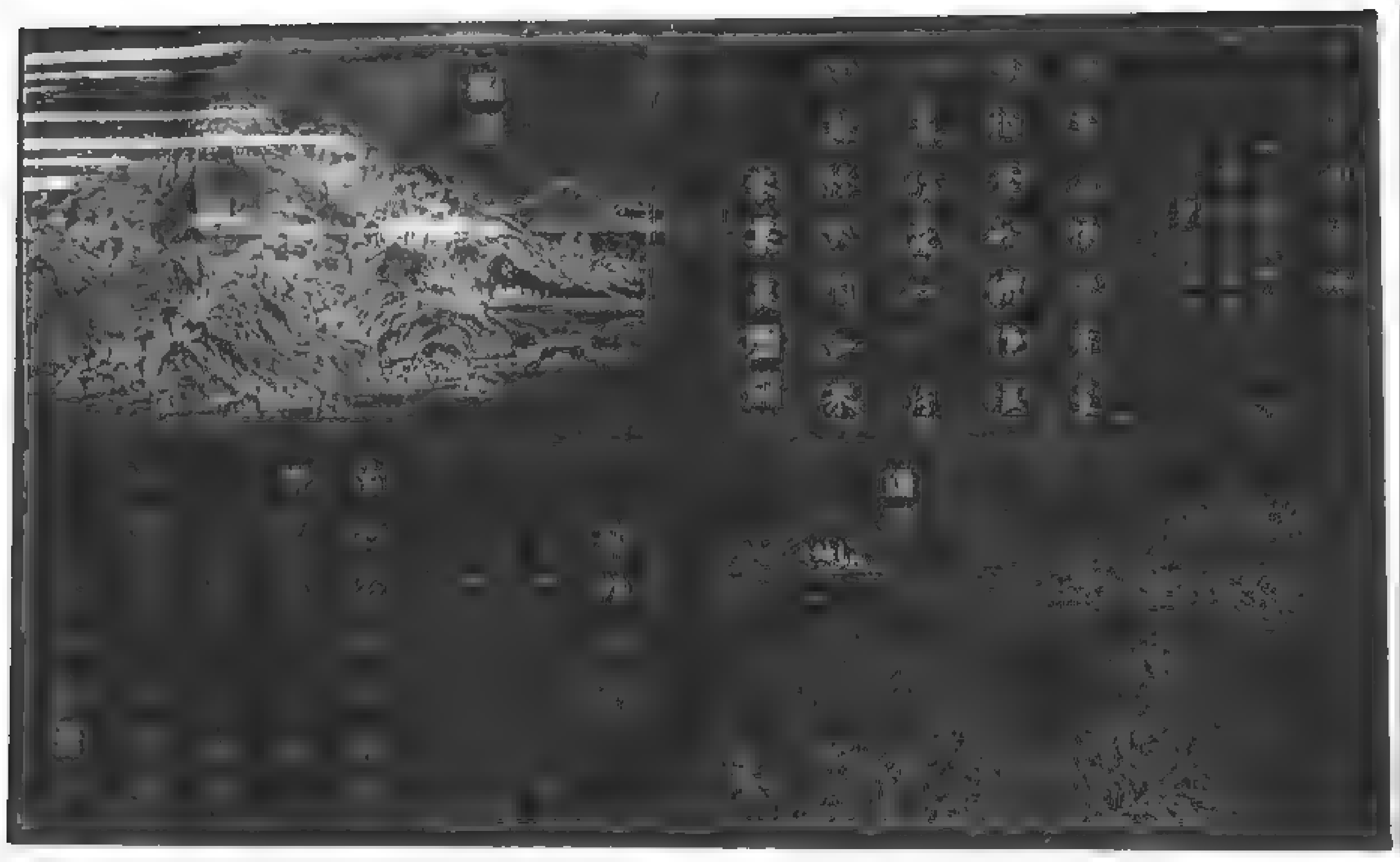
清　顺治十五年（1658）　此石为大小二石，大石呈竖方形，高171厘米，宽45厘米，文分七截，各12行，满行10字。李宏柱立石，王铎撰文并行书，书法苍郁雄畅，丰神潇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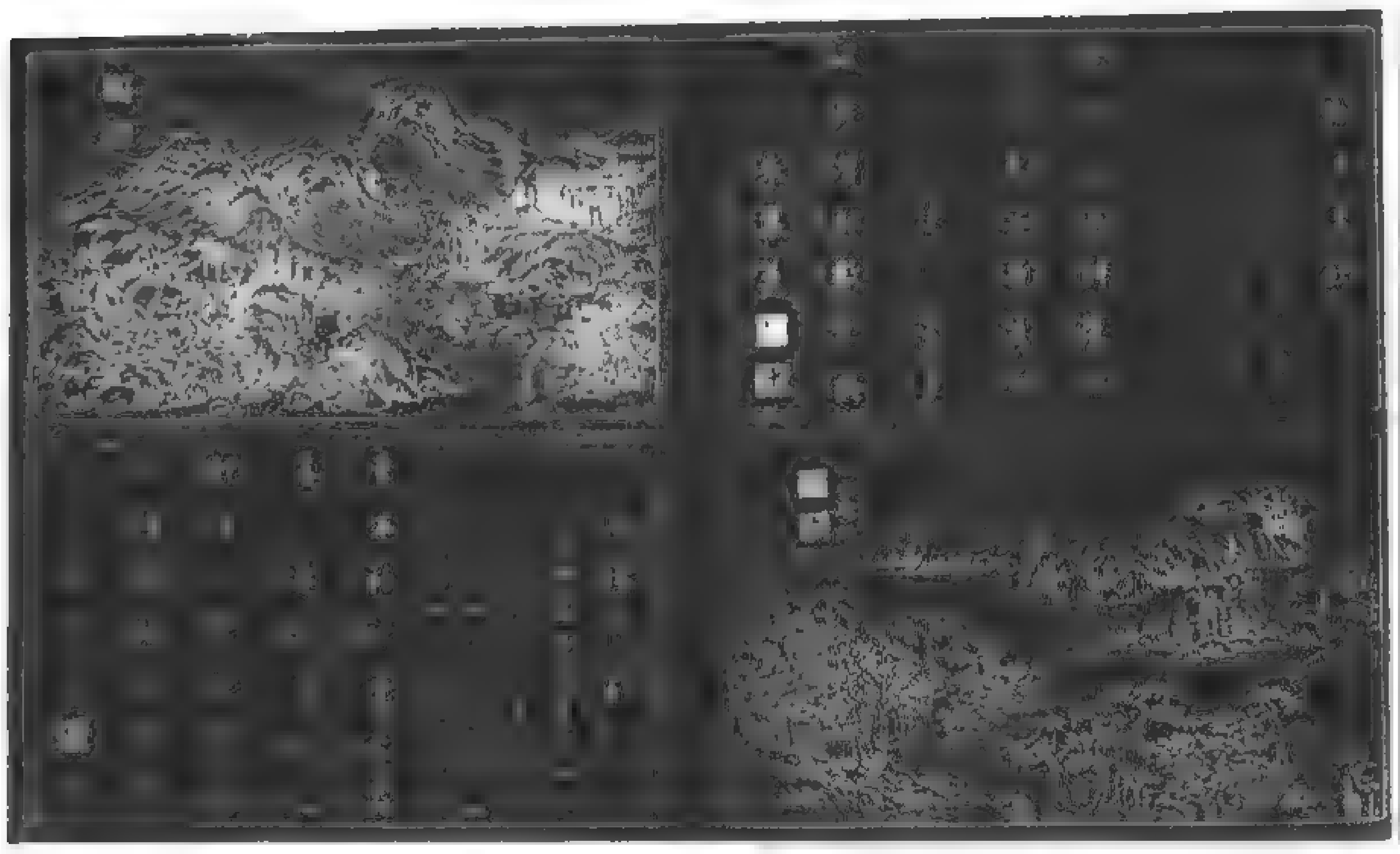
王铎（1592—1652），明末清初的书法家，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弘治年间官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降清后又任官至礼部尚书。曾与倪元璐、黄道周为明末同年进士，以书艺论，卓然大家，然王铎降清，作了二臣，故为人所轻。王铎行草，尤得力于颜真卿、《阁帖》、王献之，取法米芾，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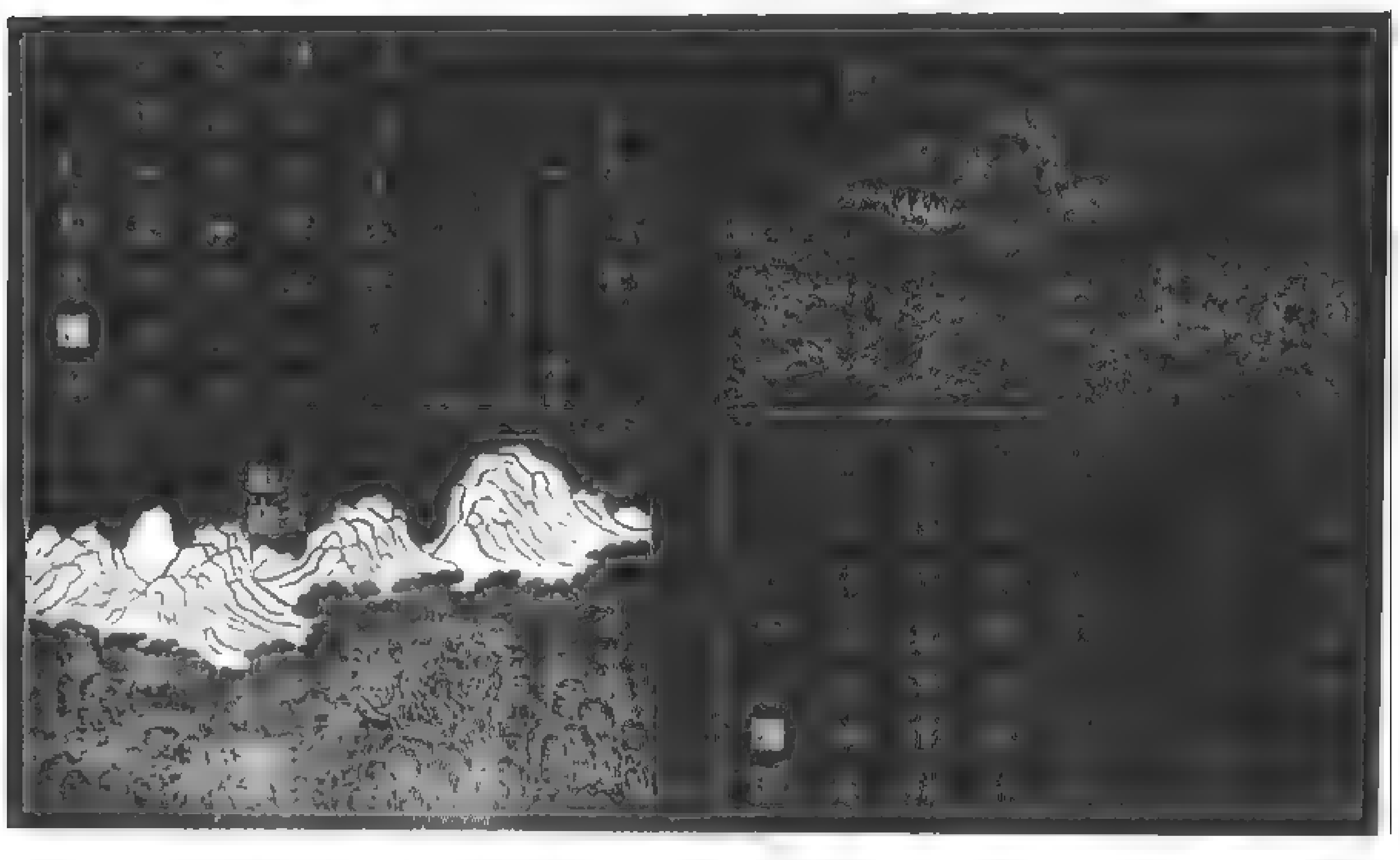
笔苍古遒劲，以纵横取法，在当时风行的赵孟頫、董其昌流派之外，另别树一帜，为晚明书坛巨擘。有《拟山园帖》集其书法，兼能画山水兰草，以沉雄见长。而其草书笔力千钧，法意俱足，极可师法。

小石阴刻有成化十九年，余洵草书，渊静解、传赞及姚合送别友诗两文。

现存西安碑林第六室。







117. 白衣大士像碑

清　康熙年间（1662—1722）　附刻于重修文庙石经记（明万历十七年刻）碑上。石高 214 厘米，宽 70 厘米。吴达画，张汧篆书题赞六行，行 16 字，卜年、卜世合刻。

画面上为山岩，傍有瀑布流下汇成小溪，岩下大士手持念珠，倚石上俯视溪旁孩童曲身捕捉水中禽物，人物造型秀丽，远近比例合度。全画使用线雕与减底雕混合刀法刻成，线纹精细圆熟，属清代一件很好的艺术作品。题赞篆书笔法也有功力。惟石刻无具体年月或干支记时，但卜年、卜世均是康熙年间著名刻工，因而记时当列为康熙年间。

现存西安碑林第一室。

118. 关中八景图

清　康熙十九年（1680）　此石为圆首方座，高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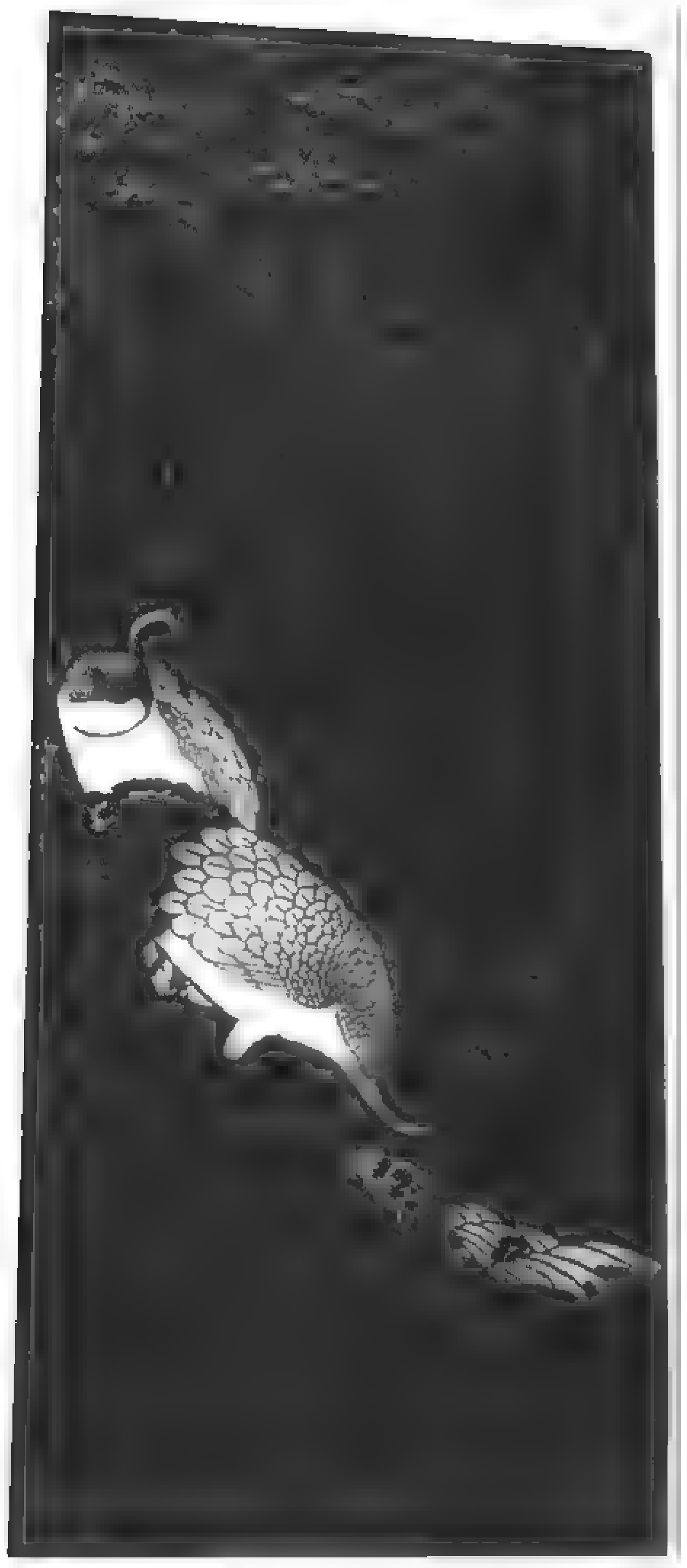
厘米，宽 84 厘米，分十截刻，由朱集义诗画并行书，周王褒题跋，楷书工整。周在丰钩朱，晋文煜、赵斌立石，高君诏刻字，杨玉璞刻画。冯绣篆额，名为《关中八景》。

“关中”是东起函谷关、西至陇关之间，故谓之关中。《关中八景》是描绘长安（今西安）周围名地名山胜景，因又称《长安八景》，此说大约起于明代，到清代流传渐广。八景计有“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柳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等八处胜景。石上线刻胜景八幅，并附八篇简文扼要说明其历史，且各题七言诗一首。书法行书秀劲，结体遒美，诗意清新，山水画格调也属上乘。题跋中有“读其诗而烟云万状，展其图而尽幽人，韵士之致”的描绘。被誉为少陵（杜甫）、摩诘（王维）再现。可见朱集义诗、画、书法皆工，为当时人所崇敬。石上刻画线条刀法亦极婉转圆熟，观其诗画，即能领会胜景，如置身其中。

现存西安碑林第四室。

119. 松　鹤　图

清　康熙十九年（1680）　此图绘刻在“关中八景图”碑阴，由朱集义画，冯绣篆额，周在丰过朱。



图上画松壑深处，有清泉激流，仙芝瑶草缘石而生，苍松之下石旁有两只白鹤；一作回首伫立，一在小溪旁觅食饮流，神采生动，刻工刀法亦能传神，而且又善于利用凹面效果，也就是说考虑到了拓印出来的黑白对比度，作得非常成功，使人能感到鹤的羽毛洁白可爱。

关于松鹤有如下的说法：《水经注》“抱朴子说：千岁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寿万岁。”又《搜神后记》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虚山，后化为鹤，归集城门华表柱上，有欲射之，乃飞，俳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始复归，城廓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即冲天而去，后人遂以松鹤为长寿仙之象征。

刻石上仅有庚申春日朱集义写，无具体年月，查

庚申为康熙十九年，画者、篆额者、过朱者均与“关中八景图”当系同时刻于一石两面，故列时代亦同。

现存西安碑林第四室。

120. 三圣母像

清　康熙二十二年（1683）　这像附刻于碑林补刻孟子诗碑阴。图上刻记事 17 行，行 4—10 字不等，为鄂洛记、朱珏画、卜世刻。

图上刻三圣母各抱婴儿坐于石上，配有山石溪流，画稿刻工亦佳，系陕甘总督鄂海之子鄂洛为其祖母享高龄，把供奉的三圣母像，命工匠刻石立于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第一室。

121. 虚中君子图

清　康熙三十八年（1699）　石为竖四方形，高 140 厘米，宽 41 厘米，上有题记 7 行，行 38 字。另有题诗两行。石上画竹石，题为虚中君子。石旁修竹数根，枝叶临风摇曳，景致逼真生动，刻工亦佳。

题记中贾铉引白香山养竹记文，以其爱竹清风高节，傲骨凌霜，故喜画竹。这图是他任观察使时，立石于关中书院的。

现存西安碑林第四室。

122. 宁静致远四字

清　康熙三十六年（1697）　此碑为竖方形，龙首方座，碑侧、碑座亦雕饰龙纹，高 310 厘米，宽 83 厘米，上书“宁静致远”四个楷书大字，由清康熙皇帝玄烨所书。

玄烨属我国历代帝王书法家之一，不仅善行书，楷书亦佳，其法多遵循法度而善于变化。前人评其楷法云："体格精严，笔法度化"，"备八法之楷模，兼诸家之美善"。虽系过誉之词，但从其书"宁静致远"四大字来看，字的结构笔画极为精严，神采也很炜焕，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凝练恢弘的气度，实为一般书家作品所少见的。

现存西安碑林第五室。

123. 太华山图

清　康熙三十九年（1700）　此图为竖方形，方座。高 140 厘米，宽 75 厘米，由清三秦观察使河东贾铉画并行书题记，李士龙、卜世合刻。

贾铉字王万，号可斋，山西临汾人，康熙时出守黄州，善画兰竹、荷花，名噪都下。此太华山图刻于清康熙三十九年。太华山，又名西岳华山，是我国著名五岳之一，位于陕西华阴县境内，有东、西、南、北、中五峰，主峰高 1997 米，峭壁千仞，山势雄伟，为关中著名的游览胜地。图下刻有华阴县城、西岳庙。沿山道上有云台观、太清宫、太华门，上行则径经玉泉院、王母观、莎萝坪、希夷殿、救苦庵、小坊、大上方、十八盘。再上则有回心石、青柯坪、云台峰、长春石室、千尺幢、猢狲愁、焦公岩、凤凰山、北丰坪、铁牛台、百尺峡、苍龙岭。最上为昌黎投书处、二十八宿、镇岳宫、南天门、下棋处、黑龙潭、落雁峰、仰天池、炼丹炉等。山形、祠宇、道路、奇石异草，均布局得远近适宜，比例合度、准确，是一幅有旅游价值的地域参观图。

现存西安碑林第四室。

124. 太白山图

清　康熙三十九年（1700）　图为竖方形，圆首方座，高 158 厘米，宽 59 厘米，正面刻太白山全图，碑阴刻有贾铉行书太白山祈雨记，书法结体紧密，遒劲，笔画流畅。

“太白山”又名太乙山，位置在陕西眉县境内，南临洋县，东界佛坪，西南与凤县接连，海拔4000余米，山势嵯峨，峰峦叠嶂，幽森绵亘，路径曲折，为关中最高山峰。山颠有大太白、二太白、三太白池，池水清澈鉴发，深不可测。相传唐贞观年间大旱，京兆（属长安）尹三十取其池水祈雨，恰逢天降大雨，以后这便形成了大旱祈雨，必取其池水之风俗。此图为康熙三十九年三秦观察使贾铉祈雨登山后作，李士龙、卜世合刻。图是由“清湫庙至山下三十里”画起，依次为三官池、大雪岩、雷神洞、二仙桥、香烟山、万笏山、独秀峰、下板寺、救苦岭、松花坪、雷神峡、孤魂洼、东天门、观云海处、二里关、金锁关。最高峰是太白三池，观星楼及佛池、玉皇池、龙池、凤池、三清池等胜景，山高气冷、长年积雪，寒气逼人，故有太白积雪之称，属关中八景之一。

现存西安碑林第四室。

125. 御书高松赋

清　康熙四十六年（1707）　此为长方形共四石，高分别42厘米，宽分别为90—135厘米。上书：玄烨临董其昌书《高松赋》全文。书法行体。

康熙，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世祖福临帝之第三子，年号康熙（1662—1722），在位61年。执政其间，实行了各种改革措施，使国家政治、经济都日益繁荣起来，在文化方面，他推崇儒学，开博学鸿词科、明史馆，并编纂《全唐诗》、《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佩文斋书画谱》等巨著。他也酷爱书法，喜欢挥毫。清人陈廷敬云：“皇上万岁稍暇，即撰文赋诗，抽毫染翰，虽盛暑隆寒，每至丙夜弗辍。”他与乾隆（弘历）称得上是开创清代前期书风的重要书家。康熙推崇董其昌，乾隆嗜好赵孟頫，结果近臣公卿至秀才举人，无不学赵、董。故康有为在《广艺双舟楫》中称：“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一时董其昌书画身价百倍。康熙皇帝不仅大力提倡董字，还广为搜罗其真迹入藏内府，而且又经常亲笔临仿，这篇“御书高松赋”则是玄烨临的董其昌书。书法圆劲相兼，温润流畅，于飘逸中有一种刚毅之气，这正是吸取了米、董之所长，无论用笔结体，神气韵味都酷类董其昌，几疑出自一人手笔，足见康熙行书刻意习董成效卓著。

现存西安碑林第六室。

126. 心画初机

清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共六石，各高30厘米，分刻刘墉行草和小楷真书“心画初机”内容笔迹。

刘墉（1719—1804），号石庵，字崇如，山东诸城县人，乾隆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他不但书名盖世，而且博通经史百家、擅长水墨芦花，工诗善对，精研古文辨考，且著有《石庵诗集》传世。

刘墉书法，初由赵、董入手，中年学苏轼，晚年学钟繇、颜真卿，又钻研阁帖，其行、楷力厚思沉，笔短意长，拙中含恣，生涩中带有稚气，丰貌骨劲。包世臣曾评“近世小真书，以诸城为第一”。

此“心画初机”墨迹中，内容有行书“自遗诗”、“复愁十二首”等。小楷真书有“伽阿多罗宝经序”和“中隐堂诗并序”这些都是研究刘石庵文才与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127. 文　赋

清　道光二年（1825）　这篇“文赋”全文分刻在高26厘米、宽33厘米的21块石上，每石10行，满行8字，由邓廷桢撰文并楷书。

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江宁（今南京）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曾先后担任安徽巡抚、两广总督、闽浙总督等要职，曾与林则徐共事，坚决主张严禁鸦片，两人是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挚友。据《清史稿·邓廷桢传》载：他曾写信给林则徐，表示愿“合力同心，防中国大患之源”，“十九年林则徐奉命至广东，廷桢与之同心协力，尽获趸船，积烟焚之，严私贩之罪，临以兵威，屡战皆捷。”使英侵略军在厦门丧胆逃遁。后由于投降派的诬害，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林则徐同时革职，谪戍伊犁。道光二十三年旻宁（道光皇）为了缓和朝中主战派的不满，释还了邓廷桢，为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等。在陕甘任职其间，他曾亲自查勘荒地，招民开垦，仍在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道光二十六年（1846），死于任上，后归葬于南京郊外灵山之下。宋翔凤在《双砚斋词钞（宋序）》中称：“先生持节数省，洁清自守，居处饮食，一如寒素，胸次坦白，耆欲尤鲜。”因此可说邓廷桢与林则徐，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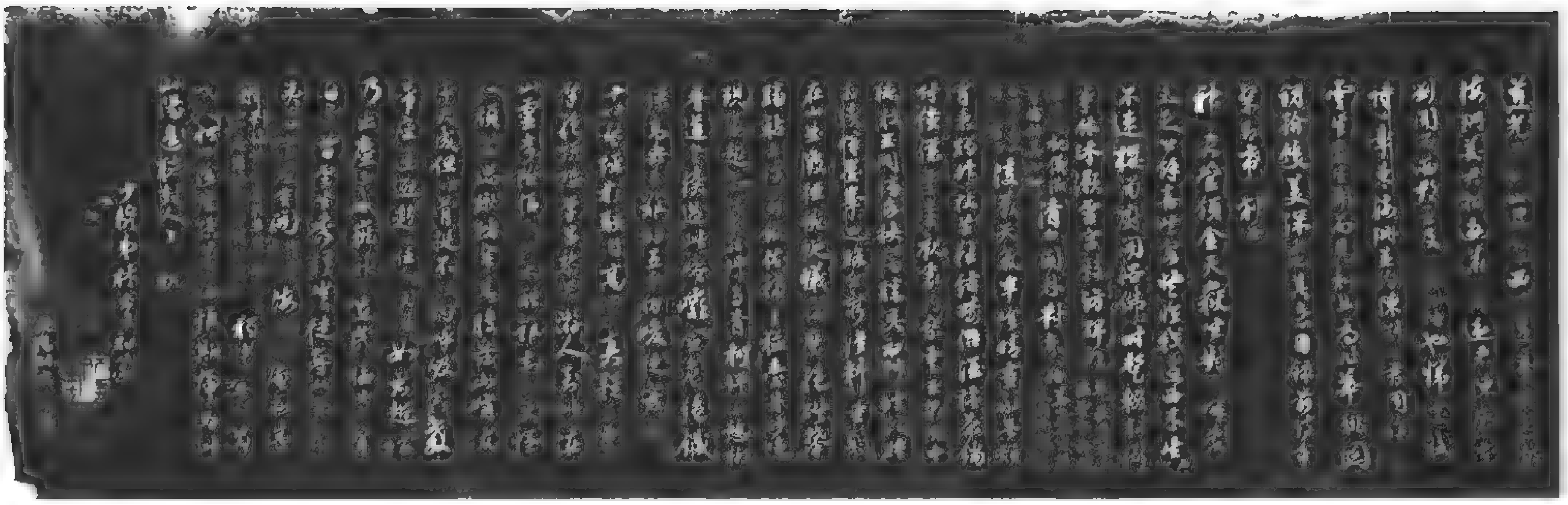
国封建社会末期，称得上是二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邓廷桢也工书法，善写楷、行、篆诸体。篆学“二李”（李斯、李阳冰），并得宋代篆书家徐铉笔意，字迹雍容刚直，雄健宏大，胸中浩然正气自然流于笔端，书品位高。小楷、真、行书是从唐褚遂良入手，而直入“二王”之室，举腕回锋，寓刚于柔，态致萧疏，真无一点尘俗之气。这篇“文赋”书法工整劲健，颇具唐人之风味，是其经心用意之作。他的字不多见，因此很为世人珍爱和学书者楷摹。

现存西安碑林第六室。

128. 林则徐游华山诗

清　道光二十二年（1845）　此石呈长方形，高 30 厘米，宽 102 厘米，35 行，满行 14 字。为林则徐书，刘笃刻石。



这首《游华山诗》是林则徐因禁鸦片遭馋言被清政府流放伊犁时路过陕西游华山时所作。

林则徐在政治上对外来侵略不妥协，一生治学态度严谨。对书法也下过功夫。他的字脱胎于柳公权。点画运笔、间架结构、分行布白，都有一种清新秀丽之态。此石书法遒劲可喜，独具风格，在晚清书法家作品中亦为佳作。

现存西安碑林第六室。

129. “福”字

清　（1644—1911）　石竖方形，高 151 厘米，宽 91 厘米，上有郭修文书一大“福”字。其字含意即：幸福、福气、福运等。《韩非子》载：“全

寿富贵之谓福。”此字书法正如题跋中所评“笔致森严若快剑长戟，笔势遒劲疑破地而揭云……”

现存西安碑林第五室。

130. 一笔“虎”字

清　同治五年（1866）　此石竖方形，高158厘米，宽83厘米，上书一大“虎”字草书，据题记知由西蜀马德昭书写，该马曾作过陕、甘巡抚，工书且善挥毫，西安碑林之中，留有他许多笔迹。此草书“虎”字，笔势雄劲飞动连绵，一笔而就，观后尤如亲临墨翰之境。

现存西安碑林第五室。

131. 大“寿”字

清　同治九年（1870）　石竖形方座，高229厘米，宽126厘米，马德昭草书大字“寿”。笔饱墨重，运转急速，刚劲有力，美不胜收。福、寿二字均属祝词，人们常以它作为贺词运用。

现存西安碑林五室。

132. 于右任草书正气歌

现代（1938）　石共六块，每块均高175厘米，宽53厘米，计18行，行13—18字不等，于右任草书，郭西安刻石。

于右任，原名伯循，号骚心，陕西三原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64年病逝于台北。他的书法，早已驰名中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书法家之一。他早年曾精研六朝碑版、墓志，工行、楷。后致力于草书的研究，曾编订《草书部首》，提倡《标准草书》。学识渊博，收藏宏富，曾将其《鸳鸯七志斋》中苦心经营、收集的汉、魏、六朝、隋、

唐等墓志刻石290余方，捐献给了西安碑林。于右任草书，是熔会了章草、今草各家的精髓，用笔凝重简洁，结体脱落大方，雄浑奇伟，仪态多变。晚年所书更入化境，随意浑洒，皆成佳作。于书《正气歌》，是体现其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原则的典范。《正气歌》是南宋文天祥在监牢里作的抒怀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此诗经于右任草书上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作。

下附《正气歌》全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或为辽东帽，清操历冰雪；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嗟余遘阳九，隶也实不力。
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
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
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

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
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
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
顾此耿耿存，仰视浮云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133. 杨松轩墓表

民国21年（1932）　此碑竖方形圆首，高181厘米，宽70厘米。张伯苓撰文，于右任楷书。

1983年由陕西华县征集入藏西安碑林。

134. 朱子桥纪念碑

民国35年（1946）　此碑竖方形，高233厘米，宽83厘米，冯玉祥隶书。

1984年由长安县征集入藏西安碑林。

三、收藏宏富的历代墓志

西安碑林收藏着一大批内容丰富，很少发表过的历代墓志，是碑林藏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0 年，于右任先生将其“鸳鸯七志斋”收藏墓志 290 余方，捐赠给碑林；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除将碑林旧存志石重新整理外，又把西安附近历年来各种工程建设中出土的墓志，全部收入碑林。截至目前，碑林所存墓志，仅汉、唐部分，总数已超过解放前所收藏的一倍以上；北魏墓志的收藏量，也远远超过全国收藏墓志最多的地方。这些墓志大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书法艺术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墓志，是人们为纪念死者，把他的经历、事迹和德行、功勋以及家世等铭刻于石，以志不忘。为防止因陵谷变迁而丢失，故深埋于墓中，借以流传久远，其性质和碑刻大致相似。散文体的志文叫“志”，韵文体的志文叫“铭”。石刻上有志无铭，称之为墓志；有铭无志，称之为墓铭；大多数是志、铭兼而有之，就叫墓志铭。习惯上把它们统统称之为“墓志”。

墓志之习，起源很早。“墓志”这个名称，据文献记载，始于南朝刘宋元嘉年间(424—453)，造型也是在刘宋时基本形成正方形的。到了北魏时期，魏孝文帝拓拔宏迁都洛阳(时在太和十八年，即 494)，禁止朝廷使用北俗语言和一切风俗习惯，尽力汉化，因而承袭汉、晋以来丧葬制度与撰刻墓志的风习，贵族阶层中盛行的用墓志随葬已成为定式。此后，梁、陈、北齐、北周、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也都沿用这个习惯，多用方形有盖的墓志(虽然其间偶有其他形制，如竖长方形、横长方形、碑形，甚至龟形的，不过均属特例)。尤其是唐代，连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死后，也要刻一方墓志，如 1955 年西安西郊土门出土的波斯人苏谅妻马氏的墓志铭，就是例证。

墓志使用虽开始于南方，但纵观全国墓志发现的地区，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多。西安一带尤多。

墓志除具有史料和雕刻艺术价值以外，其志文书体有真书、行书、隶书、篆

书各体，大部分出自当时名书法家的手笔，而且刻完即加盖入墓，很少受损伤，所以出土时多半石面光洁、笔画崭新，书迹完整。为今天的书法爱好者和考古工作者，以及历史学家们，提供了非常珍贵而且完整的研究资料。

古代墓志和碑石一样，刻制的过程是先用朱笔描写在石面上(因为石面颜色灰暗，用朱笔比较明显)，称为“书丹”，然后由刻工根据字迹刊刻。这种通过刊刻产生出来的字，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注意石面上刻的效果，例如方棱笔画，用毛书写，不经描画，是写不出来的，但经过刀刻，就可以收到方整厚重的效果；另一种是尽力保存毛笔所写点、画原样，企图描摹精确，做到“一丝不苟”。但无论哪一种刻法，其最终的效果，必然都已和丹书的效果有距离、有差别。这种经过刊刻的书法艺术，本身已成为书法艺术的另一品种。它数量上相当多，在书法艺术史上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此外，在魏、晋、隋、唐各代墓志中，还有一种未经书丹而直接用刀刻写的，今天称之为“单刀刻法”。用这种方法刻制成的墓志，也叫“急就墓志”。它比一般由文人书写的刻石，更能表现出劳动人民在雕刻艺术上的卓越才能和成就。这种刻法，多用于刻制宫人墓志，如西安碑林保存的由西安西郊三民村发现的《大唐宫人司制何氏墓志铭》和西安东郊韩森寨发现的《唐故银娘墓志铭》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在了解、研究碑石、墓志书法时，往往只注意其时代、书体、书者及撰者姓名等，而忽略了刻石工匠的姓名。前边已经提到，无论哪位书法家书写的碑文、墓志，既经刊刻，立即就渗进了刻者所起的那一部分作用。这些石工匠师们，虽然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但却又都是我们不能遗忘的无名艺人。碑林所藏墓志、碑石中，保存了一部分刻工的姓名和官职，是非常可贵的研究资料。特别是唐代名书法家中有经济条件者，他们所写的碑志，都是固定由一个或两个能工高手专门镌刻，如褚遂良书碑由万文绍刻；李邕书碑由黄仙鹤、伏灵芝刻；柳公权书碑由史华刻等。这些刻工，有的还有官衔，如集王羲之字刻成的《圣教序碑》，其刻工朱静藏，官衔是“武骑尉”，《大达法师玄秘塔碑》末记有“刻玉册官邵建和并弟建初镌”。又如《符璘碑》末书“中书省□□□官昭武校尉京兆周城折冲上柱国邵建和镌字”(按所缺三字当是“刻玉册”)。

西安碑林藏存的历代墓志，从书法、文辞方面看，北魏以前，书法上多纯守隶法，文字大部分都很简略，犹存汉代刻砖记墓的遗风。到北魏太和年间(477—527)，书法渐趋秀劲，文词典雅。东魏书法体势宽博，多含分隶遗意，文体是骈文同散文并用，表现出另一种风格。这种局面经北齐、北周延至隋。隋朝统治时间虽短，这一时期墓志的书法却俊爽秀整，接近了真书的成熟阶段。

上变北朝劲拔之气，下开盛唐秀丽之风。志文多用骈体。唐初基本上还是隋代风格，到开元、天宝（713—756）以后，书法逐渐趋于秀润，文体则多为散文了。

墓志的史料价值很高，除了提供史书无载的资料外，还可以起校正史书的作用。以墓志证诸史籍，有许多地方往往不相符合，这一般应以墓志所载为是，因为史籍流传人世，多有变故，墓志埋于地下，不易损伤。

墓志风习波及很广，汉族而外，兄弟民族及相邻国家，也多有受影响而为死者镌刻墓志的。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墓志很多，唐代也有发现，并且多有边疆少数民族及邻近国家的人的墓志，如碑林中保存的《米继芬墓志》和《苏谅妻马氏墓志》等，就是新疆人和波斯人的墓志。其内容涉及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多方面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以下就碑林藏石中比较著名的墓志，择要说明如下：

《元桢墓志》，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北魏墓志中时间最早的一块。刊刻这块墓志时，正是北魏尽力汉化的时期，这个特征在书法上表现得尤为显著；书体处在隶、楷转化阶段，秀整可观，在我国书法史上自成一格，实开隋唐楷书之先河。墓主元桢，是北魏恭宗的第十一个儿子，曾任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有武功，封南安王。太和二十一年死于邺，葬于洛阳城北邙山上。此墓志于 1926 年夏出土于洛阳北高沟村东南。

《元晖墓志》，刻于北魏神龟三年（520）。楷书，共 31 行，满行 31 字，河南洛阳出土。书法沉重劲拔，结构严谨而又奔放，可以说是隋《龙藏寺碑》及唐褚书《圣教序碑》的前驱。只是该墓志书法前瘦、后肥，可能是葬期迫近，为两人分刻，但各尽其妙，实为难得。据《北史・昭成子孙传》载，元晖为元德的儿子，但《魏书》却说是元中的儿子，依据墓志的叙述，证明《北史》记载正确。

此外，《元灵曜墓志》，书法遒劲，结体俊整，颇相近于驰名于国内外的《张猛龙碑》；《元崇业墓志》，书法秀润，间用篆书笔意，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志文中叙述崇业是元钦的儿子，《魏书》、《北史》上却没有说元钦的儿子是崇业，史、志互证，自应以志补史。

东魏《李挺墓志》，文体虽也是骈文体，书法却大部分带有八分书的意味，别具一格。

碑林中还收藏了不少北周和隋代的墓志，其中有许多是书法精美、文辞典雅的杰作。如北周《步六孤墓志》；隋《李和墓志》、《尼那提墓志》、《田行达墓志》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墓志中书艺水平较高的作品，特别是《李和墓志》，书法瘦劲俊秀，字体近似楷书，略有隶书余意，是我国书法由隶向楷过渡的可贵资

料之一。

唐代的书法，奠定了1000多年来中国书法楷、行体的基础。碑林藏存的墓志中这一时期的佳作很多。如《南川县主墓志》，是书法家韩择木的真书笔迹，韩择木是盛唐分隶名家，传世的作品多是八分隶体，其真书极少见。而这块真书墓志，字体秀劲，类似虞世南的笔迹，为唐墓志中一件佳作。《张去奢墓志》，书法秀润，为裴冕所书。《屈元寿墓志》，书法圆劲，为张少悌书写；《高元珪墓志》，书法遒劲而妍美，是顾诚奢写的八分书体，唐代诗人杜甫就曾赋诗称赞过；《冯均衡墓志》，是张说撰文；《会王李钟墓志》，是诗人白居易撰文；《杨执一墓志》，是唐代大学士贺知章撰文；《李虚中墓志》、《苗蕃墓志》，是韩愈撰文；《李绍墓志》，不但书法秀整，颇似隋人，并且从志文知道李绍的祖父李珣，曾任过隋营建新都大监，但《隋书》漏载，因而它补充了长安城建筑史资料。唐《宋伯康墓志》，是1982年在长安县郭杜镇一带发现的。从墓志得知宋伯康的伯父崇望是“内侍省给事”，父亲守义是“赠骠骑大将军”，他本人字安耆，也曾在唐代居官，大中四年(850)死在长安修德里，第二年埋在京兆郡长安县义阳乡，“其村曰邓其原，曰高阳府……”等等。这一记载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城郊区乡里提供了宝贵资料。《王定墓志》，志文中介绍王是唐初的第一流画家；《程修已墓志》，称程是晚唐名画家周昉的弟子。从《唐工部尚书杜公长女某柔墓志》，可知其曾祖父是中唐时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佑；其祖父式方为桂管观察使，赠司徒；其父悰，任工部尚书，判度支；其叔父是晚唐诗人杜牧。这些记载均与史书相符合。这方墓志是1983年在长安县大兆乡司马村发现的，为我们考证杜氏一门族望关系和杜氏祖茔地，以及研究唐代郊区乡里提供了新的资料。《刘世通夫人王氏墓志》，是未经“书丹”而直接刻在石头上的“单刀”墓志，笔法生动有致，可看出是由汉代草隶演变而来，在墓志书法中别有新趣。

在碑林收藏的唐代墓志中，还有不少反映我国边疆民族和外国人在唐朝社会的活动的内容。如1954年从咸阳底张湾出土的唐贞观十六年刻的《大唐左卫将军考城公独孤开远使君墓志铭》，1973年从昭陵出土的唐上元二年刻的《阿史那忠墓志铭》，以及1956年西安西郊枣园村出土的唐开元十二年刻《阿史那毗伽特勒墓志铭》等，从志文中可知道他们都是突厥人，从1955年西安东郊岳家寨出土的唐天宝二年刻《唐故九姓突厥契苾李中郎墓志铭》可知墓主人是回纥族，从1973年昭陵出土的唐上元二年刻《唐阿史那贞公墓志铭》，知道归附唐朝的还有铁勒诸部中最强大的薛延陀。而1972年乾县出土的唐垂拱元年刻《大唐故右卫员外将军燕国李谨行墓志铭》的主人，是靺鞨族人；《阎

守元墓志铭》的主人是蠕蠕族的后裔;《夫蒙锽墓志铭》的主人是羌族人。另外,从唐《安万通墓志铭》(砖刻)和《苏谅妻马氏墓志铭》知道他们的先祖是安息国及波斯人。这些人之中,有的是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有的是因战争失败或因政治需要质于唐朝的外国人士;有的是仰慕中国文明远道而来参观学习的异国友人、宗教徒等。他们到中国后,长期与中国人民生活在一起,感情融洽,共同劳动,互相影响,死后也像中国人一样树碑刻志,埋葬在长安城近郊;有的还因受统治阶级赏识或器重,死后有陪葬在帝王陵园的殊荣。

碑林藏石中由宋到清各代的墓志数量比较少,就书法艺术来讲,它们不及魏、晋、隋、唐的作品,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总之西安碑林所藏的内容丰富的历代墓志,绝大多数是造型华丽,文字繁缛、书法精美,它们不仅颇详尽地记述了各代贵族地主和大小官吏们的生前事迹和死后荣耀。而且不少志文内容还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目前这些墓志正在抓紧时间整理、印刷出版,以供考古、史地、文学、艺术等专业工作者研究参考。

1.元桢墓志

北魏　太和二十年(496)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67 厘米,志文 17 行,满行 18 字,共计全文 285 字。该墓志是 1926 年夏由洛阳东唐寺门出土。1940 年经近代已故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收藏后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主人元桢,鲜卑族,本姓拓跋,是北魏恭宗的第十一子,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封为征南大将军,中都大官,又迁内都大官。高祖即位,拜凉州镇都大将军。后又以忠职和治理地方功著,加都督西戎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等职。后因贪财聚敛而坐罪。《通鉴》中载:"初魏朝闻桢贪暴,遣中散閭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赂,为之隐,事觉,文祖亦抵罪。"《魏书·南安王传》云:"南安王桢以懿戚之贵,作镇关右,不能洁己

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壅绝诉讼，货遗诸使，邀求虚称，二三之状，皆犯刑书。”又称“今者所犯，事重畴日，循古推刑，实在难恕”，说明元桢犯罪事实确凿严重。但当朝群臣都以元桢为景穆皇帝之子，而都说情请求给予宽恕。后免去死罪，削去官爵，废为庶人，禁锢终身。以后又因元桢随驾南征，出谋划策，颇受文帝赏识，又被重新起用，封为南安王，镇北大将军，祖州刺史。据墓志载：“太和二十年八月壬辰朔日癸巳薨于邺”，死后葬于洛阳北邙山。其时，因恒州刺史穆泰谋反之事涉及元桢，谓：“桢知而不告，虽薨，犹追夺爵封，国除。”所以《元桢墓志》的袭官和志文均都很为简略，以避不荣之事。

而这方墓志从时间上说，属目前所发现的魏墓志中最早的一方。书法楷书遒美严整，在魏墓志中所不多见。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出现了南北两宗，尤其北魏的书体，风格更为独特。这和北朝各民族的融合有很大的关系。北魏迁都洛阳后，为了促使鲜卑族汉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又由于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所以在墓志和造像题记上所反映出来的书法，也由初期的粗、杂而走向规范化，同时在古拙敦厚中显现出豪爽劲健的气势，这在龙门造像碑题记和以后出土的墓志中，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典型风格。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墓志廊。

（藏石编号 1060）

2. 元简墓志

北魏　太和二十三年（499）　志呈方形，高 73 厘米，宽仅余 33 厘米，右后段残缺，字存 8 行，满行 18 字。盖篆书 10 字。元简是北魏文成帝拓拔浚的第四子，字叔亮。所以墓志载有“齐郡王简，字叔亮，高宗之叔子，皇帝之第五叔”之句，此载多与《魏书・文成五王传》相吻合。在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太和年间，被封为齐郡王，累官太保。孝文皇帝仁孝，以诸父零落，存者唯简，每见礼遇甚隆。简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死于北魏太和二十三年，葬于河南洛阳（魏都城）城北。此志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 年由洛阳城西北高沟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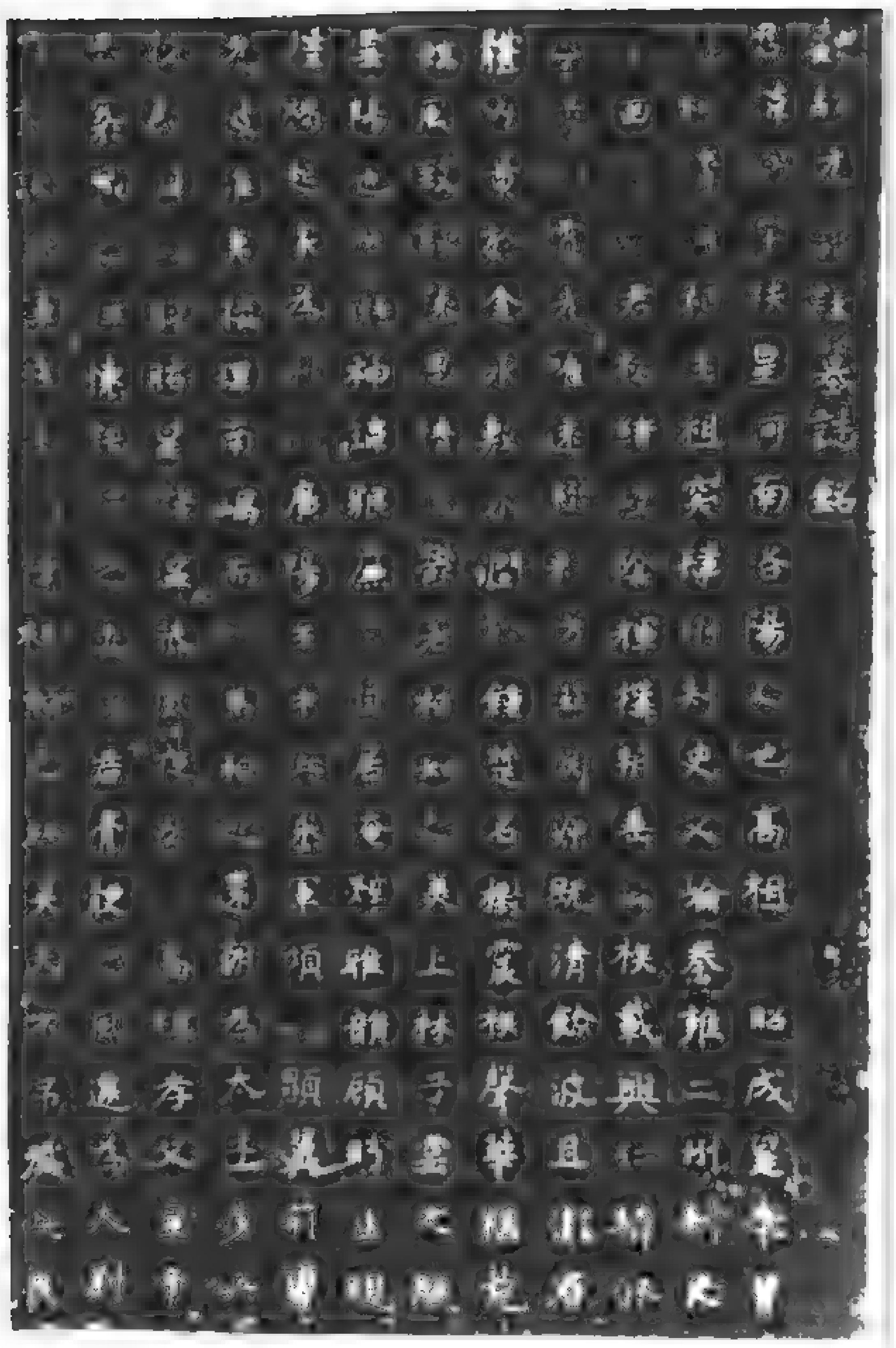
志文文词简拙，但楷体书法遒丽俊秀，挺拔有力。《墓志集释》有著录及考证。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墓志廊。

（藏石编号 1173）

3. 元 弼 墓 志

北魏　太和二十三年（499）



此志呈正方形，高宽各60厘米，20行，满行20字，书法楷书秀丽劲健。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年由洛阳城北姚凹村东南出土，1931年归三原于先生右任。"1940年又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云：志称"弼字扶皇，高祖昭成皇帝，曾祖根清河桓王，祖突肆州刺史，父嵛秦雍二州刺史陇西定公。"考《北史・昭成子孙传》"陈留王虔，昭成子纥根之子。虔兄顗，以功赐爵蒲城侯平芦太守。顗卒，子嵛袭爵，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进爵陇西公，卒谥定。"志之根，即传之纥根，殆根名而纥根其字，亦犹常山王素之字素连欤？传不载纥根子顗，即志之突；而官肆州刺史，则又传所略也。志叙嵛爵谥与传合，然志之秦雍二州刺史与传之秦州刺史小异，盖卒后赠官。传称"嵛卒子琛袭爵"，而不及弼，此志可补史缺，志称"弼起家为荆州广阳王中兵参军，允彼淮夷，接理南嵎。"以《太武五王传》及《高祖纪》证之：广阳王即元嘉，淮夷谓南齐也。弼乃宗室中有文才者，故志以相如美上林，子云赋云阳拟之。志又称"赵郡李珍悲春秋之无始，托金石以遗文"，与李奖铭王诵墓志同例。珍名不见于史，疑李顺之裔。

罗振玉《丙寅稿》考证从略。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64）

4. 元定墓志

北魏　景明元年(500)　这志呈正方形,高宽各53厘米,13行,满行14字,书法楷书,文词简拙。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2年阴历十一月初四日,洛阳城北高沟出土,无冢,同时出陶器不精。”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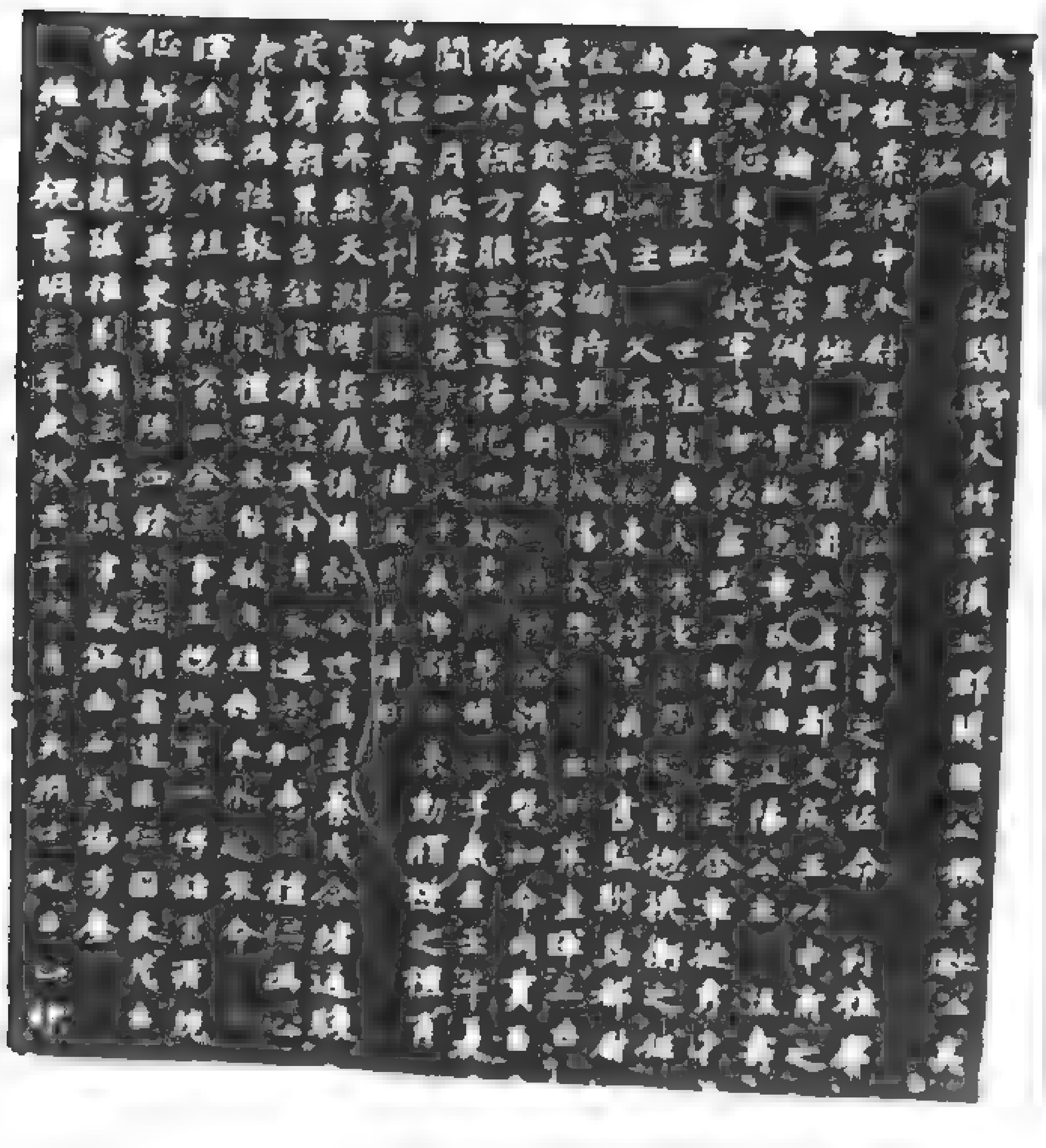
《墓志集释》载:定为青、雍二州刺史,京兆康王第四子。志称“广平内史前河间王元泰安讳定”,不记行事及卒之年月,定再无可称者。《景穆十二王传》京兆王子推子太兴,太兴弟遥,遥弟恒,不及定及定之子裔,此志可补史缺。

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18)

5. 穆亮墓志

北魏　景明三年(502)　此墓志为四方形,高66厘米,宽59厘米,志文20行,满行22字,书法楷体俊美挺劲。墓主人穆亮,字幼辅,北魏献文帝(拓跋弘)时,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长公主,封长乐王。孝文帝(拓跋宏)时,以征南大将军护西戎校尉,击走吐谷浑。宣帝(元恪)即位,拜尚书令、司空、封顿丘公。死于宣武帝景明三年,葬于洛阳城北邙山。志文标衔顿丘郡,按《魏书・地形志》有顿丘郡,晋置,领县四。文铭词内有“风勇冀东泽流陕西”之句的“勇”字,疑为芳字的别体。志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5年出土于洛阳城东北西山岭西南土冢内,与亮妻尉太妃墓志同时出土。《汉魏六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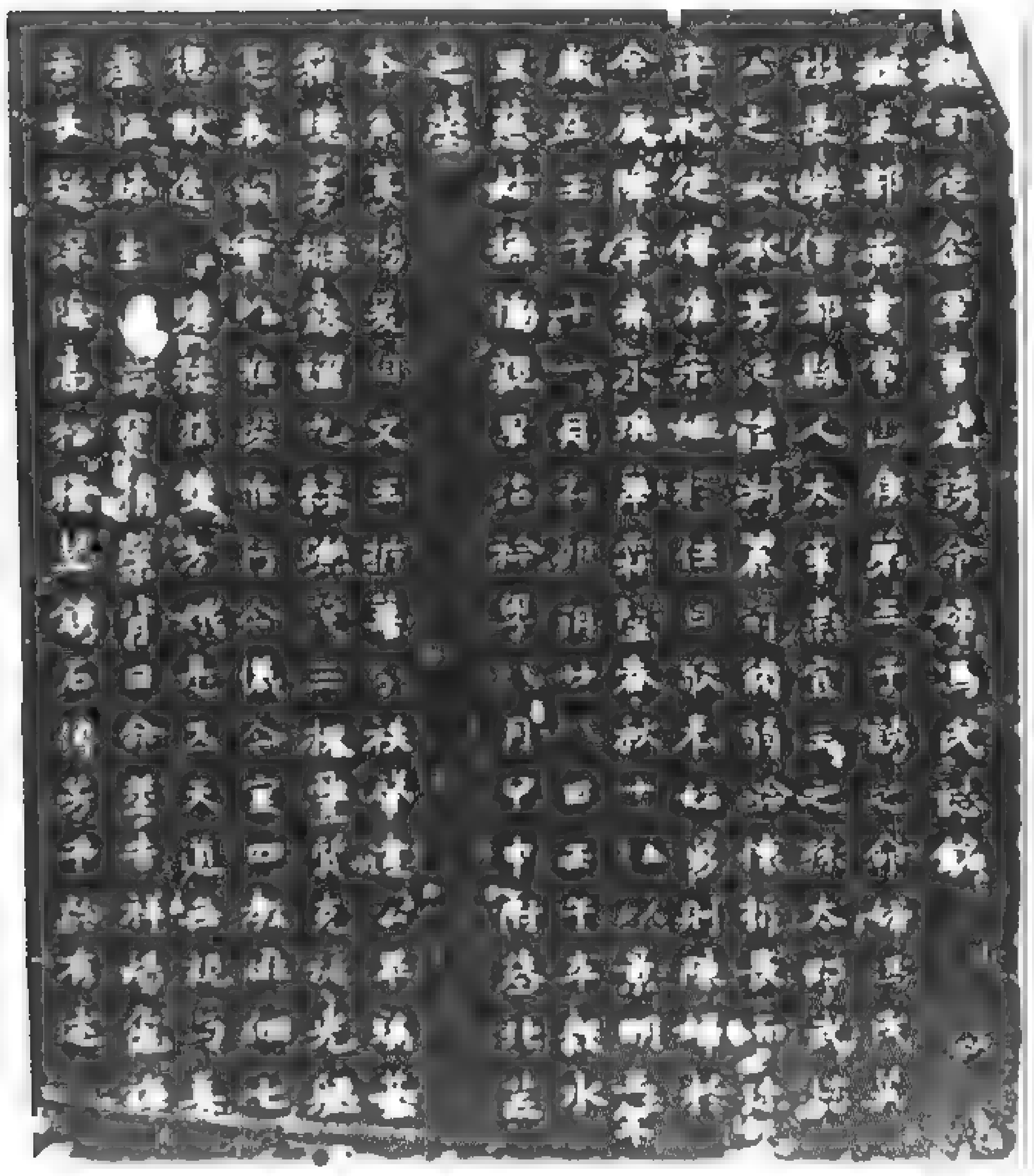
墓志集释》及罗振玉《松翁近稿》均有考证和著录。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第二墓志廊。

(藏石编号 1064)

6. 元诱妻冯氏墓志

北魏　景明四年(503)　此志呈四方形,高 60 厘米,宽 53 厘米,15 行,满行 18 字,书法楷书,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3 年洛阳城北安驾沟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题"司徒参军事元诱命妇冯氏。"又称"冯氏为吏部尚书常山侯第三子诱之命妇。"《考景穆十二王传》"南安王桢子英,世宗初以军功拜吏部尚书,进爵常山侯。"冯氏卒于景明三年,正英进爵常山侯时,故志称诱为常山侯子也。《元诱墓志》载:"诱正光元年薨于岐州,年三十七",知生于太和八年。下数至景明三年,诱年十九,冯氏年十八。时秀名未显。志称"诱司徒参军事",传与诱志俱不及,盖以位卑略之,志称"冯氏为太师武懿公之女。"《考外戚传》"冯熙薨,有司奏谥,诏曰可以威疆恢远日武,奉谥于公。"元澄妃冯令华、元悦妃冯季华、元显魏妻冯氏,与诱妇为同父姊妹。诸志亦俱云"武王女",无作武懿者。此志盖衍懿字。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85)

7. 张整墓志

北魏　景明四年(503)　此志呈四方形,高 39 厘米,宽 35 厘米,16 行,满行 16 字,书法楷书。志称张整源出南阳郡白水县,系以郡望称。《魏书·宦官传》有白整,《墓志集释》订为同一人是对的,按传志均无改姓之说,但据志称

"君以乡难入京，奉策宫掖"，疑当入宫时，即冒姓名为白，而史书就从实录，故曰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此志标题为墓志铭，但志后不书铭，是为异例。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9 年由河南孟津西四十里王庄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张整字菩提，上党刈陵人。世祖太平真君中以乡难入京，高祖授以太官令，除中给事中，迁中常侍立志将军云阳男，加大长秋卿虢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事。春秋六十，景明四年薨于第，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男如故。"案《魏书・宦官传》载："白整因事腐刑，少掌宫掖碎职，稍迁至中常侍。太和末为长秋卿，赐爵云阳男。世宗时封其妻为云阳县君。卒赠平北将军并州刺史。"传志互校，知为一人。传失载整字里及年寿，志不及妻封县君事，赖志传互补知之。整事迹又散见《后妃传》、《释老志》，亦作白整，与本传同。予比干墓文碑阴载侍从诸臣有"中给事录大官令上党郡白整"，与志称"整上党人"亦合。乃志独作张整，且云"源出南阳白水"，殊难索解。案赵明诚《金石录》二十一后魏《化政寺石窟铭跋》云"《北史》及《魏书》有宦者抱嶷，传云自言其先姓杞，后辟祸改焉。今碑题泾州刺史杞嶷造，疑后改从本姓尔。"碑以抱嶷为杞嶷，与志称白整为张整同例。

现存碑林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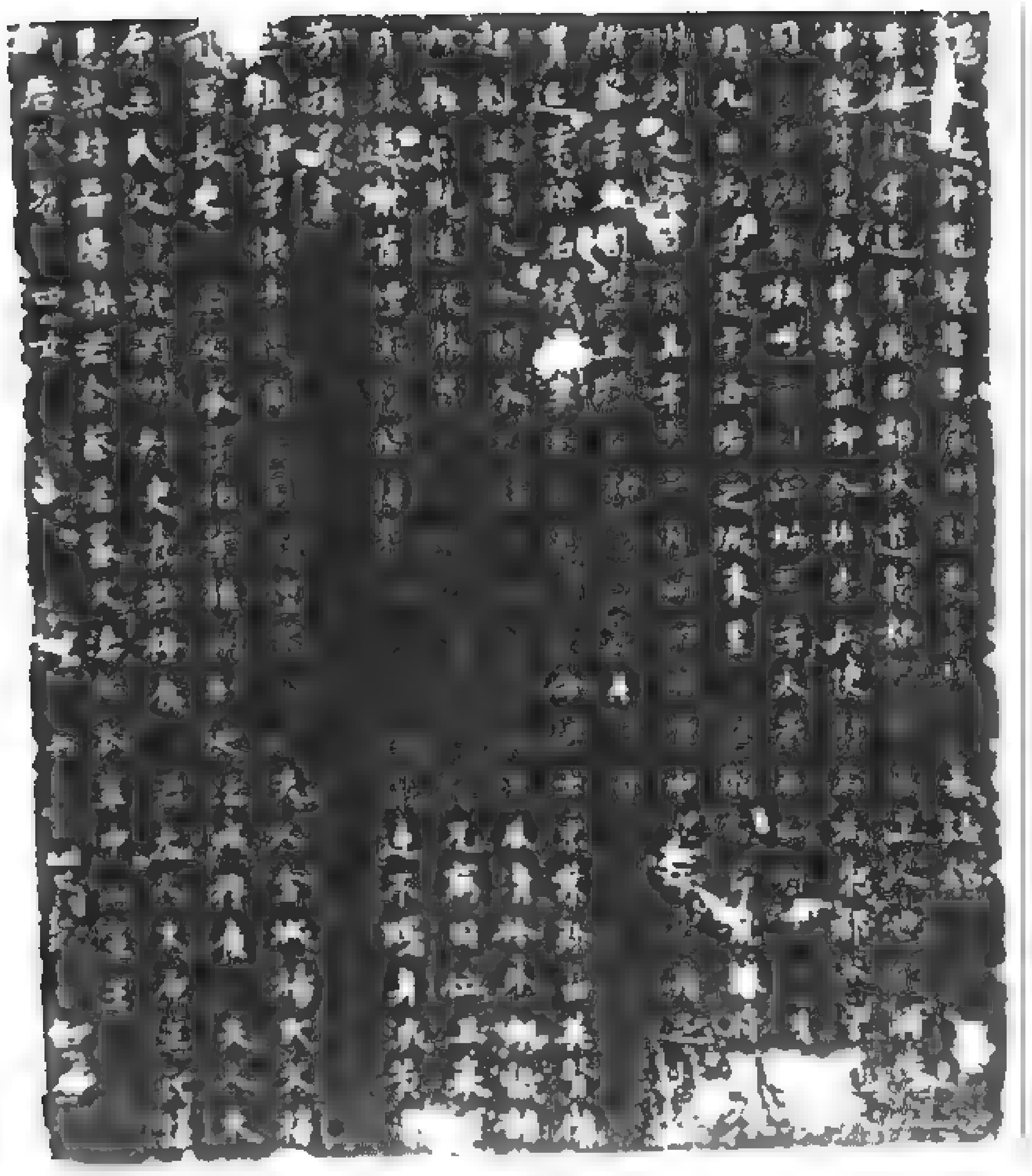
（藏石编号 1184）

8. 李蕤墓志

北魏　正始二年（505）　此志呈四方形，高 49 厘米，宽 42 厘米，17 行，满行 23 字，书法楷书秀劲，《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31 年此志出土洛阳城东北四十里省庄东，俗名御史冢。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蕤，附见《魏书・李宝传》、《北史・序传》，传志互校多合。惟志称"弱冠侍御中散符玺郎中，转监御令，春秋四十二，正始二年十一月薨，谥简；传俱不及。又称"夫人太原王氏，父洛成太宰中山宣王。"《魏书・恩幸

传》"王睿字洛诚，女妻李冲兄子延宾"；可作洛成为异耳蕤卒，祔葬覆舟北原李



父司空文穆公神茔之左。文穆公卿李冲。冲传"葬覆舟山近杜预冢"，与志正合。《李宝传》"蕤长子讠永字义兴。讠永次弟义慎。第三弟义真，第四弟义远，第七弟义邕。"盖讠永居长，义邕最幼。义邕为讠永七弟，知蕤子可八人。志云八男与史正合。讠永、《北史·序传》作谚，均误，当从元子邃妻李艳华墓志作误。义慎、序传作义顺，未知孰是？蕤子尚有三人，其名未详，书缺有间，不可知矣。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93）

9. 奚智墓志

北魏　正始四年(507)　　此志呈圆首碑形，高 75 厘米，宽 40 厘米，14 行，满行 17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 年出土河南孟津城西四十里田沟南岭。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墓志集释》有著录并引罗振玉《丙寅稿》详细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19）

10. 元鉴墓志

北魏　正始四年(507)　　此志呈四方形，高 43 厘米，宽 46 厘米，19 行，满行 19 字，志文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8 年由洛阳城北前海资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鉴字绍达，道武皇帝玄孙，河南王之曾孙，成王之孙，简王之子。考《道武七王传》"河南王曜薨，长子提袭，改封武昌，薨，谥曰成，子平原袭，薨，谥曰简，长子和为沙门，以爵让其次弟鉴。"传志互校：成王谓提，简王谓平原，鉴盖平原仲子也。鉴年四十三，传为四十二。传云谥悼，志独未及盖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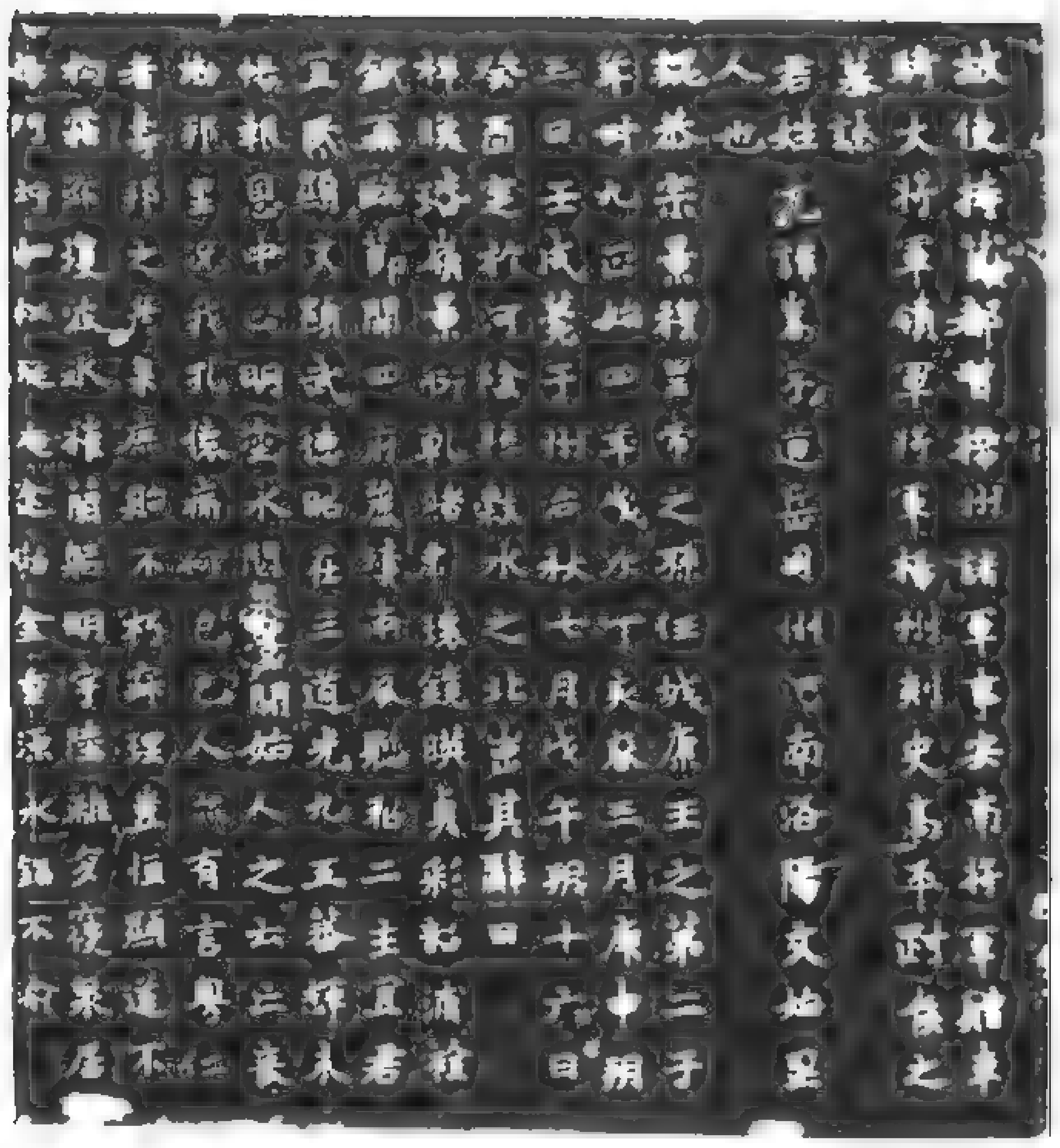
在葬后故耳。志题“大代魏武昌王墓志铭”；代魏连文，与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文例正同。《崔浩传》“代魏兼用，犹彼殷商”；其此之谓欤？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57）

11. 元嵩墓志

北魏　正始四年（507）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0 厘米。17 行，满行 17 字，书法楷书，笔迹劲健，据《洛阳出土时地记》载：1932 年由洛阳城西柿园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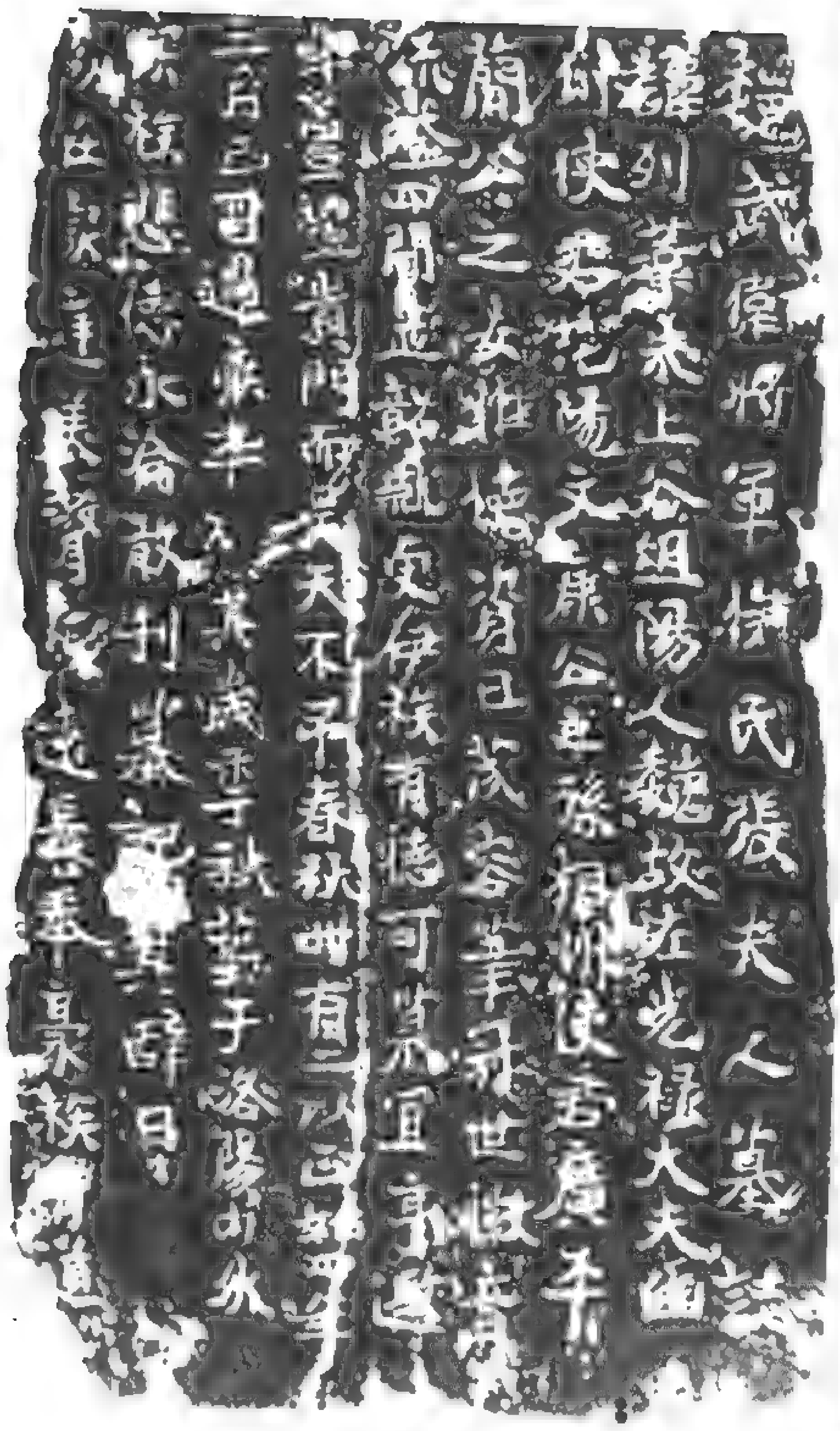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考证，嵩字道岳，任城康王云第二子。以校《魏书·任城王云传》。传称“嵩破萧衍将于淮西，后为苍头李伯谋害”；志云“人之云亡，哀恸邦里”；亦暗示其屈死，但没有明言。嵩卒于正始四年三月，年三十九岁，赠刺史高平侯，传具不提，今从志知，传云谥刚，均与志合。

此志与现存西安碑林的元桢、元简、元遥、元定、穆亮等三百余方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等墓志，原是现代名书法家于右任于 1924 年在河南洛阳从古董商手里购买到的。那时陇海铁路才通到豫西灵宝县，数百方志石运到西安很是困难，因而，当时就全部运到北京西直门内菊儿胡同的一座旧王府保存起来。1935 年冬季，于右任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时，面托杨虎城将军设法运回西安。经过很多周折，终于 1940 年运回西安，捐赠给西安碑林，由其收藏。

1952 年，陕西碑林博物馆将其中部分精品，陈列出数十方，镶在碑林第二室，第三室、第四室之间左右廊壁上，供广大书法爱好者和广大观众临摹、欣赏。

现存西安碑林第一墓志廊。

（藏石编号 1152）



12. 武卫将军侯氏张夫人墓志

北魏　正始四年(507)　此志呈竖方形，高 42 厘米，宽 25 厘米，两面刻，正面 9 行，行 12—20 字不等，背面 3 行，行 12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出土时地不明，石裂后玉堂市得以生漆粘之，广庆按志字似为镵凿而成，未书丹，题曰中侯氏之候似俟以尹疑莫能明。"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229)

13. 元融妃穆氏墓志

北魏　永平二年(509)　此志呈四方形，高 39 厘米，宽 46 厘米，15 行，满行 20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35 年由洛阳郑凹南地路西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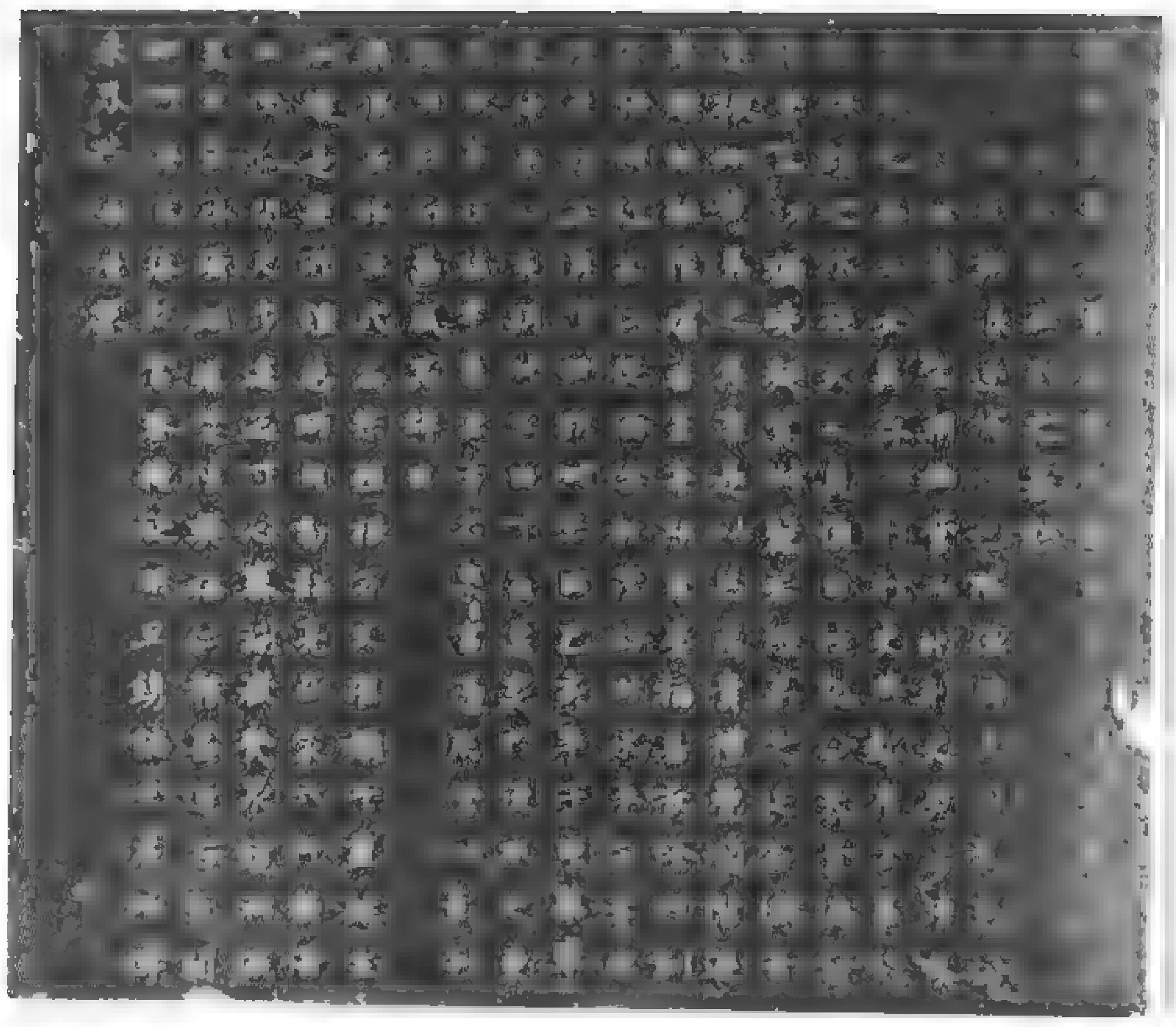
按志载章武王名元融，为南安王元桢元孙，以融后妃卢桂兰志证之，知融有二妃，穆氏为其前妃与融合葬，据《洛阳出上石刻时地记》载，穆氏墓志与元融墓志同坑出土。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63)

14. 元愿平妻王氏墓志

北魏　永平二年(509)　此志呈四方形，高 56 厘米，宽 64 厘米，20 行，



满行18字，书法楷书挺秀，为一佳作。按志文记载，夫人为安定王第二子给事君妻。以《魏书·安定元休传》改之，休长子安，幼年早卒。次子燮。燮弟愿平，初拜员外郎，后迁给事中，“清狂无行”，“悖恶日甚”，曾被免官禁锢。解禁后，又“坐裸其妻王氏于男女之前，又强奸妻妹于妻母之侧。”以不道处绞刑，会赦免，黜为员外常侍，是夫人王氏即愿平之妻。志题“安定靖王第二子给事君妻”，是因长子幼卒，略书次序。志铭中有“六行独悟，四德孤闲，尺步逶迤，寸心蹇渊”之句，亦隐示所配非偶，谀墓文类多如此。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5年洛阳城北徐家沟村东北陵上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夫人乐浪遂城人，燕仪同三司武邑公波六世孙，圣朝幽营二州刺史广阳靖侯道岷第三女。”案王氏世为高句丽乐浪巨族。王桢墓志。“桢，燕武邑公波六世孙。”《周书·王盟传》“其先乐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此二人同夫人同行辈。书缺有间，未由考矣。

罗振玉《松翁近稿补遗》考证从略。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084）

15. 杨阿南墓志

北魏　永平四年（511）　此志呈四方形，高41.3厘米，宽46.8厘米，无盖，志文21行，行19字楷书，据墓志载杨阿南为杨懿第七子，杨播之弟，死时年仅14岁。墓志书法楷体洗练，偏平结构的字体很多，常常可见使用起笔藏锋技法的笔画，还有“以”字作篆体、“之”字作隶体，“迺”（乃）字收笔带草书风格，是这一时期的新风。此志1962年出土。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16.元保洛墓铭

北魏　永平四年(511)　此志呈四方形,高42厘米,宽39厘米,12行,满行12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年洛阳城北姚凹村村东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保洛为昭成帝后,其名不见于史。志叙曾祖素连、祖贷毅、父太拔侯,爵位甚详,而不及保洛行事,盖以位卑略之矣。昭成子孙传常山王素四子,曰可悉陵,曰陪斤,曰忠,曰德,而不及贷毅,(《元和姓纂》四"常山王寿鸠生遵,遵生素达,素达生羽邻忠倍斤尉货敦菩萨淑。"据此志知素达当作素连,货敦当作贷毅,均字之讹);故太拔侯及保洛,传亦不及。志载素连历官与元侔、元诞、元智诸志多合;惟征南大将军传与他志并作征西,又得铜虎符元诞墓志属之常山王遵为异耳。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33)

17.杨颖墓志

北魏　永平四年(511)　此志呈四方形,无盖,高51.5厘米,宽48.4厘米,文24行,行22字,1962年陕西华阴县西五方村出土。

据墓志载:杨颖,字慧哲,是"汉太尉震之十二世孙,晋尚书令瑶之七世孙,上谷府君珍之曾孙,清河府君真之孙,洛州史君懿之第三子,杨播之弟,官至华州别驾,曾以文才著称于世。"此记载与《魏书》、《北史》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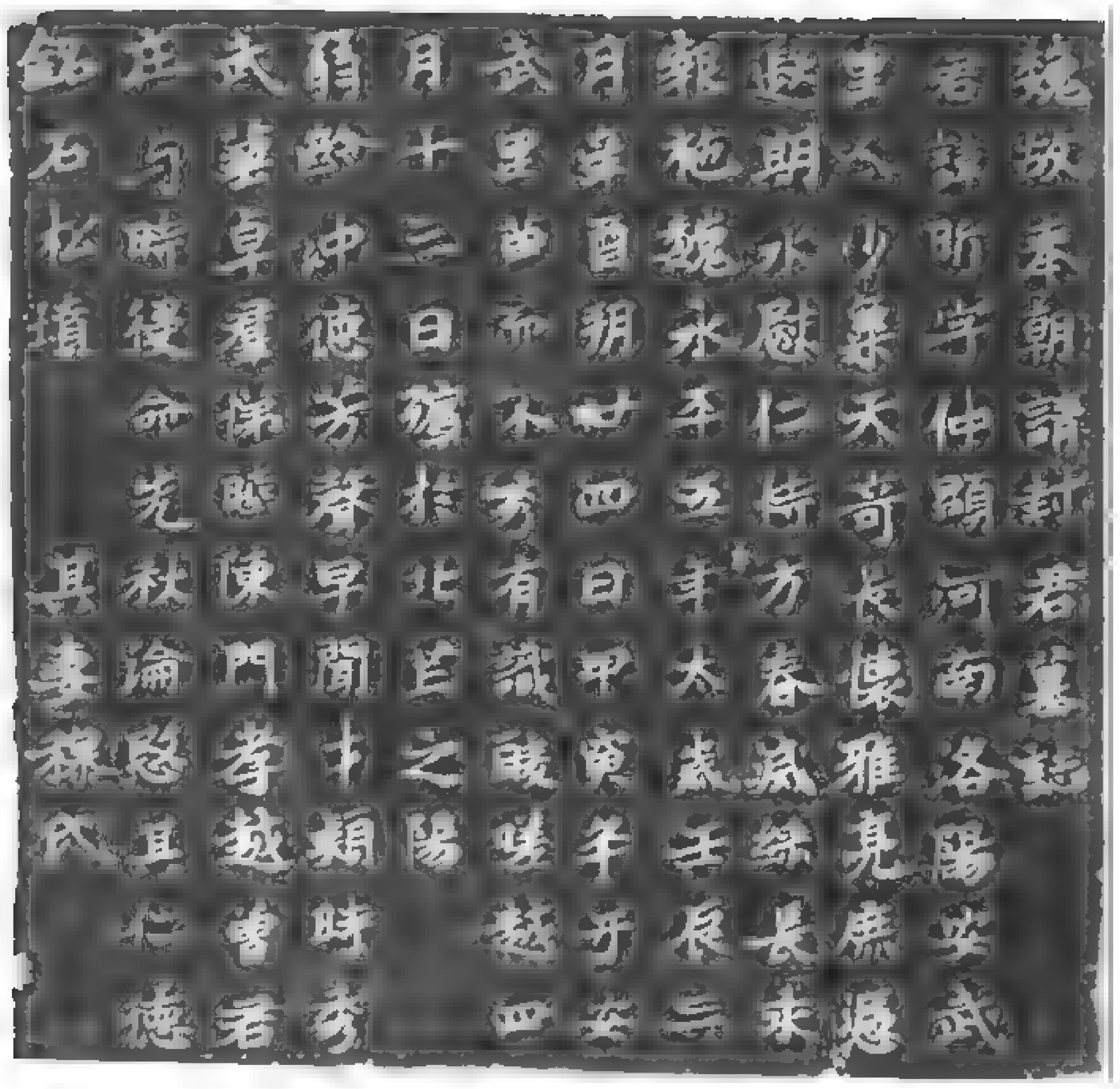
志文书体楷法笔致劲拔,多用别字,别具情趣。

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

18.封昕墓志

北魏　永平五年(512)　此志呈正方形,高宽各为27厘米,12行,满行

12字，书法楷书劲丽，《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0年，洛阳城北徐家沟村东南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昕字仲显，河南洛阳人。永平四年三月卒。妻穆氏。”不及他事，昕盖早夭无可称者也。穆氏之女得嫔于昕，其为显族无疑。疑封敕文后裔。敕文代人，魏书有传。后裔随孝文迁洛，遂世为洛阳人。惜志文简略，未由确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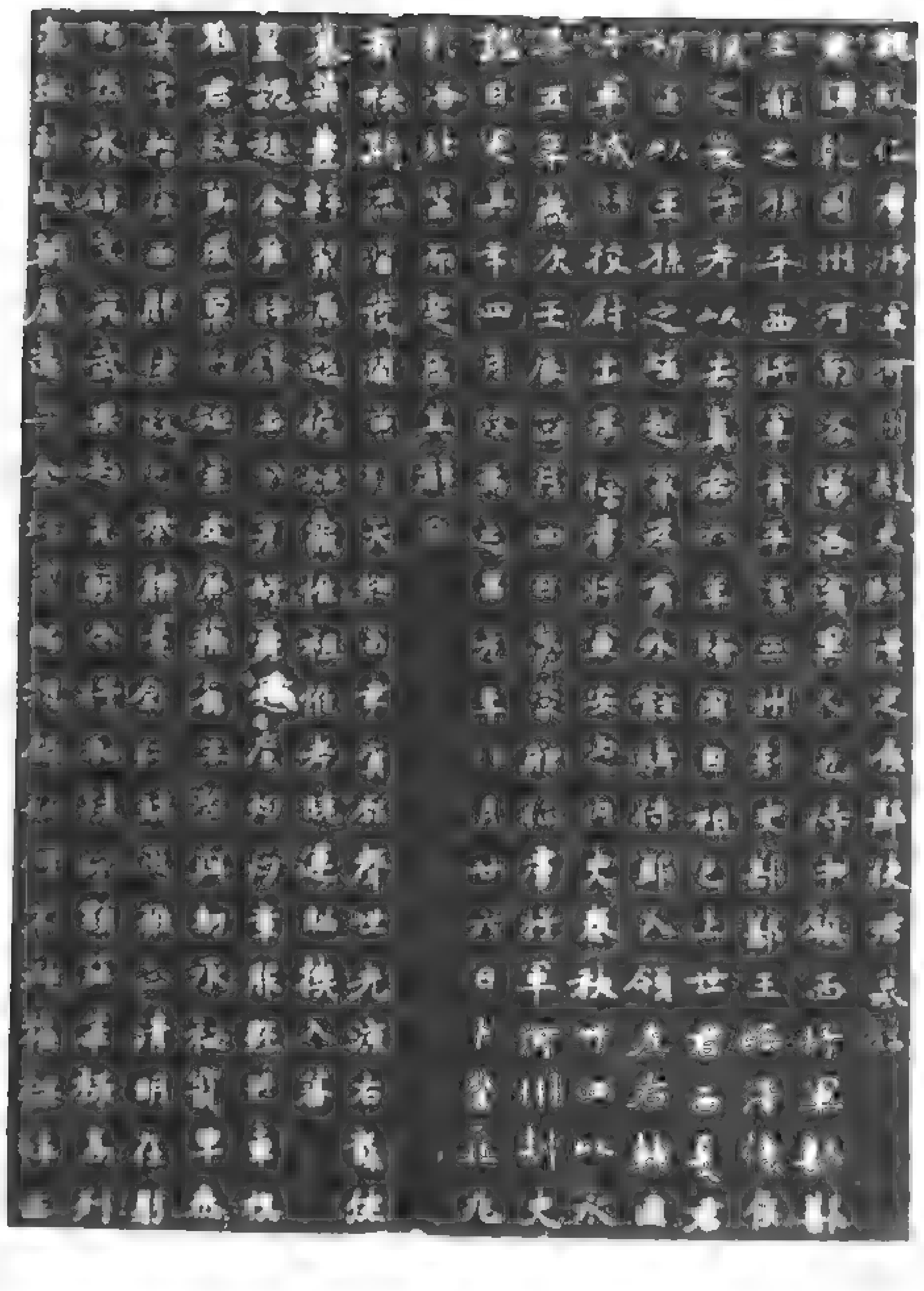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04）

19.鄯乾墓志

北魏 延昌元年（512） 此志呈四方形，高57厘米，宽48厘米，19行，满行22字，书法楷书俊丽，志盖为覆斗式，残存半块亦断为二，上真书“墓志铭”三字泛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31年，洛阳城东北后沟村东北二里许的关帝庙后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乾为侍中镇西将军鄯善王之宠孙，平西将军清平凉三州刺使鄯善王临泽怀侯视之长子。”又云“考以去真君六年归国，自祖已上，世居西夏”。案《北史·西域传》“鄯善王比龙率众西奔且末，世祖诏成周公万度发凉州兵讨之，其王真达面缚出降。度留军屯守，与真达诣京师，世祖大悦厚待之。”《魏书·世祖纪》系万度袭鄯善事于太平真君六年。与志互校，知志云鄯善王宠即此龙，视即真达矣。史不载真达降魏后事，据志知封临泽侯，谥曰怀。平西将军三州刺史疑皆卒后赠官，故史云“世祖厚待之”也。乾以国为氏。犹于阗之氏于（见《高宗夫人于仙姬墓志》），吐谷浑之氏吐谷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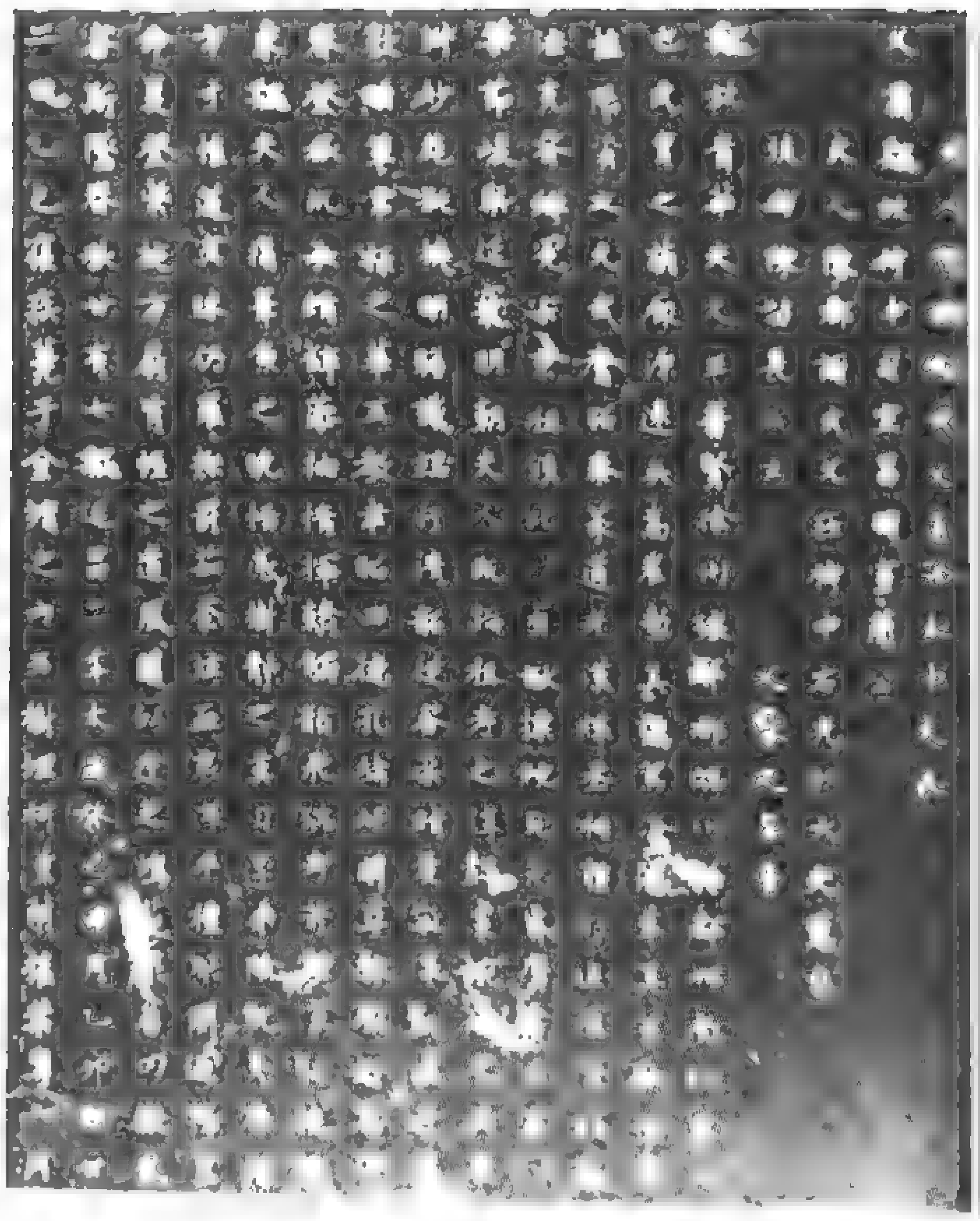
(见《吐谷浑玑墓志》、《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殆当时俗尚欤?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72)

20. 贵华恭夫人王普贤墓志

北魏　延昌二年(513)　此志呈四方形,高 55 厘米,宽 68 厘米,27 行,满行 23 字,书法楷书秀丽,志称普贤父肃"魏故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夫人陈郡谢氏","后尚陈留长公主"均与《魏书·王肃传》合,传述"肃临薨,谢始携二女及(子)绍至寿春,世宗纳其女为夫人",按此可知夫人为谢出。再志称夫人"妙闲草隶,雅好篇什。"按王氏晋魏世家擅长易礼,故夫人出自名门,能诗善书亦合情理。又《魏书·皇后列传》云"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夫人身为贵华而不得附葬山陵,或以此故。《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5 年,洛阳城北十余里南石山村西南郑凹村北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普贤父肃尚陈留长公主,父献文皇帝"。案《魏书·王肃传》"诏肃尚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魏书·刘昶传》"昶适承绪尚高祖妹彭城长公主,为驸马都尉,先昶卒。"盖太和中肃前妻谢氏尚未奔魏,而公主适新寡,故肃得奉尚主之诏。肃临卒,普贤与弟绍随母至寿春。普贤卒于延昌二年,年 27。逾二年绍卒,年 24。普贤长绍 5 岁,先后俱窆于洛阳西乡里。绍从弟翊亦葬西乡里,见王诩墓志,西乡里盖王氏家茔。身为贵华而不祔葬山陵何耶?

罗振玉《丙寅稿》考证从略。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82)

21. 高祖充华赵氏墓志

北魏　延昌三年(514)　　此志呈四方形，高 33 厘米，宽 46 厘米，15 行，满行 14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8 年，洛阳城北张羊村北陵北陈庄村南陵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充华、孝文皇帝之九嫔，芦氏义阳长公主之母。"案《魏书・芦玄传》，"玄子度世，度世子昶，昶子元聿，尚高祖女义阳长公主。"据志知充华乃义阳生母也。魏制内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大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此称九嫔赵充华。《崔亮传》，"世宗纳亮女为九嫔"，知魏有九嫔，如知充华为九嫔之一。与《后妃传》"六嫔视六卿"不合，疑传误也。遍考魏书，充华凡四见。一、郑充华。《孝文五王传》，"郑充华生皇子悦"。二、韦充华。《韦阆传》，"阆从子崇，高祖纳其女为充华嫔。"三、胡充华。《后妃传》，"灵太后既诞肃宗，进为充华嫔。"四、潘充华。《后妃传》，"肃宗专嬖充华潘氏。"合赵充华及芦令媛数之得六人。考《宋书》、《隋书》及《南史・后妃传》充华列九嫔，乃晋武所创，南齐仍之，梁承宋制，改入五职，位亚于九嫔，隋炀帝又复齐制。是充华一职历朝均有之，不独魏制然矣。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15)

22. 长孙瑱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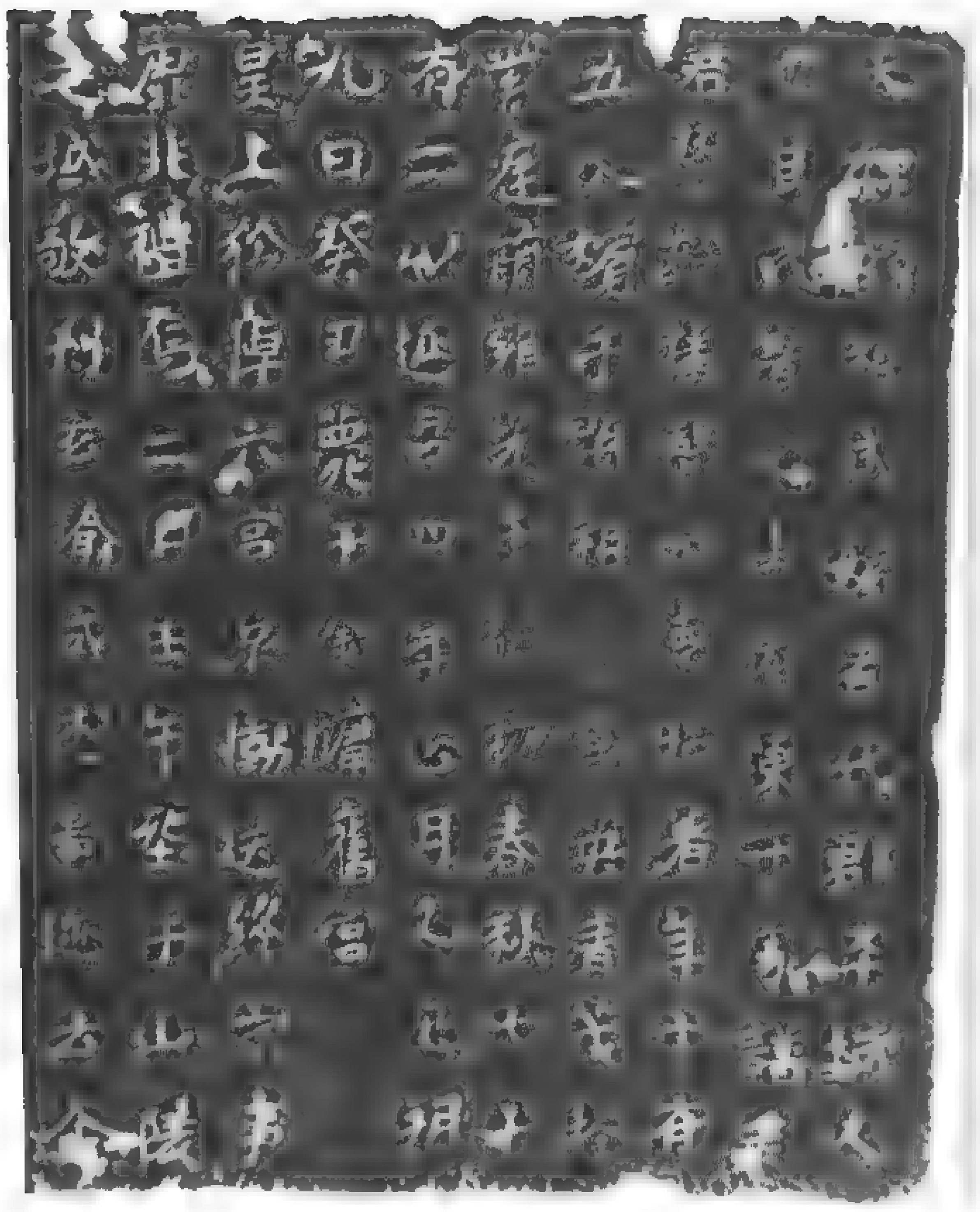
北魏　延昌三年(514)　　此志呈四方形，高 68 厘米，宽 81 厘米，20 行，满行 18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9 年，洛阳城东北西山岭头村南太仓村北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瑱为镇远将军益州刺史之孙，宁远将军白水府君之子"，而俱不名，疑长孙嵩、长孙道生后裔。《魏书・长孙嵩传》、《魏书・长孙

道生传》久失，后人以《北史》补之，非魏收旧文，宜其有罣漏矣。志首书其谥，次及名字邑里，亦志石中罕见之书例。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65)



23. 显祖嫔成氏墓志

北魏　延昌四年(515)　此志呈四方形，高 34 厘米，宽 29 厘米，10 行，满行 12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 年，洛阳城北十余里南石山村之北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88)

24. 山晖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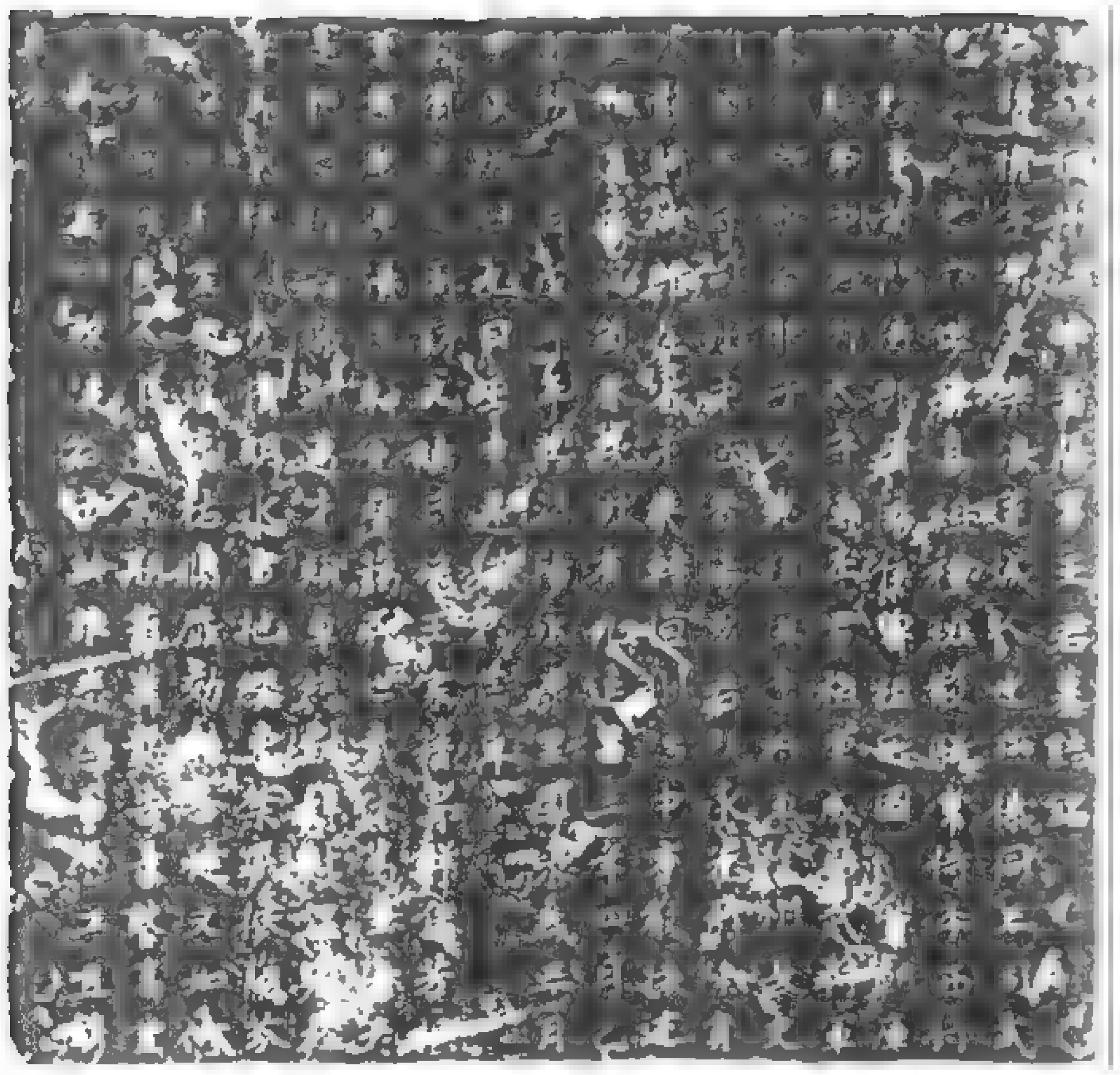
北魏　延昌四年(515)　此志呈四方形，高 33 厘米，宽 34 厘米，15 行，满行 15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1 年，洛阳城东北太仓村北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按《魏书·官职志》鹰扬将军为从四品上，屯骑校尉为第三品中。此墓志石甚厚，系以晋碑改琢，背面典午隶书文字极为清晰。以古碑磨平其一面作为志石，在魏墓志中甚为少见。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76)

25. 王祯墓志

北魏　延昌四年(515)　此志呈四方形，高 51 厘米，宽 53 厘米，19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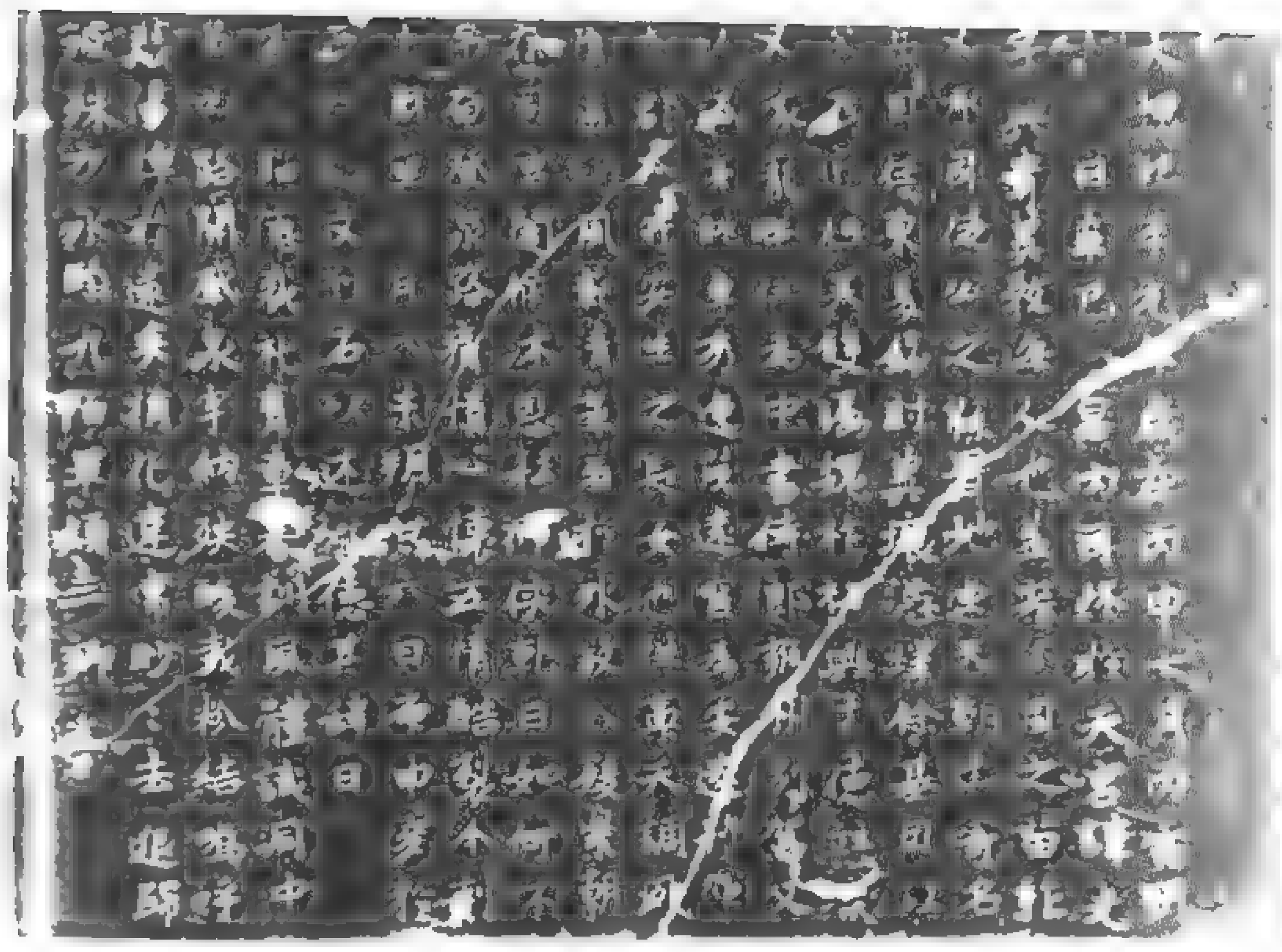


满行18字，志石稍漫漶，有方界格，书法楷书，极为方整。按《魏书·地形志》恒州，为拓跋珪天兴中都平城置司州，拓拔宏迁都洛阳改为恒州，即今山西大同县东。治中为汉置官名，北魏仍沿用。晋阳男为祯袭其父爵。志称"祯字宗庆，乐浪遂城人也"，遂城故址在今朝鲜平壤南境，属汉置乐浪郡，可藉以看出北魏时与当时高句丽（今朝鲜）的关系。志铭后刻有"凭石凭工且镌且述"字样，可足证魏墓志多不经书丹，全由当时的能工巧匠高度的雕刻技法而制作成的。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87）

26. 皇内司吴光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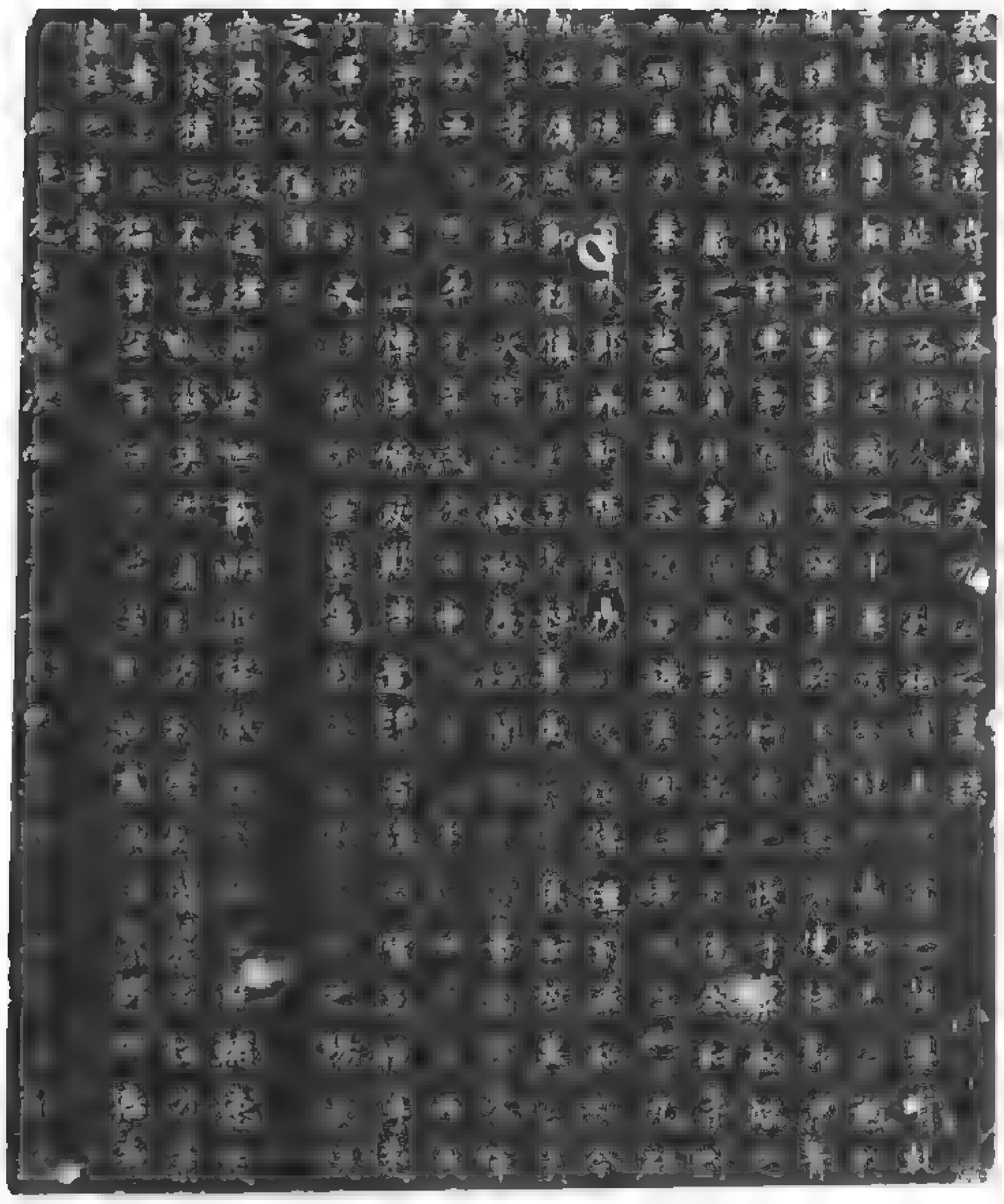
北魏　熙平元年（516）　此志呈长方形，断裂为三块，高36厘米，宽48厘米，18行，满行15字，书法楷书。墓志中的"内司"为管理宫内事的女官，职位等于尚书令，为从一品（见《魏书·皇后列传》）。《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年，洛阳城北十余里南石山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90）

27. 元广墓志

北魏　熙平元年（516）　此志呈四方形，高56厘米，宽49厘米，19行，满行22字，书法楷书秀整。据罗振玉《丙寅稿》考证，志称"公讳广，字延伯，烈



祖道武皇帝之苗裔，考使持节凉青梁夏济五州诸军事济州刺史牂牱侯之长子。”案《魏书·道武七王传》“阳平王熙子比陵，赐爵牂牱公，卒，子天琚袭，高祖时征虏将军青州刺史，寻降公为侯，世祖时征虏将军夏州刺史，卒赠本将军济州刺史，子延伯袭，卒。”志之牂牱侯乃天琚，延伯即广；传以字为名，据志乃知其名广也。传不载广历仕及事实。志称“二九辟为直后加员外郎，升朝袭爵，转襄威将军，春秋五十，以熙平元年八月二十二日丙辰薨，追赠宁远将军洛州刺史”，以补传文之缺略。《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此志1926年洛阳城北姚凹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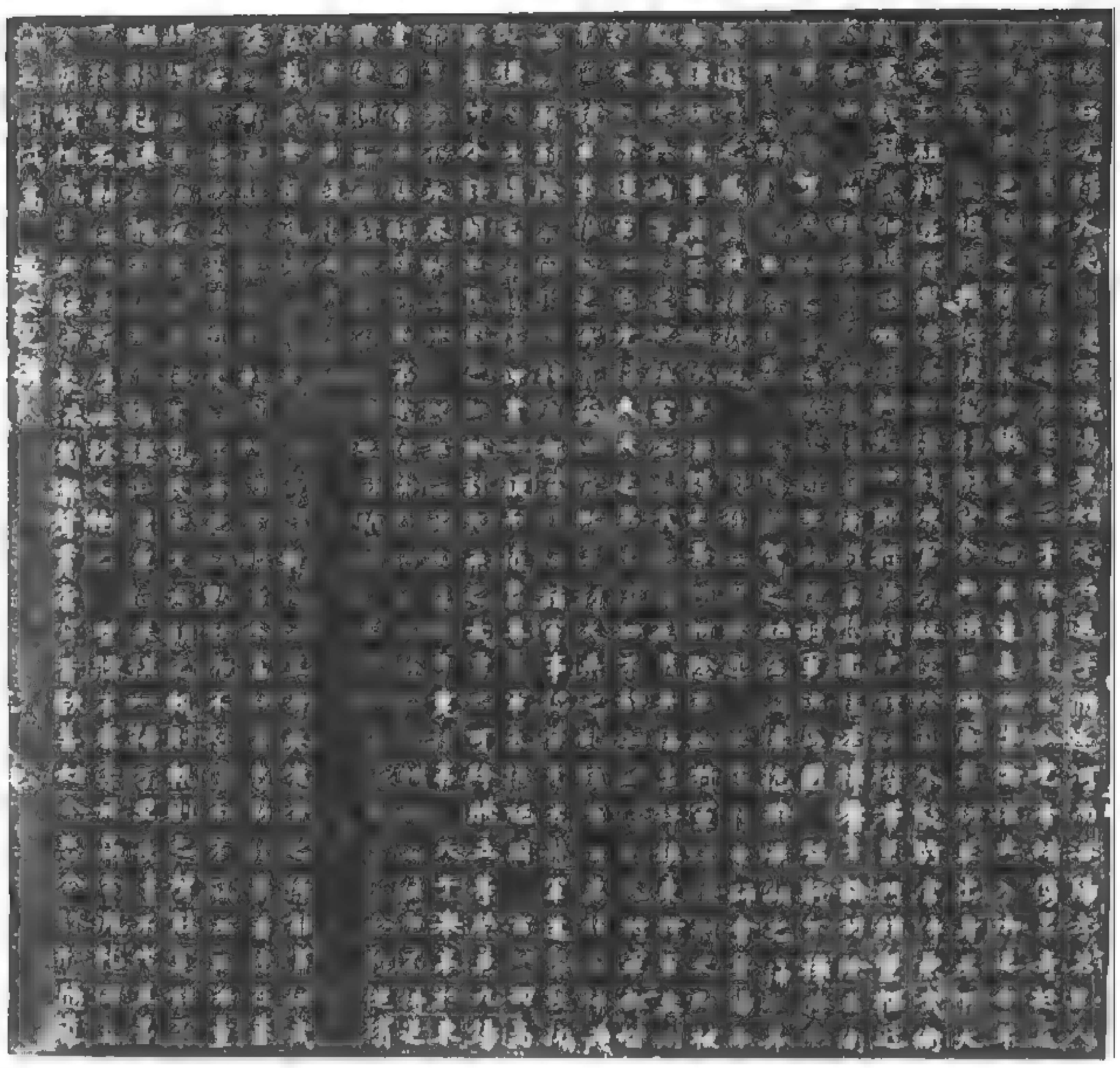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50）

28. 元遥墓志

北魏 熙平二年（517）

此志呈四方形，高43厘米，宽46厘米，29行，满行28字，书法楷书谨严，笔画厚重，可称为一佳刻墓志，《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19年，洛阳城北后海资村南凹距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遥为京兆康王第二子，附见《魏书·景穆十二王传》。传志互校多合。惟传称“遥字太原”，志作

修远。传云"肃宗初，累迁左光禄大夫，仍领护军，迁冀州刺史"；志则云"景明初，除平西将军泾州刺史，被征为七兵尚书，又迁中领军，出拜镇军将军冀州刺史，入除护军，加右光禄大夫，延昌中淮泗不静，加征南大将军都督南征诸军事。"传失书南征事，(《魏书·世宗纪》"正始三年五月诏尚书元遥率众南讨，延昌三年十一月以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东道都督镇遏梁楚"，与志正合)。又误列光禄护军冀州刺史等除授于孝明时为异耳。《魏书·彭城王勰传》"高祖至马圈，疾甚，崩于行宫，独与任城王澄及左右数人计，奉迁高祖于安车中，遣使奉诏徵世宗，会驾梓宫，至鲁阳，乃发丧行服。"志云"太和之季，伪贼侵边，王师亲讨，军次马圈，圣躬不豫，特命公与彭城王侍疾，晏驾之始，在公怀抱，奉迎世宗于京师，会鲁阳而举讳"；即指马圈定策事，可据志以补传。至沙门法庆举兵冀州，延昌四年遥奉命进讨，事详本传、《魏书·肃宗纪》及《北齐书·封隆之传》，与志皆合。帷志泛云熙平初，亦一失也。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57)

29. 邓夫人李渠兰墓志

北魏 神龟元年(518) 此志呈正方形，高、宽各为 59 厘米，25 行，满行 25 字，书法楷书，笔画圆熟，《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38 年，始闻于 1918 年在洛阳马坡村马聋子即马文秀家发现。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夫人勃海郡倏县广乐乡新安里人。"又称"高祖中庶、祖陈留、父功曹"，而俱不名。当是李璧同族。璧为广乐乡吉迁里人，二人籍贯正同，惟里名小异耳。志又称"太和廿年武昌王出牧齐藩，妙简良佐，帝难其人，除公为长史带东魏郡"。武昌王谓元鉴，而未明言其夫人所适为何人。考《魏书·邓渊传》(附邓羡传)"羡以明谨见知，出为齐州武昌王征虏长史。后李元护之为齐州，仍为长史带东魏郡太守。在治十年，以清勤著称。"与志云"以公为长史带东魏郡"吻合，因疑夫人乃羡之妻也。又志称"太和二十一年十一月薨于新安里第，神龟元年十二月迁配于洛阳北芒山之阳。"前后逾二十年，当因羡卒于神龟初，夫人与羡合窆，故志云迁配耳。据此，则夫人乃羡之妻，益可信。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68)

30. 元珽妻穆玉容墓志

北魏　神龟二年(519)　　此志呈正方形,高宽各48厘米,20行,满行20字,书法楷书秀整,志盖题“魏羽林监轻车将军太尉府中兵参军元珽字珎平妻穆夫人墓志铭”27个楷书大字。志称“夫人曾祖堤,宁南将军相州刺史。祖袁,中坚将军昌国子。父如意,左将军东莱太守昌国子。”考《魏书·穆崇传》“崇宗人丑善,子莫提,从平原,为中山太守,除宁南将军相州刺史,假阳陵侯。”志之堤与传之莫提,官职正同,当为一人,但一称堤,一作莫提,不知谁对。传又载莫提子吐,而子袁与孙如意,则赖志知。《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2年,洛阳南陈庄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29)

31. 元遥妻梁氏墓志

北魏　神龟二年(519)　　此志呈长方形,高31厘米,宽42厘米,10行,满行7字,有方界格,书法楷书,志称“合葬仪同墓”,因其夫元遥卒时封仪同三司,故有此称。《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19年,此志与元遥墓志同时出土于洛阳南城北后海资南凹。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12)

32. 杨胤季女墓志

北魏　神龟二年(519)　　此志呈四方形,高35.2厘米,宽34.5厘米,盖呈覆斗式,无题额,志文书法楷书,用笔洗练,有渊雅醇厚之风,文中不少字迹如“华”、“之”还留有隶意,是北齐到隋代一种过渡书法。此志由陕西临潼县管南出土。今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33.元晖墓志

北魏 神龟三年(52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69 厘米,31 行,满行 31 字。元晖,字景袭,本姓拓跋,为北魏昭成皇帝的六世孙,他性沉敏,幼涉经史,长爱儒术,颇有文才,韬略过人,因而深得皇帝赏识,官爵屡迁侍中兼尚书左仆射。死于北魏神龟三年,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墓志 1926 年由洛阳城北四十里陈凹村出土。此志书法极为秀劲,可为隋《龙藏寺碑》、唐褚书《圣教序》前驱。惟墓志前瘦后肥,疑系葬期迫近,为两人所刻,但都能各尽其妙技。

志侧四面,减底阳刻从汉代以来普遍应用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案主体,之外,还刻有神采各异的云纹。在青龙一面,云纹舒展平静,与龙的矫健姿态相应;白虎一面,云纹呈急速的反复旋涡状,有如虎在吼啸,致使四周气浪翻滚,山鸣谷应;朱雀一面,云纹有节奏,有韵律,组成了安闲宽和的境界,与凤鸟神韵合拍;玄武(龟蛇)部分,则略饰云彩数朵,其空隙则另刻鹿形怪兽。总的说来,这方墓志的图案布局手法较高,具有音乐感和运动感,为碑林所藏志石花纹中的最上乘。

现存西安碑林第一墓志廊。

(藏石编号 1104)

34.穆亮妻尉太妃墓志

北魏 神龟三年(520) 此志呈四方形,高 54 厘米,宽 52 厘米,16 行,满行 24 字,书法楷书秀劲,字文占全石三分之二,《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洛阳城北二十里处,具体时间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太妃祖侍中散骑常侍建义将军四部尚书西阳公,建明略于皇家,有大功于帝室。父博陵府君。"而俱不名。以《魏书·尉元传》考之,元天安太和间南征有功,官侍中都曹尚书,封山阳郡公。子诩袭,以山阳郡

公在畿内。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76)

35. 元孟辉墓志

北魏　神龟三年(520)　此志呈四方形,高 52 厘米,宽 54 厘米。22 行,满行 21 字,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 年洛阳城北北陈庄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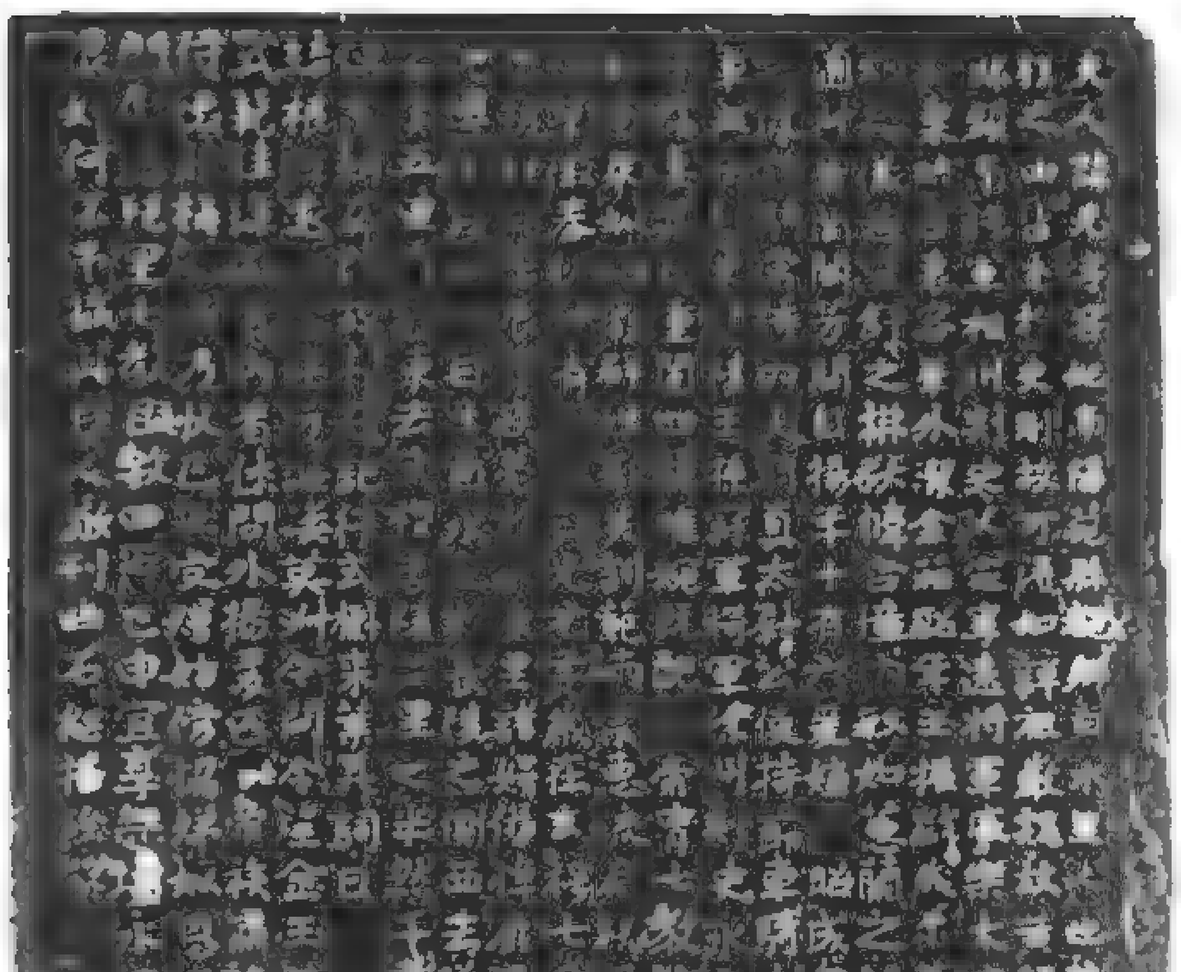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孟辉字子明,高凉王七世孙,祖辅国,考骠骑。"以元珍墓志证之,辅国谓平,骠骑谓珍,孟辉盖珍之元子也。平文子孙传叙珍事至简略,又不及其子裔。今父子二志同出一兆,足弥史缺。第二行"洛阳恭里人"以下文"终于笃恭里第"证之,恭上当补笃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35)

36. 元夫人赵光墓志

北魏　正光元年(520)　此志呈四方形,高 45 厘米,宽 47 厘米,20 行,满行 20 字,书法楷书,厚重秀整,盖题"魏故元氏赵夫人墓志铭"10 字正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 年洛阳姚凹村东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夫人嫡昭成皇帝之胤比陵王孙冠军将军徐州刺史永之长子为妻。"考《魏书·昭成子孙传》,"毗陵王顺,昭成子地干之子,位司隶校尉,太祖空之。"《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四月南安公元顺进封毗陵王,六年七月镇西大将军司隶校尉毗陵王顺有罪,以王还京第。"毗陵王事迹可考者,如此而已。志叙顺官散骑常侍内大羽贞太尉公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史俱失载,疑皆

赠官。毗陵志作比陵，比毗字通。传不载顺子裔，据志知永为顺子，可补史缺。志云“夫人窆于苌陵之侧，东去武穆王二里之半”；武穆王谓广平王元怀。怀卒于熙平二年三月，见肃宗纪，下距夫人之葬只三年也。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36）

37. 刘阿素墓志

北魏　正光元年(520)　此志呈四方形，高 44 厘米，宽 36 厘米，13 行，满行 16 字，书法楷书。据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二》考证，志称“阿素遭家不造，幼履宫庭，内宠其劳，赐官一品。同火人典御监秦阿女等，痛金兰之奄契，乃刊玄石，述像德音。”考《魏书·皇后列传序》“大监视二品”，故得一品。（按《魏书·皇后列传》“置女职以典内事，内司视尚书令，仆作司大监女侍中三官视二品”，是大监为宫女官，与后代称阉宦为太监有别。）志中所谓同火人；就是木兰诗中的所谓火伴。典御监为诸监之一，其名未见他志。阿素以家难入宫，没而火伴为之刻石，其情可闵。《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此志 1918 年洛阳杨凹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78）

38. 叔孙协墓志

北魏　正光元年(520)　此志呈四方形，高 37 厘米，宽 38 厘米。16 行，满行 21 字、23 字不等，书法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9 年，洛阳镇北玉仙庙西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协字地力懃，冯翊景王鸿罗侯之孙，仓部尚书勑俟堤之子。“地力懃、鸿罗侯（元宁墓志“曾祖武阳侯鸿洛侯”，与鸿罗侯盖同名异译）、勑俟堤，皆鲜卑语，于史俱无徵。《魏书·官氏志》“献帝命叔父之胤曰

乙旗氏后，故云“其轩辕皇帝之裔”也。协夫人百字文氏，六壁镇将胡活拨女。《魏书·宇文传》，“福祖活拨仕慕容垂，太祖平慕容宝，活拨入国为第一客。”即志之胡活拨。传不载活拨官六壁镇将，赖志知之。《水经·文水注》“东径六壁城南，魏朝旧置六壁于其下，防离石诸胡，因为大镇，太和中罢，仍置西河郡。考“《魏书·太祖记》，“天兴元年三月离石胡帅呼延铁等叛，诏安远将军庚岳讨平之。”据此知活拨镇六壁，当在天兴后。协封终广男，终广未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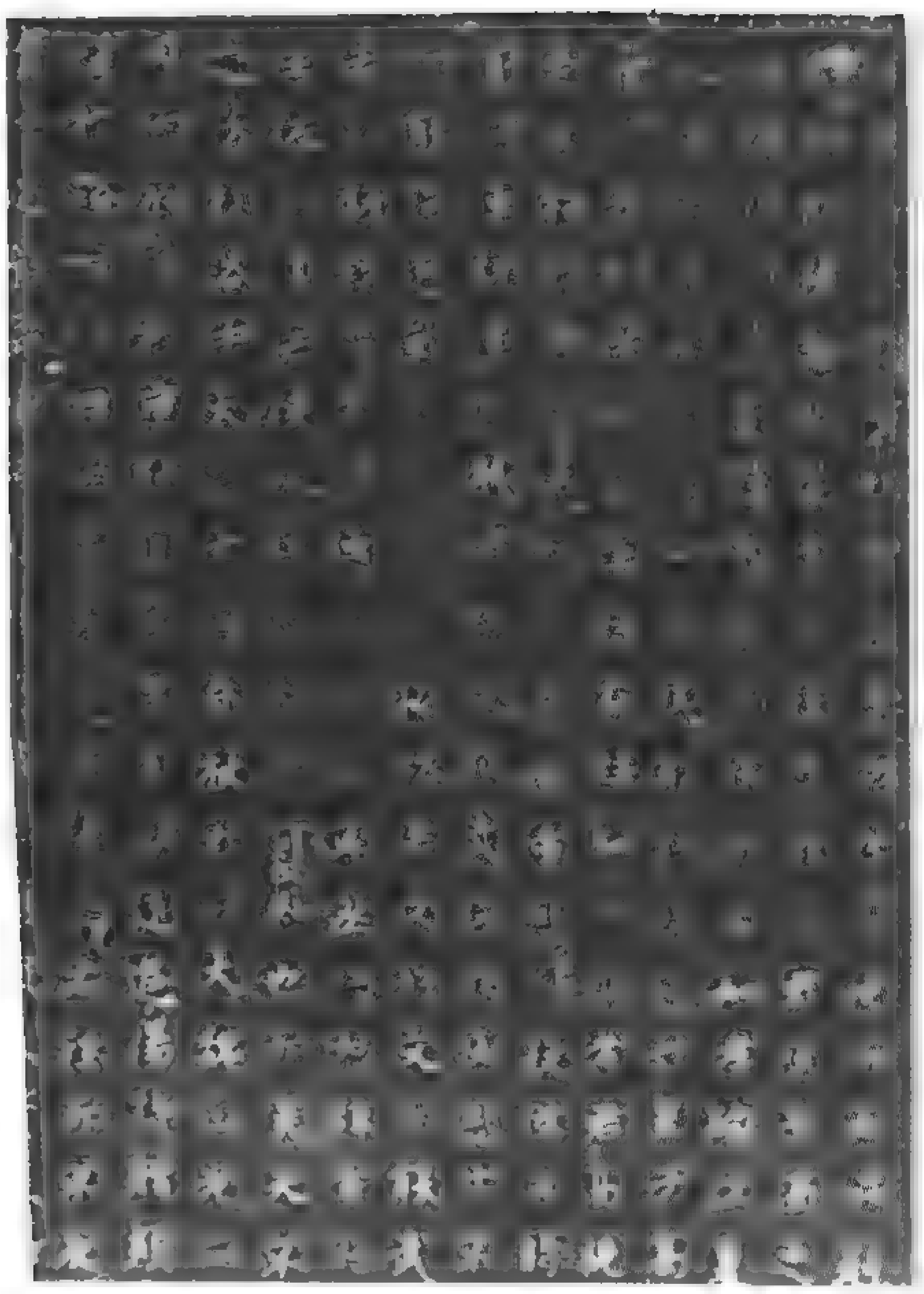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21）

39. 穆纂墓志并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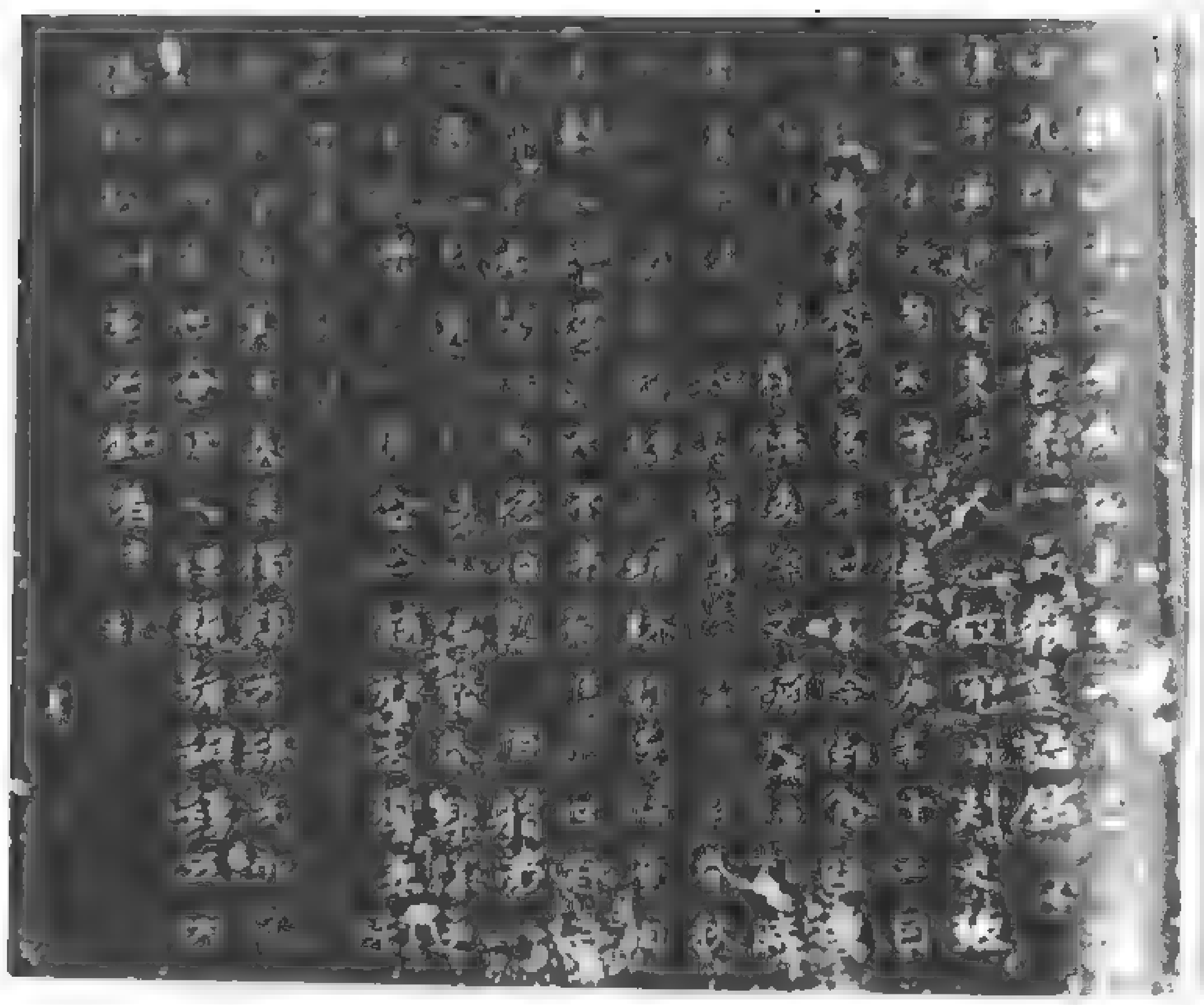
北魏 正光二年(521) 此志呈四方形，高 56 厘米，宽 55 厘米。26 行，满行 26 字，书法小字楷书秀劲，志盖题“穆君墓志之铭”6 个大字。楷法清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 年，洛阳西北水泉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纂为代北显阀穆崇之后，而名不见于史。志叙纂高祖跋、曾祖寿、父长成名位，以校魏书穆崇传多合。惟志称崇为“宜都贞公”，与穆亮、穆彦二志合，而与传云谥丁公不合；传称“崇子观字闥拔”，志则单称跋；又传云长城，志作长成，均与传小异耳。传叙“正国尚长乐公主，拜驸马都尉”，志则称“冠军将军散骑常侍”，当是卒后赠官。至长成拜驸马都尉，传亦失载，惟不知所尚者何人耳。传载“长城子世恭”，不及纂及纂弟彦，志可补史之缺。纂卒于正光二年二月。志称“南荆州刺史桓叔兴背国重恩，归投伪主，召君为东荆长史，统军追贼”。考《魏书·肃宗纪》系桓叔兴南叛事于正光二年五月。《梁书·武帝纪》，“普通二年（即魏之正光二年）七月魏荆州刺史桓叔兴帅众降”。据志，则叔兴降梁必在是年二月前，不得在五月或五月后，传闻异辞，当以志为正矣。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81）



40.张安姬墓志并盖

北魏　正光二年(521)　　此志呈四方形，高 47 厘米，宽 53 厘米。16 行，满行 15 字，书法楷书。盖题“魏宫品一墓志铭”7 个大字亦为楷书。《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2 年，洛阳城北杨凹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安姬卒于正光二年，春秋六十五，上推至年十三罹难没宫时，当在魏献文皇兴三年。志称“安姬兖东平人兖州刺史张基之孙，济南太守张嬉之女”。《魏书·显祖纪》，“天安元年十一月刘彧兖州刺史毕众敬遣使内属，皇兴元年正月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遣使举内属”。案魏之济南郡隶齐州，即刘宋之冀州，皇兴三年更名。史志互证，安姬先世，俱官刘宋，其祖占籍任新，故称东平人也，此志书体绝似刘华仁墓志，殆出一手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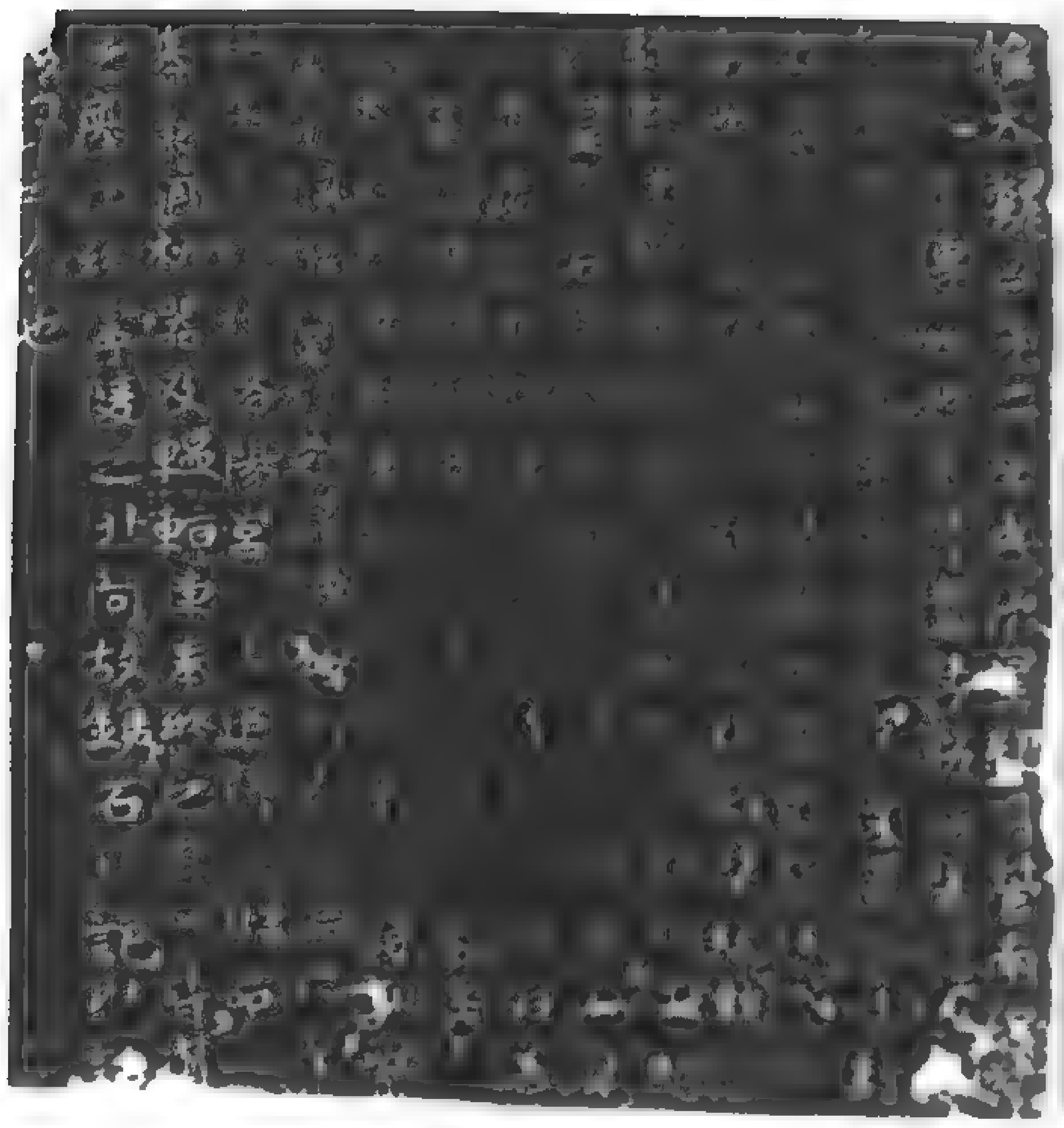
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二》考证从略。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05)

41.傅母王遗女墓志

北魏　正光二年(521)　　此志呈四方形，高 38 厘米，宽 35 厘米。15 行，满行 16 字，书法楷书。志称“遗女以罪入宫，初知御膳，后转当御细达，后又进尝食监，超升傅母，又赐品二，卒赠品一”。考《魏书·皇后列传序》载，内官无知御膳及当御细达及傅母，知宫职的名称不书于史者甚多，尝食监为诸监之一，视三品。张安姬志上书有御食监，不知与尝食是否为同一名。遗女以尝食监升傅母，则傅母位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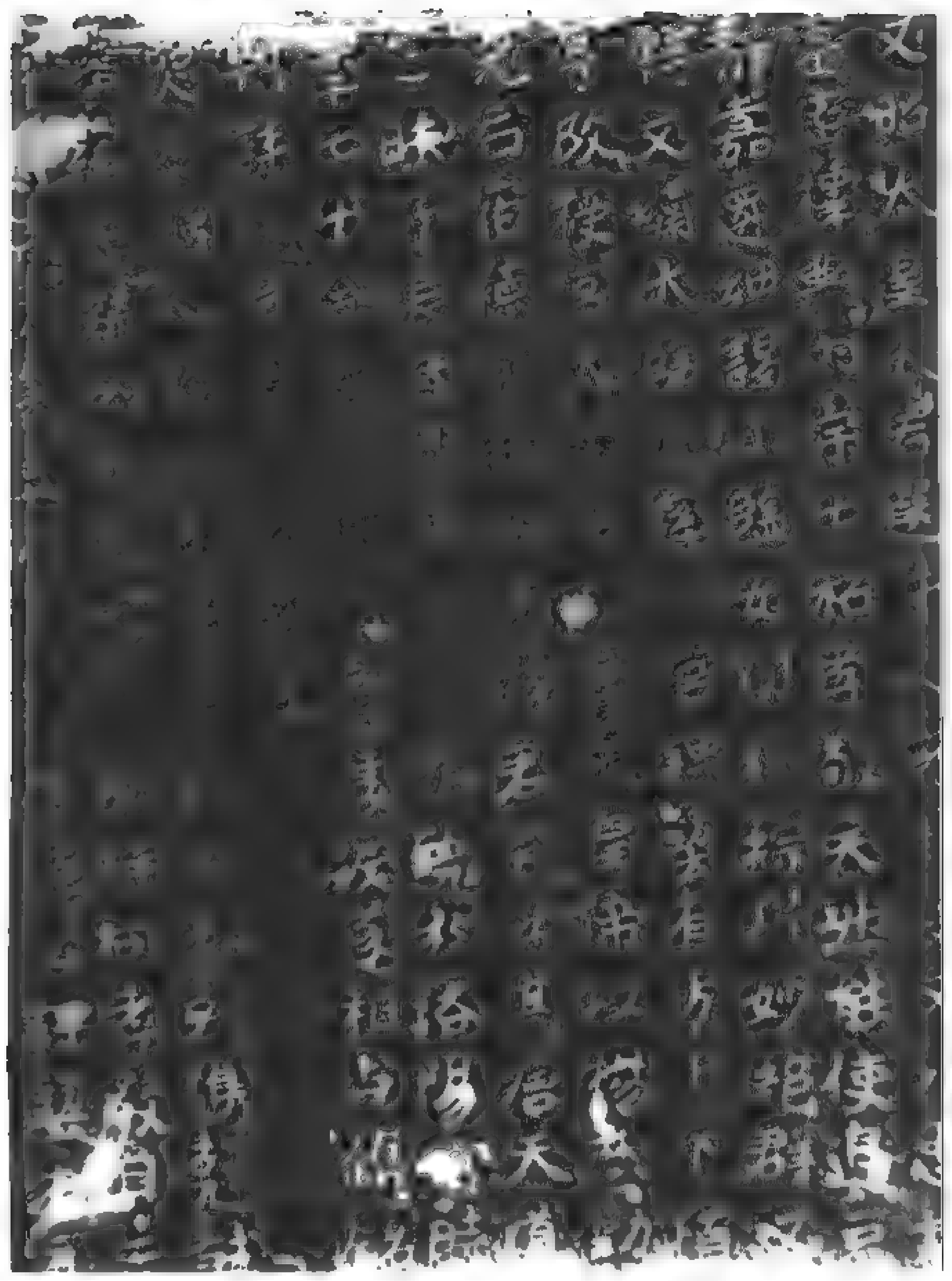
诸监之上，故品二，卒得赠品一。志序称遗女之夫为当阳高，官深泽令，与刺史竟功元衡，以此入宫，夫与上官对抗，而竟被没拿入宫，可见当时等级制观念何等凶残。此志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19年，由洛阳城北杨凹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82）

42. 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

北魏　正光二年（521）　此志呈长方形，高37厘米，宽52厘米。23行，满行16字，书法楷书。《墓志集释》及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均有著录考证。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18年，出土于洛阳杨凹村。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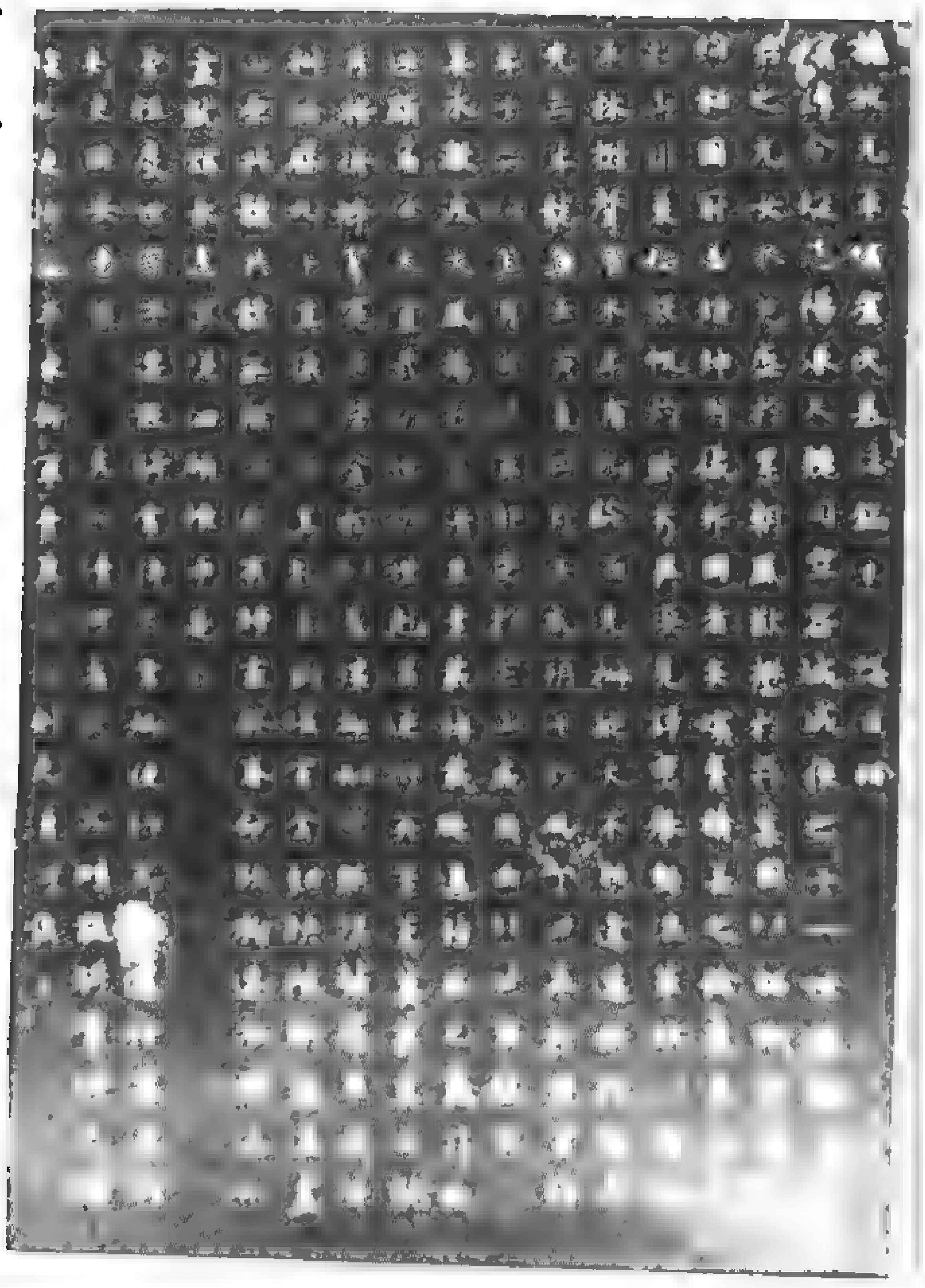
（藏石编号1159）

43. 卢令媛墓志铭

北魏　正光三年（522）　此志呈正方形，高、宽各57厘米，12行，满行23字。书法楷书秀丽。《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年，出土于洛阳城北小梁村。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志称“令媛魏司空容城成侯十一世孙”，容城侯谓芦毓。考《魏志·芦毓传》（裴注）、《魏书·芦玄传》、《唐书·宰相世系表》，知毓生珽（唐表作班误），珽生志，志生谌，谌生偃，偃生邈，邈生玄，玄生度世，度世生渊，渊生道约，道约生令媛，适得十一世，与志合。志又称“祖渊，夫人李氏，父孝伯平西将军泰州刺史”，《魏书·李孝伯传》则作秦州。此盖误而志是。知者，《魏书·地形志》有两秦州，一治上邦城，一治蒲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谓治蒲坂之秦州当作泰州。其言曰：“《地形志》州名相同者，多加东西南北以别之。独两秦州并置六十余年，何以不议改易。且延和元年改雍州为秦州，其时赫连定甫

平，秦州初入版图，岂有复置秦州之理？后读《食货志》称，并肆汾建晋泰陕东雍南汾九州；《灵征志》天平四年泰州并溢，太和二年泰州献五色狗；《薛辩传》赠都督冀定泰三州诸军事；出帝纪泰州刺史万俟普拨，又《齐书·莫多娄贷文传》仍为汾陕东雍晋泰五州大都督；《周书·薛端传》高谨泰州刺史；《侯植传》父欣泰州刺史；言泰州者多矣，而志无之，乃悟蒲坂之秦川，当为泰州之讹。”《张曰鉴集释》引钱说，又申之曰：“《北史·魏诸宗室传》赞弟淑，孝文时为河东太守、为之谣曰，泰州河东杼柚代春，连下所属河东郡书之更明。”《杨守敬札记》亦引钱说，复据隋元公墓志曾祖忠相太二州刺史，以证魏有泰州。案诸家所论列，均确凿无以易，此称孝伯官泰州刺史，正魏有泰州之澄。《魏书·崔衡传》载：“除秦州刺史，先是河东年饥，劫盗大起，衡至脩龚遂之法，周年之间寇盗止息。”《魏书·王建传》，“子斤以卫兵将军镇蒲坂，关陇平徙镇长安，斤遂骄矜不顺法度，而委罪于雍州刺史阳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周观传》，“出除平南将军秦州刺史，抚驭失和，民薛永宗聚众于汾曲以叛，观讨永宗，为流矢所中，世祖幸蒲坂，观惊怖而起，疮重遂卒。”以上三秦州州，亦皆泰州之讹，与《李伯传》同。自《地形志》误蒲坂之泰州为秦州，《隋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十二、《太平寰宇记》四十六仍之，莫能是正，至钱氏始据史传以订千载之谬，其卓识诚不可及。乃《丙寅稿》谓志误而传是，则失之眉睫矣。志又称，“曾祖度世，夫人清河崔赜女。父道约，妻荥阳郑道昭女。”《芦玄传》俱未及。《李伯传》“孝伯取崔赜女”与度世之妻当为同父姊妹。《郑羲传》“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与渊之妻当为同父姊妹。据志则羲次子道昭女，又嫔于渊子道约。此三姓者，皆中原显伐，故互申婚姻，累世不绝。令媛卒于正光三年，年12。9岁入宫，当为神龟二年。是岁孝明帝年甫十龄，二人年岁正相若，故以稚龄召充椒掖也。《后妃传》“肃宗专嬖充华潘氏，时范阳芦道约女等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传云世妇，而志作充华，令媛殆以世妇晋为充华嫔欤？又罗振玉《丙寅稿》考证：志称“嫔讳令媛，范阳涿人，年甫九龄，召充椒掖，卒年十二，谥曰诏。”考魏书于妃嫔之制之不详。后妃传但载，“高祖改定内官，左右昭仪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卿，世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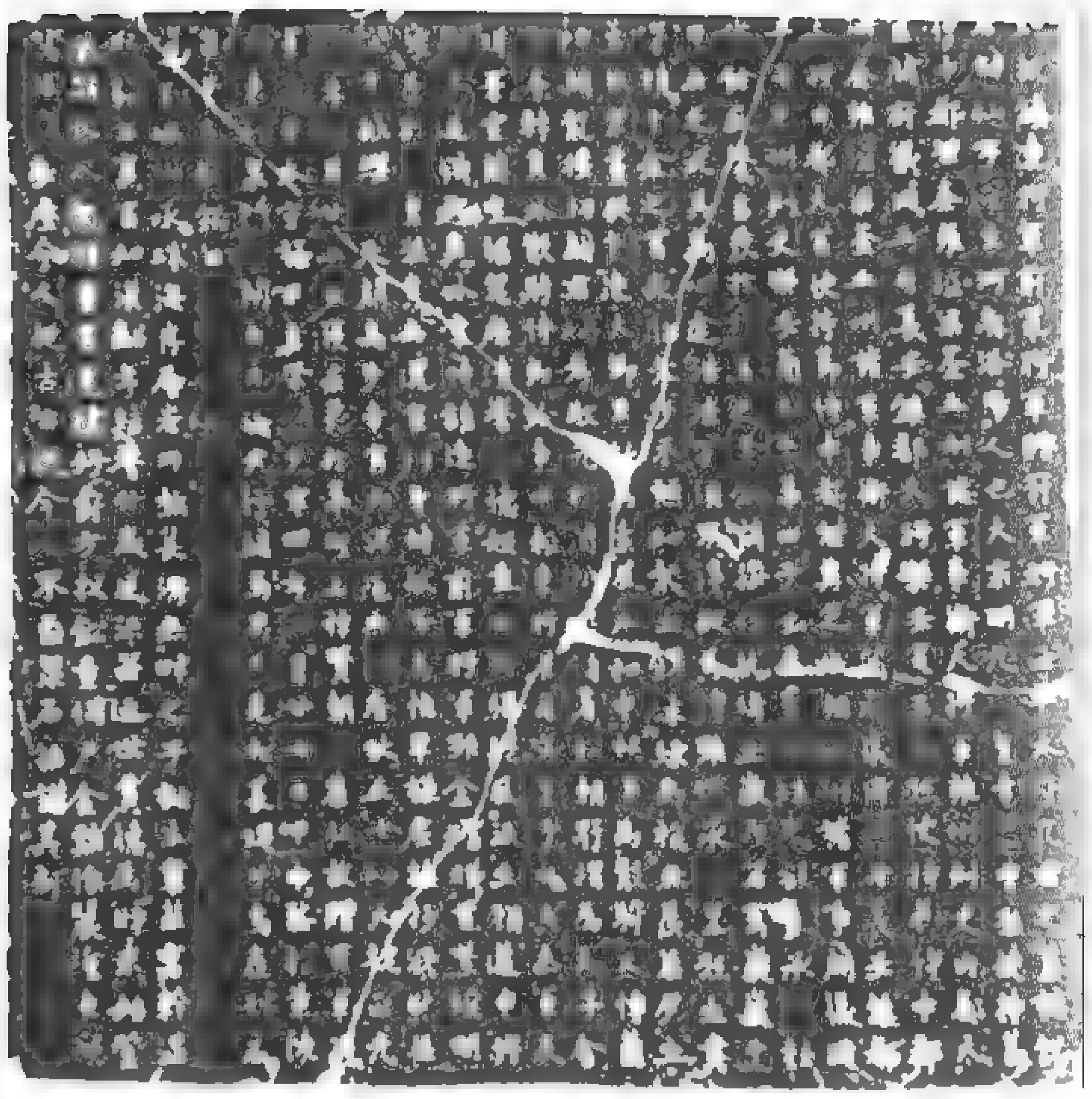
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而无充华之名。此称充华嫔，不知在三嫔，抑在六嫔中也？而年甫九龄，即入椒掖，亦一奇矣。志载嫔先世曾祖度世官镇远将军济州刺史，传则作齐州。北魏有齐郡，无齐州。然《隋书·地理志》称“齐郡旧曰齐州”，疑魏世曾称齐郡为齐州。志与传不知孰为得也？志又载，“祖渊，夫人李氏，父孝伯官平西将军泰州刺史”而传作秦州。魏有秦州无泰州，则传是而志误矣。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83）

44. 镇远将军前军将军赠冠军将军正平太守元仙墓志铭

北魏　正光四年(523)



此志呈正方形，石现四裂，字有残损，高宽各55厘米，25行，满行25字。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7年，洛阳城北徐家沟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集释》考证，仙为元悦之弟，元腾之兄。志称“仙字延生，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雍州刺史内都大官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乐安宣王之孙，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三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内都大官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幽相四州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定州刺史乐安简王之第四子。”案《魏书·明元六王传》“乐安王范泰常七年封，世祖以长安形胜之地，非范莫任，乃拜范都督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安镇都大将。长子良袭，高宗时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为内都大官，薨简王。”以志证之正合。惟传失载范谥宣。《魏书·世祖纪》“延和二年正月丙寅以乐安王范为假节加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五州诸军事卫大将军仪同三司镇长安”，与志合，传未质言五州之名为异耳。范父子官雍州刺史，俱兼长安镇将。《地形志》雍州治长安，知魏之长安镇，即雍州治所。厥后宜都王目辰、阳平王他、任城王云、南安王桢、源怀均以雍州刺史镇长安；则以刺史兼镇将，必当时成例也。《袁式传》“延和三年，乐安王范为雍州刺史，诏武与中书侍郎高允俱为从事郎中”，是范官雍州刺史，亦见于史，特本传遗之耳。志称“良都智冀定幽相

四州诸军事定州刺史”，传与元腾、元均、元弼诸志俱未及，疑卒后追赠亦赖志知之。《明元六王传》于乐安王系不载简王后裔，此志可补史缺。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13）

45. 假节督洛州诸军事𪊲骧将军洛州刺史河南元秀墓志

北魏 正光四年（523）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67 厘米。24 行，满行 25 字，字迹小楷清秀。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1926 年，由洛阳伯乐凹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据罗振玉《丙寅稿》考证，秀字士彦，为太武皇帝之后，临淮康王第二子。而魏书宗室太武五王传不载其名。志称“曾祖侍中中军大将军参都坐韦临淮宣王，祖使持节侍中都督荆梁益雍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羌戎校尉雍梁二州刺史临淮懿王，父持节督齐州诸军事冠军将军齐州刺史临淮王。”考《魏书·太武五王传》载，临淮宣王谭历官，与志合。惟参都坐事，传作参都曹事。谭子提袭为梁州刺史，以贪纵削除徙配北镇，后以预参迁都功，追封长乡县侯，世宗时，赠雍州刺史，谥曰懿。志称提为临淮懿王，殆世宗复旧封，而赠雍州刺史，传失书复旧封也。传称，“提子昌世宗时封临淮王，未拜而薨，赠齐州刺史，谥曰康王，追封济南王。”志则称临淮王，不可晓也。秀以正光三年秋八月卒，春秋三十三。文中不书其历官，仅于志题书“假节督洛州诸军事龙骧将军洛州刺史”，殆为卒后所追赠耶？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69）

46. 龙骧将军元引墓志

北魏 正光四年（523）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43 厘米，有方界格，16 行，满行 15 字。书法秀劲，结构谨严。据墓志知，引字马璁，常山王之曾孙，使持节征西将军豳州刺史之元子。当是常山遵的后裔，但均未见史载。按北魏置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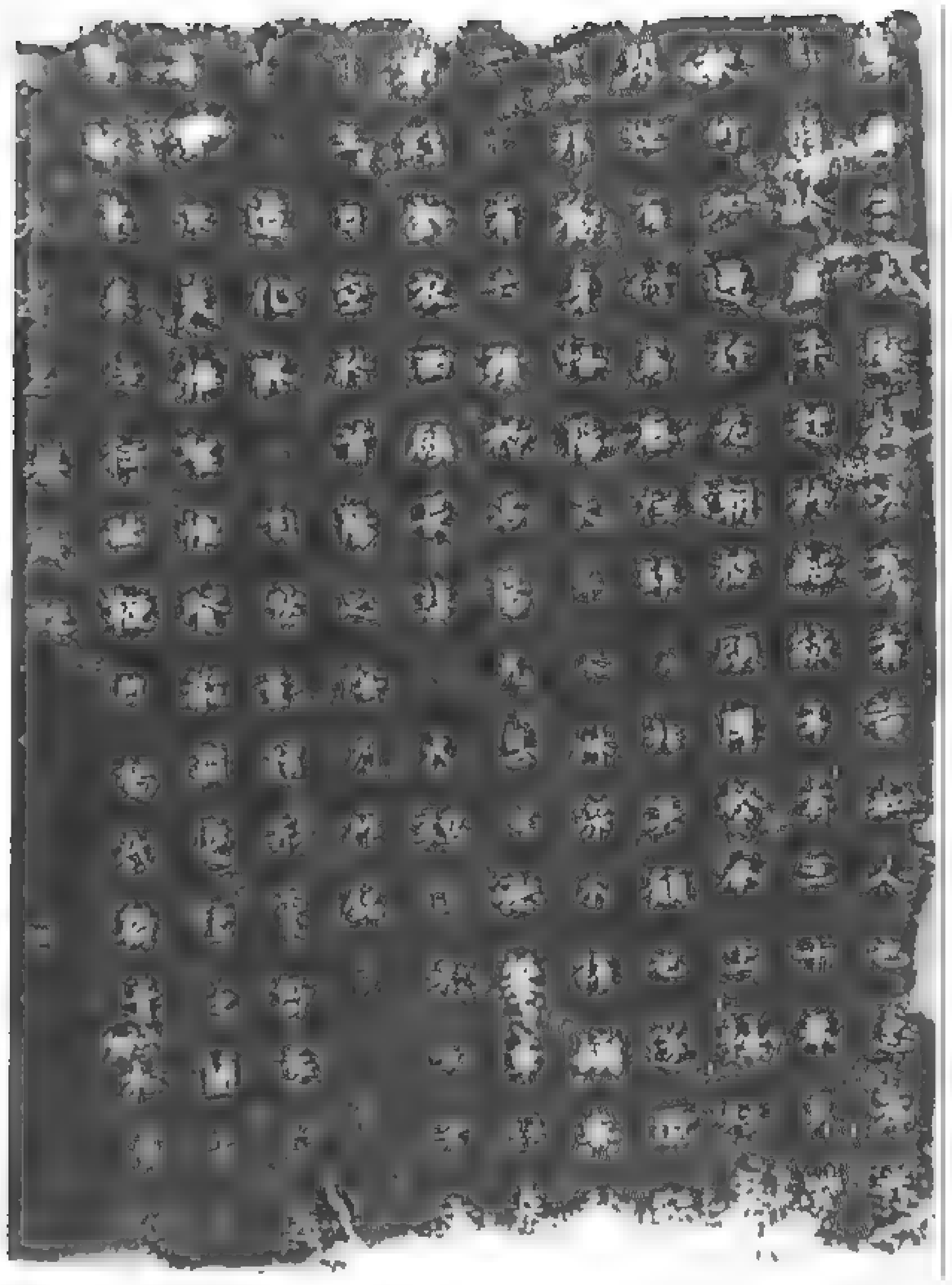
骧将军官第三品上阶。沿用至隋唐废。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此志1925年由洛阳城北姚凹村东南岭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137)

47. 傅母宫大监杜法真墓志

北魏　正光五年(524)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55厘米,12行,行16字,楷书,1933年由洛阳南石山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此志仅寥寥200余字,别字不少,如误荷为何,误迹为跡,误空为空等均是。这大概是受北魏拓跋焘始光间颁字的影响。按《魏书·世祖纪》"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永为楷式",故北魏石刻中别字甚多。如墓志中以陵为崚、长为镸、士为仕、使为史等例不一其见,沿至隋唐仍有习用者名曰帖写。清代赵之谦、罗振玉均有关于魏书体别字的集考。

此志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081)

48. 殷州刺史崔楷墓志

北魏　孝昌间(525—527)　志呈长方形,石右下角及下部多残缺,字颇漫漶,残高35.4厘米,宽48.5厘米。13行,行约14—16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此志未见他书著录。志称崔楷字模之,河南济源人。而《魏书·崔辩传》记辩为博陵安平人,其第三子楷字季则,均与志不符。志文中未叙及楷之出身经历,仅叙守殷州拒葛荣死难事,与传完全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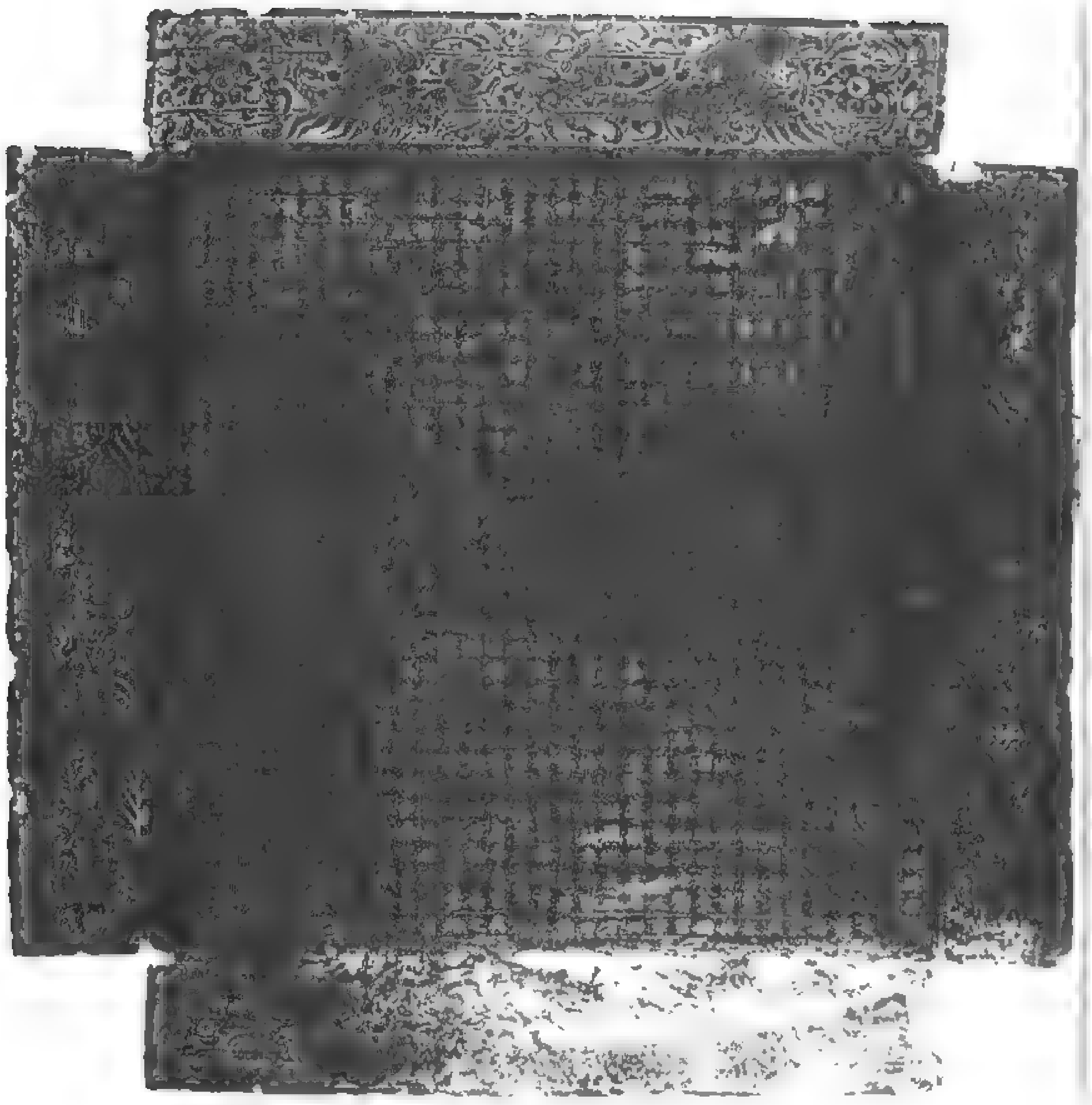
墓志书法在楷隶之间，颇草率，似为临时仓猝刻成，字多漫漶，记时隐约似有大魏孝昌三年字样。传载拒葛荣为孝昌三年春事，肃宗亦有孝昌三年春正月“辛巳葛荣陷殷州，刺使崔楷固节死之”。志末有“众见公尸于□□中瘞之”的语句，可知仓皇中只记死难事，而对字与籍贯或未详，致与传有出入，因纪年不清故附于魏末。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649）

49. 武阳县开国公侯刚墓志

北魏　孝昌二年（526）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82 厘米，33 行，行 33 字楷书，戴智深撰文，志四侧饰云龙花纹。盖作覆斗式，四刹饰花纹。1927 年洛阳城东北马沟村西陵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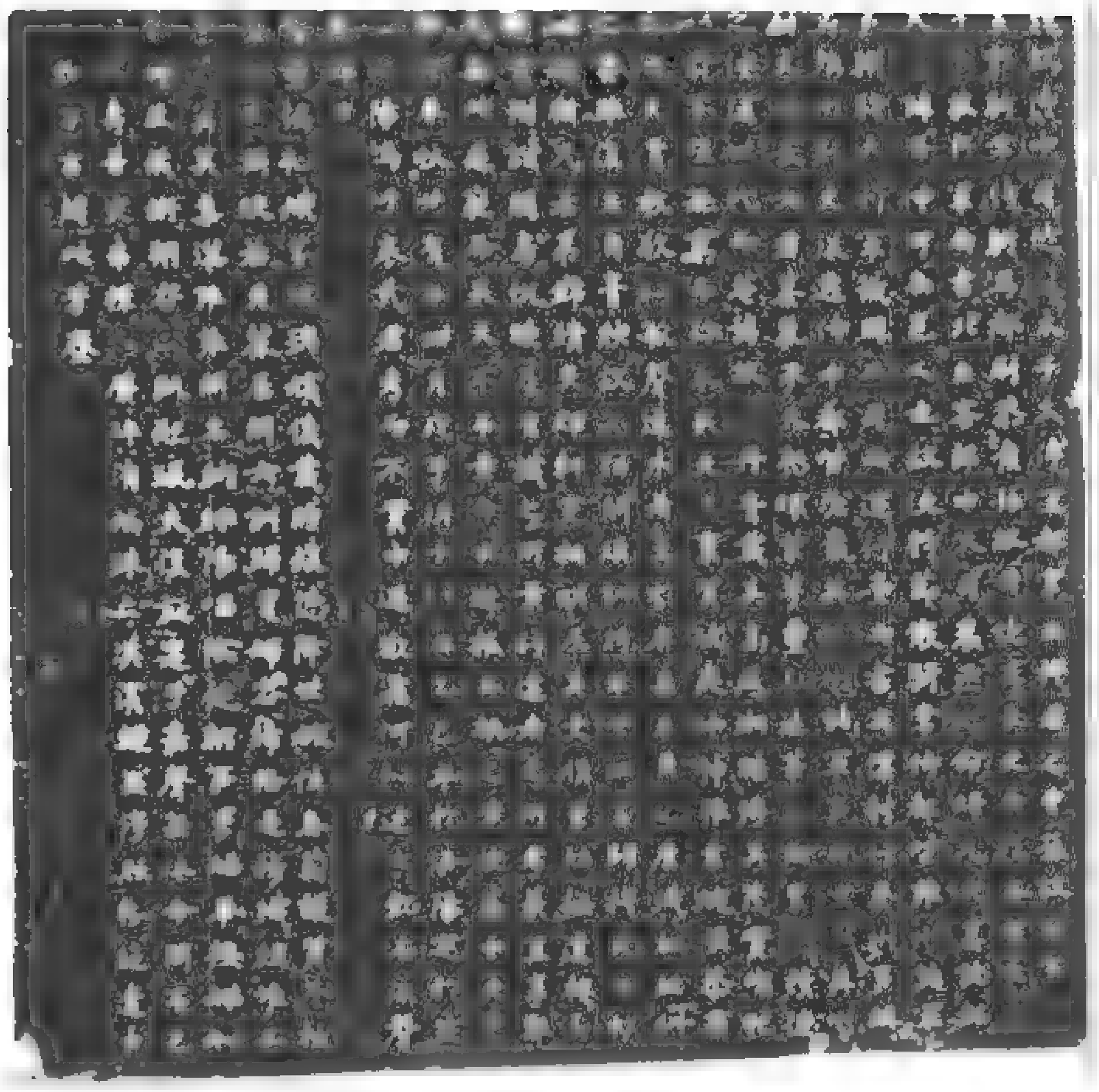
此墓志书法秀整，末行有“侍御史谯郡戴智深文。”数字。魏志中署撰志人姓名，极为少见，此为一特例。志盖为覆斗式，上分九格，中刻阳文篆书“魏使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阳公志”16 字，四角有提环，格内减底阳刻莲瓣花纹，中格上下左右四格均减底刻镇墓兽一，姿态凶猛生动，斜侧各刻战国以来传统式云龙纹，边侧各刻北魏流行的忍冬图案花纹。志四侧亦减底刻镇墓兽串云龙纹的图花纹，技法严整刀笔流利，为北魏志石中一件精品。

《石刻时、地、记》、《北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并集有松翁未焚稿详细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98）

50. 伏波将军尚书北主客郎中大司农丞穆彦命妇元洛神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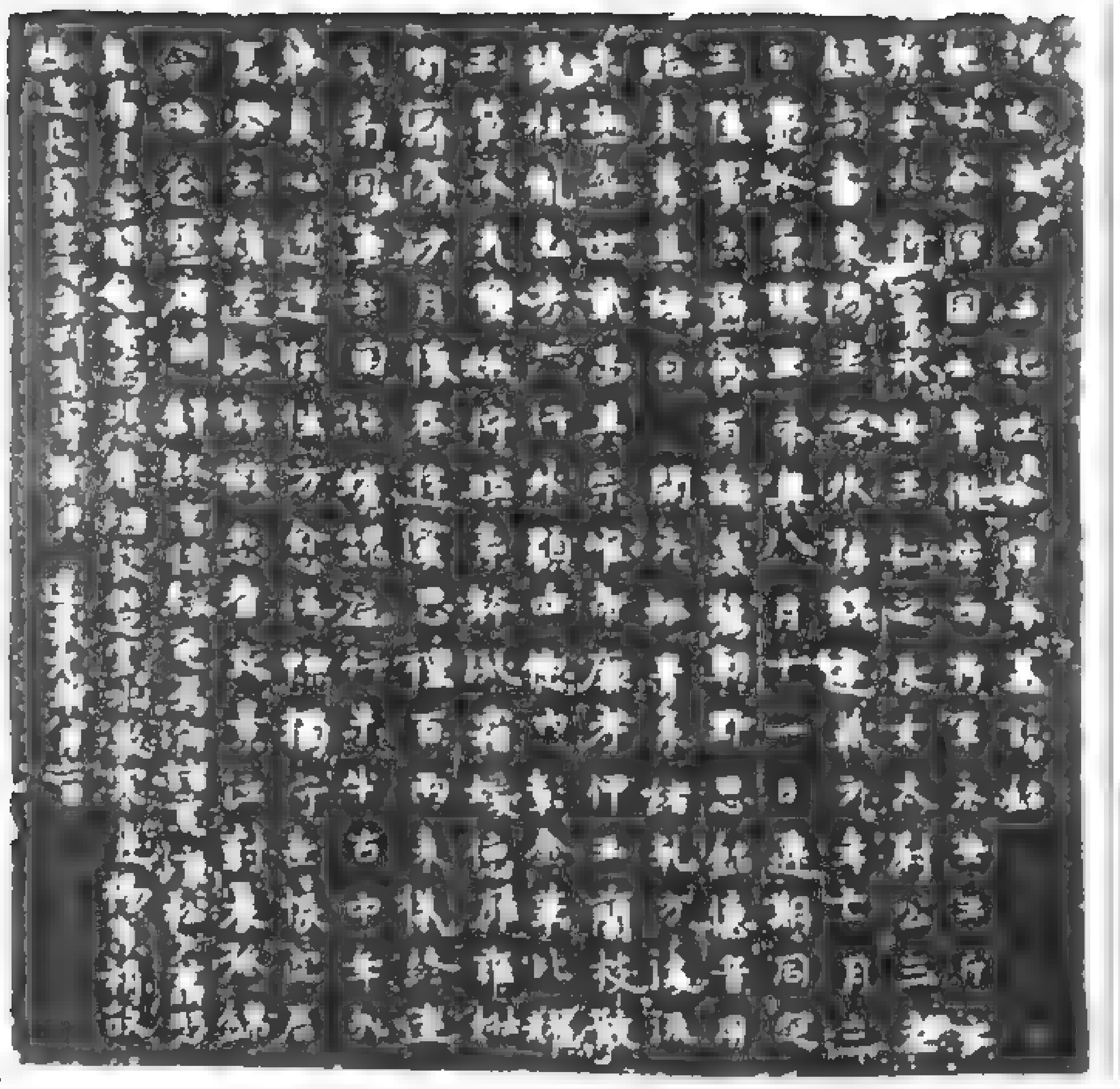
北魏　建义元年(528)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69 厘米，13 行，行 24 字楷书，有盖楷书 9 字，1928 年洛阳北白鹿庄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此志未记卒时年号，仅书“四月戊子朔十八日己巳卒于洛阳窆于芒山之阳”。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定为武泰元年，而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定为建义元年。且根据穆彦元寿两志，定元洛神为穆彦之妻，甚是。按《魏书·肃宗纪》、《敬宗纪》，武泰、建义、永安三年号均为 528 年，三月前为武泰，四月至九月为建义，九月以后则为永安元年，故列此志为建义元年。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61)

51. 元鉴妃吐谷浑氏墓志



北魏　建义元年(528)　　志呈四方形，高 50 厘米，宽 48 厘米，17 行，行 17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北前海资村北与元鉴墓志同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此志书法奇玮，但别字甚多，如颢作颢，體作躰，凝作徴，雍作廱，庭作逭，髮作镺，衾作食均是，亦可能属当时风尚的原因吧。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67)

52. 冀州刺史博野县公笱景墓志

北魏　永安二年(529)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68 厘米，27 行，行 26 字，楷书，盖作覆斗式，中题“魏故仪同笱使君墓铭”九字篆书，1928 年洛阳城西东陡沟村西南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此志书法秀整，盖满刻花纹。中减底篆刻题衔九字，有方界格。上刻两对称迦陵频伽手持莲蕾供物，下刻对称翼牛、翼兔各一，中为火珠形宝供，两侧各刻有对称镇墓神兽各二，均间以中国传统的云龙纹，构思富丽，刀法圆熟，给人以雄浑华美的感受，当时的佛教艺术已极盛行，由此志上的纹饰足以看出中西艺术构图融合的技法，启发了唐代更为成熟的石刻花纹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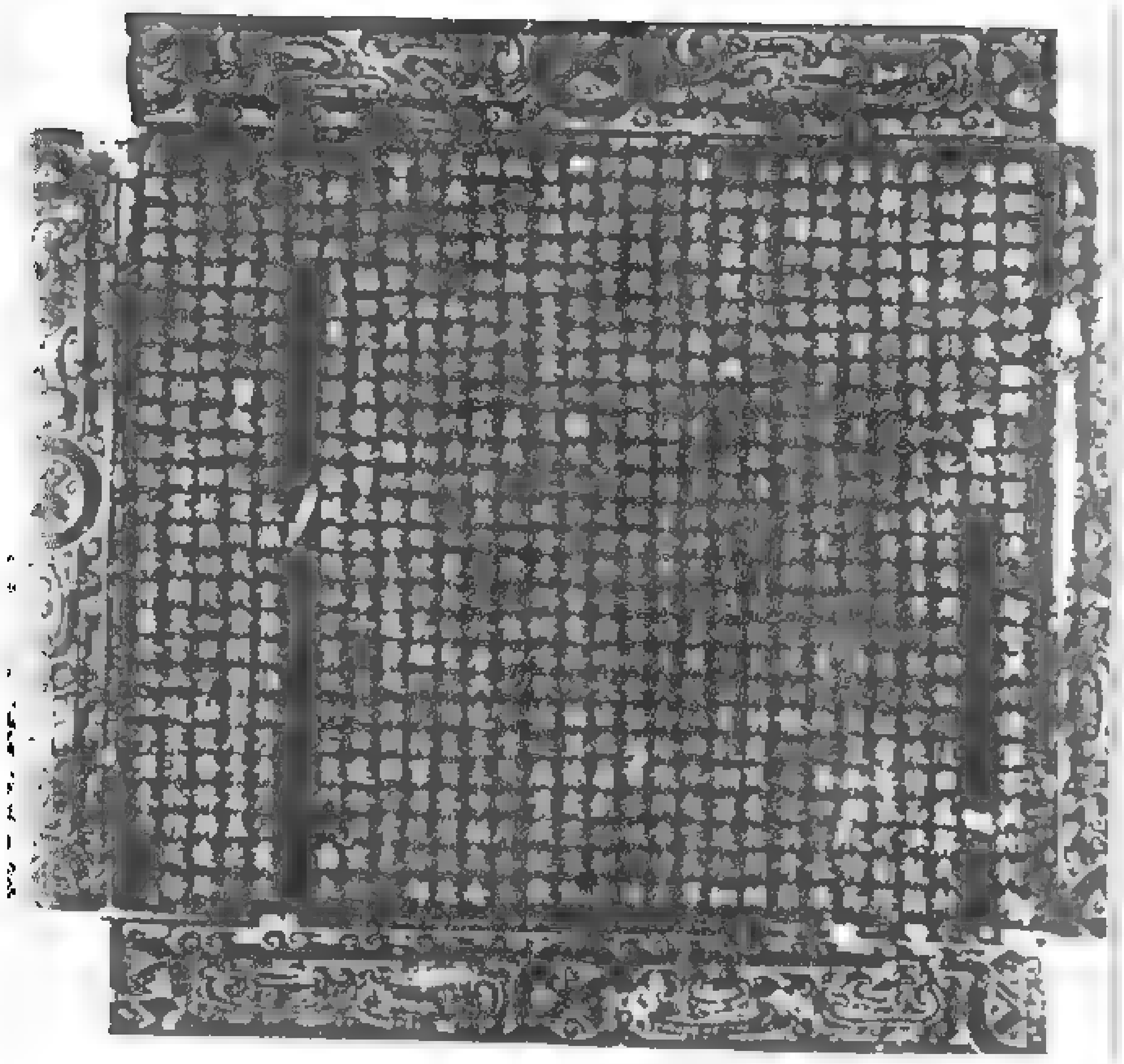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62)

53. 冀州刺使赵郡开国公尔朱绍墓志

北魏　永安二年(529)　　志呈四方形，高 63 厘米，宽 74 厘米，29 行，行 26 字楷书。1928 年洛阳城北十里头村南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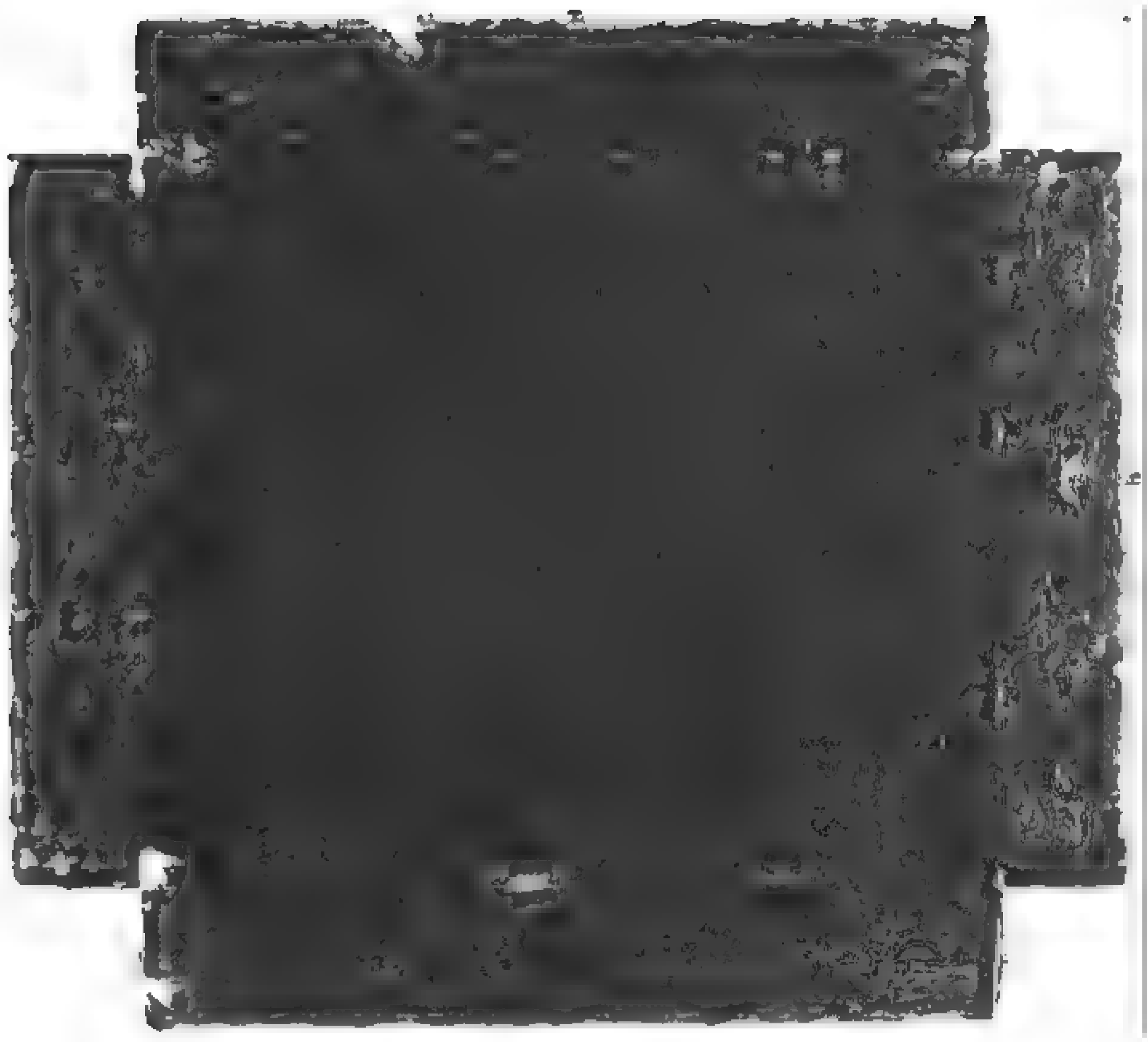
此志四侧有减底阳刻穿壁云龙图案花纹，书法秀整。《石刻时地纪》、《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并集松翁未焚稿详细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00)

54. 尔朱袭墓志

北魏　永安二年(529)　　志为四方形，高 64 厘米，宽 74 厘米，28 行，满行 26 字。1928 年，由洛阳北十里头村西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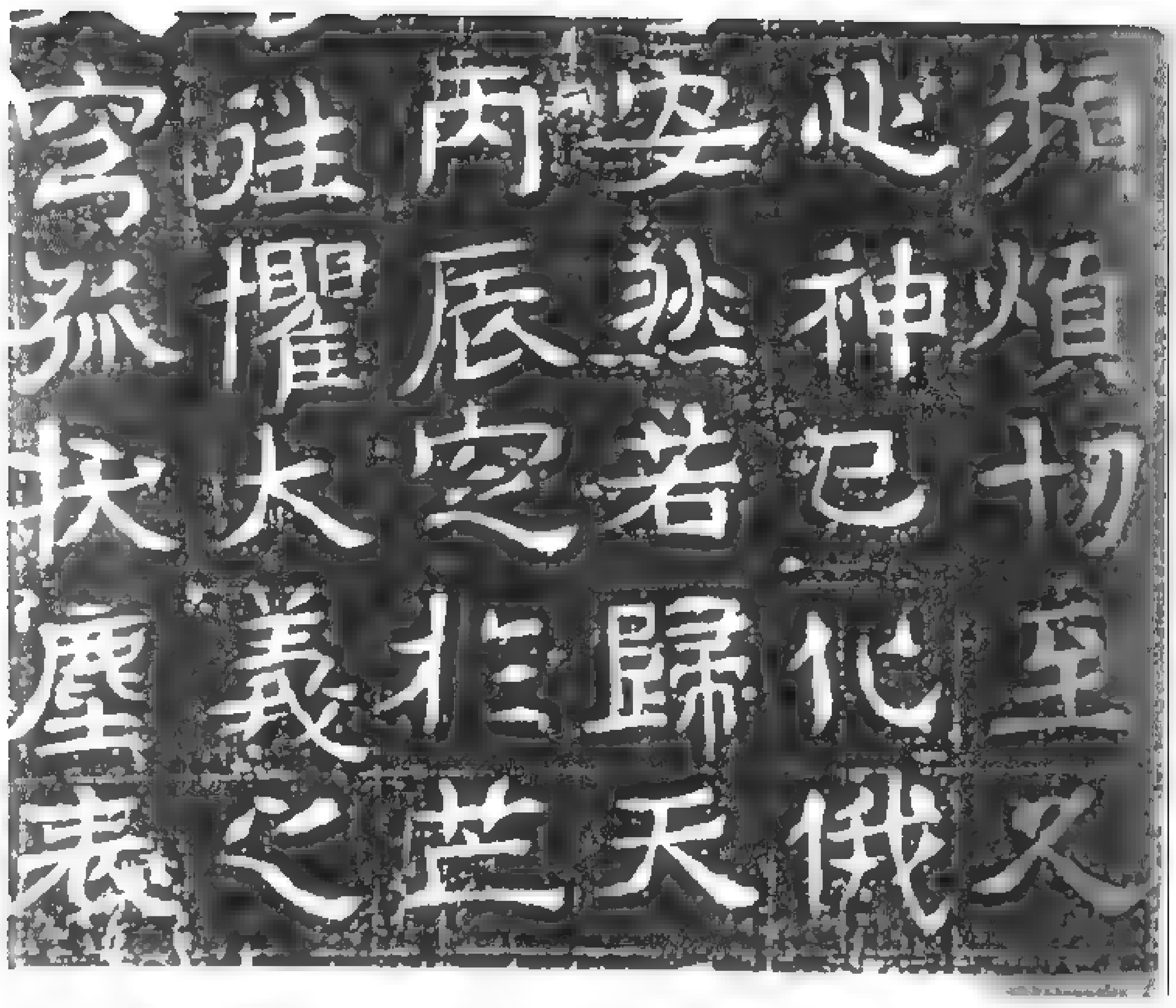
尔朱袭字显伯，北秀客人。据墓志载，多因战功累迁州至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定州诸军定州刺史万年县开国伯。《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及《汉魏六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和考证。

此志有盖，盖呈覆斗式，正中减底阳刻篆书“魏故仪同尔朱君墓志”九个字。字间有方界格，四角有提环配以圆形莲盖纹饰，作为四面分界，上刻朱雀，下刻玄武，左为青龙，右作白虎，四灵身上各骑一类似菩萨的神人，可能在南北朝时，一般为区别麟、凤、龟、龙而又为区别当时将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称为四神的概念，因而才有各骑一种人的构图，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墓志盖四刹均刻有云龙图案花纹，线条流畅秀丽。志侧四面还各刻两镇墓兽围攻一恶魔作搏斗状花纹，构图繁复富丽，刀法流利圆润，为志石纹饰中极好的一件作品，充分表现了当时艺匠的豪迈气概。此外，墓志图案所显示的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技巧，以及为研究北魏时代衣冠等所提供的资料，都是非常可贵的。

现存西安碑林第一墓志廊。

55. 昭玄沙门大统僧令杜法师墓铭

北魏 永熙三年(534)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5 厘米，21 行，行 22 字，楷书含有隶意，盖覆斗式，中题楷书 4 行，行 4 字，1929 年洛阳东北蟠龙冢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志题昭玄沙门大统是管理众僧的上级僧官。北魏盛倡佛教，以佛化作为统治手段，上行下效，归依者众，因而僧众中有颇多不法行为，遂置僧官管理。魏文成帝拓跋浚和平元年(460)始置沙门统一管理众僧，以开凿云冈五大石

窟，而著名历史的昙曜当此任。志称昭玄沙门大统僧令法师姓杜，京兆人，"被征为沙门都维那""庄帝聿兴，仍转为统"，是说明僧令由都维那，升为昭玄沙门大统的。按《魏书·释老志》说："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以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之。"又说"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无籍之僧。"可见僧众多有不法行为，必须有籍，才便于管理。还说："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齐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齐都维那等印谍，然后听行，违者加罪。"《隋书·百官志》中也说"后齐制官多循后魏"，后齐"昭玄寺掌褚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这都说明昭玄，大统，都维那，维那等为管理众僧的各级官员。隋代官制多依前代，《魏书·百官志》虽未提到隋代僧官，而都维那、维那等名称，颇见于当时造像题名中，可知此制度仍旧沿用。僧令此墓志既记为昭玄沙门大统，必为当时名僧，而《释老志》提到的沙门统，昙曜后为惠深，并说"世宋(元恪)以来至武定末(520～550)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钦、僧献、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荣、道长，并见重于世"，却无僧令之名，因而，此志可弥补史书的缺漏。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81)

56. 平北将军殷州刺史元瑗墓志铭

北魏(386—534)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49 厘米，3 行，行 13—14 字不等楷书。1926 年洛阳后海资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此志仅刻前三行，只记葬者衔名世系，似系志未刻成便草草入葬的，为墓志中的异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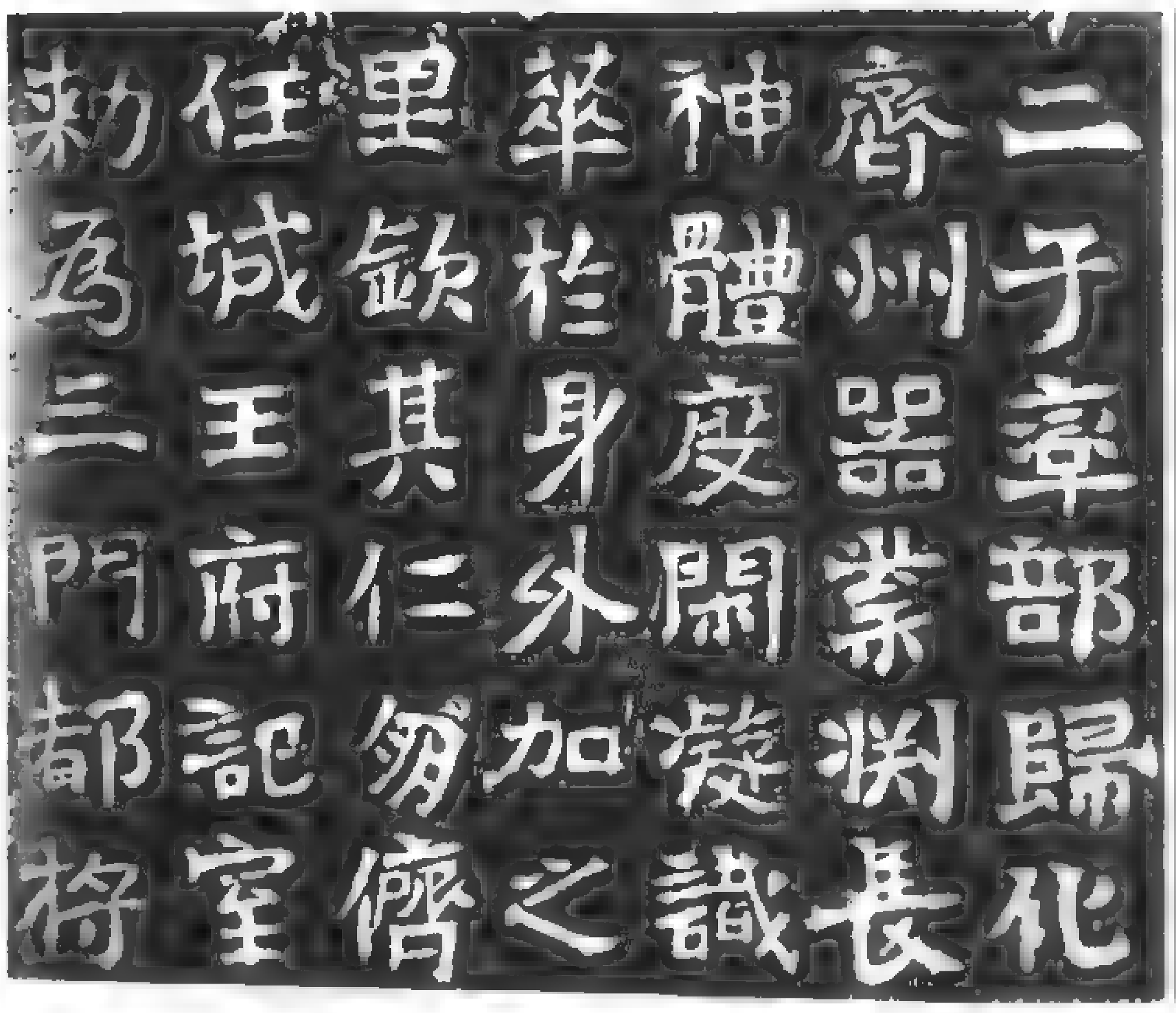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和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60)

57. 闾仪同伯升及夫人元仲英墓志铭

东魏　兴和二年(54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65 厘米，29 行，行 29 字



楷书，石斜裂一缝泐 29 字。河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志称伯升为茹茹主后裔，夫人为咸阳王元禧之女，夫妇同年死葬，一石并刻两志各有题首起讫，为墓志中仅见，真所为鸳鸯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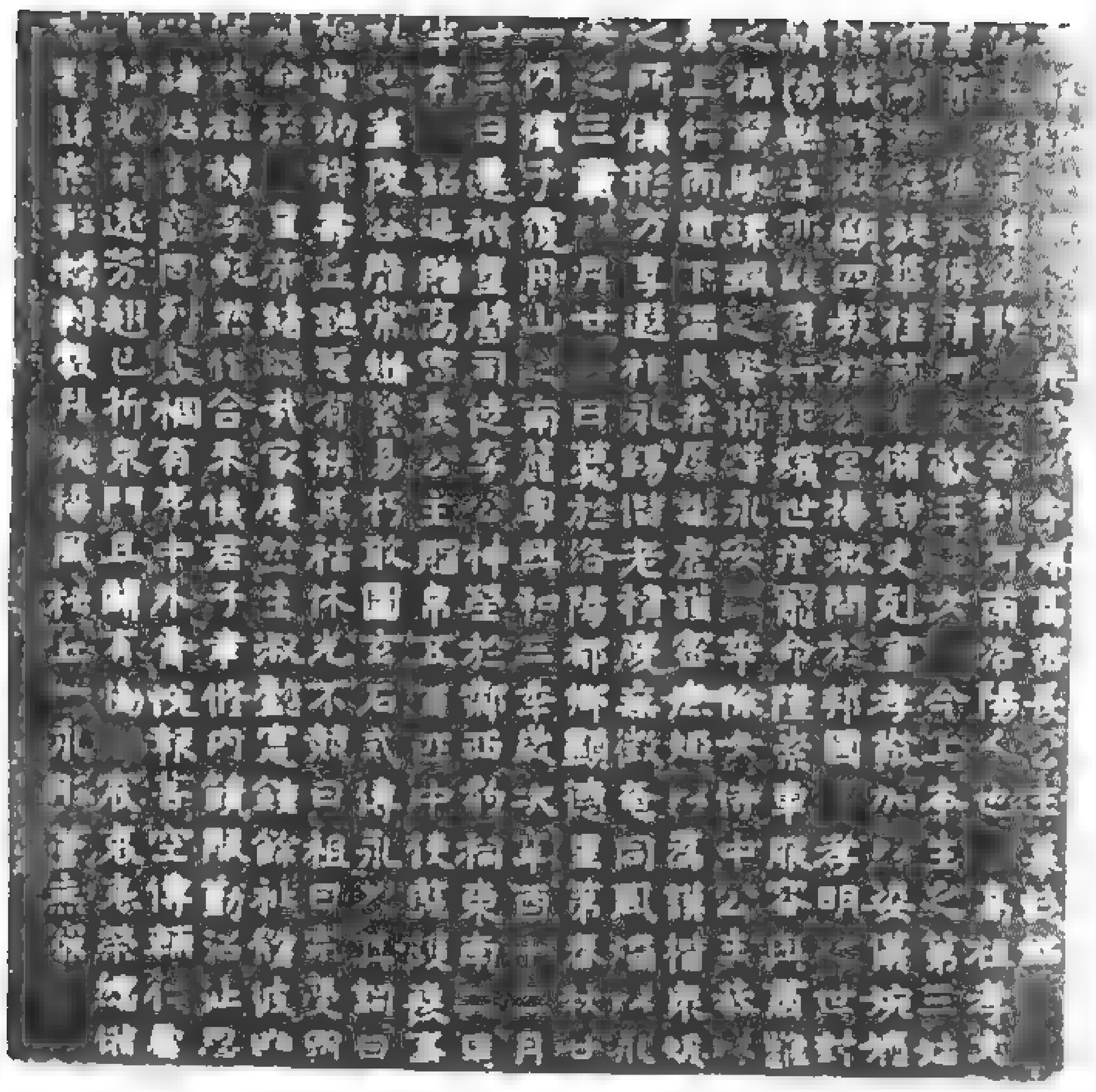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078）

58. 李挺命妇元季聪墓志铭

东魏　兴和三年（541）　志呈四方形，高 48 厘米，宽 47 厘米，20 行，行 22 字，楷书，盖为覆斗式，中篆书，12 字 4 行。河南安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志称李聪为孝文帝元宏之孙，清河文献王元怿之女，清河文宣王元亶之妹，孝静帝元善见之第三姑，司徒李神儁（挺字）之妻，曾除女侍中。《魏书·孝文诸王传》多阙文，得此志可补订。《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李挺志尾记有元妻为彭城刘芳第二女幼妃，未期而亡；又娶江阳王继第三女阿妙，卒于穰城；又娶清河文献王第三女季聪。以为神儁卒时清河王女尚健在。依此志季聪于永安三年 21 岁时死于洛阳，兴和三年李挺 64 岁死后合葬于邺（安阳）。是季聪尚早死于李挺 12 年，得此志可以更正史籍的错误。

《汉魏南北朝墓志释》无著录。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38）

59. 源磨耶圹记

东魏　武定八年(550)　　志呈四方形，高 33 厘米，宽 41 厘米，10 行，行 10 字，楷书，河南汜水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此圹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并集有陆增祥《八琼宝金石补》正十九及端方陶斋藏石记九的详细考证。据圹记载磨耶死时年仅 6 岁，即为刻石记墓，可见魏人对死者过为重视的陋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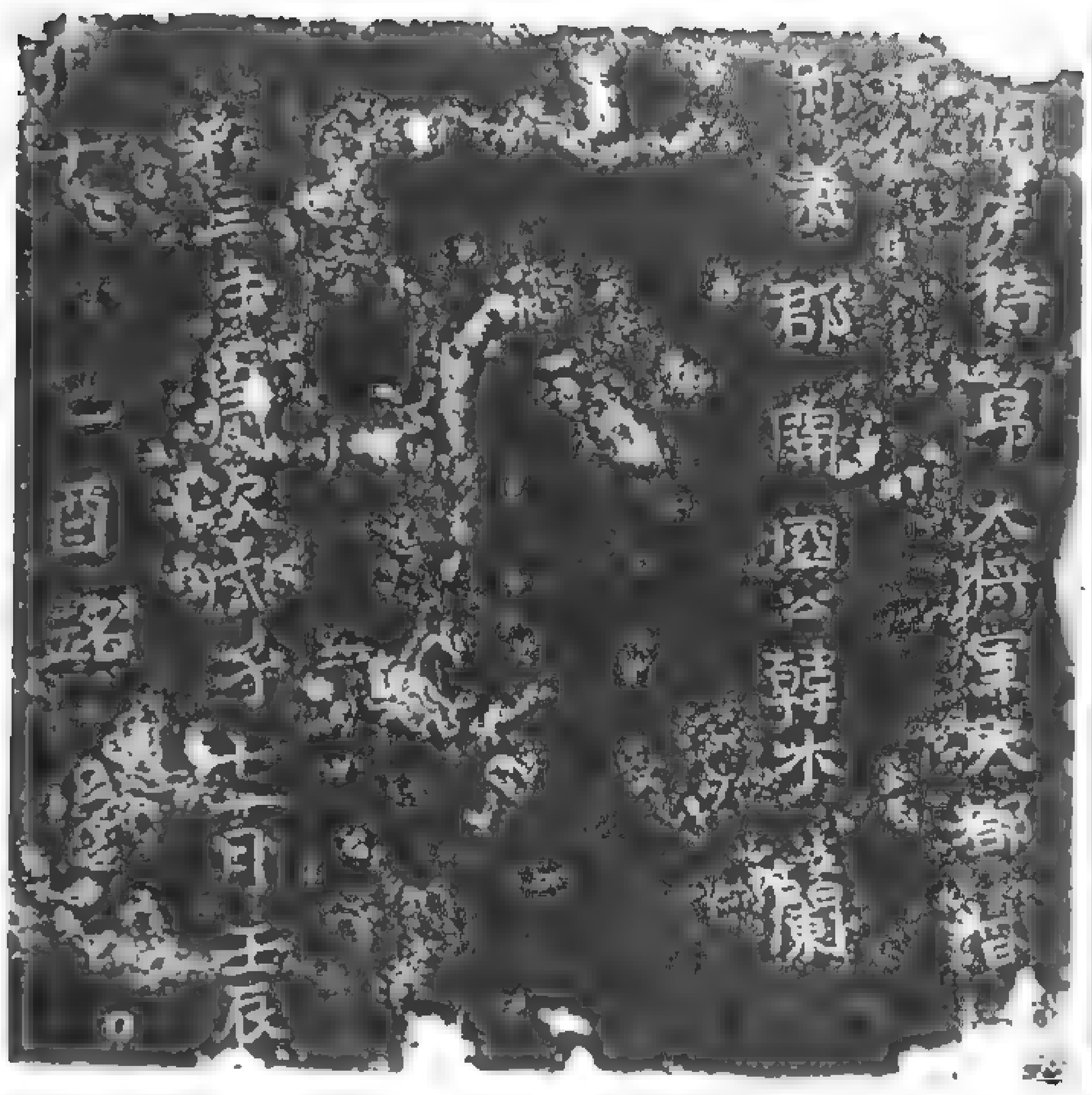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83)

60. 征西将军上洛县开国男元子邃墓志铭

北齐　天保六年(555)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为 49 厘米。23 行，行 30 字，楷书。河南安阳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志尾一行刻有“今葬后九百年必为张僧达所开，开者即好迁葬，必见大吉”一行，系厌胜的语词，荒诞不经，古志多有，《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多有引证。至隋唐此类语词即转为“开者即死”一类恐吓语句。如 1957 年西安西郊仪表厂出土的原昭成尼寺隋李静训石棺上的刻字即是，此石棺现陈列于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内。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208)

61. 新义郡公韩木兰墓志

北周　天和三年(568)　　志呈四方形，高 28 厘米，宽 29 厘米，4 行，行 7—13

字不等，书法楷书，河南洛阳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志云：木兰名雄为韩擒虎之父。唯志只载职衔及志铭年月，而不著里贯事迹，为一般古墓志中所罕见。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并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16）

62. 通直散骑常侍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高僧护墓志铭

北齐　武平四年（573）　志呈四方形，高40厘米，宽41厘米，15行，行23字，隶书，河南安阳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据志载：僧护为高欢族子，6岁夭亡，即赠开府仪同三司，亦可见权臣滥用威权的情况，较源磨耶仅占籍望，但刻石墓记更为浇漓。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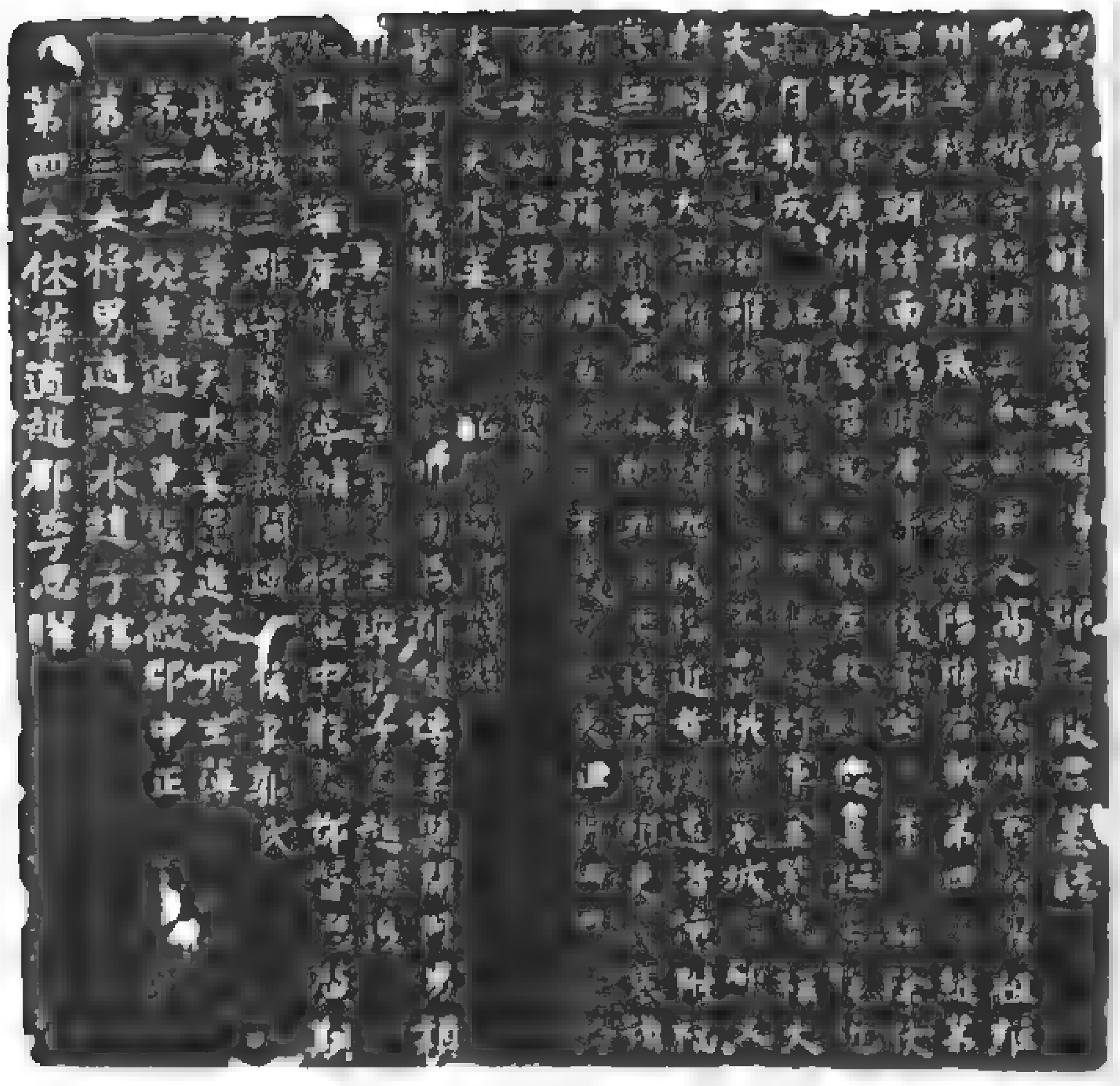
63. 伪齐俗赠车骑将军时珍墓志

北周　宣政元年（578）　志呈四方形，高42厘米，宽51厘米，19行，行16字，楷书，清光绪七年山东诸城西古娄乡出土。

志云：时珍字丽宝，钜鹿人。志题有“伪齐”“俗赠”等字意为古墓志中少见，右还刻“光绪辛巳出城西古娄乡……赠于鼐者。诸城尹鼐”楷书小字，第二行下刻“尹鼐得来”四字篆书印章纹样，均为墓志出土后所刻。是乎记载了墓志出土的时间地点。此志先归长白端方，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

（藏石编号1215）

64. 襄城顺阳二郡太守寇炽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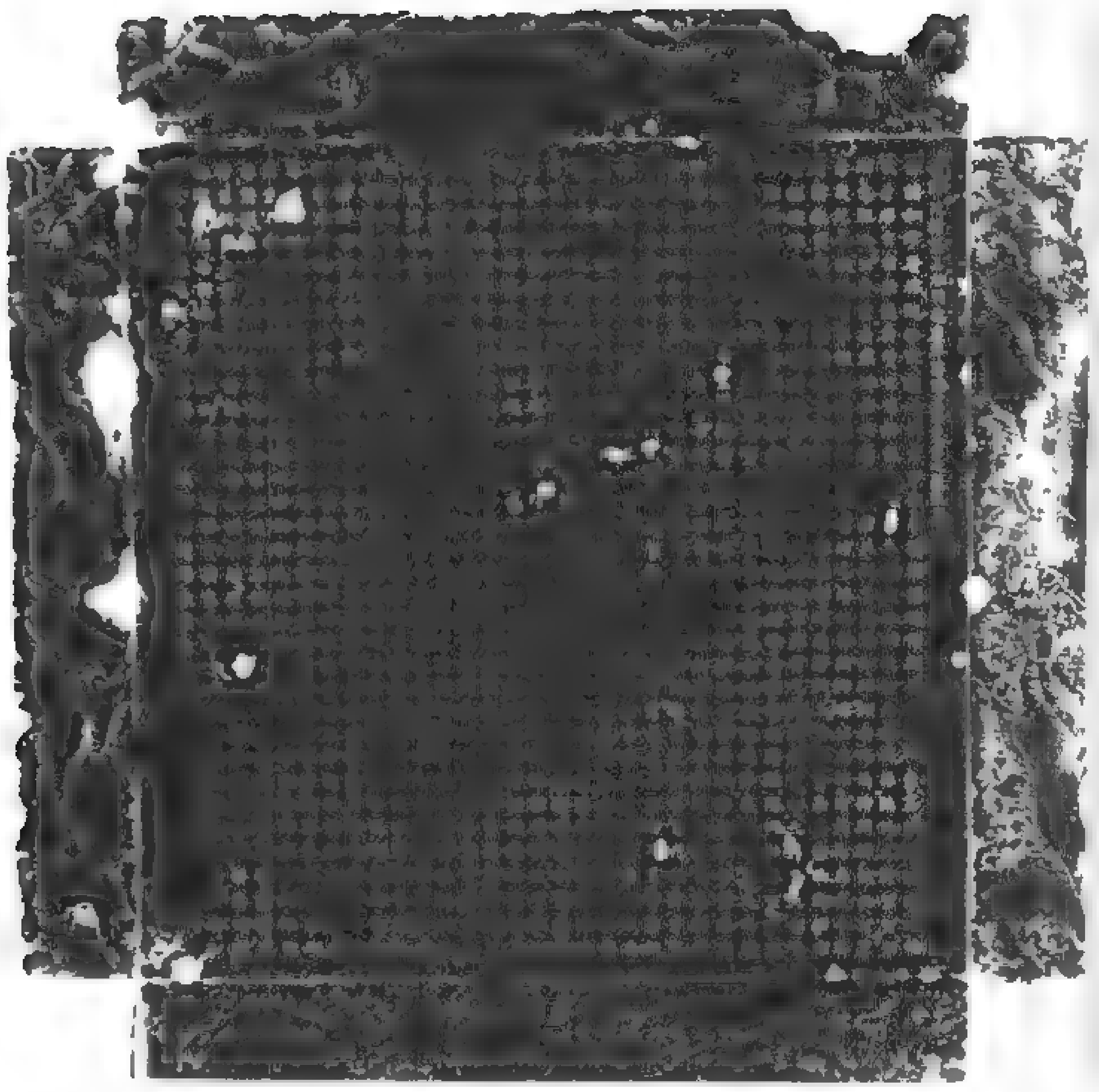
北周　宣政二年(579)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38厘米,20行,行20字,楷书。1925年洛阳马沟村西陵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志云寇炽,字绍升,上谷昌平人。墓志文前叙世系,后详子女,简明不夸,书法尚存北魏风格。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14)

65. 李和墓志



隋　开皇二年(582)　此墓志1964年由三原陵前公社出土。志呈正方形,高、宽各68厘米,33行,满行34字。志盖周边雕刻花草和青龙等图案,中间阳刻篆书四行"大业上柱国德广肃公李史君之墓志铭"16字。志底四边阴刻山、石、树木、野兽,但线条简单潦草。志文内容记载与《北周书·李和传》符合。李和的儿子李彻(字广达),《周书》也有传,在隋文帝时,爵至柱国。这块墓志和北魏墓志一样,未刻撰书人姓名,志文书法瘦劲俊秀,字体属楷书,但仍有隶书笔意。按李和四世都是大将军、刺史等官,这块墓志的书者,也很可能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之一。

现存碑林博物馆。

66. 寇炽妻姜敬亲墓志

隋　开皇三年(583)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58厘米,两面刻,正面阳刻“故襄城府君寇公夫人姜氏铭”9字,背面志文24行,行24字,楷书,1925年洛阳东马沟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48)

67. 来公静墓志

隋　开皇九年(589)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54厘米,21行,行21字,隶书,1927年洛阳城北凤凰台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此志首行数字漫漶,葬者姓名不明。《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考订为来姓,而仍题为□和,《石刻出土时地记》记为字公静,以《隋书》考证,其行谊绝非术士来和。惟志文中有“尚书以德雅辉帝乡”句,似指來豔好学下士,开馆授徒,少历显仕,再迁司空的影响而叙述的,故暂亦订为来姓。志出洛阳城北凤凰台北,《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注出孟津似误。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84)

68. 平安郡守谢岳及夫人关氏墓志

隋　开皇十五年(595)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50厘米,20行,行20字,隶书,有志盖,篆书“大隋故建州平安郡守谢府君墓志之铭”16字。河南洛阳出土。1955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移交西安碑林收藏。

志文叙葬者名岳,经历中曾授太尉府行参军除泾州长史,“武平元季逊事而归”,“周统东爰”,“授平安郡守”,死于隋开皇三年,十五年与夫人关氏合葬而志墓。可知是仕于北齐,归顺北周,死于隋初的。据志所谓建州平安郡,在《魏书·地形志》、《元和郡县志》十九、《太平寰宇记》四十四,俱作安平而非平安,且从无平安郡名。《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为“未知孰是”而存疑质,这是

属治学者慎重虚心的态度，但《魏书》成于北齐天保五年，为当时名史家魏收修撰的，上距北魏永安中初建置建州仅20余年，为时甚近，而早于志作者50余年，当不致将平安误写为安平。此志可能为70多年后的作者对于建置疏忽而致误。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五581）

69.张通妻陶贵墓志

隋 开皇十七年(597) 志呈四方形，高38.5厘米，宽38厘米，19行，行19字，楷书，出土时地不详，1952年张伯英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并集有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二十六，毛凤枝《关中金石存逸考》三，叶昌炽、奇觚庼文集中，等各家详细考证。原志石久佚，此为覆刻，旧存陕西渭南赵乾生家，后归河南新安张伯英，1952年捐赠给西安碑林。原石书法韶秀，墨本甚为难得，此方墓志仅存形骸。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3760）

70.独孤罗墓志

隋 开皇二十年(600) 此墓志为正方形，高、宽各82厘米，28行，行30字，书法楷书，志盖作覆斗式，中刻“使持节大将军赵国德公独孤君墓志铭”16字篆书，四行刻，志四刹周边均刻缠枝花纹，间以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灵图案。1953年由咸阳底张湾M_{22}号墓出土。

现调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71.左葙直长王荣及妻刘氏墓志

隋 仁寿四年(604) 志呈正方形，长、宽各50厘米，24行，行24字，楷书，盖作覆斗式，中题篆书16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述荣字文贵，仕魏历齐周，而卒于邺，经250年至隋仁寿四年始与夫

人合葬洛阳。《隋书·百官志》，领军府管左右厢，为禁卫中之官职，直长疑即直左厢禁军为头目。厢字汉书箱，此志作葙，当为箱的别体，据此可知左右厢官制不始于隋。志盖将刘夫人刻为刘夫，省去人字，当系夫人二字合文，魏以来志盖中屡见。志称王荣死于“邺城东北王直长村”，是以官名为村名。盖作覆斗式，上减底阳刻“魏宁朔将军左葙直长王君刘夫等墓志”16 字篆纹字，叙边四面刻隶书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每面二字，字中间以刻十二生肖纹，四角线刻北魏以来盛行的忍冬花纹，字纹刀法健劲书法精美。此为五行方位与十二生兽字纹混合装饰之一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161）

72. 李文都砖铭记

隋　大业元年（605）　志呈长方形尺寸不计，共 4 行，计 32 字，楷书。1954 年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

按原式录记铭文于下：

维隋大业元年岁次己丑二
月壬戌六月卯雍州大
兴县安盛乡民李文都铭
记

据记铭载：大兴安县即隋的县制，李文都即是安盛乡人，墓地亦可能就在此乡之内。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无编号）

73. 刘尚食墓志铭

隋　大业二年（606）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35 厘米，18 行，行 18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西北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按尚食局统管司膳、司醖、司药、司饎等，尚食为主管局事者。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275）

74. 宫人归义乡君司玺元氏墓志铭

隋　大业五年(609)　　志呈四方形,高 48 厘米,宽 49 厘米,16 行,行 18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按司玺属尚服局,主要管理掌琮玺符节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15)

75. 宫人司乐刘氏墓志铭

隋　大业六年(61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44 厘米,16 行,行 17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按司乐属尚仪局,掌管音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28)

76. 宫人五品司仗程氏墓志铭

隋　大业六年(61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5 厘米,15 行,行 18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志司字下一字损,以志文证之应是仗字。按司仗属尚服局,管理仗卫戎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13)

77. 宫人典彩六品朱氏墓志铭

隋　大业六年(610)　　志呈四方形,高 41 厘米,宽 42 厘米,14 行,行 15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按典彩应属尚工局管掌缯帛。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27)

78. 宫人司饎六品贯氏墓志铭

隋　大业六年(61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46厘米,16行,行17字,1925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按司饎属尚食局管掌廪饩柴炭。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324)

79. 宫人尚寝衣魏氏墓志

隋　大业七年(611)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49厘米,15行,行15字,楷书,1925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按尚寝局统管司设、司舆、司苑、司灯。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317)

80. 席德将墓志

隋　大业九年(613)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43厘米,22行,行22字,楷书,盖作覆斗式,中篆书。1933年洛阳南石山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此志《石刻时地记》有著录,志盖中题"席君之铭"四字篆字。志称"讳德将字道行,河南洛阳人,秦丞相宝子十世孙"。按席为水名。《魏书·宕昌国传》曰"其地自仇以西,东西千里,席水以南八百里"。仇池在今甘肃成县西,晋时氐酋杨氏世据此地,或有以席水而为氏者。再隋马夫人称心志有"坐则同宴绮席,行则共乘香车",是当时有写席为席者,可能"席""席"通用。赵㧑叔《六朝别字记》有带字写为帶者。《晋书》载记《苻坚传》有丞相长史行太子詹事席宝,志称"秦丞相宝十世孙"或即指席宝,宝与苻坚同为氐族,后裔相继仕于北朝。德将年二十四参加隋炀帝杨广镇压杨玄感战事时阵亡,可能撰志者于世系阀阅苦无典要,因取近似名族附益之。《石刻时地记》称志出土时附出的还有"跪子马一,独角兽一,小男人五、抱琶人一,大骑马人一,美人九、角子人六、马上人二、

拉马人二、跪盘人二、骆驼二、外国人四、舞人一、飞虎一、骑装驾鹦二、全车一辆、狗二、鸡一、羊一。"志并记"赠赙之礼已有优诏,然名级未颁阙于镌勒"。可见葬时对有战功的死者尚未赠官衔,却已赐与厚葬,因而有此大批殉葬品,也可见当时厚葬制度及风俗的一斑。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222)

81. 宫人采女田氏墓志铭

隋 大业十年(614) 志呈四方形,高 45 厘米,宽 46 厘米,12 行,行 12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石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隋书·后妃传》载:"炀帝时后妃世妇九嫔以降,有御女品正第六,采女品正第七,是为御。"采女是职位卑下的宫人。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239)

82. 宫人司宝陈花树墓志铭

隋 大业十年(614)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41 厘米,13 行,行 14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按史书载:司宝属尚工局掌管金玉珠玑钱货。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16)

83. 樊三品宫人墓志

隋 大业十年(614)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48 厘米,17 行,行 20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按《隋书·后妃传》载:炀帝自定三夫人品正第一,九嫔品正第二十二,婕妤品正第三、樊三品宫人,可能为婕妤的一员。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05)

84. 明云腾墓志

隋　大业十一年(615)　志呈正方形,长、宽各58厘米。盖作覆斗式,中刻“明君墓铭”四字篆书,周边阴线刻缠枝花纹。志文23行,满行23字,笔法瘦劲端整,楷书中间隶意,为西安碑林隋代墓志代表书法作品之一。

据志文记载:明云腾,河南洛阳人,曾祖范,魏宣武将军迁雕阴太守。祖畅,齐奉朝廷。父度冀州信都县令。明云腾文职出身,品学兼优,拜文林郎加上郡三川县正,能尽忠尽职,不幸早逝,年仅四十,隋大业十一年(615)葬于洛阳宫城东北十里亥地。此墓志1926年由洛阳东北吕家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博物馆。

85. 宫人采女田氏墓志

隋　大业十一年(615)　志呈四方形,高44厘米,宽45厘米,13行,行15字,楷书,1925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此志未著年号,仅列十一年,按开皇大业均有十一年,惟采女为炀帝所定宫官名称,故记时为大业十一年。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39)

86. 宫人司饹丁氏墓志铭

隋　大业十一年(615)　志呈四方形,高39厘米,宽40厘米,14行,行17字,楷书。1925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志中的饹同饰,按司饰属尚服局,管掌汤沐中栉瓯弄。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320)

87. 翟突娑墓志

隋 大业十一年(615)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36厘米，18行，行20字，楷书。1930年洛阳郑凹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对此志有著录考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并集有向达著《唐代西域文明》第七西亚新宗教入长安一节有详细考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89)

88. 桃林县令王衮及妻任城夫人合葬墓志

隋 大业十一年(615)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51厘米，31行，行31字，楷书。志首题有"著作佐郎摄起居舍人济阳蔡允恭撰志"。1926年河南洛阳邙山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石刻时地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有著录考证。志称王兖为晋王遵十世孙，其妻萧夫人为梁明帝萧驾长女，隋炀帝萧皇后姊。志撰者蔡允恭在两唐书均有传可查，桃林县系隋以汉弘农县改置，为长安洛阳之间必经之地。《通鉴》载有隋大业元年"废二崤道开蔓册道"注云此皆东西二京往来缘道。唐天宝初于县得老子宝符，更名灵宝，即今河南灵宝县，有古函谷关遗址。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291)

89. 东垣县主簿张浚墓志

隋 大业十二年(616) 志呈四方形，高43厘米，宽45厘米，33行，行33字，楷书，盖有阳刻篆书，1923年洛阳北前海资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著录、《石刻时地记》载同坑出土唐贞观七年与夫人合葬的又一张浚(志作叡与睿通)，字号籍贯葬地均同，惟世次历官享年互有异同。疑系夫人后葬时，另刻志石致有出入，盖断为二，四刹及边侧有线刻花纹

均精美匀称，志侧图案花纹残泐。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219）

90. 宫人司言杨氏墓志铭

隋　大业十二年（616）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34 厘米，15 行，行 16 字，楷书，1925 年洛阳城西后洞村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按司言应属尚宫局，管掌宣传奏启等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22）

附记：西安碑林收藏隋大业间宫人墓志计有 39 种，与《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著录者全同，较《石刻出土时地记》著录少宫人刘氏、元氏两墓志，其余志石均存西安碑林。据《石刻时地记》校录者王广庆所记，洛阳隋宫人志出土者不下四五十石。1925 年相继由城西后洞村西北寇姓田中发现，他处出土者仅二石。“埋石地区约七八亩，东西排比，相距六步，如今日之公墓，亦有空来葬人者，间亦有陶器铜镜出现”。乃知其地为隋东都宫人丛葬之所。隋代宫掖女官制度，见《隋书·后妃传》各志中所记宫人职位品级均与史合，《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均有著录考证。

91. 王成墓志

唐　贞观初年（627—649）　志呈四方形，高 32 厘米，宽 33 厘米，18 行，行 18 字，楷书。1928 年由洛阳北郑凹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志称王成为王猛十世孙，于“隋开皇四年孝廉入第，释褐任木工监，俄迁左校署监”，“春秋七十”而殁，是死时当在贞观初年，故列唐初。按《隋书·百官志》，“将作寺大匠，统左右校署令丞，各有监作等员”。王成于开皇四年后任木工监，俄迁左校署监，正为隋初新建大兴城土木工程之时，亦即参与修建唐长安规模基础的人物之一。《隋书·高祖本纪》开皇二年诏以“此（汉）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场”，命“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等创造新都”，“名新都曰大兴城”。又《宇文恺传》“及迁都，上以恺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

凡所规划皆出于恺”。隋由旧汉城迁都大兴城，为开皇二年，即任宇文恺营新都副监规划一切。王成于四年释褐即任木工监，不久又迁升左校署监，可见为宇文恺手下参与兴建长安城实际工作之一有力的助手。《炀帝纪》大业元年“三月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志称王成死于洛阳，叙其历官而未详所事，仅以“职务烦剧”，“勲忧损年”概括其生平，也就可以推知其亦是参与隋东西两京兴建工作者。因此事有关长安城的历史，故略记如上。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249）

92. 安定胡永及妻张氏合葬墓志

唐 贞观二年（628）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7 厘米，27 行，行 27 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书法楷隶间用，文体尚存魏风格，可藉以了解志文发展演变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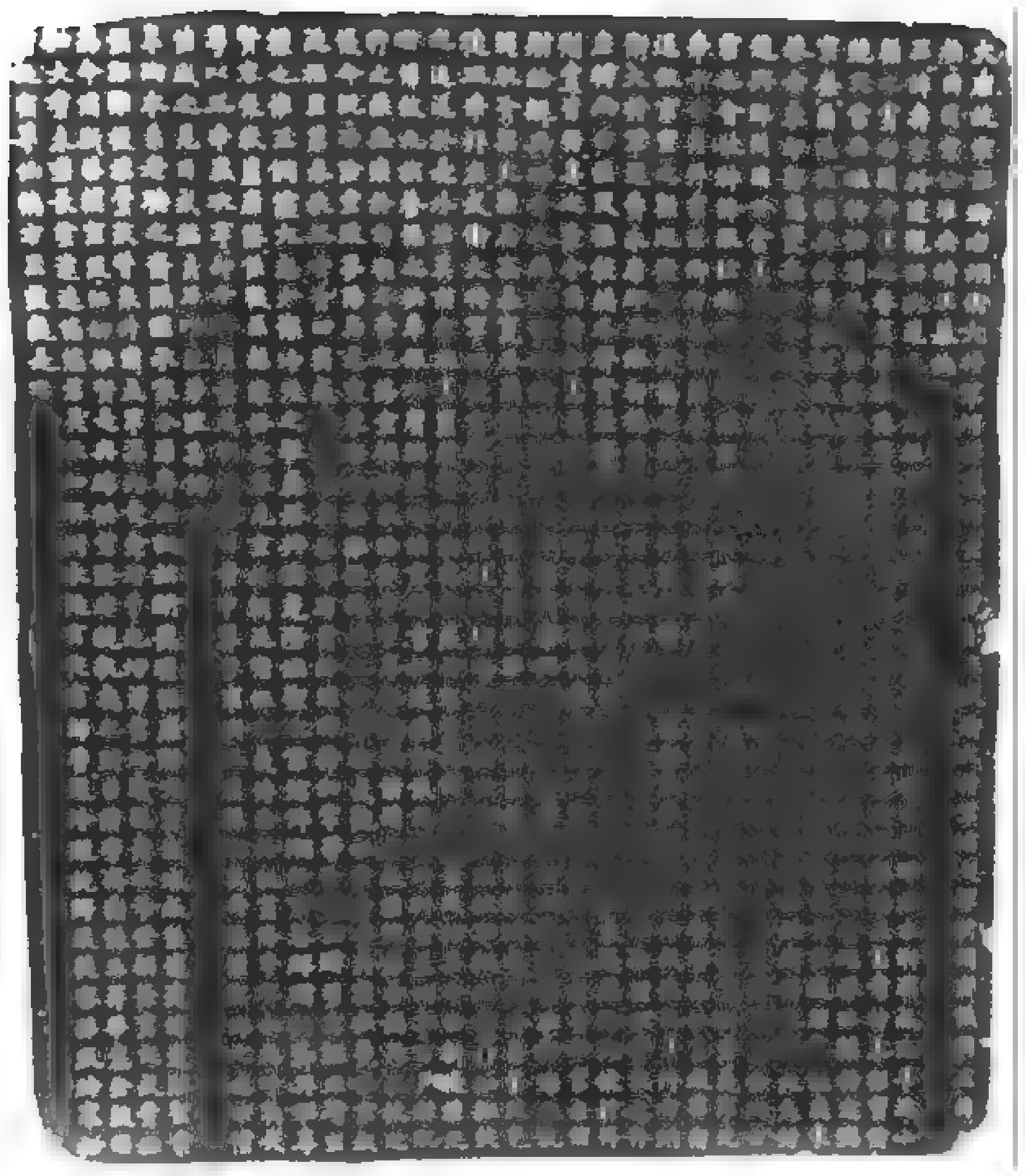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35）

93. 李寿墓龟形墓志

唐 贞观四年（630） 此墓志形制特为别致，兽首、龟身、四足趴伏在长方形座上，高 64 厘米，宽 96 厘米，长 166 厘米，从志石初出土残存的颜色看，全身像彩绘贴金，可惜已全部脱落。

这龟志是以龟背作盖，中减底阳刻“大唐故司空公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16 字篆书，志文 31 行，满行 37 字，书法楷书，笔画清秀，无撰书人姓名。墓主人李寿（577—630），字神通，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官封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死后诏赠司空。从志文内容看，为了达到对死者歌功颂德的目的，在字里行间采取有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描写手法。《封氏闻见记》卷六：“（王）俭所著丧礼云：施石志于圹里……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记姓名，历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文。”按此，似乎说撰写墓志文要“文与人符。”但从李寿墓志了解，事实并非如此。李寿武德二年（620），李寿同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作战时，明明被打得“全军陷没”，且当了俘虏（见《旧唐书·本纪第二·列传十》）；而志文却吹嘘为“禁令肃清，仁惠孚洽，扶老携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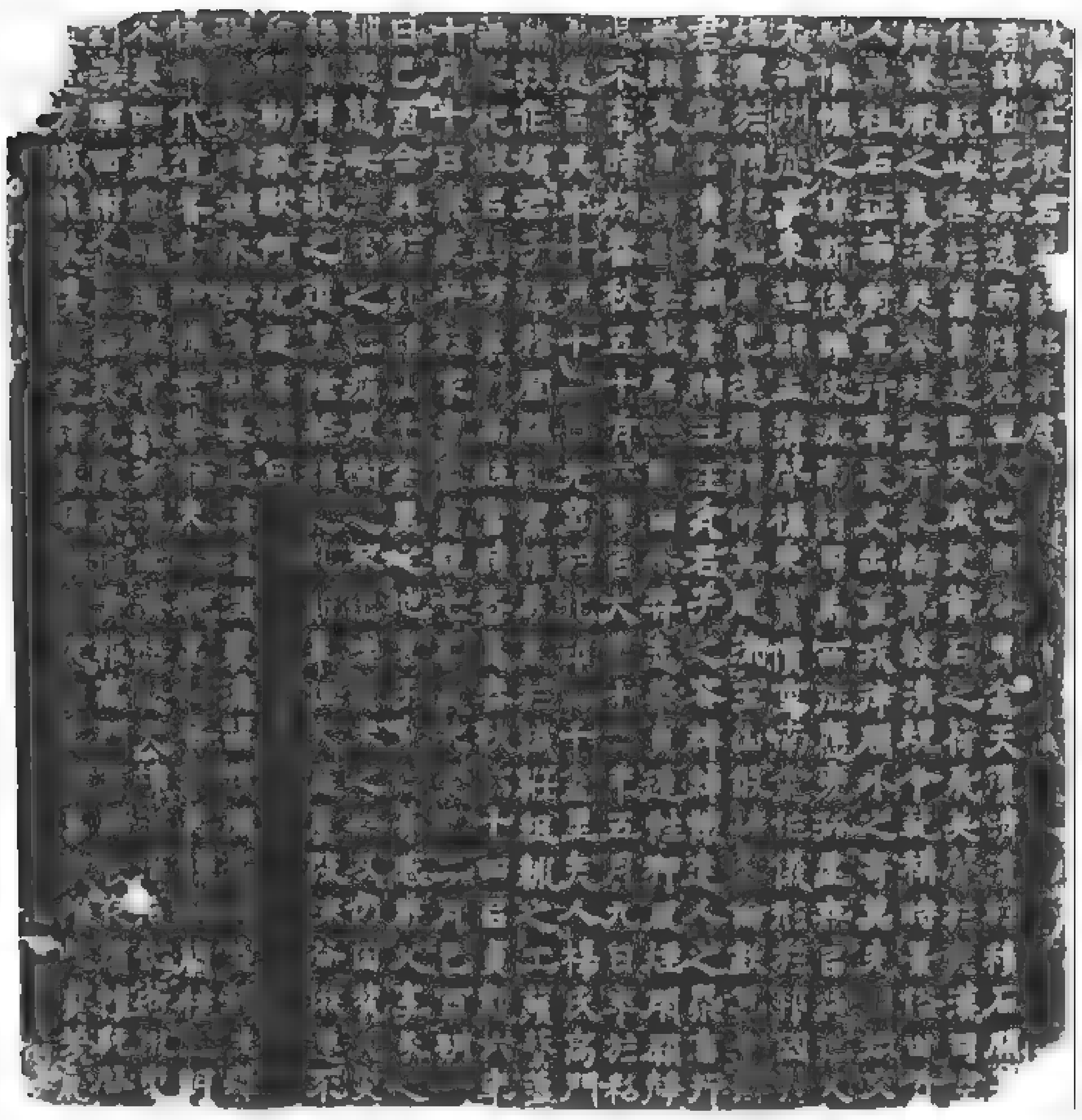


动色相趋。"武德四年，李寿同刘黑闼作战时，"望风皆破"，"皆为（刘黑闼）所败"（见《旧唐书·本纪第二、列传十》）；而志文则说"累致克捷"，真是弥天大谎，极尽歪曲历史事实之能事。墓志四边饰龟甲、联珠、蔓草等花纹。整体显得庄严华丽。龟形墓志历来罕见，解放前洛阳曾出土过北魏建昌二年的元显俊龟形墓志一合（见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已流落国外，现国内仅有这一合，值得倍加珍视。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94. 处士张叡墓志铭

唐　贞观七年（633）　正方形，高、宽各50厘米，24行，行25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按隋墓志中有处士张叡志与此志同时出土，姓氏籍贯葬地均同，仅世次历官享年略异，疑前为先葬志墓，此为合葬时所刻。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1334）

95. 静信乡君张夫人妃墓志铭

唐　贞观八年（634）　志呈正方

形覆斗式，高、宽各46厘米，两面刻文，上方阳刻篆书“马君志铭”四字，里楷刻志文20行，行20字。1925年洛阳东杨湾村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志石文书张夫人妃事，惟文中未提及马君只字，为志石中所仅见。查碑林中所存隋马少敏志石，尺寸与此志全同，志文叙及马君（少敏）于隋仁寿四年春秋六十终于家，権窆安阳河北万金乡，亦未提及张妃只字。张妃志述，唐贞观七年春秋86岁卒于家，八年合葬于洛阳清风里，而未提及合葬者为谁。以两志所记年、时计算，仁寿四年春秋六十与贞观七年春秋八十有六，就年庚推算，马君仅长张妃三岁当是元配，所以马志有“黄金重诺白珪无玷”，张志有“偕愿不遂丧俪兴悲”的叙述。因而疑马君志石，原分为志和盖二石，马少敏曾为北齐员外郎，周隋间闲居信佛，客死安阳，撰志者未叙及其夫人，至张妃殁于洛阳迁葬马君时，即藉原志盖以刻夫人志，因系合葬致志文亦未叙及马君。两志同时出土，实为合葬一志，甚为少见。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1336）

96. 李绍墓志

唐　贞观十六年（642）　志呈四方形，高36厘米，宽35厘米。26行，行26字，楷书，四侧饰花纹，盖作覆斗式，中篆书，四刹饰花纹。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称：李绍“以贞观十六年八月卅日终于雍州万年县安兴里之私第”。是为唐初墓志。书法楷体谨严，无撰书人姓名。内记李绍祖名询，“随上柱国，营新都大监”。《隋书》记营长安新都时有高颎、宇文恺、刘龙、贺楼子洋，尚龙义等，由此志知还有李询为大监。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又据志记贞观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葬李绍于长乐里，并可推知唐长安郊区乡名和里名的关系。

（藏石编号01785）

97. 张仲宾及夫人刘氏合葬墓志

唐　贞观十七年（643）　四方形，高39厘米，宽38厘米，21行，行22字，楷书。志石右下角残损二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

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37）

98. 右勋卫宣城公武希玄墓志铭

唐　永徽元年（650）　正方形，高、宽各 44 厘米。27 行，行 26 字，楷书，盖阳刻篆书九字。1952 年西安浐桥东南下家村出土，1955 年西安市文管会拨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637）

99. 化度寺僧海禅师坟记

唐　显庆三年（658）　四方形，高 38 厘米，宽 40 厘米，9 行，行 2—9 字楷字不等，石左下角缺损一字。毛凤枝《关中金石存逸考》有著录。原石宋代已佚，此石为复刻，旧在渭南赵乾生家，后归新安张伯英，1952 年该张捐赠给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55）

100. 刘世通夫人墓记

唐　永徽元年（650）　呈四方形，高 35.5 厘米，宽 35.2 厘米，10 行，行 8 字，楷书，志盖仅篆书"大唐永元"四字，1955 年西安西郊小土门出土。

此墓记文字比较短简，书法瘦劲具有魏意，文及做法均甚别致，未书任何官职，可能属长安郊区一普通人家的墓碑，盖仅篆书"大唐永元"四字，乃用墓志的形式，但却称为墓碑，语句都很简朴有致，似为制作工人将文直接刻于石上。

现仅录文原形式于下：

大唐雍州长安县龙
首乡兴台里
永徽元年岁次庚戌
四月己巳朔五日癸
酉故刘世通夫人王
氏人世飘忽以奄从
风烛葬于兴台村南
三百步天地久田成
碧海故勒此碑用旌
铭记

墓记文中言长安县龙首村有兴台里，并有兴台村，似里名以村名起，刘世通即为此村的人。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8086）

101. 安万通墨书砖墓志

唐　永徽五年（654）　四方形二块，高各 40 厘米，宽各 39 厘米。20 行，行 25 字，墨书楷体。1956 年西安西郊土门出土。

此砖墓志为一少数民族墓志，志文以墨书写，不少字迹已脱落，无法卒读，仅能领略其大意说：安万通京兆长安人其祖先原属安息人，北魏初入中国，位至摩诃萨宝，开皇十六年家破，大业三年又得恢复。由此可视为摩诃萨宝，袄教职务，在北魏时即由安息人充任，是研究中外交流方面的一块资料。

以下依原式录文以供研究参考：

君姓安名□字万通京兆长安人也□祖本生□安息□□
化内大然同归□杨芳弁其贵□傅名识其□□□□□□
经□席代君多贯领不相篡位君家□二□□□□□□
原大魏初王君高祖奉使入朝帝慕□□□□□□□
三品位至摩诃萨宝子孙□浪冠带□□□□□□□
华阴县开国公□□使文巡随任上开府通仪郎□□□□
□

□至北蕃奉敕□□□□教公说荣依计□□□□于人

于是□家□兴□□数□□自牧□川□于□□□□同□□

□□入则□□□□出则□□□□□□□□□□□□□□□

□

□□□□□□□□□□开皇十六年□被□敛破家财物□□□·

□

它□□公□□□□□□□□□□□□□□□□□□

绝□亦不寐群□□利□□□然□之□三□至大业□□

□□□□真情遂免思若□□尽□方得□虑□□□□

於□驰□存济君□□可托□□可谋乡闾用其量□□□□其

首□□□□隐言□断终无彼□□□祖宗累代三□□□□□

□□□□传其□□何期一朝□□家□安□□□□□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1798）

102.尉迟恭墓志

唐　显庆四年(659)　　此墓志为正方形，长、宽各120厘米，厚25厘米，1971年陕西礼泉县昭陵东南烟霞新村出土。是昭陵陵园目前发现志石最大的一合。志盖阴刻飞白书5行，行5字，共25字，题铭为“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尉迟府君墓志之铭”，志盖用飞白书，书法健劲，是目前昭陵陵园发掘中仅见的。盖为覆斗式，四边雕饰宝相花纹。间刻十二肖兽。志石色晶莹、磨光有阴线界格，阴刻50行，行50字，共2218字，楷书，无撰书者姓名。

将此志与尉迟恭神道碑并史籍勘校，发现如下问题。

1.尉迟恭名，史载：“名恭，以字行”。碑文同史载同。志文独云“公讳融”。其因待考。

2.尉迟恭籍贯，史载“朔州善阳人”。志文作“河南洛阳人也”，碑文与志文同。考朔州善阳属唐(贞观时)十道的河东道。唐德宗建中时节度使马燧胥马邑(马邑郡治善阳，即今山西朔县)，后复故治。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作“鄯阳”，是以县东三十里有鄯河得名，以“鄯”易“善”。宋郑樵《通志》云“朔州城南石碣村有鄂公故宅，旧址尚存”是以敬德为鄯阳人之佐证。志文与碑文均说“洛阳人”。可能“洛阳”指魏迁洛阳时尉迟恭氏随同南迁的“旧望”，而朔州是尉迟

恭少年时家庭所在的新籍。

3.尉迟恭生前所任官职，史载："改封鄂国公，后历鄜、夏二州都督"。碑文有"累迁灵、夏、鄜三都督"之语，与《唐书》相校又增加灵州都督一职。志文称（尉迟恭）"除襄州都督、襄、鄀、邓、淅、唐五州诸军事，襄州刺史"。碑文称"贞观四年授襄、鄀、邓、淅、唐五州都督，襄州刺史"。志、碑五州名称相印，两《唐书》只载"襄州都督"而无"襄、鄀、邓、淅、唐五州都督之任"。

4.志文载尉迟恭"祖孟都"，《文苑英华》所载碑文则云"大父益都"。

5.关于翟松柏起义反隋的时间，史载为大业十二年。志云"（隋炀帝）征驾南辕，乘舆西反，公（迟恭）时领千骑迎于幽州。有山贼翟松柏、刘宝强等拥兵数万，据山断道，公乃麾下百骑以击之。"隋炀帝三次用兵，史载在大业八年至十年之间。而志文载：敬德在击翟之后"又击王须拔、历山飞等"而史载王、历等于大业十一年起事。参互以观，击翟当早于大业十一年，可能在炀帝最后一次用兵的大业十年。因此，翟松柏起义当在大业十年。刘宝强此人则史籍失载。

现存礼泉县昭陵博物馆

103.张难墓志铭

唐　龙朔三年(663)　　志呈四方形，高 35 厘米，宽 35.5 厘米。21 行，行 21 字，楷书，四侧饰蔓草纹。盖作覆斗式，中题"南阳张君墓志铭并序"篆字，四刹饰蔓草纹。1955 年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

墓志载：张难，河南南阳人，"祖仁居贞履素，业重丘园，父德宝粹含真，赏清林壑。君以志坚金石，常懃报国之心，操洁冰霜，果徇捐生之分，以前后征讨有功，遂加上骑都尉，然而忠诚显节，履危阵而愈勤，斩将褰旗，赴辕门而弥固，为从军得患，遂归家不仕，养疾私庭，时敦妙赏，乘闲虚室，每重玄书，岂图阅水惊波，藏舟易往，金乌聚从，玉树先摧。呜呼哀哉，粤以龙朔三年岁次癸亥十二月庚辰朔十三日壬辰卒于浐川乡里第，春秋七十有三，即以其年葬于浐川乡白鹿原。"唐代文献以记载长安郊区人家的家事甚少。据志言，张难祖、父都未为官，然生活非常优闲，似为郊区浐川一家富豪之家的缩影。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1307）

104. 何刚墓志铭

唐　麟德元年(664)　志呈四方形，高40厘米，宽41厘米。21行，行21字，楷书，四周饰花纹，盖作覆斗式，中题“大唐何府君之墓志”篆书，四刹饰蔓草纹。1955年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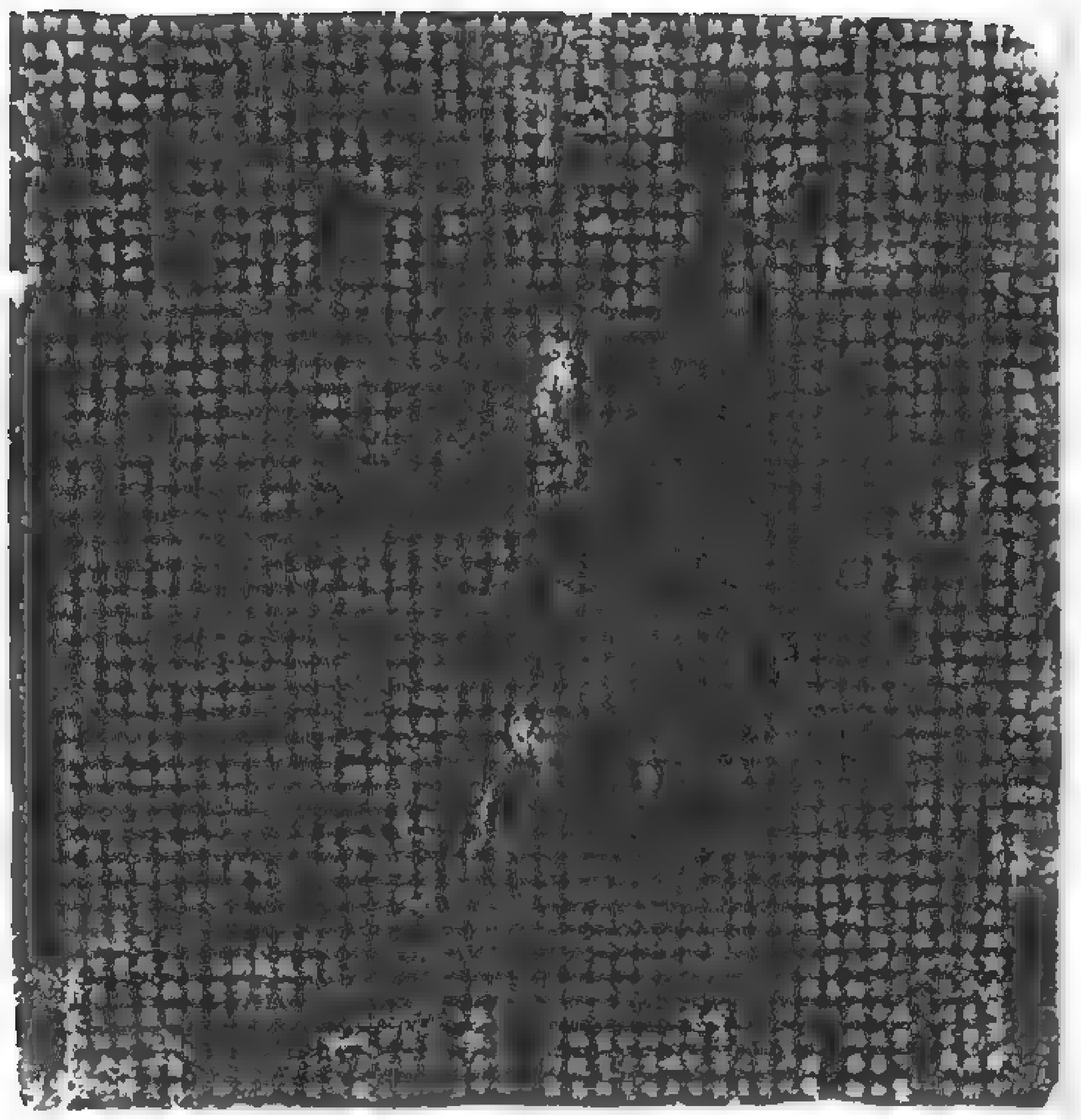
据墓志载：何刚字僧寿，京兆万年县人，“麟德元年岁次甲子二月己卯朔九日丁亥终于胜业里私第，春秋七十有六，以其年其月二十四日葬于灞浐之间，其所乃三辅之胜地礼也。”所谓“三辅之胜地”，唐长安城之东，多有贵族别业林园，景致美观，以供游乐，故被当时视为胜地。因而在志文中特加此一句。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3478)

105. 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爽墓志铭

唐　总章元年(668)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84厘米，43行，行45字，楷书，崔行功撰文。盖作覆斗式，中题“大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爽墓志铭并序”篆字五行，行四字。四刹饰宝相花纹。1956年西安东郊红庆村出土。



据志文除称：李爽、字乣佑，陇西成纪人及世系变化，历代官职和事迹外，志中还谈及到有关被誉为唐大书法家褚遂良等人的资料，略云：“诏授御使大夫，……君以天资刚直，权豪慴惮。中书令褚遂良贸易之间，交涉财贿，既挥霜简，因触时蠹，遂良出为同州。”《新唐书》、《旧唐书》中《褚遂良传》及《高宗本纪》都仅记褚遂良在永徽元年坐事出为同州刺史，但均未言因何事。据此知乃是牵涉财贿，被御史大夫李爽本参攻击所致。有名的《同州三藏圣教序碑》就是褚遂良贬于同州后书写的。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9358)

106. 赵府君德合及夫人杜氏合葬墓志铭

唐　咸亨元年(670)　　正方形,高、宽各58厘米,32行,行32字,楷书,志石右方剥落20余字,侧饰有花纹,由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陆耀通《金石续编》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1348)

107. 费智海墓志

唐　上元三年(676)　　志呈四方形,高66厘米,宽64厘米,31行,行32字,书法楷体,四周饰花纹,盖作覆斗式,中题:"大唐故内侍省仆局令费府君墓志铭"篆字,四刹饰缠枝花纹。1955年西安西郊小土门出土。

墓志载:费智海,字守忠,刘郡捷为人。咸亨五年为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内侍省内仆局令。"上元三年五月十七日终于岐州麟游县九成宫北中尚署之官舍"。据此知九成宫虽属行宫,但仍有关于宫闱生活的各种官署。九成宫在今陕西麟游县,此宫原建于隋文帝时,原名仁寿宫。《隋书·杨素传》说:"寻令素监营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督役戾急,作者多死于宫侧,时闻鬼哭之声。及宫成,上令高颖前视,奏称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高祖不悒。素忧惧,计无所出,即于北门启独孤皇后曰:'帝王法有离宫,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是损费。'后以此理谕上,上意乃解。于是赐钱百万缗,绢三千段。可知修建此宫劳民伤财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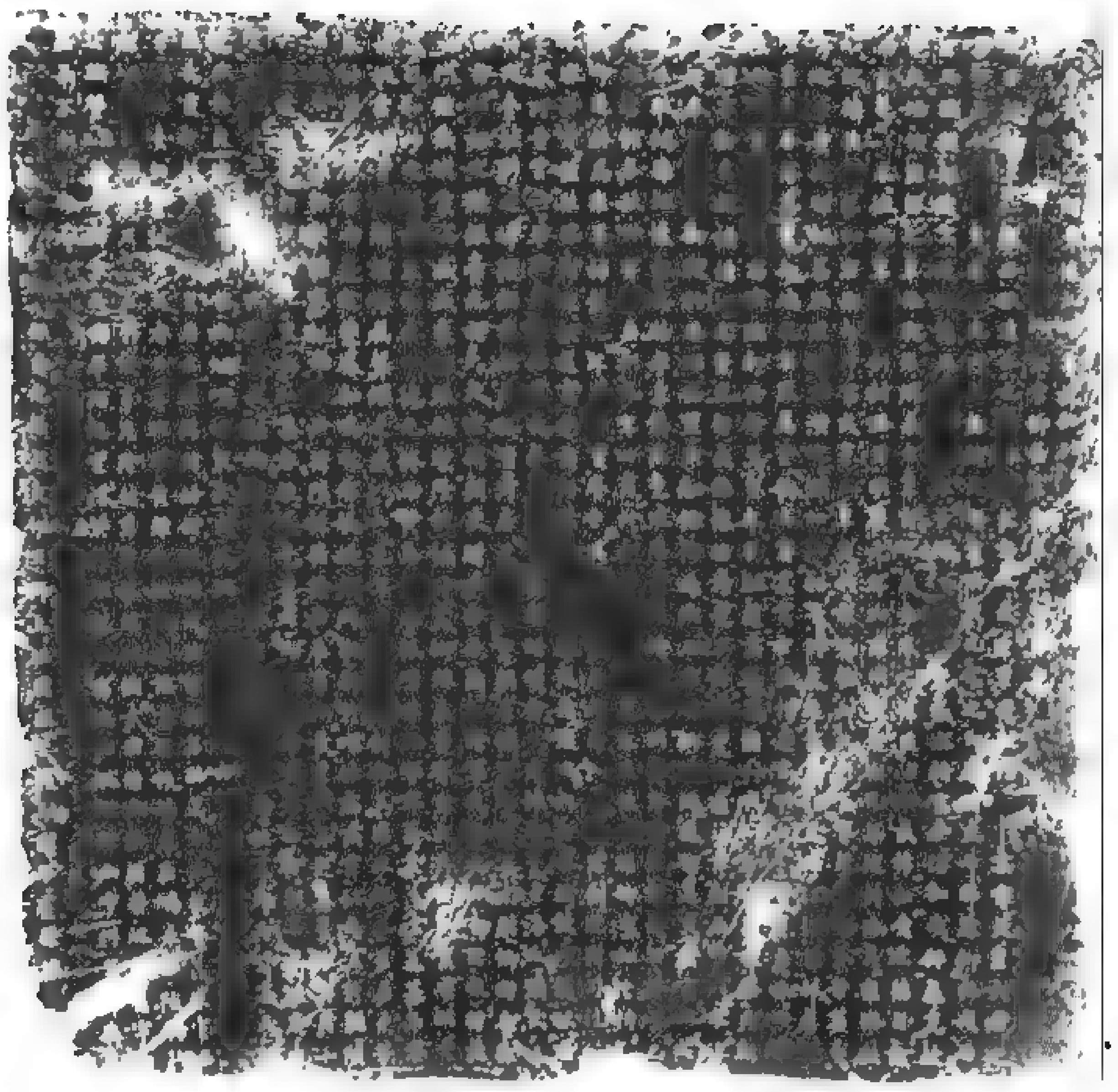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9353)

108. 雍王李贤墓志铭

唐　文明元年(684)　　章怀太子名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曾注解《后汉书》,先后被封为潞王、雍王,上元二年(675)立为太子。调露二年(680)被武则天废为庶人,贬到四川巴州(今四川巴中县),文明元年(684)逼令自杀,年仅31岁。唐中宗李显神龙二年(706)迁陕西陪葬乾陵。景云二年

(711)追封为章怀太子。妻房氏与之合葬。



雍王李贤墓志，1971—1972 年间与《章怀太子墓志》同时出土。雍王墓志系李贤棺柩，在神龙二年(706)由四川巴州迁回以雍王身份埋葬的墓志。章怀太子墓志系景云二年(711)追赠太子与其妻房氏合葬时的墓志。

雍王墓志呈正方形，长、宽各 90 厘米，盖篆书“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九字，盖周及四刹雕刻蔓草及十二肖兽鼠、牛、虎、兔、猪、羊等形象，志文共 40 行，满行 41 字，共计 1600 余字。墓志无撰书人姓名，书法遒劲严整，不同一般唐墓志。

志文文体为四六骈体。雍王墓志第一行原刻“故雍王墓志并序”，后改刻为“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并序”。志文中“屈伸舛午”之“午”作“牙”。“辛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之居”，“甲第”下脱一“候”字。

关于李贤的卒年，《新唐书》卷八十一列传六载其终年为“三十四岁”，《旧唐书》卷八十六载其卒年为“三十二岁”。按《旧唐书·高宗本纪》：(永徽)“五年(654)……十二月……戊午、发京师谒昭陵，在路生皇子贤”。从永徽五年到文明元年(684)李贤死，计 31 年，这与墓志所记终年 31 岁相吻合。

关于章怀太子李贤生前所任官职，志文与新、旧《唐书》大体相同。惟雍王志文云：“麟德二年(665)，加右卫大将军。其年从驾东封，摄兖州都督”可补文献之缺。

章怀死于巴州后，则天皇后追封他为雍王的时间亦有出入。雍王墓志云“至垂拱元年(685)三月二十九日思制追赠“雍王”谥曰“悼”。章怀太子而文载：“垂拱元年四月二十二日，皇太后使司膳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雍王事，而未书月日；《通鉴》则系此事于章怀死的同月己亥。

李贤生前封雍王事，雍王墓志文为咸亨三年(672)八月，章怀太子墓志文云咸亨二年。《旧唐书》记载为“咸亨三年九月癸卯，徙沛王贤为雍王。”看来《章怀太子墓志》文错记了一年。

李贤流放巴州及被逼令自杀，新、旧《唐书》、《通鉴》均记载较详。尤以《通鉴》记此事更明确且详。但在时间上亦有出入，当应以墓志文为准。

现存陕西乾陵博物馆。

109. 五品宫人墓志

武周 永昌元年(689) 四方形，高 48 厘米，宽 39 厘米，15 行，行 17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41)

110. 王定墓志铭

武周 万岁登封元年(69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3.5 厘米，27 行，行 26 字，楷书，四侧饰花纹，无志盖。1956 年西安西郊小土门出土。

王定其人据墓志载：琅琊临沂人，曾任少府监中尚署令，加朝散大夫。《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载少府监“总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及诸冶铸钱互市等监”。中尚署“掌供郊祀圭璧及天子器，后妃服饰，雕纹错线之制”，“岁二月献牙尺，寒食献毬。五月献绶带，夏至献雷车，七月献钿针，腊月献口脂。惟笔、琴瑟弦月献。金银及纸，非旨不献。制鱼袋以给百官。蕃客赐宝钿带鱼袋，则授鸿胪寺丞。有金银作坊院。”王定为中尚书，似职管上述事，而且是“妙闲仪礼，尤长丹青，起天下之图样，修国家之冠冕”，有着吸收专长，收集资料，丰富制作内容的职责。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5071)

111. 八品亡宫志铭

武周 长寿二年(693) 四方形，高 36 厘米，宽 35 厘米。14 行，行 15 字，楷书。洛阳出土，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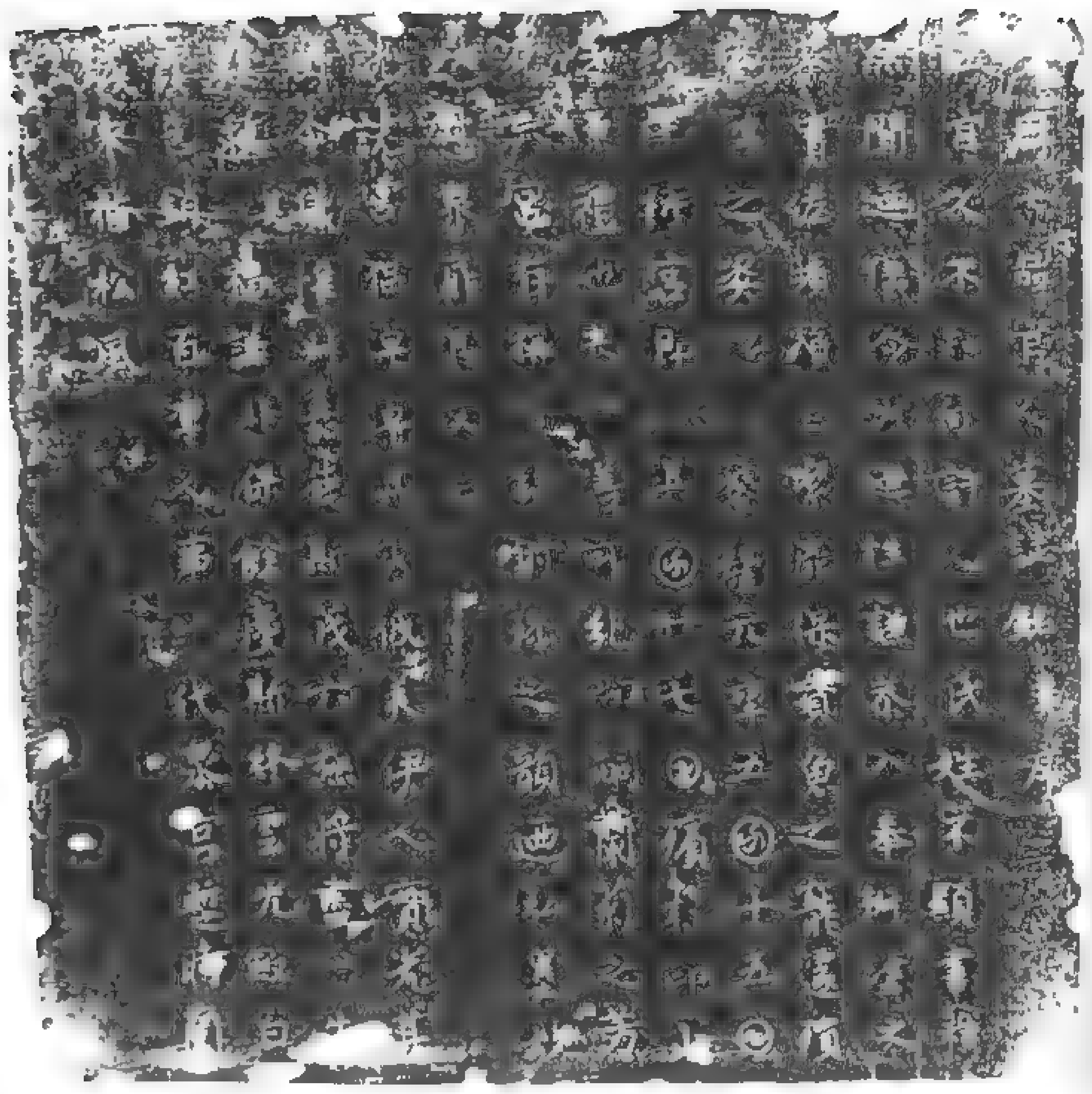
112. 亡宫墓志

武周　𨲠𨲢元年（695）　正方形，高、宽各 35 厘米，13 行，行 13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墓志中“𨲠𨲢”二字即“证圣”二字，属武则天所新造。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53）



113. 大周七品宫人墓志铭

武周　证圣元年（695）　正方形，高、宽各 45 厘米，14 行，行 15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42）

114. 九品亡宫人墓志铭

武周　证圣元年（695）　正方形，高、宽各 35 厘米，12 行，行 12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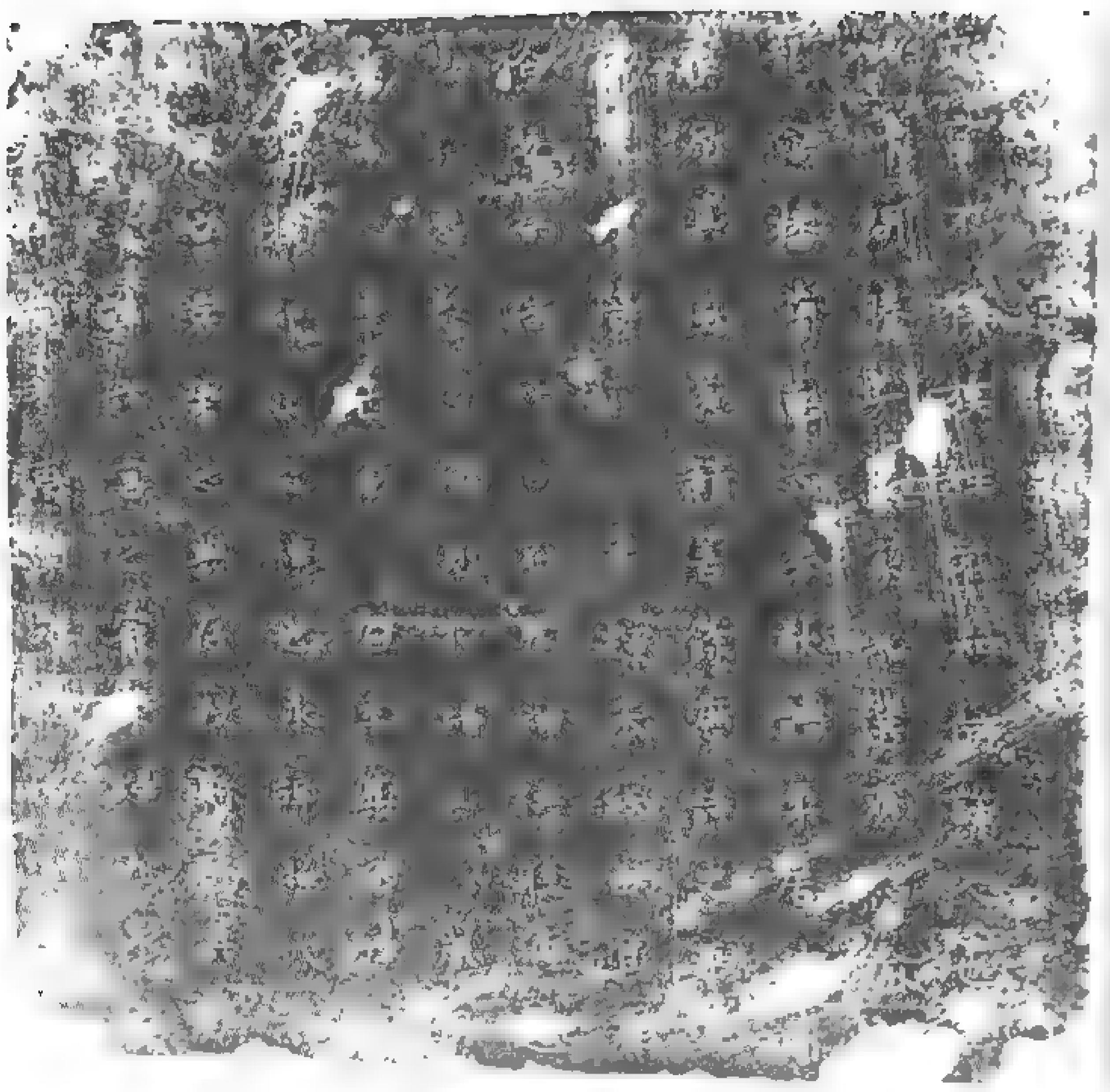
（藏石编号 1345）

115. 七品亡宫墓志铭

武周　天册万岁元年（695）　正方形，高、宽各 38 厘米，14 行，行 14 字楷书。洛阳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藏石编号 1344）

116. 五品亡宫志文



武周　天册万岁二年（696）　正方形，高、宽各 36 厘米。13 行，行 13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46）

117. 八品亡宫志文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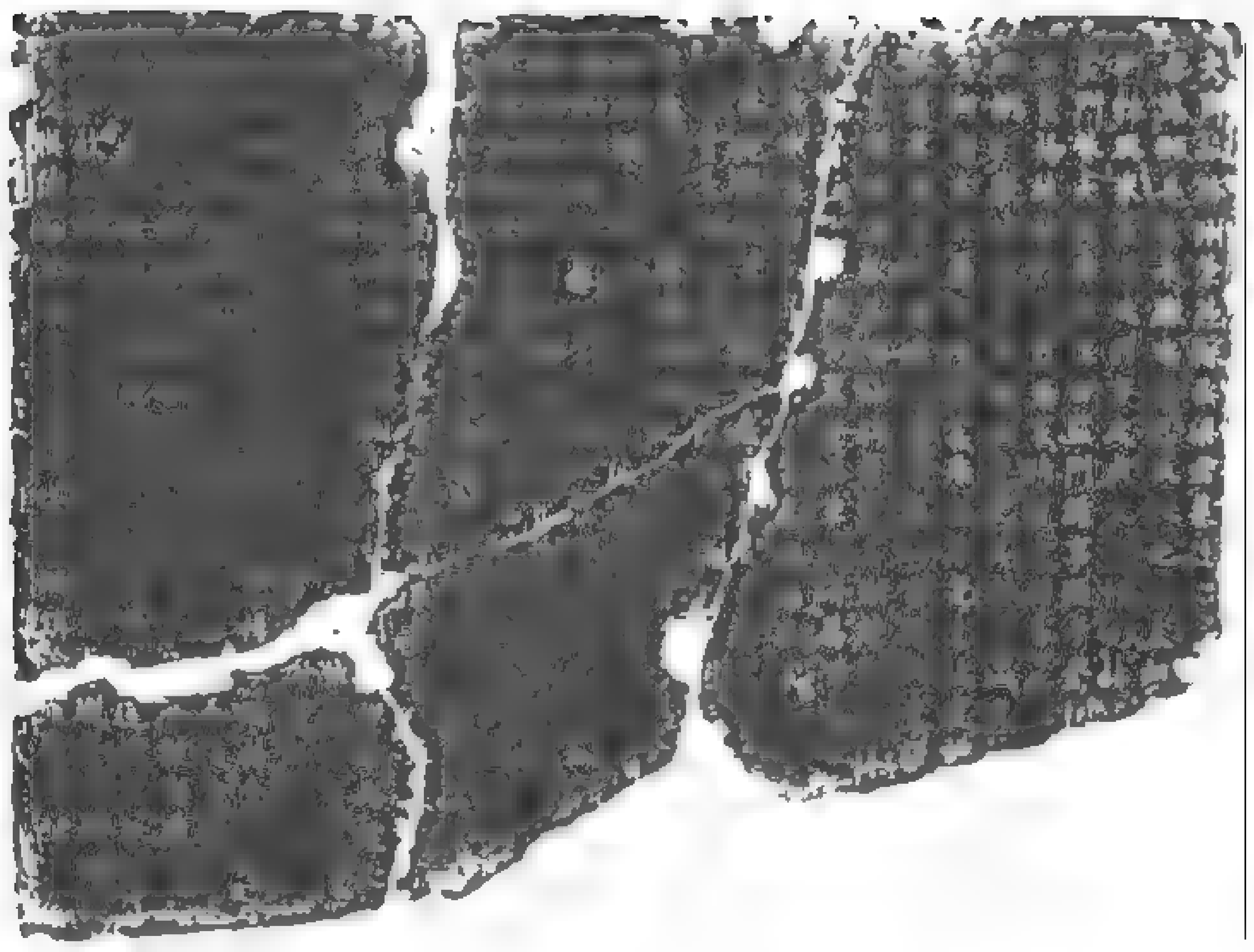
武周　万岁登封元年（696）　四方形，高 33 厘米，宽 34 厘米，13 行，行 15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43）

118. 邛州荣德县丞梁师亮墓志

武周　万岁通天二年（697）志石裂为五块，下缺百余字，残高 55 厘米，宽 72 厘米。29 行，行 14～28 字，楷书不等，书法端雅。出土时地不详，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西安碑林旧存。



此志石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十二著录并集有《金石文字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雍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及其本人详细考证。墓

志制刻于武周时代，故文中杂用则天武后别出心裁的改制字天、地、日、月、年、国等等。如将天作𠀑，地作埊，日作②，月作⑮，年作𠡦，國作圀，聖作𤯔，授作𥠢等均属时创。这些改造字给当时可能造成一些麻烦，但对我们今天判断文物的年代提供了方便，可一望而知那是武则天时代天授元年（690）至神龙元年（705）的遗物。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663）

119. 上柱国杨基及夫人能氏合葬墓志

武周　神功元年（697）　正方形，高、宽各 61 厘米，24 行，行 23 楷书字，盖篆书九字，志石由陕西华阴县出土，时地不详。1952 年由现代书法家段绍嘉送交西安碑林收藏。

志文中称杨基为弘农仙掌人。仙掌本"关中八景"中的华阴县。武后捶拱元年更名仙掌，中宗李显神龙元年复名华阴，志文作于武周时，故称籍贯为仙掌。能姓为楚熊挚之后，避难改为能氏，唐另有能元皓为安禄山大将，安禄山反唐后委为淄青节度使。志文中亦有武则天时制字，如星作〇、载作𡕀等。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20）

120. 同州清河县尉柱国房逸及夫人李氏合葬墓志铭

武周　圣历二年（699 年）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8 厘米，30 行，行 29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志文中人作𤯔、月作𠥱，亦为武则天新造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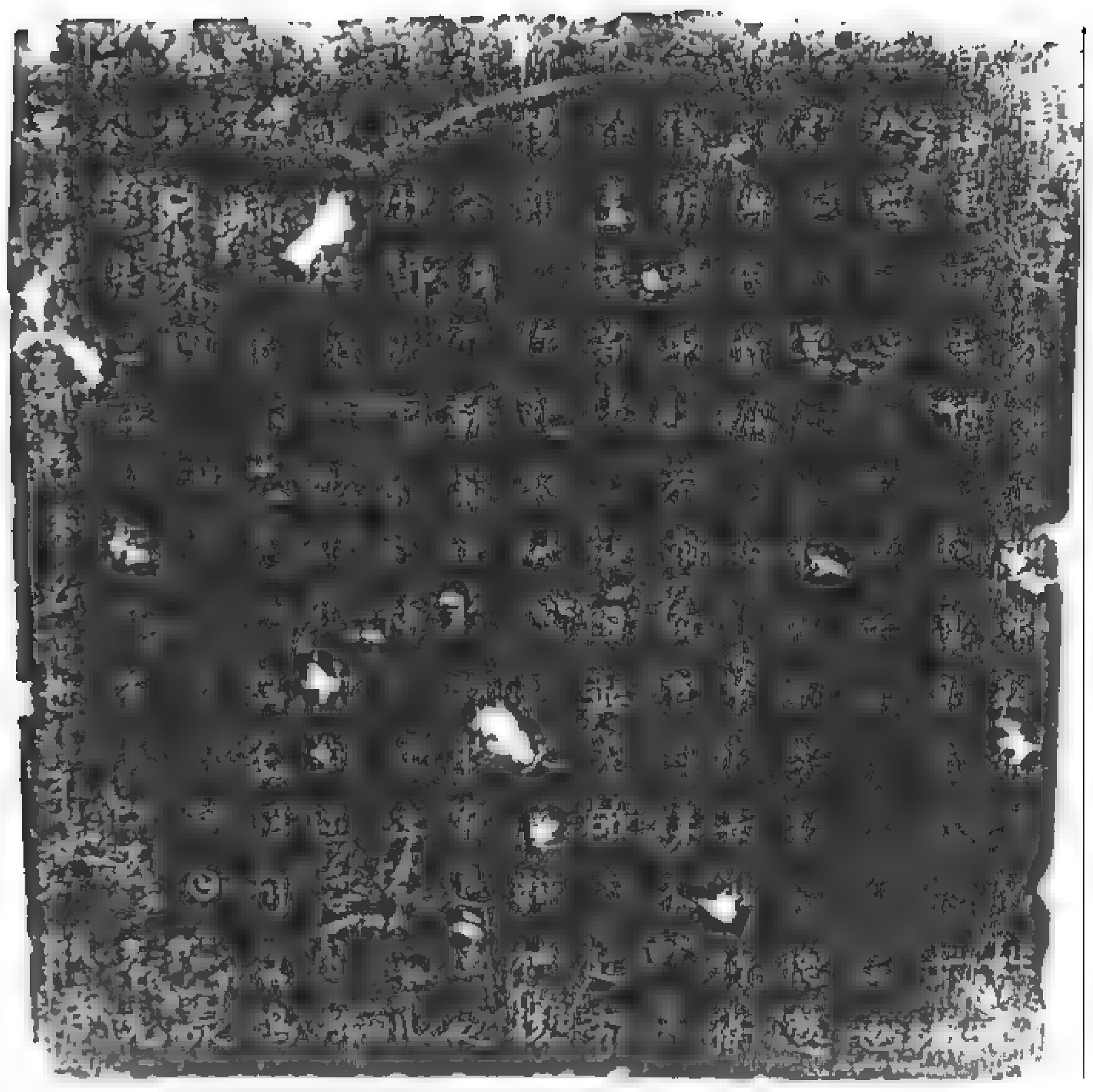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31）

121. 智惠墓志

武周　大足元年（701）　正方形，高、宽各 34 厘米，15 行，行 15 楷书

字。此墓志由长安县西乡出土，同坑发现的还有精美生动的陶俑、陶马等。1951年由西北文化部文物处拨交入藏西安碑林。



志侧刻有花纹，志文首称“青槐乡弘化之第姓名智讳惠”，即读不成句，余尽是虚文，且多错讹。惟云“葬于承平乡龙首原”可藉以作为研究唐代长安郊区乡里名称考方面的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2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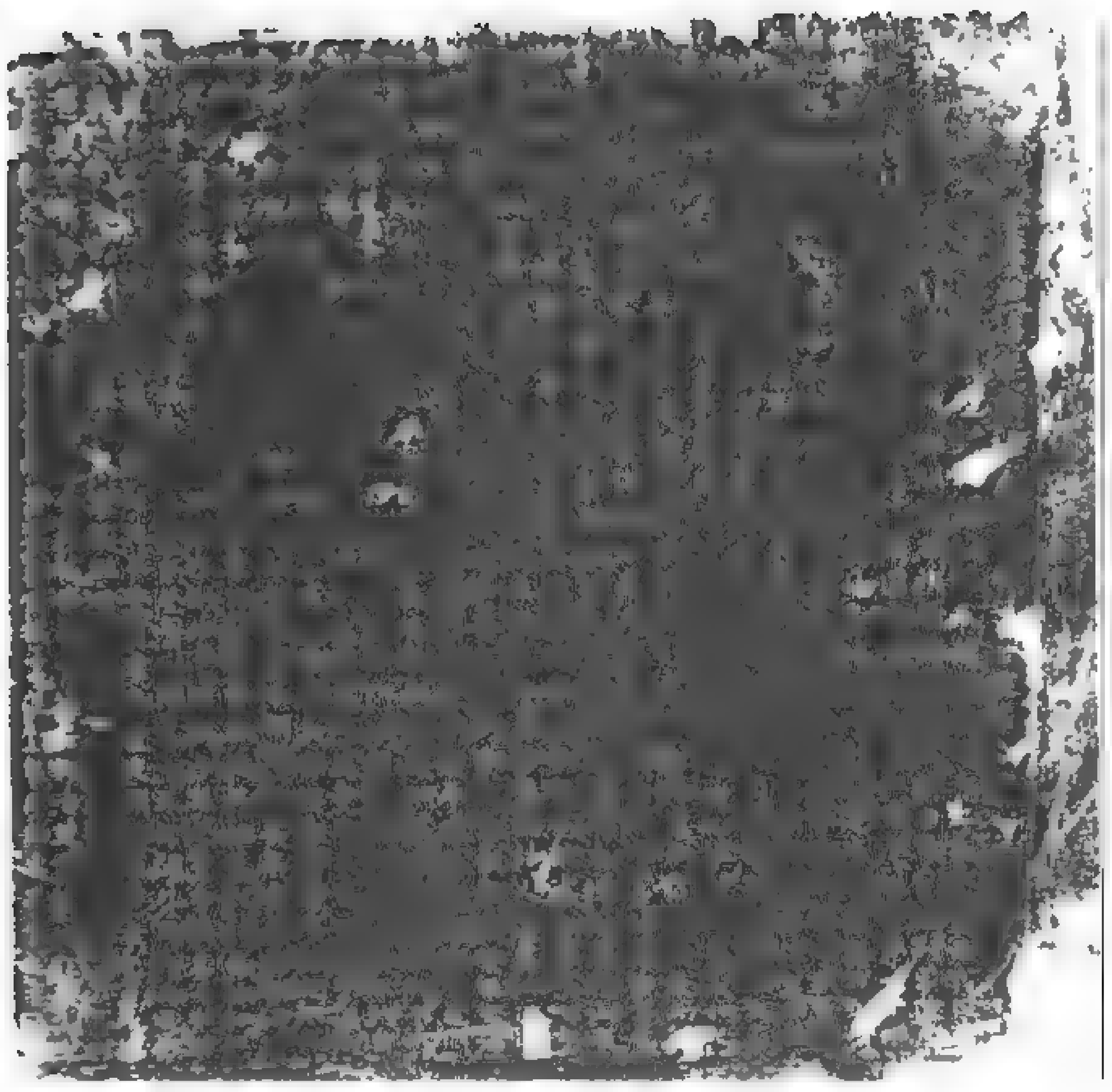
122. 永泰公主墓志铭

唐　大足元年（701）　此志铭呈正方形，长、宽各 114 厘米，志盖为覆斗式，周沿遍雕忍冬蔓草及十二生肖花纹，颇为华丽，中间篆书“大唐故永泰公主墓志铭”10 字。志文楷书 32 行，满行 32 字。墓志撰者徐彦伯，新、旧《唐书》均有传，《旧唐书》传称其以文擅名，曾预修过《武则天实录》，晚年为文，好为强涩之体，颇为后人所仿效，有文集 20 卷行于世。《全唐文》中仅存 6 篇，而无此志文。志文的主要内容叙述了永泰公主的身世。永泰公主本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名仙慧，字秾辉，嫁于武延基（武则天侄武承嗣之子），死于大足元年（701），时年仅 17 岁，中宗神龙二年（706）与驸马都尉武延基合葬于乾县北原，陪葬乾陵。志文内容不仅叙述永泰公主的身世，但也对研究武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亦提供了重要资料。志石书法楷体，无书者姓名，而书体紧严遒丽，具有明显的盛唐艺术风格，惟字大小不一致，且间有错字，志文凡涉及皇帝的都提行或空三格或空二格，亦不统一。墓志是 1960 年由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墓中除出这方墓志外还有大量的三彩和粉彩俑及色彩鲜艳的宫女壁画，同时又有高大的石椁，椁壁由十块高 1.40 厘米，宽0.80厘米的石板和十根石倚柱构成，每块石板内外两面都细线刻出宫女侍从人物，装扮和动态各不相同。多数人以正在花园款步，在人物背景空间，刻出飞鸣的禽鸟和奇花异草，用为衬托，生活气息十分浓郁，是一组很好的艺术作品。

现存陕西乾陵博物馆。

123. 游击将军上柱国南阳赵智俭及夫人宗氏合葬墓志铭

武周　长安三年(703)　正方形,高、宽各 72 厘米,31 行,行 30 字,楷书。书法秀劲,颇有褚遂良笔意,此志出土于长安县南乡神禾原,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有著录考证。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969)

124. 亡宫七品志铭

唐　神龙元年(705)　正方形,高、宽各 37 厘米,15 行,行 16 字楷书,洛阳出土,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58)

125. 亡宫七品墓志

唐　神龙元年(705)　正方形,高、宽各 28 厘米。12 行,行 13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49)

126. 亡宫七品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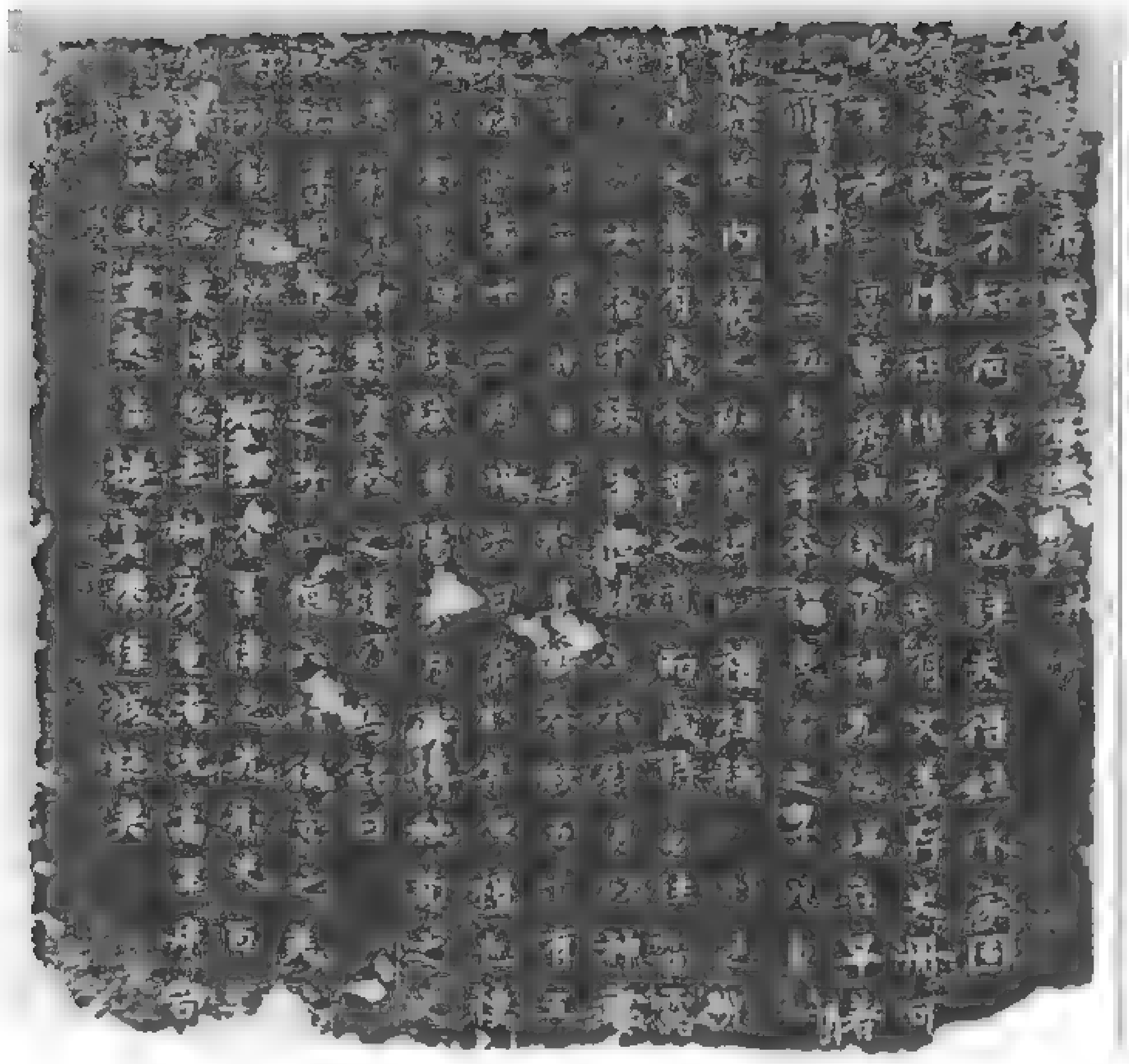
唐　神龙元年(705)　正方形,高、宽各 33 厘米,左方斜裂,16 行,行 16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56）

127. 五品亡宫墓志铭

唐　神龙元年（705）　四方形，高 32 厘米，宽 33 厘米，右上下两处有残缺，16 行，行 17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57）

128. 五品亡宫墓志

唐　神龙（705—707）　四方形，高 39 厘米，宽 38 厘米。15 行，行 15 字，楷书，盖九字亦为楷体书写，字迹漫漶，年月不清。盖铭下增一也字，属创见。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7150）

129. 亡宫九品墓志盖

唐（705—907）　正方形，高、宽各 39 厘米，3 行，行 3 字。志佚仅存其盖，上书"大唐故亡宫九品墓志"9 字篆体，1952 年经段绍嘉捐献入藏西安碑林。出土时地不详。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3721）

130. 韦 洞 墓 志

唐　神龙二年（706）　志石为正方形，长、宽各 97 厘米，刘宪撰，志文 43 行，满行 42 字，书法楷体秀丽，但无书者姓名。墓志盖中书"大唐赠并州大

都督淮阳王韦君墓志铭”篆书 16 字。志盖周边与四刹均饰有三层蔓草花纹，中层花纹间雕飞禽。志石周边亦刻蔓草纹，间以二奔兽，形象生动，刻工颇佳。此墓内同时出土的还有大型石椁，椁上线刻画人物中还有执役的侍从，男侍从头戴软帽，身穿花袖长袍，腰束荷包带、花裤、软鞋，全是官府中仆人打扮。女侍是身着翻领胡装，长袍和长统花裤，头梳双髻，足穿便履，双手持物，显示了唐代贵邸中侍女们最常见的风尚，这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和唐人喜新心理和风习都有很大关系。从椁上线刻艺术来讲，人物刻线虽都同样圆劲，但还有粗细之分，特别在刻有女侍的衬景上，增添了飞鸟、修竹，使得画面分外显得绮丽。据墓志文所载，死者韦泂，系唐中宗皇后韦氏之弟，唐武后如意元年卒于容州府，年 16 岁。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韦氏复为皇后，追封泂为卫卿，二年追封为淮阳王，并将灵柩运回京都长安，同年十一月己未朔日陪葬于茔先陵。因此葬仪十分豪华。

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

131. 魏国夫人河东裴觉墓志

唐　景龙三年(709)　正方形，高、宽各 90 厘米，41 行，行 43 字，楷书，盖覆斗式，上篆书 12 字。1910 年由西安南郊李王村与韦顼志石同时出土。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移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971)

132. 许君及夫人华阴郡君杨氏合葬墓志

唐　景龙三年(709)　志上断缺，残高 68 厘米，残宽 67 厘米，存 26 行，行 28 字，长安出土，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移交西安碑林收藏。《关中金石存逸考》有著录考证，以文中“让帝，平恩贵戚敞丹第而封侯”语，可能是用许由及许广汉故事，定为许姓。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661)

133. 冠军大将军行右卫将军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杨执一妻新城郡夫人独孤氏志铭

唐　开元四年(716)　四方形，高74厘米，宽75厘米。31行，行11字，楷书。志盖覆斗式上阴刻篆书16字。王丘篡书。1951年由咸阳顺陵区与杨执一墓志同坑出土。

志称夫人原姓李，祖楷，隋初以功赐姓独孤。志首行下，特以篆书标出“夫人讳开字正真”为其他志石少有此例。盖覆斗式，中阳刻篆书“大唐故新城郡夫人独孤氏墓志铭并序”16字，四周减底阳刻盛唐习用的番石榴蔓草图案，四刹及志侧均为番石榴蔓草间以瑞兽图案，构图匀整，刀法圆熟，可称为盛唐代表的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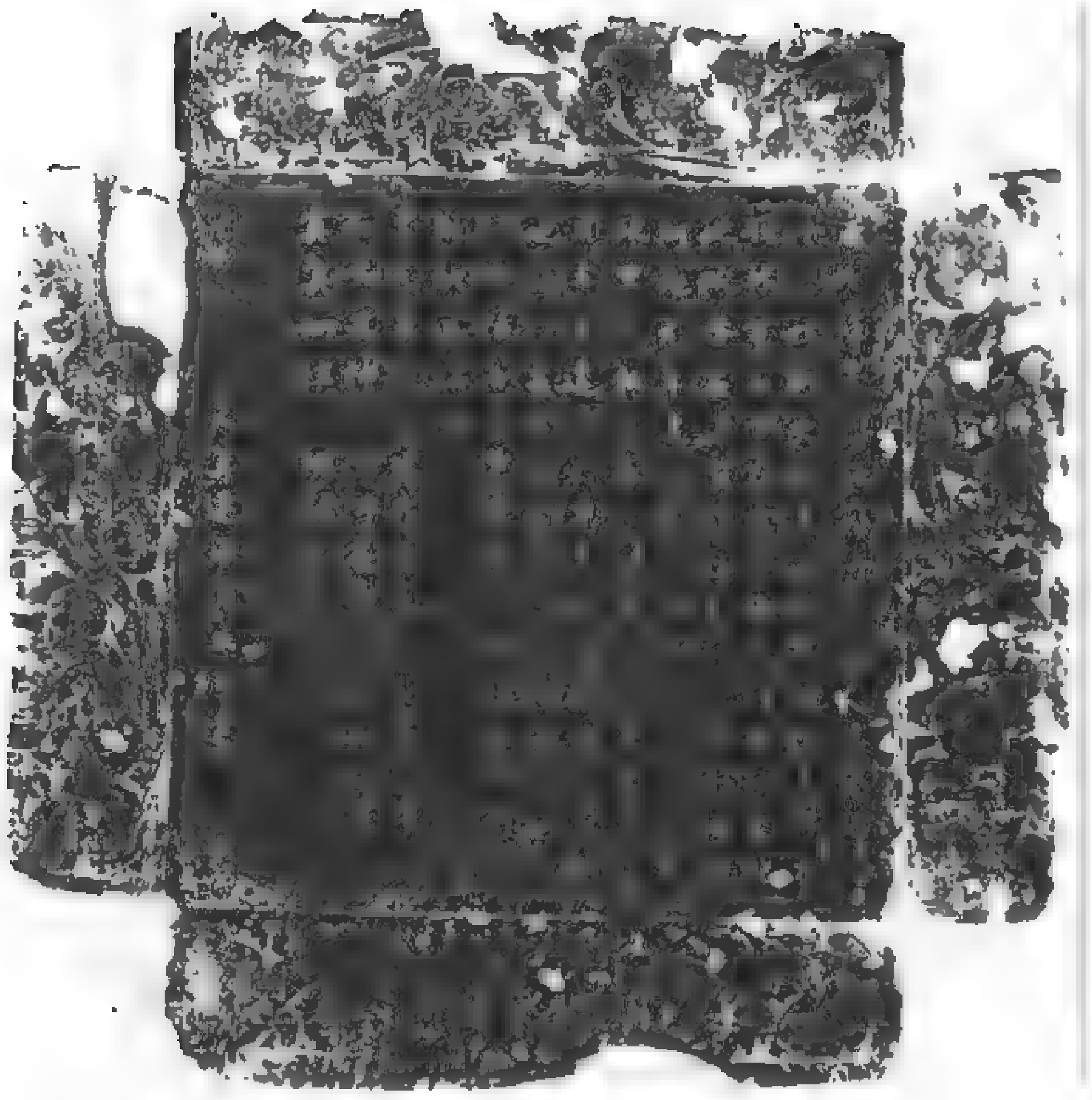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藏石编号2282)

134. 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

唐　景云元年(71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36.5厘米，四侧饰蔓草花纹，志文14行，行15字，行书。志盖作覆斗式，四刹饰蔓草纹中题“大唐阿府君之墓志铭”共3行，行3字，篆书。1955年由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此又为一少数民族墓志，现录全文于下：



(一行)十二姓阿史那叶护可寒，顺氏王男，左(二行)羽林军，上下左金吾卫大将军阿史那(三行)从政、番名药和特勤，夫人薛突利施匐(四行)阿施，元年建卯月十八日染疾终于布(五行)政里之私第，春秋卅有八，以其年建辰(六行)月五日迁厝于万年县长乐乡之原礼(七行)也，乌呼哀哉，泫伦等痛当擗涌，泣血难(八行)任，恐陵谷之迁变，示以刻雕贞石，用记(九行)徽猷其词曰

皇天无亲　歼我良人　占卜宅兆　而安其神

呜呼哀哉　有去无来　冥冥何德　魂归夜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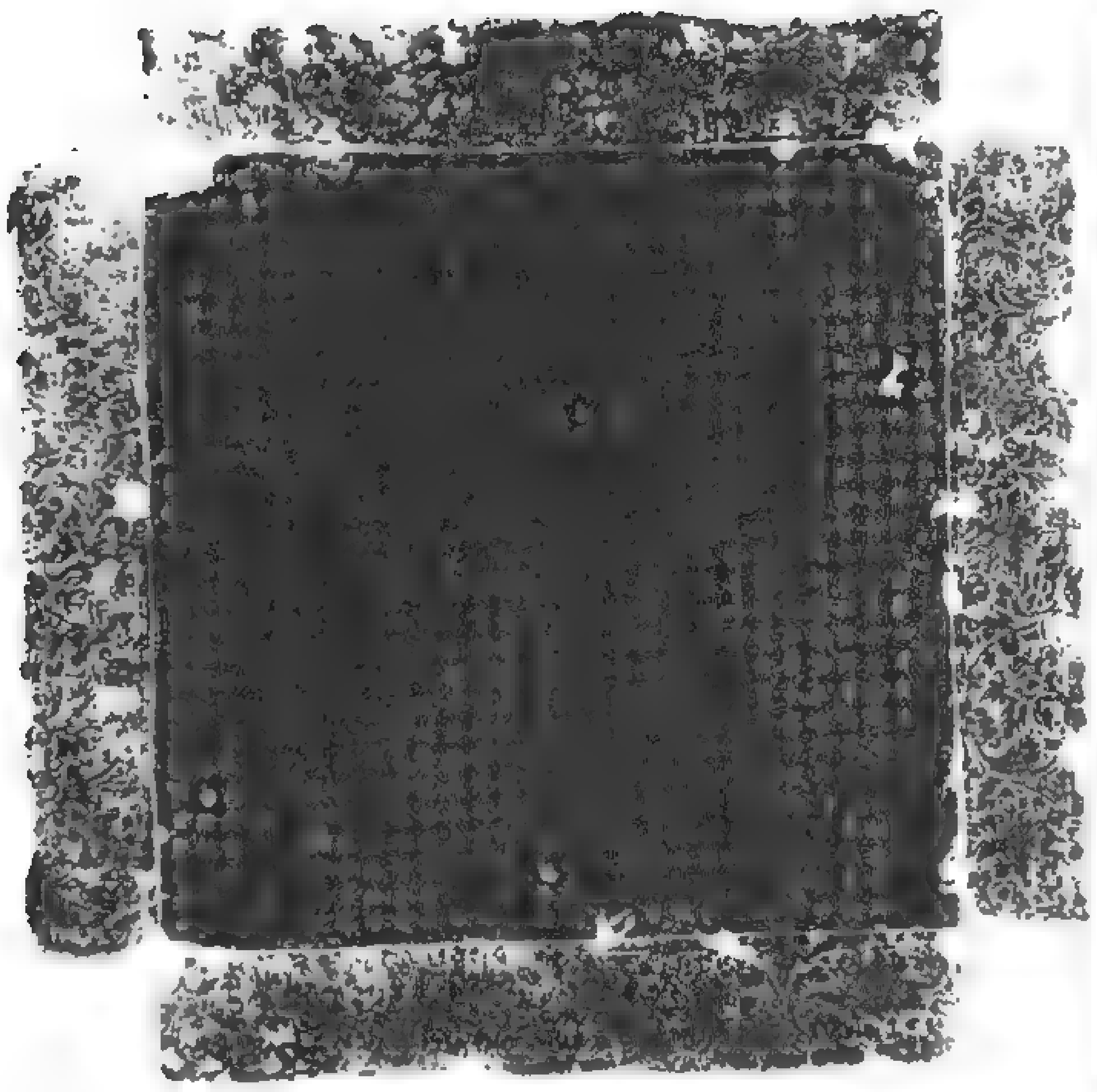
元年建辰月五日造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4290)

135. 万泉县主薛氏墓志铭

唐　景云元年(710)　志呈四方形,高 71 厘米,宽 72 厘米,28 行,行 28 字,楷书,卢藏用撰文,豆卢欣期书,无志盖。1953 年咸阳底张湾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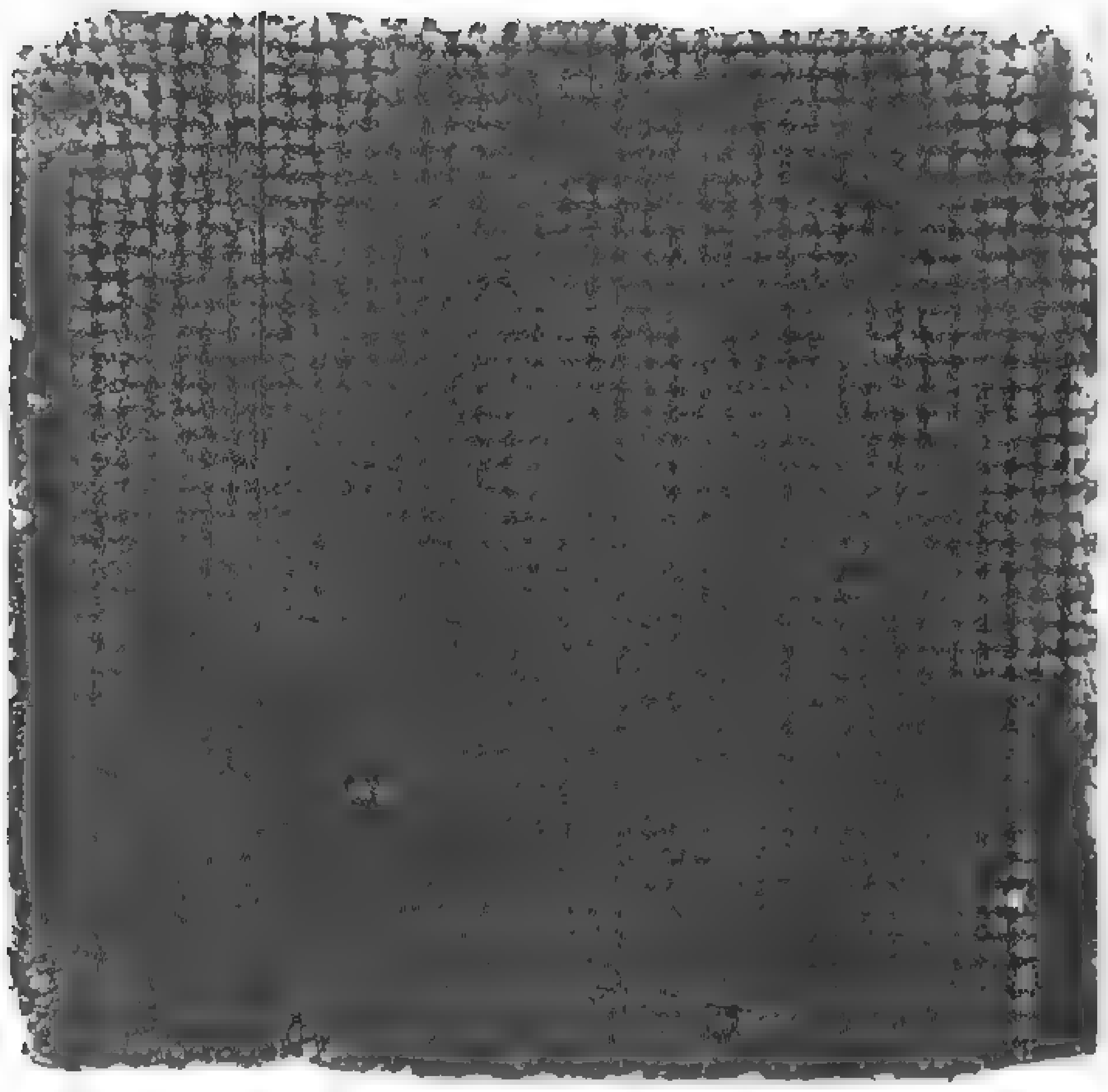
据墓志记载:薛氏,万泉县主,河东汾阳人,为武后女太平公主之第二女。太平公主下嫁薛绍。

墓志的撰文者卢藏用,《新唐书》卷一二三有传,称其"能属文","工草隶大小篆八分,善琴弈","附太平公主"。故文极为纤丽,大加美称薛氏;"县主禀淑贞之灵,资瓌宝之粹,生而凝贵,幼则柔嘉,骞鸿龙之闲婉穆芝蕙之贞秀,翠帷珠缀,彩丽韬华,兰膏铅泽,璟芳褫妙,色受神会,惠问发于初孩,目领心传,聪识扬于将丱,颂椒状柳之敏,遇律斯融,弹丝捻籥之妍,旋宫莫滞,年十一有行于豆卢氏,环珮有节,鞶悦有文,巾栉不媮,匜盥不懈,贵而逮下,攀樛木以自恃,和以秉柔,咏葽草而为试,至于碧楼初蔼,银庭始彻妙唱徐吟,驻迟光于绮榭,商弦暂拊,弄清月于华轩,则雅而不流,靖以知禁,加以节励清玉,志邈高云,思入纤微,艺兼巧妙,裁红剪翠,晔若春林,缛黛楱朱,粲成椴锦,故振振公族,咸贵慕焉。则天皇后嘉其嫔则,赐以崇号,封万泉县主。"志文中悦当即悦,椴当即缎。万泉公主 11 岁即出嫁,唐代人风俗,以晚嫁为耻,武则天事事过人,故孙女出嫁亦特别早。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299)

136. 韦项墓志



唐 开元四年(716) 墓志呈正方形,高、宽各为78厘米,盖为覆斗式,中刻"大唐故卫尉卿韦项君墓志铭"12字篆书,周边四刹饰蔓草纹。苏晋撰文36行,满行40字,书法楷体,字迹秀劲。无书者姓名。

韦项是唐中宗的皇后韦氏的兄弟,死于开元四年(716),死后合葬于魏国夫人之旧茔。由于他是皇亲贵戚,故墓内除墓志外,还有大型的石椁,其石椁上线刻也必然出自水平较高的名工之手。此石椁是1910年由长安县南李王村出土。旧存西安市湘子庙街,1952年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这批石刻线画共14块,其中7块一面刻,3块两面刻。画面人物都是一些贵妇或侍女,有的盛装异服,满饰珠玉,有的头戴皮帽,手驾小鹰好似准备出猎,有的在花间扑蝶,显得神情安闲,还有捧盘、持扇的侍女。表情、衣冠发髻都各有不同。背后衬景和边框纹饰,尽是小花小草,鸟蝶奇石分列左右,构成一幅幅完整和谐的画面,生活气息十分浓郁。所有人物的线刻形式,全是用游丝描刻出如春蚕吐丝,细劲连绵的细线。人物造型生动,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地主贵族家庭妇女装饰和生活的真实资料。

现存西安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970)

137. 李嗣庄墓志铭

唐 开元九年(721)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65.5厘米,26行,行27字,楷书,岐王李范撰并书,盖作覆斗式,中题"唐故济阴郡王墓志铭"9字篆书,四刹饰蔓草花纹。1955年西安韩森寨出土。

据墓志载:王子讳嗣庄字延敬陇西成纪人。嗣庄乃玄宗之侄,宁王李宪之第二子。玄宗一向兄弟友爱,故对其侄亦特别关照,志称"驾幸温泉,中使各医,道路相继,屡回天眷,特轸皇慈"。盖记实际情况。《新唐书》卷八十一《三宗诸子传》"宪子十九人,其闻者琎、嗣庄、琳、瑀"。"嗣庄幼有令名,为太子左谕德,

封济阴王，薨，赠幽州大都督”。未言死于何年。据此志为“开元九年十月廿七日薨于京师胜业里之私第，春秋一十有七”。又志称嗣庄“幼而明慧，长而聪善，忠孝成性，礼乐在躬，书学一览而通，剑术才经而即妙”。叔为侄志，不免过夸。但玄宗兄弟子侄多风流儒雅，或是事实。《新唐书》卷八十一载：记李宪子琎精于音乐，“尝早朝过永兴里，闻笛音，顾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识之，曰：何故卧吹？笛工惊谢。又闻康昆仑奏琵琶，曰：琵声多，琶声少，是未可弹五十四丝大弦也。乐家以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顺鼓曰琶。”等。又唐南卓《羯鼓录》载宁王李宪长子琎，精于羯鼓，“汝南王琎，宁王长子也。咨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音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常戴砑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笪当是檐宇处。三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落。”盖打鼓要在如宋璟所谓“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山峰取其不动，雨点取其急碎。李琎能使鼓曲终而绢帽檐上的花不落地，所以是能手。这些资料尽是说明了李琎在音乐、美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43）

138. 阿史那勿施砖墓记

唐　开元十一年（723）　志呈四方形，高 32.5 厘米，宽 32.3 厘米，21 行，行 22 字，楷书，盖为覆斗式，中题篆书。1956 年西安西郊土门出土。

此为一少数民族墓记，特录原文于下：

（一行）君讳施字勿施，淳维之后，夏禹之苗，云中部人也。曾祖（二行）□干，北蕃单于启人可汗，大业初随尚义成公主，赞拜不（三行）名，位在诸王上。（空二格）大唐实录具载，祖奚纯单于处逻（四行）可汗，随拜左光禄大夫，赐婚李夫人，正二品，属随季版荡、（五行）鹿走秦郊，（空二格）大唐运开，（空二格）龙飞晋野，（空二格）太上破宋（六行）金剄，处逻可汗遣弟步利设帅师来□□军会，其后处逻（七行）可汗率兵马助起义至并州，留兵助镇而去，父俟末单于（八行）郁射设，即处逻可汗嫡子也，（空二格）唐初所部万余家归附，（九行）处部河南之地，以灵州为境，授右屯卫大将军，（空二格）太（十行）宗敕书慰问曰，突厥郁射设可□公主，是朕亲旧，情同一（十一行）家，随日初婚，□时在朕家内成礼，朕亦亲见，追忆此事，无（十二行）时暂忘，勿施□节忠诚，起家蒙任郎将，然君主性骁雄，自（十三行）然特秀，心神爽悟，识用明远，鸿鹄□飞，便怀四海之志，骥（十四行）騄方骋，已有千里之心，奄归魂于幽穸，以神功元年八月（十五行）十七日寝疾薨于河南府新安里之官舍，春

秋六十有二，(十六行)夫人赵氏，琼柯吐秀，宝务含姿，攸闻女，无□贤克，着以(十七行)神功二年十月十九日薨于京兆府□□里之官舍，□前(十八行)鸾影，初暂兴悲，剑彩蛟分，终同赴水，即以开元十一年十(十九行)骁卫翊府中郎，芝兰发秀，共植阶庭，永积号咷长□鄠杜，(二十一行)寂寞广霄遥遥大墓，何岁□年。

据《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载："八年，颉利死，赠归义王，谥曰荒，诏国人葬之，以其礼，火尸，起冢灞东。其臣胡禄达官吐谷浑邪者，……至是哀恸，乃自杀。帝异之，赠中郎将，命葬颉利冢旁，诏中书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颉利、浑邪之墓碑。"据此志，阿史那勿施葬龙首原，墓志出土地在今西安西郊土门一带，还可知唐长安城西有突厥人的墓田。又此志载"太宗破宋金刚，处逻可汗遣弟步利设帅师来会"与《新唐书》"秦王讨刘武周也，处逻以弟步利设骑二千会并州"不同。而志载太宗慰问郁射设之敕书，《新唐书》未见有载。由"在朕家内成礼"等语，又可知高祖李渊父子与突厥早已有交往关系。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229)

139. 龙兴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

唐　开元十二年(724)　四方形，高 68 厘米，宽 74 厘米，26 行，行 24 字，楷书，毕彦雄文，此塔铭原在长安县香积寺，1956 年入藏西安碑林，《金石萃编》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均有著录，《金石萃编》并集有《石墨镌华》、《金石录补》、《潜研堂金石跋尾》等书考证。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五六 150)

140. 索崇墓志

唐　开元十三年(725)　正方形，高、宽各 30 厘米。16 行，行 15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墓志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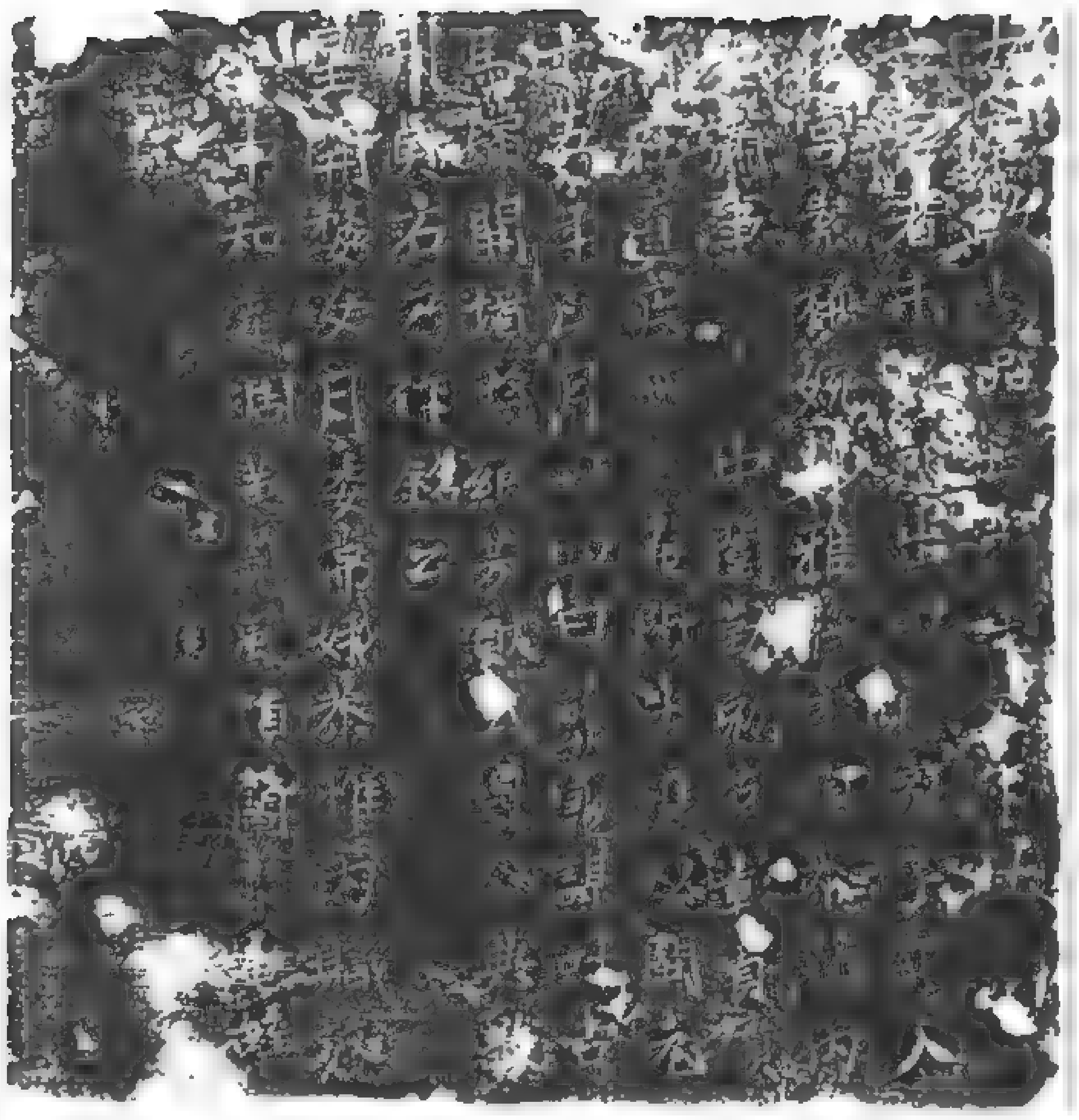
(藏石编号 1339)

141. 八品亡宫年卅墓志铭

唐　开元十四年(726)　正方形,高、宽各31厘米,12行,行12字楷书,洛阳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352)



142. 七品亡宫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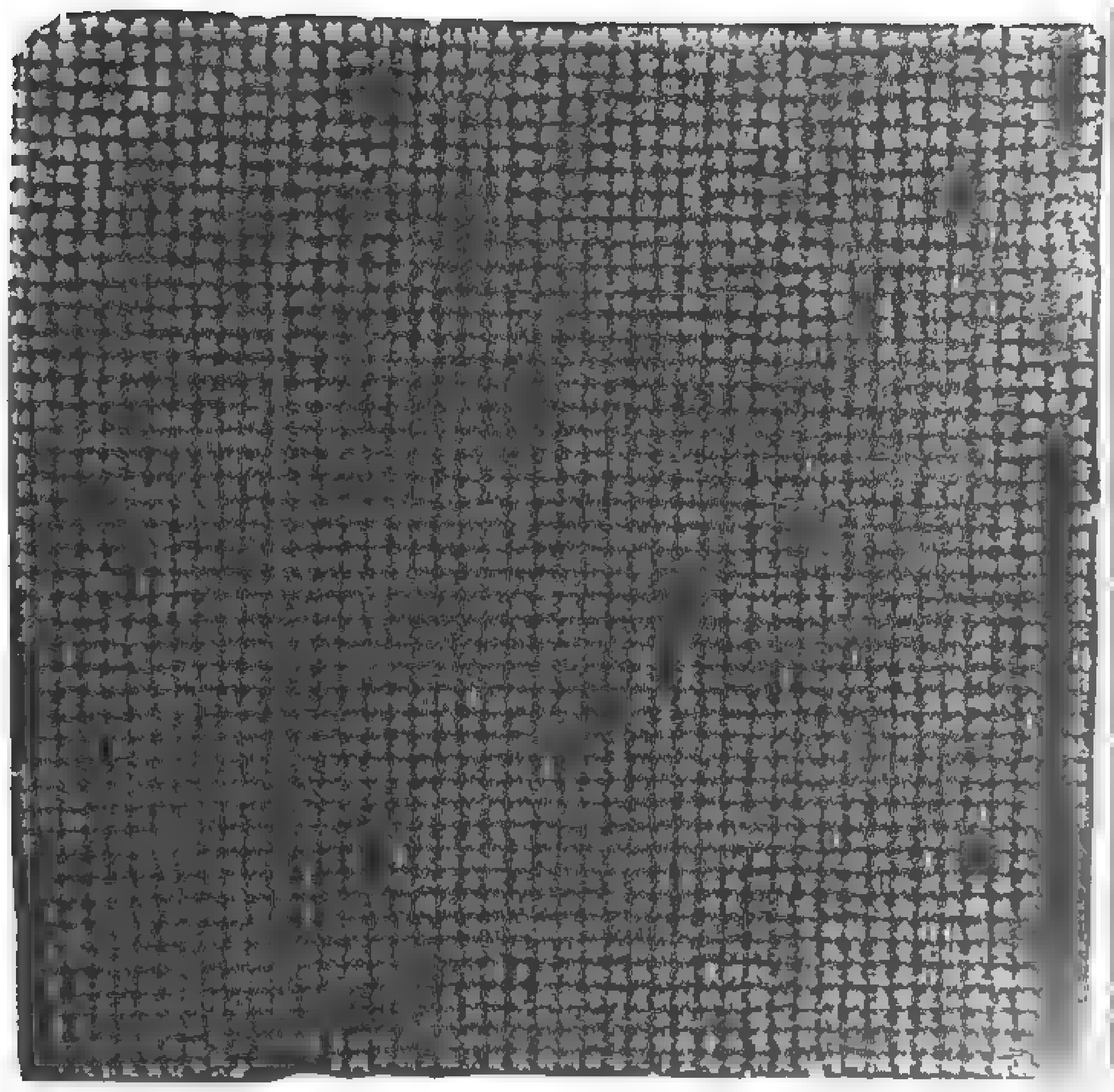
唐　开元十五年(727)　正方形,高、宽各33厘米,10行,行13字楷书,洛阳出土。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355)

143. 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执一墓志铭

唐　开元十五年(727)　正方形,高、宽各92厘米,45行,行45字,楷书,志盖覆斗式,上篆书九字。贺知章撰文,史书有传,季子汲书。1951年与其妻独孤开墓志同坑出土于咸阳底张湾,后由西北文物处拨交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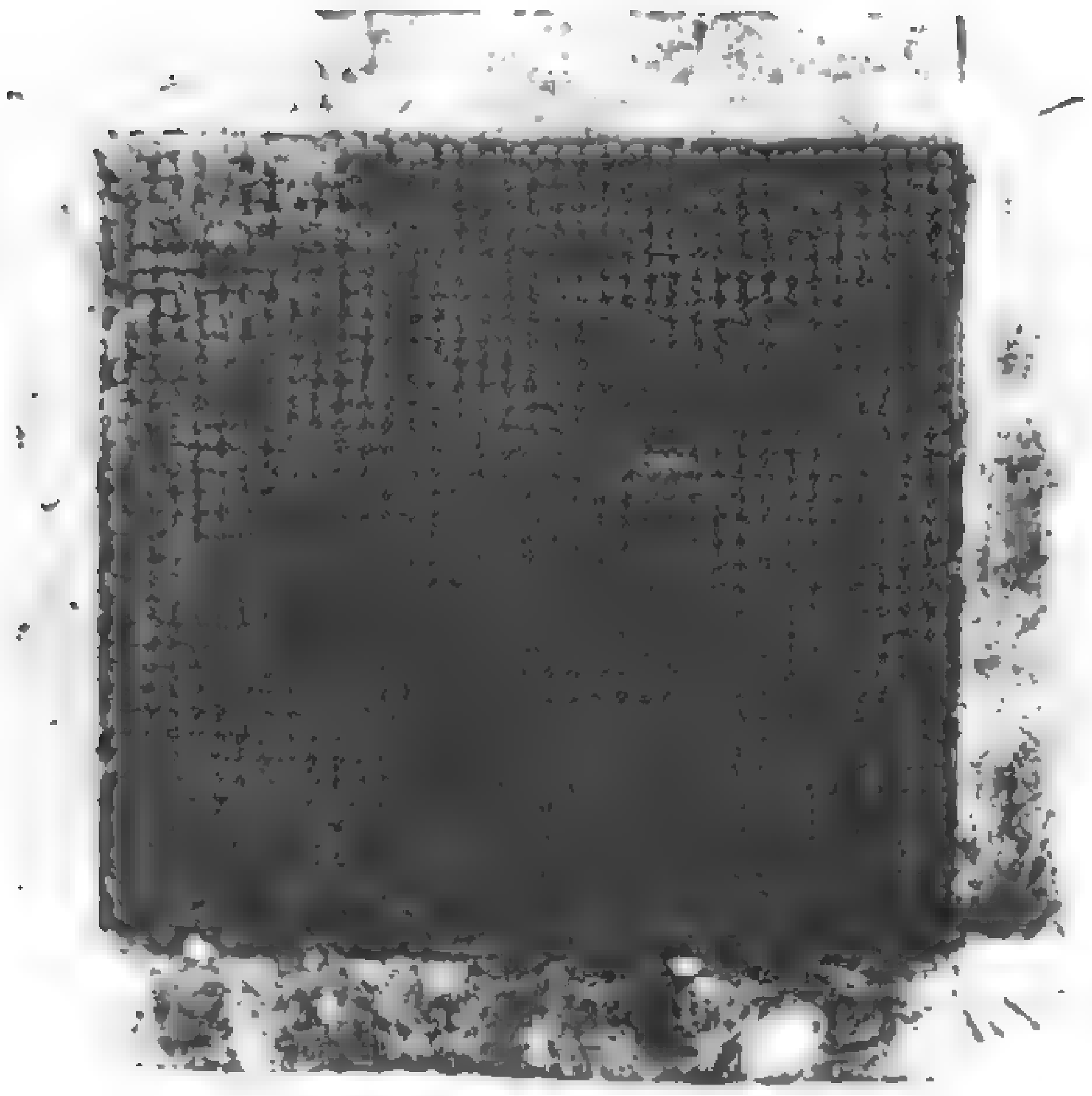


杨执一为隋宗室,唐懿亲,武周中睿开元四朝均直谏有声,志称开元中"衔拜凉州都督兼左卫将军河西诸军州节度督察等大使","降颉利发,败乞力徐"。又称"单于犯关,上急边任,复授右卫将军检校胜州(今陕西榆林)都督处置降户等使","边民用安"。复称"河塞殄殱,军实屡空,复命为朔方元帅兼御史大夫,慰扶凋亡"。由以上诸事看,是杨执一曾屡立过边功。

而唐书仅在杨恭仁传中，叙及恭仁弟续孙“执一，神龙初以诛张易之功封河东郡公累至右金吾卫大将军”等数语。由此志可补正史缺漏。旧《咸阳县志》载“元帅杨执一墓”，是指任朔方元帅之简称。杨执一开元十四年正月卒于鄜州刺使任上，夫人独孤氏于开元四年先卒，十五年九月合葬于咸阳洪渎原。墓室全以砖砌，外有圆首石门，门额线刻双朱雀对立，间以蔓草花纹，门楣、门柱遍刻茂密番石榴蔓草图案花饰，门扇各线刻一宫装仕女姿态生动。志盖中篆书“大唐故杨府君墓志铭”9字，四周亦线刻蔓草图案花纹，斜边四面各刻二瑞兽间蔓草纹，志侧四面均用减底阳刻线刻混合手法，刻出十二肖兽间以蔓草花纹，上侧正中为鼠，左为猪，右为牛，右侧顺次为虎、兔、龙，下侧为蛇、马、羊，左侧是猴、鸡、狗，表示十二支方位，以子在上，午在下，当指示墓正南向。花饰均极精美，构图刀法全属上乘，实属盛唐志石饰纹中一代表作品。

现存碑林博物馆石刻艺术室。

（藏石编号 2281）



144. 刘浚墓志铭

唐　开元十七年（728）　墓志为正方形，高、宽各 76 厘米，1964 年 6 月由陕西乾县城北乾陵陪葬墓范围内出土。刘浚为武则天宰相刘仁轨之子，墓志未载生卒年月，只知刘浚死时 47 岁，初葬地在河南午桥，在洛阳南 10 里，后同刘仁轨一起陪葬乾陵。

墓志由王进撰文，孙子英楷书。志文 36 行，满行 37 字，除具有一定的书法艺术价值之外，文中颇多谀词，有失实之处。如夸耀先人地位声势，则不惜妄加官箴，罗列权贵，称述先德，则曲解习俗。但它的发现对研究唐史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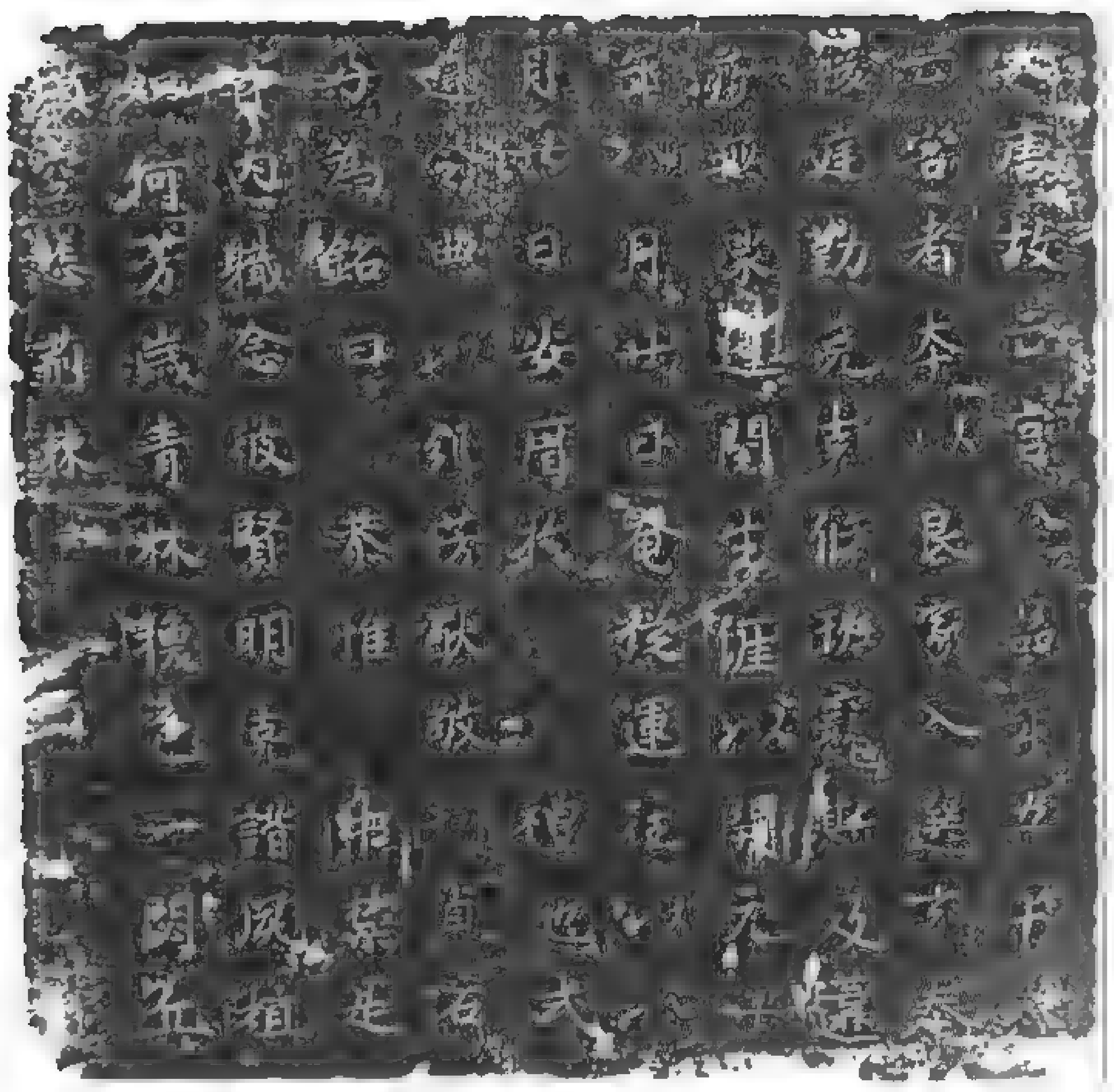
145. 亡宫八品年五十八墓志铭

唐　开元二十年（732）　正方形，高、宽各 31 厘米，11 行，行 11 字，楷

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西安碑林。

（藏石编号 1354）



146. 亡宫八品墓志

唐　开元二十二年（734）　四方形，高 29 厘米，宽 30 厘米，12 行，行 13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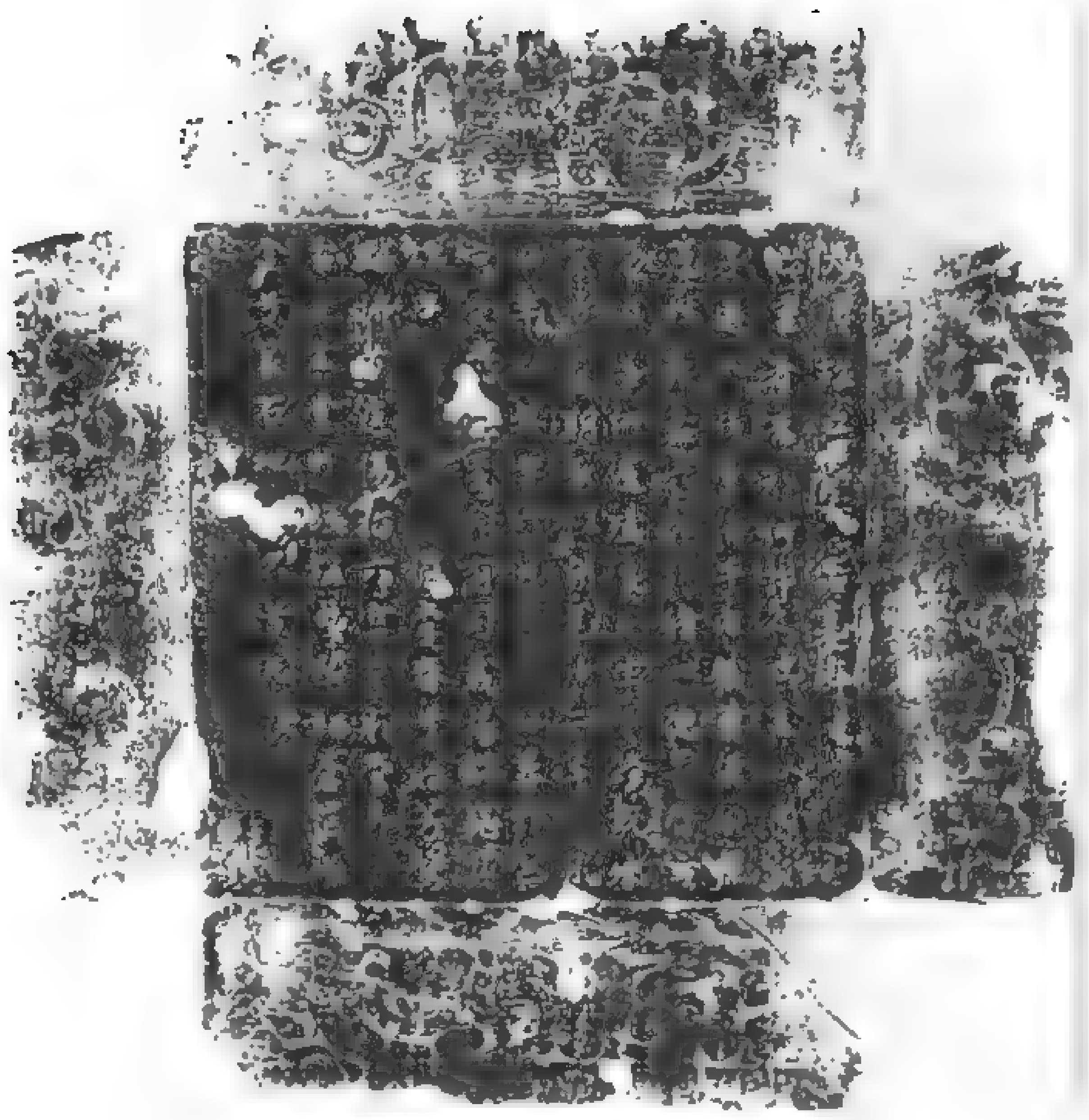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38）

147. 王祖与夫人衡氏合葬墓志

唐　开元二十一年（733）　四方形，高 30 厘米，宽 29 厘米。16 行，行 16 字，楷书。志石由陕西武功县东原出土，1952 年现代书法家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2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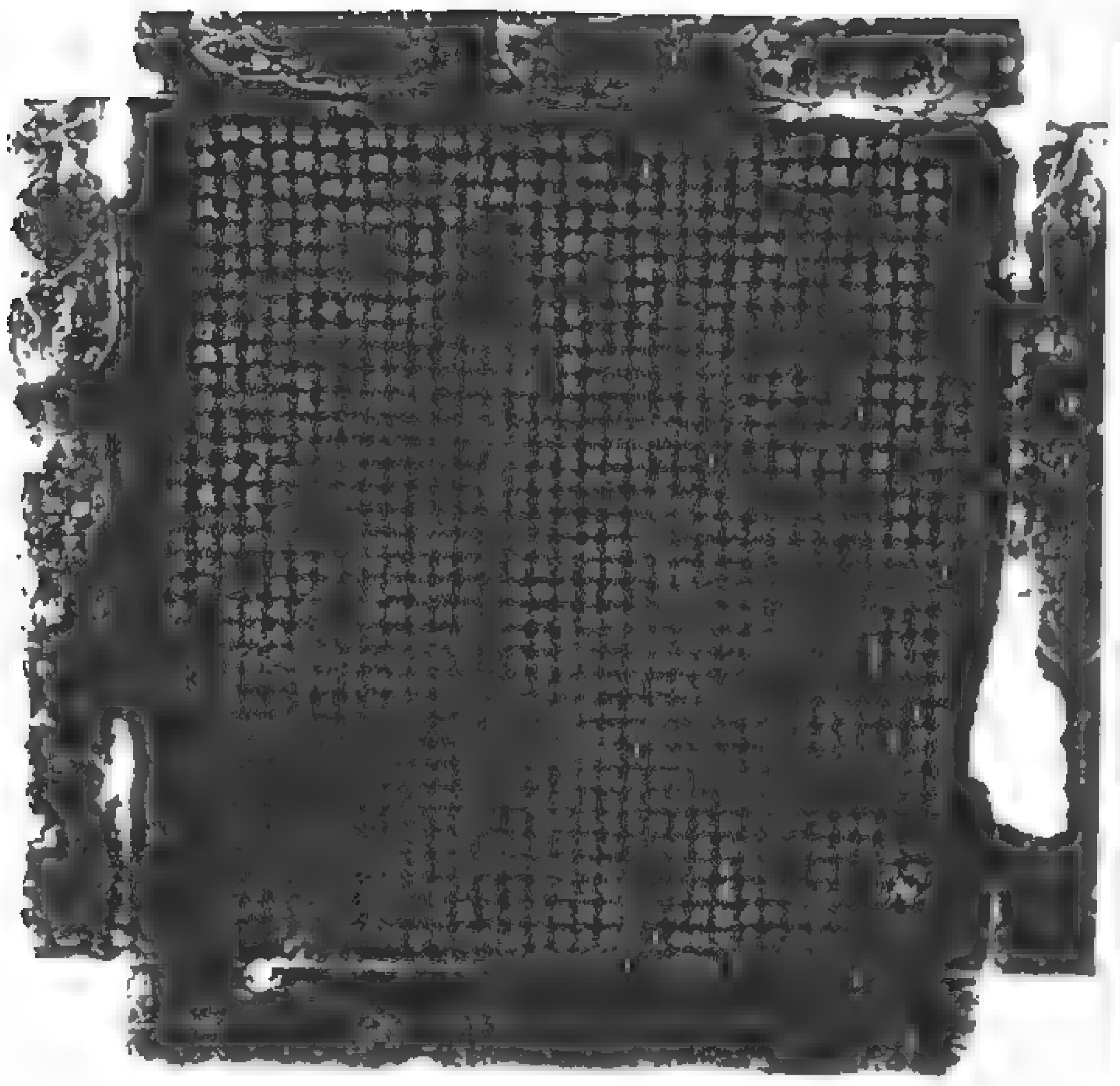
148. 亡宫墓志

唐　开元二十四年（736）　正方形，高、宽各 30 厘米，9 行，行 9 字，楷书，内容记述亡宫女曾奉侍于宫后庭，勤于洁度，终于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十日，葬于亡宫之茔。而不记其姓名。墓志出土于洛阳，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51）

149. 张去奢墓志



唐　天宝十年(751)　志呈正方形,长、宽各87.5厘米,盖为覆斗式,中刻"大唐银青光禄大夫少府张公墓志铭"15字篆书,盖四刹阴线刻牡丹花纹及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纹饰,显得异常华丽。墓志文共34行,满行35字。韦述撰文,裴皃书写,书法楷体劲健秀美。杨岊刻字,刀笔犀利。志侧阴线刻团云中附十二肖兽。

据墓志载:张去奢字士则,其先范阳方城人。后改为京兆万年县人。曾祖立德为秦城都督,祖崇延州刺史,父守浪阆州司法赠都督。张去奢由于门望高厚,兼之智能、德行过人,多有功绩,特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累封为范阳县伯,后又被封右金吾卫大将军,无几又迁升为少府监,曾率"百工惟时巡警以清器用必备禀命"天宝六年死于长安城安业里第,终年六十。天宝十载葬于咸阳洪渎原,衬葬于先茔。

此墓志对研究唐代城坊考和书法艺术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现存西安碑林第五墓志廊。

150. 陆琛振墓志铭

唐　天宝十年(751)　志呈四方形,高38.5厘米,宽38厘米,21行,行21字楷书,盖篆书"大唐故陆府君墓志铭"9字。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记陆琛振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赠扬州大督讳元方之曾孙,皇太子少保左丞相讳象先之孙,今京兆府长安县令众之长子。聪敏而好古,博识多能,善词赋,以天宝十载八月二十六日丙子遘疾,殁于咸宁县安兴里之私第,以其载九月五日还葬于京兆之浐川乡。

《新唐书》卷七十三下《宰相世系表》陆氏世系表中,列有元方,曰"相武后",子象先,曰"本名景初,相玄宗"。象先格下,列有子三:曰泛,"秘书少监,袭兖公";曰广,"沂州刺史";曰偃,"泉州刺史"。而将众(表作潒)列于其孙格内。据此志,当改正。众子振,曾官右金吾卫胄曹参军,表亦缺其名及官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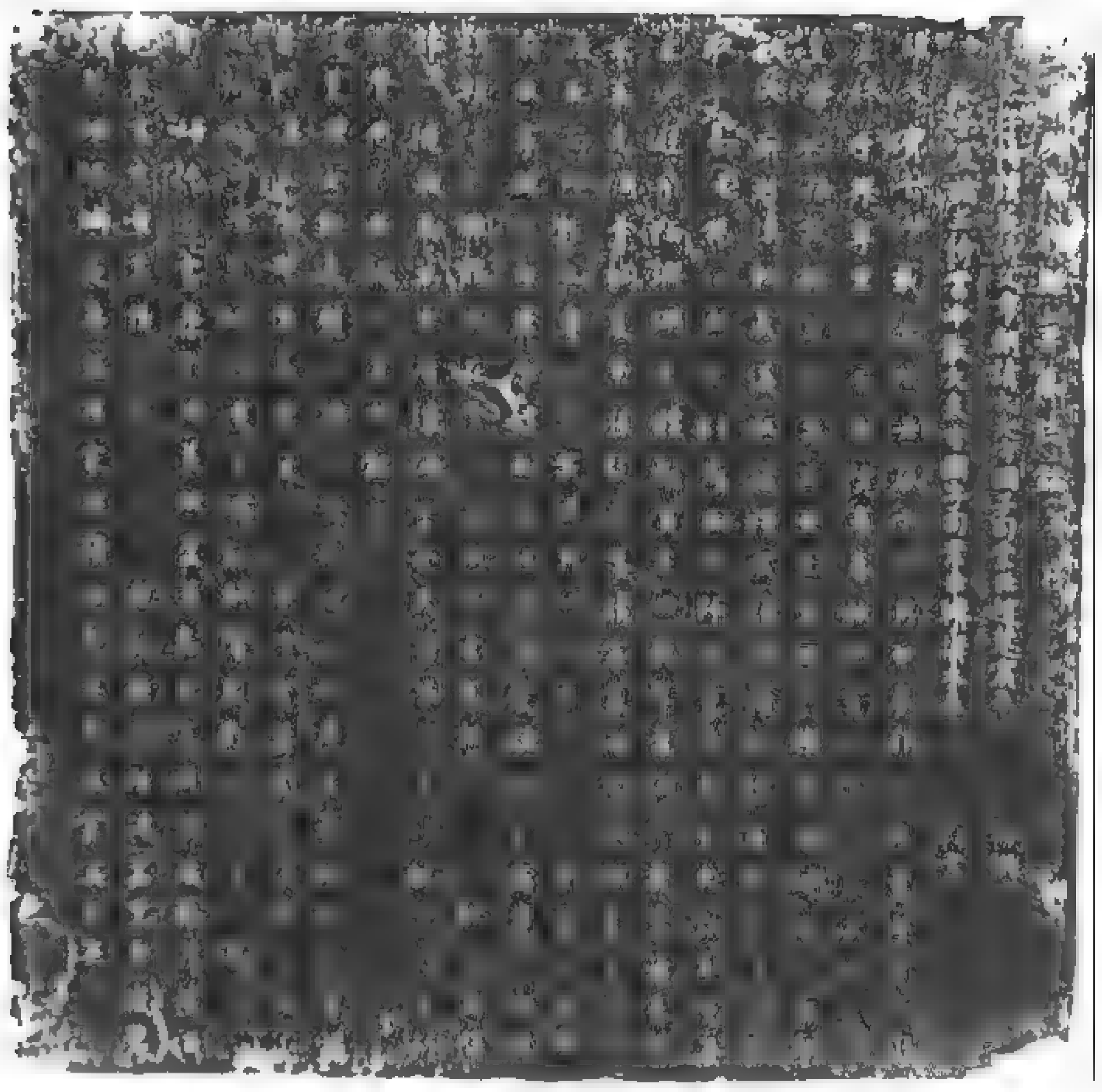
众之妻墓志亦已出土，首云："唐故刑部郎中长安县令洋州郡守陆府君夫人弘农杨氏。府君讳众，祖元方，鸾台侍郎平章事，考象先，中书侍郎平章事。"是杨氏乃陆琛振之母也。又云："嗣子演，河中府士曹，该扶沟县令。"未言振，盖因其已先卒之故。《宰相世袭表》有演、该之名，但将该与众并列，将演列于众之下格，致演与该成为叔侄辈，亦当以志为准改正。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安兴坊内书曰："西门之北，户部尚书陆象先宅，次北，开府仪同三司宋环璟宅。"《谭宾录》曰："璟宅中造屋悉东西正阳。"志载陆琛振于天宝十载八月卒于安兴里，自是陆象先原宅。《城坊考》"西门之北"、"次北"云云，二句下别无注解，似是书述《两京新记》原文。而韦书宋代以后已佚，此处所引必是根据宋敏求《长安志》但今通行本《长安志》则将陆象先、宋璟宅列于大宁坊内，文句与《城坊考》全同。可见徐松在编著《唐两京城坊考时》，对《长安志》文有所变动，而这种更动是正确的。

又《两京城坊考》云，大宁坊西门之南有左侍拯兼右相陆敦信宅，北门之南有太子詹事陆余庆宅。大宁坊与安兴坊相连，陆氏一族可能居此两坊，今本宋氏《长安志》则于晋昌坊列此二宅，文句亦与《城坊考》全同，可见亦是错乱的。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402）



151. 南川县主墓志

唐　天宝十一年(752)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61 厘米，21 行，满行 22 字。1954 年由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队送交陕西省博物馆存。志称南川县主为唐玄宗李隆基第四子棣王琰之第五女，聪敏过人，读诗作书皆能，18 岁卒于兴宁里的十王院，葬于唐都长安京兆府咸宁县之白鹿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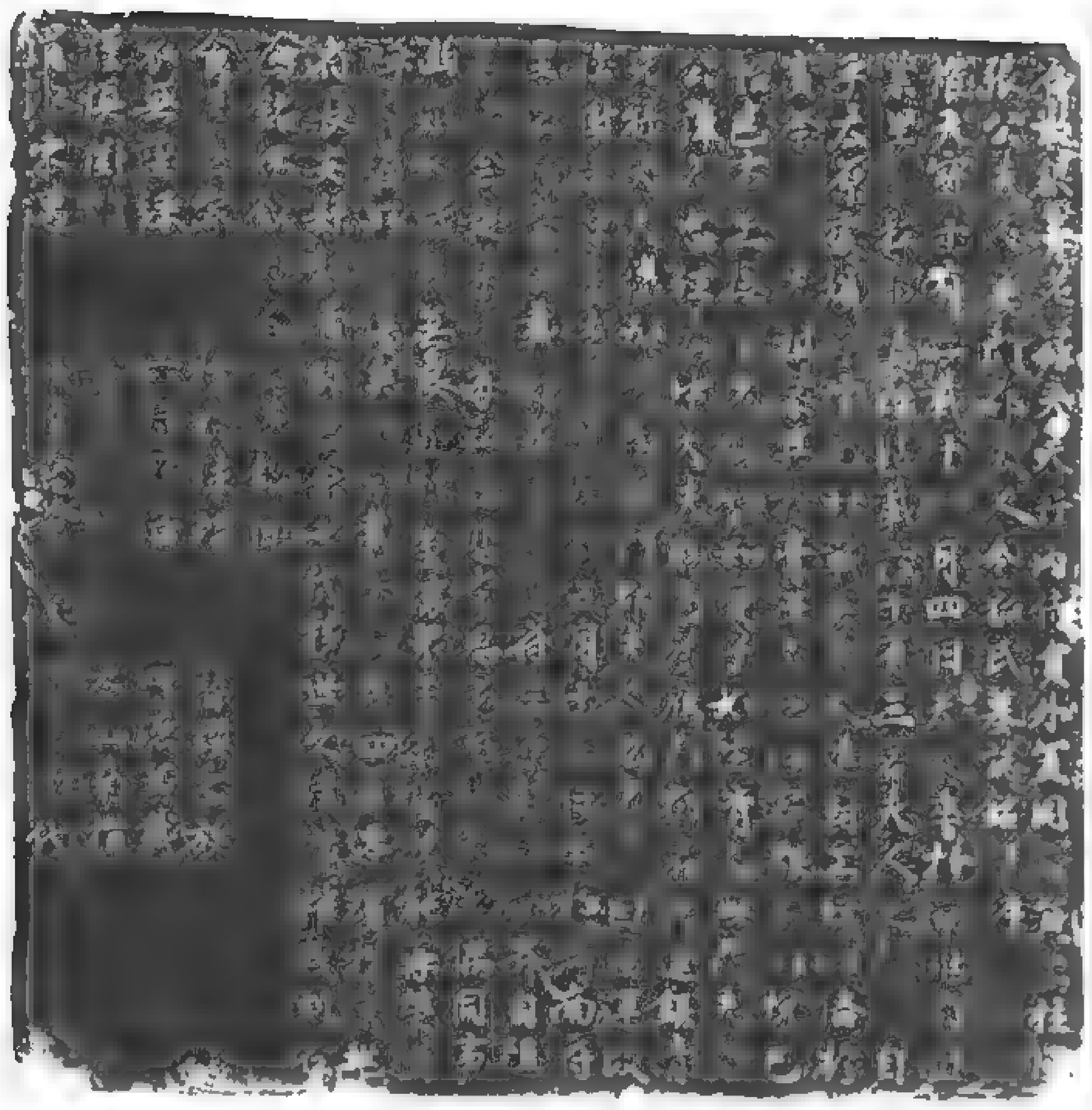
墓志为赵楚宾撰文，名书法家韩择木楷书。韩择木，昌黎（今属河北）人，官工部尚书，散骑常侍。书法精于隶书，杜甫在《观李潮八分书歌》中说："尚书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以来数八分，潮也与之成三人。"《宣和书谱》称韩择木："隶书之妙，惟蔡邕一人，择木乃能追其遗风，风流闲媚，世谓蔡邕中兴焉"。其

楷书极少见，不知者以为韩择木只是隶书能手，及看到他写的这《南川县主墓志》楷笔秀劲多姿，类虞世南，才晓得韩择木的楷书也是精妙无比。

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四 649）

152. 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张元忠妻雁门郡夫人令狐氏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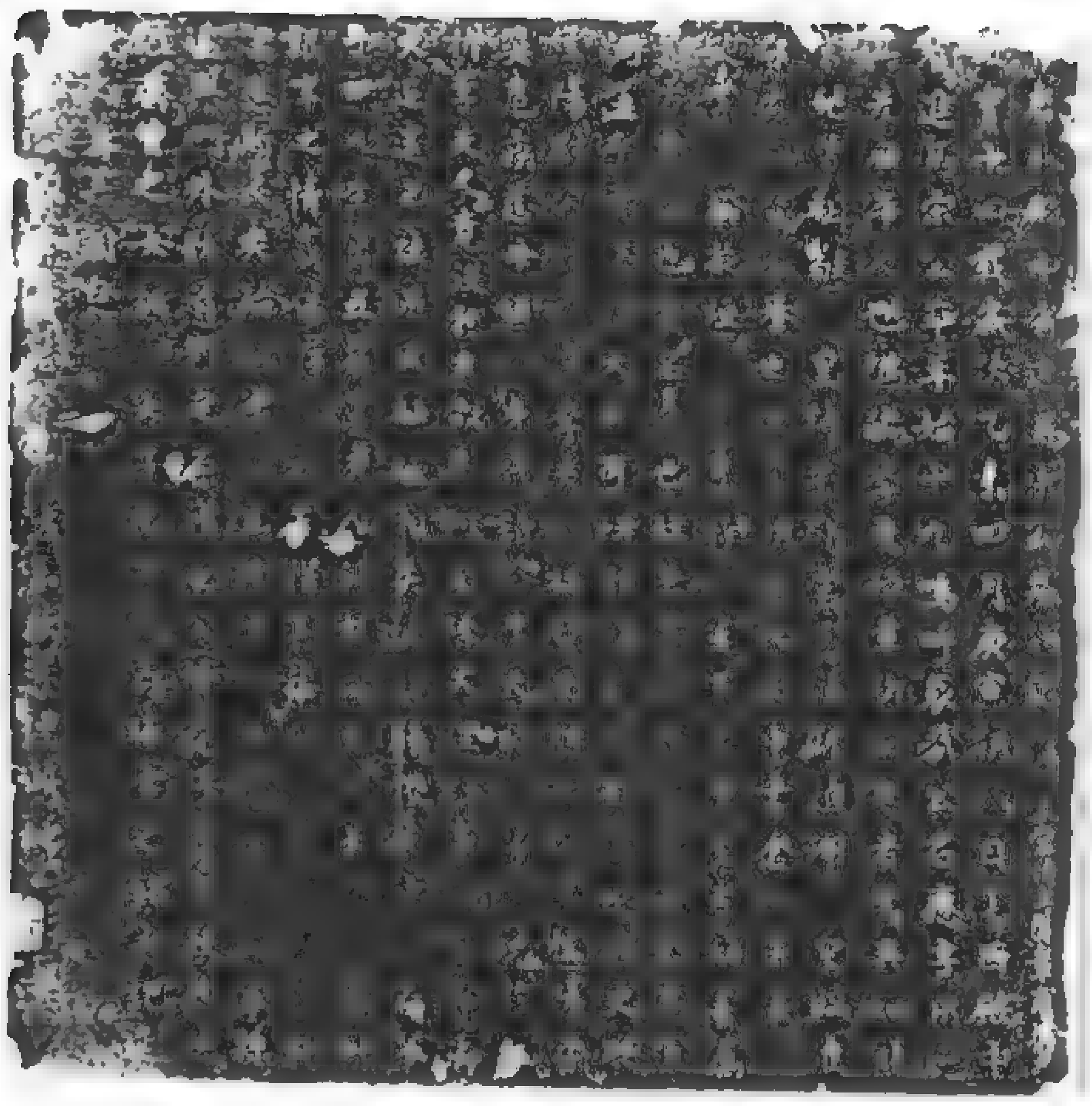


唐　天宝十二年（753）　正方形，高、宽各 55 厘米，20 行，行 20 字，行书，志石由长安出土，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志称“夫人卒于京兆府殖业里”，“殡于长安县龙首乡”可作为长安坊里及乡名的研究资料。《金石续编》、《金石文字存逸考》均有著录考证、续编并集有古志石精华的详细考证。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662）



153. 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

唐　天宝十四年（755）　四方形，高 42 厘米，宽 41 厘米。20 行，行 20 字，楷书，志盖篆书九字，陈章甫撰文。1952 年由西安东南郊新开门出土。

按《唐书・百官志》三，殿中省尚乘局有“进马六人七品下”注称“进马旧仪，每日尚乘以厩马八匹，分为左右厢立于正殿侧宫门外，候仗下即散”。“进马二人，戎服执鞭立于马之左，随马进退。”“天宝八载李林甫用事罢立仗马亦省进马官。十二载杨国忠当政，复立仗马及进马官”。又《百官志》二兵部尚书条内有“凡殿中省进马，取左右卫三卫及高荫，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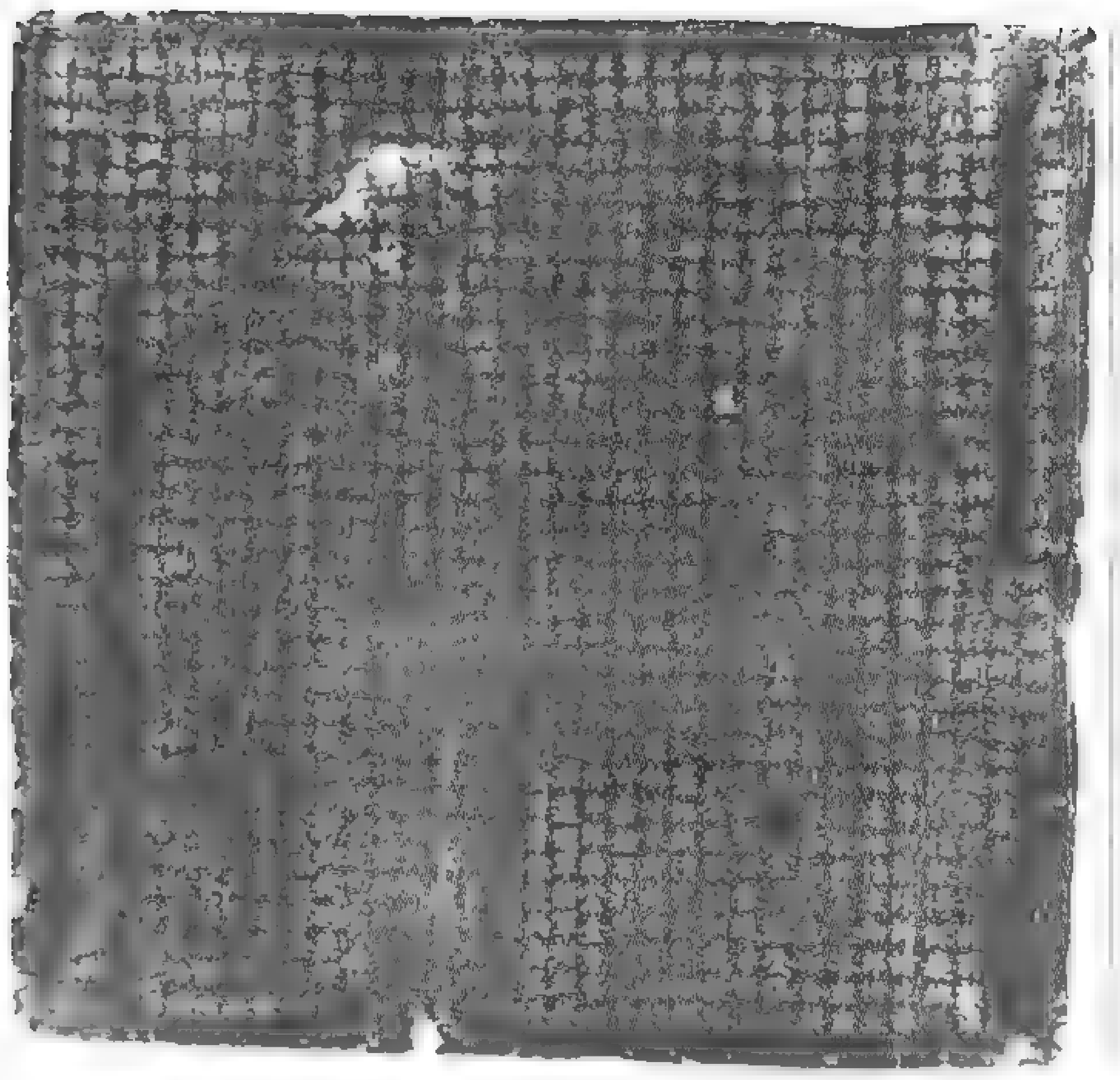
仪容可观者补充”。志称宋应卒年始于十九，先一年以其父昱，时为中书舍人，“掌纶掖垣，天恩特拜进马”，是以仪容及父荫而于杨国忠恢复进马官后任斯职的。这志石1952年在西安市东南郊新开门村东出土，与志称“座于咸宁县正兴门外龙首乡之原”正合，可藉以知唐长安龙首乡的地点。与志石同坑出土有铜器数件，其中以漆背金银花镜最佳，还有陶器数件，但出土时已残毁，这些文物除志石外现均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志石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2989）

154. 立功臣冠军大将军右龙武军大将军张登山墓志

唐　天宝十四年（755）　四方形，高59厘米，宽60厘米。33行，行33字，楷书，志盖覆斗式，中楷书九字，申参撰文。志石出土于西安西郊，1952年现代书法家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志盖四刹线刻四神间以蔓草花纹，志石四侧各分三区，减底阳刻十二生肖。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3718）

155. 六品亡宫墓志

唐　天宝（742—756）　四方形，高32厘米，宽31厘米，9行，行3～15字，楷书，志盖篆书九字，年月泐，1953年西安市西十里铺出土，电器工业局送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三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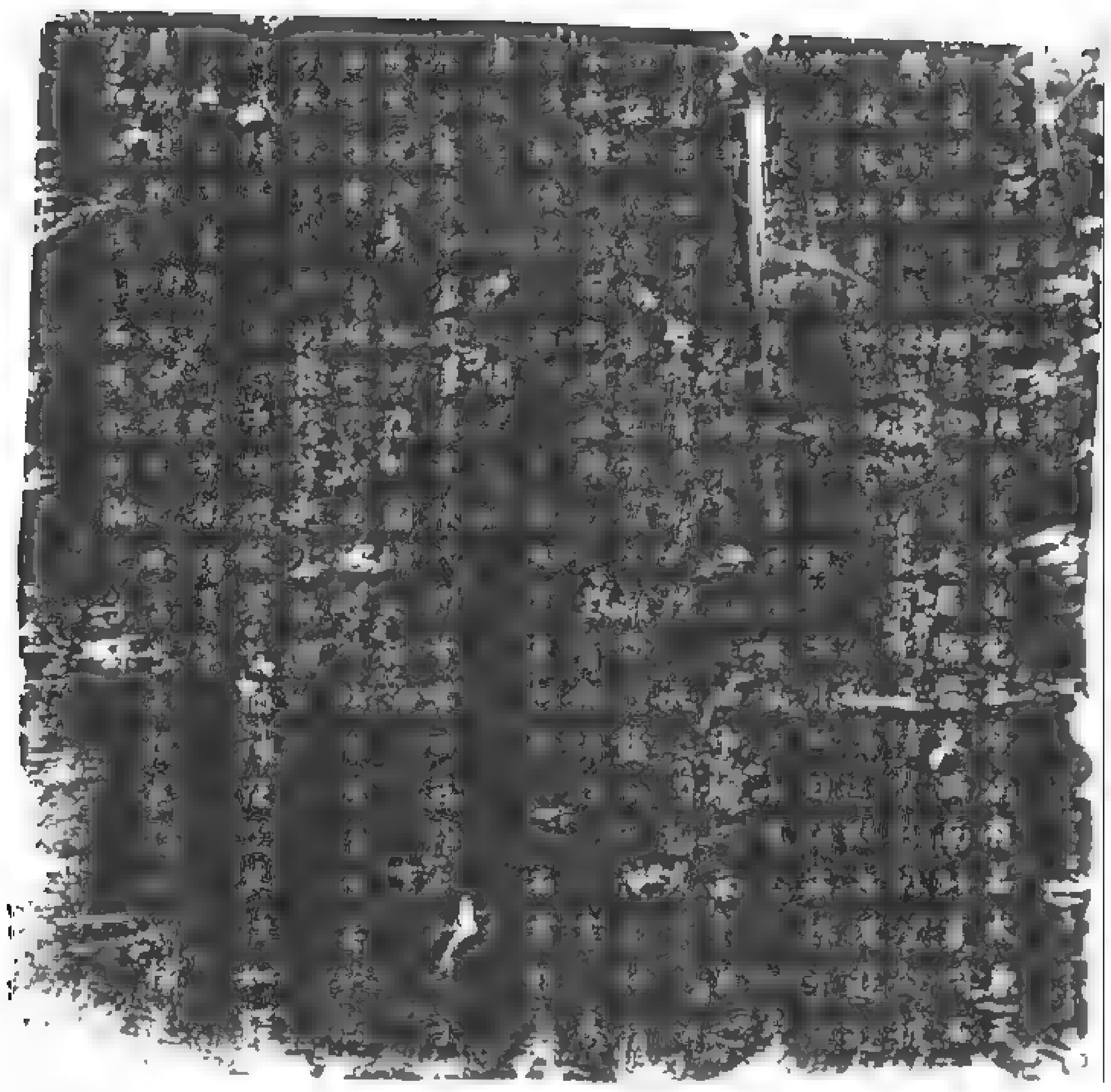
156. 太原王府君玭墓志

燕　圣武二年（757）　正方形，高、宽各47厘米，21行，行22字，楷书，盖篆书9字。长安出土，1951年西北文化部拨交西安碑林收藏。

"燕"为安禄山国号，圣武二年当为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志称王玭"终于京兆府长安县醴泉坊之私第"，可藉以作研究唐长安坊里名称的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7149）



157. 处士徐怀隐墓志

燕　圣武二年（757）　四方形，高 41 厘米，宽 40 厘米。17 行，行 17 字，楷书，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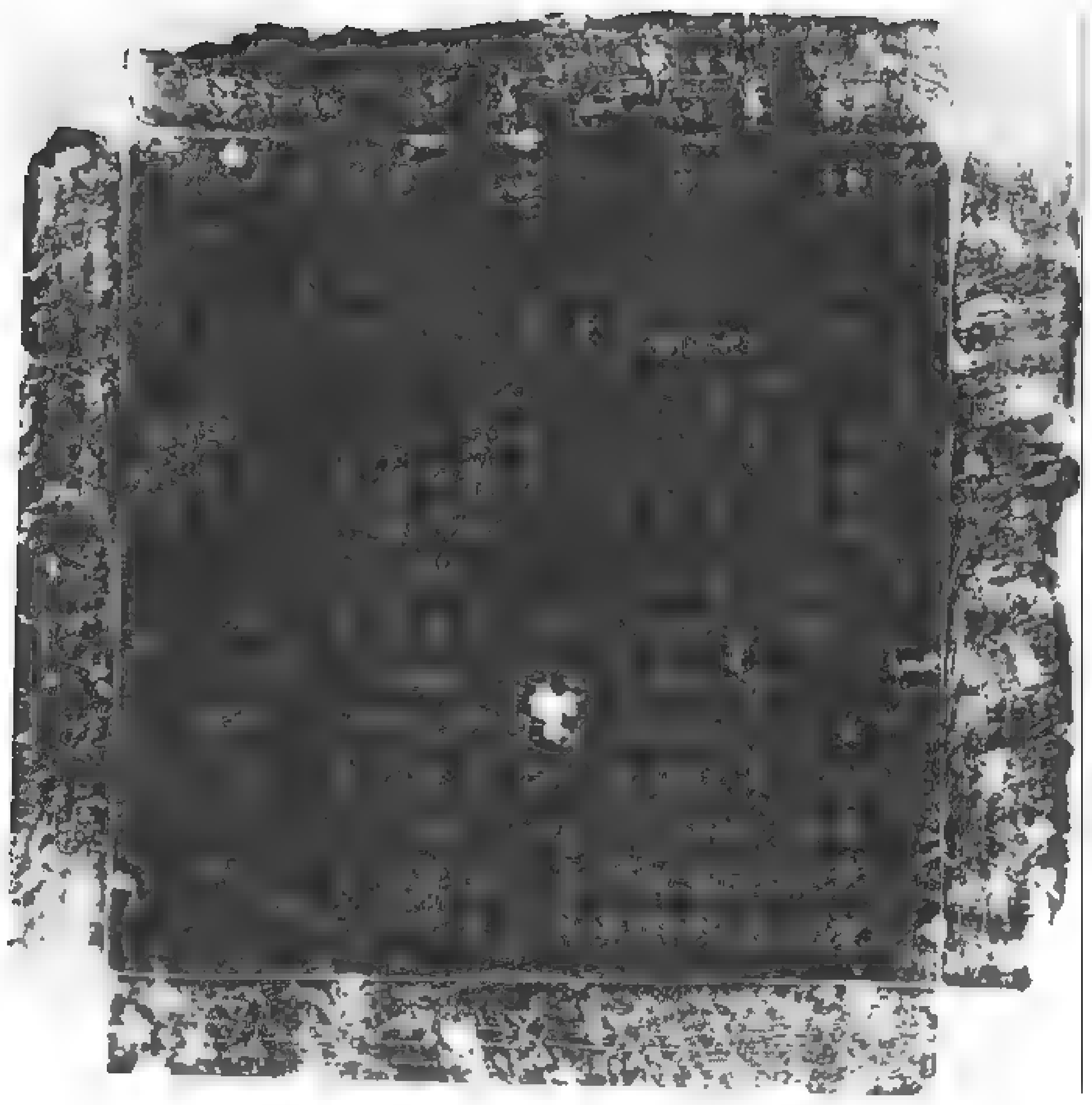
158. 亡宫七品墓志

唐　上元二年（761）　四方形，高 38 厘米，宽 39 厘米，12 行，行 13 字，石剥落，字颇漫漶。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01）

159. 唐长安县主簿李公故夫人司马和墓志铭



唐　广德二年（764）　志呈四方形，高 37 厘米，宽 37.5 厘米，志四侧饰几何花纹，志文 17 行，行 16 字，楷书，盖为覆斗式，中题"唐长安县主簿李公故夫人司马氏墓志铭并序"篆字。1955 年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

志记司马和，字班，河内温县人，晋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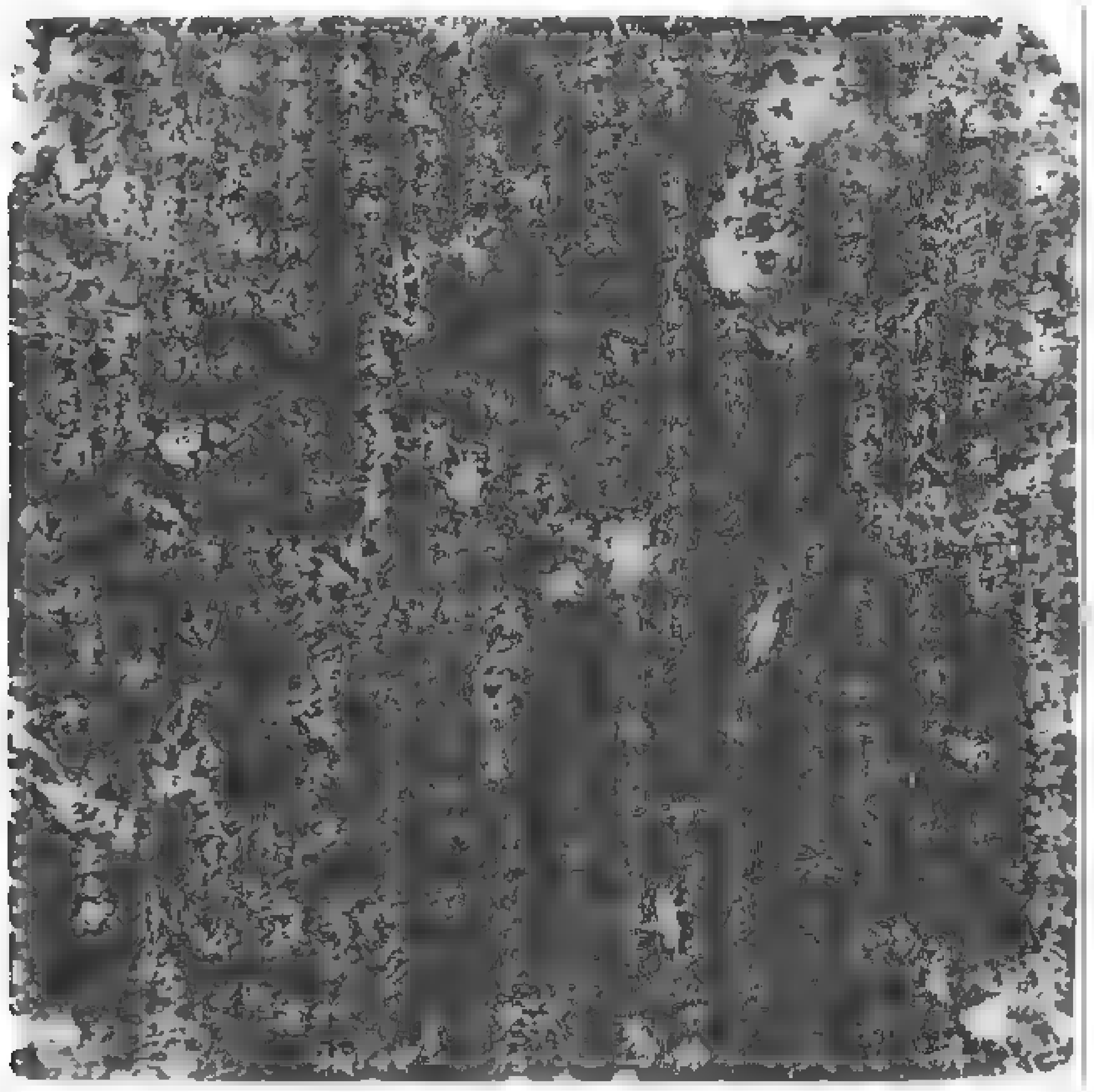
帝十六代之孙，中书侍郎锃之孙，河南府功曹益之女，18岁归于渤海人李元叶。广德二年九月十有二日终于长安大觉精舍，粤十有六日，权殡于万年县郑村，享年32岁。郑村之名，别志已见。大觉精舍即大觉寺。宋敏求《长安志》载："次南崇贤坊"，"街北方西大觉寺"注"隋开皇二年，文帝为医人周子臻所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在此注下增"其地本臻之佛堂也"一句。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9408）

160. 左相兼兵部尚书集贤院弘文馆学士崇玄馆文学士上柱国许国公陈希烈墓志

唐　永泰二年（766）　正方形，高、宽各43厘米，17行，行18—23字行书不等，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



按陈希烈于唐玄宗李隆基时，由李林甫荐引为左丞相，后以降安禄山罪处死，《新唐书·奸臣传》有传，故此墓志撰书亦甚草率。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1329）

161. 唐故金紫光禄大夫颖王府司马元怀墓志

唐　大历四年（769）　志呈四方形，高44厘米，宽43厘米，23行，行23字，楷书，四侧饰花纹。1954年由西安西门外自来水厂出土。

志记元怀，字弘，清河南人，"弘量神伪"曾任右卫兵曹参军、左监门卫中郎将、左监门卫将军、卫尉少卿、虢州刺史、怀州刺史。并参加过讨伐安禄山史思明的平乱。上元元年终于上都，大历四年二月十日卜宅兆于京兆长安县龙首乡岐村南，与夫人新平县主合葬。这说明长安郊区有两个龙首乡。另一属万年县，在城东郊。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1326）

162. 行内侍省内常侍孙公故妻彭城郡夫人刘氏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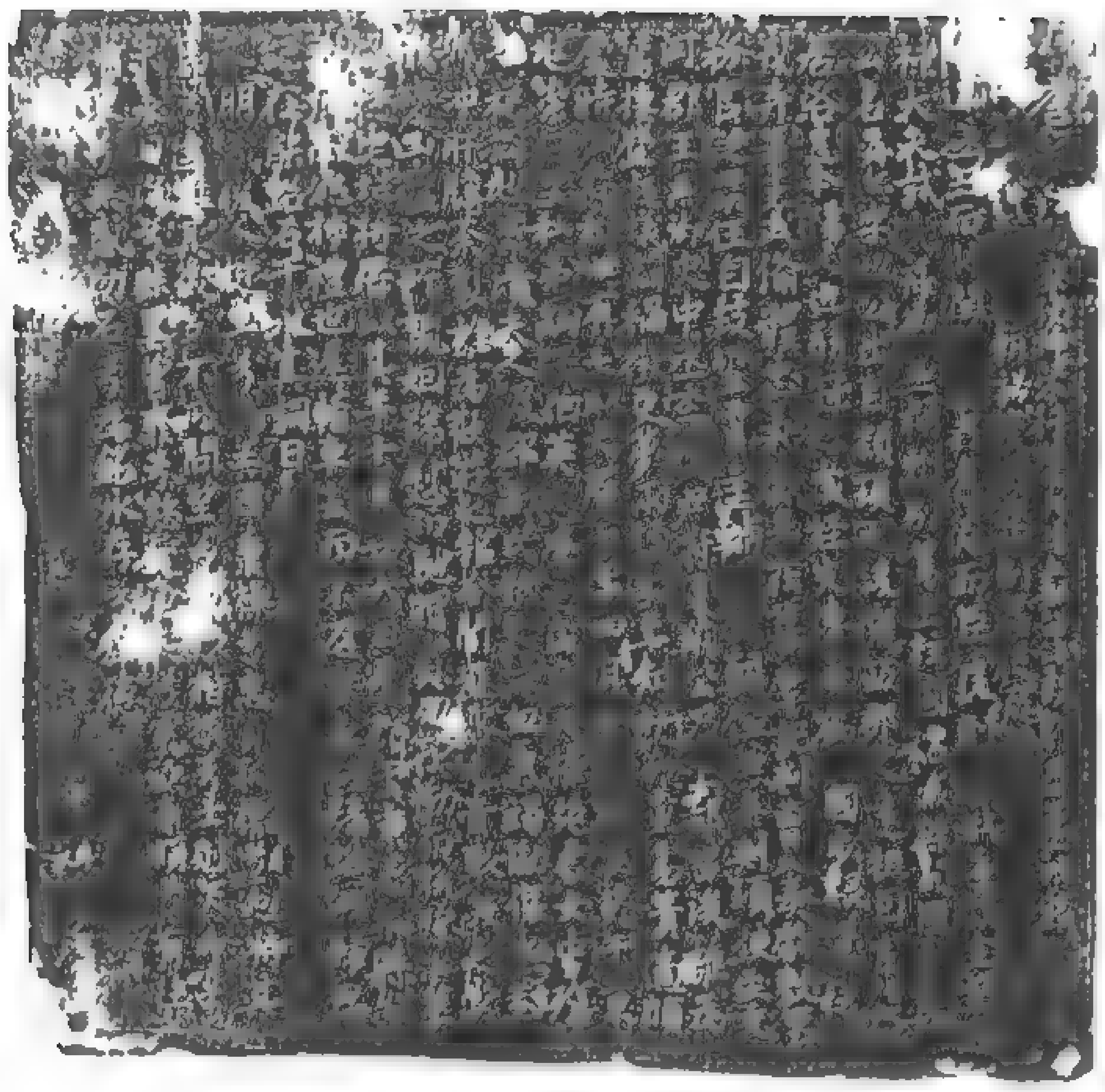
唐　大历七年（772）　志呈四方形，高 39 厘米，宽 40 厘米，18 行，行 18 字，楷书，志四侧饰花纹，朝议郎兖州别驾韦移撰文，1956 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称“彭城郡夫人刘氏九兄福游，随、饶两州刺史，十一兄福仙左卫军，七姊鱼军容之妻，国夫人也。八妹即行内常侍孙希严之妻也。”唐代宦官多有妻妾，刘氏姊妹乃都嫁与宦官。所谓鱼军容，即是唐代有名的宦官鱼朝恩，《唐书》有传。肃宗至德初，讨史思明，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此为观军容称号之始。代宗时，更以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领神策军。新、旧《唐书》记其专横贪污事实甚多，虽被元载与代宗设谋诛死。但未有一字涉及其家属。由此志知其妻为刘氏。志并有“刘氏享年三十有八，终于京兆府万年县来庭里之私第。孝息子贵、子昂悲生薤露”等语，说明鱼朝恩不但有妻，且亦有子，妻之兄弟都为大官。封建社会一人成仙，鸡犬飞升，不独宦官为然。唐长安城来庭里多居住宦官，鱼朝恩宅即在此里。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38）

163. 唐故凤翔观察使神策行营兵马上都留后段晏墓志



唐　大历七年（772）　志呈四方形，高 36.5 厘米，宽 36 厘米，22 行，行 22 字，楷书，四侧饰花纹，盖呈覆斗式，中题“大唐故段府君墓志铭”楷书 3 行，行 3 字，盖四刹饰蔓草花纹，徒庭训撰文。1956 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墓志称：段晏，先陇西郡人，后居洛阳，“经史博通”文才武略兼备，官至光禄卿兼颖州别驾，以大历七年十月廿六日迁

殡于京万年县崇义乡南姚村。据调查南姚村之名，至今还尚存。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2149）

164. 行内侍省给事周惠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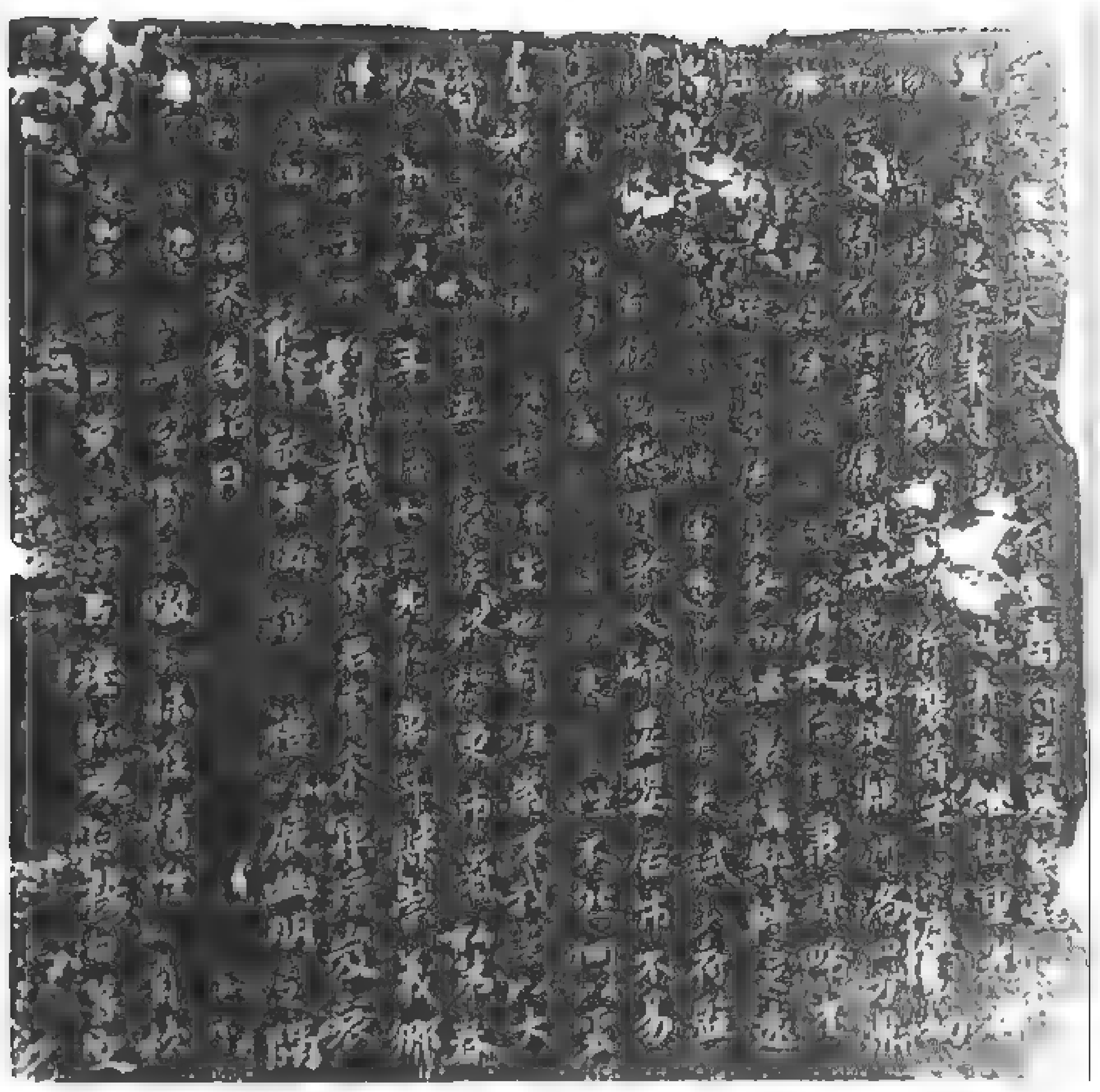
唐　大历十二年（777）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3.5 厘米，22 行，行 22 字，楷书，四侧饰花纹，盖篆书“大唐故行内侍省给事周府君墓志铭”，覆斗式盖四刹饰蔓草纹。志为僧有侧撰，僧道秀书。1955 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云“章敬寺沙门有则述，沙门道秀书”，关于章敬寺《旧唐书·鱼朝恩传》载“大历二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楼观，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新唐书》所记与此略同，但多“观沼胜爽”一句，是鱼朝恩在城东郊的庄园中，有池沼楼观。章敬寺为唐长安有名佛寺，其来源如此。此志又提到沙门为宦官撰书墓志，似章敬寺主要为宦官活动场所。志记周惠为潮州人，故唐代宦官籍多是岭南，此文是一证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44）

165. 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义忠墓志铭



唐　大历十二年（777）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32.3 厘米，18 行，行 19 字，楷书，盖呈覆斗式，中题“唐故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府君墓志铭并序”篆书，四刹饰蔓草花纹。1956 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载：高氏为渤海人，以谋略得官，为定远将军，守左威卫大将军，迁中散大夫试少府监。“以大历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寝疾终于东市署私第”。是说明唐代官员亦有在市内居住者。所谓东市署私第，当是

在市署附近，因志未言高义忠的历官和东市署有何种关系。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5710）

166. 唐故游击将军守左领军卫曹惠琳墓志铭

唐 大历十四年（779） 志呈四方形，高 59 厘米，宽 57.5 厘米，22 行，行 22 字，楷书，四侧刻十二宝相花纹，盖呈覆斗式，中楷书“唐故游击将军守左领军卫翊府郎将上柱国曹府君墓跋文”24 字。敬业寺大德令名撰文，僧道秀书。1956 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云：“公讳惠琳，本望敦煌康氏也”。又云“体刚毅之资，出酋豪之右，未龄乱，舅氏赠绵州刺史，元裕见面而奇之，毓为后嗣，礼均天属，遂称曹氏焉。又毕恩终，宣归本族，君子韪之”。是曹氏本姓康，全是少数民族。唐代在长安军队中活动的康姓人甚多，《唐书》中屡见不鲜，如康待宾、康愿子、康艳典（《旧唐书》卷八）、康宪、康日全、康艺全（《旧唐书》卷十七上）、康君立（《旧唐书》卷二十上）等都是康姓人。原本是以国为姓氏的康国人（今撒马尔汗，唐时称康国，在唐代属中国的领土）。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70）

167. 朝散大夫行太守洗马上柱国萧季江墓志铭

唐 贞元十一年（795） 正方形，高、宽各 48 厘米，25 行，行 25 字，楷书，盖篆书九字。韩章撰文，杜沔书。出土时地不详，1953 年入藏西安碑林。

志称死者萧季江“窆于万年县毕原”，按万年县本隋大兴县，唐武德元年更名，天宝七年改名咸宁，至德三年复名万年。故天宝十四年宋应墓志称“瘗于咸宁县延兴门外龙首乡”均合史实。死者卒于“京师怀远里之私第”，可藉作研究唐坊里的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五三 1008）

168. 唐故彭王赠司空李仅墓志铭

唐　建中四年（783）　志四方形，高 38 厘米，宽 41 厘米，文 16 行，行 17 字，楷书，志四侧饰花纹，盖作覆斗式，中篆书“唐故彭王赠司空”衔，四刹饰团花。1956 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称“王讳仅，故唐高祖神尧皇帝八代之孙，肃宗之第五子，代宗之弟，建中神武皇帝之叔也。”又云“而唐主忌克，恶其多能，囚挚逾时，殷优靡诉，及奔亡之际，遽而见害，以十月三日薨于某宫，时享年六十。”

《新唐书》卷八十二《十一宗诸子传》载：“彭王仅，始王新城，进封彭。史思明陷河、洛，人心震骚，群臣请以诸王临统方镇兵，遥相维压，兴王凤翔，并为大使。是岁仅薨。子镇为常山郡王。”《旧唐书》仅传与此略同，均无被囚被害字样。查在肃宗弥留前，唐宫内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程元振勒兵杀肃宗张皇后及肃宗第二子越王系（肃宗第三子封建宁郡王，在灵武被肃宗赐死，第四子卫王佖早薨，仅为第五子）。第六子兖王僩（《新唐书》卷六《肃宗纪》）。仅亦必是于此次政变中被杀，但《唐书·肃宗纪》竟未提说，岂非脱误的缘故？又从志中“唐主忌克，恶其多能”等的语句记载，盖是因兄弟争权，代宗依程元振、李辅国杀害兄弟。《唐书》只言说是程、李所为，是不正确的，应加以补正。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35）

169. 郑国大公主墓志铭

唐　贞元三年（787）　志呈四方形，高 54 厘米，宽 54.5 厘米，志石右半残缺余残文 28 行，行 29 字，马锡撰文，书法楷体，盖覆斗式，中真书，四周饰蔓草纹，四刹雕四帜像。1953 年咸阳底张湾出土。

《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公主传》载，肃宗七女，“郑国公主，始封大宁。下嫁张清。薨贞元时”。此志云“贞元二年十月七日卒于宣阳里，终年 58 岁。唐德宗曾停止朝事，派人吊唁”。志又云张清乃“玄宗之表侄，肃宗张皇后之爱弟”。是郑国所嫁，乃是其舅。唐人婚姻不重行辈，这又是一实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六三 129）

170. 唐故扈德监右银台门进奏使张明进墓志铭

唐　贞元十九年（803）　志四方形，高 42 厘米，宽 43.2 厘米，25 行，行 26 字，行书，侧饰花纹，张据撰文并书，志盖呈覆斗式，中篆"大唐故张府君墓志"8 字，志盖四刹雕团花纹样。

据志载，张明进为京兆高陵人，书衔为"唐故扈德监右银台门进奏使朝仪郎守内侍省掖庭局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志内又有"十五年（贞元）奉诏右银台门监天下银奏事，监守应门，恭勤严肃"等语。考唐大明宫银台门有二：曰左银台门，右银台门。左银台门为向大明宫运进物资之门，右银台门系全国各地进奏皇帝文表所由之门。可知张明进所从事的职务。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96）

171. 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弇夫人京兆韦氏墓志

唐贞元十九年（803）　正方形，高、宽各 38 厘米，24 行，行 23 字，楷书，书法精劲，近似欧阳询书。李翱撰文。河南陈留出土，原为新安张伯英藏，1952 年由该张捐西安碑林收存。

志文四周有简单边花，左下角由第九行 23 字起至末行 11 字止全缺。夫人为韦说之女，韩弇之妻，韩愈的从嫂，李翱之妻母，故志文撰书均出翱手。志称弇贞元三年遇害，与《新唐书》德宗贞元三年闰五月"浑瑊及吐番盟于平凉，吐番执会盟副使兵部尚书崔汉衡杀判官殿中侍御史韩弇"合。又称"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归于陇西李翱"亦与《昌黎先生集・送翱诗注》悉合。夫人以 17 岁而寡无母，以母依父，依董氏姊，均不幸，最后依于婿李翱，卒于汴州。志文又称"以从女子之怀权道也"，是依翱开封为葬。志的缺文，除韩集贝州君墓志外，当依《李翱集》十五卷补之。《李文公集》中韩书记夫人墓志文与残志文无少异。再志称夫人以 13 岁而婚，女以 15 岁而婚，可见当时早婚风习尚盛。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58）

172. 宜都公主墓志铭

唐　贞元十九年（803）　志呈四方形，高 78.5 厘米，宽 78 厘米，志文行书 30 行，行 28 字，志侧饰十二生肖及蔓草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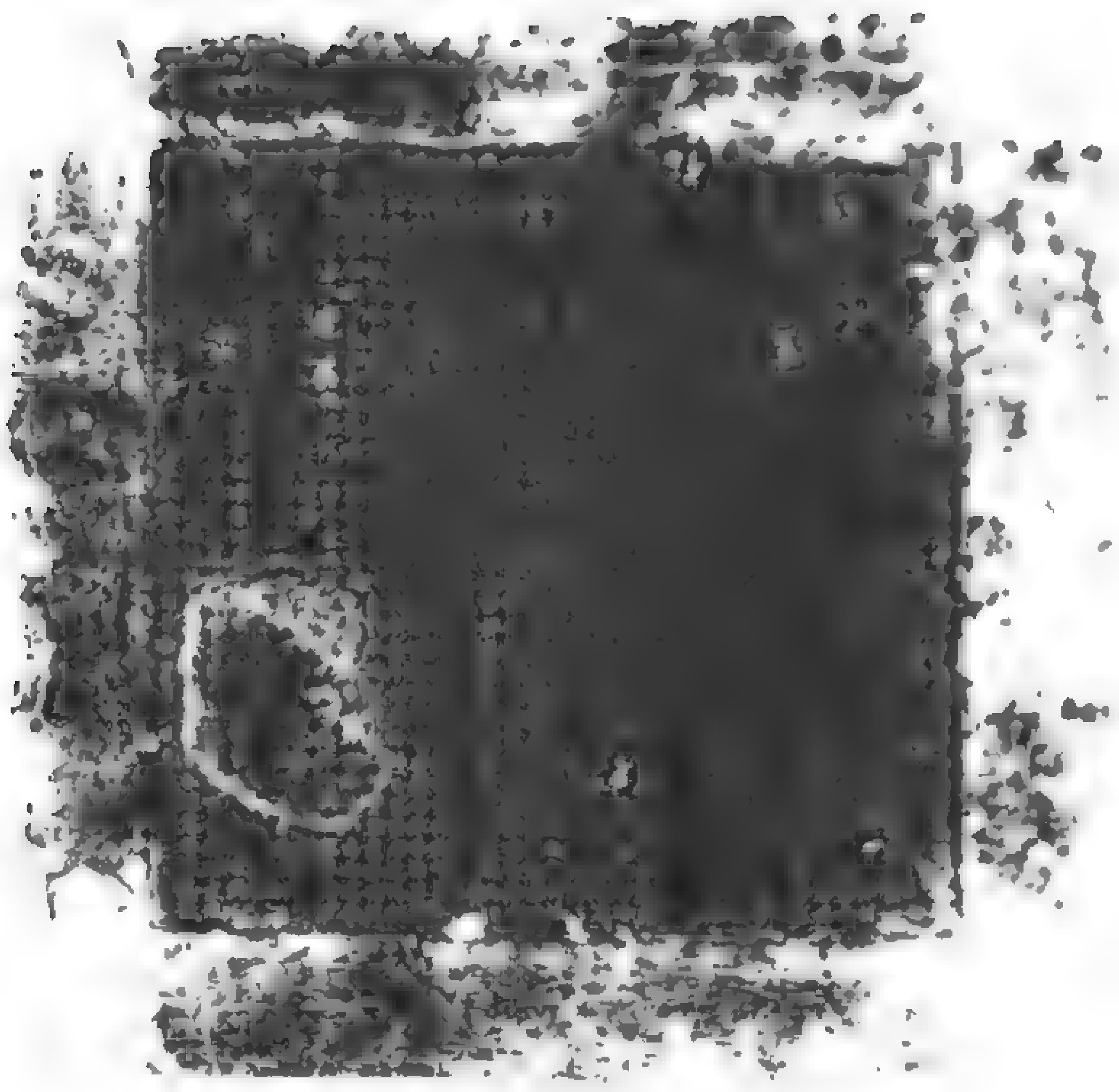
据《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载，德宗十一女"宜都公主，下嫁殿中少监柳昱。薨贞元时"。据此墓志载："公主，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宣孝皇弟之曾孙，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之孙，德宗皇帝之第五女，皇姑和正公主之少子驸马都尉柳昱之妻。"史志互证相合。又据《诸帝公主传》和政公主乃肃宗之女，其子与代宗同辈，而尚德宗之女，是唐人不论辈分通婚的事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1645）

173. 驸马都尉柳昱墓志铭

唐　贞元二十年（804）　志呈正方形，高 76 厘米，宽 76 厘米。志文楷书 35 行，行 35 字，李再荣撰，李正仪书，志四侧饰十二生肖像，盖为覆斗式，中题楷书"大唐故柳府君墓志铭"，志四边及四刹饰团花及四神纹饰。1955 年由西安东郊红庆村与宜都公主墓志同坑出土，称为鸳鸯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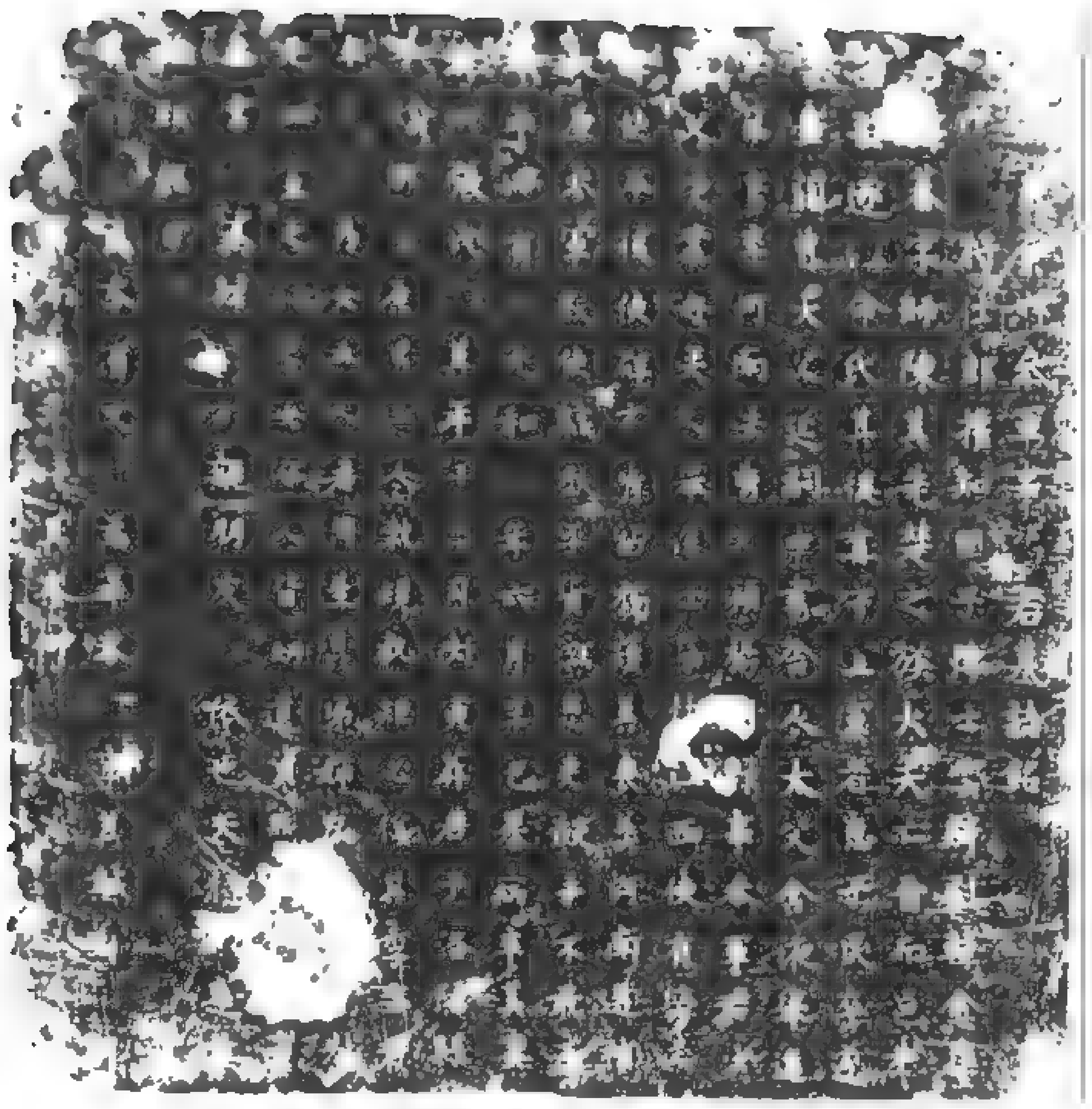


由墓志知：柳昱，字季昭，柳潭之子，而潭亦是驸马都尉，所尚者即肃宗女和政公主。柳氏为河东大族，多与皇族联婚。柳昱享年仅 45 岁，唐贞元二十年终于长安永兴里，同年合附于宜都公主茔地。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01）

174. 太原府参军事苗蕃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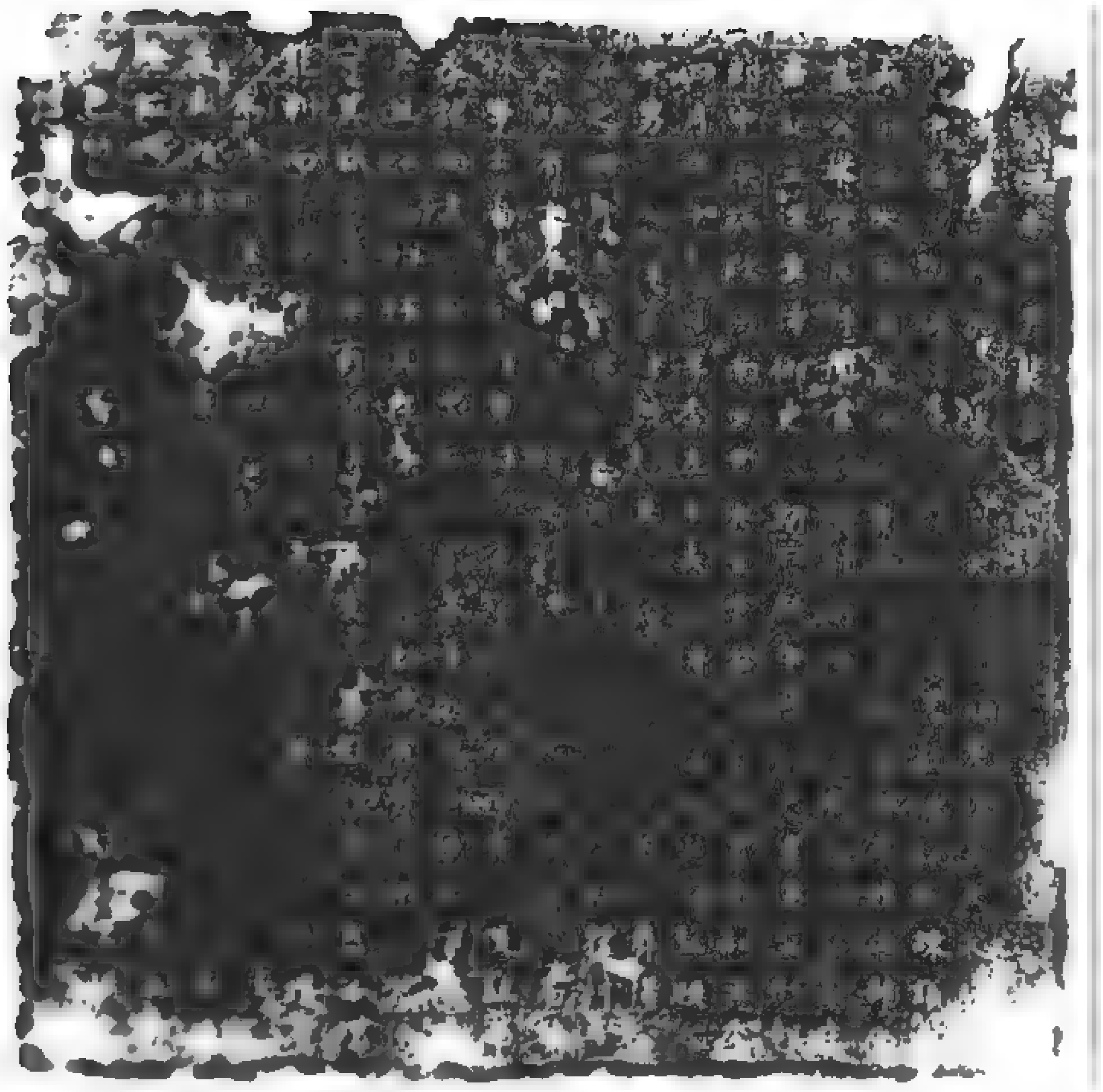
唐　元和二年(807)　正方形，高、宽各 53 厘米，18 行，行 18 字，楷书。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西安碑林藏。

《韩昌黎全集》第二十五卷收此志文，其中除“后使辟不肯留”句脱“使”字，“年卅有二”析为年四十有二，扬州误为杨州外，余无不合。志称蕃子执规执矩必复，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苗氏表中含液生颖、颍生蕃、蕃生署，署生愔、惲、恪不合。以会昌元年苗夫人张太君志证之，愔、惲恪为苗蕃三子，可知《宰相世系表》传抄有误，多增署一世，依此两志可更正表误。至于执规，执矩必复，樊汝霖疑为蕃三子的幼年乳名。韩文公撰此志仅 260 余字，包括志例无遗，并对苗蕃之秉母、教仗、义气、与身后萧条遗孤多而无为生感概系之。言简意赅为极好的一篇古文，文的笔法，可谓志文的范例。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32)

175. 河南少尹裴复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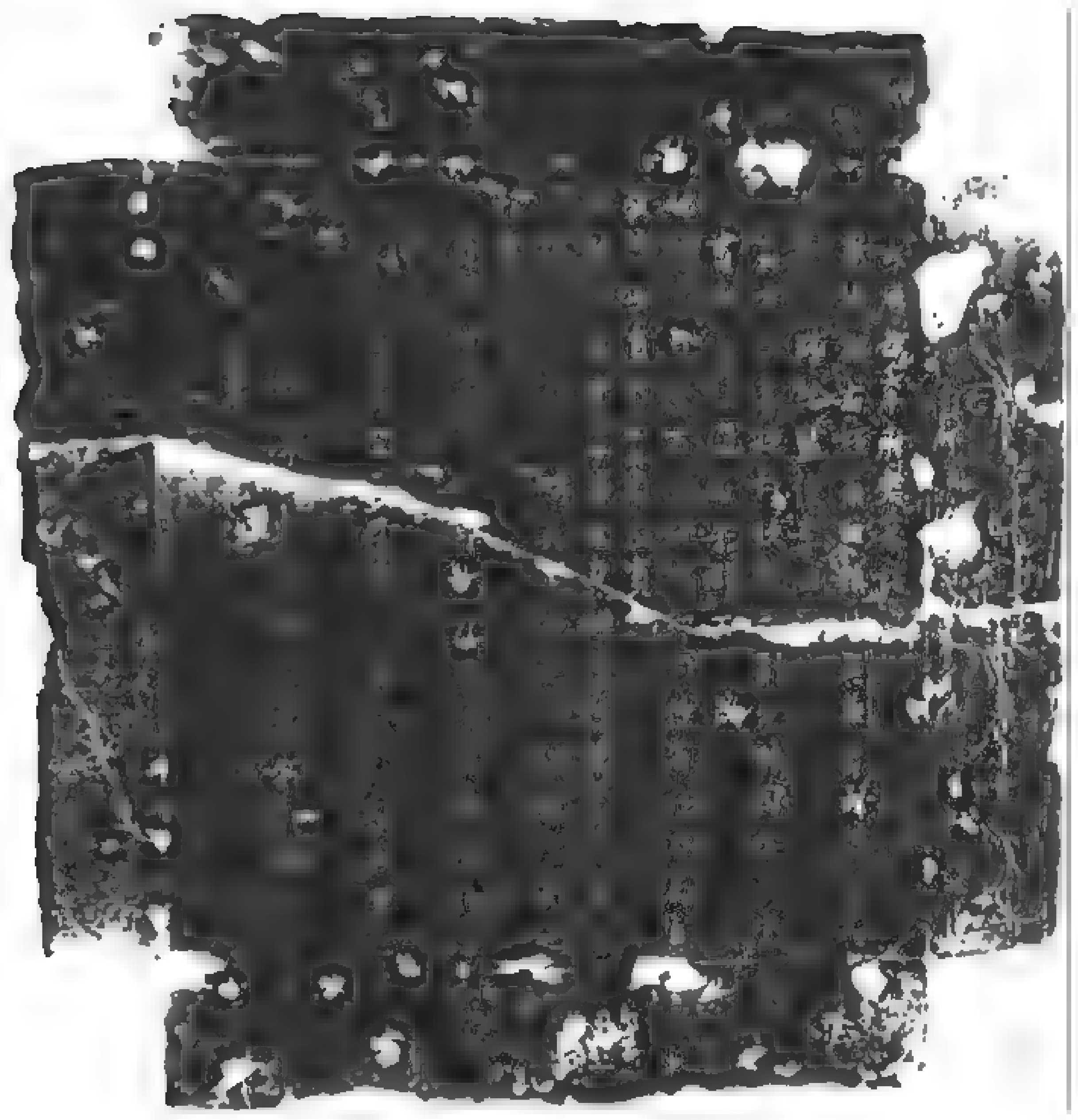
唐　元和三年(808)　四方形，高 40 厘米，宽 39 厘米。21 行，行 21 一字，楷书。1952 年张伯英捐赠西安碑林收藏。出土时地不详。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63)

176. 李日荣墓志铭

唐　元和四年(809)　志四方形，高 38 厘米，宽 38.5 厘米。志文 17 行，行 17 字，楷书，字文漫泐不清，四周饰蔓



草花纹。盖呈覆斗式，中题“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9字楷书，四刹饰蔓草花纹。1956年西安北郊出土。

此志文较难通读，仅按原式录文于下：

大唐故李府君墓志

敕凤翔陇右泾原四镇北庭兼管内诸军兵

马副元帅给监李日荣

贞元二年玖月玖日元副元帅司徒兼中

赐绿李日荣右可将士郎内侍省掖庭局官

教博士员外置同正员

敕赐绿宗守宁等立身谨信效职恭恪每闻

周慎益念在公畴其夙夜之劳俾荣宫局之务可依前

贞元廿年十一月十九日授琼林库作坊判官

元和四年闰三月十三日终于辅兴里之私第用十一月十八日葬长安县丞平乡小阳村

曾讳希　祖讳念　长子怀珎　次子

怀宝　夫人孟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8097）

177. 定远将军守左龙武军翊府中郎张涣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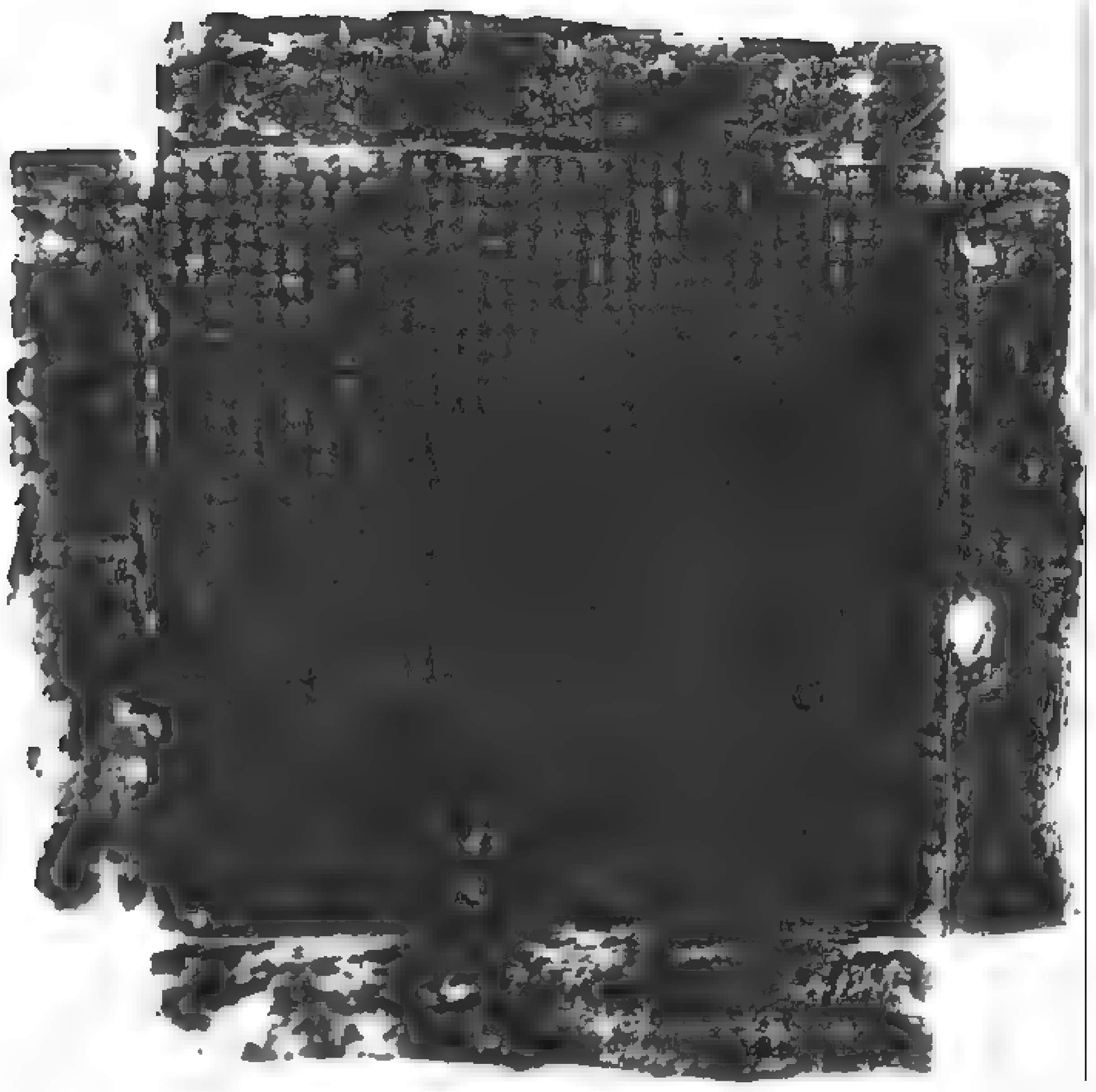
唐　元和五年（810）　志呈正方形，高61厘米，宽61厘米。32行，行31字，楷书，刘冲玄撰并书。志四周饰十二辰线刻纹。盖为覆斗式，中题篆书，四刹饰蔓草纹。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志载张涣曾随德宗驾幸奉天府，忠于职守，为奉天定难功臣，“以元和五年八月四日宅兆于万年县凤城东长安乡青龙原之先茔，礼也。”凤城即为唐长安城，青龙原之名史籍少见，可能即龙首原之别名。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72）

178. 会王墓志



唐 元和五年（810） 四方形，高 76 厘米，宽 77 厘米。22 行，行 2～20 字行书不等。白居易撰文。1952 年西安市灞桥区浐河西滨出土，同坑发现还有陶制墓俑，俱存西安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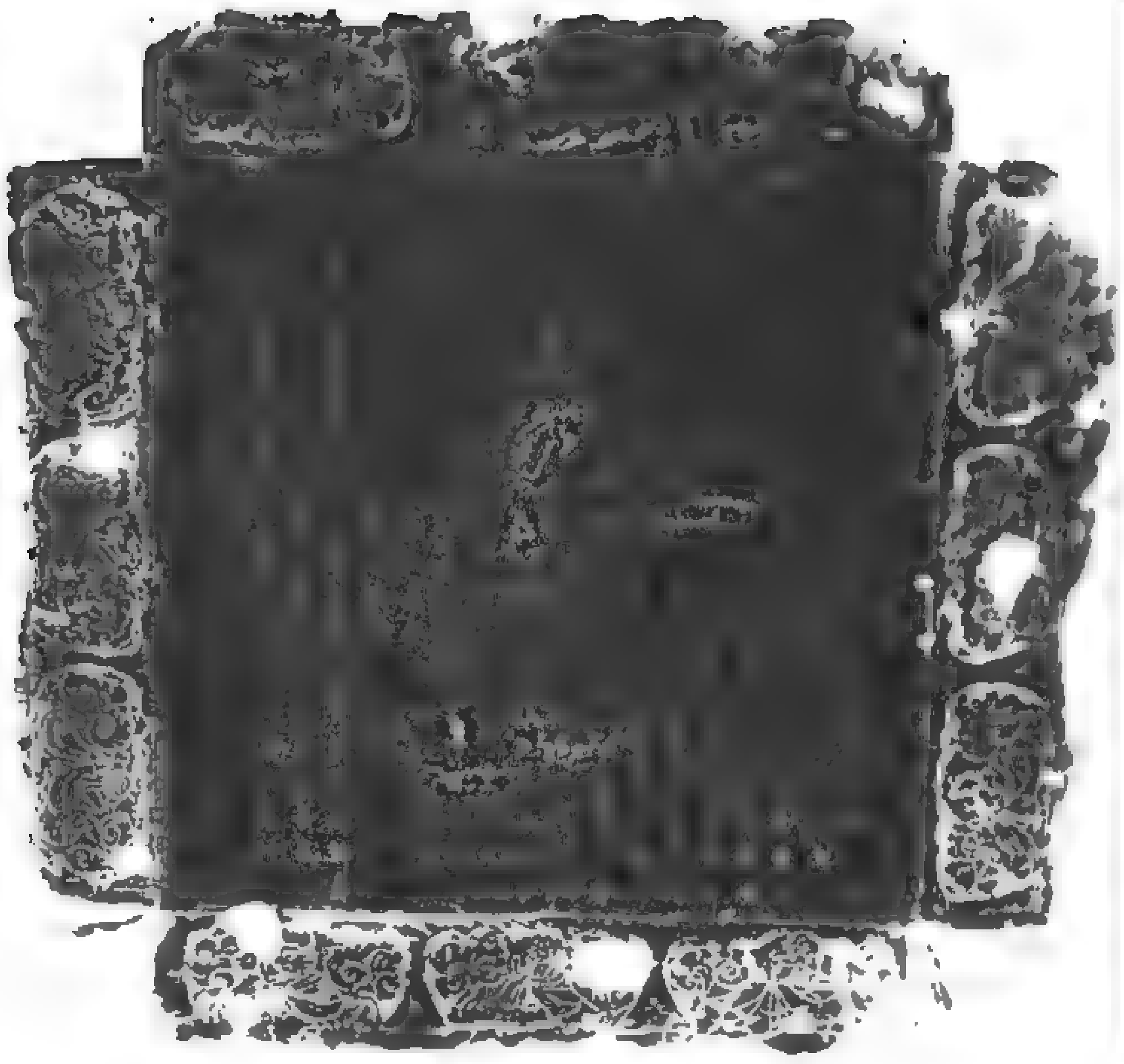
志称葬于“万年县崇道乡西赵原”，可藉作研究唐长安乡里地名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2142）

179. 崔慎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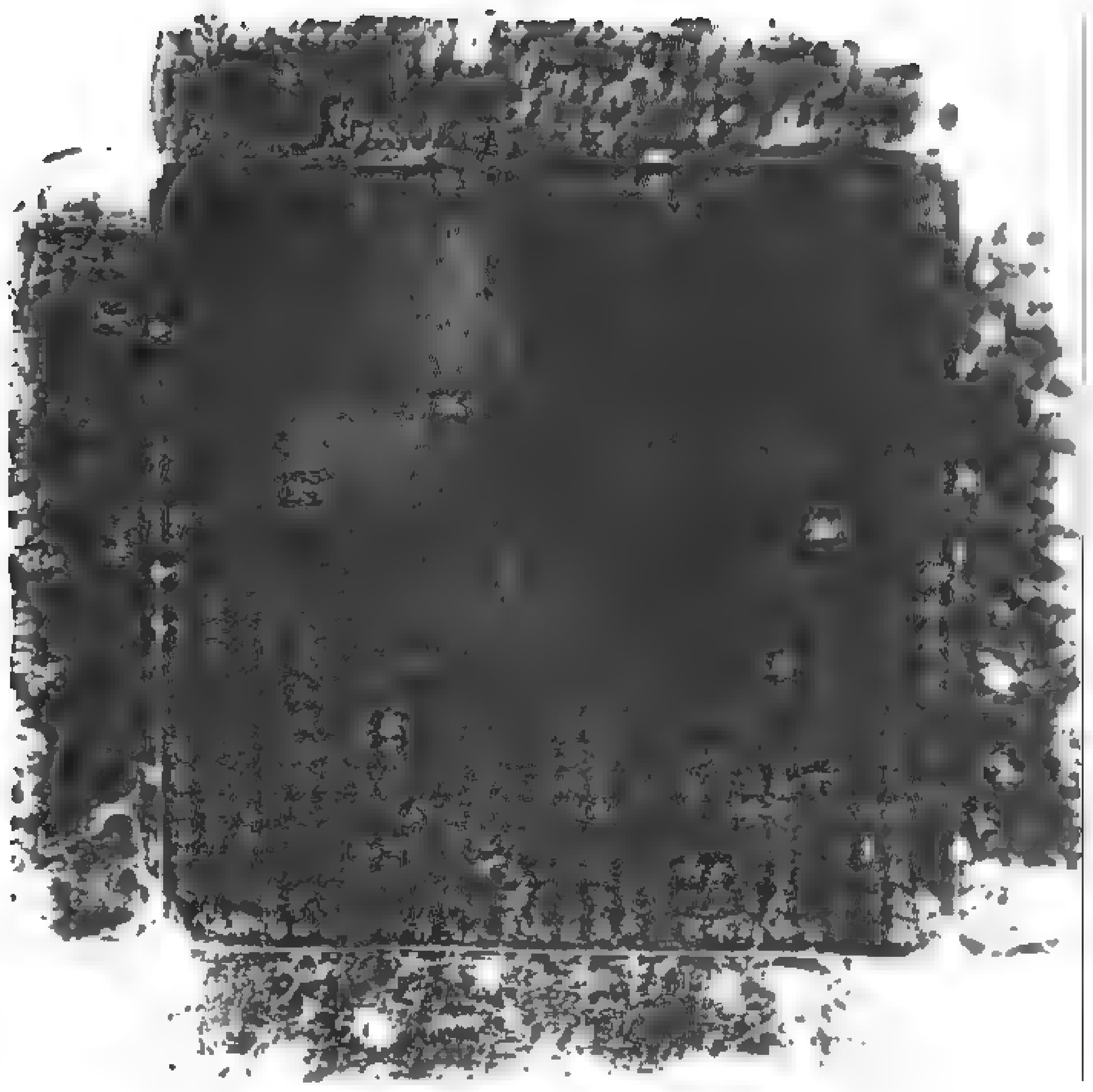
唐 元和五年（810） 志呈四方形，高 36 厘米，宽 37.5 厘米，志文 18 行，行 20 字楷书，哥舒恒撰文，志侧饰十二生肖线刻纹饰，盖覆斗式中题楷书“大唐故崔府君墓志铭”9 字，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饰。1956 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据志载崔慎思，字茂冲。传陵人。“五代祖讳仁相国安平公，高祖讳挹户部尚书，曾祖讳泌刑部员外郎，大父讳讽户部郎中，烈考讳密广都县尉。”《新唐书》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所列挹、泌、讽之名字、官职均与志合。但表于讽之后即成空格。依此墓志载尚有密及其子慎思，可弥补史书不足。又志载慎思“以元和五年二月十七日殁于长安延祚里李氏之庙舍，八月十六日葬于万年县长乐乡”。是长安城内之人家家庙，亦可让别人寄里。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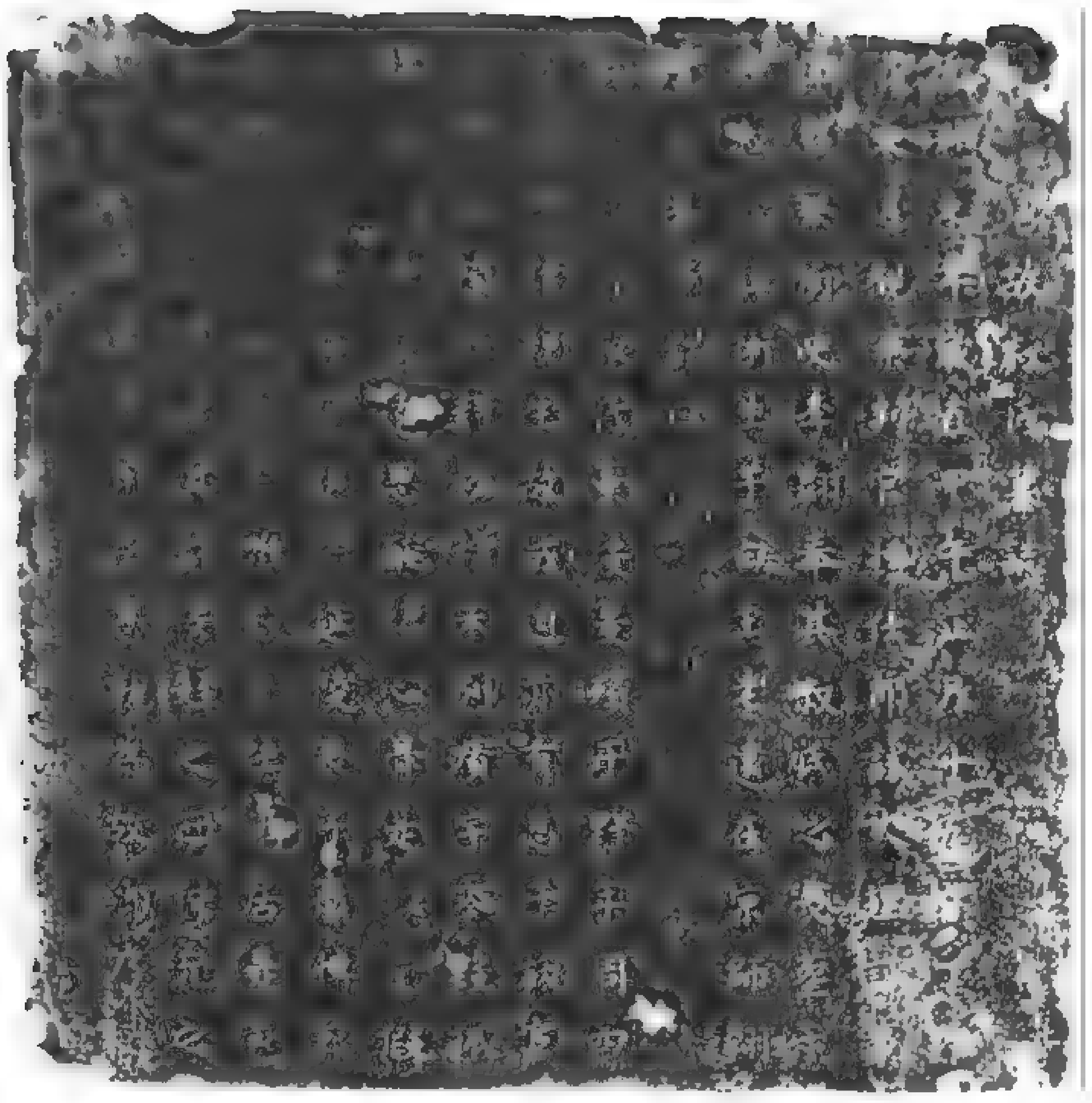
180. 殿中侍御史陇西李虚中墓志

唐　元和八年(813)　正方形，高、宽各 52 厘米。26 行，行 26 字，盖篆书 9 字。韩愈撰文，芦礼源书，郑权篆盖。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存。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30）

181. 李术墓志铭



唐　元和九年(814)　正方形，高、宽各 26 厘米，15 行，行 15 字，楷书。1952 年张伯英捐赠，西安碑林收藏。出土时地不详。

志题唐故叔氏墓志，《金石续编》卷九著录考证，疑为后人伪刻。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61）

182. 河间郡太夫人宋氏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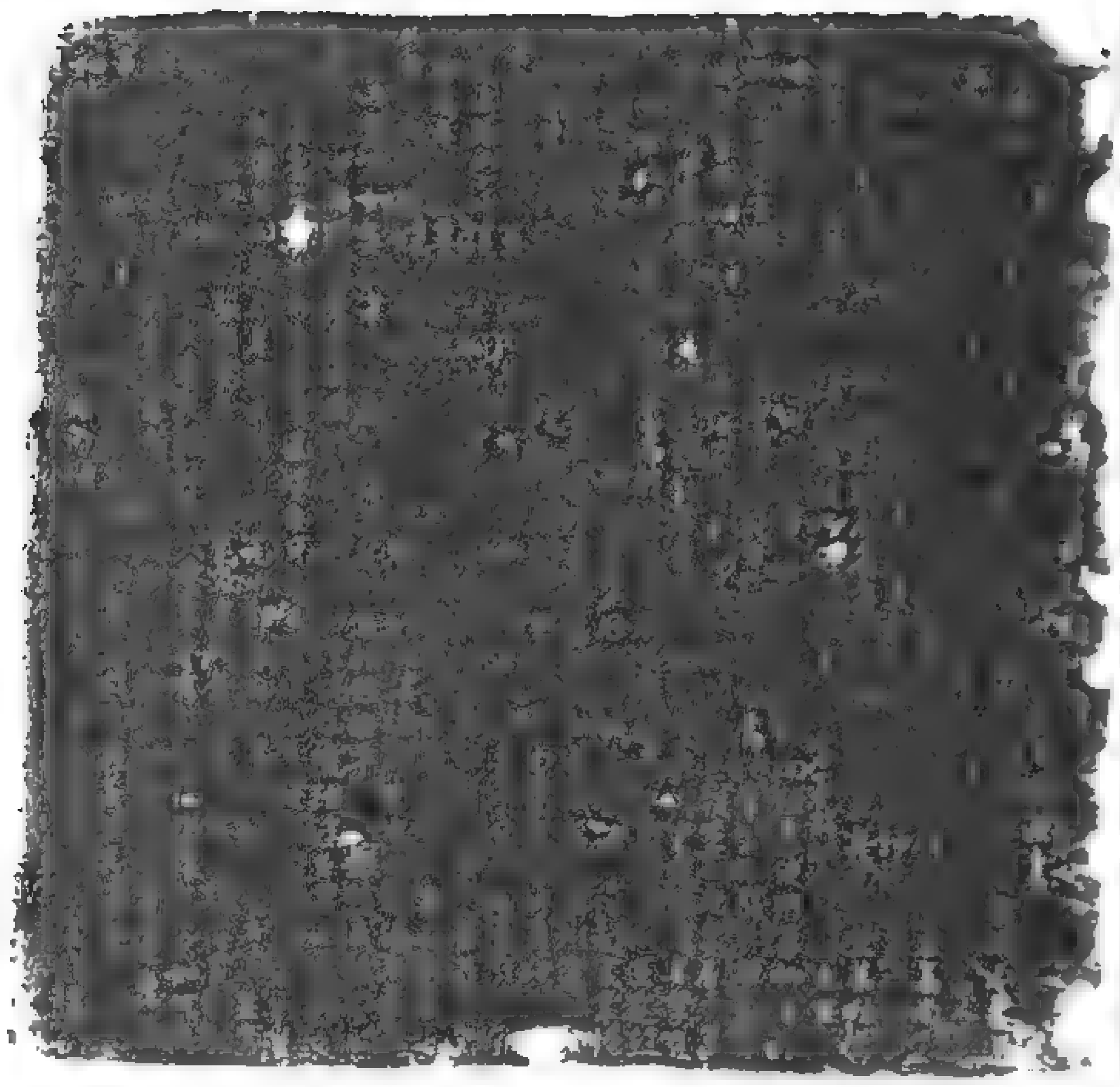
唐　元和九年(814)　四方形，高 44 厘米，宽 46 厘米。24 行，行 23 字，楷书，1956 年王耀堂捐赠西安碑林收藏。出土时地不详。

志称“宋氏父再荣，为宣文君十四代从孙之女”，可藉以知韦逞母宋氏家于晚唐有检校太子宾客之宋再荣。宣文君承受父周官音义之业，时乱采樵纺绩以教逞，学成名立，为苻坚太常。坚命“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宋，年八十“视听无缺”，“隔降纱幔而授业”，一时“周官学复显于世”(见《晋书·列

女传》)。志又称再荣常言"我女异绝,有继吾家晋代从祖姑学矣,不可嫁与凡人"。可见晋代女经师家学,到唐元和时,尚继承有人,亦为经学史上一段佳话。又称"季子泰谦崇仁府折衡都尉"与颜真卿《臧怀恪碑》"公子游击将军崇仁府折衡"提法相同(见劳清源《唐折衡府考》)。宋氏"卒于京师兴宁里之私第",可藉以作研究唐长安坊里名称的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五六 582)



183. 宣州司功参军魏邈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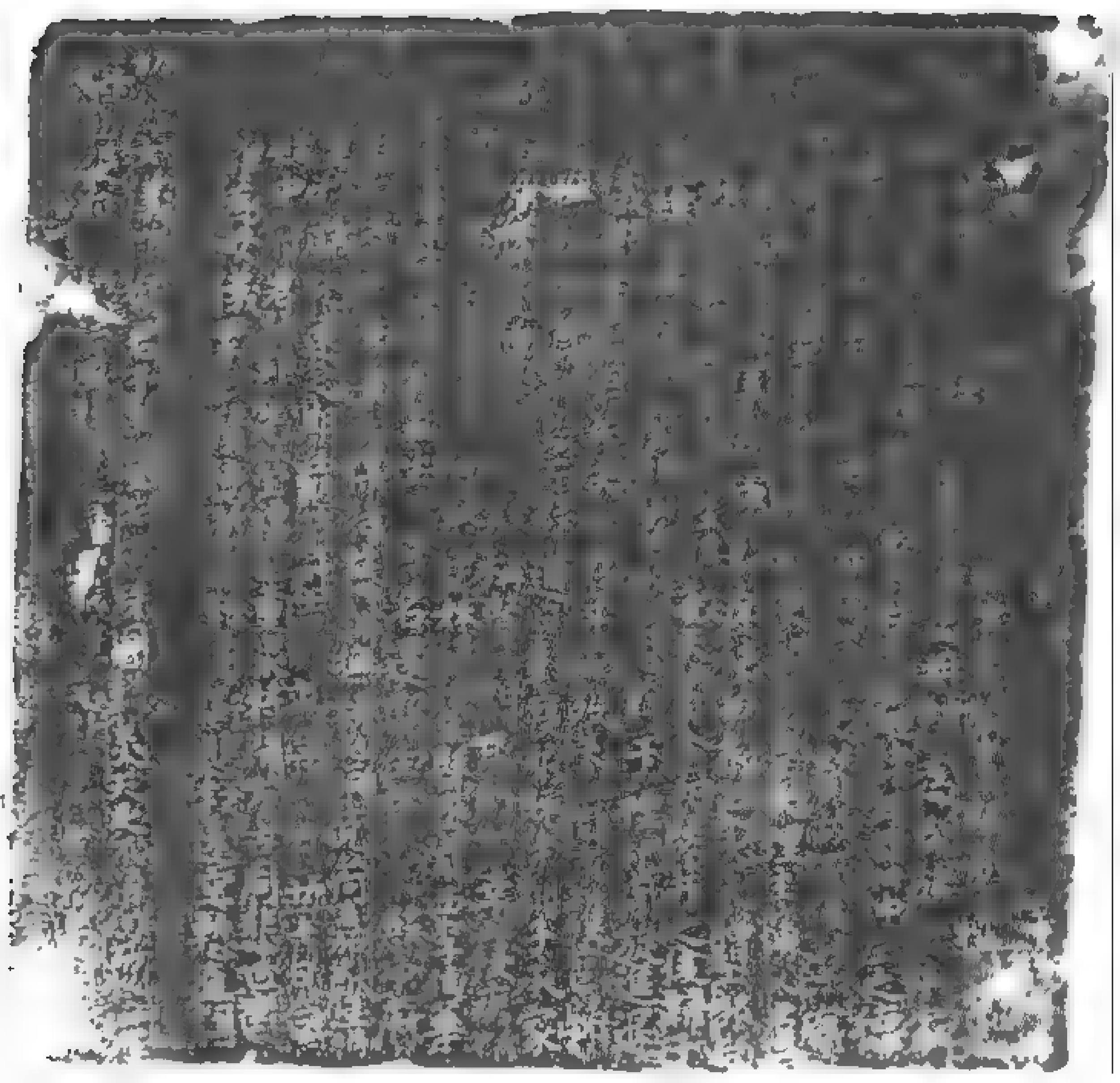
唐 元和十年(815) 四方形,高48厘米,宽49厘米。30行,行30字,行书,息孤子匡赞撰并书,书法学"二王"。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金石续编》、《金石文字存逸考》均有著录考证。续编并集有《古志华筠清馆金石记》及瞿仲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的详细考证,可参阅。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655)

184. 殿中试御史陇西李府君夫人范阳芦氏墓志铭



唐 元和十二年(817) 正方形,高、宽各35厘米,21行,行22字,楷书,从祖叔芦卓撰文,志石原出洛阳。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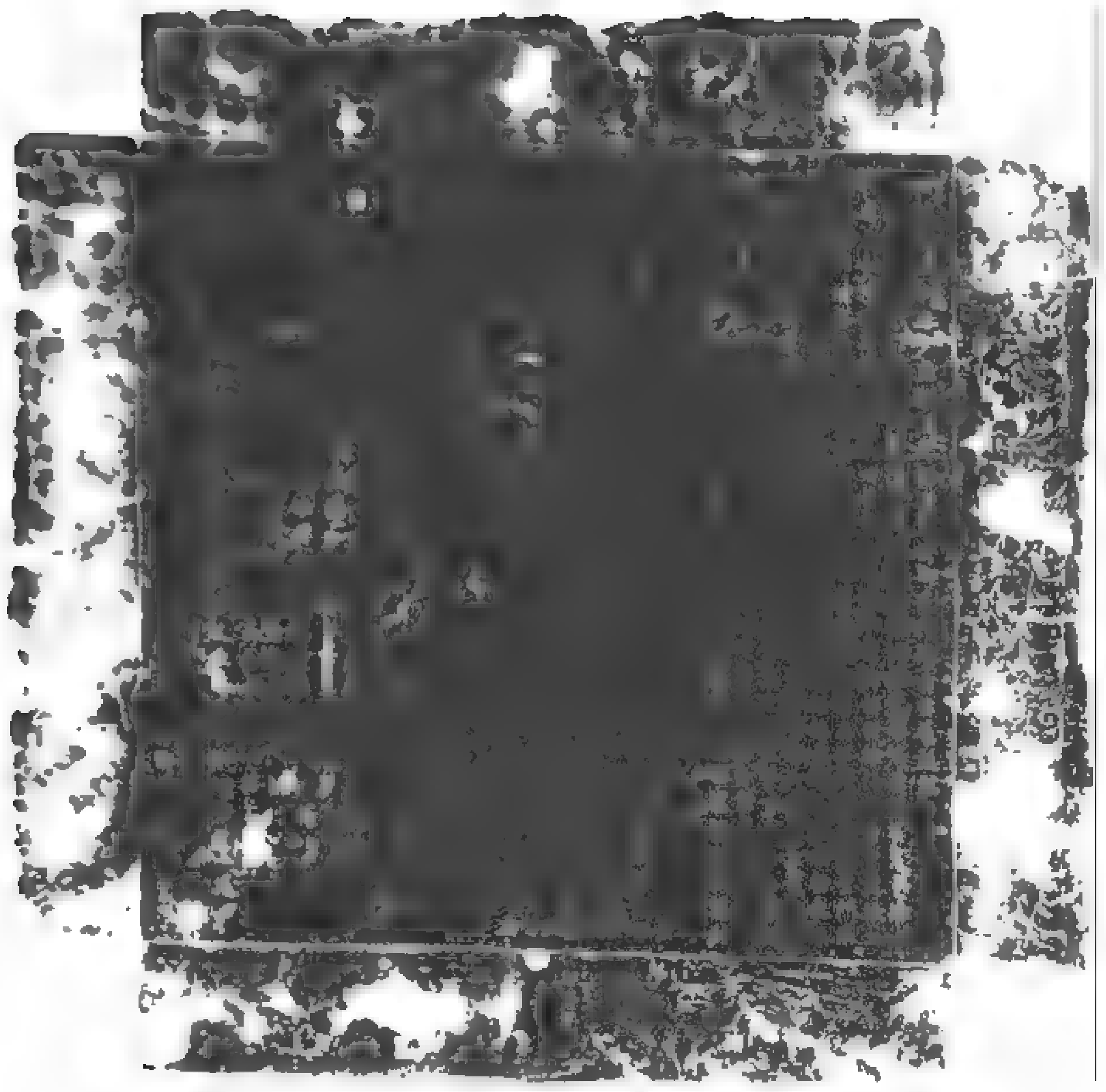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47)

185. 驸马都尉张怙墓志

唐 元和十三年(818) 此志呈正

方形，高、宽各 77 厘米，志文 29 行，行 18 字，楷书，崔复本撰文、杨降书。志边侧饰花纹，盖呈覆斗式，中题“大唐故张府君墓志铭”9 字楷书 3 行，志四刹饰团花。1953 年由咸阳底张湾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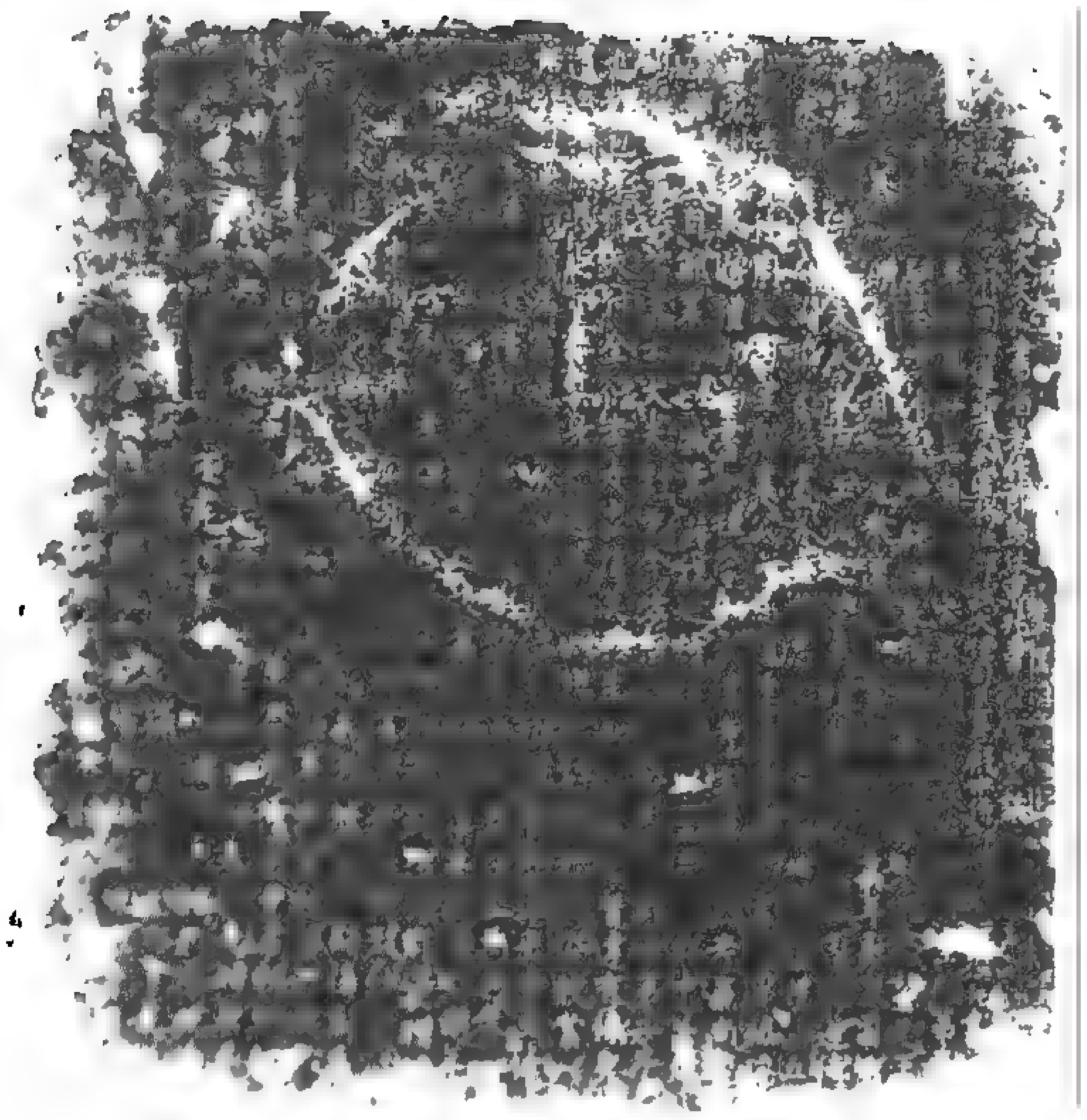
据志记载：公讳怙、字怙，范阳人，乃尚肃宗女郯国公主张清之子。内云：“贞元初，朝廷以公官重礼，下嫁殊荣，选尚之艰，中外攸眘，茍非践履无玷，谦默有闻，侧何以膺平叔之宠光，揔鲁元之汤休。繇是特恩尚乐安公主，拜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公主即代宗皇之息女也。”又云：“有子八人，曰造、曰逵……”。但《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代宗十八女中竟无乐安公主，诸女下嫁者亦无张怙丈人，可知文献遗误尚多，志可弥补史书的缺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4674）

186. 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韦端玄堂志铭

唐　元和十五年（820）　正方形，高、宽各 46 厘米。27 行，行 25 字楷书。第四子纾撰文并书。1949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金石续编》与《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均有著录考证。续编更集有《古泉山馆金石文编》的详细考证。志称葬者“卒于长安新昌里私第”，可藉作研究长安坊里名称的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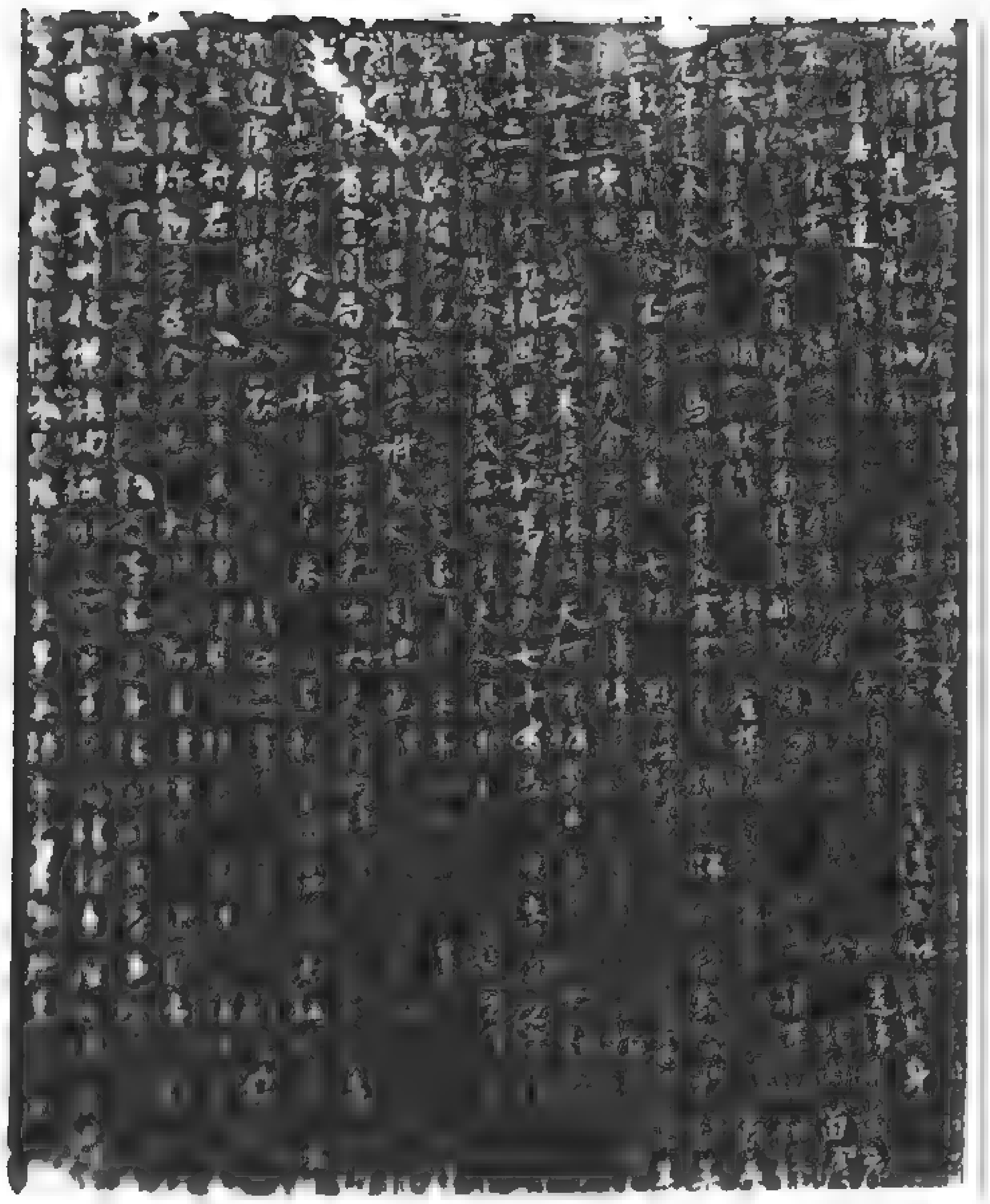
187. 许遂忠墓志

唐　太和三年(829)　墓志盖为覆斗式,四刹阴刻宝相花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图案。上书"大唐故许府君墓志铭"9 字篆书。志呈四方形,边长 74 厘米、宽 75 厘米,厚 11 厘米。31 行,满行 36 字,全文共 837 字。王源中撰文、刘讽楷书,书法笔力遒劲、结体峻整,师承欧体。

墓志主人许遂忠,新、旧《唐书》均无传。据墓志可知,许遂忠曾任掖庭局监作,内府局丞、内府局令、内侍省内侍等职,均属内侍省宦官职官。中唐至晚唐,在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股势力强大的宦官集团,作为宦官执掌的内侍省,其势就绝非初唐时可同日而语。许遂中发迹于内侍省,侍奉德宗、宪宗、穆宗、敬宗四帝,享有"绿绶"、"朱绶"、"紫绶"之荣,"进封为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并握有"入司禁署,出护藩方"的大权,声势显赫,虽然史籍无传,但也可以看出是当时宦官集团中一位上层人物。大和三年十一月八日窆于万年县浐川乡上傅村,此处位于今西安市东郊灞桥区纺织城西北第一印染厂家属宿舍区;1983 年 4 月西安东郊纺织城国棉四厂厂区也曾出土唐代李敬实墓志亦载:(大中)十四年二月以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浐川乡上傅村。此地今在郭家滩至堡子村的范围内。所以许遂忠墓志铭,为研究唐代郊区考亦提供了资料。

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

188. 行内侍省奚官局令祁宪直墓志铭



唐　太和五年(831)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5 厘米。线 26 行,行 27 字,行书。李遇撰文,志四侧饰十二生肖刻纹饰。盖作覆斗式,中题"大唐故祁府君墓志铭"9 字篆书 3 行,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饰。1954 年西安西郊土门出土。

志载:君讳宪直,字宪直,京兆三原人,于"贞元初诏拜大明宫使,委知修造,绵历岁序,不啻廿余霜,德宗嘉之……赐朱绂银印改奚官局令,……除北内留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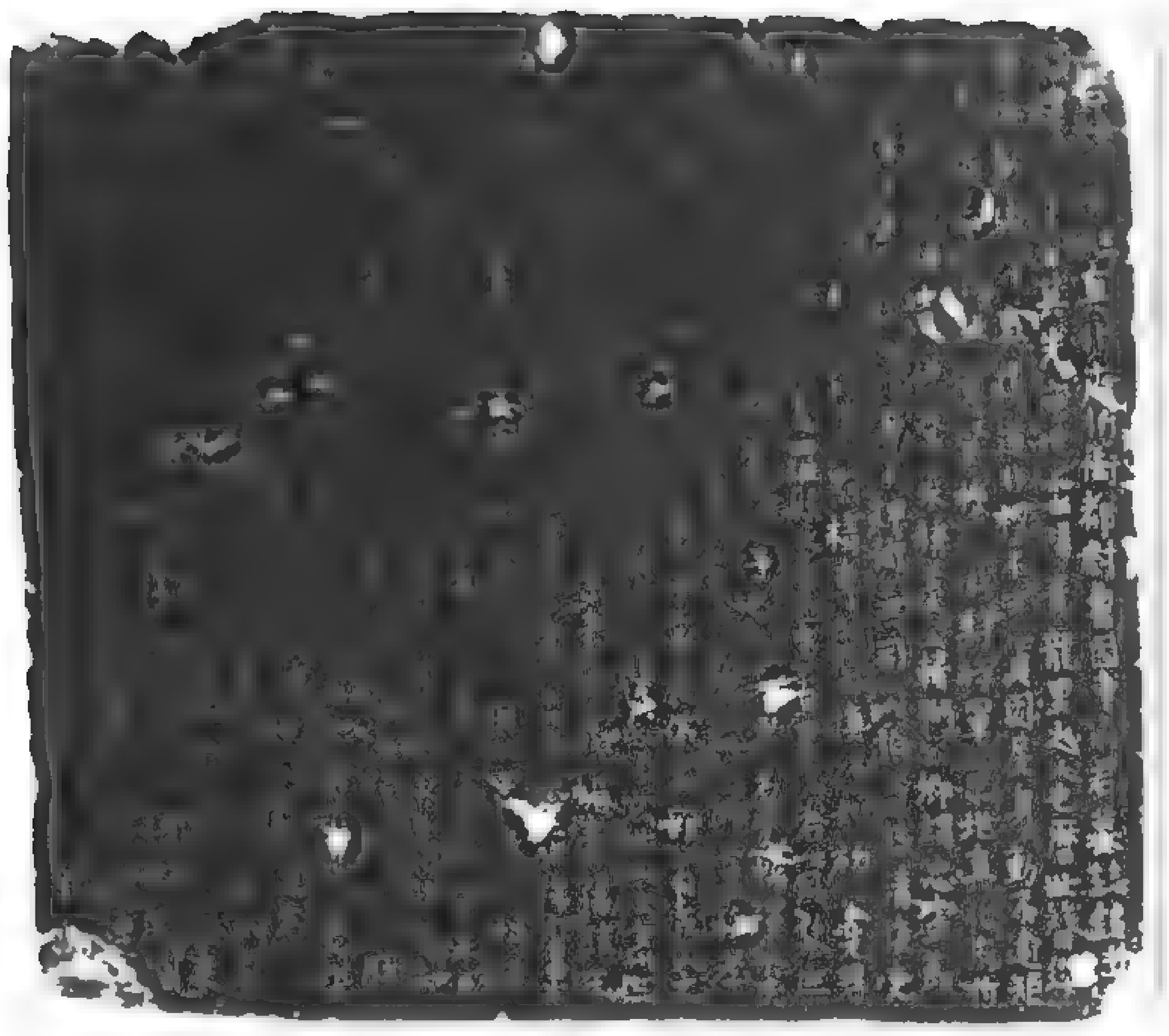
使。……至顺宗朝，再征修造”。可知大明宫在唐中叶后，曾长期重修。又一般习知，唐太极宫称西内，大明宫称东内，兴庆宫称南内。此所谓北内，依位置推之，当亦是指大明宫而言。唐长安地名在唐中叶后，盖有很多更换，这是其中之一例。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20）

189. 京兆真化府折冲都尉鲁国车益墓志铭

唐　太和七年（833）　四方形，高 40 厘米，宽 44 厘米。25 行，行 20 字，楷书，盖篆书 9 字，覆斗式四刹有线刻四神花纹。陕西陇县出土，1952 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志称“益先京兆云阳青龙里人”。按唐云阳今之陕西泾阳县东北及接淳化县境。“折冲都尉”为唐府兵制每府的基层领职。《新唐书·兵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关内二百六十一”，“皆有名号”。平时以折冲领之，农隙教习战阵，有事则征发。“若全府发，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以志所谓“国有庆命官无遗贤”之意推之，折冲当为例授乡职。真化府与元和九年宋氏志之崇仁府，均为六百三十四府名号之一。志叙益“长女第卅”，“次女卅二，次女卅三”，可看出以父若祖年龄为纪念而命名子女的习俗。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23）

190. 郑王墓志

唐　太和八年（834）　正方形，高、宽各 76 厘米，26 行，行 2—27 字，楷书不等，盖篆书 9 字。中书舍人李珏撰文，1952 年西安市灞桥区浐河东南滨下

家村出土，1955年陕西省文管会拨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五五588）

191. 贾温墓志铭

唐　太和九年(835)　　志呈四方形，高62厘米，宽61厘米，38行，行38字，李抱一撰文，周启楷书，志四侧饰蔓草花纹，盖覆斗式，中题篆书9字，四刹饰四神花纹。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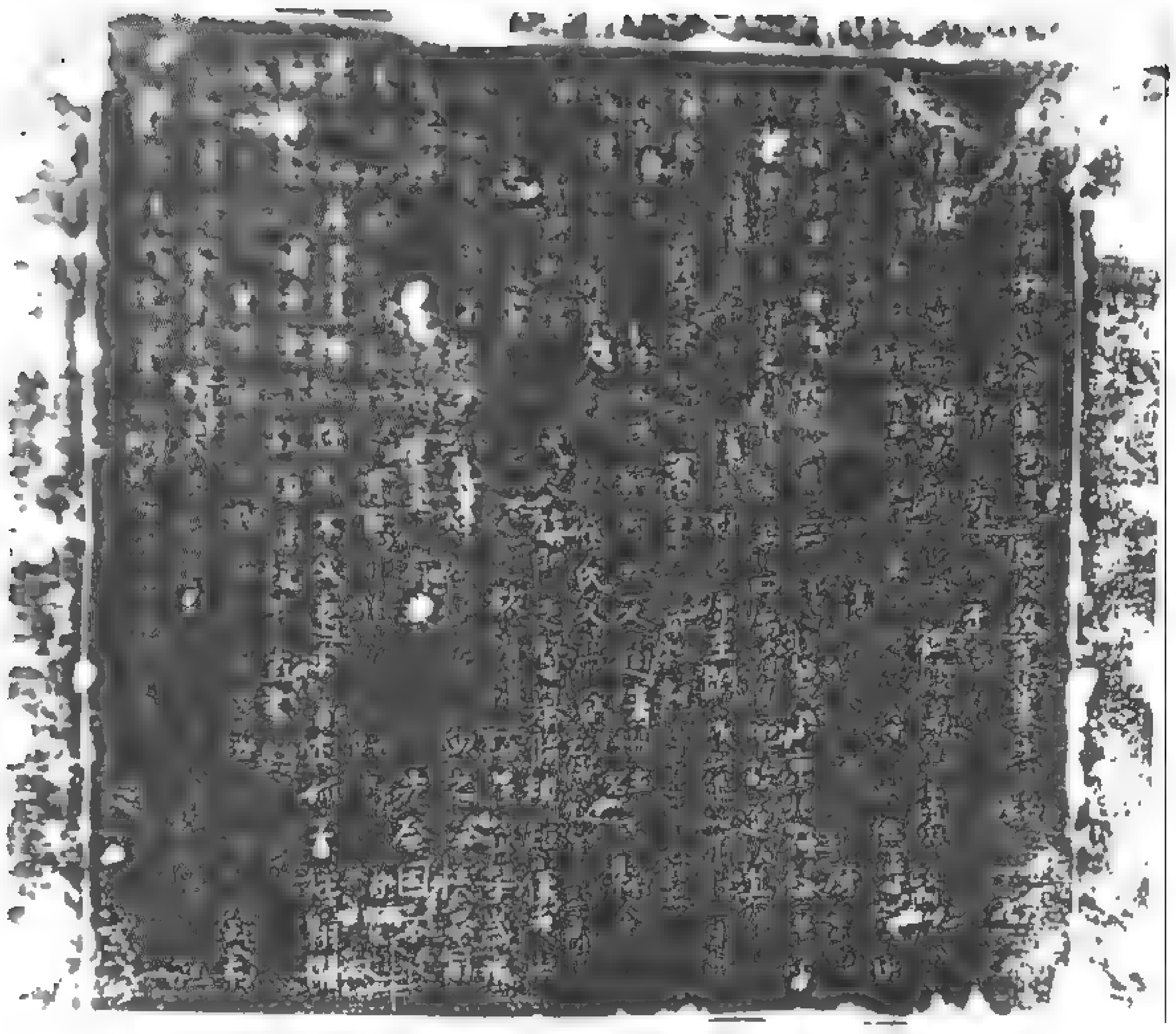
此志载贾温官衔为“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专知两市回易”。文内记贾温“所默记群货，心计百利，俾之总双鄽贾贸，未几，裨军实十五万贯”。“两市回易”和“双鄽贾贸”都是专管长安城东西二市贸易之意，说明唐代中叶以后神策军有商业化的倾向。贾温据墓志载死于唐大和八年。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9376）

192. 卢岑墓志铭

唐　开成二年(837)　　志呈四方形，高34厘米，宽34.5厘米。29行，行28字，楷书，卢翱撰文，志四周饰蔓草纹。盖为覆斗式，中题“大唐故河中府参军范阳卢公改葬墓志铭并序”篆文，四刹饰蔓草纹。1954年西安南郊岳家寨M4∶1墓出土。



据墓志载：卢岑为涿郡人，出身官宦世家，官至河中府参军“以贞元十九年六月廿二日寝疾薨于京兆府周至县仙游乡袁村之别业。以其年八月十三日权窆于其乡薛良村之原，至开成二年八月十一日自薛良村改葬于京兆府万年县孟村龙首原，祔于大茔，礼也。”唐代士大夫到处占有别业，但死后按习俗则都必尽量设法归葬祖茔。因之，长安附近，墓地占很大面积。今综观发掘唐墓

情况看，东边多在浐河东西原上的郭家滩和纬十街一带。西多在土门一带，南多在长安县韦曲和杜曲一带。可说是唐墓葬的集中区域。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405）

193. 前河阳三城节度视察处置等使怀州刺史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澧州长史开国男食邑三千户上柱国李泳夫人太原君王氏墓铭

唐　开成三年（838）　正方形，高、宽各 74 厘米，36 行，行 43 字楷书，薛元龟撰文，李珂书写。长安出土，时间不详，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地境。在元魏、北齐时，于河阳筑三城，故名。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河阳三城护军虎符之三城印”即此。唐置河阳三城使，以附近各县租税入之，视为重地。李光弼曾令李怀光、李抱真保此地，以御史思明，即改置节度使。宋以后废之。此志题衔前河阳三城节度使怀州刺史及澧州长史等职及志文中“去岁孟津变生仆射去难移佐澧阳”等语，均与史载相合。《唐书·文宗纪》太和九年“十月己亥以前河阳节度使萧洪为鄜坊节度使。”《州府元龟》载太和九年“李泳为河阳节度使。泳本以市人发迹禁军，以贿赂交通遂至方镇，初任镇武节度转为河阳，所至以贪为务，人不堪命，遂至于乱，贬澧州长史”。又《旧唐书》开成二年均记有“六月丙午河阳军乱逐其节度使李泳”。而志称夫人以“仆射谪居遐爱”，“夙音莫达”，于开成三年恸忿以死。李泳两《唐书》无传，志虽未提泳名，而时间事实均相符，故定为李泳夫人志。再夫人“终于上都长兴里之私第”，可藉作研究唐长安坊里的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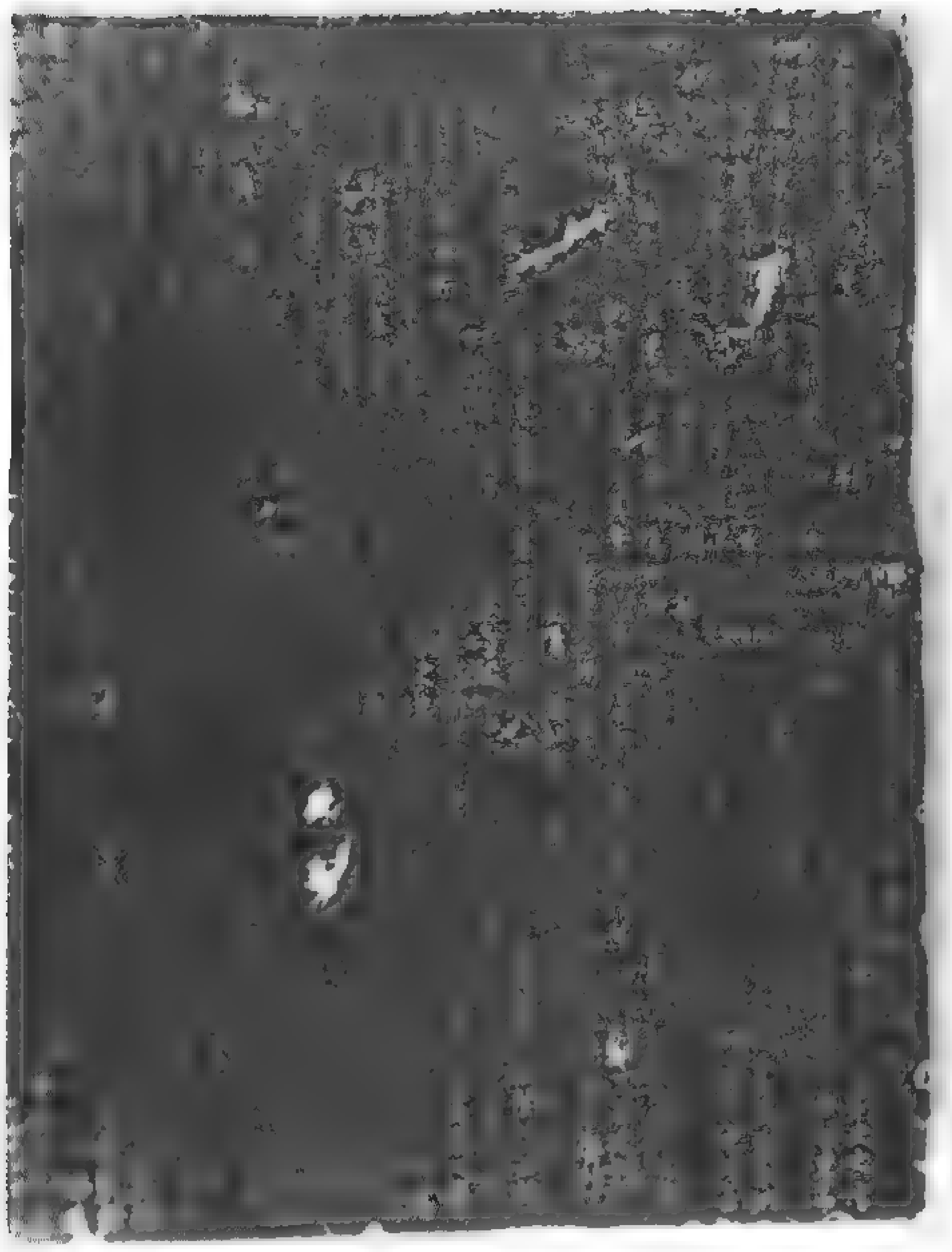
194. 安王墓志

唐　开成五年（840）　正方形，高、宽各 79 厘米，20 行，行 21 字，行书，盖篆书 9 字，志周边有线刻四神蔓草花纹。李褒撰文，安景之书，唐玄度篆盖。1952 年西安市灞桥区浐河西滨出土。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7040）

195. 太原府参军赠工部尚书员外郎苗蕃夫人河内县太君张氏玄堂志铭



唐　会昌元年（841）　四方形，高64厘米，宽65厘米。36行，行36字楷书。孤子愔撰文，孤子恽书。志侧四面各分三区线刻十二生肖人形各三，与当时十二生肖俑人意同。此志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33）

196. 顺阳范氏幼女眉孙墓志

唐　会昌四年（844）　正方形，高、宽各36厘米，15行，行15字楷书，长安出土，1952年西北文物处交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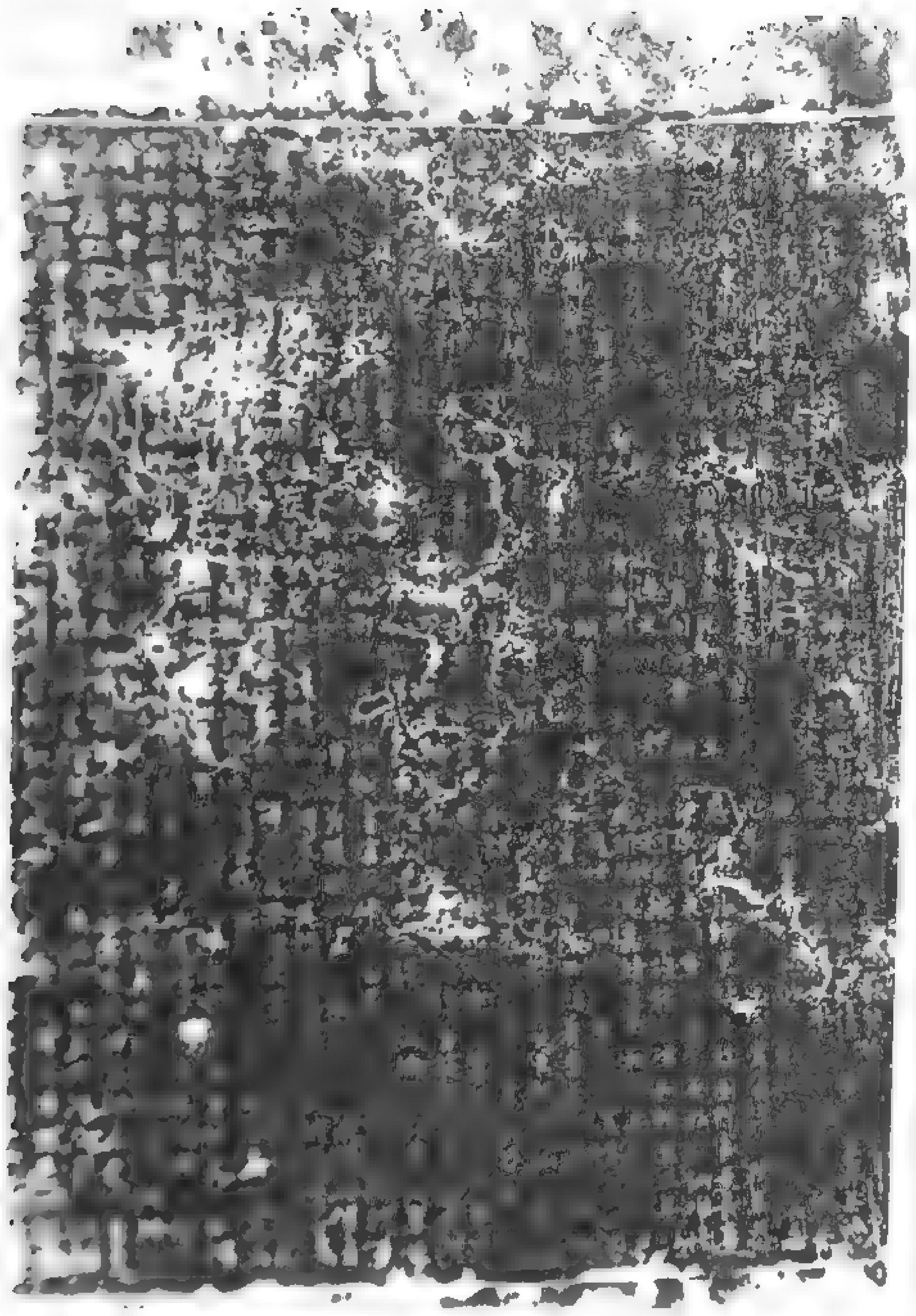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7152）

197. 奚官局梁元翰墓志铭

唐　会昌四年（844）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61厘米，36行，行36字楷书，苏繁撰文，志四周饰花纹，1954年西安郭家滩出土。

此志主要记载梁元翰执事有功，累受皇帝嘉奖，不断迁升。因而在志内的官职衔位，多属史籍未载，如德宗皇帝“赐绿绶充东头供奉官”。宪宗皇帝“改充内冰井兼浴堂园覆使”，元和十一年“转充梨园判官”，穆宗皇帝“改充东头库



家”，长庆二年“改充教坊都判官”，大和六年“从教坊判官除两头着番”，七年二月“改充南宫留后”等。这些名称多是当时宫廷的口头语，两头即指长安城的太极宫，东头指的是大明宫，南宫即指兴庆宫而言，所谓东头库家即是管大明宫内仓库，西头着番即管理官吏在太极宫上下班；“梨园判官”是管理皇帝伎乐的，地址在大明宫禁园之内。冰井是藏冰的地方。这些名称都不见于新、旧《唐书》的《百官志》，因而此志可弥补史籍的缺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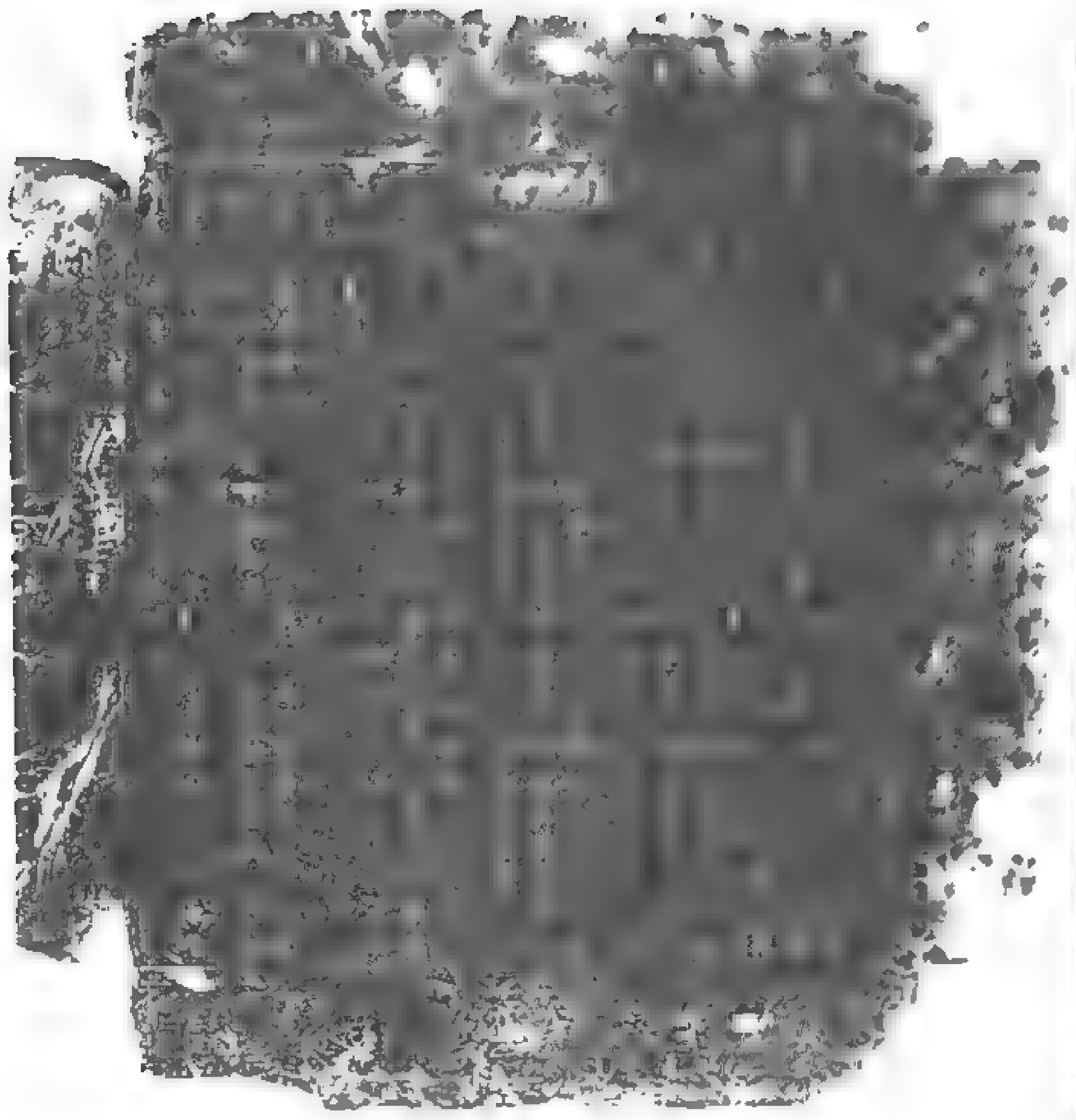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22）

198. 张渐墓志

唐　会昌五年(845)。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45.5 厘米，24 行，行 24 字，楷书，张正撰文并书，四侧有花纹，盖作覆斗式，中题“大唐故府君张氏墓志”篆书，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线刻纹饰。1954 年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

此墓志记载：张渐讳渐，字鸿举，徐方人，祖父都是武职，张渐亦曾任武宁衙前将等职，后去职游燕，“谈笑辩捷，独步一方”，以长于音声，荐至长安，引见穆宗皇帝，“宠赐金章，隶供第一部，弥历二纪，荣密四朝”。此为记载唐代音乐家的一方墓志，可惜文字太简略。“会昌五年五月五日终于翊善里之私第，以其年八月九日迁窆于长安城东南十五里上傅原。”上傅原即今西安东郊郭家滩一带的上傅村。此也为确定这个古村的位置所在提供了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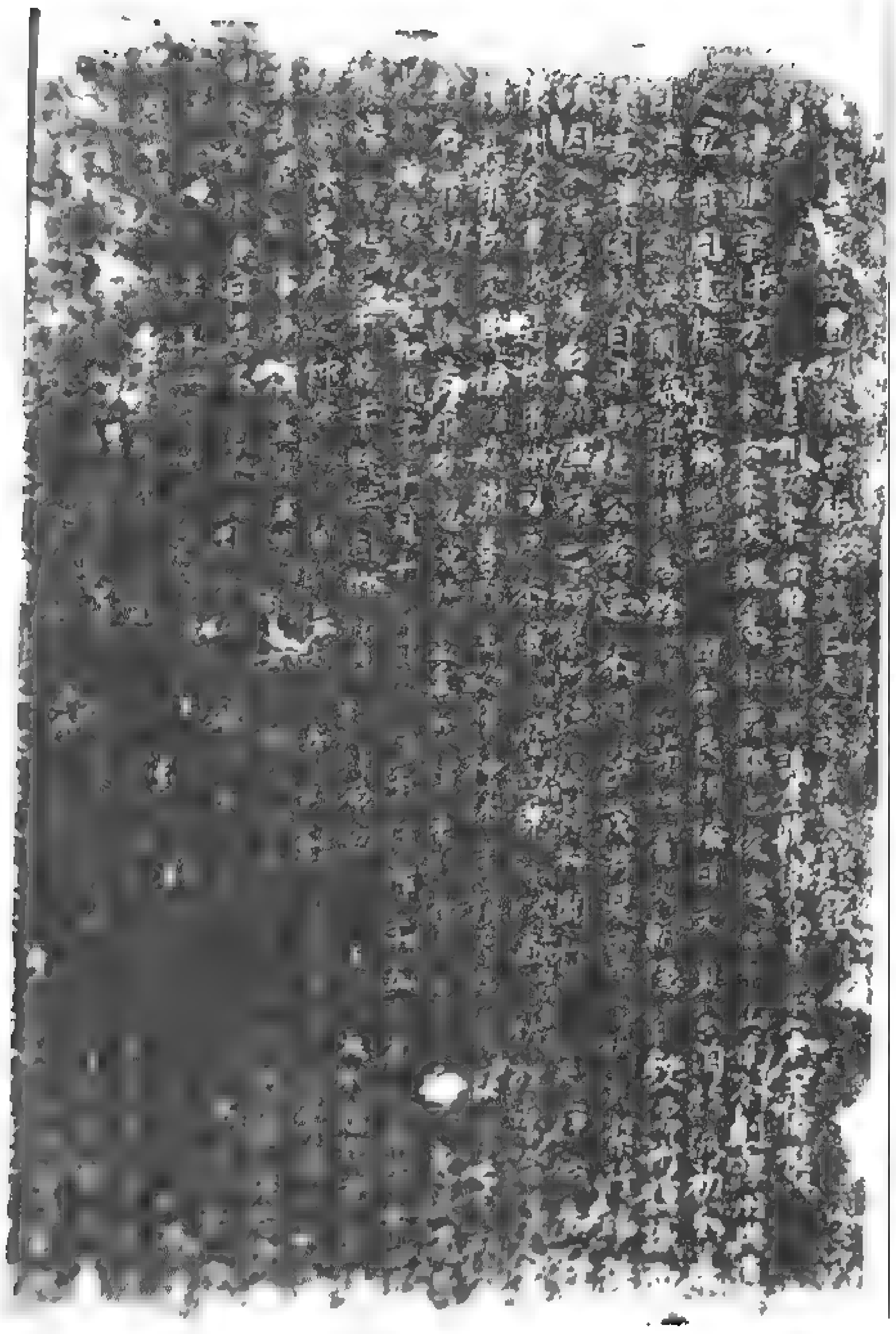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30）

199. 宣功参军钜鹿魏邈夫人赵氏墓志

唐　会昌五年(845)　正方形，高、宽各 53 厘米，28 行，行 29 字，楷书，王俦撰文。1949 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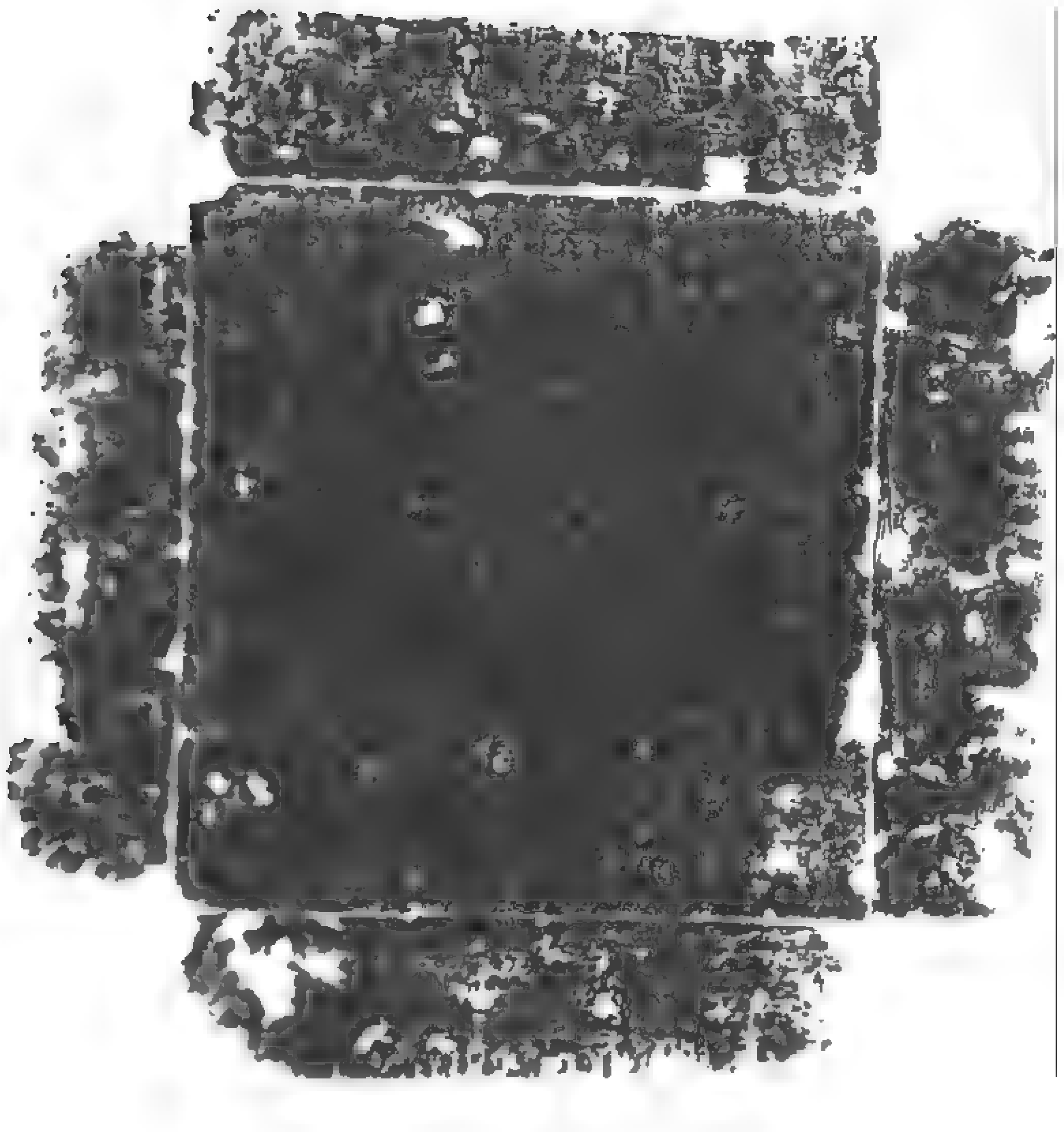
此志《金石续编》、《金石文字存逸考》均有著录考证。续编并集有《古志石华》、《右泉山馆金石文编》详细考证。魏邈志称“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之毕原”，夫人赵氏合葬志称“祔于万年县洪固乡北韦村北原”，可藉以作研究唐长安乡村名称及毕原具体地点之参考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656）

200. 王氏故笄女十六娘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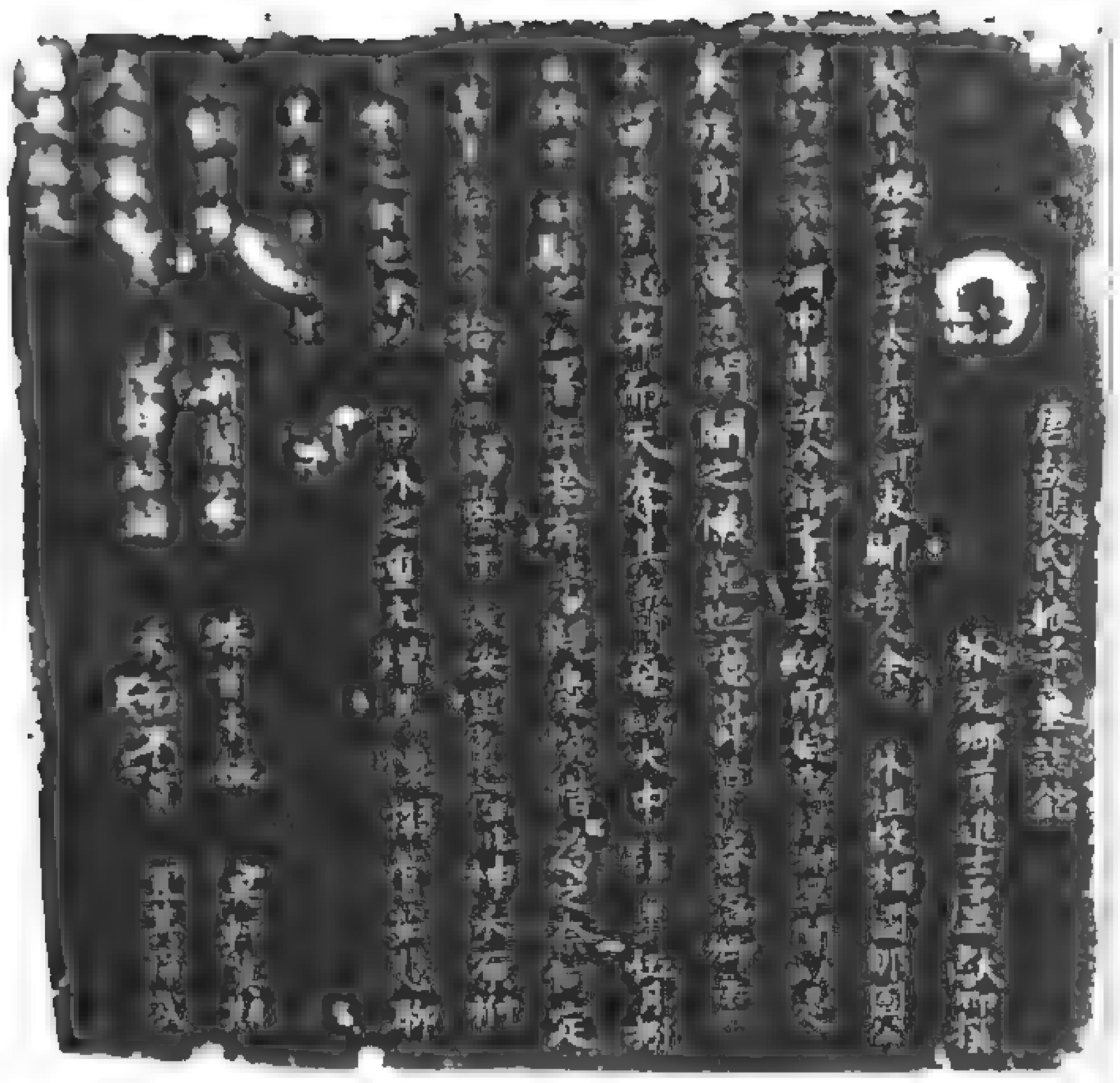
唐　大中三年(849)　志呈四方形，高 35.5 厘米，宽 34.2 厘米。20 行，行 20 字，楷书，四侧饰蔓草花纹，盖作覆斗式，中题“唐故太原郡王氏墓志”篆字，四刹饰蔓草纹。1956 年西安东郊十里铺出土。



志载十六娘大中三年十月廿二日终于安邑里水池曲之第，同年十一月三日葬于龙首原。曲即指唐代的巷或胡同。唐长安坊内的曲名，惜文献记录不多，此志为研究方面提供了一方面的资料。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410）



201．裴氏小娘子墓志铭

唐　大中四年（850）　正方形，高、宽各 33 厘米，13 行，行 6－25 字楷书不等，盖 9 字，志周线刻四神花纹。芦献卿撰文。1948 年由长安县南乡嘉里村出土，同坑并出土许多造型优美的陶俑，特别还有几件黑人俑和卷发人俑，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资料甚为珍贵。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679）

202．宋伯康墓志铭

唐　大中四年（850）　墓志呈四方形，高 59 厘米，宽 61 厘米。志盖作覆斗式，盖中书“唐故宋大夫墓志之铭”9 字篆书。周边四刹阴线刻牡丹、云纹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花纹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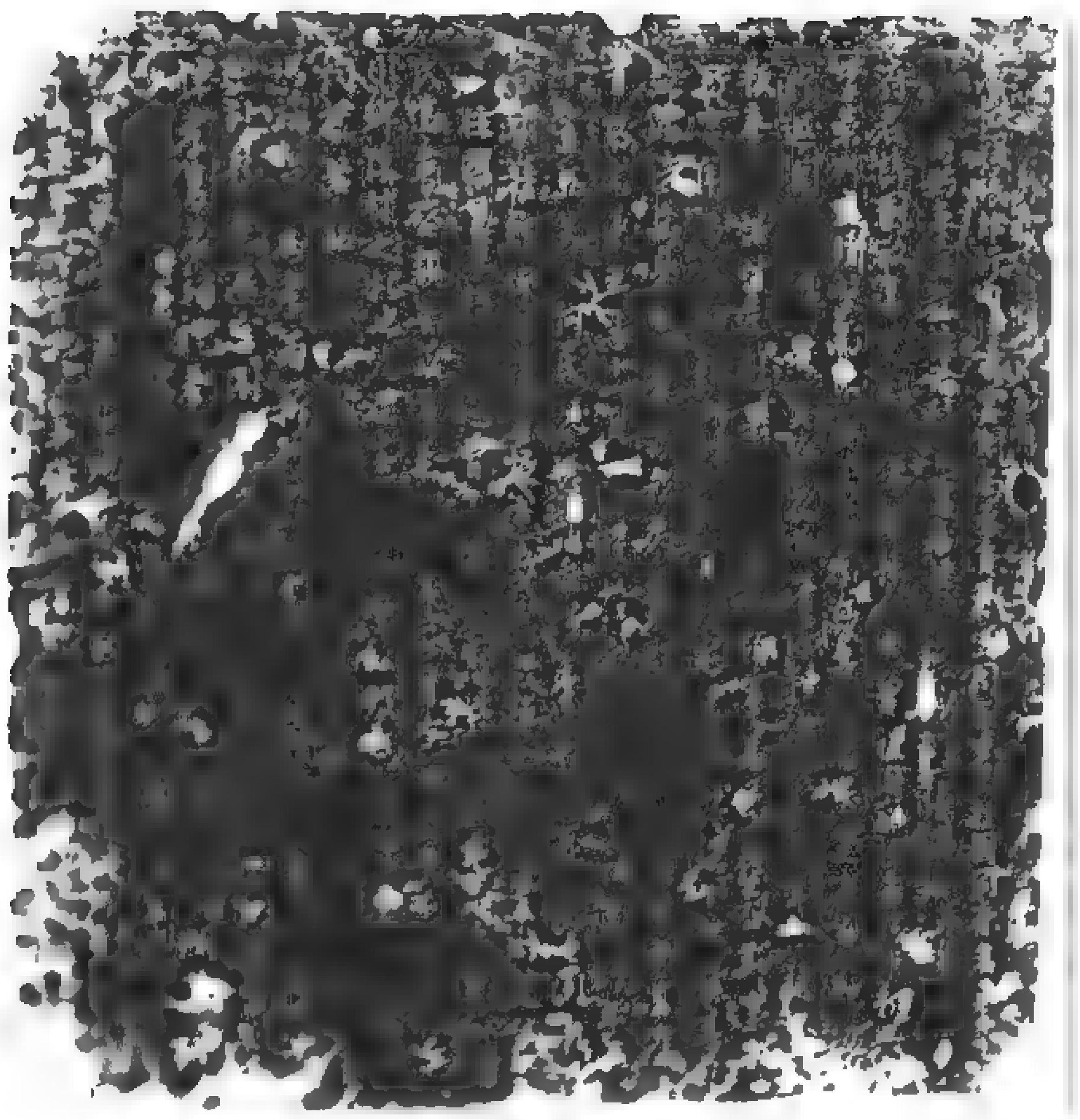
墓志为徐瓖撰文，志文为楷书，无书者姓名。由志文得知宋伯康的祖父讳逸，避世隐居，其伯父讳崇望是“内侍省给事”，父亲讳守义，是“赠骠骑大将军”。他本人讳伯康字安耆，唐大中四年死于长安修得里私第。第二年（851）埋葬在京兆郡长安县义阳乡，其村曰邓其原，曰高阳”。据《金石萃编》卷五《韩宝才墓志》文后的考证，“义阳乡在县西南二里，管正义里”。此志 1982 年由长安县郭杜乡郭北村出土。因而这便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城区乡里提供了实物资料。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203．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韦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同国政墓志铭

唐　大中六年（852）　正方形，高、宽各 57 厘米，21 行，5—28 字行书不

等。沙门清澜撰文并书。长安出土。1952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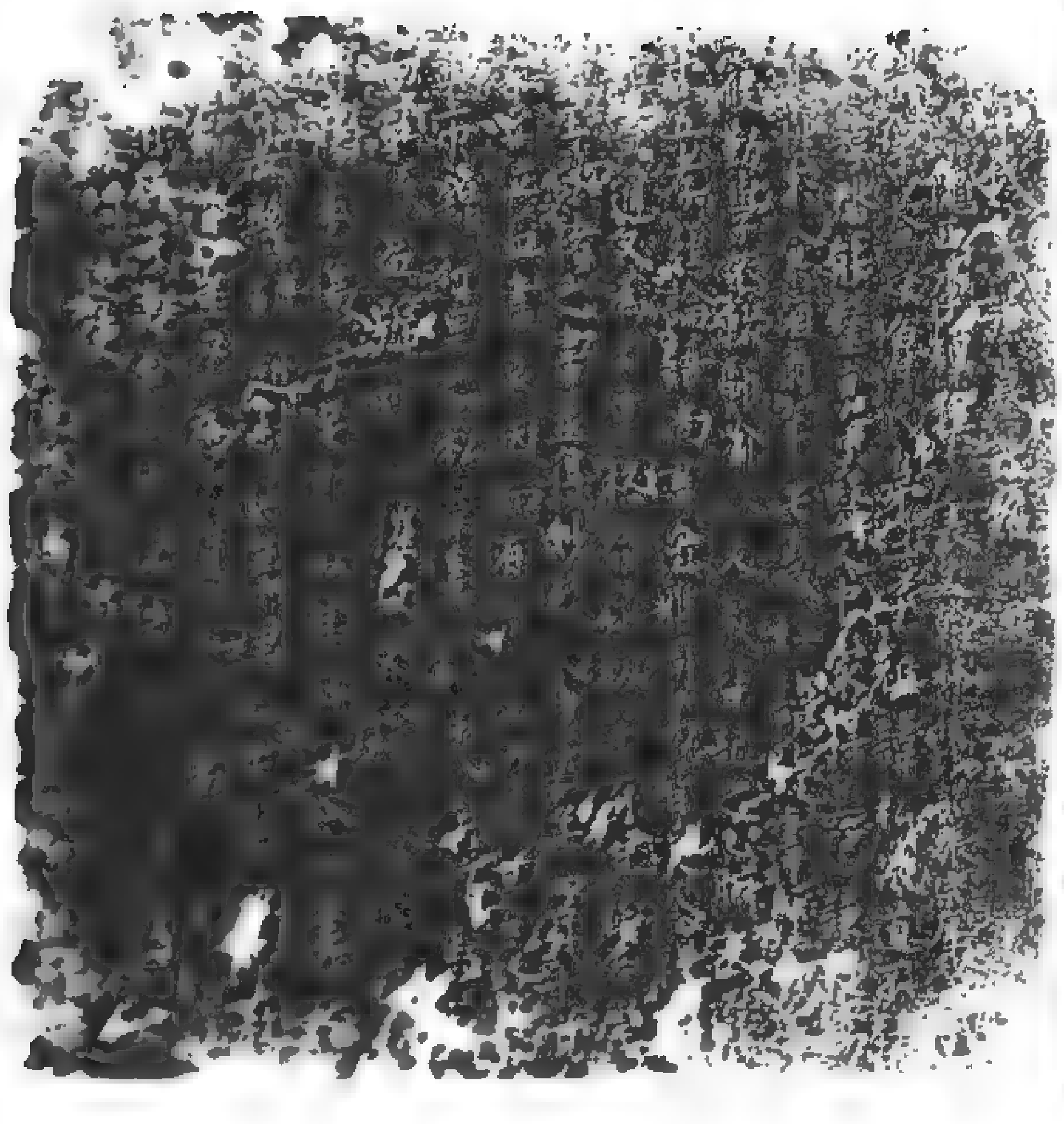
志称墓主人葬于万年县浐川乡陈村之北，又于志尾附刻买地券，以“买到孙家庄下东北土地一段柒亩半余壹拾肆步”，“都计钱一百十三贯三百五十文”，可藉作研究唐长安乡村名及晚唐长安地价及货币价值的参考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12）

204. 鲁氏子谦墓志铭

唐　大中十一年（857）　正方形，高、宽各39厘米。18行，行17字楷书，盖篆书9字，李恽撰文，兄谂书，张宗厚篆盖，从叔鲁球刻字。长安出土，时间不详。1952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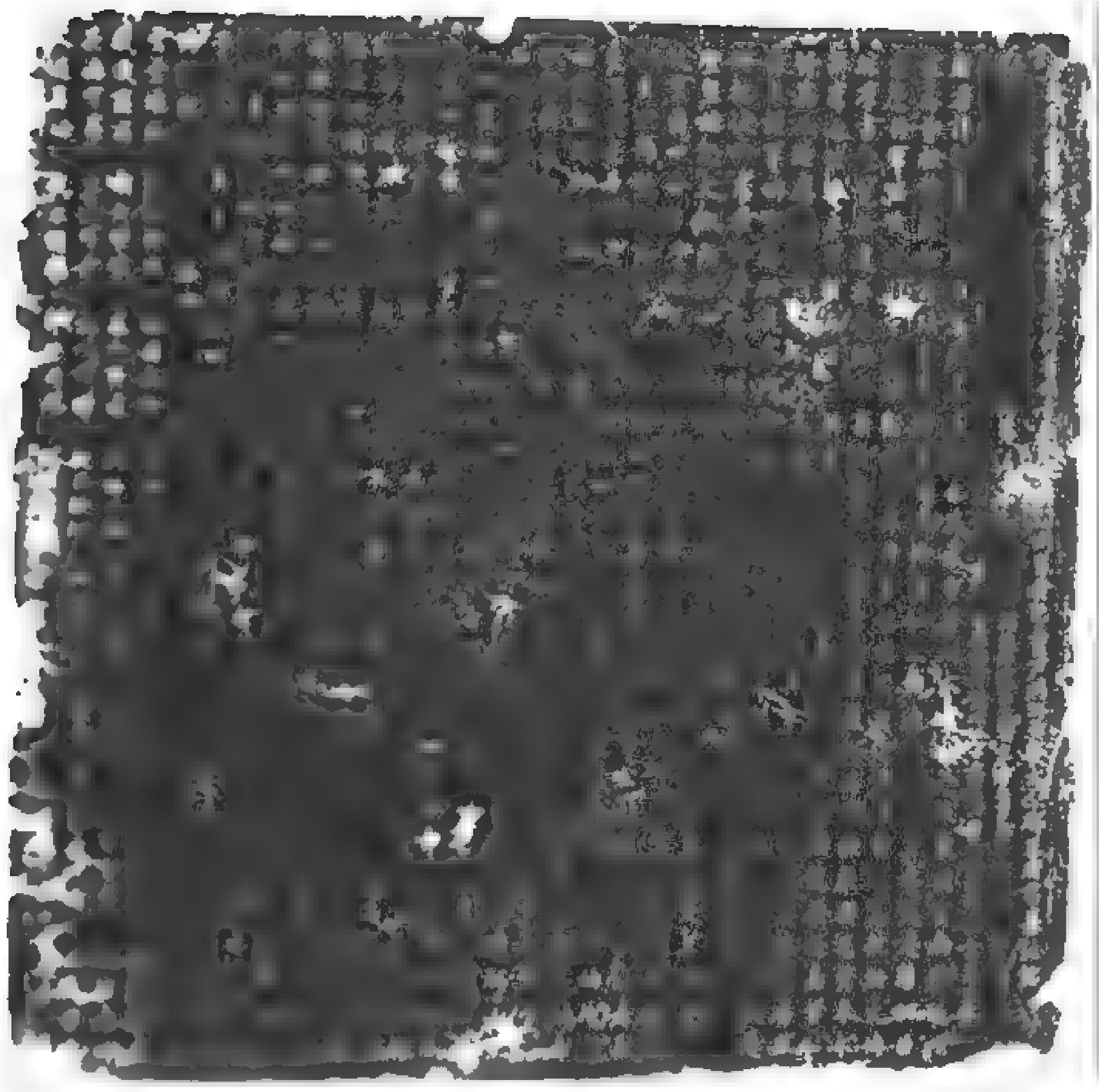
志称谦父璠为西京当时名医中医术最高。谦生性不食酒肉，好读诗书，不5岁通诸经，为文清俊，书学钟王欧褚并得绝妙，18岁“没于西市锦行里之私第”。撰者李恽为儒学教谕，“直述其事”当非溢美，可见为一天才好学的青年。锦行里不见于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可能为长安城西市中锦商行业聚荟的巷名亦未可知，亦是研究唐长安西市的一点好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27）

205. 湖南监军使正议大夫行内侍伯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太原王公素墓志铭

唐　大中十三年（859）　正方形，高、宽各62厘米，32行，行31



字，楷书，盖篆书 9 字，志斜侧线刻四神花纹，侧四面各分三区，线刻执笏十二生俑人形各三。陈竦撰文，史颀篆盖并书，玉册官陈从诗刻字。长安出土，时间不详。1952 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志称"终于大宁里私第"亦是研究唐长安坊里名称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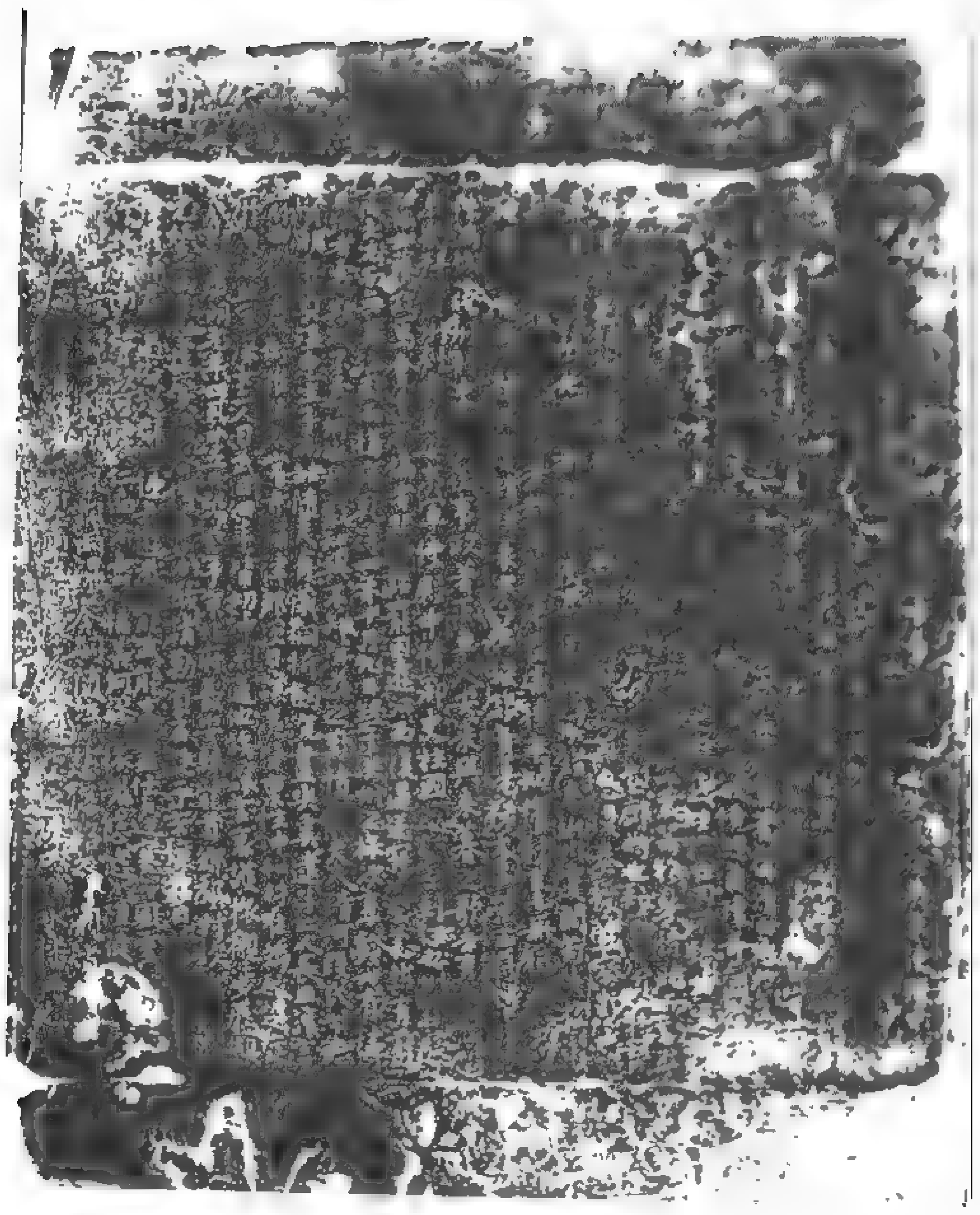
206. 李敬实墓志

唐　大中十三年（859）　墓志正方形，长、宽各 77 厘米，厚 12 厘米，盖中部阴刻篆书四行 12 字，为"唐故军器使赠内侍李公墓志"。上刻有阴线牡丹团花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志文行书 37 行，满行 16 字，共 1150 字，书法流利劲美，为行书字中的上品。志四侧分别线刻十二生肖，为崔鄑撰文并书及篆盖。

墓主人为李敬实，正史无传，而志文称李敬实"祖讳惟宁，昔侍从德宗，有定难之功，特加优宠。父讳从义，掖庭局丞，终临泾监军"。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冬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之师救哥曜。丁未，泾原军出京城，至浐水，倒戈谋叛，姚令言不能禁。"德宗为避难而逃往奉天。其扈从"唯文场，仙鸣率诸宦者及亲王左右从行"，还有右笼军使令狐建所聚四百多射士随。在平息了泾原兵乱后，德宗在奉天诏曰："应赴奉天并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德宗回到京城后，以神策兵有功劳，皆号"兴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李敬实（惟宁）因侍从德宗有定难之功，即指此事。而其身份应为文场，仙鸣所率之宦官无疑。其父从义为掖庭局丞，临终泾原监军，掖庭局丞均为内宦为之，其身份也应是宦官。所以李敬实与其父当为养父养子的关系。李敬实累因其功，据墓志载，特加银青光禄大夫兼宫内给事。《新唐书·百官志》载"从三品，曰银青光禄大夫"，"内给事八人，从五品下，掌承旨劳问，分判省事凡元日，冬至，百官皇后则出入宣传，宫人衣服费用，则具品秩，计其多少，春秋宣送于中书。"李敬实死后赠内侍省内侍，"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署三品官，内侍是长官，阶四品"而李敬实本身品位已超过四品官内侍之职。因而此墓志，除具有书法价值之外，对晚唐宦官官制制度研究方面也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现存陕西碑林博物馆。

207. 田师巽母夫人清河郡张氏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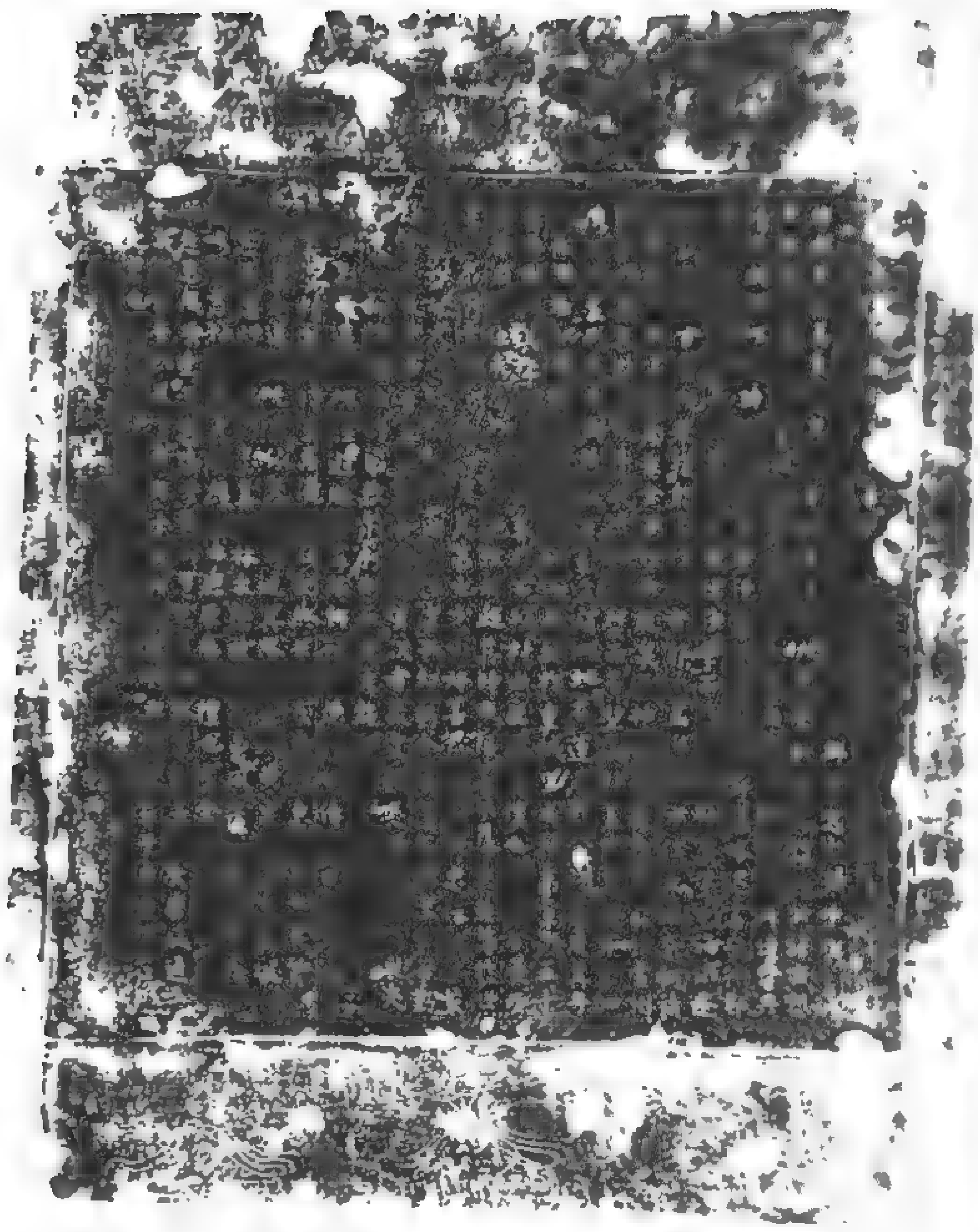
唐 咸通二年(861) 正方形，高、宽各45厘米，25行，行25字楷书，王仝撰文并书。长安出土，1952年段绍嘉捐赠入藏。志文有剥落，右下角残缺。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3730)

208. 狄玄愬墓志

唐 咸通三年(862年)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44.5厘米，文26行，行26字，楷书，杨坤撰文，李嵩书字，志四侧饰十二生肖纹饰，盖作覆斗式，中篆书，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饰，1956年西安东郊韩森寨出土。



据墓志载：狄玄愬为天水人，"以咸通三年七月廿三日终于皇城里"，"以其年八月十日葬于古城村白鹿原"。铭文末尾又有"大唐咸通三年岁次壬午八月丁酉十日丙午天水郡狄氏葬于白鹿原古城三里也"一段文字，重复叙述葬地，何意不知。"皇城里"似在唐长安城内，但不知是坊的异名。白鹿原上有"古城村"，尚属初见，可以补充长安城坊里考的不足。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09393)

209. 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墓志

唐 咸通四年(863) 正方形，高、宽各45厘米，30行，行30字，楷书，

盖篆书9字。温宪撰文，男进思书，再思篆盖。1949年前陕西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志石《金石续编》、《金石文字存逸考》均有著录考证，续编并集有《古志石华》的详细考证。程修己为晚唐名画家，而且能诗善书，艺兼三绝，与当时诗人李商隐、温庭筠为莫逆之交。撰志者温宪即庭筠之子。志述“赵郡李弘庆有盛名，尝有斗鸡击其对伤首，异日，公图其胜者，而其对因怀笼怒出，击伤其画李抚掌大骇”。又称“丞相卫国公（按谓李德裕）闻有客藏右军书帖三幅，卫公购以千金，因持以示公。公曰，此修己给彼而为，非真也。因以水濡纸扶起，果有公之姓字”。志为当时人所撰，自非虚构，由此可见其书画之妙。唐末李景玄《唐朝名画录》载“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古贤君臣之像，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意采掇，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志虽未述及此事，亦称“其为桃杏百卉，蜂蝶蝉雀，造物者不能争其妙于其际，仍备尽法，则笔不妄下”。也可见其为当时翎毛花卉人物画的大家。志又叙修己对盛唐以后画家周昉、张萱、韩干、吴道子、杨庭光等人的画均有批评。铭文中有“顾陆遗踪，曹张旧辙，芳尘寂寥，妙迹芜绝”等句，“顾”指晋代的顾恺之，“陆”指南朝宋的陆探微，“曹”指三国时期吴的曹不兴，“张”指南朝梁的张僧繇，均可藉以看出中国文化传统上历来厚古薄今的错误看法和评价。

墓志书法瘦劲秀逸，惜较残泐，为书画史上留存的一块珍贵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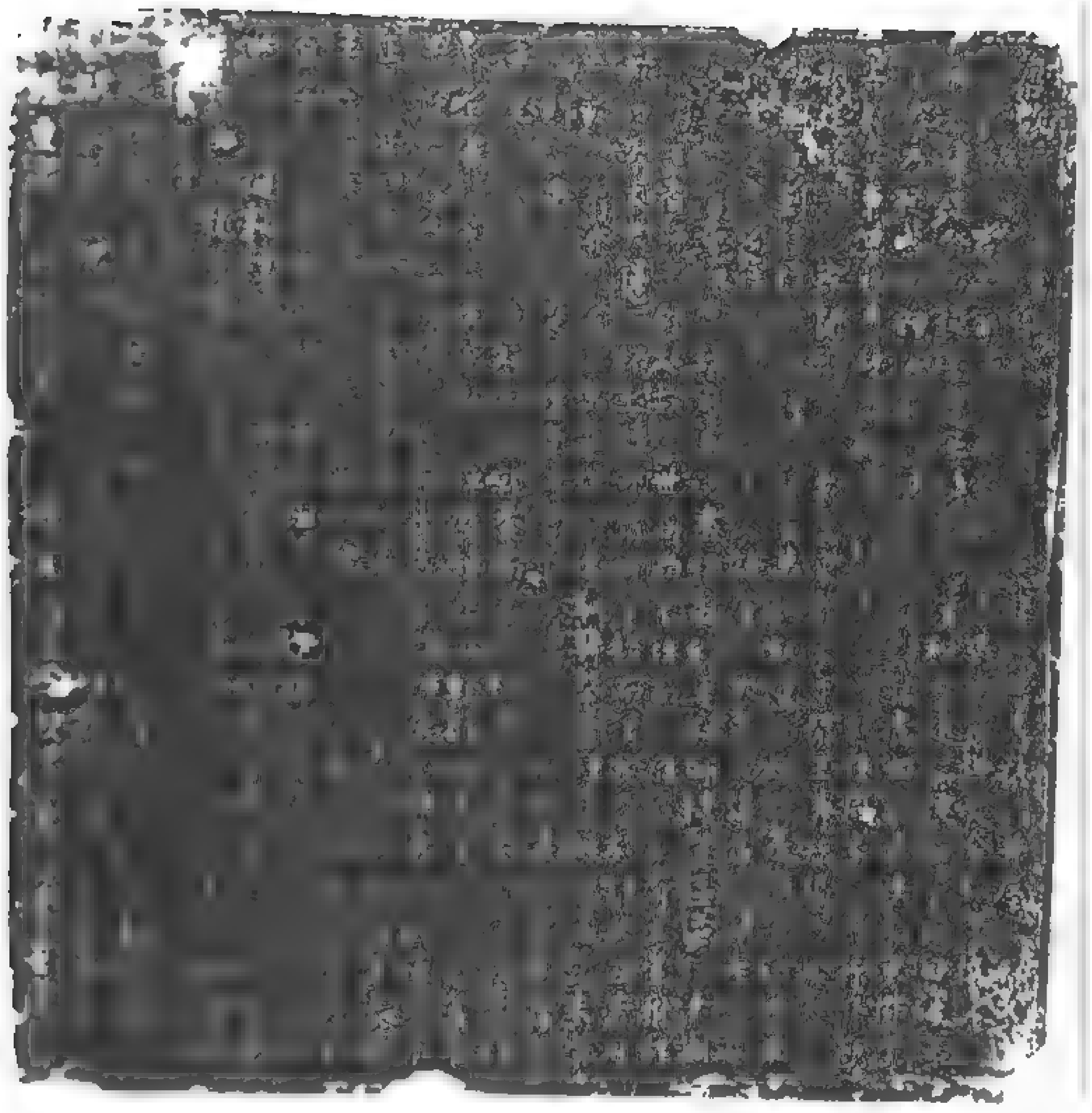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657）

210. 翟庆全墓志铭

唐　咸通六年(865)　志呈四方形，25行，行25字，楷书，令狐译撰文，李殷望书，志四侧饰十二生肖文饰，盖作覆斗式，中题为篆书“唐故右卫使押衙试金吾卫长史翟府君墓志铭并序”，盖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花纹。1956年西安西郊土门出土。

据志载：翟庆全为寻阳人，官衔为“唐故右卫使押衙试金吾卫长史”。“曾王父讳宥，大王父讳昌，显考讳晏，皆卓荦有奇节，尝读司马法，尽得韬钤要秘，鄙穰苴区区小国，非为王者师不愿赴，故三世高尚不仕。”翟庆全本人亦说：“府君少有立，尝拊髀叹曰，大丈夫得一抔土则可霸，何必禄而后食，乃于计然五策，



用三千家，未葬，累金百万。”墓志文由此以下又叙述其因富而朱紫盈门，不啻万户侯，没有一字提及其受官情况，可能翟庆全为一与禁军有交情的商人，官衔可能是虚假的。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交 01322）

211. 妓人清河张氏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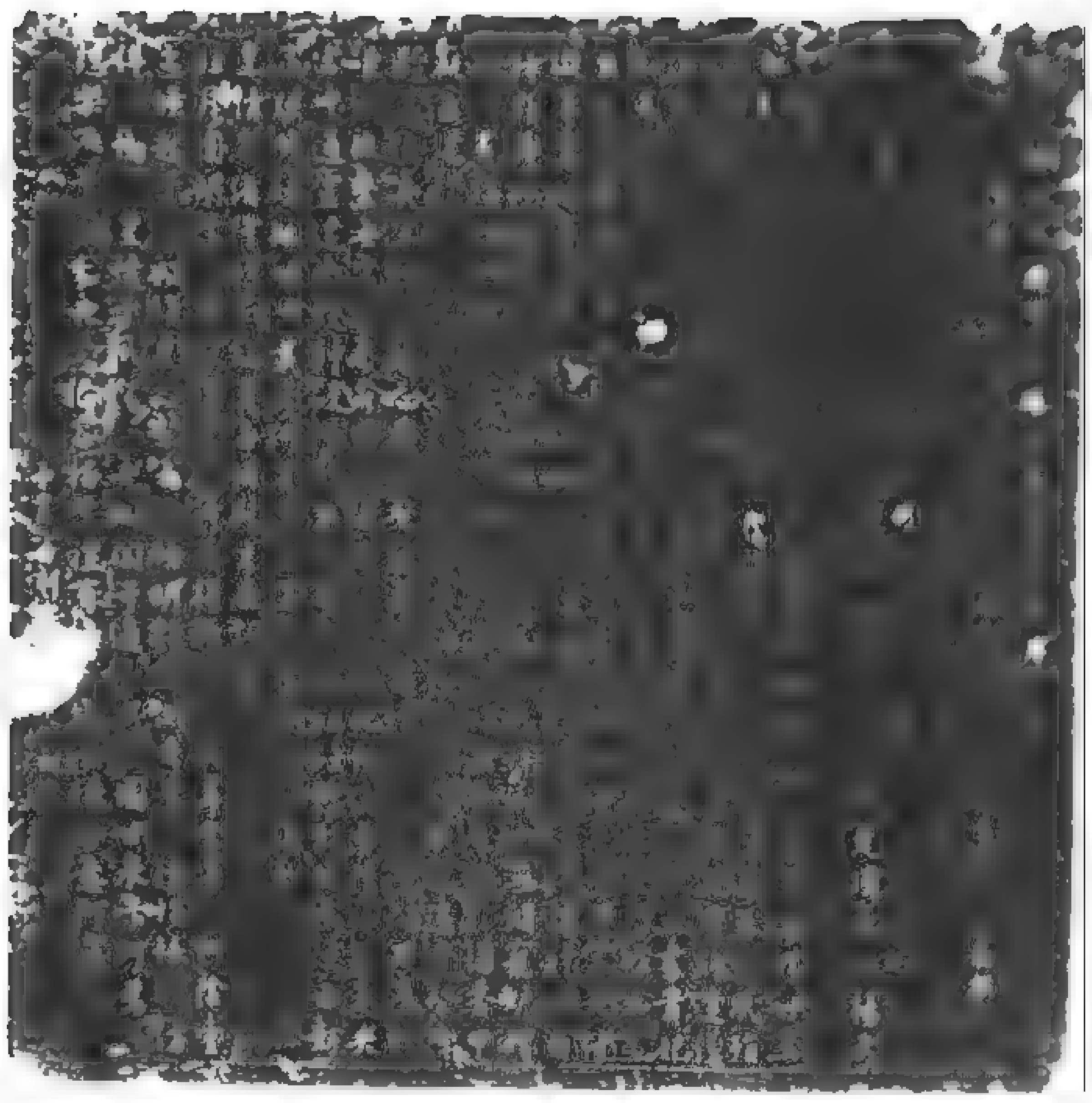
唐　咸通六年（865）　正方形，高、宽各 32 厘米，13 行，行 13 字，楷书，李从质撰文并书。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61）

212.楚国夫人赠贵妃杨氏墓志铭

唐　咸通六年（865）　正方形，高、宽各 70 厘米，26 行，行 25 字，行书，刘允章撰文，张宗厚书，董咸篆盖，强琮刻。1953 年张鉴捐赠西安碑林收藏，出土时地不详。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五三 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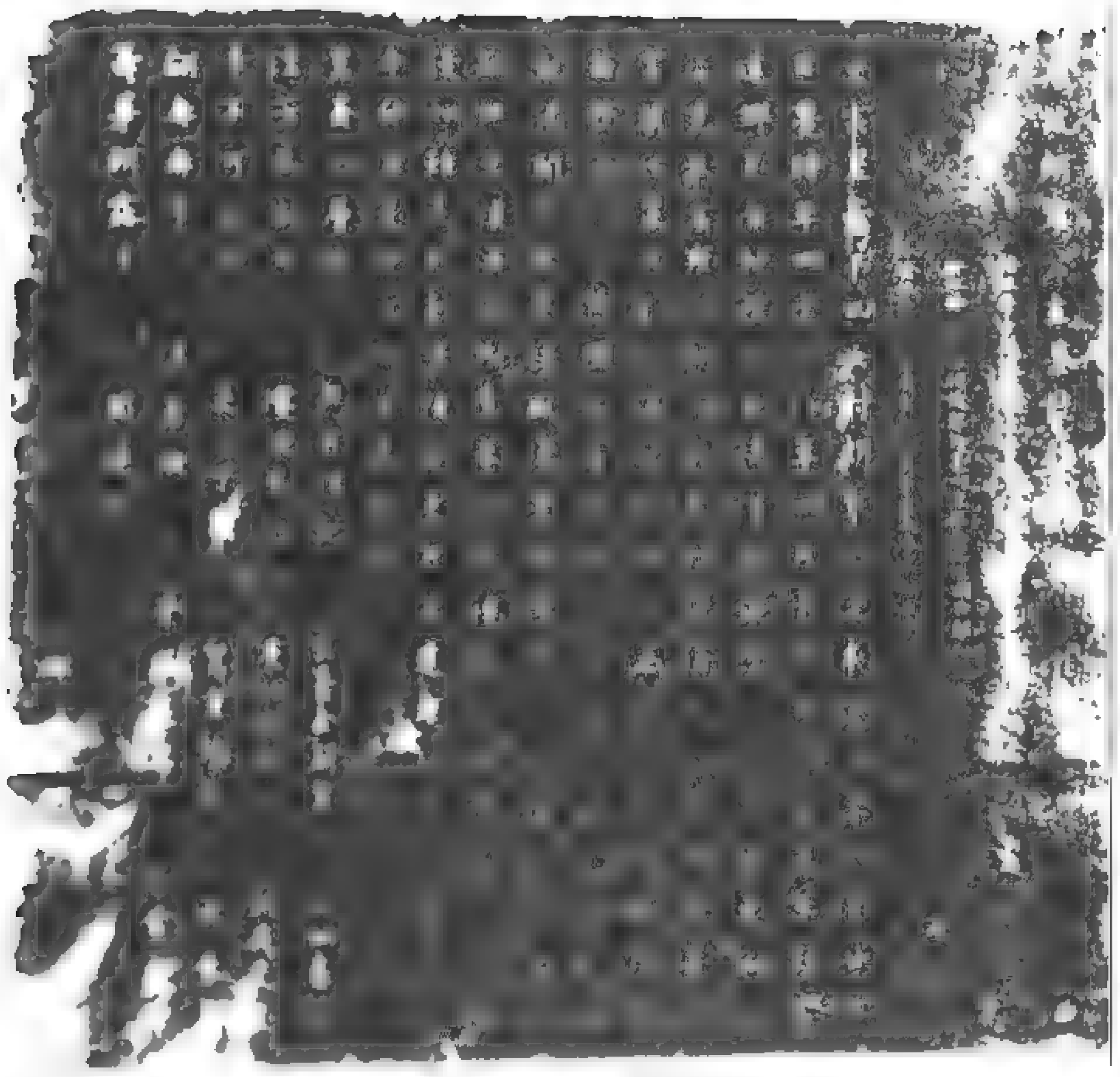
213. 朗宁公主墓志铭

唐　咸通八年（867）　正方形，高、宽各 62 厘米，20 行，行 20 字楷书，盖篆书 9 字，斜侧线刻四神花纹，李隲撰文，郭弘范书，董咸篆盖，郃宗异刻字。1952 年

西安东郊灞桥出土。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7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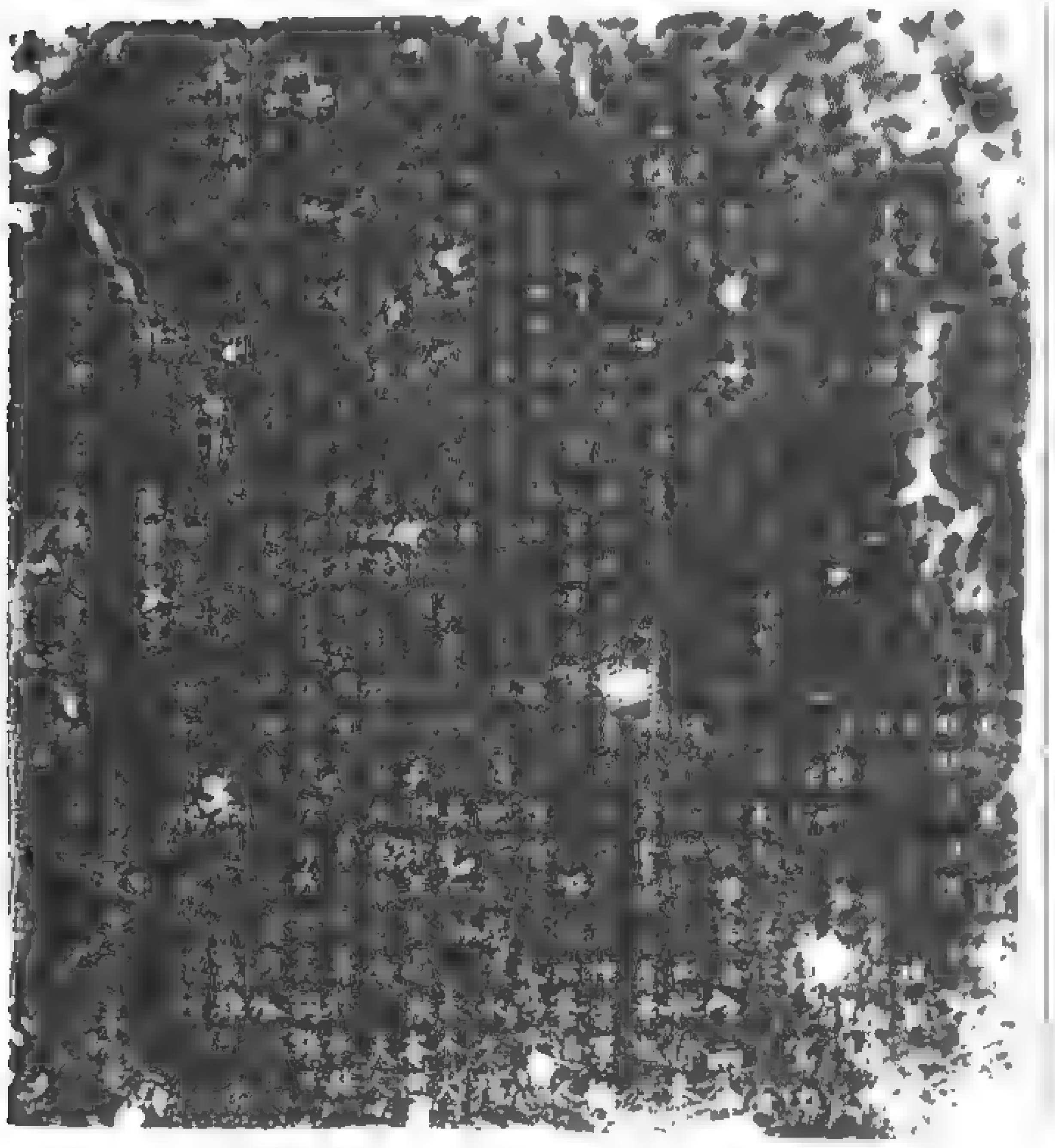
214. 狄公妻骆氏夫人墓志铭

唐　咸通十二年（871）　志呈四方形，高 44 厘米，宽 44.1 厘米。25 行，行 27 字楷书，志四侧饰十二生肖像，冯谦撰文，王义书并篆盖，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花纹。1956 年西安韩森寨出土。

此墓志与狄玄怱墓志为鸳鸯墓志，记骆氏，京兆长安人。“咸通十二年五月十五日遇疾奄逝于京兆府万年县崇义里”，“其年六月七日葬于本县长乐故城村”。由此可知狄玄怱志中的皇城里可能是当时的俗名，实即崇义里。葬地亦同，惟有“古”、“故”之差。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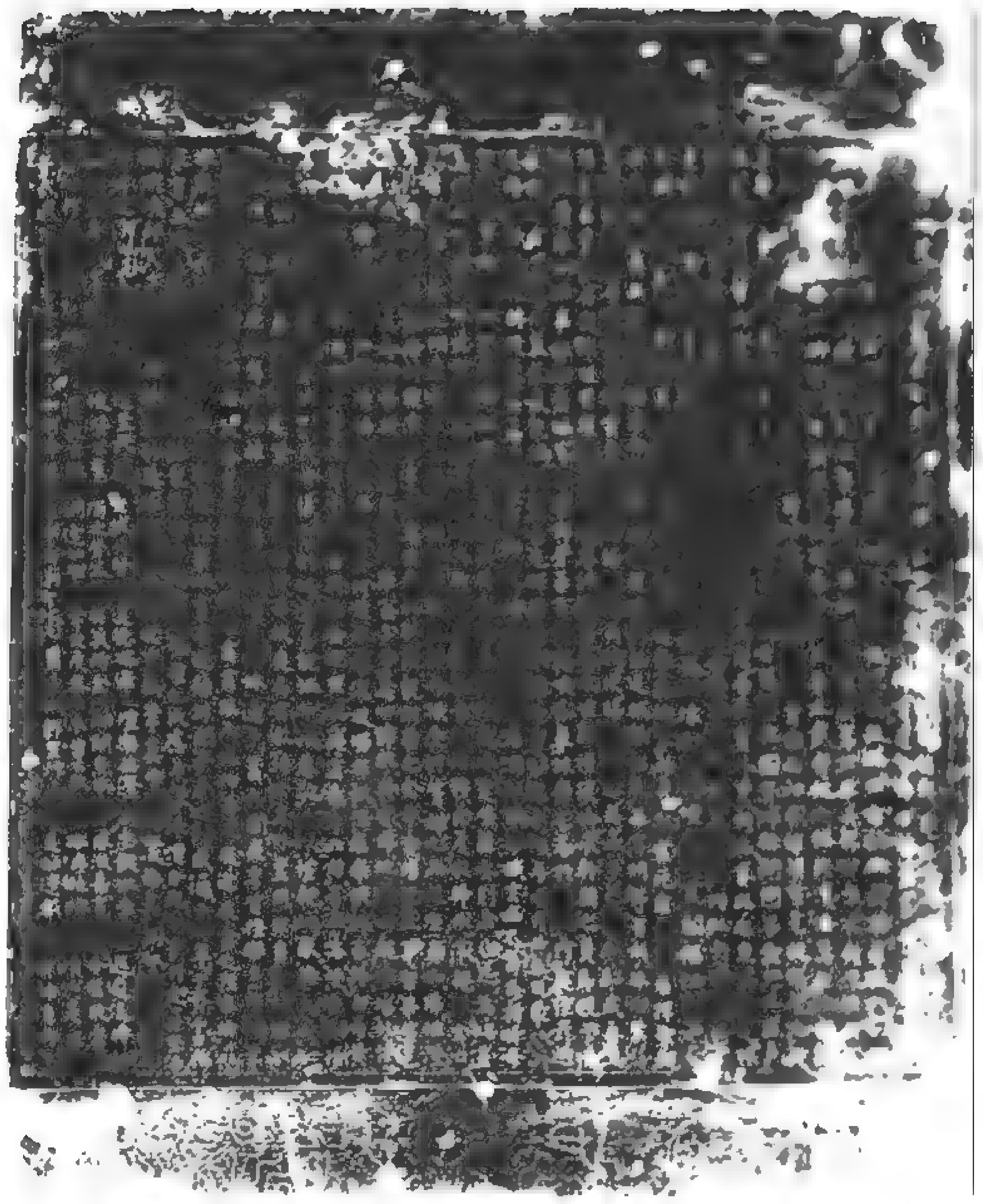


215. 张叔遵墓志铭

唐　咸通十二年（871）　志呈四方形，高 67.5 厘米，宽 67.3 厘米。志侧雕饰十二生肖像，35 行，行 35 字，楷书，杨璠撰文并书。1956 年西安西郊枣园出土。

据墓志载：张叔遵，字子名，清河郡今为交趾人。曾授太盈库，为一宦官。又此志记，张叔遵之父名元程，“去长庆四年四月十七日，时为弧矢官，其时不意供内染坊紫草人张韶及苏玄明等，潜谋乱逆，私怀勃心，罔礼君闱，猖狂禁阙。公先人时，侍翼旒扆，见此逆臣，遽怀忿惋，不顾孑命，尽死匡君，捍御亲征，身中刀箭，斯不具记，遂感神明相助，乃亲手射杀逆臣张韶及苏明玄等”。此事在《旧唐书》卷十七《敬宗纪》内载：“丙申，贼张韶等百余人至左银台门，杀阍者，

挥兵大呼，进至清思殿，登御榻而食。弓箭库右神策兵马使康艺全率兵入宫讨平之。是日，上闻其变，急幸左军。丁酉，上还宫，群臣称庆。……己亥，九仙门等监共三十五人，并笞之。辛丑，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天德，以张韶染坊役夫故也。”又《旧唐书》卷三十六《天文志》内亦有此事记载云：“四月十七日，染院作人张韶于柴草车中载兵器，犯银台门，共三十七人，入大内，对食于清思殿，其日，禁兵诛之。”这一唐宫政变志与史载相合。《旧唐书》记此事文中的银台门即是指唐宫内物品出入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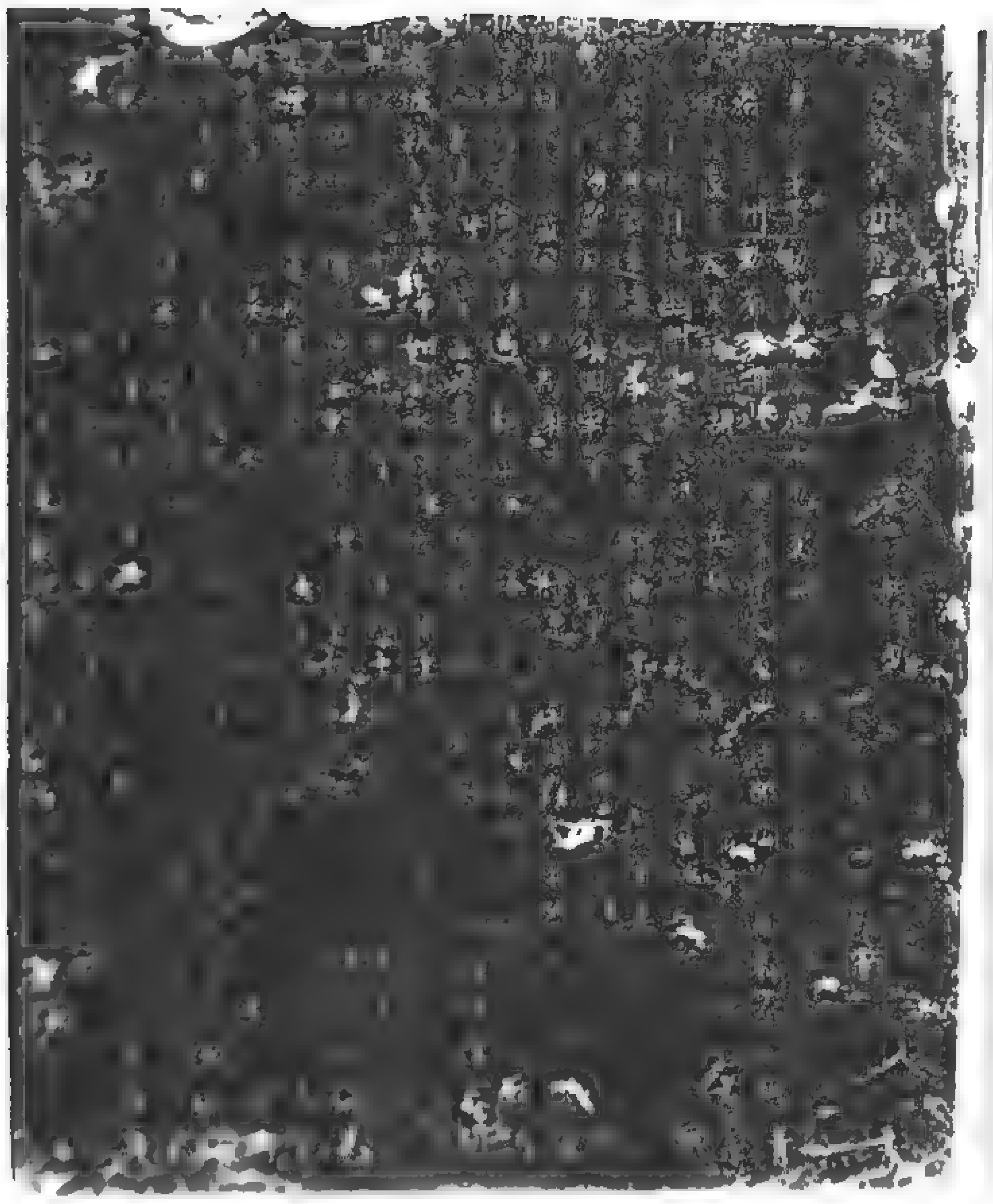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71）

216. 郭克勤墓志

唐　咸通十四年(873)　　志呈四方形，高 46.5 厘米，宽 45 厘米，何肇撰文，无书者姓名，字文 35 行，行 35 字，楷书。盖作覆斗式，中题“大唐故郭公墓志之铭”篆字，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花纹。1955 年西安东郊郭家滩出土。

据志载：郭克勤，字子望，太原人。又云：“以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陨于善和里之私第”。《旧唐书》卷一六九《郑注传》：“注起第善和里，通于永巷，长廊复壁，日聚京师轻薄子弟，方镇将使，以招权利。”《新唐书》卷一六八载《柳宗元致京兆尹许孟客书》中有“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宅”。但此善和里在宋敏求《长安志》。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均无记载，因而对善和里在长安城内的位置也难以肯定。从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一三著录的《重修大象寺记碑》（此碑原在陕西凤翔县东北十五华里处的大象寺小学内，今已残毁）碑阴首刻“大和乙卯”四字，继刻庄地、果园、顷亩、四至。略云：“管庄大小，只七所，东市善和坊店舍共六间，并瓦。”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并各占二坊之地。此等坊，想来亦必各有名称。如果《大象寺碑》中所载的东市，即长安城内的东市，则所占



两坊中必有一坊名善和坊，亦是郑注、柳宗元、郭克勤宅第所在的善和里（里亦可称坊）。又据唐《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义忠墓志》有“以大历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寝疾，终于东市署私第”之语句，是东市虽是市区，但确有仕宦人家。郑注等虽是显官，宅亦可能在市区内。这是墓志弥补了史书的不足和缺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交 01315）

217. 阿娘砖墓记

唐　咸通十五年（874）　长方形，高 15 厘米，宽 4.5 厘米。四行共 11 字。1955 年西安东郊高楼村出土。

此砖墓记仅有十一字为：

“咸通十五年　阿娘

墓

孟元简”

这墓记铭是孟元简为其母亲手所刻，所以非常简单又不能体统，书法楷体也极为稚朴。墓记的出土地点是西安东郊高楼村，此地属唐浐川乡之地。建国后出土的唐代墓志证见浐川乡一代多是官僚地主别业庄地，而孟元简则可能是此处地主富豪之家的庄户。因而其母死后因无经济实力，故刻此小砖以寄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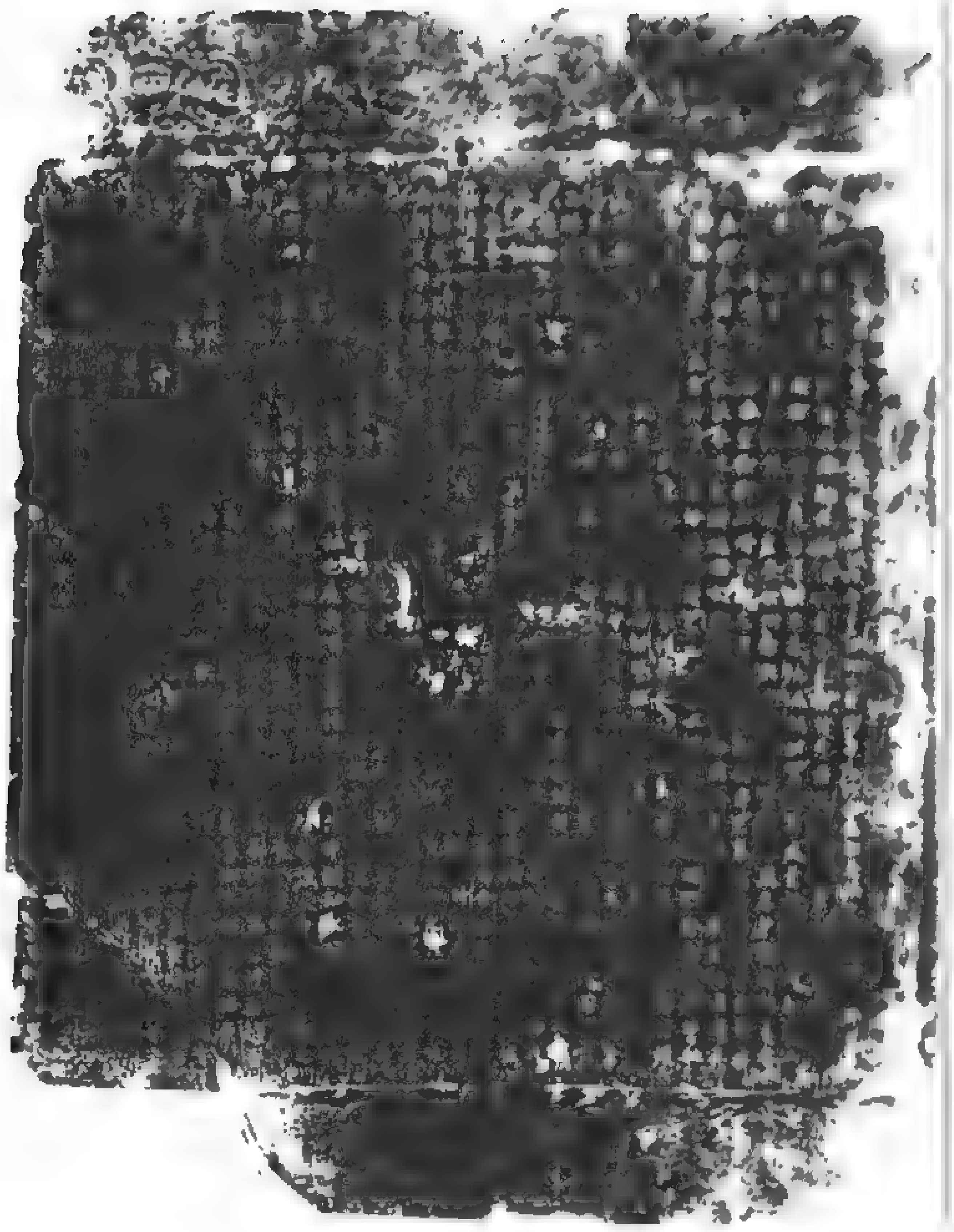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2891）

218. 朝散大夫汉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推墓志铭

唐　乾符三年（876）　四方形，高 54 厘米，宽 53 厘米。33 行，行 34 字，

楷书。从外甥崔锴撰并书。长安出土，时间不详，1952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志称“终于上都通义里”“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义善乡大作村凤栖原”，可藉以作研究唐长安坊里乡村名称的参考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22）

219. 吴兴钱氏女乌娘墓志

唐 乾符五年（878） 正方形，高、宽各30厘米，后段漫漶，约17行，行18字，楷书，盖9字。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志称“终于长安昭国里”为研究唐长安坊里的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28）

220. 亡尼七品墓志铭

唐 仪凤二年（877） 正方形，高、宽各35厘米，11行，行12字，楷书，盖篆书9字。1949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移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7151）

221. 亡尼六品墓志

唐 仪凤二年（877） 正方形，高、宽各35厘米，9行，行14字，楷书，字颇漫漶仅留30余字，盖篆书9字。1952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3725）

222. 亡尼九品墓志

唐　仪凤二年(877)　四方形,高 35 厘米,宽 36 厘米,11 行,行 12 字,楷书,盖篆书 9 字。1952 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志称“葬城西”咸长两县续志有记载。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3206)

223. 亡尼七品大戒墓志

唐　仪凤二年(677)　四方形,高 40 厘米,宽 49 厘米。9 行,行 16 字楷书,盖篆书 9 字。1953 年段绍嘉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隋唐宫人有入寺为尼者,此志称亡尼大戒,当是宫人清修称号,“葬城西”,长安两县续志有记载。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3724)

224. 亡宫墓志铭

唐　仪凤三年(878)　正方形,高、宽各 44 厘米,5 行,行 12 字楷书。1949 年前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交原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59)

225. 师弘礼墓志铭

唐　广明元年(880)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53.5 厘米,28 行,行 28 字楷书,志四侧饰十二生肖花纹,刘象撰文,无书写人姓名。盖作覆斗式,中题“大唐故师府君墓志铭”楷书三行,行三字。1956 年西安西郊小土门出土。

据墓志云:师弘礼,字德兴,平原人,官至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资州诸军事守资刺史兼安夷军使殿中侍御史柱国。乾符四年十月九日终于洪州之旅次,

"以广明元年四月廿五归窆于京兆府长安县龙首乡祁村"。又铭文末云"凤城之西,龙首之东,萧萧古柏,惨惨悲风,公之瘗此,永播无穷"表明了长安县龙首乡的位置所在。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9367)

226. 贞士韦君墓志

唐 中和四年(884) 正方形,高、宽各 31 厘米,15 行,行 15 字,楷书,字多漫漶。1952 年张伯英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56)

227. 李令崇墓志铭

唐 光化二年(899) 志呈正方形,高、宽各 75.5 厘米,41 行,行 43 字楷书,李应坤撰文,周弘济书,志四周饰十二生肖花纹。盖作覆斗式,中题"唐故南内李府君墓志铭"行书三行,行三字。四刹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线刻纹饰。

志载:李令崇,字垣子,陇右华宗人。乾宁三年"迁拜南内留后使"。南内即指唐长安城的兴庆宫。志还云"宫掖虽焚毁,司局亦且清闲"的冷落状况。《旧唐书》卷十九《僖宗纪》云:"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之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 。"言及了兴庆宫及长安城内居民房屋被毁坏的状况。

(藏石编号 04636)

228. 僧实贻墓志

唐(?) 志为四方形,高 33 厘米,宽 36 厘米,盖篆书"大唐故僧实贻墓志铭"9 字,右上角断缺。志文佚。1952 年张伯英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3757)

229. 简州长史孙府君夫人独孤氏墓志

唐(?) 志为正方形，高、宽各56厘米，5行，行18字，楷书，字迹模糊不清，隐可辨，志佚。1951年西北文物处交西安碑林收藏，由咸阳北原出土。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1459)

230. 鄚王王妃崔镇墓石记

唐(?) 正方形，高、宽各54厘米，19行，行8字，楷书，并书符箓六字。1952年张伯英捐赠西安碑林收藏。

石上段刻符箓，下段文中有“今于万年县洪固乡故里安宫立室，庇形后土”，以其语意推之，当是唐人营墓祀土之石。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3765)

231. 静难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前守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石彦辞墓志铭

梁　开平四年(910) 正方形，高、宽各91厘米，50行，行50字，楷书，盖篆书9字。胡裳吉撰、李昭远书志，石戬篆盖，李延辉刻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志称彦辞为朱温第二夫人之弟，随朱温事唐20余年，晚年信佛道二教，《旧五代史·梁书》无传。志盖为覆斗式，中篆书“梁故武威石公墓志铭”9字，斜侧四刹线刻四神花纹，气势富丽，志侧四面刻十二肖兽，均是人形持笏，仅于冠上加以鼠、牛、虎、兔、鸡、狗、蛇、羊等兽形，较唐代俑及线刻画上表现的兽首人身更为合理化。按《周书·宇文护传》护母贻护书中已有“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等语，可知在南北朝时十二肖兽的传说，已一般习惯用于人生纪年，故在志石亦多有表现，而此志侧表为人戴兽帽使生肖更人性

化，虽是小节，也可藉以看出当时社会风俗思想的演化过程，更是研究历代十二肖兽作风演变的实物资料。

现存碑林墓志廊。

（藏石编号 1362）

232. 推诚翊戴功臣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太傅知定州军州事充本州马步军部署管内制置营田使并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定郡开国公食邑五千八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赠太尉安守忠墓志铭

宋 咸平三年（1000） 四方形，高 94 厘米，宽 80 厘米。47 行，行 58 字，行书，盖篆书 3 行 12 字。张宗诲撰，吴郢书并篆，和彧刻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安守忠《宋史》有传仅 600 余字，而志文长达 2000 余字。传中所述历官行谊均见于志，可知传以志为资料而撮述的。志盖为覆斗式，中篆书“大宋故赠太尉武威安公墓志”12 字，周减底线刻蔓草图案花纹，四刹线刻四神。志侧四面各分三区，减底线刻持笏官人各一，当属十二生肖花纹，而无肖兽标帜，比照前志，更可看出五代时生肖习俗完全人性化了。线刻画的刀法流利，线条尚存盛唐风格，可谓宋代志石中一典型艺术作品。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63）

233. 提点梓州路诸州军刑狱公事朝奉郎尚书度支郎中上柱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姚奭墓志铭

宋 熙宁五年（1072） 四方形，高 77 厘米，宽 79 厘米。50 行，行 55 字，楷书。邵雍撰文，王慎言书，任逵篆盖，盖已佚，阎永真刊。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 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姚奭曾官陕西武功凤州永兴军，地方文献均失载，志述姚奭曾受夏竦文彦博富弼名相迭才推举，历官直正敢为，到处兴利除弊，亦为条陈青苗法利少害多之一人。邵尧夫人与之交游 30 年，因知元深而为之撰志，可知其为人，志文

长达2000余字。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365）

234. 朝请大夫尚书礼部郎中上护军范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祖士衡墓志铭

宋　熙宁五年（1072）　正方形，高、宽各73厘米，39行，行40字，楷书，志盖减底阳刻篆书12字。侄无择撰，邵雍书并篆盖，张琇刻字，洛阳出土，具体时地不详。1940年经于右任移存西安碑林收藏。

祖士衡《宋史》无传，而其侄无择及邵雍均有传。康节书法世间少传，此志书迹典重遒劲，可见其亦为善书者。志盖边线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刀法亦佳，可称得上艺术之作。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1364）

235. 朝奉郎直龙图阁权知陕州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兼提举商虢等州兵马巡检公事飞骑尉赐绯鱼袋借紫游师雄墓志

宋　绍圣四年（1097）　正方形，高、宽各122厘米，68行，行67字，楷书，张舜民撰，邵𩾃书，章楶篆盖，盖已佚，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合刻。西安碑林旧存。

游师雄，陕西武功人，少从张横渠游，经范纯仁、韩琦荐举，历经蔡挺、韩绛、刘瑄、赵禹诸人，对西夏边功建树甚多。《宋史》有传，志文长达四千余字，为西安碑林藏志中文字最长的一块，传均取志资料，有减无增。《关中金石记》中推崇“其才略风概瑰玮，卓荦宋世，少有其俦匹”。可想其为人情况。《金石萃编》卷一四一有著录考证，并集有《铁国山丛谈》、《姑溪集》、《石墨镌华》、《鲒埼亭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及《关中金石记》等书详细考证可供参阅。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920）

236. 金京兆刘处士墓碣铭

元　定宗后听政二年(1249)　竖方形圆首，高 158 厘米，宽 60 厘米，20 行，行 41 字，隶书，额隶书 9 字，杨英撰，张徽书，李徽题额，高贵立石。西安碑林旧存。石刻未记年号，只题己酉孟夏。铭文中叙金正大八年事，以后隔八年处士死，又十年为己酉高贵为之立石，时为元定宗后听政二年，亦即南宋理宗淳祐九年。陕西地区为元统治，故列时代为元。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7123)

237. 辅昌砖墓志

元　延祐三年(1316)　志呈四方形，高 36.5 厘米，宽 35.5 厘米，志文 10 行，行 10 字，隶书，同恕撰文，李则书字。1956 年西安西南郊出土。

此志为一砖刻墓志，实为一元代的碑，内容朴素文句易懂，特按原格式抄录于下：

辅昌京兆北关人召远门
祖茔咸在公性直无华颇
义气其子孙恒以勤俭为
戒与今市井人去相远矣
妻卫氏先卒次妻尚官氏
无恙子四人世安世荣世
忠世道奴女二人孙男四
人公享年七十有三以疾
卒至元之庚辰葬长安县
义阳乡野狐冢从吉卜也

从志文看辅昌仅有名而没有记载姓氏。又云“至元庚辰葬长安县义阳乡”乃知葬时在元顺帝六年。是长安一农户人家。此志为研究元奉元城方面提供了资料。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载：“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国军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郭外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

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城之制，内外二重，四门，门各三重，今存者惟二重。内重其趾尚存，东、(西)又有小城二，以为长安咸宁治所。"这里几乎全未提及元代长安城(即奉元城，亦即京兆府城)的情况。因此，"辅昌，京兆北关人，召远门祖茔咸在"等语，极为重要。当时长安城有北关，有一门称为召远门。辅昌葬义阳乡，当即其召远门外的祖茔所在。《隋唐石刻拾遗》、《长安县志》都说义阳乡在县西南二里，是召远门乃是西门，可能由唐长安城的开远门而来。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03335)

238. 安西路耀州尹耶律世昌墓志铭

元　泰定三年(1326)　　四方形，高 52 厘米，宽 51 厘米。28 行，行 28 字楷书，盖中篆书 12 字，四刹有线刻花纹，芦惟善撰、刘龠书。解放前出土于长安县韦曲村，同坑出土陶俑陶马等近百件，还有镔刀一柄。

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1326)

239. 夫人李氏墓志

明　正统三年(1438)　　正方形，高、宽各 62 厘米，15 行，行 15 字，楷书，盖篆书 8 字。据志载正统三年夫人李氏死后葬于长安县。墓志出土时间不详，1950 年西北文物处移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2066)

240. 永寿王府奉国将军诚流淑人杨氏合葬圹志

明　弘治五年(1492)　　四方形，高 62 厘米，宽 61 厘米，32 行，行 34 字，楷书，盖飞白书 16 字，志盖四周均雕有线刻图案花纹。据志载死后墓主人葬于长安县龙首原之侧。墓志于 1953 年由西安南郊瓦衔衕村出土，西安师范学院送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三 375）

241. 永寿王府辅国将军公铅圹志铭

明　弘治八年（1495）　正方形，高、宽各 67 厘米，25 行，行 33 字，楷书，盖 16 字，志盖四周均线刻龙纹，1953 年西安师院送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三 994）

242. 永寿王府奉国将军诚激淑人任氏合葬圹志

明　弘治十六年（1503）　四方形，高 57 厘米，宽 56 厘米，27 行，行 36 字，楷书，盖亦为楷书 16 字，志盖四周均线刻龙纹，志裂为二块。1953 年西安师范大学移交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三 996）

243. 宗室辅国将军公铅夫人雷氏合葬圹志

明　嘉靖六年（1527）　正方形，高、宽各 67 厘米，23 行，行 22 字，楷书，盖篆书 16 字。子诚泚上石。志盖四周均线刻龙纹。1953 年西安师范大学移交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7039）

244. 秦府承奉副鹤林王泾墓志铭

明　嘉靖二十一年（1542）　正方形，高、宽各 71 厘米，27 行，行 28 字，楷书，盖篆 12 字。马理撰，王准书篆，邓锦、张宥刻。志盖四边均有减底阳刻图案花纹。1945 年抗日战争时西安西郊扩修飞机场时出土，同坑出土有墓主人像及陶俑多件，均可藉以看出明代人具体的衣冠，现均藏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7039）

245. 淑人孟氏圹志

明　嘉靖二十三年(1544)　　正方形，高、宽各64厘米，19行，行26字楷书，盖篆书9字。志盖四周线刻凤纹。1953年陕西师范大学送交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三992)

246. 秦藩典宝正崔廷玺墓志铭

明　嘉靖三十一年(1552)　　四方形，高62厘米，宽63厘米，21行，行23字楷书，盖篆书9字。王九思撰，王准书，黄云篆盖，弟真侄应举等上石。志盖四刹周边均减底阳刻图案花纹。1945年与王泾志同时出土。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7038)

247. 秦府引礼舍人王琮配璩氏合葬墓志铭

明　嘉靖三十二年(1553)　　四方形，高55厘米，宽56厘米。24行，行29字，楷书，盖篆书16字。许宗鲁撰侄男朝进书篆，萧璋刻。盖四刹雕饰花纹，1952年西安市建筑工程队送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7043)

248. 昭勇将军西安左卫指挥使琢吾杨玠墓志铭

明　万历三十一年(1603)　　正方形，高、宽各69厘米。34行，行37字，楷书。秦可贞撰，秦东周书，男继美上石，张文张显刻。1953年西安师范大学送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三995)

249. 儒官肃轩李拱及元配王氏继韩氏张氏合葬墓志铭

明　万历四十一年(1613)　正方形，高、宽各67厘米。32行，行35字，楷书，盖篆书23字。王昌道撰，孟灿书，曹汝麟篆盖，男永芳上石，张文刻。志盖四刹均饰线刻图案花纹。1952年西安市建筑工程队送交西安碑林收藏。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7044)

250. 冯毅苍妻墓铭

明　正方形，高、宽各63厘米，27行，行25字，楷书。王椿撰并书篆，男文经立石。1956年西安市北关经二路出土，志右上角斜缺，损20余字，并多漫漶，夫人姓氏及年号均泐，惟文内有"孙女五人，永兴王府辅国中尉惟炕，镇国中尉惟灼"，"皆其婿也"等语，知与明藩有亲戚关系，故列时为明。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3766)

251. 墓 志 盖

明　正方形，高、宽各77厘米。四行篆书"皇明宗室小川公元配尤氏合葬墓志铭"16字，志已佚。盖石裂为二，四刹减底阳刻，上下双龙，左右双凤图案，颇为精美。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849)

252. 周显继妣李太孺人墓志

清　道光二十七年(1847)　正方形二石，高、宽各65厘米。一石上列篆书16字，楷书5行，下列楷书20行；另一石上列楷书20行，下列15行，行均14字。刘遐龄书并篆，子周康泰志，刘安笃刻。1953年西安南郊小寨村出土。

现存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五三 128）

253. 山西灵石县知县前翰林院士顾夔墓志

清　咸丰间（1851—1861）　此墓志为长方形三石，高 31 厘米，长 91 厘米，65 行，行 12 字，盖篆书 26 字。张祥河撰文，何绍基楷体书丹，姚楗篆盖。志称顾夔号荃士，华亭人于娄县。华亭娄县，今均属江苏松江县境。张祥河，道光、咸丰间曾任陕西巡抚，与顾系姻亲，为之撰墓志。志又述顾夔曾与王蕊孙等结泖诗社"词笔轻倩，小令尤擅长，得南唐遗意"，并有"综君生平应以词人传无愧也"的评语。可见顾荃士虽历官较早，亦为当时一位风雅文人。此志不仅情文并茂而书法尤佳，为当时名书法家何绍基书丹。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湖南道县人。晚清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对诗文书法金石都有所长，书名最著，被评为"清朝第一"。其书法行楷学唐颜真卿，体势遒劲流动。晚年喜作篆隶，将篆隶笔意，融合行楷书中，风格一变。他曾自称："余学书 40 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隶篆分入真楷之绪"。此志书法秀丽迷人，是一件很好的艺术佳作。是撰者在陕西巡抚任内将志底本刻石置于碑林。且三石首刻盖篆书，续志文，最后刻"顾荃士志铭"六字题签，均每隔五行空一行，作册页式刻法，亦无葬时具体年月。似作为帖，当非为原志。

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石编号 883）

后　记

1983 年 10 月，由我主要编写的《西安碑林书法艺术》一书，颇受国内外读者欢迎，曾多次再版发行，目前正被日本国人翻译成日文版，备在全球范围内发行。也曾有读者向我提出，是否能将此书范围再扩大一些，对西安碑林内容的介绍再充实、深入一些，比如能再扩充一些陕西石刻方面的内容……依据这些意见，编者便从多方面积累资料，以满足读者的愿望。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努力，才完成《陕西古代石刻艺术》这本书的编撰。

此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伍彩珍、杨亮、李颖、张群喜、罗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94 年 6 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陕西古代石刻艺术
作者= 李域铮编著
页数= 343
SS号= 10328814
出版日期= 1995年12月第1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序(一) & 陈全方
序(二) & 邢忠强
一、陕西石刻概述
1 . 霍去病墓石刻
2 . 车马出行图
3 . 东王公会西王母故事图
4 . 迎宾客、六博图
5 . 蹴鞠、击剑图
6 . 画像石墓门
7 . 歌舞和博山炉图
8 . 西王母、博山炉图
9 . 轺车、辎车出行图
l O . 建筑斗拱、羊群和牛耕图
1 1 . 执戟门吏
1 2 . 朱雀、铺首、青龙门扇
1 3 . 朱雀、铺首、白虎、独角兽门扇
1 4 . 朱雀、铺首、应龙、独角兽门扇
1 5 . 白虎、铺首、朱雀门扇
1 6 . 主客贽见、杂技表演图
1 7 . 西王母、牛车图
1 8 . 西王母、执彗人、牛车图
1 9 . 西王母、耦耕图
2 0 . 执彗人、拾粪图
2 1 . 歌舞图
2 2 . 歌舞、喂马图
2 3 . 东王公和西王母图
2 4 . 围猎、神兽云车图
2 5 . 狩猎、阙楼、七盘舞图
2 6 . 游猎图
2 7 . 狩猎、出行、放牧图
2 8 . 墓室方形门框
2 9 . 墓室方形门框
3 0 . 墓室石门
3 1 . 走兽
3 2 . 宜君道教石窟
3 3 . 道佛造像碑
3 4 . 皇兴造像
3 5 . 姚文迁造像碑
3 6 . 释迦牟尼造像
3 7 . 景明造像
3 8 . 佛菩萨造像
3 9 . 刘宝生造像
4 0 . 永平二年释迦造像
4 1 . 朱双炽造像
4 2 . 普泰造像
4 3 . 朱辅伯造像碑
4 4 . 朱黑奴造像
4 5 . 弥勒菩萨造像
4 6 . 双龛弥勒释迦造像碑
4 7 . 魏文朗造像碑
4 8 . 正光造像碑
4 9 . 李昙信造像碑
5 0 . 蹲狮
5 1 . 武成造像碑
5 2 . 武成二年造像碑
5 3 . 释迦佛立像
5 4 . 天和四面造像碑
5 5 . 建德四面造像碑

５６．建德三年造像碑
５７．释迦牟尼造像碑
５８．开皇造像碑
５９．大夏石马
６０．大统三年造像碑
６１．千佛造像碑
６２．西魏文帝永陵立兽
６３．四面佛造像碑
６４．荔非明达等四面造像碑
６５．弥勒菩萨坐像
６６．观音菩萨像身躯
６７．菩萨立像
６８．释迦牟尼立像
６９．释迦牟尼佛立像
７０．一髻文殊立像
７１．提篮观音菩萨像
７２．菩萨首
７３．黄花石观音菩萨像
７４．李小孩(　静训)　石棺
７５．永康陵蹲狮
７６．翁仲像
７７．石犀
７８．李寿墓石椁
７９．李寿墓墓门
８０．献陵石虎
８１．昭陵六骏
８２．昭陵石狮
８３．卧牛
８４．端陵驼鸟
８５．杨执一夫妇墓门线画
８６．韦顼石椁线画
８７．兴福寺残碑碑侧花纹
８８．大智禅师碑碑侧花纹
８９．道德寺碑及碑侧花纹
９０．慧坚禅师碑碑侧花纹
９１．白玉石佛坐像
９２．释迦佛立像
９３．释迦佛立像
９４．释迦佛立像
９５．菩萨残像
９６．残菩萨坐像
９７．观音菩萨像
９８．虚空藏菩萨像
９９．随心金刚造像
１００．马鸣大士像
１０１．白石菩萨头
１０２．马头明王像
１０３．石刻密教造像
１０４．天王残像
１０５．天王像
１０６．天王残像
１０７．观音残像
１０８．石刻残像
１０９．释迦牟尼坐像
１１０．菩萨头
１１１．释迦牟尼像
１１２．释迦佛立像
１１３．释迦佛立像
１１４．塔饰造像
１１５．塔门造像
１１６．释迦降伏外道造像
１１７．法藏佛方座
１１８．乐舞佛座

１１９．老君像
１２０．武士残像
１２１．持弓天王像
１２２．石灯
１２３．石栏板
１２４．螭首
１２５．昭陵石刻
１２６．乾陵石刻
１２７．顺陵石刻
１２８．建陵石刻
１２９．桥陵石刻
１３０．惠陵石刻
１３１．泰陵石刻
１３２．崇陵石刻
１３３．献陵石刻
１３４．景陵石刻
１３５．光陵石刻
１３６．药王山佛龛造像
１３７．千佛院摩崖造像
１３８．大佛寺石窟
１３９．慈善寺石窟
１４０．子长钟山石窟
１４１．延安万佛洞石窟
１４２．黄陵千佛洞石窟
１４３．富县阁子头石窟
１４４．富县直罗塔石雕像
１４５．罗汉残像
１４６．阿耨观音像
１４７．青头观音
１４８．富县石泓寺石窟
１４９．大德造像
１５０．富县石佛堂石窟

二、西安碑林中的书法艺术

１．峄山刻石
２．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
３．郭稚文墓门框文字刻石
４．石门颂
５．苍颉庙碑
６．西岳华山庙碑
７．郙阁颂
８．杨淮表记
９．熹平石经《周易》（ 残石）
１０．曹全碑
１１．三体石经
１２．永安侯墓石
１３．张永昌墓碑
１４．夫人天水赵氏墓碑
１５．菅氏夫人墓碑
１６．司马芳残碑
１７．三藏圣教序碑
１８．兴福寺残碑
１９．邓太尉碑
２０．广武将军□产碑
２１．松滋公元苌温泉颂
２２．魏文朗造像牌
２３．晖福寺碑
２４．姚伯多造像碑
２５．石门铭
２６．毛遐造像碑
２７．西岳华山庙碑
２８．毛明胜造像碑
２９．张俭妙碑
３０．贺若宜碑

３１．孟显达碑
３２．道德寺碑
３３．智永真草千字文帖
３４．断千字文
３５．皇甫诞碑
３６．昭仁寺碑
３７．九成宫醴泉铭
３８．温彦博碑
３９．张琮碑
４０．段志玄碑
４１．陆让碑
４２．孔颖达碑
４３．褚亮碑
４４．豆卢宽碑
４５．樊兴碑
４６．房玄龄碑
４７．万年宫铭
４８．周护碑
４９．李靖碑
５０．兰陵长公主碑
５１．尉迟恭碑
５２．杜君绰碑
５３．同州三藏圣教序碑
５４．道因法师碑
５５．程知节碑
５６．子志宁碑
５７．令狐熙碑
５８．吴广碑
５９．越国太妃燕氏碑
６Ｕ．马周碑
６１．李？碑
６２．述圣纪碑
６３．美原神泉诗序碑
６４．顺陵残碑
６５．契苾明碑
６６．符？碑
６７．于知微碑
６８．李思训碑
６９．御史台精舍碑
７０．杨孝恭碑
７l．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７２．代国长公主碑
７３．大智禅师碑
７４．石台孝经
７５．杜居士碑
７６．谒金天王神祠题字
７７．多宝塔感应碑
７８．大福和尚碑
７９．争座位稿(　帖)
８０．三坟记碑
８１．李氏洒先茔记碑
８２．颜勤礼碑
８３．颜氏家庙碑
８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８５．广智三藏不空和尚碑
８６．慧坚禅师碑
８７．回元观钟楼铭并序
８８．开成石经
８９．大遍觉法师塔铭
９０．基公塔铭
９１．玄秘塔碑
９２．刘沔碑
９３．孔子庙堂碑

９４．令狐德菜碑
９５．彦修草书及肚痛帖
９６．东陵圣母帖
９７．藏真、律公二帖
９８．怀素草书千字文
９９．篆书千字文及隶书释字
１００．《佛说摩利支天经》附图
１０１．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
１０２．大观圣作之碑
１０３．黄庭坚诗
１０４．大开元寺兴致碑
１０５．游天冠山诗
１０６．祝允明草书乐志论
１０７．鱼篮观音像
１０８．月桂赋
１０９．义勇武安王像
１１０．寇准像
１１１．中和二字
１１２．达摩东渡图和达摩面壁像
１１３．秣陵旅舍送章生诗
１１４．苏氏笔法论
１１５．淳化秘阁帖
１１６．千字箴
１１７．白衣大士像碑
１１８．关中八景图
１１９．松鹤图
１２０．三圣母像
１２１．虚中君子图
１２２．宁静致远四字
１２３．太华山图
１２４．太白山图
１２５．御书高松赋
１２６．心画初机
１２７．文赋
１２８．林则徐游华山诗
１２９．“福”字
１３０．一笔“虎”字
１３１．大“寿”字
１３２．于右任草书正气歌
１３３．杨松轩墓表
１３４．朱子桥纪念碑

三、收藏宏富的历代墓志

１．元桢墓志
２．元简墓志
３．元弼墓志
４．元定墓志
５．穆亮墓志
６．元诱妻冯氏墓志
７．张整墓忘
８．李蕤墓志
９．奚智墓志
１０．元鉴墓志
１１．元嵩墓志
１２．武卫将军侯氏张夫人墓志
１３．元融妃穆氏墓志
１４．元愿平妻王氏墓志
１５．杨阿南墓志
１６．元保洛墓铭
１７．杨颖墓志
１８．封昕墓志
１９．鄯乾墓忘
２０．贵华恭夫人王普贤墓志
２１．高祖充华赵氏墓志

２２．长孙？墓志
２３．显相嫔成氏墓志
２４．山晖墓志
２５．王祯墓志
２６．皇内司吴光墓志
２７．元广墓志
２８．元遥墓志
２９．邓夫人李椠兰墓志
３０．元珽妻穆玉容墓志
３１．元遥妻梁氏墓志
３２．杨胤季女墓志
３３．元晖墓志
３４．穆亮妻尉太妃墓志
３５．元孟辉墓志
３６．元夫人赵光墓志
３７．刘阿素墓志
３８．叔孙协墓志
３９．穆纂墓志并盖
４０．张安姬墓志并盖
４１．传田王遗女墓志
４２．内司高唐县君杨氏墓志
４３．卢令媛墓志铭
４４．镇远将军前军将军赠冠军将军正平太守元仙墓志铭
４５．假节日督洛州诸军事？骧将军洛州刺史河南元秀墓志
４６．龙骧将军元引墓志
４７．傅田宫大监杜法真墓志
４８．殷州刺使崔楷墓志
４９．武阳县开国公侯刚墓志
５０．伏波将军尚书北主客郎中大司农丞穆彦命妇元洛神墓志
５１．元鉴妃吐谷浑氏墓志
５２．冀州刺史博野县公笱景墓志
５３．冀州刺史赵郡开国公尔朱绍墓志
５４．尔朱袭墓志
５５．昭玄沙门大统僧令杜法师墓铭
５６．平北将军殷州刺史元瑗墓志铭
５７．闾仪同伯升及夫人元仲英墓志铭
５８．李挺命妇元季聪墓志铭
５９．源磨耶圹记
６０．征西将军上洛县开国男元子邃墓志铭
６１．新义郡公韩木兰墓志
６２．通直散骑常侍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常卿高僧护墓志铭
６３．伪齐俗赠车骑将军时珍墓志
６４．襄城顺阳二郡太守寇炽墓志
６５．李和墓志
６６．寇炽妻姜敬亲墓志
６７．宋公静墓志
６８．平安郡守谢岳及夫人关氏墓志
６９．张通妻陶贵墓志
７０．独孤罗墓志
７１．左荋直长王荣及妻刘氏墓志
７２．李文都砖铭记
７３．刘尚食墓志铭
７４．宫人归义乡君司玺元氏墓志铭
７５．宫人司乐刘氏墓志铭
７６．宫人五品司仗程氏墓志铭
７７．宫人典彩六品朱氏墓志铭
７８．宫人司？六品贾氏墓志铭
７９．宫人尚寝衣魏氏墓志
８０．席德将墓志
８１．宫人采女田氏墓志铭
８２．宫人司宝陈花树墓志铭
８３．樊三品宫人墓志
８４．明云腾墓志

８５．宫人采女田氏墓志
８６．宫人司鎊丁氏墓志铭
８７．翟突娑墓志
８８．桃林县令王哀及妻任城夫人合葬墓志
８９．东垣县主簿张浚墓志
９０．宫人司言杨氏墓志铭
９１．王成墓志
９２．安定胡永及妻张氏合葬墓志
９３．李寿墓龟形墓志
９４．处士张壑墓志铭
９５．静信乡君张夫人妃墓志铭
９６．李绍墓志
９７．张仲宾及夫人刘氏合葬墓志
９８．右勋卫宣城公武希玄墓志铭
９９．化度寺僧海禅师坟记
１００．刘世通夫人墓记
１０１．安万通墨书砖墓志
１０２．尉迟恭墓志
１０３．张难墓志铭
１０４．何刚墓志铭
１０５．银青光禄大夫守司刑太常伯李爽墓志铭
１０６．赵府君德合及夫人杜氏合葬墓志铭
１０７．费智海墓志
１０８．雍王李贤墓志铭
１０９．五品宫人墓志
１１０．王定墓志铭
１１１．八品亡宫志铭
１１２．亡宫墓志
１１３．大周七品宫人墓志铭
１１４．九品亡宫人墓志铭
１１５．七品亡宫墓志铭
１１６．五品亡宫志文
１１７．八品亡宫志文一首
１１８．珎州荣德县丞梁师亮墓志
１１９．上柱国杨基及夫人能氏合葬墓志
１２０．同州清河县尉柱国房逸及夫人李氏合葬墓志铭
１２１．智惠墓志
１２２．永泰公主墓志铭
１２３．游击将军上柱国南阳赵智俭及夫人宗氏合葬墓志铭
１２４．亡宫七品志铭
１２５．亡宫七品墓志
１２６．亡宫七品墓志铭
１２７．五品亡宫墓志铭
１２８．五品亡宫墓志
１２９．亡宫九品墓志盖
１３０．韦洞墓志
１３１．魏国夫人河东裴觉墓志
１３２．许君及夫人华阴郡君杨氏合葬墓志
１３３．冠军大将军行右卫将军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杨执一妻新城郡夫人独孤氏志铭
１３４．薛突利施匐阿施夫人墓志铭
１３５．万泉县主薛氏墓志铭
１３６．韦顼墓志
１３７．李嗣庄墓志铭
１３８．阿史那勿施砖墓记
１３９．龙兴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
１４０．索崇墓志
１４１．八品亡宫年卌墓志铭
１４２．七品亡宫志文
１４３．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执一墓志铭
１４４．刘浚墓志铭
１４５．亡宫八品年五十八墓志铭
１４６．亡宫八品墓志
１４７．王相与夫人衡氏合葬墓志

１４８．亡宫墓志
１４９．张去奢墓志
１５０．陆琛振墓志铭
１５１．南川县主墓志
１５２．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张元忠妻雁门郡夫人令狐氏墓志铭
１５３．殿中省进马宋应墓志
１５４．立功臣冠军大将军右龙武军大将军张登山墓志
１５５．六品亡宫墓志
１５６．太原王府君玼墓志
１５７．处士徐怀隐墓志
１５８．亡宫七品墓志
１５９．唐长安县主簿李公故夫人司马和墓志铭
１６０．左相兼兵部尚书集贤院弘文馆学士崇玄馆文学士上柱国许国公陈希烈墓志
１６１．唐故金紫光禄大夫颖王府司马元怀墓志
１６２．行内侍省内常侍孙公故妻彭城郡夫人刘氏墓志铭
１６３．唐故凤翔观察使神策行营兵马上都留后段晏墓志
１６４．行内侍省给事周惠墓志铭
１６５．中散大夫试少府监高义忠墓志铭
１６６．唐故游击将军守左领军卫曹惠琳墓志铭
１６７．朝散大夫行太守洗马上柱国萧季江墓志铭
１６８．唐故彭王赠司空李仅墓志铭
１６９．郯国大公主墓志铭
１７０．唐故扆德监右银台门进奏使张明进墓志铭
１７１．朔方节度掌书记殿中侍御史昌黎韩井夫人京兆韦氏墓志
１７２．宜都公主墓志铭
１７３．驸马都尉柳昱墓志铭
１７４．太原府参军事苗蕃墓志铭
１７５．河南少尹裴复墓志
１７６．李曰荣墓志铭
１７７．定远将军守左龙武军翊府中郎张涣墓志铭
１７８．会王墓志
１７９．崔慎墓志铭
１８０．殿中侍御史陇西李虚中墓志
１８１．李术墓志铭
１８２．河间郡太夫人宋氏墓志铭
１８３．宣州司功参军魏邈墓志
１８４．殿中试御史陇西李府君夫人范阳芦氏墓志铭
１８５．驸马都尉张怙墓志
１８６．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韦端玄堂志铭
１８７．许遂忠墓志
１８８．行内侍省奚官局令祁宪直墓志铭
１８９．京兆真化府折冲都尉鲁国车益墓志铭
１９０．郯王墓志
１９１．贾温墓志铭
１９２．卢岑墓志铭
１９３．前河阳三城节度视察处置等使怀州刺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澧州长史开国男食邑三千户上柱国李泳夫人太原君王氏墓铭
１９４．安王墓志
１９５．太原府参军赠工部尚书员外郎苗蕃夫人河内县太君张氏玄堂志铭
１９６．顺阳范氏幼女眉孙墓志
１９７．奚官局梁元翰墓志铭
１９８．张渐墓志
１９９．宣功参军钜鹿魏邈夫人赵氏墓志
２００．王氏故笄女十六娘墓志铭
２０１．裴氏小娘子墓志铭
２０２．宋伯康墓志铭
２０３．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韦局丞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同国政墓志铭
２０４．鲁氏子谦墓志铭
２０５．湖南监军使正议大夫行内恃伯太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太原王公素墓志铭
２０６．李敬实墓志
２０７．田师巽母夫人清河郡张氏墓志铭
２０８．狄玄愬墓志
２０９．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已墓志

２１０．翟庆全墓志铭
２１１．妓人清河张氏墓志
２１２．楚国夫人赠贵妃杨氏墓志铭
２１３．朗宁公主墓志铭
２１４．狄公妻骆氏夫人墓志铭
２１５．张叔遵墓志铭
２１６．郭克勤墓志
２１７．阿娘砖墓记
２１８．朝散大夫汉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推墓志铭
２１９．吴兴钱氏女乌娘墓志
２２０．亡尼七品墓志铭
２２１．亡尼六品墓志
２２２．亡尼九品墓志
２２３．亡尼七品大戒墓志
２２４．亡宫墓志铭
２２５．师弘礼墓志铭
２２６．贞士韦君墓志
２２７．李令崇墓志铭
２２８．僧实贻墓志
２２９．简州长史孙府君夫人独孤氏墓志
２３０．邓王王妃崔镇墓石记
２３１．静难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前守右金吾卫大将军充街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石彦辞墓志铭
２３２．推诚翊戴功臣感德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太傅知定州军州事充本州马步军部署管内制置营田使并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定郡开国公食邑五千八百户食实封六百户赠太尉安守忠墓志铭
２３３．提点梓州路诸州军刑狱公事朝奉郎尚书度支郎中上柱轻车都尉赐徘鱼袋姚爽墓志铭
２３４．朝请大夫尚书礼部中上护军范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相土衡墓志铭
２３５．朝奉郎直龙图阁权知陕州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兼提举商虢等州兵马巡检公事飞骑尉赐徘鱼袋借紫游师雄墓志
２３６．金京兆刘处土墓碣铭
２３７．辅昌砖墓志
２３８．安西路耀州尹耶律世昌墓志铭
２３９．夫人李氏墓志
２４０．永寿王府奉国将军诚流淑人杨氏合葬圹志
２４１．永寿王府辅国将军公谿圹志铭
２４２．永寿王府奉国将军诚激淑人任氏合葬圹志
２４３．宗室辅国将军公谿夫人雷氏合葬圹志
２４４．秦府承奉副鹤林王泾墓志铭
２４５．淑人孟氏圹志
２４６．秦藩典宝正崔廷玺墓志铭
２４７．秦府引礼舍人王琮配璩氏合葬墓志铭
２４８．昭勇将军西安左卫指挥使琢吾杨玠墓志铭
２４９．儒官肃轩李拱及元配王氏继韩氏张氏合葬墓志铭
２５０．冯毅苍妻墓志
２５１．墓志盖
２５２．周显继妣李太孺人墓志
２５３．山西灵石县知县前翰林院士顾夔墓志
附录页